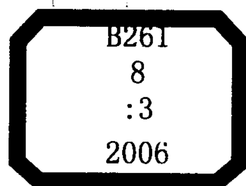
第三卷

艾思奇全書

人民出版社

第三卷

（1940—1948）



艾思奇全書



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纪念“八一”(1940.8)…… 1
哲学是什么(1940.6—8) …… 4
第一章　哲学是研究事物的最一般的规律的科学…… 4
一、认识事物规律性的重要 …… 4
二、科学是研究各种事物规律的学问 …… 7
三、哲学是研究事物最一般的发展规律的科学…… 11
第二章　哲学是党性的科学 …… 16
一、唯物论与唯心论…… 16
二、哲学的阶级基础…… 24
三、哲学本身的斗争和发展…… 29
第三章　辩证法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世界观 …… 36
一、辩证法唯物论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 36
二、辩证法唯物论的思想来源…… 43
三、辩证法唯物论与中国无产阶级…… 49
什么是辩证法(1940.9—1941.1) …… 55
第一章　事物的普遍联系 …… 58
一、什么是事物的联系…… 58
二、怎样从联系的观点上看事物…… 63
三、从联系上看事物的意义…… 69
第二章　论事物的运动变化 …… 72
一、什么是事物运动变化…… 72

二、怎样从运动变化的观点来看事物……………………… 81
第三章 论质量的互相转变 ……………………………… 87
一、什么是质……………………………………………… 87
二、什么是量 …………………………………………… 100
三、量变质和质变量 …………………………………… 109
第四章 论对立的统一(上)……………………………… 133
一、什么是对立的统一 ………………………………… 133
当前文化运动的任务(1940.8)………………………… 152
文学上的才能是哪里来的?(1940.9)………………… 158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1940.10) ……………… 161
民主与集中的关系(1940.11) ………………………… 165
自由亡国论(1940.12) ………………………………… 170
鲁迅先生早期对于哲学的贡献(1941.1)……………… 173
一、时代环境 …………………………………………… 173
二、辩证法 ……………………………………………… 178
三、唯物论与理想主义 ………………………………… 189
关于辩证法论理学认识论的一致性(1941.2)………… 198
辩证法唯物论怎样应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1941.3)………… 213
关于研究哲学应注意的问题(1941.4)………………… 230
光明(1941.5)…………………………………………… 239
进一步认识中国的现实(1941.8)……………………… 242
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1941.8)………… 246
一、前言 ………………………………………………… 246
二、辩证法唯物论思想的发展情况 …………………… 248
三、唯生论和力行哲学 ………………………………… 260

四、“中”的哲学 …………………………………………… 267
反对主观主义(1941.9)…………………………………………… 282
谈主观主义及其来源(1941.10) …………………………………… 290
庆祝郭沫若先生五十寿辰(1941.11) ……………………………… 294
不要误解“实事求是”(1942.4)…………………………………… 295
介绍五四文化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争论(1942.5)………………… 300
“有的放矢”及其他
——学习杂记(1942.5)…………………………………………… 312
学习观念的革新(1942.5)………………………………………… 323
谈讽刺(1942.5)…………………………………………………… 327
谈延安文艺工作的立场、态度和任务(1942.6) ………………… 330
关于唯物论的几段杂记(1942.9)………………………………… 337
一、实际、经验、理论 …………………………………………… 337
二、谈分析 ……………………………………………………… 340
三、谈综合 ……………………………………………………… 345
怎样改造了我们的学习
——在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学习总结报告(1942.10) ……… 348
一、我们学习上有哪些主要的缺点呢? ……………………… 349
二、什么是我们改造学习的方针和办法呢? ………………… 351
三、我们的学习是怎样改造过来的呢? ……………………… 352
四、我们得到了一些什么经验呢? …………………………… 355
哲学战线上的列宁时代
——为列宁逝世纪念日作(1943.1)………………………… 362
人民的成功(1943.2)……………………………………………… 369
共产党的本领在哪里(1943.3)…………………………………… 374
社会科学要研究什么(1943.3)…………………………………… 378

旧的恶习惯应该抛弃(1943.3)…… 382
两个相反的传统(1943.3)…… 385
谈起(1943.3)…… 387
建立新的劳动观念(1943.4)…… 389
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1943.4)…… 393
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的人生观问题
——答陈俊三同志(1943.6)…… 399
六·二三纪念(1943.6)…… 402
向“瓢虫”子孙们警告(1943.7)…… 405
希特勒之流乃是白痴
——兼答流激同志的问(1943.7)…… 407
《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1943.8)…… 414
一、关于“诚”的思想 …… 415
二、关于知与行的思想 …… 422
三、关于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思想 …… 427
扒手的诡计(1943.8)…… 434
逼上梁山(1944.1)…… 437
群众需要精神食粮(1944.1)…… 440
人民的军队(1944.2)…… 443
劳动也是整风(1944.2)…… 447
向日本弟兄们致敬(1944.2)…… 449
新办法(1944.2)…… 451
群众自己的秧歌队(1944.3)…… 453
前方文艺运动的新范例(1944.4)…… 455
《惯匪周子山》(1944.5)…… 457
改善家庭关系,建设新家庭(1944.7—8)…… 459

美术工作与群众的进一步结合(1944.8)……………………… 469
祸首(1944.10) ……………………………………………… 472
"军人乐"(1944.10) ………………………………………… 474
改变面目改变脑筋(1944.11) ……………………………… 477
"中国大众的立场"(1944.11) ……………………………… 481
降魔(1944.11) ……………………………………………… 486
打击与回击(1944.12) ……………………………………… 488
谈面子(1944.12) …………………………………………… 490
不埋没人(1944.12) ………………………………………… 492
再谈面子(1944.12) ………………………………………… 494
柱子(1944.12) ……………………………………………… 496
人类科学文化的胜利
——庆祝苏联科学院二百二十年纪念会(1945.6)………… 498
血肉相连(1945.7)…………………………………………… 502
难(1945.7)…………………………………………………… 506
类推(1945.7)………………………………………………… 509
一往无前(1945.8)…………………………………………… 512
东方强盗就缚以后(1945.9)………………………………… 517
文艺工作者到前方去(1945.9)……………………………… 519
反面文章(1945.9)…………………………………………… 523
一个声援(1945.10) ………………………………………… 525
欢迎叶挺将军(1946.3)……………………………………… 527
从理论工作方面看博古同志(1946.4)……………………… 529
悼念我们的社长和战友博古同志(1946.4)………………… 531
谁是杀人的凶手(1946.9)…………………………………… 534
反对经验主义(1948.7)……………………………………… 539

附录一：

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1942年主编) …… 553
例言…… 554
毛泽东 改造我们的学习(代序)…… 555
第一章 绪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特点…… 563
一、列宁论马克思主义与旧唯物主义旧社会主义的分歧 …… 563
二、列宁论科学精神与革命精神相结合 …… 564
三、列宁、斯大林论“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566
四、斯大林论两派马克思主义者 …… 576
第二章 理论与实践…… 578
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事实是共产主义的出发点，实践是真理的标准…… 578
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理论与实际的关系，理论对于实际的重要性…… 588
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论研究、分析具体环境、条件及历史特点是决定无产阶级政策的基础 …… 600
四、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论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需要最大的灵活性 …… 611
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论主观主义、革命空谈与革命的实际背道而驰…… 625
六、列宁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与怯懦的改良主义 …… 640
七、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与客观主义及自发论、自流论…… 644

八、列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论两条战线的斗争 …… 656
九、列宁、斯大林论政治的明确性和肯定性，反对调和派 …… 673
十、列宁、斯大林论共产党员要成为有头脑的政治家 …… 681
十一、列宁、季米特洛夫论必须终结书本与生活的脱离 …… 683
十二、恩格斯论单纯的理论家不是真正的理论家 …… 686
十三、斯大林论理论与实际一致的典型——列宁 …… 687
十四、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 …… 688
第三章　历史科学的创造 …… 691
一、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论唯物辩证法 …… 691
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规律是从自然和历史中找寻出来，规律以合乎自然及历史为依归 …… 712
三、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 …… 727
四、列宁论历史唯物主义早已由假设变成科学上被证明了的原理——惟一的科学历史观 …… 743
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应用 …… 747
六、列宁论辩证法与折衷主义 …… 766
七、恩格斯论历史唯物主义与庸俗唯物主义 …… 778
八、恩格斯对于口头“唯物主义”者的指斥 …… 785
九、马克思、列宁论庸俗经济学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些特征 …… 786

十、列宁论共产主义思想是人类知识积累的总汇，
一定的思想联盟之必要，应该用唯物主义的
观点研究黑格尔的辩证法 …………………………… 791
十一、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论最伟大的科学家
是反对偏见、打破传统的创造家…………………… 797
第四章 国际经验、民族特点、革命传统………………… 804
一、列宁论革命科学的两个要求 …………………… 804
二、列宁论用批判的态度采取别国经验 …………… 804
三、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论考察、
研究民族的特点 ………………………………… 805
四、列宁论在一定条件下利用革命传统 …………… 814
附录二：
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1931—1945 年译) …… 海涅著 816
序……………………………………………………… 817
一、新的歌 ……………………………………………… 821
二、税关的检查 ………………………………………… 825
三、无聊的亚琛 ………………………………………… 828
四、科隆的大教堂 ……………………………………… 834
五、父亲莱茵 …………………………………………… 840
六、属吏 ………………………………………………… 845
七、梦里的自由 ………………………………………… 849
八、密尔海姆的回忆 …………………………………… 855
九、哈根的中餐 ………………………………………… 860
一〇、威士特法仑的弟兄 ……………………………… 862
一一、秃陀堡的森林 …………………………………… 865
一二、狼的嗥叫 ………………………………………… 870

一三、不幸的救世主 …… 873
一四、太阳，你这控诉的火焰！ …… 876
一五、红胡子的马匹 …… 883
一六、我们也能解放自己 …… 888
一七、半阴半阳的现在 …… 894
一八、明登的恶梦 …… 897
一九、汉诺威的国王 …… 902
二〇、会见了母亲的时候 …… 905
二一、汉堡的大火灾 …… 908
二二、人的改变 …… 913
二三、汉堡的守护神 …… 918
二四、我染上了怀乡病 …… 925
二五、我发誓保守缄默 …… 931
二六、德国将来的气息 …… 937
二七、诗的火焰 …… 944
译者后记 …… 949
附录三：
《“有的放矢”及其他——哲学·文艺·随感集》
前言及目录 …… 951

纪念“八一”

(1940.8)

年年纪念八一，没有今年的意义这样严重。

八一纪念，是为着要反对非正义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的日子，是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阶级为保卫自己的生命安全的纪念日，同时也是保卫人类的进步文化的纪念日。

在今年，我们是临到了这样一个严重的时候，即是侵略战争和反侵略战争，文化的毁灭和保卫文化，已开始形成了全世界范围的广泛尖锐的对垒。

欧洲的最大帝国主义者都卷入了战争漩涡，一个帝国主义者（法国）已经战败投降，抛弃了一切表面的民主，建立摧残人民一切生活的思想自由的专制政府。战争还要继续扩大，美国在不断地增加军事预算，日本正力图利用西欧战争紧张的机会，加紧对中国的包围进攻，企图压迫中国政府投降，从速结束“中国事变”，好向南洋扩大侵略战争。

然而反战的力量也更增长了，为着保卫世界和平和进步文化，我们有最大堡垒苏联。苏联的强大和他的外交政策的正确，使他一直到现在都站在战争的圈外，使他有可能进一步发展本身的力量，加强保卫和平的准备工作，使他有可能把欧洲一部分民族从战争奴役下拯救出来，使他有可能帮助一些小国家如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推翻了腐朽的政治，建立新的幸福自由的文化生活，有可能帮助中国抗日战争。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东方反对侵略的战争，保卫进步文化的一个最有力的支点。中国的抗战已经三年，广大人民在抗日战争中觉醒起来、组织起来，受到了各方面的锻炼，抗日的力量是增强了。日帝国主义的速战速决的梦想早已打破，它的物质力量已受到了极大的消耗，它现在是要作最后的奋力挣扎，想再来一个“速决”的企图。不过，中国现在确有一些动摇的分子，在敌人的加紧压迫之下想要投降，而妥协投降的危险现在又空前严重起来。然而广大的民众，是不会投降的，是有力量抗战到最后胜利的，在广大民众及一切不愿投降的各阶级各党派人士的反对之下，日帝国主义的逼降阴谋是会要失败的。而因此，它在东方扩大侵略战争，加紧“南进政策”的企图一定要受到牵制和打击的。

在这震撼世界的侵略与反侵略的大搏斗中，在战争与革命的，要把世界地皮整个翻转过来的激变中，文艺工作者，也不能不成为战斗的一分子。在中国文艺界，值得我们高兴的是，三年的抗战，使文艺作者都能够在抗战旗帜下团结活动。若干的青年文艺作者，在战斗中产生出来，若干的文艺工作者，投身到抗战工作中去，文艺也受到了实际的锻炼，获得了不少的进步。现在再没有人敢说文艺与抗战无关了，现在的文艺工作者，都相信自己应该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为抗战、为反侵略及保卫进步的文化而服务。

但文艺界的工作不是没有缺点，文艺界的任务，是要把抗战的各方面的现实活动，生动而具体地反映出来。在目前来说，对于这一任务，我们还是落后得很。抗战的发展是多么广泛宏伟，然而文艺工作却是那么狭小、萎缩。多少的英勇伟壮的事迹我们没有写它出来，多少深刻广泛的社会变化我们的作品不能加以追踪，从文艺中，我们现在还看不到能够有最大的启发人民抗战觉悟和

胜利信心的作品，我们也没有把黑暗腐朽的方面加以深刻的暴露，我们不是没有进行过一切尝试，不是没有努力用一切形式去把握。现实的各方面，然而努力的成绩，都还薄弱得很。我们还没有能够很好的总结文艺工作的一切经验教训，不能建立完整的文艺理论……。

纪念八一，我提议文艺界应该重新下一个大的决心，进一步努力去做我们的工作，把过去的一切得失，加以全面的研究，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都这样来做一个反省，依据这样的反省的结果，决定我们前进的计划，使我们更有力、更有成绩地完成自己岗位上的任务。

（原载《大众文艺》第1卷第5期，1940年8月15日）

哲学是什么*

(1940.6—8)

第一章　哲学是研究事物的最一般的规律的科学

一、认识事物规律性的重要

人类是在战斗中争取生存和发展，为要取得物质生活资料的满足，要进行劳动、生产，这首先就要与自然界作斗争。革命的阶级为要争取全社会大多数人的生存和发展，必须要推翻少数压迫他人、剥削他人、危害他人生存的反动阶级，必须要与旧社会制度进行坚决的斗争。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解放，尤其需要艰苦的战斗。中国民族倘若不与日本帝国主义抗战到底，就不要想获得真正的自由，妥协的道路必是死路，这是有了实践的证明的。我们要求得自己的独立、生存和发展，就不能不与妨害我们的独立、生存、发展的各种障碍物进行各方面的战斗。我们努力进行生产运动，我们反对大地主资产阶级的倒退妥协的企图，反对日寇汉奸妥协投降分子的分裂阴谋，正是中华民族争取生存和进步的战斗的表现。

---

* 本文是作者以延安新哲学会名义，为当时开展的学习运动编写的哲学基本教材。

为争取生存和进步而战斗，就是革命的实践活动，就是改变世界的斗争。就是要克服民族和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困难条件，创造新的更有利的条件。为要达到这样的目的而斗争，并不是本能地盲目乱撞就可以有结果的。动物也有它们的“生存竞争”，然而动物的斗争，基本上是完全受自然本能的支配，全凭着生来的肉体器官的活动，所以只能在竞争中适应于一定的自然条件，而不能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有利的条件，也就是不能积极地改变世界使世界适合于自己的生存需要。人类之所以能改变世界，是因为在每一斗争行动中，都有一定的目的意识的作用，是由于在斗争之先，已能够在自己的思想里把握了一定的斗争的前途、方法、步骤。不论在对自然的斗争，对反动者的社会斗争，对侵略者的民族斗争中，人类都是这样依据着目的意识来造成自己的有利的生活条件，而不是依据本能作用适应于自然条件。这是人类之所以比动物更优越的地方。马克思说：“蜘蛛的工作，与职工的工作相似，在蜂房的建筑上，蜜蜂的本事，曾使许多建筑师惭愧。但最恶劣的建筑师，比最巧妙的蜜蜂更优越的，是建筑师以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脑中把它构成。劳动过程终末时取得的结果，已经在劳动过程开始时，观念地存在于劳动者的表象中了。他不仅在所工作的自然物上，引起一种形态变化，同时还在自然物中实现他的目的。他知道他的目的，并以这个目的当作方法来规定他的行为的种类和方法，并使自己的意志从属于这个目的。”（《资本论》第一卷，郭译本，第127页）

但所谓目的意识的活动，决不等于纯凭主观妄想的，毫无规律的行动。人如果希图任凭自己的妄想来改变世界，那结果一定是会碰钉子的。要使自己的行动成为正确有效的行动，要想使自己战斗的实践能够获得胜利，那么，自己的行动的目的和计划必

须首先适合于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必须凭据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认识来决定，而不是凭据主观的妄想来决定。不能希望没有水的田上种出稻米，不能在冬天耕地而不等到春天。建筑师作建筑计划时必须依据力学、物理学的规律，马克思的《资本论》揭发了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发展、没落的一切规律，为的是要能指导无产阶级进行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设共产主义世界的斗争，空想的社会主义始终只是空想，不了解社会和革命发展的规律，要正确有效地指导革命战争是不可能的。民族革命战争也是一样，"必须懂得抗日战争的规律性，才能实现对于它的战略指导，才能决定为战争服役的一切战略、战术、政策、计划与方案；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是一样，只有我们研究了与认识了它的规律性，我们才能有效地推动统一战线使之进入巩固、发展之途，而为战争的胜利起其支柱的作用"（毛泽东）。

所以，认识事物的规律，是我们改变世界的斗争活动的重要关键，懂得了这事物的规律，我们对于与该事物斗争发展的前途就可以作大概的估计，就可以依据这估计来适当地调节我们的行动计划，就可以知道怎样去造成适当的条件以达到我们所要走的方向，就可以自由地控制斗争的对象，就可以依照我们的目的创造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认识事物的规律，使我们的行动适合于事物的规律，就可以创造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业；违反了事物的规律，无论你是什么英雄伟人，也终于会失败的。反革命的阶级的行动是违反人类历史进步的规律的，不论这阶级掌握着多么巨大的人力物力，在与革命阶级斗争的路途上一定要走到崩溃的地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企图维持那必然要没落的资本主义体制，它是违反历史规律的退步的战争，而我们的抗战正是推动这历史的必然规律向前发展的进步战争，所以不论敌人的组织力量多么

强大，我们有根据说抗战下去一定可以得到最后胜利。这自然也要有其他的一些条件，尤其是要我们能坚决努力执行这历史的任务，就是要能不丝毫妥协的抗战下去，要力求我们自己各方面的团结和进步。然只要能够保持这样的条件，而不是坐着等待胜利，那我们就可以有充分的胜利的自信。因为在我们的坚持努力之下，胜利就是必然的规律。

世界的事物是无限地多种多样的，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发展规律，所以事物的规律性也是无限地多种多样的。我们在改变世界的活动中，要与各种各样的事物相接触，要与各种各样的事物进行多方面的斗争，我们不但与民族敌人斗争，而且为着克服物质缺乏的困难要与自然作斗争，我们不但要对付敌人的军事上的进攻，而且要对抗敌人文化、政治、经济上的进攻。要在这多方面的斗争中获得胜利，就必须从多方面去认识各种事物的不同的发展规律。依据每一事物的具体的规律来决定对付该事物的具体的办法。在社会的斗争上要依据社会的各方面（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的规律，对自然的斗争上要认识自然的各方面的规律。斗争的方面愈多，斗争的对象愈复杂，我们所要具体把握的规律的方面也愈多。同时我们具体地把握的规律性的方面愈多，则我们利用规律性以控制事物的能力也愈强。倘若把不同事物的不同规律混淆起来，把一种事物的规律简单地移用于另一事物，如机械论的简单用自然的机械规律来解释人类社会，那就会陷入极大的错误，尤其在斗争行动中会引到失败的道路上去。

二、科学是研究各种事物规律的学问

要有系统地从事物各方面来把握它们的规律，就要从事各种科学的研究。我们现在已经有着各种各样科学部门，每一部门研

究一定种类的事物对象，揭示一定种类的具体规律，为我们的斗争的某一方面提供一定的认识基础。各种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现象的各方面的规律，我们依据这些自然规律的应用，从各方面对自然进行斗争，以生产我们的物质生活资料。社会科学的研究指示社会发展和革命斗争发展的规律，我们依据这些规律的向导，进行各方面的社会斗争与民族斗争，向着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前途迈进。惟一最正确最完满的社会科学，我们知道，就包含在马克思主义里。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同时也是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类求解放斗争的思想武器。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革命实践，都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证明了它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力量。这就因为马克思主义之为主义，与其他一切社会政治思想不同，它并不建筑在任何死的信仰教条上，而是依据于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丰富而具体的规律性的把握。

每一种科学规律的认识，对于我们都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我们既能正确地认识了该事物的规律，就是对于该事物有了正确的理论认识，就对于它有了正确的理解。第二，理论的认识，又反过来可以作为我们研究的方法，我们依据这理论的原理，可以把它作为进一步研究更具体的问题的指南，把握新的更具体的事物规律的向导。例如，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里，认识到私有社会发展的动力是阶级间的互相关系，那么，当我们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时候，就要依据这样的规律原理，来具体地分析中国的阶级，这些阶级的力量对比，以及每一阶级在中国社会发展上所起的作用(进步的还是反动的)，根据这样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具体了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规律，并由此可以计划我们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应采取的办法和步骤。又譬如：我们从列宁

的帝国主义理论里，认识了各帝国主义为要独占经济利益，为要争夺殖民地必然要引起战争，认识了这经济上的必然规律。那么，当我们观察现在的世界政治问题的时候，不管各帝国主义者的战争的口实是多么好听，不管表面的原因是多么冠冕堂皇，不管他们有多少理由说明自己是为了和平正义，我们都要从各国的经济互相关系上去作分析研究，依据这样的研究，来对世界上一切真正要正义和平的人们揭破那骗人的假面具，并指出为正义而战斗的真正的途径。单单依靠既成的理论，单凭旧的已发现的规律，是不是就能完全把握新的事物呢？当然是不能的。把理论作为研究方法，并不是指简单地背诵既有的理论词句，并不是把旧的规律的认识无条件地移用到新问题和新事物的研究上。因为既有的理论或规律的认识都是比较一般的规律认识，而新的事物和新的问题里一定包含有一些新的特殊条件，因此，它就不能一丝不改地依照既知的规律而发展，它就不能不有某些新的特殊性质，它的发展就不能不有更具体的内容。因此，把既知的规律或理论原理作为方法，那意思只是说把它作为研究的引导，使我们对于新的事物的发展给与大概的估计，使我们看出它的发展的一般的方向，依据这种估计，可以规定我们研究过程的大体的步骤和研究的主要方向。然而并不是说，仅仅这样，就已经把问题解决了，把新的事物的规律把握住了。相反地，仅仅这样，问题就永不会解决，要解决问题，还必须充分研究新事物中所具备的一切主要的具体条件，研究这些条件对于既知的一般规律所发生的影响，所给与的具体的偏向，这样来把既知的理论原理加以补充发展，然后才能正确地解决我们所研究的问题，才能把握所要研究的事物的规律。

恩格斯发现了这样的一般规律，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会要衰亡，这一般地是完全正确的，然而不能因此就说苏联今天建

设了共产主义社会，就一定不要国家。相反地，因为苏联还处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中，这个条件使共产主义国家不能放弃保卫自己的武装，所以斯大林就告诉我们，在苏联就是建设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还需要国家。中国现在正进行着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中国的资本主义还需要发展。这是依据一般的理论对于中国社会发展前途的一个正确的展望。然而并不能因此就一般地说，中国革命与西欧资产阶级革命一样，仅仅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封建斗争，是要建立以资产阶级为统治者的资产阶级国家，如托派所主张的那样。相反的，由于中国有具体的特殊条件：资产阶级的软弱动摇性，无产阶级的坚强壮大，以及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国际环境，使中国革命不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最广大的人民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就是最近的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办法来应用的最辉煌的实例。

所以，把理论原理作为方法来应用，就是要把既知的较一般的规律作为研究具体问题的向导，就必须要依据新的实践条件来把既知的规律加以补充和发展，就是要把握更具体的新的规律和新的理论原理。同时，新的规律的发现，又可以反过来作为新的方法原则，引导我们研究更新的革命和发现更新的具体的规律。这样，理论和方法的作用互相推移，我们对于事物的认识也就可以不断地更新，不断地进步，具体化，不断地发展。使我们愈多方面地把握事物的规律，愈更多方面地增加我们改变事物的能力。因此，科学的理论是要不断地创造、发展，每一次的方法上的应用，都要多少有一些新的方面的发现，而决不停止于任何固定的论点，决不重复死的教条公式。倘若只会重复背诵旧的理论公式，倘若在任何条件之下仍只知道固执一定不变的论点，那就是教条主义，而教条主义是科学的革命的学说所要反对的。正如列宁所说：“我

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这样说，他们曾很公平地讥笑那些背诵和简单重复公式的行为，因为这种‘公式’最多只能提出一般的任务，而这些任务必须依历史进程中每个特殊时期地具体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环境而改变其形态的，……必须领会那不容置辩的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应当估计到活的生活，估计到实际中的确定的事实，而不是继续拘守着昨天的理论。”（引自《联共党史》，第425页）这是专就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而言，然其实对于一切科学的研究，一切科学的规律，都可以作如是观的。

三、哲学是研究事物最一般的发展规律的科学

现在要说到哲学上来了。就哲学的研究对象来说，哲学是研究世界一切事物的总法则的科学，也就是如列宁所说的：“哲学……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科学，即关于世界一切具体内容及其认识的发展规律的科学。”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也说辩证法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及思维的一般运动法则的学问”（吴译本，第107页）。这就是说，哲学是以整个世界的总体为它的研究对象。哲学的研究，使我们对于世界的一切事物，得到一个总的理解。也就是使我们获得一定的世界观。哲学使我们知道，世界的一切事物，就它的总体说来是什么，一切事物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存在，并一般地依什么样的规律运动变化。我们在改变世界的活动中，一般地要采取哪一些基本态度，要怎样对付一切事物，才是正确的态度？

所以，哲学之与其他科学不同，就在于其他的科学，都有一定的特殊研究对象，都把世界的某一种类事物作为自己的研究对

象，都只研究一定特殊部门的事物规律。而哲学的基本对象却不是任何一特殊的事物部门，不是某种特殊的事物规律。而是事物的总的一般规律。然而，要正确地了解世界事物的一般规律，首先不能不对于各部门事物本身的规律也要有了解，不研究人身体的各部分的构造和作用，就不能真正了解整个人体的生活规律。不以总体中的各部分认识为基础，要想直接对于总体的联系运动规律有正确清楚的认识，是不可能的。所以，哲学的研究，事实上不应该离开一切个别科学的研究而直接以世界事物的总体为特殊对象，却是要以个别科学的研究以及人类对于世界的各方面的认识做基础。就像做革命工作的领导者要把各部分的工作者的个别经验作为基础，加以总结，而得到一般的工作指导原则和指导规律一样，每一时代的哲学都是总结这一时代的各方面的人类认识和科学研究，而抽出基本的总的规律。正如列宁所说，哲学是“对于世界认识的总结、总计与结论”（同前）。

所以，哲学的发展，和人类对于事物的规律的认识以及科学研究的发展水准有密切的关系。在不同的科学发展水准之上，哲学也就有不同的成就，采取不同的姿态。要了解哲学的历史，必须也了解科学发展史以及人类其他方面的认识史，科学的历史是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背景。

在我们现在的时代，科学已发展到了高度的水准，科学本身已分化为极多极复杂的部门，事物现象的每一种类，都有特殊的科学部门加以专门的研究：不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是这样。然而在过去，在科学发展比较低度的时代，却不是如此，许多事物现象，常为科学的研究所达不到。例如社会科学，是一直到19世纪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才建立了坚固的基础。18世纪以前，真正严格的科学研究主要的还只是限于力学、数学部门。至于古代，

则科学的研究还只是萌芽时代，虽然那时对于事物现象的某些方面的规律，已经获得了科学的精密认识，然而有系统的专门的科学研究，却还没有存在。愈是回溯到古代，则科学的部门分类愈不完全，专门化的程度愈不充分。这种情形，就不能不对哲学的发展给予重要的影响。因为哲学所研究的一般规律，既是要以各科学所研究的特殊事物规律为基础，那么，科学愈是不发展，哲学所能依据的素质愈是不完全，根据这些素材所作的总结和概括也就愈更带有片面的或臆断的性质。在这样的基础上的过去的哲学，虽然对于世界发展的总规律有某些方面的发现，却都没有能够深刻而完满地把握了这规律。

例如说，在古代，因为科学的专门研究还只在萌芽中，对于世界事物的分析研究的能力还非常缺乏。因此对于世界的总的规律也只能凭直接对世界总体的观察和天才的臆断来加以把握。最初的古代希腊哲学家，都把世界看做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或自然界，把世界的一切事物看做互相转化互相联系的总体。这就是说，他们已把握到了一种唯物论的辩证法的世界观。然而这种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思想，是没有丰富的科学认识做基础的，它只是古代哲学家对世界的总体直接观察的结果。在他们看来，这种思想是自明的，用不着证明的（事实上在他们的时代也是找不到具体科学的充分证明的）。所以恩格斯把古代哲学者称做直观的唯物论者和天生的辩证法论者。正因为是直观的没有经过科学的分析研究的提炼的世界观，所以它本身一方面虽然是大体上正确的、辩证法唯物论的思想，然而同时也是朦胧的、幼稚而粗糙的东西。

又例如，就近代西洋的哲学来说，如恩格斯所指出的，15世纪后半期的西欧才开始有了真正的科学（《反杜林论》引言，第8页）。也就是从这时起才有了对于世界各部门的真正精密的分析研

究。然而既只是开始，因此所能涉及的范围也就很有限，社会科学用不着说，自然科学方面也还只是在力学方面有较大的成就。这种情形一直继续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到工业革命和科学大发展以后，才有了改变。在那时期里，因为科学的片面的发展，哲学也带着片面的性质。当时的进步的唯物论哲学思想，依据了机械力学的研究成果，竟把机械规律夸大为世界事物的一般的运动原理，于是就有机械唯物论的哲学思想。

另一方面，因为科学不发展，所以事物现象的许多部门都仍然停留在科学研究之外，于是对于这些部门中所提起的问题，就用哲学的原理来加以臆断的解决，特别是社会政治的问题如此。这就是说，凡是科学研究所没有达到的地方，都成了哲学的特殊对象。哲学成了“科学的科学”。事物各部门的科学研究不能离开哲学而独立起来。如果说古代哲学中科学与哲学是完全没有割分，那末近代这一时期里，只有一部分事物的研究，能够作为科学而独立起来。哲学并不完全是依据科学的研究成果而总结为一般的规律，却部分地在科学之外有自己的特殊研究对象，部分地占有了科学的领域。只有到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这时代科学各部已大体上建立完备，哲学已不必在科学之外找自己特殊的对象，而只有完全依据各科学的成果，研究世界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这哲学就不是特殊的科学之科学，而是“单纯的世界观，它应该不是在某种特殊的科学之科学上，而是在现实的科学上，找得自己的立证，并表现自己的作用”（《反杜林论》，第166页）。这样的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辩证法唯物论。所以，辩证法是比其他一切哲学思想更完满更丰富而具体的发展学说，是最正确的进步的世界观，因为它不是对于任何特殊事物对象的臆断，而是真正科学认识成果的最高的总结、总计与结论。

在哲学上所把握的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如各部门的科学规律一样对于我们有两方面的意义，它给我们一般的规律的认识，那就是使我们对于世界的一切事物获得一个总的理解，总的理论原理，它是我们的世界观。另一方面，这一个总的理论、原理与世界观，又可以反过来作为我们研究一切事物的总的方法原则，作为解决一切具体问题的总的向导，它是我们的科学的方法论。我们研究哲学一方面是为了认识世界，理解世界的一般发展方向，同时又是为要使我们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得到一个总的正确向导，使我们在解决问题研究事物的时候，能经常地保持科学的正确态度。自然，哲学本身的规律，归根到底还是由一切科学研究的成果中抽引出来的，辩证法唯物论的哲学，是人类各方面认识发展的总结，所以，个别科学部门的研究里，已包含着辩证法唯物论的因素，个别部门的科学者在他的研究中，无意识地在某些方面也多少依着正确的思想方法去工作。所以，一个专门科学者虽然完全不懂辩证法唯物论，也还不一定就不能作科学的研究。一个有着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的人，即使没有学过辩证法，但在他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他们的方法也可以常常在某些方面与辩证法的规律有暗合的地方。专门的科学家常常无意识地是唯物论者，经验丰富的革命战士常常是天生的辩证法家。然而这种自流性质的辩证法唯物论的把握，是不牢固的。科学专家和单凭经验而工作的战士，他们的研究认识常常要受到专门范围和经验范围的限制，常常因为只注意到自己的有限范围内的问题，而忽视了更大范围的事物的相互联系。因此，他们解决问题的正确的态度，至多只能在自己专门的范围和熟悉的经验领域内，能够保持到相当的程度，在这样的范围和一定的程度内，他们的方法可以和辩证法有某些方面的吻合，一到超出了这相当的程度和范围，一到有了新的事物发展，他们就常

常会不知道怎样处理，常常就会错误地理解。所以，近代的许多自然科学家，因为他们没有新的思想方法上的训练，他们的发现本身虽然常常是证明辩证法的正确性，而他们自己却不知道怎样来理解这些发现，以至于达到唯心论的、宗教性质的结论。列宁所说的近代自然科学的危机，就是这样的。他指出在近代自然科学的新发现里，辩证法唯物论是“病态的诞生”了。所以说是病态的，就因为这些发现本身虽然是辩证法的，而由于科学家对于辩证法的无知，所以不能得到它应有的健全的理解。

所以，研究哲学，掌握辩证法唯物论的思想，有意识地把它用作我们研究事物解决问题的方法向导，这是为了要经常保持对事物的科学态度，经常保持处理问题的正确性。倘若仅仅满足于自己狭小的专门的知识范围，满足于自己熟悉的然而有限的经验，以为仅此就已经算是十足科学的态度，轻视哲学的研究，轻视一般的思想方法的向导，结果就会成为不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唯心论的俘虏。

研究哲学，掌握辩证法唯物论，对于一个科学者和革命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就在这里！

第二章　哲学是党性的科学

一、唯物论与唯心论

当我们在一定的社会生活中进行斗争的时候，随时都可以看到我们自己和周围世界的对立。我们一方面看到，自己周围有着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这个环境是在我们之外独立存在，独立运动变化着的，我们不能以自己主观的愿望，随意将这环境创

造或毁灭，不能随意改变它的变化过程。中国的崇山峻岭长江大河，是千万年来就存在着的，日本帝国主义是一定要想灭亡我们的，汉奸顽固分子是在事实上帮助着敌人的，各帝国主义相互间是有矛盾的，广大人民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是怀着深刻的仇恨的……这些，就是我们在抗日的战斗中所处的环境，或环境中的各方面的事实，这些事实是独立在我们的愿望之外确定地存在着，我们不能幻想日本帝国主义忽然不侵略我们，即使我们要这样幻想，也对于事实不会发生任何影响，而事实仍是照样的事实。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无限复杂的事实环境里生活着，而且也只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去争取生存，我们不能希望目前能生活在不被侵略的国家里，我们既是中国人，就只能在中国的战斗环境中过活，这环境中有许多事实条件于我们的生存是有利的，也有许多是危害我们生存的条件。我们也只能努力去争取有利条件，克服困难条件，以求得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而不能幻想任何天上的奇迹，为我们突然除去了一切困难条件和造成完全顺利的条件。这样的一切独立在我们之外确定地存在着的环境事实，就构成客观世界或客观存在，或物质世界。

另一方面就我们自己来说，在生活和斗争中，我们是经常有着一定的立场、要求和目的。这要求和目的，又是和客观世界的现存条件对立的，我们在事实上不能希望日本帝国主义忽然不侵略中国，不能幻想现在突然建立起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国家，这一切在眼前的客观世界里是不存在的，然而我们依据自己的民族的立场，要求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要求达到建立新中国的目的。而且也必须要努力为着这些目的和要求去进行斗争，我们不能满足于眼前的生存条件，而必须依一定的、超于眼前存在的条件去行动，否则我们就说自己的生活没有方向，就说我们的行

动是盲目的，而盲目的行动，对于生活是危险的。倘若我们中国大多数的人民，在目前都没有了一定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要建立新中国的目的，那么也就不会为这目的去努力奋斗，也就不会有这伟大的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运动，倘若我们只是图敷衍目前，像猪一样的得过且过，不管将来的前途，那就会糊里糊涂地让人来宰割，结果是走上灭亡的道路。这样，一定的正确的目的和要求，在我们的生活上是重要的，而为着达到我们斗争的目的，一定的正确的行动计划和步骤也是必要的，而为着要能够决定正确的目的，正确的计划，我们对于事物又必须有科学的、规律性的认识：这是在第一章已说过了的。因此，在我们的社会生活斗争中，我们看见，在我们自己方面，有着自己一定的立场、要求、和目的，为实现要求、目的的一定的计划，决定计划所依据的事物规律性的认识，还有，在斗争中我们自己心中所引起的情感的要素，我们的热情和勇气，这一切，就构成了我们自己的主观意识或主观思想，或所谓我们的精神。

这样，我们就看见了，我们自己和周围世界的对立，是表现为客观世界和主观意识、客观存在和主观思想、或物质和精神的对立。我们一方面是客观世界的一分子，我们不能不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之下求生存，我们的生活不能不为物质存在条件所决定；而另一方面，我们又是依主观的目的意识而行动，我们不能满足于眼前的物质条件的限制，而要依据自己的思想的引导，追求眼前客观世界里所没有实现过的目的，我们要依适当的计划步骤，与客观世界作斗争，改变它的物质条件，使它服从于我们自己的要求，使它受到我们的控制、驱策，而服役于我们的目的，这就是说，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的主观、思想、精神，似乎又有了决定的作用，它能够创造新的世界。

在这里，我们就遇到了哲学上的根本问题：客观与主观、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这对立的方面，它们互相间的关系应该怎样确定？是客观决定主观，还是主观决定客观？是物质存在条件决定主观意识，还是主观意识决定存在？物质是一切的根源？或精神是一切的创造者？从我们上面所谈到的来看，这问题似乎很难解答，似乎两种对立的答复都有理由。一方面，人不能不在一定的客观物质条件下求生活，客观世界的存在和变化是独立在我们之外的，确定了的东西；这就表示，物质是根源，客观世界是有决定作用的。而另一方面，我们是为着自己的主观目的，依据自己的意识的计划去斗争，去改变世界，去创造新的事物，这又表示主观是有决定作用的，精神、思想是创造的根源，这就达到了另外一方面的解答。

这样，两方面的解答似乎都有理由，而两个解答又是互相反对的，如果承认一方面正确，就不能不反对另一方面的正确，如果站在一方面，就没有理由同时也站在另一面。如果说物质是根源，就不能说精神又是世界的创造主，相反的情形也是一样的。于是，这就造成了哲学史上两种对立的派别。把精神看做创造者，而认为物质只是精神活动的表现，把主观思想看做决定一切的东西，而以为客观世界只是主观活动的产物，——这样来解答问题时，就属于唯心论的派别。把物质看做根源的、第一义的东西，把精神看做从生的、第二义的东西，把思想意识看做物质运动的作用或反映，认为主观为客观所决定，——这样来解答问题的，就属于唯物论的派别。

唯物论和唯心论是哲学史上最基本的两大对立派别，也可以说是互相对立的两大营垒。任何哲学家和哲学思想，都必然要归入两大营垒之一。为什么呢？因为如前面已说过，主观与客观、精

神与物质……等中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是哲学上的最根本的问题，因为这一个问题的解答，是一切哲学思想的基础。哲学上所要解决的问题自然很多，不只这一个问题，不同的哲学处理着不同的问题，然而不管怎样，物质和精神的问题是一切哲学问题最根本的，它的解答就决定了其他问题的解答的性质。在这根本问题上，一个哲学者如站在唯物论的方面，那么对于其他问题的解答也就会有了唯物论的性质或唯物论的基础。相反的情形也是一样的。

例如，我们已经说过，哲学是研究世界发展的总规律的学问，科学是研究各种事物规律的学问。但是我们对于这规律的了解，会因为我们是唯心论者或唯物论者而有不同。倘若我们是唯心论者，认为精神是一切的根源或创造者，那我们就会以为，这些规律也只是某种精神的产物。我们会说，我们所把握的事物规律的知识、并不是客观的物质本身的规律，而只是一些思想的规律。这些规律或者是存在于我们人类的思想意识中，这就有主观唯心论的哲学，以为世界一切的存在和运动都只是我们主观意识的运动；或者是存在于某种至极伟大的宇宙精神、神、或上帝的思想中，这就有客观唯心论的哲学，以为世界的一切事物的存在和变化都只是某种万能的神的思想活动的结果。相反的，如果我们是站在唯物论的立场上，认为物质是世界一切事物的根源，我们就把所认识的事物规律，了解作客观事物本身的规律，了解作独立在我们的思想意识之外的自然的规律。这些规律不是我们的思想可以随意创造或随意改变，也不是由任何伟大的宇宙精神或神所创造的。而是事物本身具有着的物质发展规律。

这样，当我们提起怎样去把握着事物规律的问题时，如果是站在唯心的立场上，我们就只好在主观的思想意识里去找根源，而不是从客观事实中去研究。如果规律是神的思想，那么，我们要

把握规律，只好设法去获得神的启示，从神秘的灵感中去找认识的泉源；如果规律的认识只是我们自己主观思想活动的结果，那我们要获得科学的知识，就只好期待那天才思想的出现，把所谓天生颖悟的先知先觉者的思想当做科学思想的标准，而不是从客观事物本身的现实发展中去找标准。相反的，如果我们是站在唯物论的立场上，我们就必须要虚心地客观地就事物本身去研究，尽可能地依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找规律，而不能凭据任何主观的任意的思想，如果主观的思想与事物本身的发展有不一致的地方，那么，我们就要以客观事物做标准，依据客观事物来纠正主观思想的错误。

又例如，当我们提起世界是怎样发生和发展，历史怎样运动变化的时候，也因为我们是唯物论者或唯心论者，而有不同的解答。如果是唯心论者，那就会以为，世界是神创造的，人类历史是由英雄伟人的思想推动的，因此，我们要改造世界，就只好依据不可知的神的降灵和救助，我们希望社会生活变好，解除生活的痛苦，就只好期待着什么时候有这么一个良善的英雄或“真命天子”出现，总之一切只好去听偶然的奇迹来解决，而不能期待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解决。相反的，如果我们是唯物论者，我们就会了解，历史是依客观事物的必然规律而发展，要改变历史，首先要切实认识这客观事物的规律，首先要看清楚历史发展的方向，然后依据着这样的规律，循着这必然的方向，去进行推动的工作，这就是说，我们能够依靠事物规律的认识，有计划地用自己的力量把历史推向前进，而不必依赖任何神秘的奇迹。

这样，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我们的解答不同，那么在其他一切问题的解答上也就不同，于是由于这根本问题的两种不同的解答，就把一切哲学分为两大对立的营垒，这两大营垒互相对立，

互相战斗，因此哲学的历史，基本上是唯心论和唯物论的斗争史。一切的哲学，不管它表面上派别怎样复杂，不管它所争论的是或大或小的无限繁多问题，然而归根结底，仍可以分为唯物论和唯心论的两大阵营。恩格斯说："整个哲学的最高问题，就是思惟对于存在的关系、精神对于自然的关系问题……哲学家之分成了两大营垒，就是按他们如何回答这问题为标准。凡断定精神先于自然界而存在者，……就组成唯心主义的营垒。而凡认为，自然界是基本起源者，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学派。"（引自《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译本，第132—133页）

有没有这样的哲学派别，能超出唯心论与唯物论的两大营垒之外呢?表面上似乎有各种复杂的派别，我们似乎也常常看到有这样的哲学，它以种种理由，声明自己不是唯心论也不是唯物论，而是唯心论和唯物论以外的或"更高的"派别。然而如果加以最后分析，在实际上，这样的哲学，常常都是伪装掩饰了的唯心论的哲学。二元论是不是两者以外的派别呢？二元论只是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折衷的混合，是不彻底的唯物论，是在某些问题上成了唯心论的俘虏，是动摇于唯心论和唯物论之间，而不是真正的第三种派别。

哲学是有党性的，哲学的斗争是党派性的斗争，而所谓哲学上的党派性的斗争，首先就表现于这样的事实，即任何一种哲学，都是站在上述两大营垒之一个营垒上，而与另一营垒对立，对另一营垒进行战斗。或是站在唯心论的营垒，或是站在唯物论的营垒。哲学也不是简单的和平的说理，它也有它的斗争。

辩证法唯物论是唯物论的最高形态，辩证法唯物论者的党性，首先就表现在这样的事实上，即他是坚决地拥护彻底唯物论的立场，而与一切唯心论者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辩证法唯物论者要坚决拥护唯物论的立场，因为只有彻底唯物论的立场才能使我们

真正把握客观事物的规律的认识，才能够获得事物的真实的理论知识。因为唯物论的世界观是要我们虚心地客观地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把握认识事物，而不要有任何主观的夸大、曲解。恩格斯说："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不过就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了解，而不需要任何外来的附加。"（引自《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32页）

辩证法唯物论要坚决反对唯心论，因为唯心论是把人类的意识、思想的作用夸大，把我们对于事物的某些认识加以主观的曲解、神化，以为精神、思想可以决定一切，因此就使我们不能如实地虚心地认识客观事物的真相，使我们不能够获得事物的真实的理论知识。使我们眼中的世界现像带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的性质，使我们走向"僧侣主义"，接近宗教的世界观。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可以说在本质上就是实事求是的真实理论和曲解事实的架空思想的斗争。列宁说："哲学的唯心论是认识的诸特色、诸方面、诸界限中之一个特色、一个方面。一个界限底片面的、夸张的、过分的发展，发展成为与物质分离的、与自然分离的、神化的绝对。唯心论是僧侣主义。诚然，但哲学的唯心论，是到达僧侣主义的道路，是经过人类的无限复杂的认识的诸色彩之一而到达僧侣主义。"（《哲学笔记》）

辩证法唯物论是有党性的，辩证法唯物论者既是要站在彻底唯物论阵营上坚决反对唯心论，所以也就要能够在一切哲学派别中分辨出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对立的真相。不管派别多么复杂，不管每一派哲学所用的名词术语是多么新颖别致，不管它的论辩是多么巧妙朦胧，使你似乎看不出它是属于哪一派别，然而辩证法唯物论都要能够从五花八门的名词术语以及诡辩技巧的背后，看出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基本的对立倾向，并站在唯物论的方面，打

倒唯心论的方面，列宁说："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哲学中，自始至终，是有党派的。他们能够在每一个最新的倾向中，发现出它之背离唯物论与对唯心论及信仰主义的让步。"又说："恩格斯是依照着马克思的精神，而与马克思密切合作；他在一切哲学著作中，对于一切问题，都简单地明了地把唯物论的阵线与唯心论的阵线对照起来。"又说："我们讨论到每一个认识论上的问题时，我们讨论到新物理学所提起的每一个哲学问题时，我们都能追迹唯物论与唯心论之间的斗争。在一大堆新术语的诡计之背后，在博学的烦琐哲学的渣滓之背后，我们总是看到对解决哲学问题之两个主要阵线，两个基本的倾向。不是把自然、物质、物理的、外在的世界视为基始的，而是把意识、精神、感觉、心理的等等视为随附的。在事实上，仍然是这个根本问题，把哲学家划分为两大营垒。"（摘自《马恩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章）

二、哲学的阶级基础

为什么哲学上有唯物论和唯心论的两大营垒间的斗争？为什么人类的各种世界观中，一方面有追求客观事物本身规律的真实理论，即唯物论；而另一方面又有忽视客观事物规律，把主观的精神思想作用加以夸大、曲解的唯心论？这问题，不是哲学本身可以解答的，不是从人的哲学思想本身可以得到说明的。使人的思想发生分歧和对立的原因是什么？这要从人类的社会生活里才能找到它的基础。

第一章已经说过，我们认识事物的规律，为的是要能够在社会生活中进行胜利的斗争，为的是要能够依据这些规律的认识，使我们改变世界的、革命的实践能够找到正确的方向和道路。这就是说，我们的认识，是服从于我们的斗争的要求，实践的立场。在

什么样的立场上，我们就要求什么样的认识。如果我不是农人，不实行耕种的实践，我就不需要农事的知识；不是军人，不在战场上与敌人战斗，就不需要军事的知识或至少是不需要专门的军事知识。相反的，如果实行了耕种的生活，我就要而且一定会在这实践经验中，学到了植物生长的规律知识；如果我实际参加了战争，我就要而且一定会在战争中学会战争的规律知识。这就是说，在不同的实践立场上，不同的斗争要求上，需要不同的认识，而且也一定会形成为不同的认识。

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对垒的发生，也要从人类的社会生活斗争的立场来加以说明。唯物论的特点，就是在于承认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就是在于承认，我们的思想意识，也是以物质世界为根源，因此我们的知识，必须能反映或把握客观事物本身的规律，才能算真正的知识。因此唯物论是表现这样的一种实践立场，这种实践立场要求我们努力追求客观事物的认识，而反对一切与事实远离的空论。在这样的实践立场上的人们，必定是积极地参加改变客观世界的斗争活动，因为他们参加这样的活动，所以才要努力把握客观世界的规律，因为他们要求得改变世界的任务胜利地完成，所以才必须要以正确的客观事物规律的认识作向导。因为如果他们不能有正确的客观事物规律的知识，他们在斗争中就要看不见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就要有失败的危险。

这样的实践立场，一定是革命的阶级、进步的阶级的立场，这样的阶级，一定是要求社会的进步、要求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样的阶级是要反对旧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发展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以，一般地说，唯物论是反映着革命的、进步的阶级的实践立场的哲学。

相反地，唯心论的特点，就在于不承认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

因此也不承认事物的规律是客观物质本身的规律，而只是我们主观思想本身的逻辑的条理，因此我们就不必在客观世界里去找知识，而只要从我们自己的内心、自己的思想本身里去寻求天生的智慧，天生的“良知”。这样的哲学里是表现着这样的实践立场：在这立场上的人，他们不需要对于客观事物规律的真实的知识，相反地，他们所要求的，是依他们的主观愿望来规定事物的条理、规则。因此他们要强调主观思想的作用，强调人的意识的作用，使人不要看见客观事物的真相，看不见它本身的发展规律。在这样的立场上的人，一定是不参加改变世界的斗争的人，一定是不愿世界改变，而愿意永远保持世界的现状，是要把世界现状神圣化、永久化，而不愿意看见世界的变化发展，因此也不愿意承认世界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必然性的人。

这样的立场，一定是保守的、反动阶级的立场，这样的阶级，是反对社会的进步，反对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而只愿保持旧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状。他们要用离开事实的种种思想上的空论诡辩来辩护现社会制度，要用种种宗教的神秘的观念来把现社会制度神圣化。所以，一般地说，唯心论常常是表现保守阶级利益的哲学，而反动阶级的世界观常常是唯心论的世界观。

这样，唯心论和唯物论，是表现着不同的阶级实践立场和阶级利益要求。哲学的派别的存在和发展，其决定的基础就在于这阶级的实践和利益要求，随着阶级的利益要求的变化，哲学也就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流派。一个革命的阶级，如像资产阶级，当它已取得政权，变为统治者，因此也就由革命的阶级变为保守的阶级的时候，它可能就放弃了唯物论的世界观而采取唯心论的世界观，这样，阶级实践的变化，又是哲学发展的一个社会背景或社会基础。

在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我们说唯物论表现革命阶级的利益和唯心论表现反动阶级的立场，只是就一般的情形来说的，这并不能得到一个死板的公式，说一切革命的阶级都一定有唯物论的世界观而一切反动阶级都一定是唯心论者。历史的具体事实却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在一定的条件下，革命阶级也会在唯心论的世界观之下来表现自己的实践要求，而保守阶级中间也可以有唯物论者。然而，如果革命的阶级以唯心论的世界观表现它的实践要求；那么，这唯心论本身，并不能表现它的革命性，而恰恰表现它在革命实践中的弱点，例如，表现这阶级的发展还不够，在革命实践上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和勇气推翻旧制度，还带有多少的妥协性和动摇性，还不能彻底发展它的革命性，还表现着若干的保守性，还对于客观的变化发展规律的把握没有充分的自信，还在一定的程度上迷信主观的思想的万能力量。革命阶级如果是以唯心论作为自己的世界观的话，那么，唯心论正是代表它的这些保守的方面，而如果它表现着多少进步性的话，那么，这进步性并不表现在它的唯心论上而表现在唯心论的体系中所包含着的某些接近唯物论的因素。如像德国的黑格尔，它是代表资产阶级的革命立场的唯心论者，然而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他的唯心论正表现着德国资产阶级的无力，而他的进步，却表现在唯心论中所包藏的辩证法的合理核心。

反动阶级中间也会产生唯物论者，然而这样的唯物论，不会是真正有进步内容的唯物论。这样的唯物论，常常是为着要使唯物论退化，是为着要打起唯物论的招牌，而事实上企图解除进步唯物论的武装，使它不能战胜唯心论。如 19 世纪中叶的庸俗唯物论，就是在革命的唯物论（辩证法唯物论）已经开始有了广大影响的情形之下，资产阶级的一些科学者所揭起来的唯物论的招牌，

这些唯物论事实上是非科学的，内容非常简单贫乏的东西。在苏联也有机械唯物论者，他们想以简单的落后的机械唯心论的思想来代替内容丰富的辩证法唯物论的，想这样来解除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武装，这是代表富农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思想进攻，在中国甚至于还有假借辩证法唯物论的招牌，偷运唯心论的私货的，如叶青，也是代表反动者在革命发展的伟大力量之下，利用伪装来破坏革命世界观的阴谋诡计。

哲学是科学发展的总结，一定时代的新哲学，是以这一时代的科学成果和科学发展为基础的，这是第一章说明的了。然而只有进步的革命的阶级哲学，才能够真正吸收这一时代的科学成果，建立起进步的哲学，因为只有进步的阶级，才要实际进行改变世界革命的实践，才要进一步改变自然，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改变社会，推翻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因此只有进步阶级，才要求对于事物（自然和社会）的客观发展规律，加以正确的认识，才要求对于这些规律的真正的研究和把握。因此也才能够以这些规律的知识为基础，建立起进步的革命的世界观。这样的世界观（一般地主要是唯物论的哲学），才能表现这一时代的科学发展的最高总结，而反动阶级的哲学（以唯心论为主），则常常是反科学的，或是把科学的某一些片面的成果加以夸大曲解，因此它常常无力综合这一时代的科学成果。如果进步的阶级以唯心论表现它的世界观，那么，这唯心论的保守性，也就使它对于科学的客观规律知识的把握和综合受到限制。科学的发展，主要地是成为进步阶级的哲学、特别是唯物论的发展基础。恩格斯说科学发展的每一进步阶段，都使哲学的唯物论表现出一新的姿态，就是要在这阶级的基础上来说明的。

哲学的党性，哲学的两大营垒的斗争，不仅仅是思想上哲学

上的斗争，而且也反映革命阶级与反动阶级的社会斗争，或者可以说哲学的思想上的党派斗争，唯物论的斗争，是革命与反革命阶级斗争的思想斗争形式上的表现。所谓要了解哲学的党性，就是一方面要了解，一切哲学的斗争都可以归结为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而同时又要能够揭露这斗争的社会基础，把唯物论唯心论的斗争归结到革命阶级与反革命阶级之间的实践立场上的斗争。

辩证法唯物论是彻底的唯物论，它的特点就在于公开承认自己的阶级性和党性，辩证法唯物论一方面公开地坚持自己的彻底唯物论的立场，不作任何的掩饰与伪装，公开地坚决反对唯心论，而不给与任何一点姑息。同时辩证法唯物论坦白地承认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立场，把哲学的理论斗争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联系起来，使它服役于无产阶级的实际任务，使它成为解决实践问题的方法指南。辩证法唯物论公开承认，它本身“乃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联共（布）党史》第四章）。

三、哲学本身的斗争和发展

哲学的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思想形式的一表现，因此，哲学的发展历史，是以阶级斗争的历史为基础，要依据于阶级斗争发展的历史，才能够对哲学发展的真实原因加以正确的说明，这是由前节所说的一切必然要达到的结论。然而因此，是不是能够说，我们可以把哲学史简单地完全归纳为阶级斗争史，而对于历史上哲学各派别间的相互关系和前后继承关系，丝毫可以用不着注意了？是不是说，某一时代的某种哲学，都仅只是当时某一阶级依据他的实践立场，综合当时的科学发展成果，仅仅这样就得到了它的哲学上的结果，而对于同时代以及前时代的各派哲学，是

丝毫没有关系呢？当然不是这样说的。哲学并不是完全直接反映阶级斗争，而且表现为思想形式上的斗争，表现为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表现为一派哲学对于其他哲学派别的批判、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表现为对于同时代和前代哲学缺点的克服，优点的继承，和新的思想方面的补充。

资产阶级的一些哲学史家，曾把哲学的历史看做纯粹的思想发展的历史，只承认历史上哲学各派的理论上逻辑上的互相关系，而忽视了哲学发展的阶级基础，这样的观点，自然是错误的，这是一种唯心论的历史观点，把哲学史看做是纯粹以思想为根源，因思想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历史，这种观点，夸大了思想的作用，隐蔽了事物发展的真正原因。例如说，如果照这样的观点来说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论思想的发生，如仅仅从思想的形式上来说明，那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好像纯粹是舶来的，而不是直接由中国旧思想中产生的，如果仅只看到这思想上的关系而不注意中国的社会基础，不注意中国已经有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论在中国之所以能生根，就是由于社会基础和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如果不注意这一点，那就会陷入国情论者的错误，说马克思主义不是中国内部自己产生的，因此是不合乎中国国情的。所以，如果单只注意哲学历史的思想上的互相关系，而不注意阶级基础，那是错误的。

然而哲学派别互相的关系的存在，也是事实，不容我们忽视，如果不注意思想上的这批判、继承和发展的关系，那我们就不能说明，为什么哲学本身也会有进步，为什么哲学会由低级的形态发展为高级的形态，为什么后来的革命阶级的哲学总比以前的哲学要进步些。为什么有的国家的革命阶级能在哲学上有很高的表现，有的国家里的同一革命阶级就差一些？例如中国的资产阶级，

它在一定条件下也是革命阶级，为什么它不能如英、法、德各国资产阶级一样，能创造很伟大的哲学思想？这原因，除了说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本身发展不够之外，还得要说，因为它没有能够继承和发扬国内国外的旧哲学的一切优良成果，例如它就简直不曾有系统地介绍过法国唯物论和黑格尔的哲学，更说不到对这些外国资产阶级伟大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每一时代的进步的哲学，它不但是表现这时代进步阶级的实践要求，作为进步阶级的世界观，而且它是把以前的和同时代国内外的各种有关系的哲学加以批判继承和发扬。它批判它们的保守的反科学的方面，继承和发扬它的积极的、有价值的因素。而将这时代的新的科学实践经验加以补充，才建立起新的进步的哲学。

一个时代的革命阶级，当它在另一历史条件下忽然变为保守的阶级时（无产阶级不会有这种转变，只有剥削者如资产阶级才会这样），它的哲学思想的代表者就会排弃进步的哲学而要另外建立适合于自己的保守的立场的反动的哲学。这时它对于其他哲学派别的关系就会和以前相反，把同时代或以前哲学中的消极的、保守的（如唯心论）方面恢复和发展起来，而抹杀其中一切有进步意义的东西，使哲学不能成为把握真实的事物发展规律的科学，这就会引起哲学上的倒退，如近代资产阶级，在革命以后，它的哲学就退回到革命以前时代的落后的哲学思想。列宁曾指出19世纪后半叶的欧洲的资产阶级哲学就有这种情形，这使“恩格斯目击时髦的德国的与英国的哲学重蹈康德主义与休谟主义的在黑格尔以前的错误”（《马恩与马克思主义》，第353页）。像中国辛亥革命以后直到现在不断反复出现的复古运动或恢复尊孔的活动，就表现一部分资产阶级的不断的反动化和与封建势力结合的过程。

因此，哲学的思想发展本身有它自己的规律，它是两方面的运动：一方面表现为思想上的进步发展的过程，一方面也有倒退的过程。然而总的方向，是一个向上的发展，因为倒退的哲学是没落的，没有出路的，它终于要达到消灭的前途，而只有进步的哲学，是不断地新生，不断地增加新的丰富的内容，不断地采取更高的姿态，不断地接近更完全的客观世界规律的把握。而能够完全把握客观事物规律的最高形态上的哲学，就是辩证法唯物论的哲学。因为如列宁说的："辩证法是一个最周到的、最富有内容的、最深刻的关于发展的学说。"（《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而辩证法唯物论就是最周到的、最内容丰富的和最深刻的把握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哲学。

因此，过去哲学的发展史，就哲学本身来说，就是向着辩证法唯物论一步步完成的发展史，每一派进步的哲学，都继承着过去哲学中的积极因素，在一定的方面补充了过去哲学的缺点，而对于辩证法唯物论的完成有一定的贡献。辩证法唯物论则是哲学发展史的最高总结（同时也是科学发展，人类革命实践的最高总结），辩证法唯物论是"关于世界一切具体内容及其认识的发展规律的科学，即对于世界认识的总结、总计与结论"（《哲学笔记》）。

因此，我们说哲学有党派性，唯物论要坚持与唯心论斗争。这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对于以前的和同时代的其他派别的哲学，就要加以绝对的抛弃。相反的，我们和其他哲学派别的斗争，是要打破和抛弃它的消极的、保守的东西，抛弃它的唯心论的方面，然而如果它包含着某些接近唯物论的因素，某些客观事物真实规律的反映，那对于这些因素，就要加以保留、发展。我们要知道，进步的哲学是要把以前一切哲学中的进步内容加以综合发展的。这是哲学思想的斗争或批判的正确态度。

因此，从古代最初有哲学开始，到近代是经过了哲学思想上的有规律的发展，而达到完成辩证法唯物论的过程。恩格斯把这过程大体上加以如下的概括：在古代的哲学中，人类首先发现了辩证法的唯物论世界观的粗略的轮廓，它“首先看见种种联系及交互作用无限错综的图书，在这中间没有任何东西保持他原来的性质、场所及状态，万物皆动皆变，皆生皆灭……”（《反杜林论》中译本，第7页）。这是古代哲学的积极的因素，然而这既只是辩证法世界观的粗略的轮廓，所以“无论它怎样正确地理解了整个现象的一般性质，可是要解释整个现象中所由构成的个别部分，则实是不够的，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则整个现象也是不能明白的”（同上）。这就有了古代哲学的缺点，为要补足这缺点，必须对现象的各个别部分分别研究，“把它们从自然或历史联系中抽取出来，而分别研究每部的特性及特殊的因果关系等等”。这样的分别研究，在人类对于世界的思想认识上是一个进步，对古代的世界观是一个发展的补充。然而因此却又引起了一个偏向：即造成了我们的反辩证法的孤立看事物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这种研究同时也传给我们一种习惯，把自然物及自然现象分别观察，置于一般的大联系之外，不是从运动状态中去观察，而是从静止状态中去观察，不是看做本质上变化的事物，而是看作恒久不变的事物，不是在活的过程中去理解，而是在死的过程中去理解。……这样对于事物的见解造成了数世纪来特殊的狭隘的观点，及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同上）

在这样的见解之下，要把握整个世界的发展规律，是不可能的，“所以关于整个宇宙，它的发展与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关于这些，如果要得到精确的概念，那么就一定要用辩证法去思想，一定要顾到生灭过程，进步及退步的

变化等等的一般的交互作用”(同上书，第 12 页)。在这样的需要之下，哲学的进一步的发展，就产生了新的辩证法的世界观，产生了德国古典哲学。“这个新的德国哲学，至黑格尔而登峰造极，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整个自然历史及精神的世界，都被看做一种过程——即永恒运动、变更、转换及发展的过程；它企图证明那种存在于这些运动与发展中的内在联系。——这些都是黑格尔学说的伟大功绩。”(同上书，第 12 页)

这样，黑格尔是第一个把辩证法的世界观有系统地加以发展，它要求我们具体的从各方面把握事物的运动变化规律。然而，黑格尔是唯心论者，而唯心论是不能够容许如实地客观地把握事物本身的各方面的具体规律，而常常要在许多问题上作主观的夸大和虚构的，所以黑格尔的唯心论和他所提出的辩证法就有了矛盾，辩证法在他的唯心论的框子里就不可能彻底发展。“黑格尔虽然正确地而且甚至天才地懂得了各种现象的好些细密关系，但因上述的原因，所以在这些详细的叙述中，就有许多是补缀的、文饰的、虚构的，——就是谬误的论调。”(同上书，第 13 页) 要克服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所包含的这谬误和不彻底，就要抛弃它的唯心论，而把它放在唯物论的基础上来加以发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完成的任务。

这就是哲学发展的思想上规律的轮廓。而这是就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关系来说的，就唯心论和唯物论的关系，也可以看出一定的规律。旧的唯物论，一般都有形而上学的性质，它不能从发展、变化联系的观点上来看物质和精神的相互关系。物质既是精神的基础，那就要说明，精神怎样从物质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又精神还相对地有独立作用，它对于物质能给与反影响。如像前面所说的，我们的目的、计划，对于我们的斗争实践有着引

导的作用。这就要说明，物质既决定精神，为什么又受精神的反影响，旧唯物论，由于它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它不能解答这些问题，它不能在联系上和互相转变上把握物质与精神，不能说明精神怎样从物质产生，不能既以物质为基础，而又能理解精神对物质的反影响。于是它就不能反驳唯心论的思想，不能推翻唯心论的精神有独立性和独立作用的主张，于是唯心论就趁这机会发生，唯心论是把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加以过分夸大的评价，结果达到主观决定一切的谬论。因此在思想发展过程上唯心论又必然要暴露它的弱点。最后再被新的唯物论所克服，而这新的唯物论，是辩证法唯物论，因为旧的形而上学唯物论，已表现它的弱点，只有辩证法唯物论，才能真正战胜唯心论。（参看《反杜林论》，第165页）

辩证法应该是真正把握客观事物的运动规律的方法，而在唯心论的立场上它不能彻底成为这样的方法。唯物论反对认识事物时的主观的虚构和夸大，然而形而上学的唯物论不能成为彻底战胜唯心论的错误的真实理论。因此，哲学思想的发展，必须是把过去哲学中一切辩证法和唯物论的因素加以综合发展而排除一切唯心论形而上学的错误和偏见，而最后要归结到辩证法唯物论的形成，成为正确地把握一切事物的总的发展规律、世界观和方法论。而我们研究哲学发展的历史的时候，一方面要研究各时代各派哲学的阶级基础，研究各阶级怎样依据自己的实践要求而将科学研究成果综合成自己的哲学的世界观；另一方面也要研究哲学本身相互的斗争和发展中的相互联系。进步的哲学怎样继承和发展旧哲学中的进步的有价值的东西，而批判和抛弃其保守的因素，怎样在现有的哲学成果中加上某些新的方面，使哲学的发展一步一步接近完成的辩证法唯物论的世界观。

第三章 辩证法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世界观

一、辩证法唯物论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

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它所以能成为这样的武器，是因为它本身是革命的、科学的世界观，而要作为真正革命的、科学的世界观，就不能不与最先进的革命阶级的实践相结合。早在1843年，马克思就说过："哲学以无产阶级为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的，无产阶级则以哲学为自己的精神武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里所讲的哲学，就是指辩证法唯物论。

无产阶级就是最先进的革命的阶级，它之所以是先进的革命阶级，是因为第一，它在社会经济上已被剥夺了一切的所有，它的这无产者的地位，使得它可成为毫无顾忌的彻底的革命阶级，成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以及一切剥削压迫制度最勇敢的领导的队伍。它"是最革命的阶级，因为它在革命中间所丧失的、并没有别的东西，而不过是自己头上的枷锁"（《联共党史简明教程》，第15页）。第二，它是跟着资本主义的大生产而发展而生长起来的阶级。大生产的经济是人类生产上的最先进的形式，这种经济的向前发展是必然的，不可抵抗的。与这先进的经济形式结合着的无产阶级，必然就在发展中成为不可抗的力量，这就是说，无产阶级不但要求革命，不但在本质上是最革命的阶级，而且它有能力来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它在发展中必然有力量来担任领导革命的任务。它的力量的来源是：在量的方面，它会随着大生产的发展而不断增加，在质的方面，"它由于大生产中的劳动条件缘故，是最易于

组织起来”(同上)，而力量的发挥必须经过组织，因此无产阶级是最能够发挥伟大的集体的革命力量的。

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非常艰巨的，它的任务不是很轻易地就可以完成。无产阶级要求得自己的解放，它必须把整个世界整个社会制度加以改变，它必须推翻以资本主义为首的一切人剥削人的制度，这就是说，它不但要解放自己，同时必须解放全人类，它不但要推翻自己的直接的剥削者资产阶级，而且要摧毁人类中的一切剥削制度。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目的是要建设全世界的共产主义体系，而要达到这目的，它必须与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及一切剥削制度进行生死的斗争，它必须联合一切被压迫的阶级，与全世界的剥削者进行战斗，它在革命的战斗胜利了以后，还必须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进行镇压反动的残遗势力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工作。在这一切的战斗过程中，它必须依据历史发展的各种条件，运用各种各样的战略和策略，也必须要能够把握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才能够进行胜利的战斗。

为这样艰巨的任务而斗争，决不是靠盲目的乱撞和自发的活动可以得到结果，那是很明白的。要完成这样的任务，无产阶级必须能够清楚地认识世界发展的一切规律，认识斗争的客观环境的一切情况变化，要能够“了解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预见事变的进程”，“不仅知道事变在目前是如何发展和向那里发展，而且知道事变在将来应当如何发展和向那里发展”。要能够“在任何环境中确定方针”(同上书，第 421 页)。要能够这样，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就必须有科学的革命的理论作指导，必须有正确地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和革命斗争规律的理论作指导。“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而这样的理论，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无产阶级在它的斗争过程中，要经过两个主要的发展阶段：即从“自在”的阶段走到“自为”的阶段。在“自在”的阶段上的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开始了自发的斗争。它们对于自己的被压迫的生活现状已经表示不满和反抗，然而他们没有自觉到自己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任务，它们不知道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斗争，而常常对个别直接剥削他们的资本家斗争，它们自己的阵营也是分散零碎的，没有全阶级的组织，“在这阶段上，劳动者形成为在一个国家中分散了的，为竞争所割裂了的阶级”(马克思)。这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初步阶段，无产阶级是不能长久停留在这样的斗争阶段上的，它终于要发展成为“自为”的阶级：在这样的阶段上，它自觉到了自己阶级的历史使命，它的斗争由分散的，对个别直接压迫自己的资本家的斗争，走向了对整个资产阶级的斗争，对整个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的斗争。在这样的斗争中，无产阶级还必须建立起自己的斗争的领导队伍，建立自己的独立的政党——即共产党。只有这样“自为”的斗争，只有经过革命的党的领导去进行自觉的斗争，才能发挥无产阶级的伟大的组织力量，才能使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走上胜利的道路，才能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不能没有这样的党，“使无产阶级没有这样的党，就是使无产阶级没有革命领导，而使无产阶级没有革命领导，就是使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遭受失败”(《联共党史》，第419页)。这样的党之所以能给无产阶级以革命的领导，是因为什么条件呢？因为党是由无产阶级中的最先进最觉悟的分子所组织，它保有着革命斗争的艺术和经验、而最重要的是它能掌握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理论，它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所指导。“只有被先进的理论所指导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

用。”（同上书，第 43 页）无产阶级的党，它首先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自己，要正确把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然后才能够对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尽领导的作用，才能够使无产阶级的斗争也受到科学的革命理论的正确指导。

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更确切地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世界观。为什么？因为辩证法唯物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基础。辩证法唯物论的哲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不开的一个组成部分。要成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么他就必须以唯物论的理解和辩证法的方法作为研究一切事物的基本观点。历史的事实已经完全证明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之下来把辩证法唯物论抛弃或曲解了的人，结局终于成为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事业的人。如果说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少不了自己的党，少不了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指导的党，那么，无产阶级和这个党，也少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少不了自己科学的革命的世界观——辩证法唯物论。

辩证法唯物论为什么能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科学的世界观？为什么能成为革命的无产阶级斗争的思想武器？因为辩证法唯物论本身就包含着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它之所以叫做辩证法唯物论，是因为它的方法是辩证法的，“它对于自然界的观察方法，它用以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它用以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同上书，第 123 页），而它的理论是唯物论的，“它对于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对于自然现象的了解，它的理论，乃是唯物主义的”（同上）。

什么是辩证法的方法？这在以后会有详细的说明，如果要在这儿指出它的意义，那么，可以用一句话说明：辩证法是革命的思想方法。辩证法的观点告诉我们，世界上一切东西都是历史的、

变化的过程，一切东西都有它的发生发展和没落的过程，一切东西都是存在的，同时也将是不存在的，任何东西都会在发展中为另外的更新的东西所代替……这样的观点使我们对于事物不能不采取这样的态度：不要对任何东西有保守和留恋的念头，应该向着新的不断发展的方向走去，不必惧怕任何在眼前似乎极有权威的东西，因为任何横暴的有权威的东西，倘若它的存在是违背历史的自然规律的话，会在发展过程中终于走到没落的前途去的。这样的看事物的方法，这样的对事物的态度，正是革命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辩证法这东西，是在对于现存事态的肯定的理解之中，也包含着现存事态的否定的理解。它把历史地产生的一切形态当做不断流动的东西，从过渡的方面加以观察，对任何东西也不畏惧，本质上就是批判的，革命的。"（《资本论》第二版序）

什么是唯物论的理论？这也要在以后详细说明：这儿只指出它的意义：唯物论是要求我们真正客观地把握事物发展规律的理论，在唯物论的立场上看来，"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联共党史》，第133页），精神，思想，意识等不过是物质发展的高级阶段的产物，思想本身，不过是物质发展规律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思想的正确与否，并不决定于思想本身，而是要看它是否能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唯物论对于我们的要求，就是要切实把握客观事物本身发展的规律。"唯物主义的世界，不过就是对于自然界本来面目的了解，而不需要任何外来的附加。"（同上书，第132页）所以，真正唯物论的理论，必然是科学的客观真实的理论，必然是反对一切对事实的主观的曲解和粉饰的理论。

辩证法唯物论是辩证法的方法和唯物论的理论的统一。在这里，辩证的方法首先是以唯物论的理解为基础的。这就是说，这辩证的方法，并不是任何人的头脑里随意想出来的东西，辩证法

之所以能成为研究和观察事物的正确方法，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客观事物的规律的一般化和总结。客观事物原来就是辩证地不断运动变化的过程：唯物论的理论，就在于要如实地总结和把握这客观事物变化的辩证规律，把这些规律反过来用作我们研究事物和观察事物的指南和向导时，就成为辩证的方法。辩证法必须以唯物论为基础，才能成为真正有效的革命的方法，才能成为彻底的辩证法，因为它本身必须依据于严格的真实的客观事物规律的总结，而不依据于任何主观的人工造作，才能够真正成为事物的向导。必须不断地依据新发现的事物规律的总结，使自己内容丰富和发展起来，而不死守着，留恋着任何简单的公式，才能够成为灵活地研究和观察事实问题的指导方法，才能够成为改变客观世界的思想指南。

唯物论也必须是辩证法的，才能成为彻底真实的科学理论，因为要能够成为彻底真实的科学理论，就是要能够如实地把握客观事物的各方面的规律。然而如果没有时时革新的复杂，如果没有从不断变化方面来观察事物的方法，要想能够把握这无限观点千变万化的客观世界各方面的规律，自然是不可能的，所以，要能够成为彻底的唯物论，要能够成为周到灵活地把握一切事物规律的科学理论，就必须是辩证法的。

辩证法唯物论是最彻底的唯物论。它比其他任何唯物论都更彻底的地方，首先就表现于：其他一切唯物论，常只是对于自然现象给与唯物论的理解，而在人类社会问题上，却总是陷入唯心论的泥沼，而辩证法唯物论却能够把唯物论的理解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自从有了马克思的辩证法唯物论以后，社会历史的变化才第一次看做物质的客观规律的发展过程，才没有被看做英雄伟人的偶然的创造，才成

为严格的科学研究的对象，而改造社会的革命运动，才受到科学的指导。正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深刻的发展了唯物论的哲学，把它彻底引用和推广起来，从自然认识直到社会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显示了科学思想的最伟大的收获。在此时期以前，关于历史和政治方面完全被浑沌和光怪陆离的观点所统治着，从此，方能用完整和谨严的科学理论以代之，指明出由于生产力发达的结果，一个社会生活的阶段才发展到另一个更高的阶段，例如从封建农奴制长成出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因为辩证法唯物论能把唯物论扩张到社会历史的研究方面，所以只有它才能够帮助我们如实地把握社会发展和社会变革的规律，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

辩证法唯物论在唯物论上的彻底性，还表现于对实践的意义的重视上。辩证法唯物论能在社会历史的领域上贯彻唯物论的观点，因此也就能够对于人类的思想发展给予唯物论的说明。照辩证法唯物论的观点来说，人类的思想是人类的社会历史实践的产物，思想的发展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在一定的历史时代，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下的人群，他们在社会生产中站着一定的实践立场，他们有一定实践的立场，而他们的思想也就是在这一定的实践立场上所获得的，因此也就受着这立场的一定的制约，这样，人类的认识，人类的思想，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人类的认识是客观事物的反映，然而这反映，并不是如形而上学唯物论所了解的那样，把它和人类的历史实践分开，以为认识不是依据历史的实践发展，而可以由聪明的伟大人物一下子就把客观真理认识完尽。相反地，人类的认识事物，一定要依据于他的实践立场，要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的规律，必须是站在进步的实践立场上的人们，只有这样的人们，才要求改变世界，才要求正确地认

识事物规律，才要求依靠这样的规律的认识来指导自己的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

辩证法唯物论是最革命的科学的世界观，它自然也是有着一定的实践立场的。只有站在现代历史上最革命最进步的阶级立场上——即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进行斗争的人，才能够真正把握辩证法唯物论的世界观。因为只有像无产阶级那样对旧世界毫无留恋的革命阶级立场，才能容许人最客观地去把握世界发展（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真实规律。只有在革命的立场上，辩证法唯物论才能够保持它的充分的科学意义。因此，不但无产阶级要求以辩证法唯物论作为自己斗争的革命的世界观，辩证法唯物论本身，也不能离开无产阶级的实践立场而能建立和发展，辩证法唯物论公然地表明自己的阶级性和革命党派的立场，它不是书本里面的空洞的理论，它是以改变世界为目的的革命的世界观。

二、辩证法唯物论的思想来源

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这话的意思并不是等于说，辩证法唯物论是从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中直接产生出来。辩证法唯物论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都是科学的理论，这理论能够有力地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同时也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立场上，才能正确把握这科学理论，这就有理论的阶级性。然而这样的一种科学的理论，它本身就必须是经过科学研究的过程，才能建立起来。辩证法唯物论是人类对于世界认识的最高的总结，是从各科学以及人类历史的研究中抽出来的一般的规律。它是比一切过去哲学思想更高级更完满的科学的世界观，因此它必须又是过去哲学思想中的一切积极成果的继承和发展。没有对过去一切哲学思想的深刻的批判，也是不能

够建立辩证法唯物论的世界观的。

因此，辩证法唯物论以及整个的马克思主义，就它的思想本身的来源说，宁可说它是过去人类一切进步思想的发展的最高成果，是人类思想史的有规律的发展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决不像那些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生长起来的，闭关自守的狭窄的‘宗派主义’的学说；相反的，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天才，正在于把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来的问题给与了回答。他的学说是直接继承着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社会主义伟大代表者们的学说而产生出来的。”（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这样的学说不能从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中产生出来，更不能从直接处在无产阶级地位上的个人身上发明出来（因为这样的人就没有能力作科学的研究），是很明白的。这样的学说，只能由无产阶级以外的，而又能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进行斗争的、伟大思想家的科学研究中产生出来，只能在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人的研究中建立起来，而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够建立他们的学说，就是由于他们能够科学地研究了人类的历史和人类思想史的一切成果，能够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立场上，把他们当时的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社会主义的伟大的思想代表者的学说加以批判和发展了的结果。

因此，辩证法唯物论以及整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但有它的社会的阶级的基础，而且有它的思想的来源。它的理论的优越性，它之所以成为一切人类思想中最高级的思想，是必须要根据这思想发展的来源，才能够得到完全的说明的。这些思想的来源，直接为马克思主义所继承和发展了的，就是英国古典经济学、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德国的古典哲学。每一个来源都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和发展，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经济学、社

会主义和哲学。辩证法唯物论的哲学，就是直接批判和发展了德国古典哲学而得到的成果。

德国的古典哲学，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产物。在当时，法国已经有了大革命的爆发，而德国的资产阶级也正向着革命的道路发展中。德国的古典哲学，是代表着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要求，马克思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第一个建立者康德，曾给予了这样一个评语："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就是表示说，德国的古典哲学，正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要求在德国的哲学思想上的反映，然而，古典哲学既是产生在德国，所以它并不仅是一般地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革命的要求，也反映了德国当时的资产阶级发展的特殊条件。那特殊的条件就是德国的资产阶级在发展上还是非常落后，因此它虽然也有了革命的要求，而在实际斗争上却表现着无力，表现着对于旧封建农奴社会的妥协的倾向。这样的条件就使它在哲学思想上的表现具有了两重的性质：有着革命的方面和保守的方面。德国的古典哲学的最高表现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唯心论哲学，在黑格尔的哲学里，德国资产阶级的两重性质表现为他的哲学的互相矛盾的两个方面，代表着革命的要求的辩证法的方法，和代表着保守的倾向的唯心论的体系。

黑格尔的保守的唯心论体系，使他的革命辩证法的方法受到了伤害。按照辩证法的方法，一切事物要看做不断发展没有止境的，而照他的体系来说，他不能不主张：世界只是绝对精神的发展，而他的体系就是绝对精神的体系，就是世界思想发展的最高表现，真理的认识到黑格尔就算停止不再发展了。他依据这样的保守的思想，在政治上还达到了反动的结论：即社会政治的发展也有止境："绝对观念将会实现为只限于等级代表制的君主政体，即威廉三世所顽固主张且宽大地许给他的臣民的一种政体，换一

句话说，将要实现为有限、温和及间接的有产阶级统治。”（恩格斯：《费尔巴哈论》）社会政治发展到这样的阶段，既已是绝对精神的表现，但这发展在此便达到尽头了。

黑格尔死后，他的学说开始了分化和解体的过程，他的继承者中，有偏重保持他的体系的，就在社会政治立场上倾向于保守方面；有偏重发展他的辩证法方面的，就倾向于革命的方面，就对于当时反动的宗教和政治加以激烈的反对。当时有所谓青年黑格尔左派，就是力谋从黑格尔哲学中作出无神论的革命的结论，而属于后者一方面的。不过他们的斗争，始终主要地还只是限于反对宗教方面，而不会涉及政治斗争，因为“政治在当时是顶棘手的一个领域”（同上），发展落后的德国资产阶级仍然还没力量去进行这一方面的斗争。

但反对宗教的斗争终于使德国古典哲学走到了末日，那就是在黑格尔学派中产生了唯物论的思想。“反对肯定宗教的斗争的实践要求。曾使最坚决的少年黑格尔派当中好多走上了英法的唯物论。”（同上）在这中间，最大的代表，就是费尔巴哈的唯物论的出现。为什么终于要走到唯物论呢？这理由，费尔巴哈就说得很清楚，因为要真正反对宗教，就不能不同时反对唯心论，因为唯心论总是或明或暗地承认某种神的存在，某种世界的创造主的存在，因此它直接间接总是走向宗教思想的桥梁。要彻底反对宗教，就必须承认世界是自然的物质世界，而不是任何精神所创造的。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论辩证法的哲学，把黑格尔哲学中的革命的方面——辩证法加以继承和发展，建立起自己的唯物论辩证法的哲学。“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说明其辩证法方法的特征时，通常都是援引黑格尔，把他看做是规定了辩证法的基本特点的哲学家。然而并不是说，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辩证法，是和

黑格尔的辩证法一样的。"(《联共党史》,第 123 页)黑格尔虽然规定了辩证法的基本特点,然而他的辩证法终究是唯心论的辩证法,是在主观的独断体系之下,受到了歪曲的辩证法。他的辩证法不能成为彻底研究客观事物规律的指针,而却到处成为在主观上勉强制造体系的杠杆和图式。倘若无条件地接受了黑格尔的辩证法,那就不能得到真正革命的科学的方法。因此他们"只是从黑格尔辩证法中取出其'合理的核心',而抛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向前发展了辩证法,因而赋予了辩证法以现代的科学的模样"(同上)。

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这样批判黑格尔,所以能够把他的辩证法放到唯物论的立场上来加以改造,是和他们的实践斗争的立场有分不开的关系的。马克思早年曾是青年黑格尔主义者,最初也曾是站在黑格尔的唯心论立场上的。然而马克思和其他青年黑格尔主义者不同,是后者始终只是对宗教进行理论的斗争,而不注意实际的政治问题,而马克思却很早就进行政治问题的论争,当他办莱茵新闻的时候,他就曾站在贫苦劳动大众的立场上,为他们的利益作辩护。马克思最初是急进的民主主义者,他曾利用黑格尔的法哲学里的唯心论的命题,来进行激烈的思想战斗。例如黑格尔说,国家应当体现"一般的国民精神的自由",马克思就把这命题用来反对那禁止贫民拾取森林中的枯枝的法律。说,既然国家要体现一般的国民精神的自由,那么国家的法律就不但要关心到森林主的利益,而且也须注意到森林规则破坏者的利益,"在私有的森林中采集被风吹倒的树木是贫民'掠取权'的合法的表现:贫民们在自己的行动中……来证实自己的法权"(《哲学选辑》,第 143 页)。就是在这样的论争中,使马克思看出了,森林所有者并不是受什么国民精神的指挥而是受实际的物质利益所支配,而国

家的法律也不是维护什么“一般的国民精神的自由”，而只是维护森林主的物质的利益。就在这样的论争中，看出了黑格尔的唯心论的命题的空洞，而不能不以唯物论的原则去代替。就在这样的实践政治问题的论争中，马克思由急进民主主义者走到社会主义者的立场，从唯心论的辩证法论者转向为辩证法的唯物论者了。

但马克思恩格斯之实际转变为唯物论者，是从费尔巴哈的思想的强烈刺激之下达到的。恩格斯曾自称当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我们都兴高彩烈，马上就都作了费尔巴哈的信徒。”(《费尔巴哈论》)“马克思恩格斯在说明其唯物主义的特征时，通常都是援引费尔巴哈，把他看做是恢复了唯物主义应有权威的哲学家。然而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一样的。”(《联共党史》，第124页)就是在他们自称“作了费尔巴哈的信徒”的时候，也并不是把费尔巴哈的唯物论见解看做与自己的唯物论见解一样的东西。也还“有许多不同意的批评”(《费尔巴哈论》)。因为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并不是辩证法的唯物论，费尔巴哈抛弃了黑格尔的唯心论，同时连他的辩证法也抛弃了，费尔巴哈宣布世界是物质的自然的客观世界，而不是任何精神的表现，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的产物。世界上“除了自然界和人以外，就没有什么东西可言了”。一切宗教，唯心论，都不过是人类的本质在夸大的幻想上的反映，不是神创造人，而是人的幻想创造了神，这一切都是唯物论的思想。然而因为这唯物论是形而上学的，它不能在发展上，在历史的观点上来观察事物，尤其是不能看到人类的社会历史实践的发展，不能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来看人类的本质的发展。费尔巴哈把人类看做抽象的，本质上不会变化的东西，因此他不了解，宗教是人类的历史实践发展的一定阶段的产物，因此它不能不给宗教找抽

象的基础，而宗教既是人类本质的幻想的反映，所以又不能不找抽象的人类本质。就在这一点上，费尔巴哈就陷入了唯心论。因为在他看来，人类的本质，不外是以感官为基础的人与人间的心的关系，是人和人中间的爱的感情，所以他认为“人心乃是宗教的本质”。因此，反对宗教在费尔巴哈看来，并不是要推翻它所以能存在的物质的基础的问题，而只是改变人心的问题，只是要把人心中对于自己本质的夸大幻想除去，而用人和人的直接的正面的爱的情感来代替它的问题。因此，费尔巴哈一方面反对神的宗教，但另一方面却又主张人和人中间的爱的宗教，情感的宗教。

因此，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论不同，它是有着许多唯心论的、宗教伦理的残遗成分的。马克思决没有照样地接受了他的唯物论，而只是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中摘取其“基本的内核”，把它往前发展为科学的——哲学的唯物主义的理论，并抛弃了它那唯心主义的和宗教伦理的赘瘤成分。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费尔巴哈唯物论的批判继承的关系。

三、辩证法唯物论与中国无产阶级

辩证法唯物论在中国，是五四运动以后开始发展起来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自觉运动，这运动反映中国资本主义的较进一步的发展阶段，同时无产阶级也登上了中国的历史斗争的舞台表现为一个重大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就在这样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和它的哲学基础，——辩证法唯物论传播到中国来。这就是说，辩证法唯物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有着它的阶级的社会的基础，而不是偶然的。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论在中国的传播，确实是根源于中国自己的需要，是由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发展，和对于这斗争的指导理论的迫切要求。中国的

反动阶级中，有所谓国情论者，一直到现在还唠叨不绝地说，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马克思主义不适于中国的国情。然而事实终于是事实，在18年前，马克思主义早已经在中国的政治社会上生了根，产生了中国的共产党，领导着中国的无产阶级，走上“自为”的斗争阶段，并联合了中国的广大人民，推动了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推动了今天震动全世界的伟大抗日战争。事实将要证明，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于中国的国情，而是主张国情论的这些反动派，将要在中国的真实国情的发展过程中被淘汰无遗！

这自然并不是说，在思想的来源上，马克思主义也并不是外来的。马克思主义不但为中国民族所需要，它本身又是国际的东西，它在先进的国家里既已经建立了基础，中国的无产阶级就从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手里把这思想的武器接受过来。所以在形式上说，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中国，最初确是从外国输入的，最初是凭着介绍学习到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论的建立，并不是对于中国本国过去的思想遗产加以批判发展的结果，这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论产生的特点。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论之所以不能从中国旧有思想的批判发展中直接建立起来，是因为中国旧有的思想遗产没有发展到足够的水准，是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它的文化运动中没有能够建树足够的成绩，能够作为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论产生的基础。辩证法唯物论和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发展的最高级的产物，它的产生，需要有法国的社会主义、德国古典唯心论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那样伟大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做孕育的基础。而在中国，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它的文化运动中，甚至于对这一类的大思想认真介绍的人也还没有，更说不上创造这样的思想。因此，中国的无产阶级能够以迎头赶上的姿态，从外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和辩证法唯物论的哲学，接受这最高的科学的革命理论和方法，这正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光荣，正是中国的无产阶级的强点。

但也正因此，我们就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论在中国一开始是非常幼稚的，中国无产阶级没有在自己的国土里预先把自己的革命思想完全抚育成熟，而是在需要的时候才开始去从外面学习，这就不容否认，所学来的东西，必有多少方面是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土壤的，必然是比较浮浅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初期在战略策略指导上的许多严重错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各方面的学术研究之比较低的水准，就是这一个缺点使然的。这就是为什么到了今天，我们还要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辩证法唯物论中国化的口号的原因。

所谓是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论中国化，并不是说，今天以前，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论完全不是中国所需要的东西，今天以后才开始要把它中国化一下，这完全是反动的国情论者的曲解。今天所以能提出中国化的口号，正是因为过去的实践事实已经证明，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论的应用，曾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保证。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在过去十几年的斗争当中，虽然受到许多错误和挫折，然而一步一步地、愈更熟习地学会了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论的正确应用，而且由于这正确的应用，能够保持和发展了革命的力量，能为今天推动全国坚持抗战的核心。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论的中国化，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在对于一切错误倾向进行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过程：在过去革命斗争中对于那些错误倾向的克服，革命之所以能够有今天的发展，都是在实践上表示出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论的中国化所达到的里程。所以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论的中国化，在今天以前不能不说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准，这水准不是表现在书本的研究，而

是表现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的事业上，惟其是中国化已曾达到了一定的水准，有了一定的基础，所以今天推出了中国化的问题，才能够有重大的实际意义。惟其因为过去的革命实践中已经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论的正确应用，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发展和完成的必要保证，因此才需要在今天更强有力地提出中国化的口号，使中国化的努力成为一个有意识的普遍的运动，使中国更多更广泛的人能够来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论，使这革命斗争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成为广大群众都能够使用的工具，使中国的革命运动更能够不因为遭遇到错误和挫折而延迟了发展的进程，更能够迅速地完成。——这才是提出中国化的口号的真实的意义。

中国今天的革命还处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上。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正确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主义的立场上，并不空想跳过历史的阶段，一次就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这样正确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因此能够最勇敢最真诚为着这民主革命任务的完成而奋斗，为着彻底实现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三民主义而奋斗，在目前，是具体地为着抗战的胜利，为着政治的团结进步，为着民众生活的改善而奋斗。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这一切努力，在今天全国的抗战中，表现了最辉煌的成绩，在华北、陕甘宁边区，三民主义的纲领的实施，表现为全国的模范。而中国无产阶级所以能达到这些成绩，乃是由于他们正确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正确地应用了辩证法唯物论的结果。也就是能使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论中国化了的结果。

辩证法唯物论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系统，或共产主义的思想系统，在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实际上早已成了

指导的思想。自从五四运动以后，自从无产阶级登上了中国的政治史舞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播到中国以后，不管它传播的种子是多少幼弱，不管中国化的水准是多少不足，然而它始终是最有力的，是中国革命运动中最先进的指导思想。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与社会革命论。……二十年来，这个文化生力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新民主主义论》) 正如无产阶级，在五四以后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最先进的领导的力量一样，就思想方面来说，"盟长的资格"，也"不能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这是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特征。

"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论的思想，其所以能够取得"盟长的资格"，乃因为它本身是能够正确地把握一切社会发展和社会革命的规律，因此也最能有效地指导一切革命运动的思想。因此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论不仅仅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而且也是完成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最有力的武器。事实已证明，特别是抗战三年来的经验已完全证明，中国无产阶级政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规定的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以及民族抗战斗争的战略和策略，都是最正确有效、最能制敌人死命而保证革命成功的纲领和战略策略。因此凡是真正愿意使民族抗战达到完全胜利，真正要求民主革命完全成功的人，即使不是共产党员，他也要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论，凡是中国真正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他必然会接近以至于走向共产主义的方面，就是孙中山先生，他的思想体系虽然和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然而他在晚年终于与共产主义者做了好朋友，而且接受了中

国共产主义者的许多革命的主张。这就是对于反动的国情论者，对于那些主张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中国的人们的一个最早而最有力的反驳！这就是辩证法唯物论一定能够中国化而且早已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发展过来的最显著的事实证明！

（原载《中国文化》第1卷第4—6期，1940年6—8月；本文第一章第三节、第二章第一节曾被转载于《学习生活》第2卷第1期、第2期，1940年11月、12月）

什么是辩证法*

(1940.9—1941.1)

辩证法这名词，是从希腊文“Dialego”来的。它的含义是进行谈话，进行论战。古代希腊人所谓的辩证法，是指他们求真理的技术，其方法就是在谈话或论战中揭露论敌的意见中的矛盾，并克服这些矛盾。“古代有些哲学家认为思维中的矛盾之揭露以及对立意见的冲突，乃是发现真理的最好方法。”（《联共党史简明教程》，第124页）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解释，那就是经过思想斗争以达到正确的认识。这样，辩证法这个名词，在古代只是指人们辩驳是非发现真理的技术。但现在我们所说的辩证法，意义却不是这样狭隘的。它是关于世界的一般联系和发展规律的学说，辩证法的规律，被认为是客观事物（自然界、社会、以及人类的思想）发展的一般规律，依据这些规律观察和研究事物的方法，就是辩证法的认识方法。

辩证法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现象是永恒地运动变化着的，而这些运动变化，是事物本身内部的矛盾斗争发展的结果，是事物中间的各种对立势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揭露事物的矛盾，研究事物内部的各种对立的相互关系，研究它们中间的斗争，以及由斗争所引起的各种发展变化形态，就是辩证法的方法，就是辩

---

* 本文是上文《哲学是什么》的继续。《中国文化》连载到第四章《论对立统一》（上）即止。

证地认识事物的方法。

和辩证法相反对的，是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把事物现象看做固定不变的，没有内部矛盾，没有对立势力的相互影响和斗争的东西。“在形而上学上看来，事物和它的思想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不变的，凝固的，任何时候都一样的对象，它们在研究上是一个一个的，而一个和另一个都没有关系。”（恩格斯：《反杜林论》）形而上学不研究事物的矛盾，不研究对立势力的相互作用和斗争，而只把事物当做单独的，和其他事物没有关系的孤立的对象来看待；不研究事物的运动变化，而却想在事物中去追求永久不变的状态，永恒的规律，绝对完成的真理……

形而上学不是人类思想偶然错误，而是人类认识发展史的一定阶段上的产物。古代哲学家的哲学世界观，基本上都是辩证法的。这是由于在古代，科学极不发展，对于世界事物各部门不能详细地分别研究，古代哲学对于世界的理解，是直接从它的总体上观察得来的。这样的观察，使他们首先看见了世界的一切事物的联系和运动的状态。“首先就看到种种联系及交互作用无限错综的图画，在这中间，没有任何东西，保持他原来的性质、场所及状态，万物皆动皆变，皆生皆灭。”（恩格斯：《反杜林论》）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自然发生的辩证法思想。然而，古代的这种世界观，基本上虽然是正确的。但它没有对于世界各部门的分别研究作基础，所以，对于世界的总体虽然有着一般的印象，而对于这总体的各部分却没有明白的理解，正因此，对于总体的了解也是朦胧的，对于整个现象，也是不能明白的。这是古代哲学世界观的缺点，要补足这缺点，需要依靠后来的科学的发展。15世纪到18世纪的欧洲，正是代表着这样一个时期，这时近代的自然科学大大发展起来，对于自然的各部门的研究有了极大的进步。然而因为要分别

研究自然的各部门，首先就不能不把这各部门的事物从整个世界的联系中抽出来，单独地观察它的特性及因果关系，这样的一种研究方法，就养成了一种新的研究事物的习惯，那就是只能从联系、运动、变化之外来观察事物，而不能把握联系、运动、变化的本身。这就是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这一个时代，就成了形而上学的方法支配的时代。这一时代的科学发展，对于自然各部门的认识研究虽然有了极大的贡献，然而对于自然界和整个世界的总体，对于事物各部门的互相联系和运动，却没有正确的了解。要克服这缺点，必须打破形而上学的认识方法，在这些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事物各部门的精细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辩证法的认识方法来。这一个任务，是在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唯心论哲学提出来，并且开始努力企图使之完成的。特别黑格尔，他是“把辩证法的一般形态全面地有意识地表现出来的最初的学者”（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他开始从辩证法的观点上、普遍的联系运动的观点上，来了解世界的一切事物。“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整个自然历史及精细的世界，都被看做一种过程——即永恒的运动，变化，转换及发展的过程。”（恩格斯：《反杜林论》）黑格尔开始把世界一切现象看做辩证法的，规律的发展过程，把辩证法看做研究事物的总方法。但黑格尔是唯心论者，唯心论体系的外壳束缚了他的辩证的方法，使得他的辩证法成为不彻底的，使得他所要企图完成的建立辩证法世界观的任务，不能真正完成。他的唯心论，使他要求一切事物都服从于他的主观造作的思想构造，而不能完全客观地研究事物本身的规律。所以他的思想里，“就有许多补缀的，文饰的，虚构的——就是谬误的论调”（恩格斯：《反杜林论》）。这就是说，黑格尔的唯心论，使他不能彻底把握事物本身的辩证法的运动。要使辩证法成为彻底的辩证法，要完成建立

辩证的世界观和认识方法的任务，必须将唯心论丢开，把唯心论的辩证法改造为唯物辩证法，这一个任务，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解决了的。

辩证法的方法，有四个主要方面，或四个基本特征，这就是：

一、从普遍的联系上来看事物。

二、从运动变化的观点上来看事物。

三、从量变到质变的观点上看事物。

四、事物的内部矛盾，对立势力的相互影响和斗争，是事物运动发展的动力。

以下四章，就分别地来说明这四个特征。

第一章 事物的普遍联系

一、什么是事物的联系

从普遍的联系上来看事物，是辩证法的第一个基本特征。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相反：形而上学首先就不从联系的观点上来看事物，它把世界的一切现象看做各自独立的，彼此隔离的，相互间没有任何关系的东西，把整个世界看做是无数不相联属的事物的偶然堆集。形而上学者研究每一事物时，总是孤立的来加以考察，把它看做与周围的一切东西没有任何相互影响的；研究每一个社会时，把这一社会和其他社会的相互关系丢开不讲。例如提到中国的问题时，形而上学者可以把所谓中国的特殊性夸大到极端，可以提出所谓“国情论”，“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之类的论调。

辩证法的看法却不是这样，辩证法把世界的一切事物现象看做互相联系的东西，整个世界是联系的统一体，而不是单独的事

物的杂凑的堆积。辩证法把世界看做一整个的有机结构，因此在它的内部，每一事物都是这有机的总的结构的一部分，一事物和另一事物的联系，都是有机的联系。事物的有机联系的观点，是辩证法的最根本最重要的观点，这样的观点，把每一事物都看做是不能离开总的有机构造而存在的东西；事物不能离开世界的有机构造而孤立存在，正如人的手不能离开人的整个而表现出为手的作用一样。因此，社会也不能离开整个世界的总体而存在，中国不能离开世界各国的发展而孤立存在，离开全世界发展的道路而来论中国的“特殊性”，“国情”，永久的农业国之类，是错误的。

为什么世界一切事物形成统一的整体？为什么凡事物的联系都叫做有机的联系？因为事物的联系，是表现为互相依赖，互相制约的关系。

事物是互相依赖的，任何表面上好像是独立存在的事物，都依赖着其他许许多多的事物而存在，而发展。就自然界来说，一棵植物要能够在地球上生长，它是依赖着阳光、湿气、温度、适宜的气候、土质等等的东西。河里的水，不断向前流，似乎是与任何东西无关的，然而水之所以为水，是依赖着地球上的气压和温度而存在，如果有方法把它移到月亮和太阳上去，它马上就不会保持水的状态了。就人类生活来说，任何一个人的生活，不能离开他的社会环境而能维持片刻，也不能离开许多自然物而存在。人必须在社会内居于一定的地位，作为一社会，一阶级的分子。人必须吃，穿，呼吸，他又依赖着各种自然物而生存。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民族，也是一样，它不能不依赖一定的自然环境，例如说一定的土地，一定的人口，一定的富源出产，也不能不依赖一定的社会环境，例如从其他的国家、社会、民族中间取得自己必须的物质及精神条件，获得生活必需品的供给，以及经济的，政

治的，思想文化的影响等等。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侵略行为，也是依赖着一定的事物关系的，例如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侵略而不向阿比西尼亚侵略，这就是在自然方面，它依赖于地理上的便利，而在社会方面，它依赖于欧美帝国主义在远东方面的政治经济上的弱点等等。

事物既是互相依赖的，因此也就是互相制约的。一事物既依赖其他事物而存在，那也就是说，它的存在状态和发展方向，就要被其他的事物所规定，它之所以作为这样的事物而不是另外一样的事物，是在其他事物的作用和影响之下表现出来的。当它与某些事物相联系时，它就受到这些事物的一定影响而表现为某种状态，当与它相联系的事物改变为另外的事物时，也就在另外的影响之下而改变为另外的状态。树木的生长，随着阳光、土壤、肥料等等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成长情况，水在一定的温度下可以变为蒸气，然而同样因着空气压力的不同，由水变为蒸气的速度也就不同。人的思想行动，决定于他所生长的社会环境，不同环境之下的人，必有不同的特点。同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在中国是要用抗战行动来反对战争，要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在帝国主义国家下面却是要直接反对战争，要使战争失败。同是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侵略，英国可以征服印度，意大利可以打败阿比西尼亚，日本帝国主义却不能击败中国，这就是受到不同的国家情形和不同时代的制约。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五四以后在中国却表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不是以前的一切普通要建立资本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统治的旧民主主义，这就是为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所规定的。总之，任何事物，当与它发生联系的其他事物起了变化时，它本身也就要表现为不同的情状和不同的意义。

既然任何事物都是互相依赖互相制约，所以事物和事物中间

都有着不可分的必然的联系，都表现为有机的联系。而整个世界的事物现象，就构成统一的全体。从整个世界来说，一切事物相互间都是直接间接发生联系的。事物的联系是普遍的。

既然事物都是互相依赖互相制约，所以每一事物的存在，都是一定的联系中间的存在。每一事物的发展之表现为这样的状态和意义而不表现为另外的状态和意义，都有它所以会这样表现的一定条件，都有制约它，规定它，使它能够这样表现的条件。每一事物都是在一定条件之下保持它的存在。

这就是说，从整个世界来说，一事物与其他事物的联系是无限的，普遍的。既然每一事物都是世界的有机构成总体的一部分，所以它与其他任意的一件事物，直接间接总会发生某种联系。任何表面上好像互不相干的东西，追究起来，都一定有着某种的联系。天上的一片云与我个人生活是没有什么关联的，然而如果想到云就是雨的来源，而我吃饭所依靠的米麦的生产，是与雨水的多少有密切关系，在这样的间接意义上来说就是有联系的，现在的人与无数千万年以前的爬虫，在时间上是隔得这样远，当然也可以说是没有联系的，然而现在的人是过去的动物进化而来，这就有了一方面的联系。现在的人用煤炭煤油，这是远古的动植物的有机体遗留下来的死骸，这又有了另一方面的联系。今天德国轰炸英国，而我在中国某地写哲学文章，两者是没有关联的，然而欧洲的战争时时刻刻影响到中国的抗战，这又是间接有联系的。任何事物，既然是整个世界有机体的一分子，它就和其他任何事物都有一定的关联，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绝对没有任何联系的事物，在世界上是不存在的。

然而就个别的事物来说，与它发生联系而能够成为它的直接存在条件的事物，能够直接规定它，制约它，使它有着这样的状

态或意义而不成为其他状态或意义的事物，是一定的，有限的。如果联系的意义只就发生条件作用的这某些有限事物而言，那么其他的事物，我们就可以说是没有联系的，不管它在间接方面还有什么联系。树木的生长，有它的一些可以计算出来的必要条件：空气，土壤，温度，阳光，有了这些条件，就可以规定树木的生长，偶然飞过的一片天空的白云，或世界人类的大事，对于它却是不相干的，没有影响的，所以也就可以说是没有联系的。我写哲学文章，也只要看我自己的哲学修养和中国社会对于哲学研究的需要等等来决定，有了这些条件，我就可以写；德国轰炸英国的事，对于我写文章的行为并没有直接影响，有这样的事和没有这样的事，对于我都不起条件作用，我照样可以写文章。中国革命的性质，是由于中国的政治上有了无产阶级的活动和世界上有了一个无产阶级国家，这样的两件大事起了规定作用，远古的爬虫和那时的动植物所遗留下来的煤炭煤油，决不成其为新民主主义的条件。这样，每一个别事物现象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存在的，它的一定的状态或意义，是直接被一定的有限的条件所规定，而不必要在无限的联系上来决定。

事物既然为一定的条件所规定，因此，离开这一定的条件，也是不可能有这事物的存在，离开了这一定的条件，这事物的存在的意义也就不可以理解，每一事物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所以出现的一定的必然条件，因此也必须要估计到这些条件，才可以理解这一事物所以出现的原因。不估计到各种植物生长需要一定的气候等等的条件，就不能了解，为什么橘类只生长在南方而不生长在北方，不看社会的研究需要和自己的修养等等条件，只提起笔来乱写，那么这文章就是无意义的。不了解奴隶制度时代的各种物质条件，就不了解奴隶制度所以产生的理由，就会以为

奴隶制度的出现是完全不合理的，不可以理解的。不估计新民主主义时代的条件，那就不能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不能再是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自然界中任何一个现象，如果把它孤独拿来看，把它看做是与其周围现象没有联系的，那它就不能被人了解，因为自然界任何一部分中任何一个现象，如果把它看做是与其周围条件没有联系的，那它就会变成毫无意思的东西；反之，任何一个现象，如果把它看做是与其周围现象密切联系的，把它看做是受其周围现象所制约的，那它就能够被人理解和被人论证。”（《联共党史》，第 125 页）

因此，辩证法必须从联系的观点上来看事物，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上来看事物。——怎样从联系的观点上来看事物呢？让我们在下面一节来说明。

二、怎样从联系的观点上看事物

从联系的观点上看事物，就是要能够依据不同的具体条件，来对事物作具体的灵活的了解。同一事物，当它所联系到的各种条件有了变化时，我们对它的看法也就要改变。在辩证法的观点上来看事物时，决不可对这事物定下一个永久的原则或永久的标准，说它一定是这样而且永远是这样，或者一定不是这样，永远不是这样。而要看它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是怎样存在，而在另外的条件下又怎样改变。斯大林曾在一篇文章里引用了一个例子，对这一种观点给与了非常深刻而明了的说明：“我想到了前世纪 40 年代的一个俄国的形而上学者，他用这样一个问题去质问当时的辩证法论者：雨水对于收获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并且期望着他给一个‘确定的’答复。辩证法论者却很随便地告诉他，说这样问题在不同的时候会有不同的解答，说雨水在干旱时期是有利的，而

在多雨的时季却不会有利而且甚至于会有害。说因此如果对这问题期望得到一个‘范畴上的’解答，那就是一种很明显的愚蠢行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怎样了解民族问题》)这例子就很明白地告诉我们，必须依据不同的时候和不同的条件来对事物作不同的了解，来对问题给与不同的解答，想对任何问题作不变的“范畴的”解答，想依据一个永久的原则来对事物作永久“确定的”观察，都是很明显的愚蠢行为！

就社会的问题来说，自然是一样的，对于每一种社会制度，每一种社会现象的出现，必须依据这一社会的具体条件来加以理解。不能把“永久的正义”作为标准来评判一种社会制度或现象是不是合理，而要看这制度或现象是否有它必然的存在条件，是否依据历史的规律而出现：具备着一定历史条件的制度和现象，就是合规律的，否则就是不可能存在的。“奴隶占有制度，在现在的条件看来，乃是荒谬的现象，反自然的蠢事。而奴隶占有制度在瓦解着的原始公社制度条件下，却是完全可以了解的并且合于规律的现象，因为它和原始公社制度比较起来，乃是前进一步。”(《联共党史》，第129页）在现在中国提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要求，是合理的，因为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任务在今天还没有完成；在现在中国主张立刻就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或主张为三民主义（民主主义的纲领）斗争同时就等于为社会主义斗争，这就是一种蠢事，不然就是一种有意的欺骗，因为中国现在还没有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我们不能站在“永恒的正义”的观点上，说奴隶占有制度是残酷的不人道的，所以这制度是不合理的，所以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有的，我们不能这样说，因为奴隶制度在原始公社瓦解的历史条件之下它是合乎规律地必然出现的东西。我们也不能依据永久的道德标准，说社会主义是最合乎人道的，因此马上就要

实行社会主义，因为当历史条件未具备的时候，社会主义就不会依着我们的愿望突然出现。

这叫做“一切决定于地点时间和条件”的观点，这也叫做对于事物的历史的观点。

从联系的观点上来看事物，首先是要考察对于一事物有规定作用的联系，而不是要把任何联系估计在内。是要指出制约这一事物的条件，而不是把任何不起条件作用的东西也加以考察。前面已说过，一事物之所以存在的条件，是一定的，有限的，只要把握这些条件，就可以理解这事物的现状，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事物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其他不起决定作用的事物和联系是用不着去顾虑的，是可以把它当做没有联系的东西除外去的。倘若不是从一事物的决定条件上来研究它，而是依据一些不起条件作用的任意的联系来观察它，那么，这不仅仅是不必要，不仅仅是浪费精神，而且常常成为诡辩论的根据，成为颠倒是非，蒙蔽事实的狡辩。例如就有这样的论调，说中国之所以被侵略，是由于中国人民不卫生，或由于中国的妇女太讲时髦。于是丢开真正可以推动中国人民起来抗敌的工作不做，专门去注意老百姓的衣服整齐与否和妇女袖口的长短之类，这就是标准的诡辩的言论和行动。

不仅仅要把研究的注意力放在事物的规定条件上，而且首先要把握的是主要条件，而不是次要条件。因为所谓主要条件，就是规定这一事物，使能够保持这样的特点而不是另外的特点的条件。所以要了解事物的具体的特点，就可以从主要的条件上去找基础。一个人类的社会集团是不是能形成为一个民族，只要看它是不是具备斯大林所指出的成立民族的四个条件：一定的共同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生活习惯，和经济上的连带关系。只要看有没有这四个条件，而不必再顾虑其他条件，就可以确定那是

不是民族。中国的抗战是不是能持久，只要从中国抗战的几个条件来研究，中国抗战的进步性，中国的地大物博，中国所能得到的国际援助，中国的经济落后性等，而不必要依据其他的条件，就可以得到一个基本正确的解答。这正是在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里明白表现着的好例，有些人依据次要的条件想来解答持久战的问题，都得到了错误的结论，都被事实否定了。例如“唯武器论”和大城市失去中国必亡论，就是这一类的东西。近代武器的掌握，自然是进行抗战的一个条件。然而抗战的能否坚持，主要的条件是不是在于有没有近代的高级武器，当然不是的。坚持抗战的力量是在于进步条件，在于广大民众的兴起，在于地大物博，在于国际的或多或少的援助。所以如果单把武器问题看作决定抗战能否持久的条件，是错误的。中国的独立的保持，城市存在是不是一个条件，当然是的，然而是不是主要的条件，却又不是，因为城市失了，广大民众仍可以在乡村内进行抗战的斗争，所以大城市失去中国必亡的论调是错误的。

什么叫做主要条件？什么是对于一事物有主要规定作用的联系？那就是对于这事物的整个的发展过程上起规定作用的联系，就是对于这事物有全体(至少最大部分)的影响的条件。为什么近代武器不是持久战的主要条件，因为对日抗战不是强大的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而是一个小的强有力的帝国主义对一个半殖民地大国的战争，这里抗战的坚持不依赖于阵地战以至于闪击战，而是运动战游击战的广泛的展开，这就不需要到处都用高级武器，而高级武器在这样的战争里就没有全体性的规定作用。为什么大城市的存在不是中国独立存在的主要条件？因为中国是落后国家，城市不能完全统治乡村，失去了城市，对于中国全国的经济不会有严重的决定意义的影响。反之，例如进步，例如广大民众力量的发动，却是抗战全过

程中一时也不能放松的条件，是凡要使抗战能够坚持的任何地方都不能忽视的条件，所以是有全体意义的，是主要的条件。

把握条件，必须要从两方面看，而不要从局部看，必须要一方面看见积极的条件，同时也要注意到消极的条件。换一句话说，就是要同时注意到有利条件和困难条件。事物联系的作用，对于一事物的存在和发展有积极的助成意义的，就是有利条件，反之，对于这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发生妨害的影响的，就成为这事物的困难条件。对于这两种条件的同时注意，在实践斗争上有很重大的意义，因为这两种条件的存在，使事物的发展有两种可能的方向：或是在有利条件的助成上面积极地向前发展，或是在困难条件的压迫之下向后倒退。站在革命的立场上进行斗争的人，目的是在于将革命运动推向前进，以完成自己斗争的任务，而要这样，就必须能看清楚革命发展的各方面的条件，看清楚什么是对于革命有利的条件，和什么是有害的条件。而在斗争的每一个行动和每一个计划中，就必须要能够去努力克服困难条件和争取有利条件：所谓斗争，实际的内容不外就是克服发展的困难条件和争取有利条件。只有这样，才能够使事物的发展或革命的发展依照着我们所要求的方向前进，而不依照另外的方向。

例如抗战的斗争，谁也不应该妄想，说一切条件对于抗战都有利，而没有任何困难条件，同时凡是有勇气斗争的人，谁也不会像悲观失望的亡国论者那样，说一切条件都于抗战不利。全国人民为抗战的胜利而斗争的中间，就是要不断地克服抗战的困难条件而争取对于胜利有利的条件。在这里，如果不全面地看到两方面的条件，而是看到一方面的条件那是有害的。以为一切条件都完全有利，就会使我们忘记了要努力斗争，以为一切条件都有困难，就会使我们失了斗争的勇气。不论从哪一方面看，都会减

低我们抗战的力量的。

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的关系，也必须要有正确的把握；内外的分别，从世界的整个联系看起来，本来是相对的，只在一定条件一定范围的限制上才有这分别。对于中国的抗战来说，国际的援助，是外部的条件，而国内的进步才是内部条件，但就全世界人类社会体系来说，国际和中国的援助仍然可以看做同一有机总体内部的关系。这是首先要说明的一点。在这样的意义上所了解的内外条件，它们中间的互相关系怎样呢？对于一件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外部条件是否能起决定作用？或是只有内部条件能起决定作用？答复是：这要看情况如何，在一定的情况下外部条件或内部条件都可以起决定作用，如果以为只有内部条件才有决定作用，那是错误的。倘若外部的条件对于这事物的存在发展不发生全体的影响，那它就不是主要条件，它就不起决定作用。相反地，如果它对于事物能起全体的影响，那它就成为主要条件，就有决定作用。例如波罗的海的三个小国，今天已很快地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所以能够在今天完成革命，不能不说是由苏联的外力条件的帮助来决定，没有这外的条件，它们决不会在今天就很快转变。这就是说，在一定的情况下，在一定的时期，外部条件是有决定作用的。然而，这只是一方面，归根结底，我们还要说，内部的条件，是事物存在发展的最后基础。外部条件的决定作用，也要在这样的基础上来实现，也要通过这基础才能发生影响的。如果不是波罗的海三小国本身已有相当发展了的资本主义，如果它们内部完全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因素预先存在，虽有苏联的帮助，也将如我们的蒙古共和国一样，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斯大林所说的“革命不能输出”的道理。

以上所说，都是要我们着重首先把握主要条件。然而那并不

是说，对于次要条件就可以忽视，就可以看做完全不重要的条件。相反地，次要条件虽然不起全体的规定作用，然而它对于某事物仍有一定的规定作用，仍是对于事物的一定部分，一定时期，能给与发展上的制约。近代高级武器的掌握，虽然不是持久抗战的全范围全时期的主要条件，然而较大规模的战役中，在反攻的时期中，却有着决定胜负的作用。因此，克服次要的困难条件和争取次要的顺利条件也不是一个可以轻视的任务。

尤其要注意的是关于主要条件的转化问题。这就是说，次要条件也可以转化为主要条件，主要条件也可以转化为次要条件。这是必须要注意的，因为主要条件的转变，是规定事物的特点的条件的转变，是事物的存在和发展的转变点，善于看出这主要条件的变化，善于抓着这转变点，使我们的斗争的方向也灵活转变，这是指导革命的最重要的技术。当全国的顽固分子对于抗战队伍的进攻成为抗战主要困难条件时，我们为了克服这困难条件，要强调反顽固分子，反磨擦的争斗，当顽固分子的进攻已经减少，而抗战又有了新的困难，全国进一步的团结成为最重要的有利条件时，我们就要强调为加强全国的团结而斗争。田地里如果只有普通的害虫，而没有巨量的蝗虫时，驱除害虫虽也是收获的一个条件，然而只是次要的，如果一旦蝗虫发生，那么驱虫就成为农业上必须用一切力量去克服的主要困难条件了。这就是要看，一种条件对于事物的发展是否从仅仅部分的影响转变到发生全体的影响？如果有了这样的转变，那就是从次要的条件转变为主要的条件了。

以上就是怎样从联系的观点上来看问题的要点。

三、从联系上看事物的意义

从联系的观点上来看事物，是辩证法的方法的第一个特征，也

是辩证法的出发点。这就是说，如果要做一个辩证法者，如果要学得辩证地正确地来观察事物，那就首先要把世界看做是一切事物相互联系的总体，就要把任何事物放在联系的观点下面来考察，就要从事物所以成立的一切条件上来加以考查。没有这初步的观点，那么无论把辩证法的公式和词句背得多么娴熟，无论怎样善于引用经典，终是不能走进辩证法的大门去的。

为什么在辩证法的应用上有公式主义，为什么有许多人要叹息："学辩证法容易，懂辩证法的公式容易，灵活应用辩证法却难，甚至于就不知道怎样运用。"遇到这一个问题而感到头痛的人，主要的就是由于没有注意辩证法的出发点是在于首先从联系上来看事物，就是由于以为学辩证法的任务就在于懂得和记熟"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等规律，以及许多辩证法的范畴，就是由于有的人甚至以为辩证法的方法就只是一个"对立统一法则"（因为列宁说它是辩证法的核心），就是由于人们以为只要把这些规律法则范畴等直接引用到事物的研究上去，就算是完成了辩证法的任务，而不知道在引用这些规律作为研究的向导时，首先要有一前提，就是你必须先把所研究的对象的一切存在条件弄清楚。必须首先了解了对象的一切具体条件，才能够应用规律作为研究的向导。

直接引用规律来说明事物，是不对的，要用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说明事物，必须先弄清楚这一事物的一切对立所以产生的具体条件，然后依据这条件来研究它的对立方面是怎样具体的斗争，怎样具体的统一。例如有两个人在一起，我们研究他们的关系，如果不顾一切具体条件而直接引用公式，那么我们可以得到这样可笑的结论："对立的斗争是绝对的，两个人是对立的，所以他们一定绝对是要斗争的，是一定要打架的。"然而如果首先了解了两个

人所以在一起的条件，例如因革命而站在一起，那么，就可以发现，上面的结论是非常违背事实的，非常荒谬的。——事实上也就没有这样荒谬的辩证论者，然而如果不是在这样简单的问题上，而是碰到更复杂的研究对象时，这类似的荒谬的结论是常常会有的。

辩证法的联系的观点，就是要求我们在研究事物时，首先要从具体的客观的情况出发，而不要从主观的公式出发。要求我们在客观具体事实的基础上来应用辩证法的方法指导，而不是在一些抽象规律的基础上来对事物加以牵强附会的解释。这就是说，要使辩证法成为真正唯物论的辩证方法，而不成为唯心的主观构造。要能够这样，那么，从事物的联系从事物成立的条件出发，是有决定意义。这就是为什么不仅《联共党史简明教程》上要把联系的观点作为辩证法的第一个特征，而且在列宁讲到辩证法的诸要素时，也是首先就举出“观察的客观性”和“这些事物对于其他事物的多种多样关系的总体”（《哲学笔记》）。

革命斗争中的一切错误，基本上都是由于不能够客观地看事物，不能依据客观事物具体的条件来看问题，也就是在看问题的时候，不能够从联系的观点出发，什么是左倾空谈的错误？什么是主观主义的错误？这就是不依客观的具体条件，只凭主观的空想或简单的公式的了解，在斗争中盲动乱撞。列宁把左倾幼稚病解释作行动上的无政府主义，正是这样的意思。抗战中的速胜论者，就可以作为这一方面的例子。什么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有时是由于死守书本上的公式而不顾具体的社会斗争条件，如列宁反对普列汉诺夫，就由于他只知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般公式当做了死的公式，而忘记了无产阶级更发展的俄国客观条件下，无产阶级应起来争取领导，并争取革命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有的右倾机会主义是由于只看见部分的事实条件，而看不见全部的具体条件。如在抗战中只看见困难条件而有亡国论的主张，只看见有利条件而忘记了斗争的必要。不论左倾右倾的错误，都是由于在革命斗争中不顾客观的具体条件或不能完全把握这些条件，都是由于不能或不能充分地把联系的观点作为研究认识的出发点。

在辩证法上强调联系观点，是斯大林对于唯物辩证法所给与的一个发展。辩证法就是关于联系发展的学说，这一个基本观点，在马克思恩格斯也是被确定了的，马克思研究资本论的时候，他的研究方法就是首先研究对象的联系。“在研究方法上，要把一切大小材料搜集起来，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态，探究这些形态的内部联系。”（《资本论》第一版序）列宁也曾在辩证法的诸要素中，首先举出观察的客观性和事物与其他诸事物的联系来。然而这一个基本观点，到斯大林为联共党史所写的辩证法唯物论一节里，才强调地明白地被规定为辩证法的一个基本特征，而且更具体地简明了它的意义和内容。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和斯大林的一生的斗争经验和学说有密切的关系的。这一个强调，这一个发展，是斯大林一生对党内机会主义及党外敌人的理论上和实际上的斗争经验的一般化和总结，是联共党在斯大林领导下的长期斗争中所获得的一个思想上的重要成果。

第二章　论事物的运动变化

一、什么是事物运动变化

从运动变化的观点上来看事物，是辩证法的又一个基本特征。

辩证法既然告诉我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现象都是在相互联系中间存在，事物和现象中间都有着相互制约和相互依赖的关系，有着种种的相互作用，这就等于告诉我们说，事物现象都是在运动变化中间存在；因为所谓事物的相互作用，必然是在事物的运动变化中表现的；说一事物对于另一事物发生了作用，就等于说前者使后者发生运动变化。天上落雨，对于地上的植物起了作用，这作用就是使植物得到了生长的条件；同时植物吸收了水分，使水分变化为自己的组成，这又是植物对于水的作用——这就是自然界的相互作用和运动。帝国主义者和中国联系，对中国发生了作用，这就是使中国从封建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反过来中国对帝国主义也发生了它的作用，这作用是两方面的：作为半殖民地，中国是帝国主义发展的一个条件，而另一方面，中国广大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又表现出能够促进帝国主义没落的作用——这就是社会现象中间的相互作用和运动。所以，事物现象的相互联系，表现在它们的相互作用中，而这相互作用，又表现为事物现象的各种运动变化。承认事物的相互联系的观点，就不能不同时也承认事物的运动变化。所以恩格斯说：

“我们所能理解到的自然界组成某种体系，组成物体的某种总和的联系。……从这些物体处于相互的联系出发，逻辑地得出，它们彼此间互相发生作用，而它们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就是运动。”（《自然辩证法》）

辩证法既承认一切事物现象都在联系中间存在，因此也就不能不承认一切事物现象是在运动变化中间存在。这也是与形而上学正相反对的。形而上学把事物现象看做静止不动的东西，看做停顿不变的东西。一事物就是一事物，而且永远就是这样的事物，决不会改变为另外的事物，一切事物和现象中间都不会有任何的

革新和发展，世界永远就只是一些旧事物的堆积。为什么？因为形而上学没有看见事物的相互联系，不能理解事物的相互作用，以为一切事物都是各自孤立存在，不受其他任何事物的影响，也不能给其他事物以影响，因此也决不会因着周围条件的变化而发生运动变化。中国有特殊的国情，"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中国不会受任何其他条件的影响和作用，因此，不管国际国内条件怎样变化，中国仍是不变的特殊的国情，仍是以农立国——这就是形而上学者的观点。

辩证法则不是这样，辩证法决不把任何事物现象看做静止不动和停顿不变的形态，相反地却认为运动变化乃是事物的普遍存在形态，一切事物现象都在运动变化中；没有无物质的运动，也没有无运动的物质。一切事物既然都有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因此一切事物都必然要运动变化。倘若说事物和现象不能离开一定的条件来加以理解，倘若说一件事物离开了周围条件的联系就会成为毫无意义的东西，倘若说孤立的，与任何其他事物没有联系的现象，是不可想像，不可思议的话，那么，不在任何运动变化的形态中存在事物，也是不可能的，不能被理解的，绝对静止不动和停顿不变的事物，也是不可想像的，不可思议的。"没有运动的物质，跟没有物质的运动是同样地不可思议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如果说中国可以永久保持它的不变的特殊国情，如果说中国社会从来就没有变化过，而且将来也永远不会变动，不管国际国内条件怎样不同，它将始终是"以农立国"，这岂不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怪事吗？

运动是普遍的——这是辩证法的运动观第一个特点。

运动既是事物的相互作用，因此，每一事物现象的运动变化，都是在联系中产生的，都是在一定的周围条件影响之下表现出来

的；不能理解，任何事物可以离开一切周围条件而孤独地表现它自己的运动变化。植物不能离开一定的自然条件而生长，社会不能离开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条件而发展变化。然而这并不是说，事物的运动变化，单纯决定于周围的外在的条件，而事物本身则完全是消极的，完全是被动地接受外来的影响，并不是说，一切运动变化纯粹是外力推动的结果，而事物本身则不起任何的积极作用。运动变化是事物的相互作用，而不是片面的作用，不是单纯的甲作用于乙，甲为单纯的"能"动，乙为单纯的"所动"。相反地，当甲作用于乙时，乙也必然对于甲给与一定的反作用。德国打败了法国，然而在灭亡法国的战斗中德国也遭到了消耗和牺牲。雨水使植物生长，然而植物使雨水变成自己的有机组织。作用和反作用的同时存在，这就表现事物的运动变化中决不是只有外力的片面的推动作用，但这还只是一方面。还有另一方面：事物在周围条件的影响之下发生一定的运动变化，这运动变化所采取的一定的形态，也不是全然消极地决定于周围条件的作用，而是相反地最后决定于事物自身的性质，外的条件不能决定为什么事物的变化要采取这样的形态而不采取那样的形态。一块石头打在木头上，只使木头震动一下，打在玻璃上却使玻璃破碎。震动和破碎，都是以石头为原因，都是受到石头打击的结果，然而为什么木头只是震动而玻璃却要一定破碎，这变化形态的不同却不是决定于石头而是决定于木头和玻璃本身的不同。同是半殖民地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什么阿比西尼亚灭亡了而中国能坚持持久战以至于可能达到最后胜利？这决不是纯然决定于侵略的外来条件，而首先是由于中国与阿比西尼亚本身的不同；同是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为什么波罗的海之国家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加盟国，而蒙古仍只是一个蒙古共和国？这是因为波罗的海国家原来

已经有了进步的政治经济条件，而且在俄国革命以前它们原来就是俄国土地的一部分，而蒙古共和国是在经济上比较落后得多并且它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缘故。所以，一切事物的运动变化，虽然不能离开这一定的周围条件，然而它的运动变化的基础，它所以要这样变化而不是那样变化，其最后规定的根据却是每一事物的本身。或者可以这样说：任何一事物的运动变化，都不外是该事物本身的作用在一定条件下的反映和表现。运动变化的基础是在事物的本身，而决不是单纯被外力推动的消极的运动。

运动变化是事物间的相互作用，而这相互作用的表现如何，又是以事物本身的性质为基础，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运动变化是事物自己的运动变化，这就是列宁所说的："事物……的固有的运动……固有的生命。"(《哲学笔记》)这是辩证法的运动观的第二个特点。而这一点也正是与形而上学相反的：形而上学把一切事物现象看做不变不动的形态，事物既是永远不变不动的，那么它本身当然不会成为任何运动变化的原因，它的内部当然不会包含着任何运动变化的动力和源泉。因此，当我们对于种种运动变化的现象要求有所说明时，形而上学只好一律归之于外力的推动。中国既然被了解作永久的以农立国的特殊国家，因此中国本身就永远不可能走上发展资本主义以至于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如果我们指出，中国某些地方已经发生着一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国也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了时，形而上学者不说这是中国社会经济在帝国主义的影响下发展的结果，却说是帝国主义之赐——这就是叶青之流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见解，也就是所谓"外烁论"的见解。这种形而上学的对于运动变化的解释，结局是会和神话迷信走到一起去的：既然一切事物都没有自己运动的能力，既然事物不会在相互作用中表现为自己本身的运动变化，就不能从自然界及整个世界

事物本身的相互作用中去找它的原因,而必须在自然及世界之外去找它的推动力。这就是说,一切世界的变化运动,都是导源于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也就是导源于神的力量。17、18 世纪的机械唯物论者以为世界的变化运动的来源是上帝的"最初冲击",这种思想的代表者就是大科学家牛顿。由于从形而上学的观点上看事物的缘故,就是大科学家,也走到宗教迷信的道路上去了。

辩证法的运动观的第三个特点,就是认为事物的运动变化是无始无终的。不能设想,这世界能有任何这样一个时候:其中的事物是各自孤立存在的,而它们中间是没有相互联系的,因此也就不能设想,世界上能有任何一个这样的时候,事物和事物中间没有相互作用,没有变化运动。世界是无始无终的联系的统一体,因此也就是无始无终的变化运动的总体。"整个自然界,由其最小单位到最大物体,由沙粒到太阳,由 Protist(原始的活细胞)到人,都是处在永恒的产生和消灭过程中,处在毫不间断的流动中,处在始终不倦的运动和变化中。"(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世界的不倦不息的运动变化,在中国的自然发生的辩证法思想里,也曾经有过反映,例如"天行健,自强不息",正就是表现这样的意义。整个世界是无始无终的运动变化过程,是无限的发展过程,然而就个别事物来说,它的运动变化却是有始有终的,是发生,发展,没落的有限的过程,一个人有诞生的日子,有死亡的日子,他的生长年龄是有一定的,一个社会有产生的时期,极盛的时期以至于崩溃的时期,没有永久不变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个别的事物既是不断产生和消灭的过程,因此我们就看见,整个世界的变化运动,是表现在无数的个别新事物的不断的新生,和旧事物的没落中间。新的事物不断地代替了旧的事物,旧的事物不断地让位于新的事物,不断地转化为新的事物。无数的有限事物的新陈代谢和互相转化,形成整个世界无限

的永恒的流转。整个世界发展变化的无限性，是以个别事物的有限性为不可分的因素；个别事物是无常的，因此全世界的变化运动，全世界的不断革新和不断发展才是有常的。不要像形而上学所看的一样，以为一件事物消灭了就是绝对消灭了，一件事物的消灭常常是另一件更新的事物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不要以为个人的牺牲是纯粹的牺牲，无结果的牺牲，要承认革命的个人牺牲，总是把革命的整个运动推向前进。

每一个别事物的发生和发展过程，都是在一定的联系之下，在一定的条件之下表现的。它的发生发展所采取的运动形态，是随着条件的不同而有差异。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它表现为这样的作用，这样的运动形态，而在另外的条件下又表现为另外的一种。个别事物之所以有产生和消灭，有新旧交替和新陈代谢、就导源于这事物的存在和发展条件的产生和消灭，导源于发展条件的新陈代谢。这种新陈代谢，也就是新旧不同的发展形态的互相转化。由于五四运动以前和以后的国际国内条件的不同，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有新旧形式的不同；由于土地气候的差异，动植物能够生长的种类也有差异；资本主义之所以要转位于社会主义，是因为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已失去了保存它本身发展的条件，同时却准备了社会主义产生的条件。在不同的条件下既有不同的事物运动变化形态，因此辩证法又不能不承认，事物的运动变化，是多样的。事物的运动形式运动规律，因着条件的不同，而有着数不清的种类，承认运动变化的多样性，这是辩证法的运动观的第四个特点。

运动的多样性意义，就在于要求我们具体地研究各种各样的运动形态，而不要把事物笼统地一律看待。每一事物有每一事物的特殊运动形态，必须具体地加以把握，机械论的错误，就在于想用一种运动形态去解释其他的一切运动，就在于想把复杂的运动还

原为简单的形态。所以叫做机械论,就由于它想把机械力学的运动形态,来说明其他一切事物的运动,笛卡尔把动物看做机械,拉美特利把人看做机械,苏联的机械论者以为社会的变化也不外是力的均衡关系的变化。日常所谓“机械的应用公式”,不外就是说想用一种简单的事物变化公式去说明各种具体现象,而不肯就事物的具体条件去研究它的复杂形态。——这样的看问题的方法,是一定会犯错误的,所以也是一定要纠正的。

最后,辩证法的运动观的特点,是在于要承认事物运动的多方面性:不仅仅要了解,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运动形态,不同的条件引起不同的变化;并且还要承认,就是在同一事物,也可以包含着各种不同的具体运动方向。一种植物或动物的有机体的生长,不是单方面的生长,它的内部包含着机械的运动(例如躯干的发展,支持本身的重量,就是力学的运动),物理的运动(例如水分的吸收和蒸发),化学的运动(食物或养料的消化)。办一个学校,不仅仅是进行教务的运动,除了教务本身的活动之外,还有学校行政等等方面的活动。社会的运动更是复杂,就最大的方面来说,也包含着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运动变化。为什么事物的运动是多方面的?因为任何一件事物与其他事物的联系是多方面的,一事物与其他各种事物发生各方面的联系,各方面的相互作用,因此也就发生各方面的运动。动植物在生长中不能不抵抗地心吸力,因此就有它的机械运动,它不能不包含一定的水分,这就有物理运动,它不能不把外部的各种物质同化在自己的躯体内,否则便不能生存,因此就有它的化学运动。学生要学习,所以学校有教务活动,然而学生又是一些普通的人,不能不维持人的必要生活,不能不保持一定的生活秩序以便利于学习,这就要有学校行政之类的活动。社会也是一样,社会之所以有军

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的运动，不外是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中所具备着的各方面条件的作用的表现罢了。

一事物的各方面的运动，并不是都有同等意义的。它们在这事物中间，有着主要和次要的分别。对于这事物的全部运动有决定意义的，就是主要的运动方面，例如学校，无疑地教务活动或教育计划的推行，是它的主要的运动方面，学校的中心任务，就在于完成教育计划，所以教务活动在学校里是有着决定意义的运动。有着支配意义的运动。在抗战中的中国社会，它的主要运动自然就是在于军事方面："抗战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抗战"，抗战的军事任务的实现，在这时的中国是有着决定的、支配的意义的运动方面。

说主要运动方面是有决定意义和支配意义的运动方面，这不外等于说，次要运动方面是要服从于主要方面，是要配合和帮助主要的运动方面。动植物的主要运动方面是它的特殊的有机化学运动，机械的物理的运动，是在于便利这主要运动的进行。树木发展枝干，不外是要能够和阳光水分更好接触，以便利它的同化作用，而一定的水分的保持，也不外是为着同一的目的。在学校里，行政工作目的在于保证教育工作。在军队中战斗胜利的保证，除了革命军事训练之外，还须要有很好的政治工作和行政教育工作。这样，次要的运动方面，对于一事物的发展，决不是不重要的。相反地，正因为主要的运动方面必须要有次要的运动的帮助和保证，才能顺利地贯彻下去，所以次要的运动正是非常重要的。它之所以是次要的，只因为它没有决定事物整个的运动方向，而不是说它对于这事物是可有可无的。如果误以为次要的运动是不重要的，因此就加以忽视，或完全丢开，譬如在军队中对于政治工作加以忽视或完全不管，这就要使事物的发展受到耽延或阻碍，这就会造成很大的错误！

二、怎样从运动变化的观点来看事物

从运动变化的观点来看事物，来研究事物，不外就是把事物看做发生发展和没落的过程，看做产生和消灭的过程。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上这样说："观察对象及其精神的反映，主要是在它们的相互联系中，在它们的结合中，在它们的运动中，在它们的产生和消灭中，去观察它们。"把事物看做产生和消灭的过程时，就可以看出，整个世界的运动变化是不断的新陈代谢，是旧的不断没落和新的不断生长，是世界的永恒的革新和发展。这是和形而上学正相反对的。形而上学既把一切事物看做凝固不变静止不动的东西，因此也就不能理解事物的新旧交替，不理解任何革新和发展。如果说形而上学也承认世界上有某种运动变化的话，那么，这种运动至多不过被了解为旧事物的位置上的移动，这种变化至多不过被理解作同一事物的数量的增加和减少，旧的事物始终仍是旧的事物，在这运动变化中它们的本身决不会发生任何的变革。这就是只承认事物有表面的变动，而不承认事物在实质上的革新。世界的事物从来就只是这样而且永远也将只是这样。

既然把一切事物的变化运动看做发生，发展和没落的过程，那么，世界上的事物就不会永远只是这些事物，整个世界内部不断地有新的东西产生出来，也不断地有旧的东西消灭下去，世界的面目和实质，是时时刻刻在改变，时时刻刻都不同。在这中间，任何伟大的东西，倘若它已经失去了向上发展的条件，倘若它已经是处在没落的道路上了的话，那么，不管它眼前是表现得多么声势赫赫，它终于是要没落的。又，任何微渺的东西，倘若它具备着向上生长的条件，倘若它是处在新生发展的道路上，那么，不管它怎样微不足道，它总要向前发展，它一定会有伟大的前途，它

的新生的力量，是不可抵抗的，是不可战胜的。

几百万年前的大爬虫，是世界上空前绝后的伟大动物，然而现在完全绝种了；现在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有的也是空前地强大的，然而依据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以断定，它终归要有崩溃的一天；无产阶级在19世纪后半的俄国是数量很少而力量又极微弱的阶级，然而现在却建立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一粒米虽然微小，如果获得了生长的适当条件，它就可以传播到全世界。不要轻视任何微渺的事物，要仔细研究它是不是有向前发展的条件，如有这样的条件，那它就是绝对不容轻视的。不要被任何声势赫赫的东西所惊倒，要研究它所处的地位和条件，如果它所有着的只是没落的条件，那它就完全值不得害怕。

事物有的在没落，有的在发展，因此，整个世界的运动变化中就包含着两种运动，没落的运动和发展的运动，衰亡的运动和新生的运动；前进的和后退的，向上的和向下的。冬天去了，春天来了，资本主义既被打倒，社会主义建立起来，腐败的半封建的旧中国在抗战中渐渐消灭，朝气勃勃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渐渐产生出来。不单只整个世界不同的事物中间表现为这两种不同的运动，就是同一事物，也有着不同的运动方面，也有着前进的方面和没落的方面。人的思想的进步，是表现为旧思想的没落和新思想的生长，反过来，那就成为思想的退步。同一有机体，不断地有许多细胞在死亡，也不断的有许多细胞在新生，同一阶级社会，反动的阶级在没落，革命的阶级在前进。同一抗战，正面的正规军队向后退，而游击队却向敌后挺进。做了整天工作，疲倦了，工作完结，让位于休息，睡了一夜，结束了休息，又让工作开始。军队打仗，有时要前进，有时要后退，有时要正面进攻，有时要包围迂回。前进运动和后退运动的这种互相错综和互相交

替，构成世界事物运动变化的一幅非常复杂的图画。

退后运动并不是与前进运动毫无关系的，退后运动常是一定的前进运动的条件。有两种退后运动：一种是已经要衰亡的事物的整个的没落运动，如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段的没落，如个人的死亡，如帝国主义的被打倒。另一种是前进的事物在前进的战斗中所采取或所遭遇的部分和暂时的后退，如军队战斗中的以退为进，为着要设法给敌人于不利的境地和争取得自己有利的境地，而采取暂时的后退；如牺牲少数以保存多数，为着要使全军获得胜利，就不能顾惜那部分的被损失，胜利的战争中胜利者不能不有消耗。为着要获得更大的进步，就不惜作某些部分的让步，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动中已经很正确地做过了的。这样的两种后退运动，它们的后退，一般说来都是事物前进的条件，就第一种来说，如果应该没落的东西不让它没落，那就会成为新事物发展的障碍，旧社会不打倒，新社会就不能建立，日本帝国主义不打倒，中国怎样有独立自由？反动阶级如果始终维持着它的坚强统治，革命阶级就不能完成革命的工作。所以，没落的东西必须没落，然后才能打开新生的东西的发展道路。并且，新的东西是在旧的东西的基础上产生的，它要立足在旧东西的没落的废墟上，从旧的事物所遗留下的遗产中取得自身发展的条件。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武器，最初大都是从资产阶级的手中剥夺过来的。这就是说，新的事物的发展，并不是与旧的事物的发展完全隔绝，相反地它只是在新的方式上对旧事物的既有成果的继承发扬。因此，没落的事物常是某种新的事物的发展必然条件，因为前者的没落就是为后者清除发展的道路，而前者的发展成果又是为后者准备了发展条件的缘故。至于就第二种后退来说，那是更用不着解释，那种部分的和暂时的退后本来就是为

着全体的前进的，所以它当然常常是后者的必要条件。

新生的东西是不可战胜的，是有发展前途的，因此，从运动变化的观点上来看事物，从辩证法上来看事物时，我们就要看重新生的东西，就要依靠新生的东西。即令这东西在现时还是极微渺的，极不巩固的，然而如果它具备着向前发展的条件，那就要站在它的立场上，推进它的发展。为什么辩证法唯物论者要以无产阶级的立场为自己的立场呢?因为无产阶级所处的一切条件，使它成为最革命最前进的阶级，使它的发展最能配合历史发展的客观步骤，使它有最远大的发展前途。因此即使无产阶级在人数上非常少，即使它的数目远远地低过农民，然而它的向上发展却是谁也不能阻止的。因此只有站在无产阶级方面，我们的立场也才是适合客观社会发展的立场，我们的思想行动也才能成为最有出路的思想行动。不会走到错误的道路上去。这就是如《联共党史简明教程》所说的："为着不致在政治上弄出错误，那就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

既然后退运动常是新生事物向前发展的条件，那么要从辩证法的观点上来看事物，就在于要使一切应该退后的东西彻底退后，使应该没落的东西彻底没落。对于旧的东西，应该死亡的东西，不应该有任何的姑息妥协的态度，不应该有保存，留恋的心情。对于旧的东西的保守和留恋，就是对于新生的东西的弃绝，就是对于进步发展的阻碍，如果向后看，就不能向前看。如果不彻底肃清汉奸投降主义分子，就不能完成抗战建国的事业，如果不想彻底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中国的领土之外，却想姑息的和敌人妥协，那就没有办法建立完全独立自由的新中国。这是对于没落的事物来说，我们所应有的态度。至于前进者自身在战斗中的态度，自然首先要求得进步运动的彻底的最后的胜利。然而同时又要善于

知道，为着这样的胜利，有时必须忍受部分的牺牲（不是全体溃败），实行某些方面的让步（不是革命原则上的妥协），采取部分的或暂时的退步运动（不是退却逃跑）。列宁在批评左倾幼稚病的时候，曾经指出革命的战斗上不只要知道进攻，而且要知道退守，在一定条件下必要的适当的退守，常是向前继续进步的重要条件。当工作疲倦了时，适当的休息（对工作来说，是暂时的退后），是继续工作的必要条件。当军队在不利的地形上与敌遭遇时，迅速的撤退是保持有生力量继续作战的必要条件，当环境由顺利变为恶劣（例如一个城市变成了沦陷区），公开革命工作的撤退和人员的隐蔽是坚持工作的必要条件。在这一类的情况下，就不能不考虑适当的退后运动。

既然新的事物的发展要从旧的事物的发展成果中去找基础，既然旧的事物为新事物准备了发展的条件，那么在运动变化的观点上来看事物时，就又有这样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善于从旧事物中取得新事物发展的条件，要善于改造旧事物的成果，以适于新事物发展的需要。在军事斗争中，从敌人夺取军需枪械物品，是进步的被侵略的军队的一大任务。无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以资产阶级所发展了的科学技术作基础，必须学取资产阶级所保持的科学技术。必须把这些旧的物资上和精神上的条件加以把握和改造，才能走上更高级的新的发展的道路。

最后，运动变化既然表现为不断的新旧交替，表现为产生和消灭的不断更新过程，也就是表现为新的运动形态和新的变化方面的继续不断的展开，这就构成了事物的阶段式的发展，每一新事物的产生和消灭或每一发展方面的展开，形成世界事物无限发展的一个阶段。或者说，世界事物的发展是一条无限长的连锁，每一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成为这连锁中的一环，由一事物发展到另一

事物，就是一个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的过渡，是连锁的一环向另一环的过渡。从大的方面来说，一种社会形式到另一社会形式的转变，例如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样的一种过渡和阶段，由小的方面来说，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每一恐慌周期，也是这样的过渡；从一个人一天的生活来说，例如上午学习理论，下午工作，晚上休息，也正是这样的过渡；就一部门的工作来说，例如军队，今天打仗，明天休息，后天进行政治教育，再一天进行生产，也是各个环的阶段的互相过渡。这种连环式的运动变化，是表示在运动中有相对的静止，有相对停顿的阶段。运动变化始终是运动变化，然而每一个环的内部的运动变化，都可以看做是相对地停留在一定阶段上。理论学习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原是不断的变化的，然而因为在这中间，自始至终是学习理论的过程，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一天的生活在上午是停留在理论的学习上，这样，相对的静止，不外是运动本身的特殊表现，是运动的阶段性的表现，而不是运动以外的东西，辩证法认为运动是绝对的，没有绝对的静止而只有相对静止。所谓相对的静止就是说它在实质上仍是运动变化的，不过在一定的方面表现着静止停顿的现象罢了。

事物的发展既是阶段式的，既是在一定的时期，表现为一定的环节，而在另外的时期又过渡到另外的环节，因此，我们研究事物，也就要善于把握这一定的时期之下的一定的环节，要能够看出在一定的条件之下事物发展所必然表现的主要的方面。白天工作，夜晚要睡觉，春天开荒种地，秋天收获，这就是日常生活中反复见到的运动阶段的变化，这自然是很容易把握的。然而在不是日常反复出现的事物中间，在复杂的事物中间，就不是这样容易把握。例如抗战，在什么条件之下是防卫阶段，在什么条件之下又是相持阶段和反攻阶段，这就必须要经过很审慎的科学研

究，才能加以确定。革命斗争的指导，就在于要能够正确把握一定的发展环节，并针对一定阶段的情况而采取一定的适当的战略策略。所谓要把握斗争中的中心一环，就是这样的意思。在这里，相对的静止就有着很大的意义，在一定的阶段，只能采取一定的与它适合的战略策略，而不能采取另外的战略策略，如果事实条件基本不变，那么战略策略也是基本不变，也是基本上停留在一定的方式。超过了事实条件所需要的战略策略，或赶不上事实条件的需要，都不能正确地对付中心的一环，都要成为错误。例如抗战现在是在相持阶段，如果我们要想超过这一阶段，马上实行反攻，这就是过左的速胜论的错误。如果我们还不知道相持阶段的事实存在，以为敌人还像抗战初期一样地有着极大的进攻能力，忘记了敌人在三年战争中所受到的消耗，在敌人的威胁面前害怕，那就会陷于右倾动摇的错误。只有正确地认识当前的事实条件和抗战发展阶段，才能够采取正确的对付的态度，才能够从容地把握着这中心的一环，并准备过渡到另一环。只有看清楚了这是相持阶段，才能正确地对付这一时期敌人的各方面的进攻，才能准备将来反攻阶段的反攻力量。

以上，就是从运动观点上看事物的要点。

第三章　论质量的互相转变

一、什 么 是 质

世界是有机联系的总体，在这总体内部，包含着无限复杂的，多种多样的现象和事物。每一现象和事物，成为这联系总体的一个要素，一个组成分子。譬如自然界，日月星辰山河动植矿物，各

个都是它的有机构成的一部分；又譬如人类社会，不同的社会形式，不同的民族国家，是世界人类社会体系的不同的组成单位。我们说世界是有机联系的总体，这并不等于说世界是混沌一片，所谓有机联系，乃是互有区别的事物现象间的相互联系。我们说任何事物现象都不能孤立存在，这并不等于说一事物与他事物可以混淆不分，其实任何事物都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而与其他事物相联系的。世界的一切事物现象，是相互联系着，而同时又互有区别，互相对立，以至于互相斗争。把任何事物孤立起来看的，都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把世界看成混沌一片，把一切事物混淆不分的，也是反辩证法的观点。

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宣传，就是利用混沌一片的方法来实行欺骗，来辩护自己的侵略行为的。这就是首先把所谓“大东亚”粉饰成平等齐一的范畴的总体，而诡辩地抹杀了这中间帝国主义与被侵略民族的对立。只有甘心做奴隶的汉奸汪精卫之流，才会把这种糊涂一片的思想奉为神圣。

要认识各种事物的有机联系，同时又要弄清楚各种事物的区别性，这就是辩证法的方法的两个不可分的方面。忘记了这一点，就要犯错误，就要有危险。所谓要弄清楚事物与事物之区别性，就在于要认识事物的质，就在于把握不同事物的不同的质。

什么是事物的质？一句话，就是事物的规定性。在前章已经说过，事物与事物发生联系时，就表现为一定的作用，在不同的联系条件之下，表现不同的作用。所谓规定性，就是能使这事物在一定条件下表现为一定作用的性质。盐，被放在淡水里，一定会溶解，蛋在适宜的温度下，一定能孵化为小鸡。真正革命的政党，在民众运动高涨的条件下，一定可以大大活跃起来。一定的质，在一定的条件下必定表现为一定的作用，而不表现为其他的

作用。如果没有特殊情形，只要是盐，在淡水里一定溶解，只要是好的蛋，在适宜的温度下一定孵化，只要是革命政党，一定欢迎民众运动的高涨。这样的作用，在这样的质，这样的条件下，一定会这样表现出来，而不会有相反的或其他的情形。质就是能够使事物"一定会这样"的性质，所以叫做规定性。

质既然是事物的规定性，不同质的事物，就有不同的规定性。也就是说，即使条件相同，若质不同，就会表现为不同的作用。把铁放在水里，就不会溶解，石卵虽在适宜温度下也不孵化，革命性不彻底或不革命的政党，一定会怕民众，就因为这些东西，和前面的铁，蛋，革命政党等，在质的方面是不同的。不同的规定性所表现的这不同的作用，就能使事物有所区别，就能够使我们不至于把不同的事物混在一起。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同一条件下，由于所表现的行动不同（投降、动摇、坚决抗战等），就可以看出中国各阶级的不同的质，在要求民主的条件下，由于所表现的态度不同，就可以分别各党派的不同的质。要认识一事物的质，就必须把它放在一定条件下，看它发生什么作用，看它怎样表现其规定性；要区别不同事物的质，就要看它在同一条件下会表现出什么不同的作用。

事物的一定的作用，以至于一定的运动，是它的质在一定条件下的表现，这就是前章所说的，运动是事物自己的运动，事物的作用和它的运动基础，是在它自身的内部：是它有着这样的规定性，才能有这样的作用和运动。规定性就是一定作用和运动的规定性。现在就要进一步问：为什么一事物会有一定的规定性？它的内部有着这一定的规定性，其基础是什么？答复是，每一事物都是由各种因素所构成，它的内部包含着许多构成条件和方面。这些内在条件，因素，或方面中间，最占优势最有支配力量的，就

决定质，就成为它的规定性的基础。资本主义的质是什么决定的呢？是这社会发展中资产阶级的优势地位，资产阶级起了支配作用的地方，社会的发展就依着资本主义的规定向前发展。如果那支配地位上换了封建地主阶级，或无产阶级，社会的运动方式就不同，也就是质或规定性不同了。蛋的质是决定于那活的胚种在发展中的积极作用，革命集团的质是决定于最能坚持革命主张纲领的一些成员的领导。倘若胚种坏了，蛋也就坏了，倘若领导者不能掌握正确的纲领方向，那么革命集团的革命的质就减低甚至于会消失了。就自然界来说，化学原素的质，是决定于构成原子的某些电子的积极作用，化合物的质，是决定于构成化合物的原子中有某些具备特殊作用的原子的存在，如酸的质决定于H离子的存在，碱的质决定于OH离子的存在。因此，我们又不妨一般地说，事物的质，是决定于这事物的构成要素相互间的支配关系。认识事物构成要素的支配关系或主从关系，确定事物中间起支配作用决定作用的某些要素，在事物的质的认识上，是一个主要关键。

规定性是事物本身的规定性，但它的表现，却因联系条件的不同而有多种多样的状态；即表现为多方面的作用。铁在水里不会溶解，在潮湿空气里却会慢慢生锈，遇高热会发红，变软以至于溶化，遇强酸就会腐蚀。……这是铁的规定性在各种条件下的不同的表现。半殖民地的大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自然是要剥削的，对于封建势力是常常有某种联系的，对于帝国主义是多少总有依赖性的，对于危害它的财产的帝国主义，也知道要反抗，然而是不够坚决，对于民众运动是害怕的；这就是半殖民地大资产阶级在不同联系条件下的不同的质的表现。这不同的各种表现，就叫做事物的各方面的“规定”。所以说质就是规定性，就因为它能

使这事物表现为各方面的规定的缘故。在这里，辩证法对于事物的质的了解，和形而上学是相反的。形而上学把事物的规定性看做某些不变的，永久固定在事物本身上的某些规定的总合。形而上学常列举出某些规定，作为一事物的永久不变的标识，以为只有这些规定才是事物本身的质的规定，如果在这些规定之外还有什么作用表现出来，形而上学就认为这一定不是属于那事物本身应有的性质，认为这不是假象，就是反常的怪事。例如形而上学给物质的概念的规定，说物质本身只有广袤，质量，不可分性之类的性质，其他如颜色、气味、温度之类就不是物质本身所有的规定，而只是人的主观感觉上的假象。在封建社会里，形而上学的一定的规定是被看得很神圣的。某种花在几月开它就只能在几月开，或早或迟，都要被人看做反常，看做怪事。妇女应该有三从四德，如果有谁不守三从四德，就不被认为是正常的妇女，就被看做妖孽。依这形而上学的规定法，封建社会的统治者给各阶层的人各个定出一定的死规矩作为永远不变的行为标准，下层的人一定要绝对服从，要把被剥削看做天经地义，而上层的人就一定要享有特权。再举一个中国的例子：把“以农立国”、“精神文明”、“中庸之道”等等看做中国社会永久不变的特征的人，也正是这样的一种形而上学者。

辩证法的看法则相反，事物的规定固然是根据于事物本身，决定于事物内部要素的支配关系，然而这规定性显现为各种具体规定时，则要依着对其他事物的不同的联系而有种种差异。每一事物所能干预的联系条件是多种多样的，因此每一事物所能表现的作用规定，也是极其多种多样的，不应该把任何有限的死的规定，造成对于事物的永恒的囚牢。联系条件变化了，事物的规定也就随着变化。质是安定的，因为一种质就是一定的规定性，同时质

又不是绝对安定（或固定）的，因为这同一的内在规定性会在不同的关联中“外化”为不同的规定。同一事物的质在种种条件下所表现的这种种的作用规定，就是这事物的属性（也叫做“固有性”或“本性”——都是同一外国原文名词的不同的译法）。

怎样认识事物的质呢？已经说过把握事物内部各构成要素间的支配关系或主从关系，就是认识质的主要关键，一定的支配关系，是事物之所以有一定规定性的根据，基础。所以，能看清楚什么要素在事物内部起决定作用，就能在质的认识上把握到一个大体的方向。知道了资产阶级是统治者，就大体上可以确定这社会的质是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知道了封建势力在中国内部还很强大，它是中国革命内部的最主要的敌人时，就可以确定中国革命有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规定性。由水溶液中H离子的存在，可以确定这化合物的酸性，由OH离子的存在，可以确定其碱性，普通我们所谓质的认识，常常就是指这基本的支配关系，因为只要把握了这关系，我们就可以对于质的规定性作一个大概的确定了。当我们看见资本家是日本、美国等等国家的统治阶级时，我们就说已认识到了这些国家的性质，当我们认识到封建势力在中国内部还是很大，反封建是中国革命对内的最基本的要求时，我们就说已经把握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当我们从化学的分析上找出了H离子的存在时，就能确定这化合物的规定性是属于酸的范畴。然而，这只是普通一般的说法，倘若以为质的认识就只是在于把握这样的关系，倘若以为这就能使我们真正充分把握事物的质，那是错误的。我们要重复地说：事物内部要素的支配关系的认识，只是把握质的主要关键，只是使我们了解了质的基础，而不是由此就能够把规定性具体把握住了。内部的支配关系决定质，产生一定的规定性，然而那关系本身并不就是规定性，规定性如

何，是要在许多具体的作用规定中才能看出来的。所谓规定性，不外就是能表现为许多作用的规定性。离开了这一切具体的作用属性的规定，要来捉摸一个抽象的独立自存的规定性，那是不可能的，那么规定性是实际上不会有的。马克思关于商品的使用价值曾这样说：“物的效用，使那物成为一个使用价值。但这个效用，决不是浮在空中的。它是受商品体的性质限制着的，故离商品体，即不存在。”(《资本论》第1卷，郭译本，第2页)这里所说的商品体的性质，原文的Eigeaschaft，其实就是属性，这就是说使用价值这种规定性(效用)，不会悬空地孤立存在，而是在商品体的属性中才能实际表现的。所以，要认识事物的质、必须要通过它的各种属性，必须要具体把握它的各种作用规定，才能真正确定什么是它的实际的质。什么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规定性，就是使这革命能表现出反帝，反封建，武装斗争等等属性来的规定性。什么是疟疾的规定性？就是使病人一定要发生间歇寒热等等作用的规定性。什么是铁的规定性？就是能够不溶于水，在湿空气中生锈，一定的高热就发红、溶化等规定性。离开了反帝反封建等等属性想来捉摸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质的本身，离开了间歇寒热等等属性想另外找疟疾规定性的本身，离开了生锈，发红等等的规定性想来把握另外的铁的规定性本身，都是不可能的。黑格尔在论质的规定时，曾嘲笑康德，因为他撇开了各种具体的规定去谈“物本体”，因为他把“物本体”看做一切具体规定之外的超越的存在；然而正如列宁所说，这种“物本体是‘非常单纯的抽象’……，‘物本体’是离开了一切规定（‘对他在’）的（离开了一切对他物的关系的）抽象，也就是无。所以物本体‘除了虚伪的空洞的抽象之外，什么也没有！’”(列宁：《关于黑格尔〈逻辑学〉的笔记》) 所以想离开了一切具体的规定去找孤立自存的规定性本身，一定只能够把握到

“虚伪的空洞的抽象”，离开了一切具体效用来谈商品的使用价值，离开了一切铁的属性来谈铁的质，离开了一切革命的各种表现来谈资产阶级革命，都只能在空洞无内容的抽象概念上绕圈子。

所以，首先必须要把握到许多具体的规定，也就是必须要通过属性的认识，才能够实际了解规定性是什么。认识事物内部要素的支配关系，自然是重要的关键，它使我们知道一定规定所以存在的基础，根据。但同一支配关系并不能直接就告诉我们是怎样的一种规定性，我们也不能直接从这里就了解到这事物将表现怎样的一些规定。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把握了它的作用、属性，才能具体知道质的实际。H 离子的存在，固然是酸的基础，然而仅仅凭着 H 离子，并不能直接知道酸是什么一回事。要在它与碱性物联系起来，要看出在这种条件下 H 离子与 OH 离子立刻结合而成水 (H_2O) 的作用，或看见它腐蚀金属的作用，我们才能确定酸的规定性就是这样的规定性。什么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呢？单单封建势力的统治地位是不能直接说明的。要从这革命的要求，反帝反封建，发展资本主义，武装斗争以至于文化斗争各方面的动态上去考察，才能够具体认识这革命的规定性。单单疟虫的存在，它本身不能直接告诉我们疟疾是怎样一回事，必须从疟疾在人身的体温、脉搏、呼吸、血液等等方面所引起的变化上才可以确定疟疾的规定性如何。一个人把一件商品买到手来，并不能立刻就可以看出这商品的效用如何，要在他实际使用它的时候，或依据它的属性来设想到它如何被使用时，才可以明确知道它的效用。所以，不通过各种属性的认识，是无从确定事物的质的。平常我们以为把握了事物的支配关系，就以为能认识质，并且从这关系直接去找出它应有的许多规定，不待去研究属性。例如对于一种新的化合物，在分析化学上找出了 H 离子，立刻就可以断定

它有酸的规定性，断定它一定可以和碱结合，能腐蚀金属，或看见社会是资产阶级统治的，立刻就断定这社会的各方面的发展变化，一定表现出许多资本主义社会的属性（如竞争、恐慌之类），而不必先看见这些属性。然而，我们所以能够做这样的断定，并不是H离子或资产阶级的统治直接告诉我们的，而是因为事先我们已经研究过其他的酸物或资本主义社会，事先已经从它们的各种属性上去把握了它的规定性，事先已知道酸一定是能和碱结合；资本主义社会一定有竞争恐慌之类，所以现在看见了H离子及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联想到这些属性的。总之，属性的认识是在先行的。不先把握了许多具体的属性，那么即使认识了事物的内部的支配关系，也还不明了质是什么。从来没有经过生存竞争的苦痛的小牛，见了老虎不会害怕，从来没有见过近代交通工具的野蛮人，看了火车头拖了车厢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还依据他自己的想象，把它规定为大怪物。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竞争和恐慌之类的人，你告诉他资产阶级统治，他不会就能懂得这是什么意义。例如以前羡慕欧美文明的人，虽然知道美国华盛顿创造了商人政府，然而因为没有注意到这样的政府之下也有剥削、竞争、恐慌，所以还以为这就是太平世界、理想国。

事物虽然可能有无限多样的相互联系，但在一定的地点时间，它所干预的联系条件是常常有一定的，它的主要条件是有限的。因此，在同一地点时间，事物的质决不会表现为无限多种的属性。我们虽然不像形而上学那样，把某些有限的属性作为一事物的永久不变的规定，但在一定地点时间，一定条件之下，我们可以确定指出事物只有某些属性，或只有某些主要的属性。要具体把握质，首先就只要注意那实际与它关联着的许多主要条件，以及在这些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一些主要属性。一切实际上不起条件作用的

联系，或不重要的条件，以及这样的联系条件所能发生的影响，是不妨从略的。倘若不是这样，倘若要求我们不但把握主要属性，那么这质的认识就会成为不可能，因为这就是要我们在一事物里一次就抽出它的无限多的规定来，这就是要求我们做不可能的事。而且就是可能，也会把质的具体认识弄糊涂了，使我们不能最具体地把握一定时间地点的主要的规定，把握事物的具体的特征，这也就是不能真正认识具体的质。例如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由于半殖民地的条件，所以反帝国主义的运动成为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一个最主要的标识，由于经济落后以及敌人野蛮和强大的条件，所以长期战争是一个主要属性，武装革命也是由此而来的又一个主要属性。由于地土广大，经济不集中，所以革命力量能以乡村为基础，乡村战胜城市是一个主要属性，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是由此而来的又一个主要属性。依据这些主要属性，就可以把握中国革命的具体的规定。至于其他次要的条件，如黄河某年决口，某地出了一个英雄伟人之类，对于中国革命虽然也有作用，也许还会有很大的影响，然而这在中国革命的全范围全过程来说，这不是规定主要属性的主要条件，因此在中国革命的质的认识中就不妨略去（但这不是说在革命实际斗争中可以完全不管这些条件，而只是说在中国革命的质的认识上它不占重要地位，只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略去）。就诊病的例子来说，从脉搏、呼吸、温度、血液以及便溺等等主要条件上所表现出来的主要作用，就可以断定病情，至于病人被跳蚤咬了一下，或是住的地方光线不好等等，也对病人有影响，有作用的；然而那在断症方面也是可以略去的不重要的作用。

把握了主要的属性，就是把握了实在的具体的质，就是把握了一件事物的“特点”或“特质”。

但这主要的属性，是可以从两方面去把握的，那就是一般的方面和特殊的方面。我们说日本、美国、英国等国家的性质相同，是指它们帝国主义的规定性的一般共同点而言。说硫酸盐酸都是酸性化合物，是指它一般都能和碱结合，能腐蚀某种金属而言，说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通常是指它在要求发展资本主义，要求民主自由等属性上，一般地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有相同的地方而言。当我们说到这些事物的共同的质时，是把它们的不同的各自的特点抽象了的。这一般方面的质的认识，可以帮助我们去把握许多具体事物的共同的基础，在这一点上来说是很重要的。然而如果以为质的认识只限于一般的方面，那就是很大的错误。因为现实的事物，决没有纯粹以一般的姿态出现的事。两件事物即使是同质的，然而因为是两件事物，它们各有不同的两种存在条件，因此它们共同的规定性是在不同的形式下表现出来，日本、美国、英国同是帝国主义，同样要侵略殖民地，同样有恐慌，有战争，然而也仅仅是在一般的倾向上有这些共同的属性，至于侵略殖民地的具体方法范围等等，恐慌的具体情况以及时期长短等等，战争的准备方法，表现的力量等等，都各个有不同的具体特点，民主革命一般都要求资本主义发展，要求民族独立，要求政治文化的自由，都有革命斗争，然而要求的具体内容，那些要求是最迫切的，斗争的强度和时期长短等等，却又是各国的民主革命不能尽同的。盐酸硫酸都能腐蚀某种金属，然而腐蚀的具体情形不同。如果仅仅满足于一般的规定的把握，那么结果仍然只能得到一个没有内容的空洞概念，不能够反映现实的事物的真实的情况，仅仅说日本与英美同属于帝国主义范畴，说中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同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这并不能告诉我们日本的实际情况如何，中国的革命究竟实际上是怎样进行的，也

就是不能了解各国革命的特点,仅仅一般地说硫酸盐酸都是酸,都能与碱结合,并不能了解硫酸与盐结合的实际情形如何,而盐酸又如何。所以,要能够正确地把握事物客观的规定性,就不单只要从一般的方面来看,而且要从特殊的一方面来看,不单只要了解许多同类事物的属性的一般共同点,而且要具体认识各属性在同类各事物中的不同的表现。所以,在一般的方面看来是同质的事物,在特殊的方面来看可以是有区别的。英国、日本、美国,在它的规定性的一般的方面来看是同质的,因为都是帝国主义国家,然而在特殊的方面看它们就各有不同的特点,所以又可以说它们的质是互有区别的。中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在属性的具体表现上是性质不同的,但从一般的方面来看却都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一切商品都有使用价值,这一点是同质的,但各种商品的"效用"却绝不相同,所以各种商品又是互有区别的。一切实际存在的事物的质,它所表现的属性都是这两方面的统一,所以我们认识事物就要从这两方面来把握,忽视了一方面,就没有客观的认识。

形而上学的思想,就是只能从规定的一般方面去看事物的质,而把特殊的方面看做不重要的或不属于质的本身的东西。前面说过的形而上学唯物论对于物质的了解,就是想给物质指出一些最一般的属性(叫做"第一次属性"),以为这就是物质本身的真实的规定,而其他的属性,叫做第二次属性,以为那不是物质本身所具有的东西。仅从一般的方面来认识质,在实践斗争中尤其有危险性。列宁曾批判过的,那普列哈诺夫对于俄国革命理解的错误,就是由于他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只看见规定性的一般方面,而看不见俄国革命的具体条件下的具体特点。因此他对于俄国革命只能提出抽象的一般性的纲领,而不能提出切合俄国实

际情况的具体纲领。倘若我们只抽象地说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不能看出它与法国革命有什么不同，不依据中国实际条件把握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特点，这要会犯什么错误，是不难想象的。再说，如果以为英美在反对日本，我们也在抗日，根据这一般的方法就忘记了英美反日与我们抗日的不同，以为可以完全站在一起，那又是多么危险！

事物的具体的特质，是表现在许多主要条件所规定的主要属性里。由于事物所干预的条件不是永久不变的缘故，由于在发展中许多主要条件会起变化的缘故，因此事物的主要属性在发展中也会跟着发生变化，某些主要属性变了，以至于消失了，某些新的主要属性又出现了，因此，就是同一事物，在发展中也会改变了它的规定的表现，改变了它的特点，前后显现出不同的特质。这主要属性的变化，就形成事物发展的不同的阶段。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自由竞争到帝国主义的阶段，它的特质就在于某些自由竞争时代所没有的主要属性的出现。产业的集中，资本的集中，金融资本垄断的形成，资本输出，原料及投资市场的缩小及殖民地的争夺，重分世界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寄生化，无产阶级革命成为直接的实际问题等等，列宁在《帝国主义论》里所规定的这一切特点，在自由竞争时代或者完全没有，或者虽有而不占主要的地位，而在帝国主义时代却成了主要的属性，因此就有帝国主义的阶段。中国革命有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不同时期，决定这不同时期的新条件，最主要的就是俄国革命（外部条件）和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展（内部条件）。在这新条件下所表现的主要属性，首先是无产阶级在这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是无产阶级与广大人民（资产阶级也在内）的采取统一战线形式的斗争，是大规模的武装革命群众的形成，是乡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等等。这些特

点，也是五四以前所没有的，所以就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时代的特质。更就小一些的范围来说，五四以后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就有第一次大革命、十年内战、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也有它不同的主要属性，不同的具体特点。抗战达到最后胜利，也要经过三个阶段，而这三个不同阶段，也各有着如《论持久战》中所规定的许多不同的特质。这样，一事物在发展中，不断地从种种新方面来表现它的质，也就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发现新的属性。马克思关于商品的使用价值的属性，这样说："每一有用物，都是许多性质的集合体，故可在种种方面有效用。发现这种种方面，从而发现不同物的种种效用，是历史的工作。"譬如木头可以盖房子，但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又发现可以制纸。在同一事物的发展中，对于它的质也是要从两方面来看的，第一是这事物的过程全体的质，即过程全体的一般的规定，过程全体所表现的一贯的共通属性。第二是发展各阶段上不同的特质，各阶段的特殊的主要属性。

这样，事物的质的变化，也要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是全过程的质变。那就是一过程的总的结束和新过程的开始，这是事物内部的根本支配关系的转变，是质的根本转变，也就是事物本身的根本变化，如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第二，是过程内部各阶段的推移，在这推移中没有质的根本转变，只有主要属性的更替，但这仍是质的变化，是由一阶段到另一阶段的质变，是特质转变的意义上的质变，或者说，这不是总的质变，然而仍是某些方面的质变。例如自由竞争到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的变化。

二、什么是量

马克思在《资本论》最初一章说："每一种有用物。如铁、纸

等，都是从二重见地去观察，即质的方面和量的方面。”这虽是仅就商品的使用价值来说，然其实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质和量是任何事物都具有着的两个分不开的方面。没有量只有质的事物，和没有质只有量的事物，同样是不可想象，不能存在的。因此我们观察事物的时候，如果要获得较完全的认识，就不能不从两方面去把握它，就不能不在质的认识之外，更认识事物的量。从认识的过程来说，这两方面的被把握“常此有先后的”。一种新的事物出现在我们眼前时，我们首先要问：“这是什么?”这就是说，我们首先关心的是它的质，首先想要把握的是它的质的规定。而在质的规定多少确定了以后，我们就要关心到它的“多少”、“大小”、“程度”之类，这就是要求把握事物的量。总之，量的把握，是认识事物时不可少的方面。一事物的存在必是有一定分量的存在。单只认识质而不认识量，就不能对这事物的存在获得明确的意识。因为如果仅只知道它是什么，有什么作用，而不知道它有多少大小，作用表现的程度如何，那就不能正确地估量，它在许多事物的联系当中占着什么样的地位。所以，没有量的认识作补充，质的认识也是不会很明确的。这种补充的必要性在实践当中，就非常明白了。譬如军队在行军中，忽然遭遇了另外的队伍，首先自然要弄清楚那是敌人还是友人，这就是质的把握，这以后，立刻就要追问有多少队伍？倘若是敌人，要不要就乱打起来？这就要弄清楚有多少队伍，才可以确定，不问清数目就打，那就是莽撞。又例如生产运动，它的成功与否，不但要依据生产了什么来决定，而且最重要的还是要看生产了多少。不认清楚敌人的数量，就算是不了解敌情，不注意生产的数量，就是对于生产问题糊涂。所以在实践中，不但要把握事物的质的规定，也要把握量的规定。

量是一切事物存在的最直接的条件，这就是说，它是与存在的本身分不开的东西：不管什么事物，只要是实际存在的话，就必然是在一定分量上的存在，无分量，也就无存在了。马克思说："我们考察使用价值时，常常假定它有一定的量，例如表几打，布几码，铁几吨。"这话也可以普遍化起来说："我们考察任何事物的具体规定时，常常要假定它有一定的量……"量是事物存在的直接条件，所以也是我们考察事物时的思想上的前提条件。

不管什么事物，它既存在，总有一定的分量。这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实际上有一定的分量在那儿了，那也就可以说有某种事物实际存在了。有了分量，就一定是什么东西的分量，就一定是什么东西存在着。不管是什么东西，不管它的质如何，这一切都可以不必问，只要有分量在，我们就可以断定一定有什么东西存在。在这一种意义上说："量只是不存在"的条件，而不是这一种质或那一种质的条件，它只与存在不存在或存在的范围如何的问题相干，而不与规定性如何的问题相干。100 吨铁是铁的存在，100 吨煤油是煤油的存在；虽然同是 100 吨，然而煤油是煤油，铁仍是铁，不会因量的相同，而两者的质也混同起来，然而正因为都有 100 吨的量在那里了，所以不管是煤油是铁，都作为 100 吨的东西而存在了。列宁曾摘引过黑格尔的关于量的特征的话："量是回到自身的存在，这个存在，是与规定性不相干的，仅仅对自己的同等性。"这就是说明量的作为存在条件的意义，就是说明量与质的区别，量是与质不相干的事物的另外一种规定性。

量与质不相干，就表现为这样的事实：量的增加或减少，在一定范围内，是不会影响到质，不会使质发生变化的。摄氏表 1 度的水是液体的水，摄氏表 90 度仍是液体的水。1 吨煤油是煤油，100 吨煤油也仍是煤油，100 个敌人是敌人，1000 个敌人也是敌

人。1000 元资本开工厂是资本家的工厂，10000 元资本开的工厂仍是资本家的工厂，这一切量的变化，对于质似乎是一点也没有影响的。如果说质是事物的内在规定性，因为它们由质的规定可以知道现实存在的事物本身是什么，质的变化我们就看做事物本身变化，那么，量就在上述的意义是事物的“外在规定性”，因为它虽然也是事物存在的一定的规定，而这规定对于质是在一定范围内不相干的，它的变化，在这范围内对于事物本身是什么的问题不起影响。

因此，事物的量，可以离开质来作单独的规定，单独的计算；对于量的关系，可以从质的关系把它抽象出来，作独立的研究。数学研究的就是这种抽象的量的关系，数学的一切法则公式，就是撇开一切具体的事物的质，抽象出来的纯量的关系法则和公式。这些法则公式既然是与质不相干的，因此也可以适用于任何物质的事物。二加二等于四的等式，可以适用于自然界以及社会一切事物，而不失去正确性。因此，历史上就有许多哲学家，把数学看做最高真理的学问，以为数字的真理是普遍妥当的绝对真理，以为数学的法则和公式是最高的科学法则和公式，其他科学对于数学都只有从属的意义。甚至于有人把数量关系神秘化，绝对化，以为一切事物的关系，都以数的关系为基础，以为单单数量的关系可以决定一切。以为一切事物都是数的关系的表现。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以及中国的阴阳五行、八卦星数的思想，都是夸大了量的作用，而给与了一种神秘的意义的结果。八字先生的算命，就不外是这种神秘思想的流俗的敷衍。谁如果主张量是决定质，如果以为事物的复杂的质的规定可以简单地还原为量的关系，那么，即使表面上用的是科学的名词，而立论方法的实质，是不会与毕达哥拉斯派以至于八卦星数思想有根本差异的。

量与质不相干，在事实上只是有条件的。仅仅抽象地研究时，才能把量作为独立的东西看待。其实任何实际的量，都与一定的质分不开，都以一定的质为基础；不以一定质为基础的量，是不存在的。不会有单纯的多少，实际存在的一定是“多少什么”。而且，对于“多少”的计算方法，也因着“什么”的不同而有差异。也就是说，质不同，则量的计算也不同。具体的量的关系是决定于质的。对于布的量，我们说是多少尺或多少丈，而不说多少斗，这就是由布的质决定的。对于寒暖，我们说温度几度，而不能说寒热几尺，这就是由寒暖与布的不同的质规定的。“商品尺度的多种多样，一部分由于所测量的对象有多种多样的性质，一部分也由于因变的习惯。”（《资本论》第一章）这就是说明质决定量的具体例证。

质决定量，具体地说，就是质所表现的各种属性，规定或作用决定量。因为离开了各种属性，就没有任何具体的实际的质。任何量的规定，都是依一定的属性规定来计算的。譬如论尺买布，是因为布之为布，起作用的是它的平面面积的属性。又例如谈中国革命是长期的，这是依据革命的时间绵延的属性来计算的。事物的每一属性、都是与它的质相关的规定，而同时就又附带着把量的规定也表现出来，属性不但表现这是什么样的作用，而且附带着表现作用的程度如何。因为事物的属性是多方面，故每一事物的量也就可以从多方面去观察去计量。随着属性表现的不同，一事物就有不同的量的方面。例如米，从它的体积属性去计量的是升斗之类的量，从重量性去计量的是几斤的量。从米质（营养的属性）来说就有养分多少的量，用科学方法计算就是多少热量单位——卡路里。布不能论斤买卖，然而破旧了的布有人收买时就可论斤买卖；又我们论尺买布的时候，同时还要注意布质的好坏，

这也是另一方面的量。气候的寒暖自然用温度表测量，但燥湿的程度又用湿度计测量。对于军队，可以从人数多寡，训练程度，武装优劣，政治觉悟高低等等方面把握它的种种量。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残酷性（武装革命），不平衡性等等，也就是在各方面质的规定的意义中同时有着量的规定的意义的。这样，研究事物的量，必须依据多方面的属性去作多方面的估量，才能够获得具体完全的认识。买布要综合注意尺度、质料以至于色彩的适度与否等：估计军队的战斗力要从武器，士兵的积极性，训练的程度等等方面去看，把多方面的量综合起来，才可以下正确的判断。如果只从一方面看，那一定会犯错误。买布只管尺的长短而不注意布质的人，是布的买卖上的傻子。仅仅从军队武器的优劣去估计中国的抗战的力量，就是“唯武器论”的谬说。以前曾经有人说：中国人数很多，杀不完，所以中国决不会亡，这就是单从人数方面来看问题的荒谬结论。

只从一方面去计量事物的量，也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的一种表现，因为它不知道各种量也是相互联系的。

属性是在一定条件下表现出来的，条件变化，属性也变化，因此它的量的规定方面也变化。譬如铁，当作生铁在商品市场上出卖时，在评论价格上是重量起作用，所以计算的时候是论吨数，当作制成器物（例如刀、斧、犁头等）供人使用时，起作用的是它的坚硬的属性，所以‘硬度’就成为我们所关心的量。如果制成钟表的发条，起作用的就是它的弹性，弹力的强弱，就是它的量的规定，而制造家就不能不关心这方面的量。再如果制成铁丝，用作电线，那么传电的属性起了作用，对于电流抵抗力的强弱就成为从事电业的人所要注意的量，而对于弹力之类，倒可以不管了。再用社会的例子来说：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有时利用经济的力量，这

时经济斗争的属性的量，就在这侵略中显现出来；有时用武力侵略，这时它的量就在武装的强弱上表现出来，当我们在政治方面与帝国主义对立的时候，它的政治影响的大小又成为我们所要注意的东西。这各方面的侵略行为，有时是同时并用的，有时只展开一方面，而它的量的规定也就随着展开方面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我们有时注意到一个国家的“富”的方面，有时候注意到“强”的方面，有时注意到它的进步程度，这就是经济，军事，政治等方面的量的估计，自然也不能忽视，一个国家的“富”，“强”，和进步等方面是分不开的。事物有复杂的多方面的属性，我们也要从多方面去观察计量。然而在一定的时候，一定的条件之下，当只有某些有限的属性是主要的，而其他则是次要或不显现的，而后者的量的规定，也就为我们所不重视，或者完全不放在计算之内。在电学未发达以前，铁的电抗的强弱问题，谁也不会提起，也用不着和不可能提起。这只能在人类的农业及科学的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成为实际的问题。马克思说：“每一种有用物都是许多性质的集合体，故可在种种方面有效用。发现这种种方面，从而发现有用物的种种效用，是历史的工作。为此等有用物的分量发现社会公认的尺度，也是这样。”（同前）这就是以商品的具体例子告诉我们：事物的属性的显现，是历史的，是随着历史发展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它的量的规定，也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同。我们首先要把握的就是这一定历史条件下发生作用的量。对于没有显现的作用的量，是如对于钟表的发条不必注意其电抗强弱一样，也可以不必（也无从）去注意的。当然这并不是说，英美对于中国眼前没有用武力侵略，就可以不注意它们的武装力量。这又是另一个问题，因为英美虽然没有把武力直接用到中国，但它们的帝国主义的武装是如日本一样地实际存在

着，那就是说这种属性是实际表现出来了的，不如发条之对于电抗那样毫无关系，而这也就对于中国不能不有影响，这也就是不能忽视的。

最后再就一事物的诸构成要素来说。各种要素间也不是简单地只有支配关系，这支配关系同时也就包含着各要素的量的相互关系。同一事物内部的每一要素，都有着它自己的量的规定，而与其他要素的量的规定形成一定的比例关系，而各要素的支配关系的维持（也就是质的安定性的保持），就是以这量的一定比例为条件的。水的分子是由两H（氢气）原子和一O（氧气）原子所构成，二H一S（硫）四O，构成硫酸。社会的构成部分的量的关系，自然不像化学那样简单而确定，然而社会各阶级（就阶级社会来说）的数量对比，也有一定的不能移易的范围，最粗略的来说，剥削阶级的人数，一定不会比被剥削阶级多，否则剥削生活就不可能维持，而被剥削者的反抗力量也就不可能想象了。并且，一社会各阶层的具体的力量对比（不仅仅人数问题，而指总的力量）如何，是形成社会的一定的具体特点的条件。这力量对比不同，社会的具体情况也不同。中国五四以前也有无产阶级，只在五四以后，无产阶级的力量（包含觉悟程度、人数、组织力量等方面的量的综合）强大起来，就划出了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时代。这就是最好的例子。至于化学上的数量对比变化对于质的改变作用，如二个O与一个S的原子结合是无水亚硫酸，三个O一个S的原子结合就成为无水硫酸，二个O原子的分子是氧气分子，三个O原子结合却成臭氧，构成要素一样，而性质都不相同。这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已充分举例说明过的了。

一切事物的一定质，既与它的构成诸要素的对比有密切关系，这就又给人一个理由，来辩护量决定质的主张。不同的量的关系

产生不同的质，这就是说：不同的质，归根结底，都可以解释为不同量的关系。然而这种理由，是似是而非的。各种要素间的量的关系，其实并不是简单的纯量的关系，而是以各要素的质为基础的量的关系，是各种质之间量的关系。决定无水硫酸的，是三个O原子和一个S原子间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三和一的关系。要制成无水硫酸，首先要有硫和氧气，不是把任意的两种东西以三和一的对比结合起来，就能成为硫酸的。例如把三个N（氮气）原子和一个H原子化合，虽也是三与一之比，却变成阿姆尼亚了。所以，无水硫酸之成为无水硫酸，首先还是O和S的关系，其决定的根据是在于这不同质的两种原子的联系，而三和一的数量对比不过是使它成为这种东西的一个主要条件。所以，量的作用，即使说是决定的，也只是条件意义的决定作用，最后根据仍是质，仍是质与质的相互关系，推而言之，例如资本主义的构成，假定要以八个工资劳动者和一个资本家的比例作条件，这也就要首先确是有着资本家和劳动者，那么八比一的比例才能够构成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如果是八个农民和一个地主，那就构成封建生产了。所以质是最后决定的基础，把量绝对化，以至于神秘化，说量决定质，说一切都可以还原到纯量的关系，这起码是机械论的错误，甚则会流于阴阳五行的穿凿附会。

列宁曾摘引过黑格尔的这样一段话："思想的规定性愈更丰富起来，因之关系也愈更丰富起来时，那么，在数量的形式上来表现思想的事，就一方面显得愈更混乱，而另一方面更愈成为任意杜撰的无意味的东西了。"（《哲学笔记》）这就是说，思想（认识）的基础是在于把握丰富的事物的规定性，丰富的各种规定性的关系，撇开了这些规定和规定关系的把握，而要抽象地从数量的关系上来解释一切问题，那是会混乱不清的，会成为无意味的穿凿附会的。

数量的法则公式是普遍妥当的绝对真理吗？二加二等于四的公式，自然是可以普遍适用的，不论是二个原子加二个原子或二个人加二个人，结果总是四个。然而这样的应用，其实也只能是在抽象的意义上应用，才会普遍妥当的。就是说：二加二等于四是抽象了一切质的规定的公式，所以应用它的时候，也要假定质的关系毫不相干，把这关系完全撇开不管时，才可以说得上妥当。二个原子加二个原子或二个人加二个人时，要把这些原子或人在一起时所可以发生的质的相互作用和变化完全不管，才可以说等于四。如果一旦关系到具体的规定性的关系，那么，情形就不同的。两个H原子和两个CI（氯气）原子结合起来，就是两个盐酸分子，二加二仍等于二。两个男人和两个女人加起来可以成为两个家庭，或者生了小孩成为五，六，七。所以一定要假定这东西中间完全没有质的互相关系，把这些关系中所发生的变化完全撇开不理，也就是说，不从变化状态去看事物，而单只从片面的量的静态的规定上去看事物时，二加二才等于四。而在现实世界上，物都是互相制约的，要使两个东西和另外的两个东西加在一起而绝对没有变化作用，是不可能的。所以，数学的公式，虽然也是真理，然而只是抽象的纯量的一面的真理，如果我们只满足于空洞的数学公式的游戏，那么也或可以说数学是绝对真理，如果要把它看做认识现实事物的手段，那就不能不说它的真理性是有条件的、片面的，单靠数学公式，绝不能帮助我们把握具体事物的各种丰富的规定和丰富的关系。所以必须要以质的认识作基础，量的认识也才有现实的活的意义。

三、量变质和质变量

事物的质，是决定于它的内部各要素各方面的支配关系或主

从关系，是决定于事物的内部构造。不同的质，可以在它的不同的要素、方面，以及它们的结构关系中去找基础。在自然界里，不同的原子构造决定不同质的元素，不同的元素结合决定不同质的化合物，不同的有机组织构造决定不同的生物，在人类社会里，不同的经济结构，不同的阶级关系决定社会的质的差异，在同一阶级社会，因着人对于劳动手段的关系的不同，因着他们在社会劳动组织中的地位的不同等等，就形成不同的阶级。

事物的诸要素诸方面的主从关系，或事物的一定的内部构造，又是以这些要素和方面的一定的量的关系为前提条件。也就是说，一定的质的存在，是基因于事物内部各要素各方面的一定的量的关系。前节已经说过：量的关系自然并不直接就决定质，质的基础首先是它的各种要素，构成的要素如果不同，虽有同样的量的关系也仍不会有同样的质。所以，首先是要有一定的构成要素或方面，然后一定的量的关系才能决定一定的质。不懂辩证法的真义的人，常常忽视了这一点。这一些的例子，例如会被恩格斯反驳得体无完肤的杜林，对于辩证法就是曾经做过这样的曲解的。他曲解了马克思的关于货币转变为资本的思想，硬说马克思是主张“支款一旦达到一定的界限，就……变成资本”。这就是说只要有一定的数量，货币就直接会成为资本，而不必有待于资本之所以成为资本的各种因素的存在。恩格斯指出了杜林的无知，指出了马克思并不是说任何支款都可以成为资本，“在实际上，马克思所指的只是用于原料，劳动工具及工资的支款”（《反杜林论》订正版）。所以，一定的要素或方面，是质之所以成立的基础，是根据，而量是它的条件。有了根据，条件才是决定的，有了一定的要素或方面，然后量才取得决定质的作用。只能在这样的意义上，也就是在间接的意义上，才能说是量决定质。

所以，一定的质的成立，是首先决定于一定的构成要素和方面，决定于以这些要素和方面为基础的量的关系。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这样说："自然界的一切质的差异，是基因于不同的化学构造，或基因于运动（能力）的不同的积量（Menge）及其相应的形式，或差不多常常是基因于两者。（'作为科学的辩证法之一般的性质'）这是专就自然界的范围来说的，然而一般地解释起来，不外就是上述的意义。"

事物的诸要素和诸方面，形成一定的构造，这构造决不是静止的东西。诸要素和方面既形成一定的构造，其相互间自然不能不有一定的直接的联系，不能不发生一定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也就是不能不形成事物本身内部的不断的运动。水的流体的质，是水的分子中的相互吸引力，地心吸力，各分子的运动扩散力等等方面的一定的关系形成的。这各方面的力的相互关联，使得水的内部有着不断的运动，水在平常温度里也不断蒸发，就是这运动的表现，化学原子的构造，是阳核和以无比的高速度不断旋转（围绕阳核）的电子的关系。生物的有机体的各部分的关系，表现为不停息的新陈代谢的运动，这运动什么时候停止，那么生命也就什么时候完结。社会的结构的各成员间的关系，特别是阶级社会中的各阶级间的互相关系，万万不是平静无事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何有于我哉"，这只是空想。任何社会里的任何人的活动，都是在社会其他方面以至于其他阶级的影响之下的活动。社会是最复杂的结构，在它里面，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等方面相互间有着最复杂的交互关系，形成最复杂的内在运动。

事物的内在运动是复杂的，也就是说，不是片面的，而是各方面的。每一事物内部，包含着多种的运动方面。为什么运动是多方面的？因为事物的构成要素是多方面的，一事物的各方面的

互相影响互相推动，使得它的每一要素都有一定的自己的倾向，形成不同的运动方面。例如在社会内部，政治、经济、文化都在相互关系中有各自的运动。文化在政治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不断地反映着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和斗争，而政治经济又在文化发展的影响下更向前推进。就阶级结构来说，例如资产阶级的剥削给与无产阶级影响，使无产阶级不断地更贫穷化，更陷入痛苦的深渊，更多地出现了劳动后备军和失业者，同时也就不断地更坚强，更团结，更革命化，而资产阶级方面则在无产阶级被剥削的基础上愈富有，愈贪吝，愈荒淫，愈残暴，愈更向着寄生与灭亡的路上走。以自然的例子来说，例如构成原子的每一电子的旋转运动都有不同的位置和方面，构成化合物的每一原子都有它的化学上的意义和作用。水的形式，在普通温度下似乎就是液体，然而实际它的每一分子都在不断运动不断地蒸发成气体。事物内部的多方面的变化，就是这样的。没有绝对静止的构成，没有完全固定不变的事物要素间的相互关系。

但事物的各要素的，各方面的变化，不一定就是事物的内部构造的变化，不一定就是诸要素间的主从关系，支配关系的基本变化。这就是说，在一定的限度内，各要素各方面当然有许多变化，但仍可以不至于改变它们的互相关系的基本形式。无产阶级尽管不断贫穷化，革命化，资产阶级尽管不断堕落，腐化，资本尽管集中，恐慌尽管加强，在资本主义社会未倒塌的限度内，这些变化，却不影响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支配关系和剥削关系。在武汉广州失陷以前，不管有平型关和台儿庄的大胜利，不管敌人在进攻中不断地削弱，而我们的民众力量不断地广大地发展起来，但敌人在备战中的进攻的优势基本不变，而我们也始终是在防御阶段。水在冰点到沸点中间，分子的运动尽管加速，分子的

蒸发速度尽管加大，空气胀力及地心吸力的作用尽管减弱，然而不能改变分子的吸引力的优势，所以也就不能改变流动的状态，不能成为沸腾状态。这一切，就是各要素的变化不影响它们中间的基本构成关系的例证，而这基本构成关系的不变，就是等于说质在基本上没有变化；这就是质的相对安定性。没有绝对不变的质，但相对安定的质，在一定限度内不变的质，是到处存在的。所以说是相对的，是一方面因为它的安定性只在一定限度内，而另一方面因为就在这限度内，它的各种要素各方面仍在不断变化，不变的只是构成要素的基本关系而已。

在事物基本构成关系不变的限度内，它的各要素各方面的变化，对于这基本不变的质来说，就是量变。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说事物仍在变化，然而这种变化，只是量的增加或减少，而不是质的转变。量变就是事物在质的相对静止的情形下的运动变化。

一事物的内部变化是多方面的，因此量变也是多方面的。事物的量变决不是单纯某一方面某一要素的量的增加或减少，而是各方面各要素的量的增加或减少。同一事物的量的变化可以从各方面去计量去观察。一个人的生长，可以从身材的高矮、肥瘦，健康的优劣，思想的进步，经验的丰富等等方面去看他的各方面的量变。生产力的量的发展，是生产三要素（劳动力、工具、劳动对象）的各方面发展的有机总合。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现着资本的集中，劳动者的数量以及困苦的增大，技术的进步，市场要求的扩大等等方面的量变。从抗战力量的发展来说，经济的发展，政治的进步，军队的扩大和加强，文化的提高和普及，是其不同方面的量变。倘若我们不忘记对于事物的认识一定要具体地全面地去把握，而不能片面孤立去把握的话，那么，对于量的变化，也得要从各方面去认识，因为量的各方面的变化也不是各自孤立的，

各方面的量的变化之间也互相制约互相发生作用。倘若孤立地把握了一方面的变化而忘记了其他方面，一定会造成认识的错误。倘若对于一个人，只看见身体健康的增进，而不注重是否思想经验也在进步，那就不能具体地正确地了解这人的进步，倘若对于一个军队，只看见人数的增多或武器的改善，而看不见军队本身的训练及政治教育是否有进步，也不能真实地判断这军队的进步是到如何程度。资产阶级国家的代表者常常宣扬自己国内的生产如何进步，经济如何富裕，而故意抹煞了广大无产者层的贫苦落后的一方面，这事实更告诉我们，只注意一方面的量的变化，常常就成为剥削者粉饰欺骗的根据。

量的变化不仅仅是多方面的，而且也是多极的和不平衡的。一事物有着不同的要素，方面，而每一要素或方面就各个有它的不同的量的变化种类，各个有它的不同的量的计量标准。而这不同的变化种类，又各个有它的不同的方向和不同的变化进程，或是这一方面向前进的方向运动，而另一方面向后退的方向发展，或是这一要素的数量增加而另一要素的数量减少，或是有的方面飞快的变化而另一方面的变化相对地却很迟缓，各要素各方面的量变，决不会有完全齐一的方向和平衡一致的进退。植物在生长茎叶的当初，不是开花结实，到开花结实的时候，茎叶的生长就停顿了或者迟缓了，或者开花结实的完成过程正是茎叶枯萎的过程。温度的增加，使水的分子运动增进，同时分子间的吸引凝集的力量就减退。剥削阶级愈更富裕，被剥削阶级就愈更贫困，在物质上，富裕了的剥削者同时就在整个生活上走向堕落腐化的方向，贫困了的被剥削者却愈更坚决地向着新的生活要求的方向斗争前进。每一事物的各方面的量变，至少包含着这样的两个方面，即新的在向上生长，而旧的则向下没落。

由于事物的各要素各方面的不平衡的量的变化，我们就可以知道，在一定的限度内，事物的质虽然可以不受量变的影响，虽然与量变是不相干的，然而这不相干，也究竟只是在一定的限度之内。超过这一定限度，情形就两样了。事物的质，是基因于它的内部构造，基因于它的内部诸要素诸方面的一定的量的对比，基因于在这量的对比条件之下的各要素方面的主从关系。这就是说，倘若这些要素方面的量的对比有了基本的变化，它的原来的主从关系也就要起变化，也就是事物的内部构成要起变化，也就是质的变化。事物各要素方面的量的对比是不是会起基本的变化呢？倘若事物的量变是内部各要素方面的均等齐一的变化，那我们也许可以想象，它们中间的量的对比关系可以始终不变。如果剥削阶级的富裕同时随伴着被剥削者的生活幸福的相应的增进，而不是相反的向着更贫困的方向走去，如果植物的茎叶生长和开花结实以同样程度并列生长，如果水分子的吸引力与温度的增高同一比例增大，那也许可以想象这些事物，这阶级社会关系，这植物，这液体的水等等即使在量的方面无限增大了，而它内部构造的基本形式可以基本不变，因此质也会永远不变，永远对于量变是不相干的东西，然而这样的事实，在现实世界是不可能存在的，这样一来，将会发生无限富裕的剥削社会，无限大的植物，无限高温度的水，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怪事或神话。事实上在现实事物的复杂构造和复杂关系中，各要素方面的量的发展决不可能是均衡齐一的，前进与后退，生长与没落，迟缓和迅速，在任一事物的内部都是错综地交织在一起。因此，原来在量的对比上，形成支配的优势的要素方面，在量变的过程中可以渐渐失去了它的优位，原来是处于被支配的或附从地位的要素方面，也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经过量变而取得优势。这就是说，事物诸要素方面的量

变达到一定的程度，就要发生旧的量的对比关系的改变，就要使旧的要素方面的主从关系发生变化，就要由一种形式的事物内部构造转变为另一种形式，也就是要发生质变。

所以，事物的质的安定性是有限度的，有条件的，只在量的各方面的变化不曾改变旧的事物内部构造的限度内，只在这样的条件之下，质是安定的，不变的，一超过这一定的限度，失去了这样的条件，量的变化就不能够与质不相干，就要引起质变。

这就是说，量对于质之作为"外在的规定性"，也是有限度的，有条件的。只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一定的条件之下，量的变化才是相对独立的变化，才可以离开事物的质来单独作它的量变的计量。一超过这样的限度，一失去了这样的条件，量的变化就引起质的变化，或转变为质的变化，这是由量变到质变。

这就是说，由量变到质变，是各要素方面的量变互相关系互相作用的必然而自然的结果，"量转成质"，并不如杜林所形容的，说是"黑格尔式的混乱及模糊的表象"（《反杜林论》订正版，第167页），相反地，量转为质是事物变化的非常清楚明白的规律。各方面的量的变化达到一定程度，终于要引起事物诸要素的对比关系的变化，也即是引起事物的质的变化，这是丝毫也没有什么神秘不可解或者混乱不清的地方。反过来说，要使一事物的质发生变化，也须要设法使它的一定方面的量发生变化，也必须要依据这量的变化使它的诸要素诸方面的对比关系发生一定的转变，才可能达到目的，这也是很自然明白很合乎规律的。恩格斯说："如果没有物质或运动的添加与灭除，也即是说，如果没有该物体的量的变化，就不可能改变它的质。在这样的形式上，就使神秘的黑格尔的规律表现得不但是完全合理的，而且甚至于是非常明白的了。"（《自然辩证法》）

自然，这里却要着重地指出：所谓量转为质，决不是说量变直接转为质变，并不是说量的变化和一定程度，就能从量的本身创造新质。新质的出现，不直接决定于量，而决定于事物诸要素诸方面的新的对比关系，虽然这对比关系不能不以一定的量的关系为条件，然而首先仍是要以一定的要素和方面作基础。所以不是简单的任何量的增加和减少都可以引起质变，而是要看那些要素那些方面那些条件的量的增加或减少。水的温度增加到一定程度就沸腾，这是一定的分子运动，一定的空气压力以及地心引力，分子相互间的吸引力等等互相作用的变化的结果，不是在任何情形下，水温度到一百度就直接会引起沸腾的。资本集中到一定的程度，就准备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然而资本集中本身并不能直接造成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要达到这转变，必须另一方有成长了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斗争推动，决没有"向社会主义的和平的转生"，"支款到一定限度"，并不一定就会直接变为资本，而要看支在什么地方。支款只有在能够构成资本主义生产的生产要素上，才可以在一定的数量上转化为资本。如果完全支在土地的购买上，那即使超过任何限度，也只能造成地主的经济，而不能成为资本家的生产资本。武器的加强自然是战胜敌人的一个条件，然而如果像唯武器论者所了解的那样，说抗战的胜败的惟一决定力量就是武器的优劣，那就完全错误，因为好的武器必须在进步的军队里，才能成为战胜的武器。所以，我们必须重复的说，当我们讲到量变质的规律时，我们要注意的量变始终是各要素各方面的量的对比变化：造成质变的是这样的量变，而不是任何片面地抽象地被了解的量变。自然，具体地讲到事物的量到质的转变时，在形式上我们也常常有只从一方面的量变去计算的情形，例如说只要温度增加到摄氏一百度时水就必然沸腾，资本主义发展的垄断时代就是它的垂死时代之

类。然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所要指的内容，也并不是说百度的温度可以直接造成沸腾，或垄断直接造成帝国主义的死亡，而只是因为假定了其他的条件及其他的量变的因素已经具备，其存在已不成问题，可以暂时省略不提，而只把这温度和垄断作为主要的有决定意义的量变来加以把握罢了。

忘记了这一点，辩证法的量变质的规律就会被看成滑稽可笑的以至于神秘不可解的东西。说任何单独的量变就能直接创造质，那就是给量的变化赋予了一种神怪的力量，把它提高到万物的创造主的地位上了。就只因为对于这辩证法规律的真正内容的无知，才有杜林的这样的一段话："支款一旦达到了一定的界限，就只因这个量的增加而变成资本，这些话看来难道不是滑稽吗?"就只因为把量变质的规律片面抽象化了、神秘化了，才有西洋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把数的关系当做万物基础的唯心论思想，才有中国的八卦星数之类的俗流的神秘思想。

这就是说，质变不是突然而来的毫无根据的变化，不是量变到一定程度时，凭空就出现新质，新的质变，是在旧的质中间有着萌芽，有着它所以要出现的根据的，新的质是新的事物构造或新的支配关系的形成，而这新的构造成新的关系，是在旧的关系中有着准备基础的。旧的质里的各种被支配的要素，在一定的量变的条件下，都有可能成为支配的要素，而使旧的支配条件转到附从的地位，这些要素，都是新质的萌芽，水的沸腾，是因为分子运动的扩散力在温度增加的条件下取得到优势，而这种力在液体的状态下是被压抑着的。阶级社会的质的转变是阶级支配关系的转变，是旧社会中的被压迫阶级争取得支配权。抗战由防御阶段经过相持阶段而进入进攻阶段，是敌我力量对比关系的不同的阶段，是原来劣势的中国民族抗战力量向优势的转化。总之，新

的质的出现，不外是旧质的诸要素诸方面经过量的变化而形成的新的构造关系的结果。

这就是说，任何事物，它的量变都有一定的界限，它的量的活动都有一定的范围，而不能无限制的增加或减少。倘若超过一定的界限和范围，就不能保持质的安定性，就要转变为另外的事物。在这样的意义上说，质和量又是统一的，量对于质并不完全是不相干的，外在的东西。质以一定范围内的量的伸缩性作为保持安定性的条件，量以一定质为基础而在变化上受到它的限制。量是一定的质所表现的所制约的量，质是在一定的量的范围内存在的质。一定的质和一定的伸缩范围的量，是分不开的。液体的水是冰点到沸点的液体，封建社会是手工业和农业生产力水准上的社会。质和量的这种统一，叫做质量（Mass）或译作“度”，任何事物都是一定的质和一定的量的统一，都作为一定的质量而存在。

认识事物的质量，就开始认识了它的发展规律，这就是说由于质量的认识，我们就可以从数量上精密确定一事物的发展倾向，发展的限度，以及它可能转化的方向。就能把握事物的联系和转化的一定的辩证关系，就能对于这一事物的发展前途作一般的、正确的预测，就能够利用这样的认识来指导我们的实践行动，使我们知道在改变世界的斗争中，大体上应该走的是什么方向，我们的行动在一定情形下应有什么限度，过了这限度又应该怎样改变我们行动的方式。所以，质量的认识，对于我们的实践是很重要的，它比单纯的、初步的质和量的规定的认识是更高级的东西，或者说，质量的认识是把初步质和量的规定的认识发展了，把两者的统一关系精确化纪律化了。初步的质和量的规定的认识，只能告诉我们一些直接经验上的属性规定，告诉我们眼前事物的构造和它的各要素方面中间的量的关系，至多也只能令我们不很确实

地经验到这些规定和要素间的量的关系是在变化，然而只能朦胧的经验到这些变化，而不能精密确定这些变化的限度和方向，这只有质量的认识才能够做得到。质量（或规律）的确定，乃是科学的工作，也是科学的重要任务。列宁在《哲学笔记》里曾摘引了黑格尔的这样一段话，可以表示质量的把握在科学上的意义："对于自然界的经验上的数量的认识,例如对于行星相互间的距离的认识，是伟大的功绩。然而比这更加伟大的功绩，是在与消除了经验上的数量，而把它提高到量的规定的一段形式上，使定量成为法则或质量因素。"（《黑格尔〈逻辑学〉笔记》）

事物的量的变化是多方面的，因此事物的质量也就可以从多方面来加以考察。同一的事物可以在不同的要素方面上表现为不同的量变，而这每一方面的量变都和质变有一定的关系，也就是都表现为一定方面的质量的规律。水可以从温度的增减方面表现它的质量，然而它的表面所受的气压的高低，又能在另一方面表现它的质量。平常我们只注意到：液体的水的存在，是从摄氏表零度到百度的温度为量变的界限，而其实除了温度，一定的气压也成为液体状态存在的限量。倘若水的温度不变，那么，液体的质量就可以依气压高低来考察。例如温度始终维持百度，那么液体的维持必须有标准一气压以上的压力，一旦降到标准一气压以下，就会沸腾变气了。一种植物的生长，需要一定范围的气温，太热太冷就要枯萎，这是它在适应气温方面表现的质量；生长到一定的高度，也就停止生长，这是它在高度方面表现的质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侵略战争当中，它的经济力量消耗有一定的限量，政治的欺骗作用又有另一方面的限度，军队的战斗力的持久也有一定的限量。我们在抗日战争中，所以能够相信最后胜利属于我们，就因为我们知道日本帝国主义在战争中的力量发挥有一

定限制，它的侵略战是退步的战争，它是小国，它缺少外援，这是《论持久战》一书里早已指出来的它的各方面的质量的弱点，这些弱点将抵消了它的强点，虽然它现在是强国，我们仍可以预测它将有被打倒的一天。

事物各方面的质量，并不是各自孤立，而是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的。一方面的量变，对于另一方面的量变必然会给些促进或推迟的影响。因此，我们不但要注意从各方面看的质量规律，而且更要注意这些规律在发展中的作用。当考察一方面的质量规律时，必须要照顾到其他的方面。因为液体的水的存在，不仅依据温度的变化，而且还依据一定的气压，所以科学者不会说水在任何情形下的液体质量是摄氏零度到百度，而要说在一气压下水的冰点沸点是这样的几度，而在另外的气压条件下，液体质量法则就要变化了。武器低劣，在抗战中自然处于劣势的质量地位上，然而政治的进步，民众运动的开展，游击战争的大规模的发动，就可以在另一方面形成优势的力量，而弥盖了武器的不足。所以注意各方面的质量，并注意它们中间的相互制约和相互补充，是为了具体地、客观地了解事物发展规律必不可少的方法要点。一切现实事物本身的发展都是在复杂的联系中，在错综交织的关系中进行的，也只有全面地把握这错综交织的各方面的质量运动的关系，我们的认识才能够追迹着具体事物发展的真实轨迹，而不至于发生严重的偏向和错误。

这仍不外是说，事物的质量规律，事物量变的界限，其决定的基础并不是量的本身，而是决定于质，决定于事物内部的构造和它的存在条件，决定于以不同的量变互相发生作用的事物的诸要素和诸方面。量发展到一定限度，就要打破旧质，产生新质，这是量对于质的积极的反作用，这是量创造质，决定质，然而量在

一定的发展限度上之所以能创造质，其最后根据仍在于质的内部，仍在于各方面的质量的相互关系，而不是直接决定于量。这就是说，任何事物的质量或量变质的界限都不是绝对的，而是依它的构成要素和方面的不同而有伸缩性的。在革命的实践上，这种具体的看法尤其重要。革命的运动，社会的质变，是不是绝对需要社会构成的某一方面（例如某一革命阶级）的数量达到一定的固定不变的限度呢？对于这问题，机会主义者和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解答是完全两样，机会主义者的解答是认为革命的到来绝对要以某革命阶级的一定的数量为条件，而马克思主义却以为不必一定要这绝对的数量，而要看革命阶级与其他阶级的互相关系，例如反动阶级是不是削弱到必要的程度，广大群众是不是不能再照旧生活下去，革命阶级是不是能争取广大的同盟者在自己的周围，如果在这一些方面都有了肯定的答案，那么即使革命阶级的数量很少，也仍然可以有发动革命的时机。斯大林论到无产阶级革命中第二国际教条主义的问题时说：

“机会主义者要人相信，无产阶级如果在本国人口内不占大多数，它就不能够而且不应该夺取政权。一点证据也没有，因为，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没有可能来辩证这个荒谬的观点，列宁答第二国际先生们说，我们就假定这样吧，可是，如果造成了这样一种历史环境（战争、农业危机等等），在这种环境之下，无产阶级在人口中占少数，可是它有可能来把极大多数的劳动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那么为什么不应当去夺取政权呢？为什么无产阶级不应当去利用顺利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来冲破资本主义的阵线，并加速总爆发的到来呢？难道马克思不是在19世纪50年代就已经说过，如果德国当时曾有所谓‘农民战争的再版’来协助无产阶级革命，那么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情况当时就会‘很好’吗？

难道大家不是都知道，当时德国的无产阶级比 1917 年俄国的（比方说）无产者相对地少些吗？难道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实际还没有证明，第二国际英雄们的这一个得意的教条对于无产阶级是绝无丝毫实际的意义吗？群众革命斗争的实际正打击和打倒这个陈腐的教条，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列宁主义的基础》）

因此，量变到一定的程度是不是就引起质变，不是从任何片面的量的本身可以直接确定，而是要看事物的各要素各方面的发展情况及其互相关系，是要看具体的条件来确定的。于是就有这样的情形，即使主要的要素方面的量变已达到成熟的程度，已达到了足以变质的界限，然而却缺少了一些必要的（即使是不算主要的）转变条件时，也可能延缓质变的过程，相反地，主要的要素方面的发展已将近成熟，然而还没有充分达到足以变质的程度时，倘若有一些促进的条件存在，也可加速质变的过程。这就是说，质变的实现，不但需要有足够的量的准备，而且常常需要某些刺激条件或补充条件，以促成它的转变，这些条件虽然不是重要的，然而存在与否，对于过程有加速或延缓的作用。黑格尔曾举过这样的有名的例：水的温度降到冰点，是应该结冰的了，然而如果把它静静地放着不动，它就不一定会结冰，这时就需要给它一个外来的刺激，或是风一吹，或是一摇，它就马上凝结了，就社会的变革来说，社会的矛盾即使发展到了顶点，革命的形势即使完全成熟，倘若没有革命势力方面的正确的指导和发动，也不会就爆发革命，在紧要关头给以一个适当的刺激推动，是不论在自然或社会的变革上都有着重要意义。英雄伟人的出现，对于社会的发展有加速或延缓的作用，也就不外由于这样的原因。

× × ×

由量变到质变，就是由旧的质转到新的质，就是旧事物的消灭

和新事物的产生，从它的实质上来说，是事物的一种内部构造转变成另一种内部构造，是旧的支配关系的解体和新的支配关系的建立。为什么旧关系要解体而新关系要建立，因为经过量的发展使事物的各要素各方面之间的对比关系发生了变化，因为各要素各方面的量的不平衡的发展使旧的关系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因为新的量的基础上必然要建立起新的关系，必然要使事物产生新的内部构造。所以由量到质的转变，并不是简单消灭了旧的东西而另外凭空创造出新的东西，而是旧的东西的改造，是旧质蜕化为新质，是从旧的解体了的关系为基础而建立起新的关系，是在旧事物没落的基础上生长起新的事物。而且，这种转变，并不是简单的关系的改变，而是以旧质中的一定程度的量的发展为基础的改变，是建立在更多更广的基础上的转变，所以，新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在旧关系之外的另外一种关系，新质并不是简单的与旧质不同的东西，而是旧质发展的结果，是吸收、继承了旧事物中一切积极的东西的改造，是在旧事物已经发展到了顶点，旧的发展过程已经完结的时候的更进一步的飞跃。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指出，辩证法的运动发展观，是与形而上学完全相反的。形而上学有时也似乎承认事物的运动发展，然而它所了解的运动发展，只是单纯的位置移动和数量的增加或减少；在这样的发展中，没有任何质的转变，没有任何新质的出现。形而上学“把发展看做简单的增长过程，在这里，数的变化，并不引起质的变化”（《联共党史简明教程》，第 126 页）。这样一来，世界上就没有新的东西的产生，没有旧的东西的没落，世界上所有着的都是永久确定了的事物，在质态上永远不变的旧事物，而一切的变化，都只是表面的变化，在实质上没有任何事物真正的改变的，实质上所有的只不过是既存事物的位置形式的移动，或数

量的增加或减少。仅只有既存事物的来去换位，而在我们主观上却以为是新旧的交替。所以，形而上学虽然在这里承认事物有运动变化，然而本质上仍是不承认真正的运动变化，因为它把新旧交替的真正变化，看做纯主观的假象，而以为运动只是现存事物的“循环式的运动”，把变化发展了解“为过去事物之简单的重复”。

辩证法则相反，认为运动变化不仅仅只有位置的移动和数量的变化，而且在数量变化的一定发展限度之下，一定要引起质变，“发展是由不大的和不显露的变化进到显露的变化，根本的变化，质的变化”(同前)。这种变化，不是现存事物的换位或循环，不是过去事物的简单的重复，而是新的质，新的事物的出现，数量向前发展，就有新的事物，高级的质，更进步的复杂的构造，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的创造出来，从旧的事物，较低级的质，较简单的构造中生长出来，发展是“前进的运动，上升的运动，由旧的质态进到新的质态，由简单而发展到复杂，由低级而发展到高级”(同前)。在这里特别还要着重提一下，由量的发展到新的事物，到新的质，到复杂的高级的构造的转变，是必然的，不可免的。“质的变化之到来，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规律地，是由于许多不明显的逐渐的数的变化之积累起来的结果。”(同前)为什么是必然的，有规律的？因为量的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必然不能再维持旧的关系，因为依质量规律说，旧的关系，旧的质，所能容许的量变有一定的限度，因为在旧的质、旧的关系中间量发展到这一定限度必不可能再发展，因为在旧质和旧关系对于超过这种限度的量的发展是一种桎梏，因为量变达到了这一限度时如果还要继续向前发展就不能不转变为新的质，更复杂更高级的、也就是能够容许数量的更向上更前进的新的构造。

一气压的水，温度升到摄氏百度以后，无论如何加热，水的本身始终仍只是保持一百度，不能继续上升，温度继续上升的部分，都变为气了，因为水的分子的关系在液体状态之下，它不容许更高的温度，即更迅速的分子运动。抗战中要扩充军队，倘若完全用旧的方式，不依据政治工作，不提高民众的自觉，而只依据雇佣式，拉夫，那么，军队的扩充无论如何不能超过一定限度的数量，因为在旧的方式之下，形成民众对于政府的对立关系。而这种对立关系就使人民不能踊跃投效军队。因此要超过一定的限度来扩军，就必须有新的工作方式，必须造成政府与人民更好的也就是更高级的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只能有一定限度的发展，因为，例如资本家的为出卖而生产的目的和贫穷化的广大民众的减退了的消费能力形成了对立的关系，就限制了一定限度以上的生产发展的可能性。这种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更高的发展是不适合的，所以如果不改变社会的质，不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生产力的发展，就要受到桎梏，摧残，如劳动者的失业，新的技术的搁置不用，生产品的过剩等等。

这就是说，新的质的出现，是量的更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也就是说，新的、更高级更复杂的关系一旦建立起来，那么量的发展就有可能超过旧的限界而大踏步地向前跃进。而这样量的跃进，常常是有着更高比例的新的量变。这就是说，在新的关系下的量的发展，它的速度常常要远远地超过旧关系下的量变的速度。在苏联社会主义关系下的廿年的生产力发展不少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百年的进度，“许多人的协业，许多个别力量之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而造成了（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新的更高级的力量’，这一力量，是和组织成它的个别力量之总计，完全不同的”（《反杜林论》，第170页）。这就是说，质的转变，不但产生了新的质，

而且产生了新的更高级的量。由量的变化产生新的质，叫做量变质，由新的质的出现而发生了新的速度比例更高的量变，这就叫做质变量。

这就是说，发展的过程是一系列的量和质的互相转变，要继续不断地发展，继续不断地进步，就要在发展的线索中继续不断地通过一系列的质变点，这就是说，要不断地从渐进的缓慢的变化，进入突然飞跃的变化。量的变化是渐进地增加的，而质的到来却相反，“不是逐渐地，而是迅速地，突然地，是表现于由一个形态之飞跃式的进到别一个形态”（《联共党史简明教程》），“发展是数质关系的交错线，在这线上，纯粹数的增减，到一定交错点上就引起质的飞跃”（《反杜林论》）。这就是说，发展是渐进的发展和突变发展的交错线，是不断地经过革命式的变革而向着更高的阶段上升。因此，就我们的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态度来说，如果我们即是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发展的立场上，我们是要求社会向前进，而不是要保守陈腐的旧社会现状，那我们就同时要采取革命的立场，而不要采取渐进改良，修补旧社会的立场，因为单纯量发展，不可能无限地向上发展，单纯的渐进的改良不可能使社会向更高的阶段跃进。正如斯大林所说：

“如果由过慢的数变进到迅速的突然的质变，乃是发展的规律，那么很明显地，由被压迫阶级所实行的革命的大变革，就是完全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现象。由此可见，资本主义进到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摆脱资本主义压迫，决不能是经过缓慢的变化，决不是经过改良来实现，而只能经过资本主义的质变，经过革命来实现。由此可见，为着不致在政治上弄出错误，那就要做革命家，而不是做改良主义者。”（《联共党史简明教程》）

渐进和改良的步骤，是不是在革命行动中绝对不容许呢？当

然不是。发展既然是质量的交错线，那么量变也就是发展规律中必然的过程，为要使我们的行动不违背客观的规律，为要不弄出错误，渐进和改良，也常是一定的发展条件下必须采取的手段。无产阶级并不是仅仅只有一个推翻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口号，而任何时候都绝对拒绝一切的改良。在一定的斗争发展阶段上，也要重视八小时工作，增加工资，社会保险等等改良的要求。为着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着发动广大民众起来抗战，中国共产党也提出了“改良民众生活”的口号。适合一定条件的改良要求是必要的，这种改良是不应该反对的，应该反对的只是“改良主义”。改良而成了主义，就是把改良看成万能的法宝，抛弃了革命；以为渐进的发展就可以无限地继续，而不必任何飞跃的转变；这事实上是形而上学发展观的表现。第二国际时代的许多机会主义的“理论”，就是充满着这一类的改良主义思想的。主张资本主义可以“向社会主义和平地转生”，主张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顶点自然转变为社会主义，这就是明显的例子。中国抗战以来，许多人所提倡着的什么“一次革命论”，以为中国的民主革命无需任何革命的转变就可以达到社会主义，以为三民主义即是等于社会主义，由前者到后者没有任何质的突变，那也不外是中国化了的改良主义的一种表现。不反对一定条件下的改良是对的，改良主义却是错误，正如承认一定条件下的渐变的存在是对的，然而“渐进论”，即主张一切发展都只是渐进而不是飞跃的思想，都是形而上学的错误。正确的事实规律都是这样，渐进的量变虽然存在，却是有限度的，事物的发展终于要采取突变的形式跃进，而且一定限度内的量变，本身也不外是为最后的质变准备条件，渐进的发展，也正是为着达到飞跃的变化而进行数量的积累。因此，有时虽是必需，但是有条件限制的，为着社会的前进，我们总的目标

要着眼在革命方面：一切努力是为着革命，而间或采取的改良手段，也要看做是为着准备革命而进行的一定的步骤，改良的要求的提出也只是为着能够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是为着要提高他们斗争的情绪和力量，而不是为着要用改良的小惠来麻醉群众催眠群众。例如在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改良民众的生活，乃是为着“激发广大劳动人民的抗战热忱与生活热忱”(《论新阶段》，第 57 页)，使他们能更有力地为完成当前的民族民主革命而斗争，决不是为着要他们生活舒服，而忘记了今天民族所遭受的苦难。关于这问题斯大林曾说过：

“当进步的成分自发地继续着自己日常的工作，而把细小的，数量的变化带到旧制度中去时，这样的运动是进化式的。当这些成分联合起来，贯彻着一种观念，并且加速地进攻敌人的营垒，以便从根本上去消灭旧制度及其各种质的特征并建立新制度时，这样的运动是革命式的。进化准备着革命，给革命以基础，而革命则完成进化并助长它的进一步的工作。”(《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这里所讲的，是一般的指出，量变是准备。渐进的量变自然并不就都等于改良，然而一定改良是包含在渐进的量变内的，所以，要反对改良主义，坚持着革命者的立场，时时为着革命的目的努力，即使必须要求改良也要使改良服从于革命的目的——这就是辩证法的正确的观点。

还要注意的是，一事物的发展突变，并不仅仅是在它的量变过程完结了的顶点上才会出现，就在量变的过程中间，也不断地会出现各式各样的小的飞跃突变。一定事物的量变的尽头上所引起的突变，乃是这一事物的全体的质变，是事物的内部构造的根本转变，是总的飞跃。然而事物的内部构造是复杂的，是许多的

要素、方面的综合。在量变的过程中，在总的支配关系或基本的构造没有解体的限度内，不断地还可能有各方面各要素中间的关系的转变，这就是在总的量变质的过程中，同时还包含着各个方面各个要素部分的量到质的转变,这就是在总的量变的过程中,还不断地要产生各阶段的，各方面的飞跃。已经说过，由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社会形式到另一社会形式的总的质变，而由自由竞争到垄断，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量的发展过程中的一定阶段，一定方面的质变。这还只是就大的阶段来说，除此而外，例如资本主义的周期的恐慌，和平与斗争，民主政治与法西斯蒂的交替，也正是它的各方面的质变。革命的总的战略为着完成总的革命目的，为着达到总的飞跃，然而在总的战略指导下，又必须要有各种各样的策略形式来完成各个时间地点的具体条件下而规定的部分的或一定的任务和目的，这就是为要达到部分的一定方面的质变。因此，我们不但在总的目标上应该是一个革命者，而且在工作斗争的全过程中，对于工作的每一步骤，都要能够以革命的精神去对付，要能够多种多样地灵活转变自己的行动方式，不要固守死的策略，不要在行动上顽固化，简单化。

看重革命飞跃，并不是说因此就可以完全忽视渐变，并不是说要达到革命目的，可以不需要任何的小的数量准备工作。质变的到来，是数量的渐进积累的结果，没有足够的数量准备，就不可能有较高级的质的出现。忽视准备的工作，以为革命可以随时到来，不经过艰苦的准备工作，就想立刻达到革命的目的，那不是真正革命者的立场，而是另外一个偏向：过左的空谈，过左的空谈在表面上有着非常激进的外貌，而实际上是使革命脱离现实的基础，使行动违背客观的规律，结果就是要败坏革命。我们应该做革命者，然而不是盲目的随时都要发动革命的进攻，真正的

革命者要正确地认识和掌握由革命的准备到革命的实际发动的规律，也就是由量到质的规律。斯大林在论到马克思的时代和列宁的时代的区别时，就会指出马克思的时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革命（我们所说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以前的时期：当时还没有已经发展的帝国主义，他们生活在准备无产者去作革命的时期，当时，无产阶级革命还不是直接的实际的不可免的事情。而列宁呢？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这位学生呢？则生活在已经发展了的帝国主义的时期，生活在无产阶级革命正在开展的时期！”（《列宁主义的基础》）这就是正确地在革命问题上把握量变质的具体规律的极明显的例子。

抛弃了为社会变革的努力，而只将就着社会现状，加以条理补缀，不要革命而只要改良，这是右倾机会主义，自然要不得的。忽视了革命变革所必须的准备，而冒险乱撞，这是左倾机会主义，是行动离了轨道，也是有危险的。革命者对于这两种机会主义的偏向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而要克服这两种倾向，就是要正确地认清革命工作的质量规律，就是对于革命行动每一步骤的客观条件要有正确的估量，就是要能够适当地权衡由准备革命到发动革命进攻的各个时机。在适当的时机之下采取适当的行动，依据一定的条件创造相应的斗争方式，在什么条件之下要努力作准备的斗争，在什么时机之下发动革命的进攻，都要依据革命发展的规律作正确的决定。不要让已经到来的时机给放过了，不要在各方面的关系和条件全不具备的时候躁急妄动，“实事求是”，行动不离现实的正轨，进退要中肯适度，这是要使革命指导达到胜利目的的必要条件。

这似乎有点像中国历来的中庸观念，孔子所说的“过犹不及”的思想，似乎也是在教人把握质量的真理，他所要求的行为的最高

标准是“中道”，是依据适当的“权”，这似乎就是要求走正轨，要求进退的中肯适度。是的，我们可以承认中庸观念是抓着了质量真理的某一方面和某一因素，那就是在这种思想里也承认了质量的某种统一，承认了行动的适度的量是保持行动的一定质的条件。但我们却不能做中庸主义者，欲要反对中庸观念，因为中庸观念并不是真正完全地掌握质量互变的发展真理，而是在保守的立场，形而上学的观点上，来利用和歪曲了质量统一的观念。辩证法的质量统一，是在发展中的统一，是发展的质量互变的交错线，而中庸主义却是首先给人的行为定下一个永久不变的道德规律，为的是要用这标准来“权”衡善恶，说“过犹不及”，超过或不及这规准都不是善行。因此人必须安分守己，行动适合于这绝对的规范；才算是正轨上的行动，才算是中肯适度。在中庸主义者看来，一定的量既是保持一定的质的必要条件，所以过与不及都有伤于正确行动的质。因此，为着要保持固定的质，就要保持固定的适度的量，过了这量，这是反常，就是作乱，就是社会人生的灾难。黑格尔说：“许多民族把质量看做神圣”，这种歪曲了的质量观念，常常被人赋予了神秘的性质，例如说某阶级的人只能在生活上作某种规度的享受，超过了这些享受，就叫做“折福”，就免不了要遭神罚报应。中庸观念，其实不外是这一种迷信思想的合理化。它抓着了质量统一的真理的片面，而从停止的方面来看这一个片面。一切形而上学或唯心论都常是把事物的辩证法的真理中的某一方面绝对化凝固化了的结果，中庸观念，正是这一种形而上学的观念，它之所以能表现为合理的外貌，所以能够有着魅惑人的力量，也正是由于能歪曲和利用了辩证法真理的一个片面。事实上，我们在前面已充分说明，量质的统一决不是静止的统一，而是在运动变化中，在发展中的统一。世界上决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永远固定的质和它的永远固定的条件即

量。质量的真理只应该是从这几方面来了解,我是说:在量变的一定限度内质可以保持相对的安定;或者说,在一定的质的基础上量变有一定的限制,或者说,在量的发展的一定限度以上就要创造出新的质,或者说,质量的互相转变形成交替的发展连锁。因此,正确地把质量真理应用到我们的行动当中的结果,不是要、也不可能确定永远不变的行为规准,而是要灵活地依据于或配合着客观社会条件的发展,来决定我们的斗争行动的各种步骤,过去的行动,在过去是正确的,在现在的新的条件之下,就要加以改变,在一定的条件下要努力准备革命,在另一适宜时机却要结束准备,向革命的实际进攻跃进。我们所要的正轨是一定的发展条件所要求的行动轨道,而不是永远固定的标准。封建社会的行为规准,更是要彻底打倒的,因此,革命行动中的两条战线的斗争、乃是在不断进步发展的行动中反对一切离开现实的左右倾向,乃是一方面反对不肯前进和另一方面反对不能脚踏实地前进;并不是要把自己固定在一点上,以“过犹不及”为口实,一方面不许别人赶上来,另一方面不许别人向前走,所以正确掌握发展的质量规律的两条战线斗争,决不等于中庸思想。

第四章　论对立的统一(上)

一、什么是对立的统一

量变质的规律告诉我们,任何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当它的量增减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发生质的飞跃,就会由一种事物转化为另一种事物,而不能保持着事物的原状。这样,辩证法对于运动的了解,乃是着眼在旧事物向新事物的转变,而认为事物的运动

发展不是旧事物在数量上的简单的重复：也就是着眼在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质的升涨上，认为运动不是循环的运动。

这就是说，辩证法所了解的运动，乃是事物自己的运动，乃是事物本身的变化。在运动发展过程中，事物不单只在外形上有了变化，而且在事物本身的性质上也发生变化。新的事物的出现和旧的事物的消灭，并不是走马灯式的两种事物互相间的换位，而是蜕变式的，由旧事物变为新事物。

为什么事物能由一种质转化为他种质？为什么旧事物会蜕变为新事物。要追究这根源，首先就不能不承认：任何事物，它本身都必然具有着一定的转变的因素。事物的变化是因为这些因素发展的结果。自然，依据我们日常对于某些事物的观察来说，事物的变化，常常好像只是由外部的原因所引起。水是因为外部加了热才变为蒸气的；蛋变为鸡是由于母鸡从外部给与适当的温暖；波罗的海三小国是由于苏联的外力帮助而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华北某些地方之由封建地区一变而为抗日民主根据地是由于八路军的保卫……等等。不错，这一切也是事实，任何事物的运动变化，不能离开一定的外的条件，也就是不能不有某些外的原因。如果不承认这一点，那就等于不承认事物的普遍联系，就等于说事物可以孤立发展，就也是否认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了。但是，外的条件只是事物变化的一面的原因。单单依据外的条件，并不足以真正了解事物的自己转变，不足以说明事物本身的变化。事物在一定条件之下只转变为一定的另外事物，而不能变为他种事物，为什么它只能变为这样的事物？为什么水增加了一定的温度变蒸气，而蛋加了适当的温暖却变鸡？同是温度的增加，为什么水里不能孵出鸡来，而蛋也不会成为蒸气？同是一种外的原因，为什么变化的结果却是两样？这就不能单从外部原因去了解，而必须从事

物的本身内部去了解；也就是必须要承认，事物的内部就包含这样的因素，使它在一定条件下必然要这样转变而不那样转变。这就是说，事物转变的根据，就在事物的质的本身内被包含着。不同的事物，在它的质里有着不同的转变根据，因此即使外的条件相同，若质不同，那转变的结果也就不同。

一定的事物，具有一定的质，这质的规定性，使它成为这样的事物，然而质之为质，不仅仅在于规定事物的现状，而且也在于规定事物的将来，不仅在于现在的条件下规定了这样的事物，而且在于能在另外的条件下使它转变为一定的其他事物。蛋之为蛋，不仅因为它是蛋，而且因为它是能转化为鸡的，没有这转变为鸡的作用规定，也就不会有蛋的质；资本主义之为资本主义，不仅因为它是资本主义，而且因为它将会发展为社会主义，不了解这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也不能真正了解资本主义的质。所以，要正确认识事物的质，不仅仅应该了解它的现状，而且应该了解它的将来，不仅仅要把握它的现有的因素，而且应该把握它的转变的因素。一切事物都是具有一定的转变因素，而这转变的因素，就是事物本身所具备的变化的根据。

这就是说，一切事物都有着对立的方面，包含着与自己本身对立的东西。事物不仅是现有的事物，而且包含着能推翻自己的现状的因素。事物的现有的质都会渐渐成为腐旧的要消灭的东西，而在它的内部同时生长着新鲜的向上发展的东西，一切“对象，现象，都有其反面和正面，都有其过去和将来，都有其腐朽着的东西和发展着的东西”（《联共党史简明教程》）。这就是说，事物都有着自己的矛盾，都在自己的内部包含着自己的反面和自己的将来。都是对立的统一。

对立的统一的观点，是辩证法用来研究事物发展的最基本的

观点。除非根本不承认辩证法，根本不承认事物的由量到质的运动变化，否则就不能一时一刻离开对立统一的观点，就不能不在研究事物的时候，要分析事物本身的矛盾。因为如果不分析事物的矛盾，甚至于不承认事物本身具有内在矛盾，那就不能把握到事物自己变化的根源，就不能明白运动变化的所以然，也就是不能真正理解运动。辩证法是关于事物的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学说，而辩证法的规律的核心，就是对立统一的规律，因为内在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源。

形而上学也承认事物的变化发展，然而它与辩证法相反，把事物看做本身单纯同一的东西，不能从对立统一的观点上来看事物，不能从事物的正面里看出它的反面，不能在现在的东西中找出将来的胚胎。所以，即使它也承认事物的运动变化，但第一，它只能理解到外形的变化，而不能理解到事物本身的变化，即只能把变化看成位置的移动和数量的增减（数量的增减也被认为是位置移动的结果，如增加是由于许多事物的集中，减少是由于分散），而不能理解到质的转变。第二，它对于运动变化，决不能从事物的本身内部去找原因，而只能把运动变化的原动力推到事物之外，也就是最后不能不依据物质以外的力量（如精神、上帝、神等等）来说明事物的变化发展的所以然，也就是从外力论最后要坠入唯心论以至于宗教迷信的泥沼里。这就是因为不能够把事物看做对立的统一，并依据对立统一的观点来找出事物本身的发展根源的缘故。

列宁说：

“发展（进化）的两个基本（或者可能的，或者在历史中去观察的）见解，是（一）把发展看做是减少与增加，当做是反复，（二）把发展当做是对立统一（统一物之分裂为互相排斥的对立物，

与它们的相互关系)。在运动的第一种见解中，自己运动，它的推动力，它的源泉，它的动机都不彰明（或把那源泉移于外界——神，主观等)；在第二种见解中，自己运动的源泉的认识是特别着重。第一种见解是死的贫乏的干枯的；第二种见解是活的，仅第二种见解才给予我们对于一切存在事物的‘自己运动’之理解的钥匙，仅它才给予我们对于“跳跃”，“连续性中断”，转化为对立物，旧的东西的毁灭与新的东西的成立之理解的钥匙。”

这里的第一种见解，就是形而上学的见解，而第二种，就是辩证法的见解。

严格的说，倘若不从对立统一的观点来看事，那么任何运动变化都是不能理解的，倘若没有事物的内在矛盾，那即使是简单的位置的移动也不可能，即使是形而上学所承认的狭隘意义的运动也是不可理解。因为即使是最简单的位置移动，也必须在一定的矛盾状态中，才能够实现，即：运动的事物必须同时在某一点，而同时又不在这一点。如果某物在一定时候是在某一点，而不同时又包含着不在某一点的因素，那就是说某物是完全静止地停留在某点，而没有向另外一点移动的任何可能性，也就是只有静止，而没有任何运动的可能性了，形而上学者既不能在这内在的矛盾上来理解位置运动，因此常常把运动还原为静止，把运动看做一联串的静止点，说“运动是静止的积累”，说事物的移动，不过是该事物移动所经过的路线的每一点上都停留过一下。然而说事物在每一点都停留，并没有解答为什么它能从这一停留点到另一停留点的问题，也就是仍然没有解决为什么运动的问题。列宁对于这样的观点，曾给了深刻而完全的批评，说：“（一）这只是记述了运动的结果，而不是记述运动的本身；（二）这不能指出运动的可能性，不能包含这可能性；（三）这是把运动描写成静止状态的

综合，也就是说，这并没有除去了矛盾，而只是把它隐蔽了，推开了，离开了和蒙蔽了。”所以，要说明运动的本身，要指示运动的可能性，就不能离开矛盾，隐蔽矛盾，如形而上学一样，而是相反地，要把握事物的矛盾，要暴露这矛盾，从这矛盾里去找运动的根源。

所以，除非我们把形而上学的观点推到极端彻底，说世界没有任何变化，连最简单的位置移动（因之，如分散和集合，数量的减少或增加，旧事物的反复等）都不存在，那我们才用不着辩证法的对立统一的观点，才可以说世界一切事物的本身是绝对同一的。否则，只要我们从这里稍微离开一点，只要一涉及到事物的最简单最初步的运动，那就不能不同时接受对立统一的观点，不能不从内在矛盾上去找这运动的根源，恩格斯说：

“我们如果把事物看做静止的状态，看做没有生命的，各相孤立的，相互并立或前后相继的东西，那么我们在其中就遇不到什么矛盾。……当我们一开始在其运动中，变化中，生命中交互作用中来观察事物时，那么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这场合上我们立刻陷于矛盾的领域中。运动本身就是矛盾；就是单纯的机械的移动，也只能进行得这样，使该物体于同一瞬间，处在一个地方，又处在别个地方，它是在这一地方，又不在这一地方，这种矛盾的经常产生及其同时的解决，正形成了运动。”（《反杜林论》）

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不从对立统一的观点上来看事物，就不能理解任何事物的运动。

这样，依照辩证法的观点来看，矛盾是普遍地存在于一切事物当中的。一切事物是在普遍的联系运动中存在，同时也就是普遍地包含着自己的矛盾。运动是绝对的，不能想像任何事物能有一刻绝对静止的状态，因此矛盾也是绝对的，不能想像任何事物

能有一时一刻是绝对同一的无矛盾的状态。矛盾在空间上普及于一切事物，在时间上贯串着每一事物的自始至终的发展过程。对立不是如普列汉诺夫所说，仅仅是“实例的总和”，这好像是说辩证法只适合于某些实例，而不适合于另外的实例，对立统一可以有例外而不一定普及于一切事物，这是对于形而上学的折衷的观点，是错误的。对立统一也不是如苏联某些少数派唯心论者所想的，仅仅在事物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才表现为矛盾，而事物发展的开始和终末的阶段上是只有统一而无矛盾。这样的观点也是对形而上学的让步，也是错误的。在中国，叶青伪造了这样一个公式：“对立的统一——对立的斗争——对立的统一”，也企图借此来否认矛盾的普遍存在，否认自始至终的矛盾，而把事物发展的最初和最后阶段看做没有矛盾的情况。它的目的，不外是要把辩证法曲解，使它在政治上给顽固派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之类的专制主义作为思想欺骗的基础。

因此，要正确地认识事物，必须要认识它的内在的矛盾，必须要分析它的对立的各方面，“统一物的分裂，及其矛盾的构成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本质”(列宁:《哲学笔记》)。辩证法对于事物的认识，是不能满足于它的正面的质的规定，而要同时把握它的反面，把握它将来的因素，不把握反面和将来的因素，也就不能正确地认识事物的质。因为要是这样，就不能认识活的，生动的，能够自己运动发展的事物，就看不见事物的真实的生命，而只看见外表的躯壳。不把鸡蛋看做鸡的种子，就不能真正认识鸡蛋，不在资本主义社会内看出资本主义的否定力量，如无产阶级，就不能真正了解资本主义，不在封建社会中看出反封建的民主的因素，就不能真正把握封建社会的性质，不把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分开，不分析商品的两重性，把这对立两方面混而为一，如资产阶级经

济学者一样，就不能正确地把握商品的性质，事物的本身既是对立的统一，所以如果只看事物的一面，是一定不能具体地正确认识这事物的。

什么是事物的对立的统一？它的内容是什么？

对立的统一，恩格斯又叫做对立的互相贯透（Darchdringung——《自然辩证法》）。它的意义，首先是说任何事物内部都包含着互相排斥的对立的倾向，都在质的肯定方面同时包含着否定的方面。蛋里包含胚种，阶级社会里包含着对立的阶级，战争中包含革命，革命中包含战争，攻击中包含某些方面的防御，战略防御中包含战役和战斗上的某些进攻，“失败为成功之母”，成功中也要有一定的牺牲，没有绝对的善，善中曾包含某些恶，没有绝对的光明，光明中总有某些程度的黑暗。一切事物都包含着对立的方面，都要从对立的方面去加以观察，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包含着这样的因素。

对立统一的第二个意义，是对立方面的互相依赖。互相排斥的对立倾向，为什么能够互相包含在一事物里呢？倘若仅仅只有互相排斥，那显然是不可能的，倘若不是它们中间同时有着一定的相互依赖关系，不是在一定的情形下，对立方面必然要以另一方面作为自己的不可分离的成立条件，对立方面的统一，就是不可想象的。没有胚种不成其为蛋，没有反抗力则压力也就不能成立，没有被剥削阶级则剥削阶级也不能生存，没有战争不能完成革命，没有一定的防御也就不可能进攻，没有牺牲，就不可能有胜利，没有适当的斗争，就不能建立统一战线。适度的黑暗的存在，使光明愈显著。经过失败的经验，就更有成功的把握，事物的对立方面是互相排斥的，然而在一定的条件下，却要同时互相依赖，在一定的条件下，事物需要某种对方面作为自己的必要的

存在条件，离开了这条件，它本身也不可能成立。正是这互相依赖的关系，使互相排斥的对立方面能在一定条件下包含在同一事物中，成为对立的统一体。

对立统一的第三个意义，是对立方面在发展中的互相制约。对立的一方面既在一定条件下依赖对立方面而存在，因此在发展中也必然因对方的存在与发展，而受到一定的影响。对立方面是互相排斥的，所以，在发展中，一方面对于另一方面的发展要给一定的阻碍，给与一定的压抑，要胜利就不能不努力减少牺牲，要成功就必须能克服失败的经验，要进攻就得把防御放在次要方面，要统一战线就不能在斗争上使用主要的力量，资本家愈发展，则劳动界愈贫穷。然而在另一方面，对立在一定条件之下是互相依赖的，因此一方面的发展不能不以对方的某种发展为前提条件，因此一方面的发展同时就要对于对方的发展给以一定的促进作用。“压力愈大，反抗力愈大”，“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胜利愈大，牺牲也愈多，资本主义愈发展，无产阶级在数量和质的方面（觉悟程度，斗争性等）也就愈增进，愈更强化的和扩大了的统一战线中，对妥协投降的倾向的斗争也就要愈益尖锐。这样对立的方面，在发展中互相间就有两重的相互制约的作用，一方面互相排斥互相压抑，而另一方面却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互相促进。这种两重的相互制约关系，是因事物的不同而有各种各样的差异，或是互相抑制互相阻滞的作用比互相促进作用更大，或是互相促进成为优势，这是要依据不同的事物和不同的条件来具体把握的。一般地说，事物的新生的方面，在对立的互相制约中是更快更容易地向上发展起来，被对方的发展所促进的倾向是相对地更甚于被阻滞的倾向，而没落的方面，则是相反地，更难于和更迟缓地向上发展，而被抑制的倾向是甚于被促进的倾向。这原因是很明白，因

为新生的东西是更容易获得向上发展的条件，而腐朽的东西是更容易造成自己死亡的条件，因为前者不论是怎样软弱和不稳固，却必然要向前生长，而后者不论怎样强力和巩固，却必然要向下没落。

对立统一的第四个意义，就是事物的对立方面的互相推移和互相转化。事物是对立的统一，是在同一中包含着矛盾，事物之所以能成为统一的东西，能保持其现有的同一的形态，是因为它把对立的方面作为自己的反面包含在内部，是因为能够抑压着自己的反面，使它只作为将来的潜伏的因素而不成为现实存在的形态。液体的水分能保持液体形状，是因为沸腾蒸发只是一个被抑压的因素，蛋能成为蛋，是因为胚种未完全成长，胜利是因牺牲的比重并不过分的大。成功是因为把失败的经验克服了，消化了，在军事行动中，政治服从军队，在统一战线中，斗争只在不破坏统一的程度下进行，在一定发展条件下，事物的对立的一方抑压着，另一方，就使该事物保持一定的质，一定的统一。因此，倘若发展的条件变了，就会又有这样的情形：原来被抑压的反面，转变为优势的正面，原来的正面，被推到反面，将来的因素变为现存的形态，现存的形态成了过去的残遗，如胚种成长起来打破了蛋壳，牺牲太大以至得不偿失，军事结束，政治任务被推到前面来，某些方面的统一已不可能而不能不以斗争为主，在这样的情形下，事物就不能保持原有的统一，而转变成另外事物，转变为自己的反面，转变为另外的质，这就是对立的互相推移。由量变到质变，从它的变化的形态来说，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转变，从变化的根源来说，不外就是对立物互相推移的表现，不外就是事物自己的反面压倒了正面，将来的因素克服了现在的形态，新生的东西打破了腐朽的东西。事物在一定发展条件下被

转化为自己的对立方面，条件一变，好的就会变为坏的，胜利会等于失败，等等，这就是对立统一的第四个意义。

因此，所谓对立的统一，就是说事物都包含着自己的某种反对方面，就是事物在一定的情形下都依赖自己的反对方面而存在，就是说事物在发展中都受到自己的对立方面的一定的制约，一定的抑制和促进的影响，就是说事物在一定的发展条件下都会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都会向对立的方面推移。辩证法对于事物的看法与形而上学相反，形而上学把事物看做单纯的统一物，看做不包含任何矛盾的东西，看做永远同一的东西，而辩证法却把事物看做矛盾的东西，看做内容复杂包含着各种对立倾向的东西，把事物的质看做流动的，变化的，向对立方面转化的东西。

这里必须着重说明的是，对立的统一，是相对的，事物只在一定的条件之下，有着一定的统一性。事物的互相包含，互相依赖，互相制约及互相推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有它一定的表现，而不是任何事物在任何情形下都可以随便统一起来。鸡蛋只包含鸡的胚种，而不包含牛羊的胚种；封建社会在发展中，一般只把资本主义作为将来因素而包含着，而不会直接有社会主义的萌芽，"如果我们把靴匠的毛刷，包含于哺乳动物的统一范畴中，那么它决不会因此而获得乳房"（《反杜林论》），因为毛刷究竟只是毛刷，而不是动物，所以它决不会与乳房统一的。这就是说，事物所包含的对立方面，是有一定的，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事物只把某种东西作为自己的反面，而不会把任何东西都作为对立因素。这是就互相包含的意义上来看出事物的对立统一的相对性。

就互相依赖的意义上来说，对立的统一怎样是相对的呢？第一，对立是在一定条件下互相依赖，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互相依赖，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之下存在的。在资产阶级统治的

条件下，资产阶级依赖剥削无产阶级而生存，后者在必须出卖劳动力的情形下要依赖资产阶级，这种互相依赖在苏联的社会条件下就不能成立。统一战线中对立党派的互相依赖，是在共同抗战的条件下成立的，离开了抗战走向投降的党派，就同时也离开了这互相依赖的关系。第二，对立的相互依赖不但有一定的条件，而且只限于一定的方面，不是全面的互相依赖，资产阶级是剥削无产阶级的剩余劳动而存在，并不依赖劳动者的反抗运动而存在，抗日最彻底的党派也依赖于不彻底的党派，因此就要建立统一战线，然而也只依赖后者未曾用尽的抗日力量，而不是连后者的动摇性也要加以依赖，光明、依赖黑暗，只是在于反衬作用，而不是黑暗直接产生光明。因此，第三，在相互依赖中，还是同时存在着对立性，存在着相互排斥的作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不会因它们的互相依赖而停止，彻底的抗日党派对于较不彻底的党派的依赖，并不因此就能消灭了前者对于后者的动摇性的批判。

就互相制约来说，对立的方面在发展中的相互促进或相互阻滞，也是因发展条件的不同而有种种差异，只举一个例子就可以明白：例如社会的发展，当社会在向上生长的条件之下，生产关系主要成为生产力的促进力量，当社会走向没落的条件下，生产关系就成为生产力的障碍，事物的对立方面怎样互相制约，也是要依具体的条件来作具体的把握。更就相互推移来说，事物之转化为对立方面，必须具备一定的具体条件，转化就是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这是在量变质的规律中就已证明过，就可以了解的了，这里用不着多事重复。

在一定的条件，一定的具体情况下，来正确认识事物的对立统一性，这是辩证法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应用辩证法的任务，不是要主观地把事物任意分割任意结合，而是要确切地认识客观事

物本身的辩证法的关系，也就是要依据客观的具体条件来把握事物本身的辩证的运动规律。因此我们不能玩弄辩证法的空名词，不能一般地清谈对立统一的规律，而是要了解一定的事物在事实上怎样成为对立的统一，要研究在不同的条件下，对立统一的不同的具体形式。列宁说："辩证法，是关于对立怎样能是同一性而又怎样是同一性（怎样变成同一性），在怎样条件之下，对立变成同一性而互相转化，……等问题的学问。"（《哲学笔记》）辩证法在基本上说来就是研究矛盾的学说，然而必须研究一定具体条件下的客观矛盾，而不要有丝毫主观揣想的成分。

这就是说，在一定的条件下，事物可以保持某种形式的统一性，可以相对地保持同一的质。任何事物决不是单纯的同一物，而是包含着它的对立方面的——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然而在一定的条件下，事物常是以某一方面作为自己的正面，作为现存的优势的方面，而另一个方面却是被包含的反面，是潜伏的，将来的新生的因素，或被克服了的过去残遗的因素。事物之所以能成为一定的事物，所以能保持同一的质，就是因为在一定的条件下，它能把自己的对立的方面抑压和统一于自己的内部，成为自己的组成条件，使正面的质能够获得相对的一定安定性。这也就是事物的相对的同一性。资本主义之为资本主义，是在这社会的发展中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因素）处于被压抑的地位，胜利的存在，是因为牺牲不成为主要损失，军事斗争的存在，是因为在一定条件下，单单政治斗争已不够，而不能不发展为、转化为军事斗争，并且要使政治包含在军事斗争中，服从于军事斗争。这就是事物同一性的真正内容。但这样的同一性也仅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因此也是过渡的，一时的，而不是永久固定。倘若条件变了，倘若有了另外的客观情况，反面就可能转变为正面，将来转化为现在，

被包含被压抑的方面转化为显著的优势的方面，那就是表示，事物已被自己的对立方面所克服，被后者反过来包含着压抑着，事物就不能保持自己的质的同一性，就要转化为另外的质，向自己的对立方面推移。所以，任何事物之所以能成为这样的事物，是因为一定的发展条件之存在，是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才能成立这样的质。从条件性，相对性，也就是可变性上来认识事物，是辩证法的正确认识之必要的原则。只有这样来研究事物，才能具体地了解事物的同一性，才不会把同一性的意义过分夸大，才不会把事物看做永久不变的，才不会发生错误的，以至于荒谬的思想。

这就是说,辩证法也并不反对从同一性的观点上来看事物,也不反对把事物看做一定的事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只是因为它把同一性看做无条件的，绝对不变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事物必然有相对同一的质。辩证法虽然必须在两重性上，从正面和反面来看事物，然而并不因此就把正面和反面，现在和将来同等看待。辩证法告诉我们，在一定的条件下，正面一定是正面，优势的现在一定是优势的现在；在一定的条件下，必须肯定某物就是某物；虽然并不能因此就忘却了它的否定的因素，然而否定的因素只是被包含被抑压的因素，而不是现存的物质因素。因此资本主义只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胜就是胜，决不是败，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虽然这一切的后者方面都是和前者分不开的。在一定的条件下，肯定一定的质，这在认识上，也是非常重要的事，否则就会成为模棱两可，没有一定的思想方向。辩证法虽然要把握事物的对立方面，然而并不是说，事物仅仅是两重的，而没有主要的方面。

这就是说，就是形而上学的思想，也还是事实的一方面的反映，而不是完全绝对的荒谬。形而上学把事物看做绝对同一的东

西，认为事物本身没有矛盾，这自然是错误的。然而形而上学之所以错误，并不是因为事物本身绝对没有同一性，而是因为它把事物的相对的同一性，夸大为绝对的同一性，把对立的统一曲解为无矛盾的统一，把有条件的质的安定性误认为无条件的质的安定性；以为事物的质不论在任何情形下都始终一致，没有任何的内在矛盾和转变的可能性。辩证法对于形而上学要给与批判，然而批判并不是等于说简单的否定，简单的反对，说事物完全没有任何同一性或统一性；而是要把它纠正，克服，加以改造。形而上学肯定每一事物有一定的质，辩证法也不否认每一事物有它自己的质，并不否认事物必然是一定的事物。辩证法只要改造一点：即形而上学以为每一事物永远是这一定的事物，而辩证法却认为，只在一定的条件下，事物才是这一定的事物，在不同的条件下它又可以转变为另外的事物。形而上学是从孤立的静止不变的观点来看事物的质的同一性。不从同一性中看出可变性，矛盾性，看出对立因素；这种对事物的看法，如恩格斯所说的，是采取“是——是，否——否”的公式：是这事物就是这事物，不是这事物就不是这事物，决不在是中包含否，否中包含是。而辩证法却是相反，是从联系运动的观点上来看事物的同一性，是要在事物的同一性中同时看出可变性，矛盾性和对立的因素，它的看事物的公式，如恩格斯所说，即“是——否，否——是”。也就是说，是中包含否，否中包含是，是可以变为否，否可以变为是。形而上学只看见事物现在的是或否，辩证法却要在现在的是或否中，看出相反的发展因素，看出将来的转变根据。

这就是说，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的观点，然而并不因此就完全否认了事物的同一性；而成为相对主义的思想。虽然要从两重性来看事物，但并不因此就说，事物（在一定条件下）没有一定

的质，说我们绝对不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肯定事物是什么，说事物的是非可以随便颠倒，说一事物可以把它肯定作这样，也可以肯定作不是这样；说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说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说某人是革命者也是反革命者或汉奸，说汉奸就是抗日战士，两者没有分别。这样颠倒是非的诡辩论，和辩证法是完全两回事。辩证法虽然把矛盾看做事物的普遍的内容，然而在一定条件下事物的一定的质，是必须要加以肯定的。现在是这样的事物，也一定是这样的事物，而不是另外的事物，它可以转化成为另外的事物，然而这必须在另外的发展条件之下才能实现它的转变，在现在的条件之下，只能是这样的事物。我们现在是要抗日，而不是要内战。是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汉奸是汉奸，不能再说他们是抗战队伍中的一员。胜利就是胜利，决不是失败。这些肯定的东西，自然也可能转化为他的否定的方面，然而在具备肯定的条件时，就一定是肯定的，只在另外的条件之下才转为否定方面。“是——否，否——是”的辩证法公式，并不是说同一事物也可以作为是，也可以作为否，而是说的是中就包含否，否中就包含着是。在一定条件下，“是”只能作为“是”，而“否”则是被包含被抑压着的方面，不能立刻说它已经就算作“否”。辩证法的同一性，是把对方包含了的同一性，被包含了的对方，是转化的因素，而不是现存的因素，诡辩论就是把被包含了的东西看做已显露的东西，把转化的因素，看做现存的因素。不依据客观条件来确定一定的是或否，而是主观地任意杜撰事物的是或否，把是任意曲解作否，或否任意曲解作是。所以辩证法是唯物论的辩证法，是把握客观的辩证规律的方法，而不是主观主义的相对论，不是颠倒是非的诡辩论。

辩证法也不是折衷主义，折衷主义与诡辩论的不同，就在于诡辩论是主观地任意颠倒是非抹煞了一定的客观条件下的是与非。折衷主义却是要把各种是非加以调和，把各种对立方面平均看待，而不能依据客观条件，在它们中间看出主从的分别。诡辩论的作用是在于混淆是非，把人引到错误的立场上去，折衷主义却是装着“不偏不倚”各方面照顾的公平外貌，而实际上是丢弃了确定的客观的正确立场。诡辩论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说这是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折衷主义却说：也可以说是民主主义，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在我们要求中国发展进步思想文化的时候，诡辩论说要“全盘欧化”，而折衷主义者却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调和论，也是辩证法所要反对的。辩证法也要求我们研究事物时要照顾各方面，要看出事物的各种对立的因素，也反对片面地夸大事物的是或否的一面，而忘了另一面。然而辩证法却同时要看出对立方面的主从关系，要看出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之下，对立中的主要方面和副次方面，看出对立中的一定的质的同一性。例如说，在军事的斗争当中，不能忘记了政治斗争的意义，军事不能与政治分离，为政治所保证，因此，不能离开政治片面地来论军事。然而军事斗争究竟是军事斗争，在需要军事斗争的条件下，政治是必须服从军事，而不是把两者的任务平列看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有社会主义革命的因素，然而新民主主义革命本身仍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类型，并不同时实现着社会主义革命。学习西洋文化必须使它中国化，然而在学习西洋的时候仍是要彻底学习，不是要以中学为体，这样，辩证法不但要注意事物的对立方面，同时要找出一定条件下的主要的东西，要能确定基本的立场，基本的方向，而不是调和各方面，把各方面同等看待，以至于抛弃了客观要求的一定的方向和立场。辩证法是从对

立统一的观点来看事物，折衷主义是把对立的统一改变为对立的调和。

布哈林是苏联的折衷主义者，他曾举杯子作例，说杯子一方面是饮水的工具，另一方面也是玻璃的圆筒，列宁曾给与批评，说这是“死的无内容的折衷主义”。因为杯子虽然“无疑地是玻璃制的圆筒，也是饮水的工具”，但在一定条件下，它主要只是饮水的工具，而“如果杯子在现在必须作为饮水的工具时，那么，它的形状是否完全圆筒形的，或它在事实上是否玻璃制的，这事对于我就一点也不重要了”。辩证法必须依据一定的具体情形，确定什么是重要而什么是不重要的，而不是如折衷主义一样，把事物的各方面任意地平列结合起来。

中国的中庸思想，一部分就流为折衷主义，这种思想常常表示对于新旧事物，对于社会的进步方面和落后方面要采取调和的态度，在学术上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哲学上要既不唯物，也不唯心，在社会上要讲新生活又要讲旧道德，在建设上要把物质建设和心理建设平列看待。这种思想，自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以来，特别在某些上层阶级中间流行，并且不断地采取种种新形态向前发展；它基本上是反映这些阶级的人们的保守的立场。他们一方面站在保守的立场上，一方面又看见进步的新的潮流的不可抵抗的趋势，于是以调和新旧，“勿走极端”为名，以图延缓新的，稳定旧的。名义上是对于新旧两方面不偏不倚，实际上是要阻止新的方面的向前发展。就如现在，在抗日的问题上，采取折衷主义的态度的就大有人在，例如一面说要抗日，一面却用极大的力量来进行内部磨擦，一面要打仗，一面却总希望妥协，而不能够用一切力量为争取抗战胜利而努力，因此也就在一定的程度上对抗战胜利的前途起着阻碍的作用——这就是折衷主义在实际行动

中的表现。

诡辩论和折衷主义，都是对于对立统一的歪曲。都是似是而非地注意到了事物的对立的统一，然而并不是真正能够客观地把握事物本身的对立统一关系。诡辩论把事物的对立方面看做可以任意颠倒的东西，而不知道对立的互相转化只在一定的具体条件下才能实现；折衷主义以为对立的方面可以任意结合，而不知道对立的结合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一定的方式上的结合，是以一定的方面为主的结合，而不是任意的平等的结合。因此，诡辩论和折衷主义都不能把握客观事物本身内部的必然的关系，都是把事物各方面看做偶然的任意的结合，在这样的意义上，两者都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的变种，是多少有着一些辩证法的伪装的形而上学思想。

（原载《中国文化》第2卷第1—5期，1940年9月—1941年1月）

当前文化运动的任务

(1940.8)

抗战已经坚持三年多了，不用说，中华民族在这战争中确已表现了自己不可战胜的力量。由于抗战各党派及广大民众的共同努力，由于我们在前后方以及敌后游击区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由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以及文化上各方面人士的艰苦工作，使敌人侵略的力量大大地遭到了削弱，使敌人屡次企图“从速解决中国事变”的阴谋诡计都变成了梦幻，使我们有可能继续坚持抗战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文化界的工作，在三年来，对于抗战的坚持曾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的文化工作者，在这期间，大都离开了上海北平之类的大城市，而走到内地，走到乡村里，军队里，分散在全国的许多角落，在一定的岗位上进行为抗战的工作。我们看见，进步的文化运动，在抗战中形成了一条广泛的重要的阵线。一种新的启蒙运动，在全国许多地方高涨起来。各种大小报纸杂志的出版，普遍到许多落后的地方，戏剧歌咏的运动，到处组织起来，美术和文艺工作者走上了前线，抗战教育在许多地方都建立起来，而特别是在敌后游击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在这一方面获得了最大的成绩，此外如各种文化团体组织之普遍于全国各地，进行文化界的团结，理论研究科学知识的提高，新的文化工作干部的涌现。这一切，就表现着抗战以来我们的民族文化的空前的进步。而这些进步，反过来对于抗战就发生了它的极大的作用：它使全国人民

清楚认识敌人的侵略的真面目，把广大人民的民族意识更加提高，它指示着抗战建国的道路，鼓舞着战斗的自信。它使全国各部门各岗位上的将士能够聪明而坚定地守着自己的职任。倘若没有进步的文化运动，倘若相反地在全国的言论界被动摇不定的糊涂的思想所统治，倘若悲观失望消极苟安的空气充塞全国人民的生活，倘若只有敌人汉奸的奴化运动而没有我们的民族文化运动的高涨，那么，抗战的坚持三年，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吗？

但文化运动在抗战中所走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我们尽管可以说，今天中国文化上的发展，比较战前是大大地进步了。但如果依照抗战的需要来衡量的话，眼前的进步还是远远地赶不上实际的要求。抗战使我们需要展开思想自由的风气，以便在互相切磋的条件下提高学术理论的研究，以便在互相讨论中更能正确地把握抗战的规律，把握事实的真理，然而在许多地方，我们的思想发表要受到极狭隘的限制，我们的言论出版要经过极烦琐的检查。我们需要艺术创作的自由，以便我们的艺术家可以应用一切形式反映抗战各方面的现实，然而我们的作品，常常在发表的时候（特别是戏剧在上演的时候），要在一定的死的尺度标准之下受到横暴的剪裁。我们需要大量的抗战的进步的出版物，能够供应各地人士努力追求抗战知识及一切近代科学知识的欲求，然而我们常常听见书籍杂志被查禁，报纸被停止发卖，各地的书店出版机关被干涉被封闭的消息。我们需要近代的教育，使求学的青年们对于社会对于自然有新的进步的科学认识，使他们在现代的世界上能够有立足的资格，然而我们现在却看见了复古的运动，专门读经的教育；我们需要大批的文化工作者深入到各地去进行工作，然而在许多地区，进步文化人的活动，都受到了阻碍和限制。除了一部分的地方如华北和陕甘宁边区之外，我们几乎到处可以看到，在中华民族文化的

前进运动的前面，设立着种种人工的障碍网！

这一切障碍的存在，是因为在抗战营垒中，有着许多对文化进步怀着仇视的人们。这些人是以极少数上层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者为主体，他们对于抗战，怀着悲观失望的情绪，时时刻刻有着妥协投降的意念，他们对于全民族的进步，对于广大民众的觉悟，是怀着畏惧不安的心情的。这些人，为着少数人的私利，在政治上曾不惜听从敌人汉奸的利用，甘愿在他们挑拨离间破坏团结抗战的阴谋之下被驱使，进行组织“反共”磨擦运动，而事实上却恰恰是和汪精卫的“反共和平”的口号相呼应，成为敌人灭亡中国的工具。在文化上，他们也同样以反共作口实来压迫一切进步的文化，来限制一切思想言论的自由，来进行复古读经的运动，来进行愚民政策，而在事实上却成为破坏抗战，使中国走到灭亡道路上去的条件。

我们的抗战在当前是处在一个新的严重时期。由于法国在欧洲的战败投降，刺激了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的侵略野心。使它更积极地进攻中国，企图再来一次“从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布置，以便能够继续“南进”，去实现它独霸东亚的梦想。敌人的办法已表现为事实的是：封锁我国的国际交通，实行猛烈的空中轰炸，加强正面进攻，企图这样来压迫我们，逼迫动摇分子更积极地走向妥协的道路上去。近卫上台以后，它将会用更毒辣阴险的手段，将会利用一切可能的威逼利诱的方法，来破坏中国的抗战团结，来逼使中国屈服，那是一定无疑问的。

敌人的企图一定会失败，中国必然不会屈服，这样的自信，我们是可以有的，因为今天中国抗战的力量已经大大地增长，坚持抗战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念，已在广大人民的心中生了根。然而并不能说，在今天敌人的加紧进攻之下，中国的抗战仍然丝毫不会

增加困难。相反的，在当前的时期，我们的抗战一定会遭遇到许多重大的困难，而动摇分子将会因此愈更增加动摇的倾向，妥协投降分子的活动将因此愈更加强。而如果不设法克服这些困难，不消灭这些倾向，让它自然地发展下去，这样要说抗战仍能坚持，投降危险一定没有，是完全错误的。

今天中国全民族的任务，就是要用一切力量克服敌人新的进攻之下所造成的困难，为着这样的目的，中国全民族必须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消除一切足以对消自己力量的内部磨擦，让敌人汉奸找不到一点离间破坏的空隙。就文化方面来说，那就是要有系统地充分动员起一切文化的力量，取消对文化运动的一切狭隘的限制，把文化运动大大地开展起来，在那进行着最后狂暴挣扎的敌人前面，建筑起全民族团结的精神堡垒。这样才可以克服当前的困难，加速最后胜利的时间。

要达到这样的目的，以下的一些任务是必须要做到的：

第一，在抗战的新的困难前面，我们的政治任务是要加强全国团结，充分发扬民族的力量，打破敌人的新的进攻。因此，我们在文化战线就应该努力推动全国更紧密的团结，鼓舞全民族自力更生的勇气，揭破日寇挑拨离间的阴谋及其奴化政策的毒害。

第二，要开展思想言论以及文艺创作的自由，抗战是全民族的抗战，是由各党派各阶层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各党派各阶层都各有不同的世界观和思想系统，是不能勉强使他们完全一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原是基于共同一致的纲领原则，而不是基于完全划一的思想系统，所以只要是在政治纲领的主张上基本相同，只要是不违反抗战立场、三民主义的纲领的立场，就是统一战线的一员，就应该在中国的言论思想界文艺界有合法的自由权。如果不开展这样的思想创作自由，如果在思想上硬要坚持独断的限制，硬

要用划一的思想系统来进行统制，或用公式的尺度来束缚一切创作活动，如果一定要依据划一的思想和公式的尺度来作为统一战线的原则，那么，这不但不能统一，反而要造成分裂，至少是不能得到全民族的广泛的团结。所以，单单为着团结这一个原则，就必须要开展思想的自由，就必须一方面反对独断的统制和另一方面反对左倾的狭隘观点。至于思想自由对于提高学术的作用，文艺创作的自由对于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是用不着解释的。

第三，要反对思想文化的复古主义。思想文化自由的要求是为着要在自由开展的活泼精神之下使思想文化进步，使中国民族的思想文化能够跟上新的历史时代的需要，使全国人民能把握新的各种科学思想文化，因此也才能在当前争取民族的独立生存。复古主义是要想用旧封建时代的思想文化来迷糊现代青年的眼睛，把他们拖回到旧时代的墓穴里去，使他们看不见今天的现实，使他们不知道参加今天的斗争。因此，复古主义对于今天的抗战是非常有害的，日本帝国主义就善于利用复古主义（如“王道”精神之类）作为侵略的工具。所以只有那些完全不把民族抗战的前途放在心上而只看重少数人的私利的动摇者以至于投降主义者，只有这样的反动的人们，才会要用思想文化上的复古主义来麻醉青年。

第四，要开放出版的自由。出版自由是思想自由所依据的物质基础，对于出版自由的限制，事实上也就等于思想自由的限制，因为思想言论是终要靠出版物来表现，来传播的。现在对于书报杂志检查制度，对于书店的封闭行动，都是用来钳制思想自由的方法，这自然是要反对的。

第五，要在全国各地分散地建立许多中心的文化工作据点。抗战愈向前发展，物质条件就愈更愈更困难。在目前，战争已把全国分作许多互相隔离的区域，这些区域互相间不但交通不便，而

且政治情况人民生活条件也各不相同。文化工作要能够最有效地为抗战服务，就必须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决定具体的领导，而事实也证明必须要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能像以前，特别是抗战前那样，全国的文化中心只有一个地区（如上海），全国文化工作几乎就是由这一个中心领导。这种方法现在是不适当了。文化工作的中心据点，必须要分散在许多地区，必须把文化干部分散到各地去，建立必要的出版印刷编辑以及其他的文化机构，才能够对各地区作具体领导。

第六，要使文化工作者深入群众。过去已有些文化工作者走上前线或农村，然而这种运动并不普遍，尤其是并不深入，因此大众化的口号虽然早已提出，而文化工作本身还是不能说已经深入大众。以后，应该用各种方法使文化工作者深入群众，这一方面当然要文化工作者本身的努力，另一方面也需要各方面的帮助。可惜一直到现在，大多数地区的政治军事负责当局，对于这一点并不大注意，而且甚至于完全忽视，这是需要改正的。我们要求各地军政负责者能够重视文化工作者的需要，帮忙他取得深入民众的便利条件，而不要使他们受到种种不必要的限制。

以上所说，就是在今天要开展文化工作必须要努力做到的几件最重要的任务。这些任务，基本上是曾经在文化界，特别是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来过的，而到现在，除了一部分进步的地区曾表现出相当成绩以外，大都没有实现。在今天，抗战的实践要求，需要在文化工作上有更好的配合，使我们抗战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更进一步的开展，而要文化运动能有力地广泛开展，那么努力完成以上所说的任务，正是当前必要而不可少的条件！

（原载《中国文化》第1卷第6期，1940年8月25日）

文学上的才能是哪里来的?

(1940.9)

《中国青年》二卷六期何其芳同志的一篇《怎样研究文学》,在关于才能的问题上引起了读者陈正亮同志的一些疑问,其后《大众文艺》第四期上,雪苇同志及何其芳同志本人都给与了答复,默涵同志的短文,也论到这问题,但意见却还未一致。现在“中国青年社”因为读者的询问要我对这问题发表一点见解;我对于文艺是门外人,所以只能一般的讲一讲。

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否认“天才”的存在,如果说在政治军事各方面都有天才或特殊的优秀才能,那么文艺上当然也不能例外。现在的问题只是“天才”从哪里来,“才能”是依靠先天的遗传还是依靠后天的努力。这里首先要考虑问题的提法。我以为解决任何问题,如果是太偏于一面,“或是这样,不然就是那样”,都是难于恰当的。要认识每一件事,需要我们首先把它各方面的具体条件都把握住。文艺上的才能问题也应该是这样。“或是先天的,不然就是后天的,”——如果要求这样才解决问题,那就永远不会得到客观的正确的答复。不论何种特殊才能,都是非常复杂的东西。一种文学作品要表现作者的世界观,作者所处的时代环境,要有适当的构思,要考虑表现的形式,要有适当的文学技术水准……而文艺的才能,就是表现于能把这一切复杂的因素高度的和谐的综合起来。离开了这些表现,离开了已创作出来的优秀作品,我们就不能评判才能的优劣。这样的一种才能,当然不是任何简单

的条件所能造成的。

造成文艺上的才能的条件，我想最基本的要指出这几件：第一是作者天生的资质。如果我们不否认有生来的白痴和聪明的不同，那么也不能否认，对于文艺工作是否最能适合或比较不适合，也有生来的资质的不同。自然，所谓天生的，并不是由于“神的命中注定”，而只是由于父母生理上的遗传。然而单单这一点，并不能够表现为才能，还要看，第二，作者有无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个人经济条件，使他能够受到必要的教育，能够有机会进行写作，能够发挥和发展他的才能。第三，作者的具体的生活过程，他所处的时代，所属的阶级，特别是他所直接接触过的社会环境，这一点对于一个文学作者的才能的发展方向，是有着根本的意义，因为他的作品的内容，作品的本质，他为什么能写出这一类的作品而不写出其他的作品来，是必须由此说明的。第四，作者所接受的文艺传统。从事文艺的人不但要有生活的经历，而且要能够善于从自己以前自己以外的优良文艺成果学习，要能够继承和发展本国的以及国外的文艺中的好的东西。然而这些都还不够，他还必须坚持刻苦的工作，他还要长期地努力锻炼自己的写作技术，一个人具有普通的天资，受过普通的教育，加以一定的生活经验和文艺修养，只要坚持努力，多少总可达到某种成就，反过来说，他即使具有异常的资质，却缺少了其他的条件，尤其是缺少了自己的异常的努力，而能成为一个大作家的事，却是不会有的。没有一个真正的大作家，他会向学习文艺的青年说，我的作品是毫不费气力就能成功的。世界文豪如托尔斯泰等人，他们最初发表作品以前就曾经过不间断的努力写作，已成名了以后，他们的作品原稿还是改了又改，以至于全盘涂去的都有，这和现在有一些浅尝文艺的人，随便写点东西就以为有了不得的价值，就要立刻

要求发表，就要一句不动，一句不改，否则便要和人打架的态度，那是有天上地下的分别的。

造成文艺上的才能如果需要上述的这许多条件，那么，单是如雪苇同志所说，“才能不是天生的，而是人为的”，这就未免是太片面太主观的了解。因为整个的才能表现虽然不是天生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虽然不是直接从娘肚子里带来，然而才能的天生的因素究竟是必需的。而根据其芳同志所说，则又使我们觉得，他是把学习优秀文学传统和努力写作锻炼，计算在形成才能的条件之外去了。他们的意见分歧的基本点就在这里，就在于一方面把主观的努力作用绝对化，另一方面则只估计到先天的客观因素。然而问题的解决却在于要把才能形成的主客观条件都要估计到。因此，一方面，一个人在决定从事文艺工作的时候，要不要考虑一下自己的才能或写作的客观前提，并不是不值得讨论的。如果自己经过实践的考验确是没有具备相当的条件，那么，要是有人忠告自己去改做飞行师或其他可能对革命贡献更大的工作，而不以文艺写作为专业，也不一定是硬要拒绝的。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因此就提出一些高不可攀的条件，来骇退初学写作的人，叫他们丢下文艺的笔。一般人都有多少文艺的欣赏和表现的能力，都有多少生活的经历，这样的人只要愿意写，就不妨勇敢的写，努力的写。因为只有这样，每个人的才能才会发展，历史才会从许多人中间发现和锻炼出真正的天才来。

（原载《中国青年》第2卷第11期，1940年9月5日）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

(1940.10)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与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最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定、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是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论》关于鲁迅的断语。

什么是鲁迅的方向？鲁迅的方向就是为大多数人而战斗的方向，他所创造的新文化就是为大多数人而战斗的文化。鲁迅向什么人战斗？向民族的压迫者战斗，向社会的压迫者战斗，向吃人的旧制度战斗和吃人的旧礼教战斗。鲁迅热爱自由，热爱光明，热爱最大多数的被压迫的人类。因此，他对于敌人就不宽容，不姑息，他并且喜欢“打落水狗”。他主张打到底，打到旧的真正死灭下去，新的产生出来。因此，他牺牲了一切可能的个人幸福，被剥夺了一切的自由，竭尽了血，贡献了一切可能的能力，直到最

* 本文是作者为《中国文化》撰写的社论。

后的呼吸。鲁迅的名字是在战斗中成长起来，成为千百万大众所熟悉的名字。鲁迅这名字的所以不朽，因为这名字是象征着近代中国人民战斗的事业。

不断的战斗和不断的进步，成就了鲁迅历史的两方面。战斗促进了进步，进步又开拓了战斗的新场所，增进了战斗的力量。战斗与进步——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开的；没有一方面，就没有另一方面，而决定的方面，当然是革命的战斗。在这里，鲁迅的基本出发点，是向着将来。“救救孩子！”——这是鲁迅在他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上的号召，这精神贯串着他的一切著作，贯串着他毕生战斗的事业。他认为：“旧账如何勾销？我说，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热风》）在《故乡》一篇小说里面关于“后辈”，他沉痛地写道：“……我又不愿意他们……都如我的辛苦辗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为着希望小孩们能有新生活，他反对过去，反对一切吃人的勾当。他是根据“将来”而来处理问题的。

在《狂人日记》上，鲁迅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和那些把旧中国当成“黄金世界”的死顽固派相反，鲁迅看清了旧中国的黑暗面，透视了旧中国的丑恶面，他指出了旧中国是“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本来阶级社会是建立在吃人的基础上面的；鲁迅把中国旧封建社会这点秘密揭穿出来了，这是鲁迅极大的功绩。随着历史的发展，鲁迅就由反对封建的吃人制度并进到反对资本的吃人制度了。

鲁迅思想的发展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发展。历史更往

前走的时候，他没有“固步自封”，他跟着走去，并努力去站在前头。这就是他的伟大。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许多一时热闹的人物，由于时代发展的结果，有的逃避了，有的重新复古了，有的当官了，有的向革命诅咒了，有的甚至当了反革命的刽子手的奴才，礼赞起屠杀青年了。历史是无情的，的确只有刚毅的人才站得住足，才能继续地战斗下去。然而这种“刚毅”并不是能够凭空取得的，而是要依靠于社会战斗的生活，依靠于大众；同时，不是面向将来的人，也决不能依靠社会战斗的生活，决不能依靠大众。鲁迅是面向将来的人，所以他能够这样做。他明白：“将来是子孙的时代”，所以必须谋及子孙，必须以子孙的幸福为标准；他看到“新生活”在面前，他就不顾一切的危险赶上去。这样，他就从急进的民主主义者成了一个优秀的共产主义者。这样，他不但发现了辛苦和饥饿的农民大众，而且也发现了真正能组织起没有吃人社会的先锋队——无产阶级。他和崭新的革命队伍在一起了。

像鲁迅那样丰富的人生经历，像鲁迅那样在文化界上一时无两的才学，像鲁迅那样的名望，像鲁迅那样的年纪，其结果走上的路是无产阶级的路，是由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路，而当他走上这条路的时候，正当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主义者万分苦难的时候，他在共产主义的立场上、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斗争，他和大家一块儿受苦，并且越战越坚强，这不是偶然的，这不是投机的，这是说明了鲁迅战斗的韧性，鲁迅思想的深刻，鲁迅眼光的远大，同时正说明了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真实性及其力量。

鲁迅死了！千百万大众哀悼他的死，愿意继承他的事业，而一提到他的名字，无数的青年和知识分子便会抖擞自己的精神，增加自己战斗的勇气。有些生前对鲁迅及革命青年实行迫害的人，当

鲁迅死后，他们依旧不改其迫害青年的勾当，而对鲁迅之死，却装着“老鼠哭猫”的神气，想来愚弄人们的智慧，这是对于鲁迅的侮辱，而其企图却是徒劳的。

鲁迅死了！但他的奋斗并没有落空，他所奋斗的方向正由同胞们在实际上担戴起来。当他死后不久，在东亚大陆上燃起了民族革命战争的烽火来了。四万万同胞在站起来，为自己生存而流血，他们将获得最后的胜利。中国民族在战斗上将永生，中华人民在战斗上将经过各种必经的阶段，一步一步地摆脱自己的锁链，而这就是鲁迅的不死。

鲁迅死了！他的著作，他的名字，仍在代表着中华民族向全世界映射自己的光辉；他的著作，他的名字，把中国人的战斗精神和全世界人类求光明的战斗精神联结起来，表现了这种战斗的必然胜利。

鲁迅是中国文化的旗帜，是中国文化界实行战斗和团结的旗帜。鲁迅的方向，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所走的道路，是中华民族一切最优秀的、最有骨头的、最有远见的知识分子所必然要走的道路。鲁迅死了，中国革命事业仍是艰巨的，而文化界正需要有第二个鲁迅、第三个鲁迅，以至无数个鲁迅，要他们起来负担鲁迅生时还未完成的事业。鲁迅是我们的先生，然而鲁迅是可学的，只要能和大众在一起，只要能革命，能战斗，只要能不断求进步，能深思，能好学不倦，不自满足，那么，做鲁迅就不难。纪念鲁迅，大家必要能够真挚地这样来学习鲁迅，来创造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并迎着那人类大同最新的文化路前进！

（原载《中国文化》第2卷第2期，1940年10月25日）

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1940.11)

“我参加边区青救会的工作团到农村去工作。我们遇到了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特请你们给解答一下。边区青年运动目前的中心口号是开展民主运动，这是配合整个政治形势而提出的口号。根据这个口号，我们的中心工作之一是进行整个青救会组织的民主改选运动，在我们进行改选运动的时候，我们发生了争执。一种主张是：青救组织预先议定候选名单，再在大会上民主讨论，来保证青运积极分子的当选，他们认为由于边区群众认识程度不够，采取这种办法是民主的。一种主张是：用工作和活动使积极分子为群众所认识，群众自然会在大会上选举他们，这些人即使有的落选也不要紧，这才是民主。积极分子落选，选坏了，也正是教育了群众，使他们以后可以更好的运用民主。在这个问题上，两种主张的人数均等，争论了三四天没有结果。

“在我看来，两种办法所获的结果都是民主的，确实的，但在路线上，后者较好，所以我主张后者。不过在对于问题的认识上，两种意见都犯有片面性的毛病。因为我对于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是这样认识的：什么是民主呢？民主便是全体发表意见，全体讨论问题，民主的作用在于发扬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什么是集中呢？集中便是步骤的确定，事情的决议，集中的使用在于组织民主，主导运动。讨论事情，在达到选举表决的阶段是要集中了(当然是民主的集中)，我以为这种场合集中之中的民主有两种：一

种是当地的民主，选举人的民主，一种是组织上的民主，实际上是多数的民主，是领导方面代表全体的民主（也可说是集中)。前者是当地人民决定当地人选，后者是组织上提出对当地人选的意见，是组织上的保证。两者是对立的统一，不统一便行不通。因为人民不同意任命的人选当然行不通，但当地人选是反革命，组织上不同意也行不通。而现在边区正是组织上的民主太强，以致当地民主不得发展，于是统一物脱节，群众创造性和积极性不够。为今之计，必须加强当地民主的作用，抑制组织上的民主，以期统一。

“前面两派主张只认为自己是对的，而抹煞了对方，所以都是片面的认识，我企图以上面的意见作为我对于这一问题的结论。”（下略）

〔复 信〕

××同志：

你提出的问题是青年组织生活上的民主与集中的关系问题，你的某些意见和不主张用提名单的办法，是对的。但有几点，还需要在这里说明一下：

第一，关于什么是民主问题。中国的革命运动，对内来说，就是要求民主政治的实现，五四以来我们的革命运动就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所以民主不只是边青救的中心口号。所谓民主就是一个集团里的人对于大家公共的有关事情都能够过问，就国家来说，就是全国人民，至少大多数人民都是国家的主人，人民对于国家，不但要能够提出自己的要求，表示自己的意见，而且要有权管理国家的事情，使国家机关施行于他们有利的政策。照这

样来说，所谓民主，就不仅仅在于让群众发表意见讨论问题而已。你说“民主便是全体发表意见，全体讨论问题，民主的作用在于发扬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这是不够的。自然，这也是民主的一方面。但仅是这样，不能成其为真正的民主。因为真正的民主，除了能让群众或者老百姓说话以外，还要让他们能够活动，办事，要能够依他们所希望的来决定行动的方针方法，要能够让他们所真正相信的人来办事情，要能够真正实行他们所希望的一切。

资产阶级国家，也有所谓民主政治，就是设立议会之类的民意机关。然而这些机关，第一，不是真正代表大多数的老百姓；第二，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是和行政机构分开的，他们只是说话的机关，只能说话，不能做事，所以议会有什么主张，行政方面不一定就能够真正施行。所以即使它真能代表民意的机关，也只有发言权而没有执行权，这样的政治不是真正的完全的民主政治。民主集中制，就是要把立法行政合在一起，也就是把说话与作事统一起来，使国家或集团的管理机关能够言行一致，使民意不但能表现出来，而且能够推动实施。

第二，那么，什么是民主集中制？“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怎样？民主集中制，依上面所说，正是真正彻底的民主制度，是真能发挥群众的民主力量的制度。在这里，并不是一方面有民主，而另一方面又有民主以外的集中。“集中”的本身，就是民主的集中，就是群众的共同意志的集中的表现。所以关于集中，你说，集中仅仅是“步骤的确定，事情的决议，集中的作用是在于组织民主，主导运动”。也是只说到一面。群众如果是真正获得了民主的自由，真正的能够过问大家公共的事情，真正能表现和贯彻他们的意志，那么，他们的共同意志，他们的共同要求，就必然可以（而且应该）在思想上，在组织机构上，在集团的实际行动中，集

中的表现出来。那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形下，必然能决定代表大家（至少大多数）的要求的政策方针，必然能选出大家所真正爱戴的人来领导工作，领导机关必然能真正为大家做事情。所以说，民主集中，正是彻底的民主制度，集中就是民主的集中表现。

有人说，民主是手段，集中是目的，我以为这是错误的。我们所要求的既是民主政治，那么我们的目的当然也是真正的民主，而不是其他。更不是与民主相反的“集中”。民主是惟一的基础，集中的机构，必须能反映民主，表现民主。

第三，关于具体应用民主集中的方法，如边青救的选举问题，那当然要看具体情形来说话。不过首先可以讲的一点，就是民主就只是群众的民主，就只是人民的民主，不能把民主硬分做“选举人的民主”和“组织上的民主”。你的信里把组织上的民主解释为“领导方面代表全体的民主”，然而既是代表全体，那么归根结底仍是群众的民主。所以，离开了选举人，离开了群众，说另外还有组织上的民主，那是不对的。因为反动阶级的政治组织，他正是以“我是代表全体”的名义，来反对大多数人的真正民主要求，如现在有些人以“国家的自由”和“民族的自由”为理由，来压迫人民的民主自由，就是有同样意味的。所以，在民主集中制里，有些事情，领导的组织可以代表群众集中来做（或做的多，或做的少，依各种条件而定），然也必须首先根据群众已提出来的要求，也必须考虑到真正能反映群众的要求，也必须以群众的民主要求为基础。

如像选举的问题，组织上是不是可以采取先提名单的方式呢？这就要看情形来讲。这就是要考虑，这样的方式是不是适合于反映当地群众的要求？如果第一，因为选举的环境太复杂，群众自己一时不容易考虑周到，一定需要组织上给与介绍，如一个国家，

一个大地区里的选举；第二，群众自己也赞成这样的方式；第三，群众如不赞成所提的名单，他们有全权可以自己提出另外的名单，不是被强迫保证一定要选已提出来的人，在这样的一些条件下，当然也可以采取提名单的方式（如苏联的最高苏维埃的选举）。否则，提名单的方式就容易形成包办，强迫保证，而不能真正反映民主的意志。

至于边青救的选举，还是如你所主张的，以不提名单，让群众自由选举他们所信任的人为好。这是因为：边区是全国模范的民主地区，我们的选举也应采取模范更自由的方式，其次，边区的群众不是不能辨别谁是自己所信任的人，群众决不至于把汉奸选作自己的领导人。更其次，青年的性质又与其他的群众不同，青年在群众中，是最前进的，他们当然更不至于选举出不良分子来。所以还是自由选举的好，提名单反而是一种束缚，容易使某些狭隘的工作同志走上包办和强迫保证的路上去。

（原载《中国青年》第3卷第1期，1940年11月5日）

自由亡国论

（1940.12）

出版言论的自由，在大后方是愈来愈被限制得厉害了。随着那实践的发展，就产生出一大批反对自由的理论上的英雄。这些英雄们以自由的言论为武器，而向着言论的自由大举进攻，所以阵容是很堂皇的。他们所举的罪名不外是：

第一，自由要不得，自由就是个人自由，而现在只能有民族自由国家自由，所以任何人都不应该有自由；否则就危害国家。

第二，言论自由更要不得，言论一自由，就要有人说不负责的话，使真正负国家责任者处境困难，以至于会误事。

于是，就有一种新的理论产生出来，说自由是足以亡国的，所以不能让人民有自由。这样的理论，不妨叫做“自由亡国论”。

我们的英雄的确不是凭空立论的，还常常要从自己国家的历史上去找例证。言论自由为什么有害呢？因为：

“中国古代多少事被‘言官’误了的。如在明末，清兵在关外非常放肆，而国防工作，非常腐败，袁崇焕、熊廷弼等督师关外，以守为战，而北京方面的言官们，一味谩骂，认熊廷弼与袁崇焕等为卖国，促责他们进攻，结果，袁崇焕与熊廷弼均冤死，而明祚以斩，这些言官，动机或许纯正，爱国或出真诚，然而他们不懂军事之实况，于是使有能的熊廷弼袁崇焕不能发展其能，卒至亡国。”（《民意》第142期，第4页）这不是言论自由亡了国么？

但是，英雄们的说话恐怕是太自由了，所以有的地方竟使人

莫测高深。

明末的中国，似乎绝没有什么卢梭的自由平等之类学说，那些“言官”们恐怕也从来没有听到过什么“个人主义”等等的名词。他们的误国，不知怎的却能够联系到“自由”上来？讲言论自由，在明末的中国怕也更不会存在的，不然为什么只有“言官”们的谩骂而袁熊等人只能“冤死”？说明的亡国，是由于言论自由，那不是很肤浅的学者难于了然么？

如果英雄们肯屈驾来就事论事，抛开那舞文弄墨的玄虚，那么明亡的例子只能作这样平凡的解释:明末并没有言论的自由,而能自由言论的，只是那少数“言官”，他们是官，所以才能自由地“一味谩骂”；多数的人都不是官，所以才只听见言官的谩骂而听不见另外的公道的声音。又熊袁等人虽然是官，却还不是北京的官，挨了骂还是没有回嘴的资格或机会，所以只好冤死。所以，并不是言论自由使明朝亡国，而是“官”们的统制了的自由言论使明朝亡国，亡国并不是由于有言论自由，相反地恰恰是由于没有言论自由。

或者更进一步说，亡国不亡国的原因，并不是抽象地说有没有言论自由的问题，而是要具体地看什么人有言论自由的问题。是少数人的自由言论或多数人的言论自由的问题，是仅仅只有官才能说话，抑或老百姓也能发表意见的问题。前面的历史事例并没有一般地证明言论自由足以亡国，而只证明少数人把持的言论足以亡国。

这就又明白了，亡国不亡国，不是根据于个人自由或国家民族自由的问题，而是谁在国家民族里有自由或谁代表国家民族掌握自由权的问题。如果只有少数专门以“言”为生的官们在国家民族里有自由，只有他们能作为国家民族的代表者说话，而真正

在前线上打敌人的将士们以至于广大民众，却在国家民族里没有自由活动的地位，不但行动要受限制，而且没有作为国家代表者而给自己的行动辩护的权利，那么国家民族就有灭亡的危险。倘若相反，真正抗战的将士们能够得到在国家民族里有自由，最广大的民众能够成为国家的主人，能够提出自己的意见要求，并且推动实行，那么国家民族前途就可以好转，因为这样一来，少数的官就无法跋扈专横，无法谩骂好人，陷害忠良，就无法把国家民族当做私人发财的工具或随便偷着出卖了。

英雄们常常把希特勒作为赞美的对象，把他看做反对自由复兴民族的模范人物，然而他们忘记了“或者看不见”，因为希特勒的独裁政绩下而只有少数金融寡头资本家能够依据贪欲自由活动，所以全个德国的国家民族都被卷人悲惨的掠夺战争里，它所当面着的灭亡危险其实并不比邱吉尔和近卫的国家更好些！

英雄们自然不会赞成这一切太简单明白的道理。自由必亡国，亡国即是因为自由，不管历史事实上有着多么明白的反驳，总之英雄们既已用他们的自由言论的武器这样断定了，所以一切反驳都会是错的！

（原载《中国文化》第2卷第4期，1940年12月25日；署名：崇基）

鲁迅先生早期对于哲学的贡献

(1941.1)

一、时 代 环 境

设想我们是处在鲁迅先生早期生活的时代，处在清末的中国，对于中国民族的前途，我们当要感到更多的危惧和苦恼吧。情形虽然不似今天，没有一个公然要来全部吞灭我们国家的民族敌人，然而事实上周围已站满了贪馋的虎狼，土地已慢慢被蚕食，政治主权与经济命脉，渐渐地已转移到帝国主义者的掌握里，慢性的，肺痨病似的灭亡的危险，不停止地侵润着民族的肌体。而就中国民族的本身来说，又是一个腐木似的衰朽了的古国。暮气沉沉，内部是一片萧条景象，如“入于秋肃，勾萌绝朕，枯槁在前”（《摩罗诗力说》)。本身已是处在死亡的境地前面，而又顽固自大，疾视改革，不求进步，“见善而不思式”，加上外来侵略，自然就毫无抵抗能力了。“有新国林起于西，以其殊异之方术来向，一施吹拂，块然踣傹。”（《文化偏至论》）处在这样愚昧昏暗的时代环境里，一个有觉悟、有热情的战士，会怎样陷于孤立，怎样感到寂寞啊。看得见的敌人表面上似乎并不如今天这么强大，这么残暴，民族发展的路途上，似乎也没有横着今天这样巨大的困难与深刻的苦痛，然而也不如今天这样可以看见全民族的奋起，可以看见光明，可以有充分的胜利信心。具有共同觉悟，共同认识，共同决心的战友是那么稀少，以至于可以说完全无有，光明仅仅是主观的希望，

胜利的把握是非常微弱，而且有时甚至于似乎只有绝望，而如果不肯投降，就不能不在绝望的境地里也要继续战斗下去。这又是多么艰苦卓越的战斗啊！

鲁迅先生早期的生活，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境里度过来的。这样的处境占据了他一二十年的生命，他是不妥协的，他不能不在这样长的时期里进行那寂寞的战斗。寂寞而无所安慰，曾给与他很大的痛苦，实在忍受不住了，他曾尝试过用沉默来抵抗，然而沉默是无济于事的，而且战士的本能也决不甘于沉默，他终于继续战斗下去，一直到1927年以后，才在他的战斗生活上划了一个新的时期。

能说鲁迅先生在早期生活中，完全没有看见过中国民族任何上进的努力么？自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不断地遭受外敌的侵凌，到清末已经过了六十几年，在这样长的期间，能说中国人民始终是麻醉无知，任人宰割而毫不动弹么？不错，中国曾经不断地动弹过，鲁迅先生自然也会曾看见中国民族是怎样动弹过来，会曾看见广大的农民起义如太平天国运动，会曾看见上层的改良运动如曾、李的“洋务运动”以及康梁的戊戌政变。然而这一切都只是动弹而已，只是昏睡中的几次沉闷的呻吟而已，它的作用，只在于排除一定时候的外来刺激烦扰，结果是使睡眠仍旧继续下去，并不曾使中国民族自觉地清醒地站立起来。农民起义是没有方向的，它只暂时实现了原始的民主主义而无力创造新的更高级的中国社会，上层的改良运动是在于修补和保持异民族统治的旧封建关系，而且就是这改良的希望，也在旧封建建筑物的重压下而被粉碎了。这一切运动，都不曾打破了中国社会的黑暗愚昧，都不曾惊醒了中华民族的长期睡梦。

先觉的战士，是善于反省历史的教训的。鲁迅先生批评了当

时许多人的所谓图谋中国富强的主张。这些人或者提倡“兴业振兵”，或者希望“立宪国会”，在鲁迅先生看来，这一切嚣嚣嚷嚷的主张，都只是“抱枝拾叶”的办法，并不是根本的计谋。事实上单纯以“兴业振兵”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在中日战争的试炼中已招来了惨败的结果。“立宪国会”在戊戌政变中只是极短期的幻梦。“有源者日长，逐末者仍立拨”，舍本逐末的办法，终究不能立足。为要使中国民族从衰老黑暗的境地超脱而入于新生的光明，什么是最根本的计谋呢？这是鲁迅先生曾经努力求索解决的问题。

问题是在于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和半封建的长期黑暗的方面，反映在当时一般求改革的“志士”们的身上，这些人以努力改革为名，而实际上是最善于与封建势力妥协，最易于和旧社会同化的。这些人在鲁迅先生眼中所呈现的面貌是：“志行污下，将借新文明之名，以大遂其私欲者乎？”（《文化偏至论》）他们并不真心坚决地抱着挽救民族危亡的远大目的，他们的目的，却在于“假力图富强之名，博志士之誉；即有不幸，宗社为墟，而广有金资，大能温饱，即使怙恃既失，或被虐杀如犹太遗黎，然善自退藏，或不至于身受；纵大祸垂及矣，而幸免者非无人，其人又适为己，则能得温饱又如故也”。“是故今之所谓识时之彦，为按其实，则多数常为盲子，宝赤菽以为玄珠，少数乃为巨奸，垂微饵以冀鲸鲵。”或者是昏暗愚昧，没有任何高尚的理想，或者是狡狯自私的庸俗的物质主义者，这就是当时大多数的谋国志士们的面貌，在外表上是革新的，在内底里却是腐朽的。然而在当时已经算是前进的营垒的人物了，这样的一些人物构成所谓前进的营垒，那不是说领导全民族的广大的革命运动，就是“抱枝拾叶”的改良工作，也不会真的能够做得成功的。

鲁迅先生看见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这些征候，他根据这些征候下了诊断，认为根本的病症，是在于国民性的愚弱，在于民族精神的腐朽。因此，要求根治这民族的病症，挽救中国的危亡，“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呐喊》序)。人的精神根本改造了，其他一切枝叶问题，就自然解决。“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文化偏至论》)

我们不能以现在的立场来责成鲁迅先生，说他不能给中国社会作一个唯物史观的诊断，而却以精神的原因作为历史发展的基础。当时的历史条件，只容许他作这样的诊断而且要达到这样的诊断，在当时已经需要鲁迅先生这样有天才卓识的人的努力了。并且精神的治疗也不是没有一定的效果，一经诊断之后，治疗的努力也就开始，鲁迅先生亲自将这历史的任务担当起来，他抛弃了医学，开始从事于他认为“善于改变精神”的文学工作，他要在文艺中注入民族的“先觉之声”，把中国人民从睡梦中唤醒过来。“有作温煦之音，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在鲁迅先生早期的写作活动中，是遭遇到极大的困难和打击的。庸俗的周围群众谁也不能理解鲁迅先生的创意。并不是鲁迅先生不能够“振臂一呼，应者群集”。而是由于他的提议是超出在时代的前面，没有立刻能号召起广大群众来的条件，“新生”出版计划的失败，使鲁迅先生第一次感到了空前的无聊。然而，援中国出于荒寒的“温煦之音”，也就此从鲁迅先生的作品里发露出来了。虽然是带着寂寞情调的苦味的呼声，却也正是中国民族的“先觉之声”，正是在中国的新时代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号角。就如“华伊斯奇”①的吹角一般：“起自微声，以至洪响，自榆度榆，自槲至槲，渐乃如千万角声，

① “华伊斯奇”，波兰语，意义是“大管家”——编者。

合于一角。”(《摩罗诗力说》)鲁迅先生的改造的呼声，也是由孤寂的微声，渐渐地激起了千千万万的回音，汇合而成巨雷般的全民族自觉的音响的洪流，一直到今天，还不断地在涌现着愈更壮大的浪涛。

一切进步的思想，都是一定时代人类革命斗争的产物，鲁迅先生是在革命的斗争中,创造着他的反映新时代精神的思想系统。鲁迅先生不是一个简单的文艺家，而是一个伟大的启蒙的革命战士，文艺只是他的战斗武器，或者说，文艺是他的战斗的主要武器。通过文艺，他向中国人民传播他在政治上、历史上、哲学上、文艺上等等方面的革命的观点，传播着他的改造民族精神，改造中国文化和社会意识的新思想。他的思想，不是玄学研究的结果，不是纯理论的空谈，而是充满着深厚的，对于民族，对于自由解放的热爱，而是把拯救中国民族的危亡作为实践任务，作为理论推理的出发点，作为对事物的考验的标准和评价的前提。鲁迅先生的思想言论的每一个细胞里，都充满着这一种民族所要求的原形质，这不是主观主义的要求，而是客观真理的反映。因为中国的进步运动，乃是合乎客观历史规律的运动，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革命要求，乃是社会物质发展本身的要求。所以，鲁迅先生的思想言论，不仅仅是充满了革命的热情和理想，而且揭露了许多历史的真理，而这些真理，就是中华民族新精神的思想基础。

鲁迅先生的哲学思想，也是与他的革命精神分不开的。他的哲学思想，是一个战斗的启蒙主义者的世界观，是他的全部斗争生活和他的全部思想系统中一个不可分的关系，因此我们不能不用相当多的字数，在前面对旧的时代环境和思想行动作了一个简略的说明，然后再进入现在所要讨论的本题。

二、辩　证　法

中国民族的危难，是在对外接触的失败中表现出来的。以前闭关独守，自尊自大，以为是世界上惟一最强大最文明的古国，一旦和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接触，却暴露了自己的愚弱无能。万里长城被洋枪洋炮轰破了，几次的血的教训之后，才知道世界上还有更文明更强大的国家的存在，才认识在这些强国包围之下本身的危险。“震于他国之强大，栗然自危。”才知道旧的中国必须改革，否则就会“抱残守阙，以抵于灭亡”。怎样的改革呢？从老朽的中国本身，要找出改革的条件，是不容易的，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向强大的外国学习；学习其所以强大之道，作为自己改革的指南。西方的学术，于是就成为改革者一时风从的规范。“近世人士，稍稍耳新学之语……翻然思变，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掊击旧物，惟恐不力，曰将以革前缪而图富强也。”在这中间，只重表面的摹仿而忽视实际的应用，固然是一般的通病，振兵兴业之说是摹仿西方的方术，然而是“仅眩于当前之物而未得其真谛”（《文化偏至论》）。国会立宪的主张是采取西方的制度，然而是“抱枝拾叶”，不能作根本的改革。虽然如此，西方学术的影响，并不因此就减少了它的重大意义。要求从根本改造民族精神的鲁迅先生，也曾对于西方的学术从事了各方面的广泛的研究，而且他的诊治中国的药方，也是依据这些研究的结果开出来的。

“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自觉之声发，每响必中于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响……故曰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摩罗诗力说》）为着要使中国民族发出自觉之声，鲁迅先生自己努力获取了广博的

“世界识见”他不是如“轻才小慧”之徒，只从一枝一叶上来摹仿西方的方术，而是从西欧的政治、历史、科学、文艺等等全面的研究中引出自己的结论，他也不是对西方方术的单纯的摹仿，而是“首在审己”，依据他所看到的中国民族的病状而采取对症的药方。鲁迅先生遗留给我们的仅少的论文，告诉我们他的思想是包含着多么丰富的历史和文化知识的综合——当我们分析他的初期哲学思想的时候，我们必须记住，这一个世界观，是以相当深邃广博的具体知识做基础的。

近代哲学的发展，常常是一定的科学的重要发现作为思想上的依据。恩格斯曾说科学上每一次的新发现，都使唯物论表现出新的形态。西洋的科学知识，在鲁迅先生早期生活中的中国，就已经在知识分子中间广泛传播了。尤其是进化论的学说，在当时前进的知识分子中间，有着很大的影响。严复的《天演论》的译本，鲁迅先生在出国以前就已经读到了的，进化论的影响之大，不仅因为它在世界范围上也才是不久以前的震动一切的发现，而且在中国来说，也由于民族的灾难的刺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国的民族，在世界上似乎已经成了不适者，将要走到被淘汰的末路上了！这样的推论，对于当时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无疑地引起了很大的激动，提高了他们的警惕心，加强了他们改革的意志，在社会科学尚未传入中国的当时，进化论就成了革命战士的基本的思想武器，就成为开展民族自觉意识的思想上的源泉了，鲁迅先生和当时一般革命战士一样，接受了进化论的思想，而这思想就成为他的哲学世界观的科学基础。鲁迅先生在这一个基础之上建立了他的思想体系，从这思想基础上引申出他们的哲学世界观，他的思想方法和理论观点。

从进化论的源泉里，鲁迅先生所引导出来的哲学思想的洪流

是什么呢？

从思想方法来说，鲁迅先生依据进化论的学说，首先为中国民族提出了发展的历史的观点。进化论在全世界人类思想史上的革命意义，就是在生物学的领域内最后打破了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堡垒。人类并非从来就是万物之灵，而是生物进化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结果，这观点推广到社会的领域上来，自然就成为社会变革的理论根据。自然界，生物界既然是进化发展的，低级的种类既然是依物质的规律可以发展成高级的种族，那么，人类社会也自然是可以进化发展的，自然可以由旧的社会改变而为新的社会。又在自然界的生存竞争中能够争取生存地位的，既然必须是有一定高度的适应能力的有机体，那么，在社会斗争中要能争取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存地位，也就必须要发展、变革，成为适于生存的新的民族国家，这是很自然的逻辑，在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前，这一套由进化论引申出来的逻辑，必然是要求革命者对于保守者进行思想进攻时的最锐利的法宝。封建社会的反动的人们否认人类社会的进步，把自己的祖先崇奉为至高无上的神圣，以此来证明古人的制度的必须永久守护，而痛恶“人心不古”。进化论者却认为人类的子孙必须比祖先更进步，必须不断地革新，才能够适应新的生存环境。反动的人们以夸大自己的祖先为光荣，而以暴露祖先的落后性为耻，他们讥笑进化论者，因为进化论者把猿猴当做自己的祖先；进化论者却把这讥刺回敬给反对者，因为反对者的讥刺正证明他的愚顽和不长进，因为人类能超过自己的祖先并不是耻辱，而正是光荣。“中国迩日，进化之语几成常言，喜新者凭以丽其辞，而笃故者则病侪人类于猕猴，辄沮遏以全力……抱残守阙之辈，耳新声而疾走……虽然，人类进化之说，实未尝渎灵长也，自卑而高，日进无既，斯益见人类之

能，超乎群动，系统何昉，宁足耻乎。”（《人之历史》）由此可见，当时只有“笃故”的“抱残守阙”之辈，才会沮遏进化发展的言论，而有新思想的人，却在自卑至高的生物发展中看出了人类之能，看出世界万物（包括社会）的必然的规律。

既然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是必然的规律，那么，当我们研究任何事物的时候，就必须把它在发展中所处的时间、特点作为依据，才能够获得正确的认识。必须依据事物的不同发展条件来给它以不同的估价，而不能在研究之前放着一个绝对不变的标准。不能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过去，也不能把过去的事物的价值夸大，把一切都看做“古已有之”，没有任何新的东西，这就是研究方法上的发展观点和历史观点。鲁迅先生早期就曾从进化论里引申出了这种观点，并且应用了这样的观点，来研究人类社会以及科学文化的发展史。他研究科学发展的历史，并且告诉我们，以现在进步的眼光看来，古代人类的科学思想是多么幼稚荒谬，然而如果顾虑到古代的历史条件，站在古代人的地位上来设想，那么，仍是当时空前伟大的发现！“其精神则毅然起叩古人所未知，研索天然，不肯止于肤廓，方诸近世，直无优劣之可言。盖世之评一时代历史者，褒贬所加，辄不一致，以当时人文所现，合之近今，得其差池，因生不满。若自设为古之一人，返其旧心，不思近世，平意求索，与之批评，则所论始云不妄，略有思想之士，无不然矣。若据此立言，则希腊学术之隆，为至可褒而不可黜；其他亦然。世有哂神话为迷信，斥古教为谫陋者，胥自迷之徒耳，足悯谏也。盖凡论往古人文，加之轩轾，必取他种人与是相当之时劫，想度其所能至而较量之，决论之出，斯近正耳。”（《科学史教篇》）这样，研究过去，必须设身处地，从过去人的立场上着想。这是历史观点的一方面。而另一方面，近代人对于近代的事物，也就必须有近

代的要求，近代的评价眼光，如果忘记了近代必须有近代应有的进步，把一切都看做古已有之，那就走到另一个反历史观点的极端，错误仍是一样的："惟张皇近世学说，无不本之古人，一切新声，胥为绍述，则意之所执，与蔑古亦相同，盖神思一端，虽古之胜今，非无前例，而学则构思验实，必与时代之进而俱升，古所未知，后无可愧，且亦无庸讳也。"（同上）

鲁迅先生把这历史的方法应用到他的一切研究里，他的几篇早期的论文，对于所处理的每一问题，都回溯到它的过去的历史，都研究它在发展的各阶段上的作用和意义，然后检视它在当前的成果，然后展望将来的发展。在《人的历史》里，他研究了进化论思想本身的发展形成史，在《科学史教篇》研究了西方科学的历史。《摩罗诗力说》是对于浪漫派文学的一部分作横的研究，然而也是站在一定的历史立场上的。特别在《文化偏至论》里，他研究了西洋文化发展的全史，从这研究中总结出文化发展的"偏至"的规律，指出了某些新的倾向在当前发生的必然性，指出了今后文化发展必须依循的方向："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这自然是鲁迅先生自己所认为的应走的方向，它的正确性如何，是另一问题，以下还要论到。单就他的方法本身来说，在中国是有革命意义的，这对于封建社会的保守的思想方法，形而上学的守旧的意识，是彻底的"叛逆"！

然而这只是其一。依据进化论的学说，鲁迅先生又引申出了斗争的绝对性的观点。生存竞争的概念，本来是进化论的一个基本核心，生物之能发展进化，是由于生存竞争，是由于对自然淘汰力量的反抗斗争。和平不能促进进化，如果生物一旦都能和平共处，那么进步也就可以停止了。因此，斗争是依必然的规律而永久存在的，而和平，则至多只能是一时的表面现象，是潜伏状

态的斗争的表现，这一个辩证法的核心，鲁迅先生在他早期的思想中已深刻地把握到了。“平和为物，不见于人间，其强谓之平和者，不过战争方已或未始之时，外状若宁，暗流仍伏，时劫一会，动作始矣。故观之天然，则和风拂林，甘雨润物，似无不以降福祉于人世，然烈火在下，出为地囱，一旦偾兴，万有同坏。其风雨时作，特暂伏之见象，非能永劫安易，如亚当之故家也。人事亦然，衣食家室邦国之争，形现既昭，已不可讳掩，而二士室处，亦有吸呼，于是生颢气之争，强肺者致胜。故杀机之昉，与有生偕；平和之名，等于无有……”

如果我们要写一部中国近代辩证法思想的发展史，那么，鲁迅先生在前面一段话里所表现的思想，应该成为最重要的一章：“平和之名，等于无有”，这样鲜明的斗争意识的表现，从中庸和平的中国民族中间产生出来，这难道不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变吗？这不是启示着中国民族的新纪元的号声吗？在这里，鲁迅先生是代表着新的中国的要求，而与旧中国宣布了营垒分明的战争了。对于和平观念的进攻，即是对于旧中国的痛烈的打击，鲁迅先生指出，中国人的和平观念在客观上是违反现实的规律，而在主观上是表示自己“无希望”，“无上征”，“无努力”。为什么客观上是违反了现实的规律？因为照进化论来说，斗争是绝对的，完全平和无苦无争的太平世界，在现实世界上不可能存在，这种理想，只能成为空想而已。“吾国爱智之士……心神所注，辽远在唐虞，或径入古初，游于人兽杂居之世；谓其万祸不作，人安其天，不为斯世之恶浊阽危，无以生活。其说照人类进化史实，事正背驰。”因此，想要追求这种太平世界，是无用的空想，不但是无用的空想，而且是有害的妄想。生物既然都具有斗争性，具有“杀机”，而且只在斗争中才能发展，如果要遏止它的杀机，消磨它的斗争

性，那就是要违反它的本性，就是要阻碍它的发展，鲁迅先生在这里批评了老子的“无为而治”的理想。“无为而治”固然是“其术善也”，然而在实际上，“奈何星气既凝，人类既出之后，无时无物，不禀杀机，进化或可停，而生物不能返本。使拂逆其前征，势即入于苓落，世界之内，实例至多，一览古国，悉其信证。”所以，要求不“入于苓落”，就不能空作太平世界的妄想，就不应该惧怕斗争。所以，从主观上说来，和平中庸的思想，是不努力，不进步，无希望的表现，原因就在这里。

鲁迅先生既已判定和平无争的思想是不求进步的保守的意识，连带也就认识到了这种思想意识的作用，认识到了它对于旧中国的封建统治关系的意义。在这里，虽然不是明确地，然而已是素朴地触到了社会的阶级斗争的思想了。统治阶级要维持其剥削的统治制度，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够麻痹被剥削阶级的意志，使他们能够安分守位，浑浑沌沌的生活下去。要达到这目的，在思想上的方法，就是要在他们中间散布和平妥协的意识。所以，“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有人撄人，或有人得撄者，为帝大禁，其意在保位，使子孙王千万世，无有底止，故性解（Genius）之出，必竭全力死之。有人撄我，或有能撄人者，为民大禁，其意在安生，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故性解之出，亦必竭全力以死之。”（《摩罗诗力说》）这种思想意识，反映在中国的文学上，就是充满了“颂祝主人，悦媚豪右之作”。要推翻陈腐的旧中国，要创造新的中国，不打破这种奴性的和平思想，是不可能的。反过来说，打破这种有毒的思想，提高斗争的意识，就能够把生活振作起来。“和平之破，人道蒸也。”以此，鲁迅才赞美浪漫主义文学中的“摩罗诗宗”，为摩罗诗宗中的许多人名而“激昂”（《坟》题记）。因为这些诗人，特别是裴伦（Byron），是善于斗争，不与社会的虚

伪的俗众妥协，因为他们的诗中充满着“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人所不愉悦”的“最雄杰伟美”的新声。鲁迅先生又引用了尼采的言语，阐扬了他的许多思想论点，因为这些思想是启示我们去“求方来之泉”，“求新源”，去向旧的传统进行毫不容情的战斗的。

新旧对立的斗争，是事物发展的原动力，这辩证法的真理，是被鲁迅先生的天才的慧眼发现了。既然发展是以对立的斗争为动力，那么，发展的规律，发展过程所采取的形态，也就决定于斗争的情况。为对立的斗争所决定的一个最重要的发展规律，就是向对立方面的转化。既然对立方面是处在互相排斥的斗争的情况里，因此，双方的平衡的共存，就是不可能的。或是甲方处于优势，或是乙方多少占了上风，或是旧的势力成为统治者，或是新的势力把旧的克服推倒。对立的存在，必然是在多少偏于一极的状态中维持着它的相对安定，这相对安定不能继续维持时，就是变革、转化，而变革、转化，就必然是在另一极取得优势的情形之下而实现，这是从对立的斗争性必然地得出来的，事实上也是逻辑上的结论。这就是向对立方面的转化规律。鲁迅先生依着他自己的辩证逻辑的推理，也把握到这一个规律了。《文化偏至论》叙述西洋文化发展史，就是以这一个规律作方法，把向对立的转化，把“偏至”的发展形式，当做必然的规律来看的。“既然以改革为胎，反抗为本，则偏于一极，固理所当然”。

向对立转化的思想，和斗争绝对性的思想一样，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庸主义的发展观，本身就是一个尖锐的对立。中庸主义者把折衷调和看做事物发展的正道，把走极端看做不祥的征象。然而鲁迅先生依据历史的分析，证明事实上并不如此。“人间教育诸科，每不即于中道，甲张则乙弛，乙盛则甲衰，迭代往来，无

有纪极。”一时代有一时代的特殊条件和需要，事物的发展也就不能不依据这条件和需要而有所偏向，平衡不变的中道，在事实上是不可能也不必要，既然发展的过程不必依中道而行，那么，以推动社会发展的前进为职志的革命者，在要求和行动上也就不必时时顾虑到折衷调和的必要，尤其对于旧势力的没落，更不必存丝毫顾惜。而应该一往直前，为新的任务斗争到底。中国的保守主义者，常劝戒青年人勿走极端。以为一走极端，就要破灭。不错，青年人如果一走极端，就预示着什么东西要趋于破灭。然而不一定就是青年自己的破灭，如果他们走的是新的一个极端，那么破灭的正是旧的社会，旧的制度和旧的人群。这就是为什么保守主义者一定要提倡中庸之道，一定要反对走极端。然而对于新的事物新的人类来说，中正调和的打破，正是革旧鼎新的前提，没有人坚持新的一面，勇往直前地迈进，要想开辟新的局面，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

发展的过程是不断地向对立转化的过程，“自卑而高”的向上升涨，是以一极到另一极的形式为其规律。因此，世界发展的总的图画，就不会描绘成直线前进的形式，而是曲曲折折，由一个对立转化为另一对立，不断的一反一复，终于会构成螺旋状的发展图画。“所谓世界不直进，常曲折如螺旋，大波小波，起伏万状，进退久之而达水裔，盖诚言哉。”(《科学史教篇》)——在这里，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也在鲁迅先生的早期思想中有着表现了。否定之否定原是最平常最普遍的规律，是对立斗争所必然形成的世界发展的图画。既然由于对立的斗争，而在发展中不断地引起向对立的转化，那么，在无数次的向对立转化的运动中必然会常常表现出向出发点复归的姿态，表现出否定的再被否定的现象。这是非常自然的事实，也是非常合理的逻辑的结论，没有任

何奇怪神秘的地方。

“一般说来，即使没有反复，没有向出发点的复归，运动和生成也许还是可以存在的，但总之，这样的运动就不会是对立的同一性。不论天文学的运动，机械的（地球的）运动，或动植物及人类的生命——这一切的一切，都不单只在人类的头脑里映出了运动的观念，并且还映进了向出发点复归的运动观念，即辩证法的运动观念。”（列宁：《哲学笔记》）

把列宁这一段话和前面所引鲁迅先生的螺旋发展的观点相对照，可以使我们对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规律获得更自然的、合理的、深刻的认识，为什么我们对于事物发展的认识中，不能没有向出发点复归的观念，因为我们不能没有对立同一性的观念。因为对立的同一性，对立的斗争及其互相转化，即使我们对事物的辩证法认识的核心，那么，向出发点复归的规律，也就会很自然地反映到我们的观念里来了。

然而所谓向出发点的复归，并不等于说历史的发展是绕圈子，是循环的发展，历史没有简单的反复，不会绝对回复到原来的出发点。反复只是外表的现象，事实上发展是螺旋式的，因此在外表的反复中实际是一步一步向前进了。“进退久之而达水裔”，反复多次的结果，终于会达到更高的阶段。而否定之否定律的意义，也就在这里。这不外是说，发展不是直线向上，在这中间也有退后，有逆转，有周折，然而最后的方向，仍是向上的，仍然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世事反复，时势迁流，终乃屹然更兴，蒸蒸以至今日”。这又不外是说，否定、退后、逆转，在发展的一定条件、一定时期，有它的必然性，有它的意义，它不是绝对的退后，而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因素，再从另一方面说，退后逆转并不一定是可怕的，不一定是绝对无希望的表现，它是暂时

的因素，在我们的继续努力斗争中，它终于会被克服，终于会回到向上发展的地位。这就是我们从鲁迅先生的早期思想中可以看出来的否定之否定律的意义。

由以上所说的一切，我们看见，鲁迅先生在进化论的科学思想基础上面，综合着他对于中国和西欧的历史文化的研究，天才地引伸出了辩证法的思想方法，锻炼出了这一个思想斗争的最锐利的武器。辩证法的一切基本原则，虽然只以萌芽的形式，虽然带着自然发生的性质，然而确已全部为他所掌握着了。在他的思想里，辩证法不只是发展了某一点，某一方面，某一原则，而是呈现了整个系统的雏形。这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不用说是有它的重大意义的。这是中华民族自觉精神的核心，是新的中国的灵魂。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太古老了，旧的传统依靠着两千年来的习惯的势力，形成了极坚固的堡垒，中国的旧意识的建筑物是那么强固，以至如果没有最锋利的思想武器，就休想使它动摇。中国的革命是长期的，中国的思想改造也要经过顽强持久的战斗。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到了一百周年关头前面，戊戌的改良失败了，“五四”的文化革命大部分妥协了，只在物质上有了无产阶级的党与在精神上有了马克思主义以后，旧中国的建筑物才开始根本动摇起来。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然而鲁迅先生在早期已经把握了辩证法的革命思想方法，就这一点来说，处在旧民主革命时代的当时的他，可以说已经是民主主义文化的先驱者了。当时他确不是简单的一般的旧民主主义者，他在某些方面，是超出在他的时代的一切人们的前面，他是位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他在1927 年以前所以始终是处于一个寂寞的孤立的战士的地位，原因也就在这里。

我们还可以由鲁迅先生早期的哲学证明，许多人说马克思主

义和辩证法唯物论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是多么谬误的思想。鲁迅先生在与中国旧文化斗争的过程中，即已发现了辩证法的真理，那就是说，在中国的国土上，在中国社会的前进运动中，已产生自己民族的辩证法的思想。辩证法之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它之成为新的中国所需要的思想，也在这里有了事实上的证明了。中国不需辩证法，这只是就过去了的旧中国而言，只是就保守的反革命的人群而言，在他们的立场上，新的思想方法自然是不需要的。因为他们的目的是要为中国也为他们自已造坟墓，对于自愿做死尸的人们，辩证法也许真是不适合的。然而可惜，求生存是人的本能，中国社会是不要没落，中国民族是不要灭亡的。中国人民要求中国的进步，要求新的中国，然而要建立新的中国，是必然要有一个前提：推翻旧中国的一切物质和意识的陈旧的建筑物。这样，辩证法的思想就是必要的，鲁迅先生的发现，就是伟大的。而一直到今天还企图保守复古的人们，他们的旧思想，将和他们腐臭的肉体一样，不管眼前是如何猖獗，迟早将会被中国的新人民铲除、抛弃，投到历史的垃圾堆里，一同为革命的火焰所焚毁。

三、唯物论与理想主义

进化论在鲁迅先生的思想里不仅仅展开为辩证法的方法，而且也提供了对于自然界的唯物论的理解。既然生物是依循着进化的过程，由低级以至高级，由简单达到复杂，今天的高级动物，不过是昨天的低级动物转化而来，万物之灵的人类，不过是比较不灵的生物的后代。这样回溯下去，追究起最简单最低级的原生物的发生原因时，必然可能是由无生物所转化，有生物与无生物，有灵性的与无灵性的，都是同一物质世界发展的不同阶段的表现，一

切都是依物质规律而出现的自然物——这是由进化论必然要得到的结论。因此，过去的进化论者，自然地同时也就是唯物论者。例如发现“用进废退”和“习得性遗传”说的兰麻克（Lamarck），鲁迅先生就曾转述了他的唯物论思想：“其言曰：凡在地球之上，无间有生无生，决无差别，空间凡有，悉归于一，故支配非官品之原因，亦即支配有官品之原因，而吾党所执以治非官品者，亦即治有官品之涂术。盖世所谓生，仅力学的现象而已，动植诸物，与人类同，无不能诠解以自然之律。”恩格斯说世界的统一是在于物质性，这是唯物论的基本见解。兰麻克的思想，是如他当时一般的唯物论者一样，表现为一种机械论，“以机械之作用进动物于高等”。然而理解到了有生与无生的统一，理解到它们都能“诠解以自然之律”，这一个唯物论的理解，无疑已为鲁迅先生所接受。他在论生物的起源的问题上，明白表示是承认有生与无生的统一的：“故论人类从出，为物至卑，曰原生动物。原生动物出自穆那罗，穆那罗出自泼罗比翁（Probion），泼罗比翁，原生物也。若更究原生物由来，则以那格黎（Naegeli）氏说为近理。其说曰：有生始于无生，盖质力不灭律所生之成果耳；若物质全界，无不由因果而成，宇宙间现象，亦遵此律。则成于非官品之质，且终转化而为非官品之官品，究其本始，亦为非官品必矣。”

但鲁迅先生早期的唯物论思想，不能不有他的历史的限制。既然是以一种特殊的自然科学，进化论学说为基础，因此，它的正确理解，也就只能限制在自然界的范围以内，而不能彻底扩张到社会的领域。社会虽然也依必然的物质规律而运动，但这规律却不同于自然的规律。人类社会中虽然也有物质的竞争，然而却不等于生物界的生存竞争。社会发展有它自身特殊的规律，进化论的规律，是不可能在这里机械地简单引用的。鲁迅先生以进化思

想作理解的基本原理，但在解释人类历史时，他也不曾简单地应用生存竞争的原理，凭着他的卓越的具体理解事物的能力，他不能不找出社会发展中的一些特殊的现象。他要把握这一些现象的根本规律，必须依据唯物史观，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中去找基础。这在鲁迅先生早期的时候，是做不到的。中国的社会条件还没有成熟到这样的程度，从而中国对于西欧思想的接受，也还没有达到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程度。因此，当说明社会历史现象的发展时，就不能完全反映出它的物质的规律的本来面目，而必须作一些唯心论的附加。这样，鲁迅先生早期对于世界的理解，就不能完全超出旧唯物论的范围，而与旧唯物论一样，在社会的理解上成为唯心论者了。

《文化偏至论》论文化发展的历史，就是把人类思想意识的自动的辩证发展作为理论的骨干的。例如论宗教改革的原因，不是从封建社会中的新的物质条件——资本主义的生长来说明，而是从思想的被压制和思想的反抗关系来说明。“罗马统一欧洲以来，始生大洲通有之历史，已而教皇以其权力，制御全欧……益以梏亡人心，思想之自由几绝，聪明英特之士，虽摘发新理，怀抱新见，而束于教令，胥缄口结舌而不敢言。虽然，民如大波，受沮益浩，则于是始思脱宗教之系缚，英德二国，不平者多，法皇宫廷，实为怨府，又以居于意也，乃并意大利人而疾之。林林之民，咸致同情于不平者，凡有阻泥教旨，抗拒法皇，无间是非，辄与赞和。”这样，思想压制和要求“思索自由”，被看做是人民起来推翻封建统治的根本动力，诸国唯物论者把社会发展的原因归结到理性的抬头，在理解的本质上与这是一样的。

鲁迅先生为中国民族所开的药方，就是精神的药方。要改变中国，不是从物质着手，而是先要改变精神。用什么来改造中国

人的精神呢？鲁迅先生最初从事科学，以为发展科学也是根本改变中国的一法。从事科学研究，是比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改革更重要的，虽然并不是要完全抛弃了或忽略了后者："非谓人必以科学为先务，待其结果之成，始以振兵兴业也，特信进步有序，蔓衍有源，虑举国惟枝叶之求，而无一二士寻其本，则有源者日长，逐末者仍立拨耳。"科学发展了，那么"兴业振兵"也就不成问题，它的作用，是比任何政治军事上的英雄伟人的出现更为重大的。"故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动。时泰，则为人性之光；时危，则由其灵感，生整理者如加尔诺，生强者强于拿破仑之战将云。"（《科学史教篇》）然而，鲁迅先生又觉到了科学的缺点，那就是只崇尚知识，偏于一面，而科学发展的结果，也不过只能增加人类的物质财富，而不能把人民提到最高尚的精神的境界，虽然不能否认科学家本身也有他们自己的高尚的精神做基础。"故科学者，必常恬淡，常逊让，有理想，有圣觉"（同上）。医学可以使人体魄强健，但如果没有新的精神，对于改造也是无用的。——这是鲁迅先生看了中国人被斩首示众的电影时所作的结论。"盖使举世惟知识是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同上）因此，科学还不是改造中国的最根本的工具，而最根本的工具，鲁迅先生认为是文学。"故人群所当希冀要求者，不惟奈端已也，亦希诗人如狭士丕尔（Shakespeare）；不惟波耳，亦希画师如洛菲罗（Raphaelo）；既有康德，亦必有乐人如培得诃芬（Beethoven）；既有达尔文，亦必有文人如嘉来尔（Carlyle）。凡此者，告所以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见今日之文明者也。"鲁迅先生既认为中国最缺乏的是新的精神，因此就抛弃医学，而从事于文艺了。

唯心论是人类思想之树上结出来的空花，它不能恰如其实地全面地反映现实，而只是抓着某一面而且对于它给以夸大的以至于错误的表象。既然鲁迅先生早期曾在唯心论的立场上来解释历史，那就不能讳言他的解释中也就有时表现出唯心论所必然带来的弱点。不是依据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上来分析社会意识的发展，不能把握意识形态的阶级对立的基础，因此，虽然有时也天才地透露出对于文化的阶级性的理解的萌芽（特别是中国旧文化对于中国的旧封建统治阶级的关系的认识），然而基本上，却是抽象地来看文化发展史的。这就是常常把一定时代的文化现象看做是这一时代人类精神的总的表现，而不能把它看做一定的阶级意识的表现。于是就会把反动的支配阶级的意识，也看做是代表时代的合理的意识。例如对于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的看法，就是这样的："盖中世宗教暴起，压抑科学，事或足以震惊，而社会精神，乃于此不无洗涤，熏染陶冶，亦胎嘉肥。二千年来，其色益显，或为路往，或为克灵威尔，为弥耳敦，为华盛顿，为嘉来勒，后世瞻思其业，将孰谓之不伟欤。……盖无间教宗学术，美艺文章，均人间曼衍之要旨，定其孰要，今兹未能。"中世纪基督教是反动封建统治阶级的最大的精神工具，它与欧洲新的资本主义文化曾是势不两立的敌人。不推翻宗教统治，就没有近代欧洲文化，而现在却认为新文化也渊源于宗教精神，这不能不说是唯心论的夸大。这种夸大，也表现于鲁迅先生对世纪末时代的文化思想的看法。资本主义的腐朽过程中的意识表现，如叔本华、尼采的哲学，也被看做世界的新的精神的代表。

然而这只是就今天的观点来批评过去的思想，单单这样，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如鲁迅先生自己的历史方法所示，依据这种思想在过去所以产生的条件，来理解它的时代意义。早期的鲁迅

先生，是生活在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不用说他是当时最彻底的、急进的民主主义者，但无论如何，他不能完全超过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条件的限制。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善于妥协，固然使鲁迅先生在前进中感到了寂寞，他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意识，使他要求跳出这妥协软弱的人群，然而在当时中国的政治历史舞台上，却还看不见新的更进步的人群。无产阶级还没有抬起头来。不能够在当前的物质生活条件中看出彻底前进的力量，又不能与无前途的现实的人群妥协，那就只有在个人的主观的理想中，寻求光明的希望。鲁迅先生初期的唯心论、理想主义（《神思宗》），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原是包含着这一种反抗的动机在内的，虽然同时也就反映了这种反抗的弱点，反映了对于现实革命之无力的资产阶级的弱点。

唯心论在本质上是保守的，由于它的夸大性，它在客观上常常便利反动阶级作麻醉人民的工具。然而它的产生的动机，在主观上却不一定都是由反动的立场出发的。鲁迅先生为中国人民所开的精神的药方，包含着提倡理想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两大要素——“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这是他依据对于世界文化发展历史的刻苦研究而得到的成果。他由于对尼采、易卜生等人的思想的研究，而认为理想主义与个人主义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新方向，同时认为中国的发展也必须依循着这样的方向。他从尼采、易卜生等人的思想中采取了这些因素，构成他所自信的中国需要的药方。试一研究尼采和易卜生的思想，我们能说是直接简单地产生于没落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动机吗？他们生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前夜而看不见无产阶级的力量，他们在现实社会中已具有着新世界产生的条件时而看不见这些条件，这里就有他们思想的反动性。他们的理想主义，成为反动阶级对被剥削者宣

传禁欲主义的理论根据，他们的个人主义成为法西斯蒂专制主义的先声，这是他们的思想在客观上所表现的反动的作用。然而在主观的动机上来说，这些思想含有一些消极的反抗意义。理想主义曾是对于没落时代寄生的资产阶级的、庸俗腐化的物质主义的暴露，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曾是对于那借多数的名义来操纵社会生活的、资产阶级的虚伪民主的抗议。易卜生的《国民公敌》，就是抗议虚伪民主的最典型的例子。“掊物质而张灵明”，不应该是对唯物论的反驳，而只是反对庸俗的物质主义，“任个人而排众数”，不足以攻破真正的民主，而只是对于能够任人自由发展个性的真正民主世界的素朴的原始希望。虽然由于唯心论的夸大，由反对物质主义而至于轻视物质条件，由抗议虚伪民主而至于否认一切民主，于是转化成了金融寡头统治者的思想工具，然而这些思想的产生，最初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世纪末社会现状的不满，由于他们对现社会的病态的批评指摘以至于对将来的希望（自然是空想的）。这些思想的消极的意义，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乃亦以见末叶人民之弱点，盖往之文明流弊，浸灌性灵，众庶于残弱颓靡，日益以甚，渐乃反观诸已，为之然，于是刻意求意力之人，冀倚为将来之柱石。此正犹洪水横流，自将灭顶，乃神驰彼岸，出全力以呼善没者耳，悲夫！”

鲁迅先生在早期所处的环境，和西欧的理想主义者自然不同。后者是在资本主义将近没落的时代，前者却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夜。然而有类似的方面，那就是鲁迅先生和西欧的理想主义者同样，在自己的周围所见的，都是一些庸俗愚昧的群众。生活的境界是浅薄、狭隘、无理想、无进步，在社会活动上不是随波逐流，任人摆布，就是奸谋权变、投机取巧。只有个人的私欲，而

对于民族国家却没有真正的关心。这些市侩主义者，他们也挂革命的招牌，提倡民主，主张革新。实际上不过是想“假是空名，遂其私欲”，所以主张多数，民主，目的不外要“见异己者兴，必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文化偏至论》）。鲁迅先生当年所见的，大都就是这样的一些人群，这些人群的存在，对于中国革命不但没有任何好处，而且害处更多。因为，“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究何与焉”（同上）。——这几句话，可以看做民国以后军阀割据，连年内战的形势的预言。

处在这样的环境而又未曾看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现实力量，在这种情形下，一个急进的民主主义者只能依据主观的理想来考究治疗的药方，这是必然的。现实是无望的，所以只有坚持理想，群众是庸俗的，所以要提高有“意力”的个人，虽然这唯心论的夸大强调，结果有滑入英雄崇拜主义的泥坑里去的危险，然而就其发生的动机来说，乃是对于旧民主主义的不彻底性的抗议，是对于周围的庸俗群众的不妥协的战斗表示。在唯心论的圈子内，这抗议和战斗就是无力的，是寂寞而且徒然的，然而能坚持着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就可以为更向前进一步的机会而不至于“苓落”，这样的人，在未看见现实的前进力量的时候，自然始终只能停止在理想主义者的范围之内，然而当他看见了那样的力量时，只要他还要坚持战斗下去，他就可以抛弃空想而成为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崇高的理想主义者或伟大的唯心论者，有时是比庸俗的唯物论者更接近于真正的唯物论者，更易于成为真正的唯物论者，这在历史上是并不缺乏例子的。就现代来说，法国的巴比塞和罗曼·罗兰，就是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走向唯物论的辉煌的例子。“五四”以后鲁迅先生之所以终于能够走到辩证法唯

物论的方面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正是由于他坚持着崇高的个人的理想而不肯与庸众妥协的缘故，也正是由于他在战斗中看见了真正民主的现实力量（不是借多数以压制别人，而是以创造多数人和全社会的友爱合作自由发展的高级社会为目的，以争取一切人能以同志关系相待而又不妨碍相互的个性发展的合理社会为目的的现实力量）——即无产阶级力量的缘故。

（曾收入《鲁迅研究丛刊》第一辑，鲁迅文艺社 1941 年 1 月版，以及《艾思奇文集》第一卷）

关于辩证法论理学认识论的一致性

(1941.2)

一

列宁在哲学问题上清楚指出了“辩证法、论理学、认识论的一致性”。强调这一个命题，并且从各方面更具体地发挥了这命题，乃是列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主要点。列宁依据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经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学说，从各方面各部门给马克思主义补充了许多新的论点。列宁也依据了同样的革命斗争经验，并且综合了当时自然科学的新的成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世界观——辩证法唯物论的哲学。

列宁关于哲学的最大的专门巨著——《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是为着反对那些企图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们——经验批判主义者——而写的。经验批判论是以一种唯心论的认识论为基础的反动哲学思想，当时俄国的经验批判论者，想用这种唯心论的哲学来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基础，想用它来代替辩证法唯物论。经验批判论者的出现，是有它的历史条件的：

第一，经验批判论的出现，一方面是表现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过去参加革命的一小部分人的悲观失望情绪和思想动摇，另一方面是反映当时反革命势力的思想上的进攻。在革命汹涌高涨的时期，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跑进革命队伍的同路人，经

不起革命失败的打击，在他们中间就产生了动摇与分化的现象，他们中间一部分人离开了革命，而去迁就反动势力，反动势力也就乘机利用他们，向革命势力进一步进攻。这种情形反映在思想上，就出现了“批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热潮。

“一大群时髦的作家出现了，他们实行‘批评’和谴责马克思主义……在哲学方面，‘批评’、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企图，已经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已成为时髦的货色。”（《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经验批判论的出现，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想对马克思主义加以“批评”、修正的一种企图。

第二，经验批判论的出现，是由于资产阶级哲学家（马赫等人）利用和曲解了一些新的自然科学发现的结果。新的自然科学发现动摇了自然科学上旧的物质观，于是资产阶级的学者就趁机来向唯物论进攻，不说旧的物质观不能成立了，却一般地说“物质消灭了”，他们利用这冒牌的“科学”论据，建立起一种唯心论的认识论学说，建立起“新”的唯心论的哲学。

俄国的经验批判论者，就是接受了这种资产阶级的反动学说——马赫主义，并根据这种学说，想从认识论的基础上来“批评”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的。

因此，列宁就写了《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一书，来反对这种思想上的堕落，反对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修正，因此，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就是针对着这些冒牌“科学”思想的根源，综合了新的自然科学发现的成果，进一步发展了辩证法唯物论的哲学。

但是，冒牌“科学”的唯心论思想，并不仅仅限于马赫主义的派别，而是当时资产阶级哲学的一般倾向。当时一切的资产阶

级哲学者，虽然有种种不同的派别，然而利用某些自然科学的成果，来建立某种唯心论的认识论，并且据此来向唯物论进攻——这却是他们一致的共同点。例如新康德主义以及新休谟主义之类，就是这样的东西。

仅用资产阶级的新的唯心论学说，从认识论上来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也不仅只限于俄国的经验批判论，而是当时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们的共同的伎俩。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就是要用新康德主义来代替辩证法唯物论，而考茨基虽然表面上并不赞同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然而在哲学这一方面的修正，却曾表示不必加以反对。

马克思恩格斯建立了辩证法唯物论的世界观，并用这种世界观来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现象。在自然和社会的研究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曾留下了丰富的劳绩，提供了辩证法唯物论的具体运用的辉煌范例。在认识论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也已奠定了基本的观点，在他们的一切研究中，就是以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做基础，正如列宁所说，“在《资本论》里，论理学、辩证法及唯物论的认识论是应用在一个学科里了”。但马克思恩格斯却还没有更专门地更详细地来发挥认识论，这一点，就使修正主义者像老鼠似的找到了藏身的空隙，就使他们从认识论这一方面来偷偷噬啮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以为资产阶级的思想进攻作内应工作。

因此，不仅是为了对付经验批判主义者，而且为了对付当时一切资产阶级的思想进攻，对付一切修正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破坏活动，列宁都需要在认识论方面来进一步发展辩证法唯物论，需要把马克思恩格斯已奠定了的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更详细地加以具体发挥，因此列宁不但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里，

而且在《哲学笔记》里（尤其是关于黑格尔论理学的笔记）与其他许多著作里，都用了最多的注意力来提出和解决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问题。列宁对于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在各方面都发展了许多宝贵的新论点，其中对于认识论方面，更有着最有系统的、最多的发挥。

从认识论方面发展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列宁时代在哲学上的中心任务，列宁完成这一任务所表现的基本思想，就在于明确地强调提出：辩证法、论理学、认识论的一致性，就在于有系统地具体发挥了这一个基本思想。

二

什么叫做辩证法、论理学、认识论的一致呢？

这就是说，客观世界发展的、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也就是人类的思想和认识发展的基本规律。辩证法的本身，是关于世界一切事物的最普遍的发展规律的学问，即是如恩格斯所说的，它是“论自然、人类、和思维之运动和发展的一般法则”的学说。

辩证法的规律是一般地适合于自然，适合于社会，也适合于人类的思想认识的。虽然我们要说，自然的发展规律，并不等于社会的发展规律，社会的发展规律也与思想认识的发展规律有差异，自然、社会、人类的思想认识，在发展中各有其特殊性，不能完全混为一谈，然而它们中间，不论有如何差异，都是辩证法的。所以，辩证法的规律，基本上也就是人类的思想（论理活动）认识发展的规律，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辩证法和论理学、认识论有一致性，这是一。

因此，要研究人类的思想和认识的具体规律，就必须用辩证法的方法来处理问题。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既然是世界一切事物的

普遍规律，我们把握了这些规律，就可以反过来把它作为我们研究一切事物的指南。它首先是“对自然界现象的观察方法”，是“用以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进一步加以推广，它又可以作为“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的方法。同样，对于人类的思想认识，也要应用辩证法的方法去研究。

思想认识不是永久不变的东西，它和一切事物一样，是不断地变化发展的过程。所谓用辩证法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的认识和思想，就在于要把所研究的对象看做永久发展变化的东西，就在于把思想认识都看做运动的过程，辩证法的论理学或认识论，就在于用辩证法去把握思想认识的运动发展规律，正如列宁所说：“在马克思看来，以及在黑格尔看来，辩证法却包括着现在的所谓认识论；这个认识论一样地应该用历史眼光来观察自己的对象，研究并归纳认识的起源和发展，从不认识到认识的过渡。”（《卡尔·马克思》）

资产阶级的学者们从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研究人类思想认识的问题，把论理学和认识论分成两个不相干的部门。把认识论规定做研究认识的根源和可能性的学说，而把论理学规定为研究思想的形式及其形式的互相关系的规律的学说。他们在认识论里要求解答的问题是，什么是认识的不变的惟一根源？我们依据这根源能够认识客观事物的绝对不变的真理吗？还是完全不可能？至于认识的进步发展，他们是不问的。他们在论理学里所要解答的问题只是：什么是各种思想形式（概念、判断、推理）中间的绝对合理的关系？至于这些思想形式是否客观事物的反映，并如何反映，他们也不问的。

辩证法的认识论不是要问认识的绝对不变的根源，和认识绝对不变的真理的可能不可能的问题。辩证法唯物论的认识论所要

研究的是认识怎样发生、发展，怎样一步一步更深入更完全地把握客观事物的真理？辩证法唯物论的论理学不研究空洞的思想的形式，而是要研究人类思想的进步发展的规律，研究思想怎样随着人的认识的进步而成为反映客观事物真理的更深刻而更完全的思想。所以，思想的发展，是在认识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或者可以说，思想的发展也就是认识的发展，因此思想的发展规律，思想的各种形式中间的关系，也不外就是认识发展的规律，也就是客观事物在我们的主观意识中的各种反映过程中间的关系。因此，论理学说不只是研究思想形式的学问，也是研究认识发展规律的学问，也是研究客观事物在主观意识里的反映过程的学问。因此，用不着在论理学之外再有另外的认识论，论理学就是认识论。

而这样的认识论或论理学，是要在辩证法的向导之下去进行研究的，它所要把握的规律，就是辩证的认识发展规律。在这样的意义上，就有着辩证法、论理学、认识论的同一性，这是二。

我们的认识论的研究，目的就在于要把握这辩证的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

三

在辩证法唯物论的立场上，对于认识有这样的一些基本的理解：

认识并不是在物质之外独立存在的、精神的自动活动，相反地，认识乃是一种物质的作用，是一种物质的属性表现，或简单的说，是一种物质的反映。一切物质都有反映的属性，任何一件事物，当它与其他的事物发生相互关系的时候，它一定表现出某种作用，而这作用，就是它对于与它相关系的事物的反映。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相互关系，有着不同的反映形式，世界上的物

质现象是无限地多种多样的，因此物质与物质间所能表现的反映，也是无限地多种多样的。说到认识，不外就是这多种多样的物质反映之一种。

因此，不能把认识看做物质之外的精神的独立活动，认识只是物质运动之一种表现，认识是反映，而“一切物质，在本质上都有着类似于感觉的性质，即反映的性质”(列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辩证法唯物论不该把认识的作用和一般物质的作用绝对分开，只有唯心论者，才会主张认识和一切物质的作用绝对不同。认识的运动，与自然界的运动一样，是客观的物质的运动，认识的发展规律，也与自然界的规律一样，是客观的事物发展的规律。

因此，对于认识的研究，就成为一种科学的研究。正如自然科学的研究，是为着要把握自然界的、客观的必然规律，认识的研究也是为着要把握人类的认识和思想发展的、客观的必然规律。资产阶级的唯心论者，以为人类的思想认识是完全受自由意志的推动，以为思想认识的运动不依据任何自然的规律，因此他们对于认识论和论理学，看做只是研究“规范法则”的学问，而不是研究必然法则的科学，这是非常错误的了解！

认识的运动，在本质上也是物质的运动，这是辩证法唯物论对于认识的第一个基本的理解。

然而认识的运动并不仅仅是一般的物质的运动。把它从一切物质运动绝对地分离开来是不对的，但把它看做是与一切其他物质的运动毫无分别的东西，那又是另一个错误。不同的事物的联系有不同的作用，随着物质现象的多种多样，它们在相互关系中的反映也是多种多样的。每一种事物的作用，每一种事物的反映，都有它自己的特殊性，而与其他事物的作用或反映不同。为要能够具体地正确把握客观事物的运动，辩证法唯物论要求在事物的

一般了解之外，更要能把握事物的特殊性。对于认识，在一般地确定它在本质上是物质的运动之外，我们还要研究它的异于其他物质运动的特殊形式，要研究它本身的特殊的运动规律。

认识的作用，与其他物质的作用有什么不同呢？

认识的作用，与其他物质的作用，首先有高级和低级的分别，认识是发展到一定高级阶段的物质属性的表现，是高级物质的反映形式。认识的作用，只存在于高级的有机体中间，而且只在人类中间，才获得了最高的发展。在人类以及某些高级有机动物之外，只有一般的反映作用，而那些反映作用，都不会成为认识的事实。

认识的作用与其他物质的反映作用之间的高级和低级的分别，不仅是在于量的方面，而且是在于质的方面，它们中间并不只是有程度的差别，而且有本质的差别，认识作用的特点，系在于有主观意识的存在。认识的物质（人类、较高等的动物）与其他事物接触的时候，其反映作用就表现为主观和客观的相互作用。主观是作为认识的主体，而与客观对立着。主观与客观的对立，和主观对于客观的认识，是互相作用的，主观与客观世界的对立意识愈明显，则对于客观的认识也愈清楚，人在睡觉的时候，主观与客观对立的意识朦胧了，同时认识也朦胧了。这一种集中的、与客观事物对立的主观意识，在认识物质以外的事物中，是不存在的。这就是认识的反映作用和其他事物的反映作用的质的基本差别。

认识作用的特点，不仅在于主观意识的存在，而且还在于能够以主观的形式来认识客观事物，来反映客观事物，或者说，来摹写客观事物。普通的物质对于其他事物只能一般地表现其相互制约和相互依赖的关系，但不能把其他事物的真相，用主观的形

式描摹出来。“观念界不外是移植在并翻译在人脑中的物质界。”(《资本论》)认识的内容，不外是客观事物在主观意识里的“移植”和“翻译”。什么是这客观事物被移植和被翻译时所表现的形式？什么是认识用以反映或摹写客观事物的主观形式？基本上有两种：感觉和思维。人的主观意识，就是由感觉和思维的形式所构成，就是用感觉和思维的形式去认识外物，反映外物，摹写外物。认识作用的表现，并不是把外物直接搬到人的头脑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而是在认识主体接触外物的时候，发生感觉和思维的活动，经过感觉和思维的活动去把握所要认识的对象。

感觉和思维中间也有着等级的和质的差别，思维的活动，是比感觉更高一级的认识形式。人类以外的高等动物，都有感觉的认识，然而基本上都不能超过感觉认识的范围，而进到思维的认识。高等动物至多只有思维认识的萌芽，只有人类，才能在感觉的认识形式之外，更有思维的认识。

人类之所以能比动物有着更高级的认识，是因为人类有着更高级的物质生活条件。人类的物质生活发展规律不同于动物的物质生活发展规律，因此人类的认识发展规律，也不同于动物的认识发展规律。动物的生活是自然的生活，它只依据着自然条件和本身的生理条件来维持自己的存在。动物的存在和发展，是受着生存竞争、自然淘汰的规律的支配，而动物的感觉认识，也是在生存竞争中受锻炼，在自然淘汰的制约之下发展着的。感觉器官要适合于生存，这是动物生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条件。自然淘汰使动物具备了最适合于它自己生存的感觉器官，因此也使它具备着最适合于生存的感觉认识。鹰的锐利的眼，某些兽类的极敏感的听觉和嗅觉，都是与它们的自然的生存条件分不开的。也正因此，动物的认识就只能限于这与生存条件分不开的感觉的认识。

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却不是仅仅依靠自然的生理器官的活动，而是通过一种人为的器官，通过工具去进行的生产活动。生产是人类生活发展的最根本的物质基础，也就是人类认识发展的最根本的基础。生产活动有两个方面：在生产中人对于自然界的关系，人从自然界取得物质生活资料的活动，是生产力方面的活动，在生产中人与人相互间的关系，生产手段和生产物的所有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方面。生产是把人和人结合在一定的关系之下的社会的生产。在社会生产的实践中，人不仅仅要依赖自然的感觉器官的认识去行动，而且要依赖于事物的各方面的规律的知识。依据对自然的规律的认识，才能够制造工具，改变自然，取得生活资料；依据社会的规律的认识，才能正确地组织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才能改变社会。而认识要把握事物的各方面发展规律，就不能不提高到思维的认识。

因此，人类的认识，是在感觉的基础上，更发展了思维。人类的认识，不被限制于生理的感觉器官，而是受着社会的生产实践的制约，不同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准，制约着不同的认识发展的水准，在同一社会内，人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那么，他们的思想认识也就不同。

这就是辩证法唯物论对于认识运动的一些基本的理解。

四

怎样从辩证法的立场上来研究人类认识的发展规律呢？

人类的认识，都是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的认识，都是以人们的一定的社会历史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认识是实践的一个不可分的因素，认识从实践中产生，它本身的作用也就在于要指导实践，推动实践向前发展。这就是说，认识是服从于实践的任务，因此

它就受到实践的制约。辩证法的认识论的第一个要点，就在于要研究每一种思想，每一种认识所由产生的历史条件，研究它们的实践基础。

人类社会的实践是以生产为基础，而生产的两个方面，都对于认识的发展给予一定的制约。辩证法的认识论必须一方面依据生产力发展的水准来研究思想认识的发展。即是如恩格斯所说："人底理性按着他的能改变自然的程度而发展。"(《自然辩证法》)辩证法的认识在另一方面必须从生产关系的基础来观察某种思想认识的存在，必须分析这种思想认识的阶级基础，即是如列宁在批判经验批判论者时所说的："在经验批判主义认识论的烦琐哲学后面，不可不看出各党在哲学方面的斗争，这个斗争，归根到底说来，就是表现着现社会里各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系统。"

这就是说，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要从一定的客观物质条件上来观察某种思想认识的发生和发展，把握这种发生和发展的必然规律性，而不是如形而上学一样，把任何思想认识的出现都看做凭空而来的偶然的东西；不是离开一切物质条件仅仅就思想认识本身去研究它的合理和不合理。落后的旧的思想，在新的先进的社会人们看来是不合理的，然而在落后的旧的社会里却有它的发生发展的必然性，这是第一。

第二，人类的思想认识，是向前运动的过程，是革新和发展的过程。在人类中间不断地可以看见新生的进步的思想认识的出现，也不断地可以看见某些思想成为落后的陈腐了的东西。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不是要如形而上学那样，把人类思想认识看做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相反地，要研究思想认识的这种前进运动，研究新的思想认识怎样产生，而旧的思想认识怎样地没落，研究我们怎样才可以把握进步的正确的思想认识，而不至于陷入在旧的

落后的思想认识范围里。

思想认识的发展，是以人的实践的发展为基础，是以社会生活的物质条件的发展为基础。旧的没落的思想认识，表现着旧的没落者的实践立场，新的进步的思想认识，是从新的进步的社会生活条件上发生的。任何一种思想认识，当它表现着一定新的进步的实践立场时，它是新的、进步的思想，是必然的、适合客观需要的合理思想，当这种实践立场在另外一个时候成为陈旧了的东西，当更新的更进步的社会生活条件发展起来时，原来的新的进步的思想认识，又变成陈旧的东西，而不能不用新的更进一步的思想来代替了。

为什么我们要时时刻刻革新我们的思想认识，因为新的思想认识是正确反映了客观物质发展的新需要之思想认识，因此也就是更完全地更正确地把握了客观事实的思想认识，也就是能够帮助推进我们的社会生活实践、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想认识。为什么要反对旧的落后的思想认识，因为它在新的社会生活的物质条件下已是不适合的，它已不能反映新的社会实践的需要，它对社会生活的发展会起阻碍的作用。

这样，在辩证法的认识论里，思想认识是随着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的，是随着新的实践需要的出现而不断地革新的。一切思想认识都受着一定的历史条件的限制，然而一切思想认识都不能停止不变，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类能认识一定限度的客观真理，在进一步的历史条件下就要把这真理更进一步加以发展，加以补充和革新。在思想认识的这种不断发展的过程里，就有列宁所指出来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统一。

第三，由旧的思想认识到新的思想认识的发展，并不是简单地把旧思想加以补充，并不是旧的思想原则的量的重复，而是依

据着量变到质变的辩证法规律，在认识的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时，就要抛弃一些旧的思想原则而建立一些新的原则，这是由较低级的思想原则转变到更高级的思想原则，这是由较简单的片面的思想，过渡到包含多方面认识的更复杂的思想。

认识上的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也具体表现在由感觉的认识到思维的认识的转变过程里。新的认识是在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但这种认识，并不一开始就能形成新的思想原则，即不能一开始就作为思维的认识表现出来，它首先只是常在旧的思想原则的胚胎内部，以所谓“经验”（即感觉认识）的形式慢慢地积累起来。只在实践中所获得的感觉经验积累到必要的程度时，才从这积累的基础上以飞跃的形式总结而成新的思想原则，才代替了（或说根本改造了）旧的思想原则。

历史上一切革命的新思想的产生，首先常是在旧思想的旗帜或形式之下加入新的感觉经验的内容，经过这样的一个阶段，到一定发展时期，革命的思想才取得自己独立的形式，在自己独立的旗帜之下站立起来，而将旧的思想根本改造。这是一般的规律。

列宁说：“从生动的直观（即感觉的认识——作者），到抽象的思维，再由思维到实践——这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性的辩证法的途径。”（《哲学笔记》）辩证法的认识论要研究怎样依据新的实践经验，怎样把积累起来的新的感觉认识加以总结，怎样从这总结中找出新的思想论点，这样把旧的思想原则加以发展或改造，把它提到更高的阶段上来，以作为我们进一步的实践的指南。

第四，由旧的思想到新的思想的转变，并不是和平的过渡，而是要经过思想间的斗争才能达到的。新的思想虽然最初能在旧思想的胚胎内增长起来，然而这胚胎的内容，对于旧思想是一个对立的趋向，它的生长，即预示着旧思想的没落。然而旧的思想原

则是在人的认识里习惯了和固定了的原则，它有着相当坚固的存在的基础；而它的存在，对于新的思想原则的形成，就是一个非常坚牢的桎梏。不打破这桎梏，那么新的思想原则就不能建立起来，就只能停止在感觉经验的状态里，就只能做为萌芽胚胎而不能作为独立的成熟了的思想。新的思想要形成自己的独立的原则，就不能不进行斗争，就必须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

这自然不是说，这斗争只是思想本身的斗争，旧思想本身的顽固性。虽然直接形成为新思想诞生的阻碍，形成为新思想必须斗争的因素。然而更重要的是，旧思想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旧的实践立场的反映，旧思想对于新思想的阻碍，反映着旧的物质势力对于新生的势力的压制。旧思想的顽固性，反映旧势力的顽固性，在这样的条件下，旧思想是有着物质基础的支持，因此对于新思想就成为更强大的桎梏。这样，新旧思想的斗争，就反映着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的新旧力量的斗争。正如社会的新旧物质势力之斗争是不可妥协一样，在新的思想的建立过程中对于旧思想的斗争，也是不能调和折中的。

列宁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理论的党性的命题，就在于要强调这思想斗争的不可调和性。列宁提出这一个命题，是针对着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以及经验批判论者们的思想上的堕落以及他们对于资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对于资产阶级哲学世界观的投降的态度。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哲学中，自始至终是有党派性的。他们能够在每一个‘最新的’倾向中，发现出它之离背唯物论和对唯心论及信仰主义的让步。”(列宁:《哲学的党性》)

“马克思学说的万能，正因为它是正确的，它完全而又严整的给了人们一个决不同任何宗教信仰、任何反动、任何拥护资产阶级压迫和调和的整个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

分》)

这就是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的斗争性的说明，而在列宁自己，当卢那察尔斯基为经验批判论的修正主义者作辩护，并且说，“也许我们陷入迷途了，但我们是在寻求着”，这样露骨地表现着他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动摇时，列宁却坚定回答道：

“至于说到我，那么，我也是哲学中的‘寻求者’，这就是说，我在这篇短文中（即指《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一书而言——作者），我抱定任务要找出，这些冒充马克思主义而拿出一些极端糊涂的、杂乱的、反动的东西来的人们，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失足的。”列宁在思想上，就是有着这样毫不含糊的斗争性的！

以上，就是在唯物辩证法的立场上来处理认识问题的几个要点，就是列宁的命题——辩证法、论理学、认识论的同一性——的基本内容。

（原载《解放》周刊第124期，1941年2月1日；曾收入《艾思奇文集》第一卷）

辩证法唯物论怎样应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

(1941.3)

社会历史的科学研究，是因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的发现，才开始建立起来的。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演说》中，曾经指出历史唯物论是马克思的伟大发现之一，并且把这发现在社会科学研究上的价值，比之于达尔文的生存竞争学说在生物学上的价值。在历史唯物论发现的以前和以后，社会历史的研究领域上，表现着完全相反的情况："在此时期以前，关于历史和政治方面完全被浑沌和光怪陆离的观点所统治着，从此，方能用完整和谨严的科学理论以代之。"(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马克思之所以能发现历史的唯物论，是因为把辩证法唯物论的原理，扩展于社会历史的领域。"历史唯物论就是把辩证唯物论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就是把辩证唯物论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辩证法唯物论是最彻底的唯物论的世界观，它与一切旧的形而上学唯物论不同，旧唯物论的主要缺陷之一，就在唯物论观点(当然是不彻底的)一般还只能够应用于自然的研究上，而不能推广到社会历史的研究上。一切旧的唯物论，一碰到社会历史的领域上，就成为唯心论，就只能用精神的原因来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只有辩证法唯物论，能把唯物论的观点彻底推广起来，能正确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的规律，能把社会历史严格地当

作科学对象来研究，能使我们在社会历史领域上掌握到精密的科学理论，以便于指导我们的革命的实践。

哲学的任务是不仅在于解释世界而更在于改造世界，辩证法唯物论的特点，就在于能够密切地与这任务相结合，就在于能成为历史唯物论的基础，成为我们改变历史的指南。

不必奇怪为什么一切修正主义者，在他们曲解马克思的理论的时候，少不了总要对于辩证法唯物论也加以“修正”。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曾想用新康德主义代替辩证法唯物论，俄国 1905 年革命失败后曾有一批经验批判论者想用马赫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这些动摇者、变节者、内奸等等，都曾经想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政治的理论中，抽去辩证法唯物论的哲学基础，这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政治的理论（历史唯物论以及全部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乃是辩证法唯物论在社会历史领域上的推广应用，撤去辩证法唯物论的基础，就足以使马克思主义失去革命世界观的意义。

因此，辩证法唯物论怎样推广应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的问题，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或有志研究社会科学的人所必须认真了解的。所谓辩证法唯物论在社会历史方面的推广应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

一，用唯物论的观点（同时，反对用唯心论的观点）来理解社会历史现象。

二，用辩证法的方法（同时，反对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

怎样用唯物论的观点来理解社会历史现象呢？

唯物论的观点，首先认为世界（它是一切事物与现象的总体）在本质上是物质的。把这观点用来理解社会历史现象时，也

就必须要承认，一切社会历史现象，都是物质运动的各种表现。在社会历史发展中间，我们固然可以看见不单只有物质的现象，如经济现象之类，同时也可以看见种种意识的精神的现象，如道德科学艺术之类，然而我们仍然要承认，就是意识的精神的现象，也仍是社会历史的物质运动的一定的表现形式。

为什么能说社会历史的一切现象，都是物质运动的各种表现呢？

因为所谓物质，就是在人的意识之外独立存在着的事物，就是有着他们的一定的运动规律，一定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事物。而社会历史现象，从本质上说来，都表现着这样的特征。

不论社会的物质现象或精神现象，都是在人的意识之外客观存在的东西。人不能随便选择自己所处的社会物质生活环境，是怎样的环境，人就只能怎样地生活。个人也不能随便选择自己所处的精神、思想的环境。因为一定的时代，在一定的物质生活基础之上，有一定的精神生活，一定的风俗、习惯、道德、法律、艺术、科学，人也只能在这样的思想环境里生活。人的意识，在表面上，似乎是“自由”的，而在实际上，仍是为一定的历史时代所限制的。在封建时代，不会产生科学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奴隶制度时代，不会有资本主义的道德和法律，正如在社会主义时代，不应再残留效忠于君主个人的封建道德一样。

不论社会的物质现象或精神现象，都有他们自己的一定的相互关联或必然的运动规律。社会一定经济制度的发生发展和没落固然不是偶然的，就是社会的意识、风俗、习惯、道德、法律、艺术、科学之类，也有着它们的一定的发展规律，社会的意识现象与社会的经济现象中间固然有着一定的必然的相互关系，就是各种社会意识以及新旧的社会意识之间，也各自有着一定的、必然

的相互关系，任何社会现象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毫无来由的事情。

既然一切社会现象都是物质运动的表现，都是客观存在的，有着一定的相互关系或必然的运动规律的东西，因此，我们在研究社会历史的时候，就必须要着重于去发现这些客观的必然的相互关联或运动规律，因此，社会历史的领域，就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

这样的理解，自然是与唯心论完全相反的。唯心论不承认社会历史现象是在人的意识之外客观存在的事物，而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依赖于人的“自由意志”的活动，特别是依赖于英雄伟大的愿望。唯心论不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必然的规律，而认为一切社会历史现象都是人们的自由意志和偶然的愿望的表现。因此，社会历史中没有任何规律可以发现，也就是不能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这种思想，在中国也曾有一部分人提出过，例如十七八年前，曾经有过一次“科学和玄学”的论战，站在“玄学”一方面的人（以张君劢为代表）就是站在这一种立场上反对把科学的研究应用到社会历史领域上来的。

然而唯心论的理解是错误的，自从马克思建立了历史唯物论的科学理论以后，这错误就很明白了。

“由此可见，社会生活，社会历史，就不复是‘种种偶然现象’之凑合。因为社会历史已成为社会之规律性的发展，而社会历史之研究，则已变为科学。”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的实际活动，应当不是以‘卓越人物’底善良愿望为基础，不是以‘理性’、‘普遍道德’等等的要求为基础，而是以社会发展的规律为基础，而是以这些规律的研究为基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承认一切社会现象都是社会的物质运动的一定的表现形式，这就是用唯物论的观点来理解历史的第一个基本点。

然而这并不是说，社会历史的物质现象和它的精神、意识现象，简单地就只是一个东西，简单地就都是物质现象，而一点区别也没有，如果这样来理解，那也是不正确的。

社会在本质上是物质的。同时，社会的各种现象，又是社会历史中间所表现的不同的现象，又是社会历史的物质运动的不同的形式。因此，各种社会现象中间仍是有区别的。

物质与精神的区别就在于，物质现象是第一性的现象，而精神、意识则是第二性的、从生的现象："物质世界是不依赖于人们意识而存在的客观现实，而意识则是这客观现实之反映。"（同上）这是唯物论的一般的观点。把这样的观点推广应用来理解社会历史现象时，就必须要承认："社会的物质生活、社会底存在，也是第一性的现象，而社会底精神生活，则是第二性的现象、从生的现象，社会的物质生活，乃是不依赖人们意识而存在的客观现实，而社会底精神生活，则是这客观现实之反映。"（同上）

这就是说，社会的物质生活，是决定一切社会现象的基础，也是一切社会的精神生活产生的基础。"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恰巧相反，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因此，要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首先得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研究起；要研究社会的精神生活所以形成和发展的原因，也得在社会的物质生活中去找基础。这样的理解，自然又和唯心论是完全相反的。

唯心论不承认世界上有物质的存在，认为一切物质现象都是精神的表现，这样的观点，用来理解社会，就认为社会的精神生活是第一性的东西，而一切社会的物质现象，都是为自由意志，伟

人的愿望，社会的意识、思想等等所决定，都是从生的现象。因此唯心论者不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中去找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却要从社会的精神生活中，从伟大人物的愿望、思想中去找这基础。

唯心论的理解是错误的，社会历史的发展，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都证明了这错误，证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是决定社会的精神生活的基础，证明在什么样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之下，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意识和社会的精神生活，证明要研究社会历史现象，正确的道路就是要从物质生活的研究开始。

这并不是说，社会的精神生活，是完全消极地为社会的物质生活所决定，它本身对于社会的物质，就没有任何的反作用。物质和精神的关联和作用是相互的，说物质是第一性的，只是因为它是精神意识产生的根源、基础。一旦精神作为物质的反映而产生出来，它对于物质的发展，就起着积极的反作用。

辩证法唯物论和形而上学的旧唯物论不同，旧唯物论只能理解到物质决定精神的片面的作用，而辩证法唯物论则不但要理解到物质的第一性，根源性，基础性，而且更要理解到物质和精神的相互关系。

所谓“经济史观”或“经济决定论”，就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论对于社会历史领域上的曲解。历史的唯物论和经济决定论不同，就在于经济决定论认为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足以决定一切，而历史的唯物论，则认为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只是最后起决定作用的东西，只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而在社会发展的运动中，精神生活对于物质生活也起着很大的反作用和有着很大的意义。

社会的意识、社会的精神生活之所以有重大的意义，是因为人的社会生活有一个重要的特点。这就是：人的生活是有目的有

意识的生活，社会历史的一切活动，都是在一定物质基础上千千万万人的有目的的行动的综合，社会历史的发展，是通过群众的意识的努力而向前推进的。社会历史发展的最后基础，固然是在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固然是社会的物质生活发展的要求，然而要使这种要求表现为伟大的推动力量，要使这种要求形成为一种社会的运动，首先要让这种要求反映于人的意识之中，首先要依据这种要求形成一种社会的观念、理论，并且还要使这种观念，理论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成为掌握群众的观念或理论，这样就能够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经过有意识的自觉的群众的努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这样，就可以知道，社会的精神生活、社会意识，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上是有很严重的作用和意义的。

作为最后基础的东西，和有着重要意义的东西，是可以区别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把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作为历史发展的最后基础，然而对于社会的意识，社会的精神生活，却不但不忽视，而且特别要强调进步的社会意识在社会生活中、社会历史中的严重意义和作用。

“理论只要一掌握群众，就立刻成为物质的力量。”（马克思）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列宁）

然而这并不是说，一切的社会精神生活，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都有这样的意义和作用。在这里，要加一个条件：社会的意识，要能够反映社会的物质生活发展的要求，才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发生伟大的推动力量。

也有不能反映社会的物质发展要求或甚至妨碍这种要求的观念和理论，这就是陈腐的或空想的观念和理论。陈腐的旧观念是过了时代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它不适合于新的物质生活

发展的要求，因此它只适合于社会上已经腐朽了的势力的利益，它只适合于社会上反动的、保守的势力的利益，因此它对于社会历史不但不起推动作用，相反地还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

历史唯物论在研究社会意识现象的时候，必须分别什么是每一社会的新的社会意识和旧的社会意识，什么是能反映该社会物质发展要求和不能反映这种要求的意识。必须研究新的意识怎样群众掌握，动员群众，发挥它的改造社会的伟大力量。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之所以强有力和生气勃勃，就是因为它是凭借于正确反映出社会的物质生活发展之需要的先进理论，把这理论提到它所应有的高度，并以彻底利用这理论的动员的、组织的、改造的力量为己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承认社会物质生活是第一性的现象，同时着重指出社会精神生活对于物质基础的反作用，指出它对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意义，这样正确地来了解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相互关系，就是用唯物论的观点来理解社会的第二个基本要点。

还有第三个基本要点：唯物论不但认为世界一切现象，都是客观存在的，有着他们自己必然规律的物质运动所表现的现象，而且要承认，这些现象和它的规律，是可以为我们所认识的。这样的观点，应用到社会历史领域上来，那就要承认，社会历史的各种现象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也都是完全可以认识的。

没有这第三个观点，那么唯物论就不能彻底站住，就不能打破唯心论的错误观点。因为即使你承认世界是客观的有规律的物质世界，而同时却不承认这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是可以认识的时候，那么，唯心论者就会来这样一个质问：“既然客观世界及规律不是你所能认识到的，因此你也就没有理由断定它是一定实际存在的。因此你的唯物论的观点就是不能成立的了。”

唯心论者也曾在这一个观点上来向历史唯物论进攻。他们说，说自然界的规律可以认识，还不是没有理由，因为自然现象还可以被科学家拿到实验室里来实验，因此还可以对它进行精密的科学研究。社会现象就不是这样，我们既然不能把社会历史中的许多人物和事件拿到实验室里来试验，因此也就不能对它作精密的科学研究，因此我们也就不可能认识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因此我们也就没有权利断定社会历史现象，是在人的意识之外而客观地存在的，有规律的物质运动所表现的现象。

对于唯心论的这种不可知论的观点，要给予反驳，是并不困难的：不错，社会现象不能拿到实验室里来实验，然而研究社会科学的人却可以有另外一种实验，那就是对于社会历史的运动，亲身去参加实践。人们可以在社会斗争的实践中去研究社会发展规律，去考验我们对于这些规律的认识是否正确，"我们关于自然界规律的知识，既然已为经验实践所考验，就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确实知识"（同上）。同样，为社会斗争的实践经验所考验的关于社会规律的知识，也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知识。

历史唯物论的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全部革命的学说，全部社会和革命发展的规律知识，就是曾经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经验的考验，并且以后还要不断的经过这样的考验，以证明它是有客观意义的确实的知识。

这就是说，科学的研究，是有阶级性党性的。"辩证唯物论，乃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政党的世界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辩证法唯物论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应用，历史的唯物论，乃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政党的社会科学。历史唯物论的科学的正确性，和它的革命的阶级性是分不开的。我们能坚决打破唯心

论的不可知论的观点，就是因为我们的历史唯物论的关于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规律的知识，是经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无数次的实践经验考证过的确实的知识。

这就是说，把唯物论的观点应用来理解社会历史时，就需要理论和实践的一致。理论、思想，是在实践中反映社会发展规律，是能够反过来推动实践，推动社会的发展，而同时，它本身又必须不断受实践的考验。

“科学和实际行动间的联系，理论和实践间的联系，它们的一致，就应当成为无产阶级党的指路明星。”（《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的考验之下，我们就可以获得证实社会的科学的知识，这就是用唯物论的观点来理解社会历史的第三个基本要点。

*　　*　　*

怎样用辩证法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呢？

辩证法的第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把一切事物现象看做互相联系的东西。事物现象是在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中存在着。任何事物现象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出现，而是为一定的联系条件所决定的。这样的观点，应用到社会历史上，那么，社会历史的现象，也是在一定联系之下的现象，也是为一定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现象。

“一切决定于条件，地点与时间。”（同上）

因此，应用辩证法来研究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首先就是要找出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条件。并且，根据前面所说的唯物论的理解，决定社会发展的基础，是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而不是精神生活条件；因此，辩证法首先要求我们找出决定社会历史发展

的一定的物质条件，研究这一定的物质条件为什么会产生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现象，为什么会表现为一定的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形而上学不能从一定的物质条件上来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它不研究一定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制度为什么在一定条件之下必然会产生，却只是用一些空洞的永久的道德标准，“永恒的正义”，高尚的理想来评判社会现象。这种观点不用说是非科学的。因为如果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任何高尚的理想都不可能实现，空想社会主义的失败，就是一个明证。

因此，要能够正确地认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就不能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来研究问题，而必须用辩证法的方法，研究决定社会发展的物质条件。

研究社会发展的物质条件时，必须要注意到：各种社会，或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中间，有他们的一般的条件，这就使我们在他们中间可以找出一般的规律来；但同时，他们又各自有其特殊的条件，这就使他们的一般的规律，必然是在各种具体的特殊形式之下表现出来，也就是表现为特殊的规律。研究社会历史发展总规律时，必须要注意到这规律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或者更正确的说，重要的事是在于要注意到一般规律在特殊条件之下的特殊的表现。

一切社会的发展，都是以它们的物质条件为基础，这是一般的规律，然而对于历史唯物论，重要的不在于多次复写这一般的规律，而要研究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的不同的规律。

现在的中国革命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一般都是资产阶级性的，然而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在历史唯物论的立场上看来，更

重要的还是在于找出中国的历史条件与法国革命不同的特点，根据这特殊的条件来认识中国资产阶级性民主革命的特殊规律，认识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特质。

这就是“历史的观点”。

辩证法的第二个基本特征，是把世界一切事物现象看做永久运动变化的东西，看做不断革新，不断包含着新生的和没落的事物的过程。把这样的观点应用到社会历史的研究上，那就是说，社会历史现象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东西，没有永久不变的社会秩序。例如说：“资本主义制度是可以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的，正好似资本主义制度在当时替代了封建制度一样。”（《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因此，用辩证法来研究社会发展规律，就是要研究社会怎样变化和革新，研究什么是一定社会历史中的新生的东西，什么是其中的没落的东西。从指导革命的实践立场来说，就是要能够认识出，什么是我们所要指靠的，推动社会发展前进的势力，什么是我们所要反对和推翻的没落的势力。

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决定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所谓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新生的、前进的势力，就是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有着必然的发展基础的进步势力，社会历史中的没落的、腐朽的势力，就是在物质生活条件上已无向前发展基础的势力。

因此，历史唯物论，首先要研究，在每一个社会发展中，哪些是有向前发展的可能性的物质条件，哪些势力是与这种条件结合的势力。这些势力的物质生活条件即使它有着远大发展的前途，因此它在社会历史发展上就有强大的推动作用，就成为我们的革命实践行动所指靠的基本的势力。

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行动中所指靠的势力，首先就是无产阶

级，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就是无产阶级的立场，因为无产阶级所处的物质生活条件，它是在财产方面一无所有，是与大工业相结合，这样的条件，决定着它成为最革命的，同时也是最有远大发展前途的阶级。

这也并不是说，一切社会发展的推动力，简单的只限于某一种势力，只限于与某种前进的物质条件相结合的努力，而其他的任何势力，对于社会的前进发展，就丝毫没有作用，或竟至于完全是阻碍的力量，这样来了解问题，也是错误的。一切事物都是在各种各样的相互关系中向前发展，社会现象，社会的一切势力，也都是在各种复杂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任何一种社会势力，都不能够独立地，与其他一切势力无关地向前发展。社会的最前进的势力，只在与其他各种势力密切联系中才能发挥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它一方面要向社会上最反动的某些势力对敌，要推翻这些势力，然而同时，为了取得与主要敌对的势力进行战斗的胜利，便要经常地、尽可能广泛地获得战斗中的同盟的势力。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革命实践的领导力量，是无产阶级，然而并不因此就得到结论，说革命的事业就只是无产阶级单独进行的事，相反地，马克思主义者还要着重指出，无产阶级的事业，是一时也不能离开与农民的联盟，没有这样的联盟，无产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的。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无产阶级在革命中与其他社会力量的联系，还更广泛，不但要与农民联盟，而且要与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阶层政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样才能推动全国抗战，而且领导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事业。

“为着不致在政治上弄出错误，那就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同上）首先要看出什么是社会历史发展中最前进的势力，最有推动作用的领导势力，同时要注意到，这势力与其他的势力的

相互关系，它要打倒的是什么势力，所要独立的是什么势力，所要联合的是什么势力，——这就是应用辩证法来研究社会发展规律时的第二个基本要点。

辩证法的第三个基本特点，是把事物的发展看做“由迟慢的量变进到迅速的突然的质变”（同上）的过程。形而上学不承认事物的发展变化，不承认事物中间有不断地新生的东西和不断地腐朽的东西，因此也就不承认由旧到新的事物的转变，不承认事物可以由量的增减达到质的转变。在形而上学看来，事物永远只是旧有的一些东西，所以即使有变化，也只是原有事物的简单的数量上的增减和反复出现，而不是任何事物的质的转变。这样的看法，和辩证法是完全相反的，它是错误的，是与客观事实不符合的。

既然事物时时刻刻有新生的和腐朽的、前进的和没落的，因此发展中的新旧的交替，就不是现有事物的反复出现，而是新生的东西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引起突变，推倒了旧的，并且根本代替了旧的位置，这就是由渐进的不显著的变化，终于达到了根本的显著的变化，就是由量的变化达到质的变化。社会现象也是一样的，在旧社会里有新社会的因素在不断地增长着，这些因素的增长起初只是采取渐进的量变的形式，然而这样的变化到一定程度，就要采取突然的质变的形式，根本将旧社会推翻，而建立起全新的社会来。这种突然的质变，是必然不可免的，因为如果没有这突变，没有根本的改变，旧社会是不会自愿死亡下去的。

这就是说，由旧社会到新社会，是必须要经过革命，才能够完成它的转变过程。单凭渐进的改良，是不能达到目的的。为创造新的世界而斗争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采取革命家的立场，而不是改良主义者的立场。

用辩证法来研究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就得要研究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新生的因素怎样经过渐变的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就根本推翻了旧的社会秩序而建立起完全新的社会秩序。同时，因为社会的发展是决定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首先就要研究，什么是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中新生的最革命的因素，这些因素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采取渐变发展的过程，而在什么样的发展情形之下又发生突变，根本推翻旧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形成或发展新的物质生活条件，并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整个新的社会秩序。

由量到质的转变，不仅仅是由旧到新的变化，而且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上升的运动。因此，历史唯物论，就不仅仅要研究旧的社会怎样转变为新的社会，而且要研究，新的社会怎样是比旧社会更进步更高级的社会，在哪些条件上，它比旧社会是有着更高的物质基础？只有这样，才可以使我们明白，为什么我们必须要站在革命的立场上，为建立新社会而斗争，为什么革命对于我们是绝对必要的。才可以使我们明白，为革命而斗争，是在于要使社会历史向前进步，是在于使人类能够看到更高的、更完美的生活条件。

辩证法的第四个基本特点，是认为事物都有着自己内部的矛盾，都包含着正面和反面、现在的和将来的因素，腐朽的和新生的因素，这些矛盾的因素表现为事物的内部的对立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就是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由低级到高级的运动发展的内在内容。

根据这样的观点，可以知道，社会的内部也是有它自己的矛盾的。社会内部的新生的、将来的、革命的因素，并不是在现存的旧社会以外独自发展起来的东西，这只是形而上学的了解。现存旧社会中的将来的、新生的因素，在辩证法上看来，就是在旧

社会本身内部生长起来，就是旧社会自己的对立方面。由旧社会到新社会的发展，就是旧社会内部自己矛盾发展的结果，就是在这种矛盾的基础上作用着的对立势力的斗争的结果。把辩证法的方法应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上，就必须要研究社会历史发展中新的因素怎样从一种旧社会的本身内部发生和发展起来。首先要研究这种因素怎样在旧的物质生活条件中发生和发展起来，怎样形成一种社会的势力，形成一种对旧社会本身相反对的势力而同原有的旧社会秩序斗争，怎样经过这斗争而达到建立新社会的结果。

把辩证法的方法应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上来，就是要我们知道，由旧社会到新社会的转变，改变旧社会到建立新社会的过程，是必须要经过斗争才能达到目的，因此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在进行革命工作的时候，是不能掩饰社会的矛盾，避免对旧势力的斗争，而要相反地，揭露社会的矛盾，把新旧的斗争进行到底。在革命运动中，问题是在于怎样去正确地进行有效果的斗争。历史唯物论的任务之一，就在于要引导我们去研究，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要进行什么样的斗争，要怎样去进行斗争。

把辩证法的方法应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上，必须要注意到社会历史斗争的特点：社会的斗争是必须通过意识的自觉的斗争，必须使社会的新兴势力，革命的群众，在思想上觉悟到斗争的需要。必须有这样的意识的势力，才能够形成一种强有力的行动，才能够推翻旧的社会势力，摧毁旧的社会秩序。这就是说，历史唯物论不单只要在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方面来研究新社会的因素，研究新旧势力的斗争，而且要研究社会的精神生活，社会的思想意识中间的新旧斗争，研究什么是社会历史发展中代表新兴的革命势力的前进思想，研究这种思想怎样与旧的反动思想斗争，怎样影响了群众，为革命的群众所接受，怎样掌握了群众。把群众动员起来，组织

起来，形成一种强有力的革命行动，而完成变革社会的任务。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就是无产阶级的最前进的革命的思想，就是一面与一切反动的思想进行着毫不妥协的斗争，一面对于无产阶级及其所领导的革命同盟军之革命行动能够起着伟大的动员和组织作用的思想。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这理论去唤起广大群众的自觉，保证革命运动能够成功，在现在我们中国，就是要保证能够领导今天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建立新民主主义新中国，所必不可少的一环。

以上就是把辩证法唯物论应用于社会历史研究的几个要点。

（原载《解放》周刊第126期，1941年3月31日；曾收入《艾思奇文集》第一卷）

关于研究哲学应注意的问题

（1941.4）

研究哲学，就和研究其他一切问题一样，需要对于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有一个正确的了解。要首先把哲学本身的一般的性质认识清楚，才能够正确地决定我们在研究时应该采取的态度和方法。

哲学，首先是关于世界全体的一般规律的学问。研究哲学的结果，是使我们对于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的思想认识）的规律性，获得一个总的认识和理解，简单地说，就是使我们掌握一定的世界观。

在阶级社会里，不同的阶级、党派，有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哲学思想，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应该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世界观，应该掌握辩证法唯物论的哲学思想。因为关于世界全体的一般的规律的最正确的认识，就包含在辩证法唯物论的思想里。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中，我们的思想行动是经常地与一定的世界观相联系的。如果我们能够灵活地处理工作，能够依据环境条件的变化随时正确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和任务，那么即使我们没有研究过哲学，不懂得哲学上的任何名词，但在事实上我们的思想里已经有了某些辩证法世界观的因素，因为这样的行动，已经是无意识地以这样的一种思想作基础：即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要变的，因此我们的行动、工作也不能不常常有所改变。

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所表现着的这种世界观，是自然发生的，不是在理论的研究中锻炼出来的，因此它的内容里常常混杂着各种不正确的因素，决不会是完整的无产阶级革命世界观，我们不能忘记，在我们的队伍里共同斗争的成员，好些是从各种各样的社会层中走过来的。他们带来了其他社会层的生活习惯、思想意识等等的影响，带来了各种各样反辩证法唯物论的世界观的因素，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思想行动上的不正确的偏向。

在革命斗争中某些成员所发生的错误，都不是偶然的，它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也有一定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的根源，就哲学上来说，一定是有某种反辩证法唯物论的世界观的思想根源，即使是无意识的。在个人的日常工作中所发生的错误，也没有例外。例如说，对人宣传我们的主张的时候，不根据对方的接受程度和需要，只顾说自己的一套，结果弄得对方莫名其妙，这也就和唯心论的观点，有着密切联系，因为这是以为世界上的事情都不必依据客观的情况来解决，而只要主观的思想就可以对付一切了。

这就是说，哲学的思想，对于我们的实际斗争是有重要意义的。哲学的内容，是关于世界全体的一般规律的认识，是关于改造世界的一般规律的把握。哲学的作用，却不仅仅在于世界的认识和理解，而且在于依据这些认识和理解，去实际地具体地进行改造世界的工作。在我们研究事物的时候，在我们解决各种实际斗争的具体问题的时候，要能够给以指导。如果我们的世界观是正确的，那么在研究事物解决问题的时候，就有了正确的基本态度和基本方法，如果我们的世界观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在研究上就要走上不正确的方向，因此在实际行动中就也要发生各种不正确的偏向。

因此，倘若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在思想上受了其他阶级的影响，倘若自己的世界观里竟混杂着反辩证法唯物论的因素，那对于他的斗争行动，就会发生各种毒害的影响，为要能够保持正确的世界观，为要能够保证对于实际问题的正确解决，为要成为充分自觉的、尽可能不犯错误的革命战士，就不能不研究哲学，就不能不经过哲学的研究有意识的锻炼我们的正确的世界观，排除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因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满足于日常生活工作中自然发生的世界观，而必须进行哲学的研究。

哲学的任务不仅仅在于说明世界，更重要的是在于改造世界。正是为着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任务，所以我们才必须研究哲学。研究哲学，目的并不在于读通几种艰难的书本，而在打通一切艰难的实际，许多人不了解这一点，以致在研究哲学的时候发生许多困难。

有许多研究哲学的知识青年，他们从哲学书籍上学取了大堆抽象的名词和大串难解的语句，并且很熟练地能够随时使用这些名词和语句，然而一到被人问起这些名词和语句的真实意义时，不但不能够给予任何明了而确实的回答，甚至连自己也常常弄得莫名其妙，至于联系实际问题，指导实际斗争，那更是谈不到。这是哲学研究中人们所遇到的困难的一种，这困难产生的原因，固然多少是因为当前我们还没有很完全的、通俗明了而又与实际有密切联系的哲学教科书，然而好些青年有意无意地自缚于单纯的书本研究，而忽视了在实际斗争经验中去检验所研究的东西（特别因为知识青年一般地缺少斗争经验，所以事实上也有它的困难条件），这一点却是主要的原因。

有许多长久地忙于实际斗争生活，而缺少研究理论的机会的人们，他们在开始研究哲学的时候，碰到那一堆堆生疏的名词和

抽象的语句，就觉得难于接近难于理解，于是拼命咬名词，钻句子，仍然咬不烂，钻不透，结果对于哲学的研究就失去了勇气和信心，这原因，固然也是由于现在所有的哲学书籍本身大都艰深难懂，然而更重要的，还是由于研究者不能够以自己的实际经验为基础来进行研究，不能使书本服从于自己的实际经验的研究，反而被书本的名词和句子把自己的思想束缚了。

所以，要克服我们在研究哲学中的困难，首先要明确地认识我们研究的目的：怎样才算是在研究上有了结果呢？答复是，并不仅在于读熟了书本，记熟了名词和公式，而主要地在于锻炼出解决实际问题的正确态度和方法。研究哲学的真正成绩并不仅表现在书本知识是如何渊博，而主要表现在革命实践中处理问题，是否正确。

研究哲学的目的，在我们，是为要使自己成为辩证法唯物论者，不是口头上的，名词上的，仅仅善于引用文献的辩证法唯物论者，而应该是实质上的，懂得辩证法唯物论的真精神的，在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在斗争行动中表现出来的辩证法唯物论者。真正的辩证法唯物论者，在研究事物的时候，在处理实际问题的时候，一定能够采取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因为辩证法唯物论哲学的世界观，给予他这样的可能。

我们首先必须把自己锻炼成唯物论者，不是口头上善于使用名词的唯物论者，而是要在一切实际问题上，能够保持唯物论者的态度和立场。这就是说，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都能够虚心地从客观事实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成见出发，都要依据具体的事实来解决问题，而不是依据教条公式来解决问题。

要成为这样的一个唯物论者，说起来似乎是容易，然而做起来却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个人常常要经过无数的磨难和锻炼，才

能够克服自己单靠主观愿望和简单教条来解决一切问题的习惯。我们很容易学会满口唯物论的名词，然而在实际行动常常忘记了要照顾客观事实的情况和要求，这种不适合事实情况的行动，结果必然要遭遇到挫折和失败。

革命斗争过程中某些人们所发生的许多错误和偏向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在战略策略的指导上不能真正站在唯物论的上面，就是由于不能够根据具体的客观事实来决定行动的方向和斗争的方法。什么是“左”倾的冒险主义的思想方法上的根源？就是太过性急地想达到主观的要求和愿望，就是不能忍受革命的客观困难条件所要求我们的艰苦而长期的斗争。什么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方法上的根源？就是当客观事实条件的发展，已经需要他们向前进一步的时候，而他们却偏要站着不动，就是事实上对反动势力的进攻采取妥协调解的立场，这一切都是表示在革命指导上不能从客观事实条件出发，而从主观的愿望出发。

所谓要从客观的事实出发，并不等于说要依据琐屑的、偶然的事实来决定我们的行动，倘若这样，就要变成狭隘经验主义者或事务主义者。真正的唯物论者，决不是狭隘经验主义者或事务主义者。因为后者既是把思想限制在琐屑的偶然的事件里，因此他们除了应付日常的琐事之外，就不能全面地理解革命的规律、工作的规律，因之也就不能有大的作为。然而一个革命的唯物论者，他的目的既是在于改造世界，所以他的行动就不能限于应付日常的琐事，而必须经常向前进步，理解革命的一般规律性以及自己工作的全盘规律性。对于一个革命的唯物论者，不仅要有眼前的生活的认识，和解决眼前问题的方法，而且还要知道将来怎样，和用什么生活达到将来的目的（这里又要把较远的将来和最近的将来分开）。这就是说，唯物论所需要的思想认识，是要能够给行动

以指导。

因此，唯物论者所要依据的，就不是琐屑的偶然日常事实，而必须是对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全面认识。因为只有认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我们才能够领导全盘工作并展望将来的前途，才能够指示行动的目标，才能够知道依据要什么样的路线走向我们的目的。

要成为一个真正彻底的唯物论者，那么，就要学习在决定一切问题的时候，不仅是从简单的事实出发，而必须从事实发展的各方面的规律出发。这就是说，要学习从自己工作环境的一切日常事实里，找出它的发展规律，依据这些规律来决定我们行动斗争的方法。

马克思列宁主义，给予我们以原则的指导和具体解决问题的范例。我们从马列主义的理论书籍里可以学习到社会发展的规律和革命规律的知识。但倘若我们仅仅以此为满足，并把它简单地直接应用于中国革命的指导，而不看到中国社会的任何具体条件，那么这是离开了客观事物来解决问题，这不是辩证法唯物论，这不是马列主义，而是公式主义，是唯心论的一个种类。

有各种规律，有一般的和特殊的。我们从一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书中，可以学习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知识，与具体解决革命实践问题的模范。这种一般规律知识，它本身原也正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的事实中概括出来的，所以也正是客观真理的认识。这些规律，对于我们的行动指导上，是非常有用的，而且也是绝对必要的。它指示我们社会发展的总的方向，对于我们的行动，给与一般的指导原则。然而仅仅只有这些原则，并不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或唯物论者。因为要做一个唯物论者，就必须注意到，每一个具体的社会和具体的工作环境，又有它特殊

的规律，必须要能够发现这些具体环境中的特殊的规律，必须要能了解特殊的规律与一般的规律的联系，必须要在应用一般的原则的时候，依据特殊的规律来加以补充，加以具体化，才能够对于革命的斗争行动给与正确的指导，必须学习马、恩、列、斯与毛泽东同志如何从具体事物中引申出一般规律，以及如何把一般规律具体运用的模范。

例如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我们在抗战中的整个方针，然而在各种环境的各种具体条件下，其运用有所不同，根据具体条件，一个时期，强调团结，但不忽视斗争；另一时期，强调斗争，经过各种斗争去争取与坚持团结，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正确地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

如果是唯物论者，而不是公式主义者，那就要从自己的工作环境的具体事实的基础上，找出特殊的规律，使统一战线的原则应用能够具体化。

这样，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又必须同时要做一个辩证法者。这就是说，在研究客观事物规律的时候，必须能够使用辩证法的方法。这就是说，不要把事物的发展规律，孤立起来研究，不要把原则看做僵化的孤立的东西。一般的规律总是在特殊的情况下表现的，原则是要具体地灵活地应用的，公式主义，就是把原则僵化，把它看做孤立的东西，这是唯心论，也是形而上学。

这就是说，要达到研究哲学的目的，要做一个辩证法唯物论者，概括来说，就是要能够在研究实际问题的时候，在革命的行动中，能够努力表现出这样的一些事实：第一，一切要从具体的客观事实出发；第二，要能够善于找出客观事实发展的规律；第三，要能够善于使一般的规律与特殊的规律联系起来，善于把一

般的指导原则具体化起来。

这就足以明白，研究哲学的目的，并不仅在于熟读书本和熟记哲学的名词和公式，而更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能保持正确的态度和方法。这样的能力，也不是简单地读了几本哲学书就可以充分获得的，这必须要经过一些实际生活的锻炼。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辩证唯物论者，是没有什么捷径的。不要存这样的幻想，以为只要有人指出几本正确的书，读了之后，就能够完全掌握辩证法唯物论的世界观了。因为我们的目的，不仅要在口头上善于说明辩证法唯物论，而且更是要在实际斗争中贯彻辩证法唯物论的真精神。

这并不是说在研究哲学的时候不应该读书，恰恰相反，读书，读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是完全必要的，因为真正深刻的读书研究，不仅能帮助我们很快的理解辩证法唯物论的一般的原理，而且能够使我们理解如何具体运用一般规律的方法（这点，好些青年在读书中往往容易忘记），然而，这还不是研究哲学的全部工作。如果说到要能够熟练地应用辩证法唯物论的原理，那么单只读书还是不够的，这上面还需要把理论与革命实践密切联系起来。

知识青年们一般容易以书本的知识为满足。如果他们已经获得了相当的书本的哲学知识，那么，对于他们重要的是多思考一些实际问题，当他们研究实际问题的时候，可以采取这样的办法：首先把书本上的名词暂时撇开，完全去从客观事实中找出它的规律来，然后再把书本的原则，拿来对照，看自己处理问题时，是否具体运用了原则，是否能正确解决问题。这是对于知识青年所必要的锻炼方法。

有些忙于实际工作的同志，对于书本的研究，不容易发生信心。对于他们，重要的是在于克服这种畏难的心理，努力从书本

中间，吸取辩证法唯物论哲学的基本原理知识，并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来深刻理解书本中的原理，而不要为生疏的名词和抽象的语句所迷惑，在咬文嚼字的圈子里打转。这对于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在开始研究哲学时，是必须注意到的。

这些就是在哲学研究中我现在所感觉到的几个问题。

（原载《解放》周刊第 127 期，1941 年 4 月 30 日；《知识》第 56 期，1949 年 2 月转载；曾收入《艾思奇文集》第一卷）

光　明

(1941.5)

什么是光明，光明就是有火存在的地方。

火的存在，就是物和物的化合过程的存在，是物和物中间不断的产生着新的关系。旧的关系不断地告终结，新的关系不断地形成起来，建立起来。火的存在就是这新旧交代的过程的存在。这过程继续到什么时候，火也继续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这过程完结，火也就完结。

光明也就完结。

因此，光明不是单纯平静的，光明是斗争的表现，有光明的地方，就有新旧的斗争，凡可以看见光明的地方，就有这两个斗争势力的存在。

然而光明也还不仅仅表现为两个势力的存在。光明，不仅是因为新旧中间有斗争，而且是因为新的不断地克服旧的，旧的不断为新的所代替，新的方面的经常的生长和同时旧的方面的经常的没落，这才是光明。

光明并不是纯粹的进步，不是至善至美，而只表示进步的、较善较美的东西的经常优势。

黑暗不是绝对的没落，不是至丑至恶，而只是因为没落的、较丑较恶的居于压迫者的地位。

光明的世界不是完全无缺的天国世界，光明是发源于对世界的缺陷的斗争。不断地打破腐朽的障碍而向前进，不断地粉碎旧

的外壳而发展新的生命，世界就是这样才发出灿烂的光辉。

青年朋友们，不要凭自己的幻梦来估量光明的内容，不要把它看成宗教迷信里的那种绝对平和的天堂世界。在光明里面包含着永久的战斗，这里面有冲突，有扎砾，有痛苦。

光明同时伴着热，热就是战斗：冲突，扎砾，痛苦的集中表现！

从远处窥望光明，只能看见一片纯洁的光辉，一点单纯的火星。它会使你发生至善至美的幻想，于是你就想去接近光明，你一定曾经抱着这样的幻想来接近光明。

你如果仅只为着这样的幻想来接近光明，那当你一接近的时候，就会使你失望，幻灭。因为你会发现，在任何光明里，总有着一些黑暗的成分，虽然这黑暗是终于要被销熔了的。

从远处窥望光明，它在你的眼睛里所呈现着的是一幅安静和平的影像，它会引起你的幻想，以为那是无苦无争的极乐世界。你羡慕这极乐世界，就想来参加光明，你一定曾经抱着这样的幻想来参加光明。

你如果只为着这样的幻想来参加光明，那当你一走到光明里来的时候，你就要感到意外的打击；因为这里有冲突，扎砾，痛苦，有热，虽然这一切都是产生光明的源泉。

你自己本身一定要吃意外的痛苦。因为这里不断地在消灭旧的丑恶的东西，而你一参加到光明里来时，你自己的旧的丑恶的一切也就开始要被消灭。火的热，猛烈地，来锻炼你的缺点，缺点既是你身上的，所以你就不能不感到激烈的疼痛。

只有准备着忍受这样的疼痛，你才有资格来参加光明，否则你连接近也不可能。

只有把自己的缺点当做敌人，任它被火的热熔炼毁灭，你才

能成为光明中的一个成分。否则，如果以为缺点就是自己，不肯触动分毫，那么，你就终于要离开光明，或甚至于以没落者的资格在光明里被完全毁灭。

只有不断地和自己战斗，习惯于战斗的苦痛，使自己的本身不断地生长出新的东西，你才能继续存在于光明中间，而且成为光明的创造者。

什么时候你的战斗停止，什么时候你不能再忍受锻炼的痛苦，什么时候你失去新生力量，那么，什么时候你的光明的生活也就完结！

（原载《中国文化》第2卷第6期，1941年5月20日；署名：崇基）

进一步认识中国的现实*

(1941.8)

抗战已经四年了，在文化阵线上，也经过了战斗的四年。中国的进步的文化界，是在战斗中向前发展的。它一直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活动对敌过来，它在妥协投降阴谋者的前面，曾打击了后者所散布的悲观失望的思想情绪，曾反对过一切文化上的倒退、复古、统制、压迫等等愚民政策的企图。

这一切战斗都不是徒然的。它在中国整个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表现了它一定的意义和作用。它配合了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斗争，它通过了各种方式，通过文艺剧作的表现，通过理论的研究发展，通过各种思想观点的斗争，通过各种科学的教育的工作，来提高全国人民的思想意识，来动员人民，组织人民，起来与民族敌人进行了坚决的革命的战争。

是什么使得进步的文化运动发生了这样的作用？是因为它本身反映了中国民族发展的一切需要，是因为它曾努力在全国人民的前面，指出了中国民族求解放的正确目的和道路，是因为它努力把握了抗日战争的规律，揭露了现实的真理，是因为这些规律的知识，这些真理的认识，成为全国人民打破黑暗势力的引路明灯，成为战斗中前进的方法指南。是因为它服务于全国人民的抗战要求，它的目的就是在于改变中国，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奴

* 本文是作者为《中国文化》撰写的社论。

役和桎梏。

认识必然，就能自由，反过来说，要能够改变现实，求得中国民族的自由独立和幸福，就必须认识中国的现实，掌握中国社会变化的必然规律。进步的文化界，四年来是向着这样的方向努力过来的，而它所以能在抗战中表现一定的意义和作用，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民族争取胜利的一个不可少的力量，其最基本的原因也即在此。在这中间，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所处的重要地位，是必须提到的。马克思主义是以科学的理论做基础，是认识现实，打破黑暗愚昧的最锐利的武器。中国共产党掌握了这一个锐利的武器，胜利地攻破了中国革命道路上所遭遇到的重重的关，回答了抗战中全国人们所感觉着的许多疑难问题。这在坚定全国人民胜利的自信上，在提高人民战斗的勇气上，发挥了巨大无比的力量。这使它在抗战以来的进步文化发展上，起了核心的作用，正如从五四以来，它就在文化上取得了"盟主的资格"一样。

为什么日寇和妥协投降的阴谋者，要对于进步文化运动加以无情的摧残压迫？为什么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特别要表现出最深恶的仇恨？为什么他们对于中国的某些旧文化都似乎特别爱好？为什么他们总想在现在的中国身上来施行旧时代借尸还魂的魔术？原因是很明白的。因为进步的文化，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乃是帮助中国人民认识现实的火炬，而他们却希望把中国人民的意识埋葬在黑暗的坟墓，希望中国人民看不清楚光天化日之下的真实的事实，希望中国人民成为盲目，在行动上不能独立自主，以便于他们来加以支配和奴役。

进步的文化对于中国人民就是这样重要的。

然而正因为它的重要，在我们回顾四年来的发展成果时，就尤其深感到它的缺陷。我们要问：四年来的文化发展，是否曾经

完全配合了这抗日的伟大战争的需要？在反映现实、认识中国这一点上，它的广泛性，深入性，是否能够和今天战争发展的范围相称。应该答复说，还很不够！把文艺作例子来说，抗战以来我们确有了很多的收获，产生了很多的创作，然而谁能否认，不必说反映战斗中社会各阶级的复杂而细微的全面变化的伟大作品（这原来是不容易的），就是对于某些个别事件人物写出较深刻的典型来的优秀创作，今日也是不算多见的。再把理论思想作为例子来说，我们的作家是比战前发展一步了。然而谁能否认？除了某些政治军事上的大问题，我们曾经在科学世界观的立场上有了解决之外，对于中国现实环境和中国历史的现实，深刻细密的研究工作，还几乎是等于没有开始。咬文嚼字的学习方法，抽象原则的议论习惯，随便抓着一点事实来乱套公式的轻浮作风，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当中，还是相当普遍。从具体的丰富的事实材料出发，不放松一切小问题的精神的科学研究，还很少有人来加以意识的重视。以大原则的模糊认识为得意，以浅陋的一知半解为满足，这还是一种占重要地位的作风。

这样的作风，是很危险的，在文化运动的前途上，抗战中的物质条件的困难会给我们以阻碍，日寇汉奸妥协投降分子的阴谋活动会给我们以摧残危害，然而进步文化界本身的前面的缺点也会给予文化上和革命运动上以重大损失。

当着抗战四周年的时候，当着在欧洲，德国法西斯蒂对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最大堡垒苏联进行了攻击，使中国的抗日民族战争与全世界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合流起来了的时候，中国进步的文化界就有更多的责任。在这时，对于今后的工作，应该重新作一个全盘的考虑，同时在这里，应该把进一步认识中国的现实，作为今后向前努力的方针。例如就文艺界来说，必须更进一步地多

方面地深刻地去体验生活，用更大的力量来创造真实的典型。就理论战线上的工作来说，应该从事实材料的最详密与具体的收集调查着手，应该从事实材料科学研究中找出规律的认识，而避免对任何问题作公式的主观的判断。

这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尤其重要；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只是引导我们去研究活的具体事实的方法指南，而不是摆在前面来裁判一切的教条。

中国共产党六中全会曾向全国人民提倡过“实事求是”的精神，这就是我们今后发展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为着要能够真正达到实事求是，真正能够正确地认识中国现实，使进步的文化运动在抗战中发挥最大的动员人民和组织人民的作用，我们还需要坚守着一个重要的约束，那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赠给我们的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原载《中国文化》第3卷第2、3期，1941年8月20日）

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

(1941.8)

一、前　　言

哲学是各阶级党派的世界观，是他们认识事物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南。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里曾说过：“在经验批判主义认识论的烦琐学后面,不可不看出各党在哲学方面的斗争，这个斗争，归根到底说来，就是表现着社会各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系统。”这是对于经验批判论的研究所得到的结论，然而也是关于哲学的阶级性和党派性的一般的结论。哲学的斗争，乃是各阶级党派的倾向和思想系统的斗争，就中国当前的情形来说，也是一样的。

四年来的抗战并没有使中国的哲学战线沉寂。在政治军事的激烈斗争中，仍然包含着思想战线上的战斗。各党派在抗日的总目标下结合成民族统一战线,然而各党派的思想体系是独立的,各自的世界观，哲学思想是不同的，如果说在统一战线之下也可以有政治主张上的某些争论的话，那么思想战线的斗争，在抗战的过程中，自然也会继续发展，因此，不仅仅对日寇的奴化思想我们继续不断地进行了斗争，而且在抗战营垒的内部，也有着各种的思想斗争。在抗战的各党派之间也展开了世界观的、哲学上的斗争。这样，哲学的思潮，在抗战以来，是有了相当的发展，而

且是随着政治军事的物质战斗的深入和扩大而一同向前发展的。

抗战初起的时候，全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在空前的历史大事变之前大大提高了，在文化上，思想言论上，也随着表现了一时的高潮。然而理论上的深入研究的努力，哲学思想上的斗争，是在稍迟的时候才开展起来的。因为当新的事变突然来临的时候，那令人眼花缭乱的现实虽然能引起人们生动的兴趣，却也妨碍着人们获得深刻反省的机会。只有经过了一定的时期，人们能把新的经验加以分析，加以反省，而且一方面为了对付民族敌人，为要在对敌战斗中找出更正确的方向，另一方面也为着抗战营垒内部的原因，为着在自己内部反对一切在战斗中的不正确的偏向，这样的反省、分析，就成为完全必要的事。因此，抗战以后经过不久的时期，特别是武汉失守以后，随着抗战进入新的阶段，随着国内反投降妥协运动的开展，理论的研究，哲学上的斗争，也就抬起头来了。而《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书，就是在理论上总结这一时期的战斗经验的，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哲学上的划时期的著作。

在这篇短文里，想把抗战以来在理论战线上有着活动地位的几种重要的哲学思想作一个简略的评述。这些哲学思想是代表一定的阶级党派的，它的发展情况，是和它所代表的阶级党派的活动步调相配合。在理论战线上有所活动的哲学思想，当然不仅仅只有这几种派别，每一阶级都有它自己的世界观，都有它的哲学思想，因此实际上我们是可以指出更多的派别来的。但因为限于材料，只能提到最重要的几种，而且就是这几种，材料还是不充分的，所以只能作简略的评述。

这里打算讲到的几种是：一、辩证法唯物论；二、唯生论和“力行哲学”；三、“中”的哲学；四、国家社会党的哲学；五、中

国青年党的哲学；六、张申府的哲学。

二、辩证法唯物论思想的发展情况

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无产阶级在“五四”以后成为中国革命的“政治上的生力军”，它是最坚决最勇敢地为全国人民的利益、为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而斗争的中心力量。代表无产阶级思想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论的世界观，也在“五四”以后取得了文化上的“盟长的资格”。辩证法唯物论在抗战以前就已经是中国影响最广泛而最有实际作用的哲学思想，在抗战以后，它的研究和应用都推进了一步，它的影响也更深入更扩大了。因为中国共产党在解决抗战中的一切实际斗争问题时，有意识地努力把辩证法唯物论作为方法指南，并且因此得到了最正确的结果。这事实的证明，使人不能不相信，辩证法唯物论是指导我们改变世界、指导我们争取中国民族彻底解放的最有力的科学世界观。

辩证法唯物论的发展，在抗战后的第一个表现，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辩证法唯物论在中国的具体应用的问题，同时这也是抗战以来辩证法唯物论发展上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而一切其他问题的研究，都是以这一问题的解决做中心的。这问题在武汉失守以前就早提出来了，它的意义，就在于表现着要使辩证法唯物论进一步和抗战实际相结合的努力。在持久抗战的艰难而复杂的任务前面，掌握辩证法唯物论这一种科学的方法论，作为解决一切实际问题的指南针，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因此抗战开始后不久（甚至于在抗战前），在大后方的各种杂志上以及抗日根据地的学校教育中，就已经表现出了对于辩证法唯物论的实际应用的深刻注意了。

这问题的提起，并不是说抗战以前研究辩证法唯物论的人没有注意到理论与现实的联系。相反地，自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开始，而此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也不会忘记了，改变世界的实际任务，是和辩证法唯物论分不开的。问题只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辩证法唯物论与中国的实际革命运动的结合，不是一开始就能完全合拍，而且由于抗战以前的特殊情形，理论研究与实践斗争的某些脱离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这样的脱离现象，使理论的研究基本上始终限制在介绍性质的、书本式的、通俗化性质的活动范围内，而实践的革命斗争中的某些错误，其原因之一也是因为不能掌握正确的方法理论的缘故，由于过去的某些痛苦的经验教训，由于抗战的艰巨任务当前，也由于新的条件（理论研究者与实际斗争的结合有了更便利的机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辩证法唯物论实际应用的问题之被提起，被强调，是很自然的；这不外是要号召我们，有意识地进一步在实际斗争中应用辩证法唯物论的方法和理论罢了。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辩证法唯物论的具体应用的问题，在理论上的开展，是和几种不正确的见解争论过来的。第一个在中国化问题上散布有毒的歪曲思想的，仍是那以伪造所谓“理论”为生的叶青。他利用中国的“特殊性”和“特殊的方法”等等漂亮的新名词，把“国情论”以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陈腐思想偷运到文化战线上来，想借此取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运动。如叶青所说，所谓中国化，就是要依据中国自己的特殊情形，把外国的东西加以根本修改，使它变成另外的东西。“它必需变更其形式，有如一个新的东西，中国的东西，与原来的东西不同，这才叫做中国化。”（《论学术中国化》）依他的意思，如果要把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丢掉，变成另外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因此，如果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精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应用到中国的具体问题上来，就是在中国的现实地盘上来把马克思主义加以具体化，加以发展。那么，叶青就要反对，说：这并不是中国化，因为马克思主义在这里并没有改变，“唯物辩证法仍旧是唯物辩证法，丝毫没有中国化”(同上)。

谁也容易明白，叶青所谓的中国化，在实际上是想要取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要反对把辩证法唯物论应用于中国的实际，是要想从战斗的中国人民的手中，夺去最锐利的科学思想的武装。这对于中华民族的解放战争是有害的，这是应该给予坚决的驳斥的。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辩证法唯物论的实际应用问题，在理论上的另一个错误的思想，是由向林冰先生提起来的。向林冰先生的中心思想，是认为辩证法的法则不能直接用作研究事物的科学方法。在应用辩证法法则之前，首先要对于事物获得科学的认识。他在《再论关于辩证法法规的实际应用》一文里说：“要想把辩证法法则应用到具体事物的发展上来，却需要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这就是对于所把握的对象要有具体的科学认识。”(《读书月报》第1卷，第12期)向林冰的错误，就在于把科学方法和辩证法法则分离开来，以为在应用辩证法之先，可以不依据唯物辩证法而能够获得科学知识，而不知道，倘若不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在唯物辩证法立场上来研究事物，则具体的科学知识也是不可能的。这种思想的错误，在大后方已经有人批评过了。陈力文先生在《读书月报》第27期这样写道：“向林冰先生首先把对象的具体科学认识与辩证法分裂开来，机械地对立起来，他认为要运用辩证法，必先对事物有具体的科学认识。但是我们要问这具体的科学

认识是怎样才能获得呢?难道是用形式逻辑或其他方法吗?”又说:“具体对象的科学认识决不能离开运用辩证法法则而获得。”这批评是很中肯的。

辩证法唯物论的理论是唯物论的，方法是辩证法的。所谓理论是唯物论的，就是说这种理论是反映客观物质的发展规律的理论，就是真正科学的理论。所谓方法是辩证法的，就是说它所以能认识客观物质的发展规律是因为运用了辩证法的方法。或者说它是用辩证法的方法来研究客观的具体物质现象的相互关系，才能掌握了这科学的理论。“各现象之由辩证方法所判定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乃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发展规律。”(《联(共)布党史简要读本》)掌握充分的客观具体材料，用辩证法来分析研究这些材料所提供的对象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就可以得到对事物之具体的科学认识，而辩证法唯物论的实际应用于中国，也不外就是依据充分的中国的具体事实来进行辩证法的分析研究，而这也正是科学的研究。向林冰先生的思想，明明是把辩证法法则拒斥于科学方法的门外，这不是提倡辩证法的实际运用，相反地却是阻住了辩证法的实际运用的道路，这样的错误思想，也是需要严格地批判纠正的。

关于辩证法唯物论的运用(或一般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不但进行了以上的一些理论的争论，而且抗战以来已经有了不少的实际应用和中国化的成果。首先我们在解决中国的抗战的实际问题上就有了许多辉煌的范例。而在这中间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以及毛泽东同志及朱德同志的关于游击战争问题的著作，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辩证法唯物论应用的最大的历史收获。在这些著作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是怎样依据他们无比的实际斗争

经验，运用了辩证法的方法，把中国社会的具体特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以及当前抗战中的国内国际的情况，加以科学的分析总结，而把握了抗战发展的规律，把握了关于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科学理论，并指出了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斗争的前途和办法。例如在《论持久战》里，著者把抗战中敌我对立势力的关系，给予一个全面的具体的概括（进步与退步，大与小，多助与寡助，弱与强），从这里，找出了我们能够坚持抗战以至于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据（我们的抗战的进步性，是可能胜利的"主要的根据"）和条件（有利的和困难的），并且依据有利条件（大国和多助）和困难条件（弱国）的对比，确定了抗战的长期性，确定了三个阶段的抗战发展规律。并且进而指出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两方面的错误。又例如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著者依据中国革命中间各阶段势力具体的对比关系，依据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间的领导作用，依据中国所处的历史环境条件（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指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新的性质和新的发展规律。此外如在军事方面的游击战（犬牙交错，大块小块）的理论，主观的能动性对于客观的关系的理论（例如：特定的历史条件与主观能力的优劣决定战争发展过程——《论新阶段》），关于中国新文化的理论，以及其他的具体问题等等，都表现出辩证地依据中国具体现实条件来研究问题的光辉的范例。这些著作，证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辩证法唯物论的应用，是能够最正确地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论是完全适合于中国的国情的。我们无须乎把它"化"作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相反地正是要坚决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看问题，才能科学地解决问题。我们也不必要在辩证法之外再来一个非辩证法的"科学认识"的"前提"，我们只要把唯物辩证法的原则正确地掌握了，

这样来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时，就能够在实际上把握客观的规律，认识斗争的方向，而在哲学本身上，就能够把唯物辩证法的方法加以具体化，加以发展。这样，这几本著作，在中国的辩证法唯物论的研究上，也是有许多新的贡献的。

辩证法唯物论的实际应用，不仅仅表现在解决抗战的大问题的时候，而且也表现在日常生活问题方面。抗战以来，关于待人接物，道德修养之类的生活问题，也没有被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所忽略。相反地，中国的共产党人把这些问题当做是与政治问题有密切联系的，而目前比起政治问题来，也并不是更不重要的问题。因此，在辩证法唯物论的立场上来解决道德修养问题的研究，抗战以来也表现了许多成绩。最重要的，如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如洛甫同志的《论待人接物的态度》，以及《解放》上一些关于道德问题的文章，都是辩证法唯物论在中国的实际应用的一种表现。

对于抗战的，以及生活、修养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是辩证法唯物论的实际应用的一个方面，它的另一个方面，是对于中国的固有哲学的研究，是对于中国自己的过去哲学史上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的发扬，以及对于中国的形而上学和唯心论思想的批判。这一方面也有它的相当的成绩。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史的问题大部分还没有解决，又由于中国古代文献的研究解释也还有不少的问题，当然不能说目前的研究已完满无缺，然而在一些著作里，还是有许多新的见解的。向林冰的《中国哲学史纲要》，这是对于中国全部哲学史的整部著作，也是想从辩证法唯物论的立场上来写中国哲学史的，但这部书有它的缺点，即是许多基本观点（特别是中国社会史的观点），都承袭了日本社会法西斯蒂秋泽修二的解释。除了以上的表现之外，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还有许多个

别的比较零碎的研究可以看到。一般的说，这工作还只是在开始，它还有着极广大的未开垦的处女地。

抗战以来中国辩证法唯物论思想发展第二个重要表现，是对于辩证法的某些理论问题开展了比较深入的讨论研究。在这些研究讨论中间，无疑地曾发生了一些脱离实际的、烦琐学派的、名词争论的倾向，然而总的发展方面，仍是向着实际应用的任务的方面发展的。特别是在联共党史翻译到中国来以后，那第四章里关于辩证法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一节，对于中国辩证法唯物论的研究发展上无疑地给予了很大的影响。如果说在这以前我们的争论中间烦琐学派的倾向较多，那么在这以后这种倾向就有意识地渐渐被纠正，而走向更实际的方面了。

哪一些问题是在抗战以后被提出来并且更深入的研究讨论了呢？

我们这里只能最重要的提出来讲一讲。抗战以后不久，首先在理论战线上提出来的就是关于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的关系的问题。争论之所以引起来，是由于潘梓年同志的《逻辑与逻辑学》一书的出版。这部书的目的，显然是企图把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的关系给予一个具体的全面的解決，这一问题在抗战前也有过争论，然而所涉及范围仅仅限于一般的原则，不曾涉及全部形式论理学和辩证法的各方面的问题。因此，潘梓年同志的企图，显明是抗战后辩证法研究上的一个大进步。然而在他的著作里包含着许多基本论点上的错误，以致引起了争论。

第一个引起争论的，就是关于辩证法怎样吸收形式逻辑的问题。潘梓年同志的意见，认为辩证法对于形式论理学，可以把它分做三个不同的部分，加以分别的处理。第一个部分是形式逻辑的三个思维律，即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等，是“绝对不能

用”的；第二个部分是形式逻辑关于思维的各种理论，即概念论、判断论、推理论、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等理论，“则须加以根本的改作而构成思维方法的一部分”。第三个部分是形式逻辑的一些技术规则，如“关于词，命题，三段论的各种规定以及密勒五规则与统计法等等，则全部收编起来。叫它们充当技师而列为思维技术”。这一个意见，引起了很多人的批评，差不多一致地都认为这样分别处理形式逻辑的各部分，是不对的，因为形式逻辑是有机的整个的方法系统，它的技术规则、理论，都是以它的思维规律作基础的，如果形式逻辑的理论要加以改作然后吸收作辩证法的一个有机因素，那么，它的技术规则也必须经过改作才能“收编”，而不是无条件的“全部收编了”。这一个问题，在原则上可以说已经得到了结论，目前所缺少的，是还没有一部新的著作出来，不是在原则上，而是在具体的各方面的问题上，从思维规律一直到技术规律，阐明辩证法怎样把形式论理学加以改作，吸收。潘梓年同志的意见是错误的，然而就这一点上来说，他却做了他应做的工作。而在批评他的一方面，却还没有能够用新的工作来代替他。这是还需要研究辩证法唯物论的人进一步努力的。

第二个争论的问题是关于学与术的争论的问题，而这问题也是从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问题引起的。因为潘梓年同志关于形式逻辑的技术规则的“收编”论，乃是以他自己对于学与术的关系的认识为前提。他认为学与术，虽然是一体，同时也可以分开，因此可以把逻辑的研究分为逻辑学与逻辑术，而在逻辑术的部分，就可以把形式逻辑的技术规则全部“收编”过来，作为辩证法支配下的“技师”“走卒”。这一个见解，首先受到了李达先生和和培元等人的批评，他们的论据认为“学是术的指导原理，术是学的具体应用”，因此一定的学决定一定的术，而一定的术必然只能适

合于一定的学，而不能无条件地移植到另外的"学"的范围里，形式论理学的术和它的学，它的理论，是有分不开的联系，因此不能直接成为辩证法的术。"一种术与它有密切联系的那种学，是一个不可分的有机的统一体"，"我们决不能从甲种科学中抽出其学的方面，从乙种科学中抽取其术的方面，而把这两者勉强凑在一起去创造另一种科学"，"单就这一点看来，可知形式逻辑所应用的各种术，必须加以改造才能运用"（李达：《形式逻辑扬弃问题》）。

争论的引起是由于向林冰先生起来反对以上的主张。他反对学决定术的原则，而主张"术决定学"。他的立论，是在于把"术"看做与"实践"和"生产技术"同一意义的范畴，而把"学"看作与理论同一意义的范畴。实践决定理论，因此术决定学。这一个见解，引起了其他人的反批评，因为这显然是建立在概念混乱之上的错误思想。因为问题中的所谓"术"乃是"学"的具体应用，这里所说的"学 "是指理论原理的知识，它的内容是对于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则的认识，术是指导实践行动（包括生产技术）的一些具体的方法规则，而这些方法规则的确定，是要依据于客观规律的知识，依据于理论，依据于"学"的。因此，不同的学，就有不同的术，而潘梓年同志讲到的逻辑术，其实就是以形而上学的理论原理为基础的形式论理学的思维技术，这样的学与术的关系，不能和实践与理论的关系简单地同等看待，而就这样的关系上来说不是术决定学，而是学决定术，就是很显然的。关于这一点，李达、和培元、陈茂仪等人的文章已经详细的阐明了。

科学理论对于实践的能动的指导作用，就在于它不停止于抽象的理论，而要由理论具体化为各种术的方法规则，就在于要通过"术"而与实践结合起来，就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理通过战略策略（当然战略，策略也不简单只是术），而与无产阶级的革命

运动结合起来一样。如果说学对于术不起决定作用，如果说理论原理不能把一定的原则方法给予实际行动，那就是等于说实践永远只能是自发的，那就是说理论对于实践无从发生能动作用，就是说理论只能成为客观事物规律的消极的反映，只能说明世界而不能改变世界，这样，即使有科学的理论的存在，对于革命运动也没有什么决定的重要意义了，——这是在关于学与术的争论上，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一个着眼点。

第三个争论的问题，是关于认识论上的感觉与思维的问题。这问题也是由潘梓年同志的“收编”论所引起的。因为对于感觉和思维的他的特殊见解——也是他的“收编”论的论据之一，在他看来感觉与思维有许多不同之点，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感觉只能认识事物的表面现象，认识个别的既成事实，在这里，谈不到逻辑，谈不到辩证法。辩证法是思维的方法，辩证法只能运用在思维的范围之内，所以能把形式论理学方法全部收编，就是因为形式论理学的这一部分是“感觉的方法”，收编过来也不至于侵犯辩证法的地盘。“辩证法才是思维方法，形式逻辑中所有现在还可以用得着的那些部分，只是思维活动已经决定了在某一具体情况之下要取什么方法之后所需要的一些技巧。”（逻辑学与逻辑术）这样，辩证法只能在我们进行纯粹思维甚至于抽象思维的时候才能运用，而一涉及“具体情况”时，就要用形式逻辑的术来补充了。这见解，最先引起了张宗植先生在《战时文化》上的批评，他主要指出两点：第一这不是用辩证法扬弃形式逻辑，而只是用“形式逻辑给辩证法本身的补充或附加”。第二，这不合乎列宁的辩证法认识论论理学的一致性命题，不懂得辩证法是从物质到感觉，从感觉到思维的认识发展的总规律，“把逻辑的规律认为只是思维的内在规律，自然滑进了概念的先验性、思维的超越性的境界中”。

诚然，潘梓年同志忘记了辩证法是世界一切事物的总法则，把感觉和思维的活动性质形而上学地绝对分开，限制了辩证法运用的范围，因此他要“摆脱感觉的束缚”，“冲破感觉的局限性”，单单在悬空的思维的领域里去找辩证法的认识，这是在认识论上的一个唯心论的倾向。

对于潘梓年同志的这一个见解，向林冰先生也在《理论与现实》创刊号里给与批评。他强调感觉认识的源泉这一个唯物论命题，来和前者的“摆脱感觉的束缚”的思想相对立。但他自己却陷入了另一偏向：太强调了感觉认识的作用，不理解感觉到思维的运动是人类认识由现象到本质的深入过程，也就是陷入了感觉论或经验论的倾向。这在他自己已经提出了自我批判了。

以上三个问题，是抗战后哲学战线上争论得比较热烈的，比较重要的问题。除此而外，自然还有不少的问题提出讨论，如量与质的关系问题，否定之否定的问题，以及关于《哲学选辑》的提纲中的许多批评。这些争论，一般地说来，虽然不免还有着某些烦琐学派的性质，但是单就理论水准说来，已经显示出比抗战以前提高一步的趋向。在抗战以前，我们还看不到这样热烈，这样比较广泛、深刻的理论上的争论。特别是在联共党史出版以后，理论的研究是更进一步向着联系实际的方向努力了。依据第四章哲学一节，在哲学战线上有着很多的翻译、介绍、研究、阐发的工作，直到现在，许多研究辩证法的人，仍然依据这一节的基本原则和精神，依据中国的抗战和革命的实际经验，努力想就辩证法唯物论的一切问题，作一个全面的新的研究，而某些新的，不是简单抄袭而是有多少创造意义的成绩，也渐渐表现出来了。

抗战以来辩证法唯物论思想在中国的发展的第三个表现，是辩证法唯物论应用于各门科学的企图。在自然科学的方面，由于

中国自然科学的落后（这是与中国的生产技术的落后密切联系着的），自然还做不到（至少今天做不到）像恩格斯列宁那样，把当代的自然科学成果加以全面的总结，然而在哲学战线上今天能在这一方面表现出某些努力，在中国说来也是一个进步。例如葛名中先生的《科学的哲学》一书，虽然它也只是一般地解说了辩证法唯物论的教科书式的著作，在系统上也稍嫌旧了一些，然而在一部分问题的阐明上他曾应用了他的自然科学的知识，这是比抗战以前的这一方面著作进步的地方。在心理学上也有辩证法唯物论的研究，如刘泽如同志的《行为研究举例》，虽然有人说它是含着机械论的观点，但这批评还不能说是定论，因为这是初次的尝试，缺点是不能免的，然而作者确是有意识的想把唯物论辩证法应用于心理学，这一点主观努力却不能否认。此外如在军事科学上的应用，除了毛泽东同志及朱德同志的著作外，还有郭化若同志的军事辩证法的一般的研究，以及对于中国的旧兵法和古代战史的研究，都是很有成绩的。

以上就是抗战以来中国辩证法唯物论思想发展的概略的情况。这里有着许多新的成果和进步的表现。告诉我们辩证法唯物论在中国是更进一步向着“联系实际”和“具体化”的方向走过来了。这里已经不是以介绍性质的研究为主，而是想根据中国自己的现实材料，在中国自己的地盘上，来发展辩证法唯物论的世界观，使它更能够成为改造中国、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锐利的方法武器。自然，现在的成果，还是很幼弱的，虽然中国无产阶级党的领导者在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上，表示辩证法唯物论在实际应用上获得了伟大的成绩，然而一般研究辩证法唯物论的人，在他们的工作中却还表现着很大的弱点。他们对于中国的现实的认识，还不够充分。他们没有能够精密的研究过中国的历史，中国

今天的环境，以及中国革命的经验，他们也没充分研究过，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中国过去和现在的各种哲学派别。因此，在现在，还看不到一种充分能够以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为基础的辩证法唯物论的著作（虽然不能否认也有某些尝试，如胡绳先生，陈唯实先生等的有些著作），对于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研究，也还没有很好的成绩，而最值得提到的，就是抗战以来的争论，差不多都是在辩证法唯物论本身内部的问题上打圈子，而对于其他各党派的哲学思想，则几乎没有任何批判。这是莫大的缺憾。这一切，都是需要我们今后进一步努力做到的。

三、唯生论和力行哲学

陈立夫先生的唯生论，是在抗战以前很久就发表了的哲学思想。这种思想，代表着十多年来当权的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世界观，并且是这些年来在中国与辩证法唯物论相对抗的最主要的思想之一。这种思想不像辩证法唯物论那样，在中国的青年中间受到真实的关心，然而因为是与政权的力量相结合的缘故，在中国十年左右的思想战线上，却能够保持了相当的影响。特别是在抗战以后，在武汉失守以后，国内思想斗争随着反投降妥协的政治斗争一同高涨，国民党的一切刊物杂志用了极大的力量来对唯生哲学加以宣传和阐述，并且在蒋介石先生的“力行哲学”的名义下，给予了某些新的发展。力行哲学和唯生哲学，在基本思想和社会基础上说是一致的，所以我们放在一起来评述。

唯生论哲学的提出，标明了要同时反唯物论和唯心论的两种偏见，但主要目的是在于反对唯物论。在陈立夫先生的《唯生论》的“导言”里，这样说道：“近几年来，唯物论之论调日见嚣张，唯心论的论调，又失之空寞，结果举世滔滔，既沉沦于物欲

的追求，更忧伤于心灵的桎梏。在这唯心与唯物两种偏见，戕贼下的中国人，尤其是一般思想未熟的青年学生，我们不可不有一种新的正确的理论，把他们从潢绝港中唤回。”唯物论既“日见嚣张”，所以在有心挽救青年的唯生论者看来，一定是最大的危险，反对唯心论，虽然也当作一个任务而提出来，但当前要着重的，是在于反对唯物论，这是从字里行间，可以体会得出来的。

所谓“日见其嚣张”的唯物论，在实际上当然是指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因为在近十几年来，在“思想未熟的青年学生头脑”中最占地位的哲学思想，正是辩证法唯物论而不是其他。然而可惜，正如一切反对唯物论辩证法的人都不能够真正懂得辩证法唯物论的内容一样，唯生论者之反对辩证法唯物论，也是先加以曲解，而后与这自己理想的敌人进行斗争。堂·吉诃德对风车宣战的奇观，在中国也到处重现：“我们看西洋工业社会中的家庭，人与人之爱日渐淡薄，人与物之爱日渐浓厚，因之唯物观念中毒甚深；马克思学说也就是依据这种心理而来的。”（陈立夫：《我国的社会教育应怎样实施》）这里所反对的唯物论，其实只是庸俗的物质主义，至多也只是机械唯物论，而唯生论者竟然把一切唯物论，连同辩证法唯物论在内都看成机械唯物论。对于辩证法唯物论的这种曲解和反对，明明是无的放矢的！

唯生论主张宇宙的本体是心与物的综合，就这一点来说，是二元论的表现。“宇宙间一切的东西，都是由精神物质二者配合而来。有物质必有物质的能力，精神，有精神必有精神的本体，物质。所以宇宙没有一个绝不附丽物质的精神，也没有一个绝对无精神的物质。”（《唯生论》，第36页）“宇宙是定量的不可分的精神和物质之和谐的一切配合。”（同上书，第44页）这样，精神不是物质的反映，不是物质发展到一定的高级阶段的产物，而是与物质永

久平行地存在于宇宙中的东西，所以“矿物也有精神”（同上书，第33页）。唯生论认为宇宙的一切万物是由“元子”所构成，而“元子”，就是生命的单位，就是“生元”，就是物质和精神的配合体。所谓元子，是有许多等级的，生物的细胞是一种元子，化学的分子也是元子，化学原子也是元子，电子也是元子，它们的不同是构成的“层次”不同，也就是所包含的精神的多少不同，“灵性”的高低不同，然而都有生命则是一样的。“在我们唯生论的见地，是认为宇宙万物都有生命的，并不承认唯有动植物才是生物，或者说根本就不承认宇宙间有一死物。”（同上书，第20页）“‘元子’之构成物，其层次愈低者愈先构成，愈高者愈后构成；其层次愈高者构造愈复杂而合理化，灵性愈多，生活愈强，其层次愈低者反是。”（同上书，第32页）

这种“见地”，并不是新的发明，而只不过是“物活论”的一种中国的再版罢了。

唯生论的哲学，是以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中的某些因素为渊源，以孙中山先生的某些话做为根据，但唯生论哲学本身，并不就是孙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而只是他的一部分思想的附会夸大的产物。所以如像唯生论者所说的，把唯生论本身当做就是“总理宇宙观”，这是可以斟酌的。第一，孙中山先生从来没有把唯生论这名词来称呼自己的宇宙观；第二，孙中山先生也曾讲到“生元”这一名词，然而他所谓的生元，只是指的构成生物的细胞，是有一定范围的科学名词，并没有用它泛指宇宙万物的构成单位，并没有把分子、原子、电子等等都附加上“生元”的同一性质。如果说孙中山先生曾主张过物质和精神并存的二元思想，甚至于以为精神的作用高于物质（见中山先生《军人精神教育》），这是对的，如果说孙中山先生已经是十足的唯生论者，说他的“生元和元子在

本义上就是一个东西”，“元子就是万物的生元”（《唯生论》，第 20 页），则就未免牵强附会，就是孙中山先生自己，也恐怕不会赞同的吧。

唯生论是第一次大革命以后的国民党的支配的宇宙观，它和第一次大革命时亲自领导国民党的中山先生的宇宙观，是有许多不同之点的，虽然同是国民党的领导者的宇宙观，并因此在某些论点上有渊源关系，然而思想本身和社会性质，都有很大的改变了！中山先生的思想里包含着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性质。在很多问题的解释上，在知难行易的学说和“民生史观”里，有着唯物论的倾向，而在唯生论里，却有着浓厚的大资产阶级的反民主的色彩，在哲学本身上，唯心论和神秘主义成为它的主要倾向：

第一，孙中山先生的思想有着启蒙主义的性质，重视科学知识（“知难行易”说的积极方面就在这一点），反对迷信神鬼（对基督教学生演说时他曾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基督教的上帝创造思想相对立）。但唯生论却不但在理论上对“神的境地”（《唯生论》，第 13 页）作了论证，而且承认事实上的超人类的鬼神的存在，给宗教迷信大开方便之门（唯生论第 40 页写道：“比人类更有精神的东西是什么呢?这也一定是有的——如假传的鬼怪神仙之类”)。这是它的反启蒙主义的也就是愚蒙主义的倾向。

第二，孙中山先生的思想是心物并重的二元论，他在人类社会生活的行动问题上强调精神的力量，只在这一方面他夸大了精神的独立作用，而有着唯心论的倾向（辩证唯物论也不否认在人类行动中的精神的积极的能动作用，但认为精神本身必须正确反映物质发展的要求，才能够有这种积极能动作用，所以最后的基础是在物质方面，这一点是和唯心论不同的）。中山先生从来没有把任何精神的原理作为宇宙万物的创造主，基本上他承认物质世

界的自然存在和自然进化过程,这一点说来他是有唯物论倾向的。唯生论却从中国的旧封建哲学中借来了一种精神的原理“诚”,作为世界的创造者。“唯生论第五讲就是把诚作为‘生命的动力’来立论的专篇:‘诚者物之终始’,如果没有诚,就是没有元子,也没有动力,当然更无所谓物了。所以说‘不诚无物’。”(同上书,第152页)所以唯生论只是在表现上是二元论的,在本质上却是完全唯心论的,世界的最后的创造者既是精神的原理,所以是精神决定物质,是精神产生物质了。如果一定要说唯生论就是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的发展,那么这是向着彻底唯心论神秘主义方向的发展,而所以有这种发展,就是由于唯生论是附加了中山先生的思想里从来没有过的创造世界万物的精神原理:“诚”的原理。

第三,中山先生也常常讲旧道德,然而他在旧道德的名词之下,常常充实以民族的,民主的新内容,他常常努力使旧道德的名义服从于新的事实,如在《军人精神教育》中他讲到“智”、“仁”、“勇”三种道德时,就不是《大学》、《中庸》上所讲的封建时代的智、仁、勇,而是他所要求的革命的新军人的智、仁、勇。中山先生的基本精神,是近代的、科学的。但唯生论却是相反地运用了一些近代科学的名词,在科学名词中注入了许多非科学的封建性的内容。如“电子”、“原子”之类都变成道德的本体了!我们只要一读《唯生论》,就可以看出它从头到尾,就是企图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科学名词,曲解一切可以曲解的科学知识,来给《大学》、《中庸》这一些封建时代的文献作注释。不是用新的扬弃旧的,而是使新的屈服于旧的墓穴之内。抗战以来我们如果注意许多解释唯生论和“力行哲学”的文章,我们几乎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即国民党的当权的代表者在哲学上好像并不是以孙文学说为依据,而是把《大学》、《中庸》作为惟一的经典了。这就

是说，如果中山先生的思想基本上是从旧封建社会的壳中脱出（虽然也还残有未能完全脱出的痕迹）而走向近代社会的方向，那么，唯生论却显示出由近代钻回到旧的坟墓中去的企图。武汉失守后大后方的某些复古倾向的高涨，与各种出版物上对唯生哲学的宣扬发挥互相配合，不是偶然的！

“力行哲学”的基本原理，是和唯生论一样的，它的表现是二元论的，并且是常要曲解唯物论来反对唯物论的。“总理把精神的意义解释得很明白，他说，凡不是物质的东西统统叫做精神……所以我们承认宇宙间除了物质之外还有一种精神的东西存在。”（《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的阶段》）“现代唯物论者，仅是讲唯物，完全排除了精神力量，这在东方民族一定是立不住的，就是西方民族也不能离开精神独讲物质所能立住的。我们中国从前，仅是讲唯心，而不注重物质，所以不能够独立，不能够发展。我们要成功一个新时代的国家，精神与物质决不能偏废的。”（《要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先要抵抗日本武士道精神》）

“力行哲学”和唯生论一样，在本质上仍是唯心论的，仍是以精神的原理，“诚”作为创造一切的动力。“力行哲学”认为创造一切是依靠行，“古今来宇宙之间，只有一个行字，才能创造一切”（《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的阶段》）。然而行的原动力就是精神原理，就是“诚”：“我们今天要抵抗敌人，复兴中国，完成革命，并没有什么困难，只是在我们的一念。”（同前）“诚就是行的原动力。”（《行的道理》）

“力行哲学”和唯生论一样，是从中山先生的学说里找出一些根据，同时却给予某些改变，“补充”。唯生论是把“生元”夸大为宇宙的本体，“力行哲学”则是着重在知和行的关系问题上做文章。中山先生在知难行易学说里所说的知，主要的是指科学的知，

这就是说中山先生还很看重依据客观的科学研究来指导我们的行动，在这一点上来说是有唯物论的启蒙主义倾向的。而力行哲学则认为科学的以及其他一切的知之外，还有一种人人生来就有的良知。“良知不是客观的事物的科学性的知识，而是和人有生俱来的主觉的知。”（蒋春圃：《领袖哲学体系》，黄浦季刊二卷三期）然而这种非科学的主观的知，就被力行哲学认为应该是行的出发点，有了这种知，就可以不要其他的以至于科学的知了。“所以总理常讲你们一般党员只要照我所讲的话实行就够了，不要再去求另外的知。他的意思即是：良知是我们大家所固有的，故不必另外再去求知。”（《自述研究哲学经过的阶段》）“我们行的出发点只要是发乎天性，出乎至诚……就不见有什么难易的事，亦决没有不成功的道理。”（《行的道理》）

要求我们在“行”的时候不必诉诸科学的知，而只要内部的良知，要求人们不必看清楚外在的客观规律，而只要诉诸内在的主观信仰，这正是对于中山先生的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式的“补充”。（见蒋春圃前文）

为此，力行哲学就是发展了中山先生的知行学说的消极的反民主的方面，它强调求知之难，强调人类中“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不知不觉”的区别，尤其强调求知对于“后知后觉”者之不容易，因此，为节省时间精力起见，“后知后觉”者就不必自己去求认识，最好是浑浑沌沌地跟着“先知先觉”走就行了。“若是要求学问知识的完全，就是用许多时间，也是不易，求之既是不易，即是很难，后知后觉以及不知不觉的人们只是跟着先知先觉的人们去行，就可以节省时间，完成革命，因为跟着去行是很容易的。”（《自述研究理学经过的阶段》）

要求我们不要求知，而只盲目跟着去“行”——这就是力行

理学的本质。

四、“中”的哲学

在中国，与辩证法唯物论有力的对抗者，并且和唯生论同样地与一定的政权力量相结合的另外一种哲学思想，是阎锡山先生的“中”的哲学。阎锡山先生是民国以来山西的地方政权的领袖，在民国以来连年的战乱中，全国各省的军阀统治者差不多都是此来彼倒，走马灯似地更换了多次，而只有阎锡山先生却在复杂交错的环境中一直维持着他的统治地位。所以，“中”的哲学之不同于唯生论，在社会基础上说，就是后者只是代表大革命以来才当权的国民党当局者的世界观，而“中”的哲学却是民国以来就始终自成一个局面的地方政权当局者的哲学。

唯生论是以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中的某些思想为渊源，并加以“补充”、“发挥”，使之适合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立场。而“中”的哲学却是明白地表现为三民主义之外的另一思想系统，而与“物产证券”、“按劳分配”、“土地村公有”等等独立的政治经济的理想相联系。“中”的哲学的系统的成立，是在抗战以前几年的事，它显然是从两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第一，它是阎先生几十年来统治经验的总结。在征战频繁的时代环境中能长久维持着统治权的稳定，这一方面固然要归功于山西的客观条件，而主政者的权变机巧，善于应付，善于利用内外各种势力冲突的均势而使自己处于稳定的支点，这也是相当重要的。阎先生的统治的立场和经验，显然就是“中”的哲学的基础，儒家的“中庸之道”，“不偏不倚”，“执两用中”的“权”术，显然早就是阎先生治事成功的秘诀，他承认“中”的哲学与儒学的中庸之道“根本相同”，而“中”的哲学本身，不外是根据山西统治者的利益立场和经验，

在新的形式上来把中庸思想系统化了的结果。第二，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斗争的要求，也是促成“中”的哲学的建立的原因。大革命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共产党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积极作用，引起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仇视和进攻。然而十年“剿共”既不能看见很大的成果，马克思主义思想在青年以及进步人士中间的影响又只见日愈扩大，显然凌驾在三民主义思想体系之上。在这样的情形下，一部分统治者想探求一种更好的能与马克思主义对抗的思想体系，是必然的。“中”的哲学的建立，就是以这为重要的任务之一，它不在大革命以前建立，而在大革命以后，在十年“剿共”的中间，也正是为此。这就是阎先生自己所谓的“思想防共”。在“思想防共”的任务上，阎先生应该曾是相当有自信的，因为“中”的哲学不是单纯宣传儒家的中庸之道，而且很苦心地采取了极其时髦的形式，创造了一整套近似于马克思主义而又不同的新的术语，新的论点。比之粗糙笨拙的唯生论，它的立论的巧妙，是高出了许多，就是在中国各派哲学中，它也是很深刻地运用思索力的一种思想产物——当然同时也是阶级的思想产物。在理论战线上，它确是有着相当精致的伪装的一支思想队伍。

抗战后不久，当山西的抗战高潮蓬勃高涨的期间，当全国许多的青年人集中到了山西、民大去的期间，阎先生用了加倍的力量来宣传他的学说。大量编印了各种解释他的学说的书籍。亲自与青年学生们进行了各种问答讨论。他努力要使自己的学说“为知识分子所承认”，努力想在各派思想中间争取主导的地位，特别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是针锋相对的进行了斗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世界观，差不多成了“中”的哲学的主要斗争对象了，虽然同时它也叫做“民族革命”的哲学，也并没有丢开了

抗日的旗帜。

阎先生的各种著作里，除了专门以《共产主义的错误》为名的小册子以外，到处都散见着各种对于马克思主义以及辩证法唯物论的批评。然而“中”的哲学在批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它对于后者的了解的正确性是如何不够，这也是很容易指点出来的，我们只要从《阎伯川先生对民大及随校学生问答类编》里举一个例子来看一看。

“问九六：马克思的学术，究竟是怎样？

答：马克思是五十年前德国的一个学者，他是叙述的一种学术，也就是唯物论派的集大成者。他说社会的构造与变迁，都是受着物的作用所决定，他分社会构造为三；下层是经济基础，以上第一层建筑，是社会制度（为政治法律理论等），第二上层建筑是意识形态（为哲学宗教艺术等），他认定下层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的社会制度，社会制度又决定更上层的意识形态；他完全认定环境决定意志。可以说唯物论的学术，抛弃了人的支配环境的意志作用，他认定人的意志反被环境决定……”

这是“中”的哲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的了解，只要是对于辩证法唯物论略有所知的人，就可以看出这儿所指的其实并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而至多也只是旧的形而上学的唯物论。阎先生说“他（马克思）完全认定环境决定意志”，这只有消极的客观主义才会如此主张，如果是这种客观主义，那自然它的任务只在于说明世界，只在于教我们怎样去解释和顺应这世界，也就是阎先生所说的，这是“成了叙述的学术，由叙述而推断，他推断的原则，也是根据要不要，不讲该不该”（同上）。然而这一切，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毫不相干的，因为谁都知道，马克思自己就曾批评过这种旧的形而上学的唯物论，说他们只知道说明世界，

然而实际上更重要的问题却是在于改变世界（《费尔巴哈论纲》）。

“中”的哲学在理论上是二元论的，而这种二元论，是以唯心论为它的主导倾向。关于意志和环境的关系，它的命题是“环境产生意志，意志改造环境”。“无论是在什么环境都可以产生意志，无论是在什么条件均当以意志改造环境。”（同上书，第35页）“中”的哲学反对环境决定意志的主张，认为被环境决定是错误，“环境决定意志是常人，意志改造环境是豪杰”（同上）。就其承认意志由环境产生，并且承认实际上有被环境决定的“常人”，这一点来说，是有些唯物论的因素，就其主张任何条件之下意志（管不管意志是否违背历史规律）都可以改造环境这一点来说，是唯心论的。

唯物论和唯心论的这种结合，正是“中”的哲学的二元论。这和辩证法唯物论有什么不同呢？辩证法唯物论也承认环境规定意志，意志又反过来改变环境。辩证法唯物论并不简单片面地只认为意志由环境决定。但它不认为意志在任何条件之下都能改造环境，而认为意志必须反映客观物质环境发展的需要时，才能够真正改变环境的力量，否则不但不能改变环境，相反的甚至于会有阻碍环境发展的作用。法西斯蒂的意志，把社会推回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就是一个明证。这就是说，一方面承认意志能改变环境，同时指出最后的基础仍是客观物质的发展要求，这就是辩证法唯物论之为彻底的唯物论的特征。而“中”的哲学，则丢开客观物质发展要求的基础，看重意志在任何条件下改变环境的命题，把主观的能动性绝对化了。这样来看“豪杰”的事业，来看“英雄创造历史”的事业，正是唯心论的。这一点在“中”的哲学里是主导的（这在后面还要详细讲到）。

“中的哲学是心物统一的哲学”（同上书，第23页），“就本体说，是心与物的统一体规定一切”（《民革教育教材大纲》，第7页），这是

二元论的表白。“就效用说是心能格物，物以表心。”（同上）——心不是物的反映，而是“格物”的主动能力，物是被动的表现心意的对象——这是唯心论的表白。这两种表白合起来，就告诉我们：“中”的哲学是以唯心论为主导倾向的二元论。

“中”的哲学的主要特征，是在于它的“求中”的方法论。阎先生对于他的哲学，也是着重地把它当做一种认识事物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来看待的。他认为正确地认识事物解决问题方法就是在于“求中”，中的学说，是在于求得评判一切“事理”的最高的准则。“我是主张中说的。……求中是为定取舍，得中则取，不中是舍，取是存在，舍是抛弃。我以为一个人做事，应该认识不中即不存在，唯中始是存在，意在勉人。”（同上书，第21页）

什么是“中”？“中”就是中国历史的所谓中庸之中，它在本质上，乃是和事物“规律性”的把握有同样的意义的范畴，然而却是把后者夸大了的，多少神秘化了的范畴。事物在一定的条件下，必然表现为一定的运动关系；在不同的条件下，必然表现为不同的运动关系，这就是事物的规律。揭去了神秘夸大的外衣，单就它的合理的内容来说，那么“中”的真实意义，也不外就是事物在一定的条件下的规律的适当的表现，所谓求中，也不外就是要求能够依据不同的条件，能够用不同的各种适当的方法去对付事物处理问题。“‘中’是理的适当处——事之宜于高者，最高处即是‘中’；宜于低者，最低处即是‘中’；宜于中者，正中间即为中。”（《教材大纲》，第2页）“中”既然不外是“理之恰当处”，既然不外是“事之宜”，“是适当的意思”（同上），那么辩证法所主张的一切事物都在联系中存在，“一切决定于条件地点时间”的思想，在实际上已完全把握了所谓“中”的合理的核心了。这就是说，能够具体认识事物的存在条件，正确把握该事物的运动规律，就可

以达到“理之恰当处”和“事之宜”，在事实上这样的认识是无所谓中不中。因为在这里并没有一个绝对的中心点（它可以是“高”，也可以是“低”），不中者，只是对于“恰当处”的“过”或“不及”而言，在一定条件下的适当，对于过当和不当，我们可以称之为中，称之为“正确”，而后两者都叫做偏，叫做不正确。然而这里的中和偏，正确与不正确，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同一“事理”在一定条件下是中的，在另一条件下可以是偏。中的范畴，能看做事物存在和人类认识的绝对本质，而只是它们在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态，把这一个表现形态绝对化，把它看做一切事物存在和人类认识的绝对本质，这样的颠倒，正是中庸思想的秘密，正是中的哲学的认识论上的根源。

这样一颠倒的结果，自然就产生了唯心论和神秘主义：“中”的观念范畴，就被看做世界本体的灵魂，就成了万事万物的根源。世界不是客观物质的自然的自己运动的世界，而是为中的理念所支配的世界，而是这理念的表现，我们只要看这一串串神秘的词句：“‘中’是宇宙的绝对之‘一’，宇宙本体是中的法则之最高表现。”“宇宙万有的真实存在，都是‘中’的正当表现；也都是受着‘中’的法则之合理支配”。“‘中’是世界一切的根源，万事万物的存在发展与变化，都受着‘中’的支配与表现。”（《教材大纲》，第5、6、7页）——这些话完全足以证明“中”的哲学的唯心论的倾向了。

怎样才能求得“中”？什么地方有“中”？“中”的哲学答复说：“矛盾的不矛盾”处能有“中”。“就内容说：‘中’是二的矛盾因素，绝对之一的统一处——矛盾中之不矛盾——矛盾统一。”（同上书，第1页）因此，要能够求得中，就必须在矛盾中求得不矛盾的地方，而“求矛盾的不矛盾”，就成为中的方法论的最高定律。在

这里，中的方法论就提出了一个有着辩证法的拟态而实际上只是形而上学的、折衷主义性质的定律："矛盾对消律"。"矛盾对消律"是什么呢？

"甲、是思考事理，认识事物，解决问题，决定判断的一般原则。

乙、凡物皆由矛盾之两素合成，凡物均含有矛盾的两方：

1. 凡物均由相背之两素合成，两素之相称处为'中'，寻着中以处物，则得其道矣。

2. 凡事物含有矛盾的两方，必须找着矛盾的不矛盾，事始能成：这矛盾之不矛盾，即为事之'中'，故处事必须矛盾对消以得'中'。

丙、处理万事万象，要了解它的矛盾处，再把着它的统一处，才能求出适当的办法。"

这一个"定律"，和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律"形式上近似，本质上却完全不同。近似的地方，就在于把"中"作为"对立统一"的意义来了解，而不同的中心关键就在于在"矛盾对消律"里，"中"的哲学忽视了，或者有意隐蔽了客观事物的对立因素之间的斗争性。斗争的字眼，在阎先生的哲学词典里，可以说是完全找不出来的。"中"的哲学和辩证法唯物论在理论上以及阶级本质上的差别，其核心就在这里。辩证法唯物论告诉我们：在事物的对立方面之间，斗争是绝对的。既然斗争是绝对的，因此统一就不是"相背两因素"的静态的和平的"相称"，而是斗争的结果，是在斗争中对立的一方面克服另一方面的结果，统一不是"矛盾的不矛盾"，而是矛盾的"解决"，而矛盾的解决，就是依靠斗争的；不经过斗争，不由一方面克服另一方面，要解决矛盾，要使互相排斥的对立方面得到统一，明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唯物辩

证法的正确看法。而在“矛盾对消律”里，撇开了对立之间的斗争，因此作为“矛盾之不矛盾”的“中”，乃是相背两因素间的调和式的“相称”，乃是对立势力的机械式的“对消”，不是革命式的，而是改良式的，不是斗争的，而是妥协的，这就是所谓“求中”的态度，这就是中的哲学的形而上学和折衷主义。

事物的对立的斗争既是绝对的，因此统一只是一定的斗争条件之下的表现形式，或者说，因斗争而产生的一定的运动形式，就是“统一”，就是矛盾的解决（参看《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第二节八段。中文郭译本，第 62 页）。同样的两种对立势力，在不同的斗争条件，不同的斗争力量对比之下，就有不同的“统一”形式。同是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由于发展条件不同，维持资本主义的政治统一的形式，就有民主主义（虽然始终是不彻底的）和法西斯蒂的不同。同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外部和内部的斗争条件不同，大后方、沦陷区以及敌后根据地也表现为不同的形态。这就是说，斗争是绝对的，而统一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可变的。——这是唯物辩证法的正确了解。而在“中”的哲学里，矛盾的“对消”，矛盾的不矛盾，既不是斗争的一定的结果，而是静态的，和平的“相称”，因此就不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可变的。各种对立和各个事物都有它们自己绝对的“中”，不同的对立不同的事物虽各有不同的“中”，而同一对立，同一事物的“中”，就不会因条件变化而有所不同（如后面说的把“母理”看做一定范围的绝对真理），因此，依据“矛盾对消律”的“求中”的方法，就不是在对立的斗争中求一定的运动形态，而是形式的“二的分析法”（参看《教材大纲》，第 26—28 页）——这就是“中”的哲学的抽象论和形而上学。

“中”的方法有两个定律，除“矛盾对消律”之外就是“三一

权衡律”。“三一权衡律”的意义是说正确的认识必须是主观与客观的一致：

甲，凡事物之成就，是主观的判断合乎客观的实际，将主体与客体统一起来之谓。

一，主体是一，
二，客体是一，
三，主客体统一是真一，
——三一权衡律。

乙，亦即：

一，人心所同然者惟一，
二，物之则惟一，
三，事之对惟一。
——三一权衡律。

（《教材大纲》，第 29 页）

“三一权衡律”是对于“矛盾对消律”的补充，这就是说，正确的认识，不但是要依据后者求得“矛盾的不矛盾”，而且同时要依据前者求得主客体的一致。这一个定律，是辩证唯物论的摹似，而实质上是与唯物论正相反对的。因为在这定律里虽然把主客的统一看做“真一”，它所依据以作出发点的，是主体，而不是客体，是要求客体适合于主体，而不是主体反映客体。下面一段关于“三一权衡律”的论纲就是证明：

“三一根于一一，一一不见，三一不显，故当先见人心所同然之一。

乙，以一一立三一，一一不得，三一不立，故当先得自心之一。

丙，因为一，果为一，因果相合是真一，权为一，物为一，权物相符是真一，内有一，外有一，内外符合是真一，三一可权衡万事中。

丁……

（同上书，第 29—30 页）

把“人心所同然之一”、“自心之一”和“因”、“权”、“内”等当做同列的范畴，主体就等于“因”，这是主观主义，十足的唯心论。不但着重主体的一，而且认为主体的“一”即是人心所同然的“一”，所谓人心同然，就是说人的意识不因社会阶级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由这种抽象的“人心”出发的方法，不是形而上学是什么？

主观主义——唯心论，加上折衷主义——形而上学，这就是“中”的哲学的方法基础。由于这样的方法，把它的理论上的二元论，物心统一的本体论，都变成一句空话。

什么是这里所依据作出发点的“主体”与“人心所同然”的东西呢？由“中”的哲学的全体系看起来，那就是它的所谓“母理”。

“‘中’为理的极则”（同上书，第 4 页），所谓理，就是“法则”（包括物的“必然法则”和“事”的“当然准则”，同上书，第 3 页），所谓“求中”，就是求掌握“理的极则”，就是求正确地认识“法则”。这也是近似唯物论而实质上不同，问题是在于，中的哲学之所谓“理”，并不是全指客观事物的必然的运动规律，它是二元的；认为法则有两种，一种是“物”的“必然法则”，一种是“事”的“当然准则”。“法则”的两种区分，又展开为“母理”和“子理”的区分。所谓母理——“是‘人事界’及‘人事界内’，各个范围普遍的，适当的，抽象的，超时空的‘当然准则’；换言之即‘评价根据’”。所谓子理——“是‘人事界’及‘人事界内’各事之个别的，具体的，随时空的‘必然法则’；换言之，即‘现实规律’”（《教材大纲》，第 18—19 页）。“母理专对人事而言，子理是含

有物理在内。”（《问答类编》，第 54 页）

把专对人事的“当然准则”叫做“母理”，而把含有物理在内的“必然法则”，“现实规律”叫做“子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一，世界上的“理”是两重的：客观物质的“现实规律”，是随时空变化的“子理”，而人类的主体，“评价根据”，却是超时空的永久的“绝对真理”（“母理”是人事界一定范围内的“绝对真理”——《问答类编》，第 47 页）。二，主体的“绝对真理”是“母”，客体的物质的现实规律是“子”，这就是说，就“人事”来说主体的思想在前，客体的现实在后，是前者规定后者，而不是后者规定前者，这是在唯心论的立场上来解决主客的关系：“万事是根据不变而变的，子理是变的，母理是不变的，子理的变，是根据不变的母理而变的，且是为适应母理而变的。”（《问答类编》，第 89 页）“子理是合乎母理而变的。”（《教材大纲》，第 29 页）

三一权衡律之所以把主体作为出发点，其根据就是这关于“理”的母子关系的唯心论的理解。

“中”的方法论给认识方法定了“三个原则”，即解决问题时要从三个方面的问题来着手：一，该不该；二，是不是；三，能不能。“凡事应先问‘该不该’，‘是不是’，‘能不能’”（《问答类编》，第 55 页），“该不该”是专对人事的问题，是人在主体立场上对于事件如何给予评价的问题，“是人事界各事之评价概念，‘重求对’”。“是不是”，是对于客观事物的如何认识问题，“是表示一切事物认识的判断”，“重说明”。“能不能”，是研究事件有无可能条件的问题，“表示一切人事能为不能为之判断”，“重实践”（以上均见《教材大纲》，第 20—21 页）。这三个原则之中，哪一个是基础，是出发点呢？“中”的哲学答复是“该不该”的原则。这就是说，不是以客观事物的认识（即“是不是”）为解决问题的出发点，而是以主

观对于事件的评价作出发点,因为“该不该”的原则是根据“母理”来的。人事第一要紧是“该不该”,母理是“该不该”的准则(《问答类编》,第55页),“是决定事的根据”(《教材大纲》,第89页)。虽然这里似乎只限于“人事”来说,并且声明:“物理第一要紧是‘能不能’,子理是能不能的根据”,好像物理界可以不由“该不该”出发的意思,然而“能不能”既是根据“子理”,而“子理”又是“为适应母理而变的”,那么,“能不能”始终只是为着适应“该不该”的条件问题而已。三一权衡律的唯心论的根源,就在这里。

如果是辩证法唯物论,在解决“该不该”、“是不是”、“能不能”的问题时候,就应该以“是不是”为出发点,为基础的,首先认识“是”怎样,然后才能定该怎样和能怎样。“当然准则”必须依据于“必然法则”。例如我们已认识客观的规律“是”:只有坚持抗战才能胜利,妥协就是灭亡,因此我们就应“该”坚决抗战到底,反对任何妥协投降的倾向,而这里面也就自然包含着能胜利的可“能”条件。这就是一元的,唯物论的真理,“是”、“该”、“能”是分不开的三因素,而同时统一于“是”的基础上。“中”的哲学却把三者形而上学地分开了,“当然准则”,“必然法则”和“可能条件”被看做绝不相关的三个东西。而却又折衷的机械的把三者结合起来,并且想把“必然法则”的子理,适应于与它无关的“当然准则”的母理,想把变的客观条件适合于绝对不变的主观目的。这是不可能的,与客观规律相违背的主观目的和主观“准则”,是不该,也不能的。社会的规律“是”向前发展,保守阶级的目的却要它不发展,这就是不“该”,也不可“能”。想把任何客观规律都适合于自己的主观目的,是“中”的哲学自身的解不开的矛盾,同时也是反映它的一定阶级性的思想矛盾。

并且“该不该”的“当然准则”也不能是真的绝对不变的

“生为人事之最高母理”，这是“中”的哲学的得意命题，因为它判定人要求生，是绝对不变的。然而如果生是“人事”的最高母理，那么“人事”和一般动物植物的“事”，就没有分别了。因为动植物的求生，也是不变的。所以这一个命题，其实是太抽象无内容的命题，无从成为真正评价“人事”的“当然准则”。要具体规定评价人事的当然准则，倒不如阎先生自己所主张的“按劳分配”之类，还更具体切实些。“按劳分配是劳享分配的母理”（《问答类编》，第58页），“劳享分配”是“人事”，按劳分配是它的母理。然而这是永远不变的吗？这是与客观物质变化规律无关的，仅仅人类主观的绝对的评价准则吗？如果社会的生产力已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可能让人需要什么就有什么，客观的规律已表现我们有这样的条件，“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那么，到那时我们还不应“该”主张“按需分配”，而把“按劳分配”当做陈腐的垃圾一脚踢开了吗？唯物论一定要答复说：“应该”。相反地，倘若客观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不到可以令人“各取所需”的时候，那么，就不应“该”提出“按需分配”，不到能提“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时候，就不应该提出“按劳分配”。在苏联，已经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值”，虽然向着“各取所需”的方向努力，却还不“能”也不应“该”提出“各取所需”的要求。在抗战中的中国，我们应“该”提出改善工农生活的要求，然而由于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准“是”很低的，又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我们最高的原则，所以就不应该像苏联一样提出“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要求。客观物质规律是变动的，依据客观规律的“是”的认识而定“该”的标准，这标准也是变的，而“能”的条件也是同时在变的。人只能提出他能解决的任务，当任务提出来的时候，也是在客观物质的发展中已具备了解决条件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对于

"是"、"该"、"能" 的关系的辩证的，也是唯物论的理解。

就退一步讲，生为"人事的最高母理"是对的，那么，求生的必要之作为评价的当然准则，也是决定于物质发展的一定阶段的规律。因为生命的物和无生命的物，是同一物质世界发展的不同阶段，只有当物质由无生物发展为有生物时，生的要求才成为不变的要求，当生物衰老死亡了时，它本身也就没有生的要求了；同时在客观规律上它已是死物或必然要死的物时，它的死也就是应"该"的。法西斯蒂是不是该死呢？答复是：它"是"必然要死的，同时也该"死"的。死对于法西斯蒂，对于没落腐化的社会集团，是必然法则，也是当然准则，正如生对于新兴的进步社会制度和社会人群，是必然法则也是当然准则一样。这一个辩证法的真理，是"中"的哲学者没有提到，不肯提到，也不敢提到的！

"万变之中，有个不变的中心，此不变的中心，为支配万变的根因"，"静为'动的动力'，并非动为'动的动力'"（《教材大纲》，第16—17页），"动是静生的，所以静是动的动力"（《问答类编》，第41页）。"中"的哲学把母理与子理的关系推广起来，就达到了这样一种反辩证法的结论。为什么动是静生的？因为"行动是动，目的地是静，行动是目的地生的"，"欲是静，遂欲是动，目的地是欲，向目的地行是遂欲。"这样就有了一切决定于目的的目的论思想，"中"的哲学的唯心论本质，再没有比这表现得更露骨的了。不错，动之中包含着静，然而静只是运动的一个相对安定的一方面，是运动中的一定的规律。例如在抗战中有千变万化的斗争，这是动，是万变，然而在斗争中中华民族必然结成统一战线，也只有经过统一战线去求得战斗的胜利，这是静，是不变。但这不变的规律，乃是在运动中的事物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表现，是运动中的事物及其具体联系决定它自己规律，而不是规律支配事

物的运动，是斗争中的中日民族中间的各种矛盾关系规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不是先有统一战线的目的，然后为着这个目的而进行抗战，即统一战线不是支配抗战的“根因”（“特定的历史条件与主观能力的优劣决定战争发展过程”）。我们人类认识了客观的规律，把握了运动中相对静止的方面，据此来规定我们的目的，推动我们的行动，这是真的。然而在我们能规定目的之先，早已有了客观事物的运动，早已有了它的运动规律。最后的基础，根因，是在于客观物质自己的运动发展，而不是在于任何预定的“目的”。正如我们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号召的目的，乃是因为中日民族矛盾的客观事实发展中间，统一战线的前途已经作为一定的规律的萌芽表现出来了的缘故。把客观事实与目的关系加以颠倒，把人的行动与目的的关系误植到事物与其规律关系上去，把世界拟人化。这就是“中”的哲学的目的论的来源。

恩格斯批评唯心论的时候，曾举了一个比喻：果实的概念，乃是人的认识对于具体果实（桃、李、梨等等）的一般的方面的抽象反映。一般的（相对不变的）果实概念原是以具体的（千变万化的）果实为基础而产生出来的一个抽象观念，唯心论却反过来把果实概念当做了具体果实的本质、灵魂和创造主。“中”的哲学的唯心论，也可以作如是观：所谓“母理”，原不过是万变的事物所表现出来的一个相对安定的方面，原不过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的认识，而现在却被“中”的哲学看做万变之“母”，而客观世界的永恒变动的事物，却都成了它的“子”了！

以上就是“中”的哲学的主要内容。

（原载《中国文化》第3卷第2、3期合刊，1941年8月20日；曾收入《艾思奇文集》第一卷）

反 对 主 观 主 义

(1941.9)

理论研究的重要，是用不着再解释了的。毛泽东同志早在党的六中全会上就号召我们学习理论，并且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使之向着胜利，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实际运动的了解，就不能胜利。"

任何理论都有这重要意义吗？当然不是的。理论本身必须是具有革命的性质，才能够对于革命运动发生这实际的力量。有仅仅以说明世界为满足的"理论"，也有以改变世界为任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倘若我们所学到的理论，仅仅能够对世界作一片天花乱坠的解释，而不能指导我们去改变世界，它对于革命自然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看来，一切不能指导行动而只足以供课堂上吹牛嚼舌的教条性质的东西，即使表面上很像理论而实际上仍不能算作理论。

我们要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这也是用不着说明的。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的掌握着了？

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们的党在实际斗争中曾努力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特别是抗战以后，党中央正确地应用这个理论来分析抗战中一切重大的问题，结果得到了最成功的解决。然而就一般的来讲，抗战以前，我们固然曾因为在理论上

与实际上都常常不能正确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因而对于革命招致了许多损失；抗战以后我们一般的学习研究，也还不能说真正走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正道。六中全会以后，在党中央的号召之下，学习运动虽然高涨起来，而且现在也并没有低落，我们曾从马列的原著、选集、概论之类的书籍里学取了很多的基本知识。然而学取了书本上的知识，并不能算真正掌握了理论，倘若这些知识仅仅是书本的知识，而不能对于实际问题的解决有什么作用的话。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力量，就在于它给党以可能来在任何环境中确定方针，来了解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来预见事变的进程，来不仅知道事变在目前如何发展和向哪里发展，而且知道事变在将来如何发展和向哪里发展。”（联共党史结论第二条）试问在今天我们学习的结果，能够真正给了我们这种力量没有？事实告诉我们：我们有许多同志，对于书本的研究曾用了相当大的力量，然而在处理实际问题的时候，却表现没有能力。尽管有人读过《资本论》，或者熟读了经济学的一般理论，然而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规律却茫然无知，甚至于对于边区、延安的经济变化，也没有能力加以说明，尽管有人把列宁主义的战略策略的原则条文背得烂熟，而一谈到中国当前政治斗争在一定时候一定地方应采取的策略问题，却毫无解决的头绪。尽管能够在文字上记诵辩证法唯物论的各个特征，仍然要提出这样的疑问：“究竟辩证法是怎样个用法？”仍然不能解决这疑问，仍然不懂得怎样在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立场和方法上来分析中国的一切事变发展，仍只是死记一些空洞的辩证法的词句。这就是证明，我们还没有正确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斯大林同志曾指出有两种马克思主义者，一种是懂得马克思

主义的实质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种是只能背诵词句的“引用的马克思主义者”、“括弧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凡能熟读马克思主义书籍的人，都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倘若我们熟读了的只是文句，而不能把握它的实质，倘若只能在吹牛的时候从事宏博的引证，而不能应用来解决实际问题，那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回顾我们几年来学习的结果，我们应该老实的批评一下：在理论的掌握上，我们还没有成为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至少我们还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概论的讲述者，还没有成为很好的实际应用者。

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在于我们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是唯物论的。我们没有认真以唯物论的态度来进行研究学习。我们的学习是主观主义的，形式主义的。

所谓唯物论的理论，就是承认物质世界的每一种事物现象，都有它自己本身的必然规律，承认如果我们要改变世界，改变社会，改变每一种事物，都必须要依据它们本身的这些规律。也就是说，要使我们的革命行动走向胜利，就必须熟悉我们所要改变的周围环境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之所以能够给党以在任何环境中确定方针的可能，就在于它是要掌握，而且能掌握一切环境中的事变的具体规律，就在于能使我们依据这些规律，来预见事变的进程。

因此，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标准不在于从书本上学习了多少，而在于能否了解自己所要改造的周围环境的规律，如果我们背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句、公式，而对于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规律却毫无所知，那我们就不能算真正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只是空洞的文句引用者。因为这在文句上虽然像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事实上却已失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唯

物论的实质了。

唯物论与唯心论中间并没有隔着铜墙铁壁，只要在运用上略一歪曲，唯物论的理论就立刻可以转化成唯心论。哪怕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之下曾经是正确反映客观规律的唯物论的理论知识，而在另外的环境条件之下简单地被引用时，就可能变成主观的唯心论的公式。哪怕我们所谈到的一切结论和原理是直接从马克思列宁的原著里引用来的，在我们读它的时候，只要眼睛一刻忘记了看清楚中国的实际的环境条件，它就不再是反映客观事变的发展规律的唯物论的原理，就会变成没有实际意义的教条。

然而我们在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当中，曾是严重地犯了主观主义唯心论的毛病。

在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候，就曾经把它当做脱离实际的空理论来接受的，中国没有直接产生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最初是依自己的需要，从先进的国家学取这种思想。这种情形，有它的好处和坏处，好处是我们不费很大气力，就能够学习到人类最先进的思想理论，坏处是我们的学习因此就容易被外国的书本知识所束缚，而忘记了在中国的具体应用。老是跟着外国跑，自己就没有能力来作新的发挥。抗战以前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研究固然总是限于介绍和通俗化的范围，抗战以后我们的学习也没有超出概论知识的圈子，但仅仅从外国学来的原理知识，在外国的条件下无论怎样正确，拿到中国来时，如果不与中国的具体环境相结合，则无论在它的基本原则上是怎样正确，实际上仍是会变成错误的。例如在哲学上，我们曾经跟着读布哈林的“唯物史观”，我们也曾经跟着苏联反对机械论，我们亦曾跟着反对德波林。反对德波林的唯心论，这自然是需要的，然而当我们跟着反对苏联的德波林，而对于中国自己的唯心论主观主义却

毫不注意或一声不响时，我们自己也就会变成德波林主义者了！因为德波林之所以是唯心论，并不是他没有使用了唯物论的理论词句，而是它使理论的研究脱离实际的革命任务。我们丢开了中国的实际革命运动中的主观主义错误不管，来反对苏联的德波林，也仍然是一样的脱离实际。这就是我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理论当中的形式主义的例子。

书本字母的、形式条文的接受，养成我们学习上的主观主义的恶习：只善于空原则的辩驳和空理论的清谈，而对于任何问题的具体了解对于一切事实的具体调查研究都没有兴趣。于是对于任何问题的解决判断，对于任何行动的指导，都不从客观的事实出发，而从主观的推想出发，不依据具体的事实情况找出具体的正确办法，而只凭主观的感想来判断一切，这就是主观主义，唯心论的整套作风。

主观主义是危险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是害死人的”，它不仅仅是使我们在理论的学习研究上没有结果，而且在实际行动上会招来很大的损失，这是在过去的革命的斗争的经验中可以找到证明的。

克服主观主义反对唯心论掌握唯物论的理论，这是我们在学习理论中应该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并不是不需要学习的。这些知识是前人的科学研究的成果，我们从这里可以比较容易地学取许多宝贵的结论和原理。重要的是如斯大林同志所说的那样：要区别文句和实质，要学习把握它的实质而不是背诵文字。要点在什么地方呢？要点就在于当我们研究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中的一切个别结论和原理时，必须注意到这些结论和原理，都是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之下的事变发展规律之认识，必须把这些结论和原理和它所产生的环境

条件联系起来研究，必须注意到，在中国的情形下面，不一定都能简单适用这些原理的论点。这就是说，我们的学习，不是简单地要求“诚心的读熟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中所有的个别结论和原理，学会按时引证这些结论和原理而以此自慰，并希望已读熟的结论和原理将能适宜于任何环境，将能适宜于一切实际情况。”我们的学习，要紧的是要求懂得马克思列宁怎样依据自己的环境的实际情况，而获得了这些理论的结论和原理。这就是说，我们是要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论新阶段》)，学习它们的唯物论的方法的实质。

仅仅从书本上去学习是不够的，即使我们真能从书本上学到了正确的立场与方法，如果不进一步依据这方法去分析研究中国社会的一切实际情况，不努力去找出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各方面的发展规律，那么，前面说的立场与方法，仍只是主观的东西，没有任何实际的结果。立场与方法，只是我们的工具，如果只以掌握工具为满足，而不加以应用，那么工具仍等于废物，至多也只是装饰门面的古董。所以，即使正确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还不能算是掌握了它的理论，至多也只能说掌握了一小半。唯物论的理论，是要在不断的实际应用当中才能够存在。如果一时一刻停止了实际应用，那仍然是唯心的空论，而不是马克思列宁的唯物论的理论。

“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同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也必须是具体的；抽象的，纯粹概念式的了解，不能算是真正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的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

开中国特点来讲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须解决的问题。”(同上) 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个号召，已经过了数年了，但我们在理论的学习研究上还很少注意。我们怎样来响应这一个号召，来掌握具体的、中国化的、带着中国民族特性，按照中国的特点来应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呢?这就必须要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研究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一切发展规律，就必须使我们的理论当中，包含着丰富的中国社会环境和中国历史的规律知识，而不只是一些仅仅与外国社会有关的结论和原理的把握。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因为“它既然是科学，就不是固定而且不能固定在一个地点，它是发展着和完善着的”。在不同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在中国的新的条件之下，我们应该掌握一些新的原理和论点，新的规律知识，来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内容，而不应该只是墨守着一些既成的概论式的原理和论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这一方面就是我们辉煌的模范。举最大的来说，例如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理论，抗日的持久战的规律知识，统一战线的战略策略的理论，就是中国的党在全部马克思主义的宝库中增加进去的许多新的东西。

为着使理论更有效地指导中国革命，我们还须要在这条道路上大大的努力，去获取中国社会的更多方面的更具体的规律知识，而不能仅仅以粗枝大叶的认识为满足。要做到这一些，在我们的理论研究学习上，就必须更切实采取唯物论的立场和方法。这就是说，不是从书本的概论知识学习，而要从中国的一切具体情况的调查研究出发。要详细搜集中国社会的各方面的事实材料，从这些事实材料的分析中，去找出事变发展的具体规律。“没有调查，

就没有发言权。”仅仅依据书本原理的主观臆测的言论，是应该停止的。我们的学习目标，是唯物论的理论，而不是主观主义。是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具体的规律知识，而不是书本的公式和教条。

（原载《解放日报》1941年9月19、20日；曾收入《艾思奇文集》第一卷）

谈主观主义及其来源

(1941.10)

主观主义有两种基本形态，书本教条主义是一种主观主义，狭隘经验主义也是一种主观主义。

在理论的研究上，从“五四”以来，我们曾不断地从外国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我们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于是就开展了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然而许多学习马列主义的人，单纯看重书本的知识，而对于中国实际情况却不喜欢研究，因此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常常是简单地从书本上的某些词句出发，而不是依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把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在中国具体应用。有些人能背诵苏联反对布哈林机械论和德波林孟什维克唯心论的许多原则，却很少注意中国自己有没有具体的机械论和唯心论。有些人跟着人说中国有“亚细亚生产方式”，有些人曾经引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明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停滞，而对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具体情况却不加以详细的研究。有些人的理论文章，常只是根据一两句名言，就长篇大论地发挥一大套议论，而几乎没有一点实际的内容。有些人研究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六对范畴”，只是凭借教科书上的词句和自己头脑里的杜撰，而不从中国的历史、社会和中国革命的丰富的具体知识里去概括，这样一来，我们的“理论”知识，自然就与中国的客观物质基础脱离，自然就更缺少推动实际运动的力量，自然就只能够剩下一个主观的空想。这就是书本教条的主观主义。

在长期的实际的革命运动中，我们获得很多中国特有的新的斗争经验，也因为以毛主席为首的我们的许多领导者能够总结和运用这些经验，中国革命才有今天的发展。然而许多人在吸收取得经验的过程中，曾常常走到这样的偏向，把一时的，一地的，或某一件事某一方面的经验夸大，把它看做对于中国革命全过程具有普遍性的东西，把它机械地运用于任何情况，这也造成一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

狭隘经验主义也就是一种主观主义，这有许多人往往不能了解。有些人有一种错误的认识，以为重视具体情况的都是狭隘经验主义。其实能够真正重视具体情况的人，他一定不会成为狭隘经验主义者。因为他必须要注意到周围环境的各方面的联系，他必然不能只注意到狭隘的某一方面。只有任意把事实和经验的某一方面夸大而忘记了其他的人，才会成为狭隘经验主义者。这样的人似乎也注意到实际情况，而其实却永远不可能真正把握实际情况，永远是主观主义者。

书本的教条主义和狭隘经验主义不是绝对对立的。它们经常地互相渗透。教条主义者并不能真正完全浮在天空，它常常要从客观事实里，割取某些个别现象，作为它的脚垫，它要用教条的大帽子来俘虏一些经验主义者，使后者为它提供一些片面经验的材料，作为教条公式的“例证”，使它的贫乏的思想内容获得一些似乎实际的色调，使人们乍看起来不容易很快发现它的空洞性，这就是书本教条主观主义和狭隘经验主义的联系。反过来，狭隘经验主义者，也往往会引用某些书本的文句，来装饰它的孤陋的见闻，来壮大它的声势。然而壮大了的结果还是主观主义。

为什么在革命队伍中会产生主观主义呢？

主观主义有它的社会基础，有它的思想根源。它的产生，要

由两个方面来说明：

在中国革命运动的参加者中，城市和农村的小资产阶级占着最大的成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党，包含着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员，这是主观主义所以会在革命营垒中产生的社会基础。

教条主义是中国的传统，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在几千年来就善于用礼教的教条来麻醉人民。近代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又把崇拜外洋的奴化意识在人民中传播。中国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不能不多少受到这些意识的影响。在革命营垒里面的书本教条主义，正是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者的意识在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中的影响的表现。

狭隘经验主义主要地是农民的特点。他们的分散的、小生产的、小私有的生活，养成他们眼光短浅的狭隘意识。狭隘经验的主观主义，是农村小资产阶级的意识的反映，这是很容易明了的。

就思想的根源来说，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是分不开的。片面的观察事物和理解事物，把事物某一方面的现象孤立起来，夸大起来，忽视了它和周围其他事物的联系，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正是使我们的思想脱离真实的客观认识而变为主观主义的根本原因。列宁说："哲学的唯心论，是把认识的诸特点，诸方面，诸限界从物质和自然隔离开来，使它片面地，夸张地，过度地向着神化了的绝对发展下去的东西。"（《哲学笔记》）

什么是教条主义呢?科学的书本上的原理原则，本来也是反映客观物质运动的真理的知识，然而它常常只是反映抽去了许多具体事实的比较一般的运动规律，如果把书本知识的这一方面绝对化和夸大了，忘记了它和一定的现实事物条件的联系，特别是忘记了我们今天的事实条件，例如在解决中国问题时，只公式地引用书本的个别原理，而不注意中国的具体情况，这就是书本教条的主观

主义。所以教条主义，就是把以前已经被人认识了的某些原理原则夸大了和绝对化了，使它脱离了与具体条件的联系的结果。

什么是狭隘经验的主观主义呢？就是把经验知识的一部分夸大和绝对化，夸大到把部分看做全体，绝对化到排斥了一切具体联系不管。满足于一知半解，以一知半解为真知全解。教条主义是夸大了片面的原理知识，狭隘经验主义是夸大了片面实际知识，形态不同，而本质上是一样的。

主观主义（也就是唯心论），是和形而上学分不开的。反过来说，唯物论和辩证法也是分不开的。要成为真正的唯物论者，就必须有辩证法的方法，对任何事物和任何问题都要作全面的具体的观察和了解。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图轻便，不能偷懒，不能随便抓着一点就任意发挥一大套，而应该老老实实，科学地，认真地以具体情况的精密的调查研究做基础。

唯物论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是一个东西。没有辩证法，就没有真正的唯物论。

怎样克服主观主义，就是要克服片面夸大、“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形而上学的思想病，就是要养成惯于对具体情况做系统周密的了解的健康的认识作风。这说起来似乎是很简单的，而做起来却还需要我们很大的努力。最近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如果提到哲学的原则来说，就是要求我们向这一方面努力的一个号召。因此，这一个决定，不仅仅是在实际政治发展上有重大意义，同时对于我们的思想方法的改造上，也是一个新的飞跃的起点，在我们接受这决定的指示的时候，这是必须深刻地加以注意的。

（原载《解放日报》1941年10月14日；《新华日报》1943年1月9日转载；曾收入《“有的放矢”及其他》和《艾思奇文集》第一卷）

庆祝郭沫若先生五十寿辰*

(1941.11)

郭沫若先生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上以至革命运动上的业绩，用不着多在这里描述。十几年来在先生熏陶影响之下成长起来的大批进步青年的存在，就是最好的事实明证。先生之所以受到无数进步人士的追随和景仰，不仅是由于他的如火的热情和不断精进的精神，而且是由于他所走的道路正是新中国发展的道路。他是自由、民主、真理的热情的讴歌者，也是勇敢的实践的追求者。对于深受侵略、压迫和愚昧的毒害的旧中国，他应用了科学方法的武器，给了重重的打击。我也是受过熏陶的一人，在先生的五十寿辰的今天，谨以最诚恳的心情，祝贺先生的健康，祝贺先生的战斗事业的发展和胜利。

（原载《解放日报》1941年11月18日；《新华日报》1941年11月27日转载）

---

* 在《庆祝郭沫若先生五十寿辰》同一题目下，还发表了肖三、陈伯达、长虹、草明的庆贺文章。

不要误解“实事求是”

(1942.4)

延安现在“整顿三风”运动中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大家争着揭发事实。揭发事实，是完全必要的。主观主义的根本病源是不能“实事求是”，对症下药的方法是调查研究。揭发事实的运动，使我们对具体知识的兴趣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思想，开始从枯燥空虚的教条八股解放出来而向着活泼生动的感性世界前进。这是党的正确号召的赐与。但在努力揭发事实的热潮当中，有没有人反省一下：我们对付事实的态度，是否很正确的呢？

所谓“实事求是”，是否仅在简单罗列各色各样的事例？是否将工作中和生活中的缺点枝枝节节，零零碎碎地指摘出来，就算达到反主观主义的目的？这是值得研究一下的。我们既是，或愿意是辩证法唯物论者，而不是狭隘经验主义者，那么对于上面的问题就只能给与否定的答复。经验主义者可以满足于感觉事类的例举，以为这就算是客观的知识，但辩证法的唯物论者却不能这样，不是要简单指出事实，而必须进一步应用理性的头脑，对事实加以理解；不是为事实而找事实，而必须从事实中求出它的所“是”；不是单纯做调查工作，而必须把调查所得的材料加以分析研究。

我们这样做了没有？我们曾正确地以辩证法唯物论者的态度去对待事实了没有？这是应该反省一下的。在这样的反省之下，我们应该答复说，很多的人（虽然并不是全部）是没有能保持着这种正确的认识态度的。他们误解了“实事求是”，以为只要做一个

“有闻必录”式的新闻记者，把各色各式的珍奇而有趣的消息向群众报告出来，就算是尽了今天的思想斗争的责任。在这样的误解之下，就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倾向。

真正的实事求是，首先必须注意事实的各个方面，而不是只看片面。在指摘某一现象时，必须明了它在现象全体中所居的地位，而不是离开全体来孤立看待。例如批评缺点，不能简单以看见了某些缺点为满足，却必须要知道，它在全部生活或工作中的位置是个别或是普遍的缺点。指摘人的过失时，必须辨别这是进步的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或是堕落腐化中所产生的不可救药的罪恶。如果孤立地来看缺点和过失，不分开个别的现象与普遍的情况，只看见人的错误方面而忘记了人的进步方面，那虽然能指出缺点和过失的事实，却不能真正理解这些缺点和过失的现实意义，并不是真正的实事求是。有些人以为“整顿三风”，主要目的就只在于“暴露”，忘记了真正的任务是“治病救人”。指摘缺点是为着发展优点，阐明过失是为着保证进步。因此，用全力来专门揭发过失，而不肯把过失和进步加以适当的衡量比较，于是过失和缺点，常常就被片面夸张了，批评失去积极的意义，变成消极的挑剔，甚至变成“冷嘲”、“谩骂”，没有“与人为善”的态度，却近于对人打击的态度，于是个别人的较好的生活享受被形容成延安以至全边区的“贪污腐化”，上级对下级的某些不关心的现象被比拟作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这样对事实的态度，是未得其“是”的，是与“整顿三风”的原意离得很远的，是不能发生改造思想改造工作的积极结果的。

真正的“实事求是”，必须从实质上来理解事实，而不应该只就表面现象来看事实，或为形式的假象所迷惑。有些事物在实质上相同而在形式上可以全不一致，有些事物在形式上相似而在实质上却是全然相反的东西。不能分开形式与实质，在认识上就会

造成很大的混乱和错误。苏联政治上的一党领导和德国法西斯一党专制，被一些反动的说教者归结为同一政治范畴，而在中国还有一班人把这种观点作为根据，来反对民主政治，抹煞实质的区别而只从形式上来作类比和附会，就会制造出这样荒谬绝伦的诡辩！把延安的津贴制度上的差别称做等级制度，把工作余暇看戏的事情也认作腐化——这一类的观点之产生，正因为对事物采取了表面形式的看法，所以就轻率地误认了思想斗争的目标。

形式的看法也正是一种片面的看法，正是由于把眼光局限于某一点，而忘记了它和其他方面的关系。形式的看法不能引导我们正确地去认清事实，却只能使我们误解事实；不能引导我们去揭发真正的错误和缺点，却常常制造出一些幻想的缺点。它使我们进行徒劳无益的堂·吉诃德对风车的斗争，使我们的言论变成九斤老太的饶舌，明明是自己的牙齿朽坏了，却要怪炒豆子变得太硬。纠正这种错误的思想方法是必须的，那就在于研究事实的时候，不要只从表面的某些现象来类比和附会，而必须就每一事实的各个方面来作全面的具体研究；这样来正确辨别，什么才是我们所要揭发的真正的错误和缺点。

真正的“实事求是”，由于以上的理由，就必须把事实看做一定具体条件之下的事实，必须依据每一事实所处的条件来确定它的正确意义，即使所揭发的错误是真正的错误和缺点，而不是对表面形式的误解。但同一错误和缺点，在不同的“时”与“地”一定有不同的意义。例如官僚主义是政治上的坏现象，不论在革命政权之下或在反革命政权之下，都有这种现象，而且都是真正的坏现象，然而其坏的意义，在这两种场合上是不能等同看待的。在革命政权下它是妨碍工作的，但同时是能够被克服的现象，是反革命政治影响的残遗而不是现存政治制度的必然的产物。相反地

在反革命政权之下，官僚主义却是现存制度的不可分的属性，甚至于是为维持现存制度所必不可少的属性，除非这制度被推翻了，官僚主义是不能被克服的。

延安工作人员中也有个别贪污现象，不能否认这是很坏的缺点。然而不论从量的方面或从质的方面说，都不能把它和大后方(当时对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区的称呼)的许多大官僚的贪污行为等同看待。不这样分别清楚每一事实在不同条件下的不同意义，那么即使真正指出了事实，证明了事实，然而在事实的理解上仍然有所歪曲，仍然不得其“是”。

真正的“实事求是”，不仅仅在于理解事实和认识事实，而且要从这理解和认识中求得指导行动，推动工作的方法。所以要正确地揭发我们的错误和缺点，目的决不在于要找到一些嘲笑和诅咒的材料，而是为着要能够想出办法来纠正这些缺点和错误，来改造我们的工作，使它走上正确的道路。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革命的行动家，我们的认识，是为着实践，为着改变世界的，我们不需要为认识而认识，单单揭发事实，并不是我们的目的。并且就认识的本身来说，如果不能指导我们考察出一些正确的工作方法，也就不能证明它是正确的认识。所以，在揭发事实理解事实的时候，同时要伴随着一套解决事实问题的方法，才叫做“实事求是”。我们有许多人，在讨论党的许多文件决定的时候，常常不能这样做。或者是就文件而讨论文件，只是从字面上加以复述和解释，或者是略举一些生活和工作中的例子，来证明党的决定是“十分正确”，是值得“完全接受”，却不能依据决定，依据事实的检讨，来改造工作方法，创造新的工作作风。这都是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而党的决定是工作方针；不了解所谓“实事求是”，不仅在于要“求”解决“是怎样”的问题，

而且要求解决“是怎样办”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从毛泽东同志那里学习到最多的东西。我们只要举出他在1929年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会议所作的决议来看（见整风文献中《反对党内几种不正确的倾向》），就可以看出，他怎样善于在分析每一件事实的时候，就同时考察出正确地对症下药的办法。

“实事求是”，就是在揭发事实的时候同时依据以上的一些原则（仅只是一些主要的原则）来进行研究，以求对事实获得正确的理解。在今天整顿三风的运动中，有许多人是不这样做的。他们观察事实，不是全面的而是片面的，不是实质上的而是表面的，不是在一定条件下来理解其意义而是作一般的说明，不是积极地想办法而是消极的指摘。因此，有些言论（文字上的和口头上的），确是不免陷于琐碎、混乱和夸张，甚至于使批评近于辱骂，揭发变成诅咒，这对于不正的“三风”，是不能产生“整顿”的作用的。虽然在今天，运动才是开始，重要的是发动大家多多说话，不正确的意见不能全免，不能因为顾忌到偏向，而阻止言论的展开，然而如果能在思想方法上多多注意一下，努力把握真正的“实事求是”的真精神，把偏向尽可能地减少一些，这却也是必要的。

“整顿三风”是党的思想（包括思想方法）上的改造运动，首先是要把主观主义转变成辩证法唯物论，把教条主义转变成与中国实际密切联系的理论。在这里，揭发事实调查事实，是必须的工作，然而却只是第一步的工作，倘若就此停止了，不再前进一步，以正确的态度来处理事实，那就会走上另一种偏向：狭隘经验的夸大。这是另一种主观主义。以主观主义来反对主观主义，是不会有结果的，所以这也就必须加以注意。

（原载《解放日报》1942年4月22日；曾收入《“有的放矢”及其他》和《艾思奇文集》第一卷）

介绍五四文化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争论

(1942.5)

一

在五四文化运动中，有一个重要的，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这是五四文化运动中无产阶级思想代表人与富于妥协投降性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人——李大钊同志与胡适之间的思想方法上的争论，也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诞生后一次重要的思想战。在这个争论中，显示了当时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五四文化运动的领导作用。

争论是在 1919 年 7 月到 12 月之间进行的，正是在五四运动的狂风暴雨爆发之后不久：俄国十月革命已经在中国思想界发生了很大影响，马克思主义已开始为中国人所熟悉。这使得五四运动不但是一个彻底摧毁中国的旧教条的文化革命运动，而且由于马克思主义输入到中国来，使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获得了新的性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开始就得要对各方面反动势力进行战斗。在反动的统治者中间，马克思主义是在日本人捏造的“过激主义”的名字下面受着各种诬蔑，这也显示出反动派对于这一个伟大思想的恐怖情绪。内务部下令严防“过激主义”，曹琨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卢永祥也出来查禁“过激主义”。北京有几个老官僚在酒席上叹气说：“不好了，过激派到了中国了。”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为着登载李大钊同志的一篇《布尔塞维主义的胜利》,《新青年》的编者陈独秀被捕入狱,这就是当时反动统治阶级惊惶失措的状态。

参加新文化运动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对于俄国革命也不能理解或简直是无知。蔡元培根据布勒斯特条约对德国暂时让步的事实,以为这是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的实现。“妇女国有”之类的胡说,胡适也似乎很相信了,因此他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里,竟提到“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的话。对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阶级斗争的学说,胡适更是极端地反对。在这种情形下,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时,与改良主义的自由资产阶级所发生的第一次的思想斗争。

二

争论开始在 1919 年 7 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一篇题名《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他反对当时许多人谈各种主义,主张只研究眼前的个别的问题。他提到的主义,有军国主义、无政府主义等,而对于“社会主义”、“过激主义”说得较多。胡适并不分析一下各种主义中间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胡适的立场、观点、方法,也不容许他认识各种主义有什么不同,特别不可能认识到布尔什维主义(即所谓“过激主义”)的科学性质,只提出几点和布尔什维主义毫不相干的理由,来笼统地反对谈主义。他说:

“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

“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同上）

眼睛里只看得见一个个表面事件的实验主义者的胡适，也举出了一些不加分析的事实来证明这种危险。他说是亲日的安福部政客，在当时也出来讲社会主义了：“前几天北京《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皆安福部的报）和日本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讲，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的研究会’的办法”，“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般新舆论家一个教训吗？”（同上）

也不分清楚反动派为了欺骗而假冒的什么“主义”和革命者所提倡的革命理论有什么不同，胡适就给他所谓“高谈主义”的人定了两个罪状：第一，是懒：“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同上）第二，高谈主义而又自认为所谈的是“根本解决”的方法，“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胡适反对了别人“高谈主义”以后，自己却仍然要“高谈”起自己的“主义”来，那就是爬行经验主义，庸俗的实验主义，他说：“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

接着胡适的文章，有蓝志生在《民国公报》上的折衷主义的批评。题目叫《问题与主义》，主张问题固非必须研究，主义也要谈。理由是问题有大小、有广泛的与局部的。要解决局部的问题，“自然用不着主义学说来鼓吹，只要求具体的解决方法，便有结果”，“《问题与主义》”要解决“广泛的，含有无数理想分子的问题”，就必须先有主义的鼓吹，“必定要鼓吹这问题的意义，以及

理论上的根据，引起了一般人的反省，使成了问题，才能采纳吾们的方法”(同上)。蓝志生当然也不了解科学的布尔什维主义和其他什么主义的根本区别，因此他笼统的主张问题不一定都是具体的：广泛的问题，宁可说是抽象的，“凡是革命问题，一定从许多要求中，抽出几点共通性，加上理想色彩，成一种抽象性的问题，才能发生效力”(同上)，并且相信，抽象性愈大的主义，“效力”也愈大：“抽象性大，涵蓄力可以增大，涵蓄力大，归依的人数愈增多。”本着这种唯心论的理由，蓝志生主张主义应该谈，主义本身并没有危险，危险只在于有时实行的方法不对：“危险不危险，全看择术的精确不精确，择术不精，才有危险。”并认为胡适以恐怕被人利用为口实而反对谈主义，是“因噎废食”。

李大钊同志第一次在中国思想界展开了科学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他用给胡适公开信的方式（题目是《再论问题与主义》）来解释了主义的真实意义。他对于胡适的反驳分为四点。第一：问题和主义分不开。理由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因此要解决问题就必须有主义的宣传，“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为社会上多数的共同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所以谈主义是要的，重要的是不要空谈。“高谈虽没有什么不可，必须求一个实验。”主义的危险，“不是主义本身带来的，是空谈他的人给他的”。而要不流于空谈，就必须把一般的主义和具体的实际联系起来：“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际两方面。……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所不同。”“主义的本性，原有适用实际的可能性，不过被专事空谈人用的，就变为空谈罢了。”

第二：关于“假冒牌号的危险”，李大钊同志以为任何一种学

说都可以被人假冒，“却不能因被假冒就停止宣传。王麻子不能因为汪麻子等也来卖剪刀，就关了他的剪铺，王正大不能因为汪正大等也来贩茶叶，就歇了他的茶庄。”

第三：不能因为反动派的过激主义之类的造谣而忌讳谈主义，因为即使不谈主义，单谈问题，反动派也一样造谣。“若说是谈主义的不是；我们就谈贞操问题，他们又来说我们主张处女应该与人私通。……我们唯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那些猫、狗、鹦鹉、留声机，尽管在旁边乱唱：过激主义哪，洪水猛兽哪，邪说异端哪；尽管他们乱给我们头衔，哪有闲工夫去理他！”

第四：关于“根本解决”的问题。李大钊同志指出，整个社会如果没有“生机”，“没有组织”，那么个别问题也不可能解决，“这个时候，恐怕就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在这里，他用唯物史观的观点，来说明根本解决的必要和可能。“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的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李大钊同志反对自发论和客观主义，特别提出阶级自觉运动的重要，即是说：不能等待经济上的必然的变动，而必须依靠自觉的斗争去争取改造的加速实现。“天下只是在群众里传播那集产制必然的降临的福音结果。除去等着集产制必然的成熟之外，一点的预备也没有作，这实在是现在各国社会党遭了很大危机的主要原因。我们应该承认：遇着时机，因着情形，

或吸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

在李大钊同志所提出的无可辩驳的科学理论前面，胡适不能不表示退却了一步，他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想用诡辩来补救他的败绩，为要掩饰他前次文章的笼统性和非科学性，他被迫声明他所反对谈的主义，乃是变成了抽象的空名词的主义，如果是有具体内容的理想，那他好像也是赞成的，好像“和我的原文所说的话，并没有冲突”。但下面一句似是而非的话却显示他仍想用诡辩阴谋来保持原来的阵地，他说“蓝李两君所辩护的主义，其实乃是抽象名词所代表的种种具体的主张。如此所说的主义，我并不曾轻视。”这一句话表示他仍然努力想打消主义的意义，而把主义消解在他的爬行的一个一个的经验里。

胡适对于蓝志生的折衷主义找到了进攻的空隙，即把主义和问题机械地分开，以为个别问题的解决不需要宣传主义，而主义的宣传是为的解决广泛问题；以为个别问题是具体的，而主义是抽象的；“问题的范围愈大，那抽象性亦愈增加”。胡适进攻蓝志生的理由是：“问题的范围愈大，我们研究这种问题所需要的思想作用格外繁难，格外复杂，思想的方法，应该格外小心，格外精密。”蓝志生把主义当作一种抽象性的东西，把抽象性看作一种有神秘力量的东西或“最合于人类的一种神秘性的东西”，它的神秘作用，就在于“抽象性下，涵蓄力可以增大。涵蓄力大，归依的人类愈增多。”这种唯心论和神秘主义的观点，就使胡适赢得了说话的余地，他说：“人类这种‘神秘性’，实在是人类的一点大缺陷。蓝君所谓‘神秘性’老实说来，只是人类的愚昧性。因为愚昧不明，故容易被人用几个抽象名词，骗去赴汤蹈火，牵去为牛为马，为鱼为肉，历史上许多奸雄政客，懂得人类有这一种劣根

性，故往往用一些好听的抽象名词，来哄骗大多数的人民，去替他们争权夺利，去做他们的牺牲。不要说别的，试看一个忠字，一个节字，害死了多少中国人？”但胡适反对这种抽象性、神秘性，仍然是为着给爬行经验主义找立脚点。他反对“抽象性”，主张一切都仅只是具体的、个别的，因此连主义中的普遍的方面，原则的方面也否认了。在胡适眼中，主义、“案理”，至多只能作为研究具体问题的参考，而不能具体实现于各种条件之下。于是把李大钊的主张——即主义的理想可以“因时，因地，因事的性质情形”而采取不同的实现方法，主义的普遍原则可以依不同的条件而有不同的具体表现的主张，即普遍与特殊统一，主义与问题统一的主张，——也一并看做是他所谓的“不负责任的主义论”了。

只看见具体的一个个问题，否认了普遍的原理，这正是爬行经验主义的特点，这特点在后来胡适又写了《四论问题与主义》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这篇文章论到怎样输入学理的方法就想抹煞科学理论中所包含的普遍真理。他提出输入学理的三个庸俗实验主义的原则：（1）“输入学说时应该注意那发生这种学说的时势情形”，“一个主义的发生时的社会政治情形越记的明白详细，这种主义的意义越容易懂得完全，那种主义的参考作用也就越大”，（2）“输入学理时应该注意‘论主’的生平事实和他所受的学术影响”，“‘论主’就是主张某种学说的人”。“我们对于‘论主’的时势固然应该注意，但是对于‘论主’的个人的事实与教育，也不可不注意。我们雇一个厨子，尚且要问他的家世经验，讨一个媳妇，尚且要打听他的性情家教；何况现在介绍关于人生社会的重要主张，岂可不仔细研究‘论主’的一生性情事实吗？”（3）“输入学说时应该注意每种学说所已经发生的效果。”在胡适所提的这些“原则”里，显然是一点也没有和不懂得把科学理论的普遍真

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马列主义的原则，同时，在这篇文章里，胡适更明白表示了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极端无知和仇视的态度。他妄想把唯物史观即科学的历史唯物论的“效果”关死在书斋里，说那只是“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开许多生路”。但认为这种历史观，“不一定是社会主义必然实现的理论根据，因为现在社会主义的根据地，已不靠这种带着海智儿（黑格尔——编者注）臭味的历史哲学了。”尤其是对于“阶级竞争”的学说，更表现了他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恐惧心理和仇恨心理，说：“这种学说，太偏向申明‘阶级的自觉心’，一方面，无形之中著成一种阶级的仇视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得劳动者真是一种敌人。”

11 月胡适又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想仍然用他自己的观点来总结这个争论，以至于总结整个五四文化运动。内容有以下几点：（1）新思潮的本质是一种“评判的态度”，是对于一切旧事物的重新估价（在这里，胡适不懂得新思想是在新的进步阶级基础上的新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作者）；（2）评判的态度表现在两方面：研究问题和输入学理（在这里，胡适把问题和学理割裂开，不懂得要把学理中的普遍真理与中国新的具体实践问题结合——作者）；（3）新文化运动的成绩，主要是研究问题获得的，而不是依靠输入学理。因此以后的方向仍是要以研究问题为主，以输入学理为辅（这里胡适仍是要坚持爬行经验主义）；（4）对于中国旧的思想学说要采取的态度是不盲从，不调和，整理国故（在这里，胡适阻止我们为了今天的革命实践目的来研究过去，要我们把头埋进旧的字纸篓里——作者）。最后在结语上再强调一次他的庸俗的实验主义，说解决问题应该是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的解决，

改造应该是一点一滴的改造，而不是“根本改造”。对“根本改造”的思想为什么要反对，胡适并没有提出足以推翻李大钊同志的意见的充分理由，只是作了一个武断而已。

三

在这次论争中，胡适的言论表现了一些什么特点呢？

胡适推崇杜威的实验主义。实验主义是马赫主义在美国的一种支流。它的基本思想完全是主观唯心论（如詹姆士），有时也表现出动摇于唯心论和唯物论中间的倾向。例如杜威对于唯物论和唯心论的问题，是如胡适所说，“以不了了之”的态度（事实上就是动摇的态度）来对付的，这种思想，表面上好像是重视科学的，并且以实验两字作为旗帜来伪装它的科学性，但实际上是否认了科学规律的普遍性和客观真理性，也就是对于科学真理采取怀疑的以至于否定的态度的。

第一，说研究学问要从实际的现实问题出发。“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杜威先生与中国》），“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但却不知道我们可以应用普遍的科学规律知识作为研究具体实际问题的指导方法。

第二，说一切学理和主义须有现实的内容，反对空谈抽象名词，结果是把科学学理中包括的普遍真理一笔抹煞了。因此，要不是就把主义都看作“抽象名词”，一概加以反对，要不是就在“现实内容”这一个好听名词的掩蔽之下，偷偷地把一切主义都武断为仅仅是“具体的主张”，所以他说：“蓝李两君所辩护的主义，其实乃是些抽象名词所代表的种种具体的主张”（《三论问题与主义》）。胡适当然不懂得具体的主张也正是普遍规律的具体形态的表现。

第三，为着要把一切主义都仅仅看做个别问题的“具体主张”，便用了这样的诡辩：首先把一切大小问题都看做一些简单问题的堆集：“我们研究时，……我们应该把太大的范围缩小下来，把那复杂的分子分析出去，使他们都成一个一个具体的简单问题，如此然后可以做研究的工夫。”“譬如手指割破了，牙齿虫蚀了，这都是很简单的病，可以随手解决。假如你生了肠热症，病状一时不容易明了，因为里面的分子太复杂了。”“只有用‘分析’（其实是割裂——作者）把具体的大问题，分作许多更具体的小问题。分析之后，把各分子的现象，综合起来，看他们有什么共同的意义。”“这样综合（其实是堆集——作者）的结果，仍是一个具体问题，仍旧要用具体的解决法。”

第四，凡不是专谈“具体问题”，而涉及普遍规律的研究时，却要被胡适认为是名词的抽象的使用，就要和反动派的假冒的什么主义看做一个东西。

第五，以一切学说必须经过实验的证明，才能确定它的真理性作为口实，来提倡相对主义，把真理看做主观的。“一切（!）主义，一切（!）学说，……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三论问题与主义》）这里胡适所讲的是一套似是而非的伪装科学的说法。主义和学说如果是经过实践证明了的，就是客观真理，而不仅只是假设。客观真理当然不等于僵死不变的天经地义，它是发展的。胡适当然不了解真理都是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统一，它是客观的，这就表示它有绝对的正确性，但它又是不断发展的，这就表示它的相对性。

第六，庸俗的进化思想，一点一滴的改造思想，改良的思想。否认根本改造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把“根本解决”的主张看做

"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否认渐变中的突变，否认在一定情形下渐变必须以突变为前提，一点一滴改造之先必须有根本改造。

四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十月的革命影响之下产生的。因此，它的第一个代表者李大钊同志，一开始就接受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他的《布尔塞维主义的胜利》，表明了他的正确的立场。他的思想方法，在这论争中表现得虽然很简单，但也足以看出革命的科学方法的一个轮廓。

第一，理论与实际联系的思想方法。在致胡适信中关于"主义与问题"的一节里，就包含着这样的思想：主义必须变为具体的行动，必须与实际相联系。这联系是必要的，而且一定可能的。"谈主义的人，高谈虽没有什么不可，也须求一个实验"，"不论高谈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努力去做，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

第二，承认研究实际问题的重要，但同时注意要使普遍真理与具体的实践相结合。一方面"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向实践方向去做。"一方面表明："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际两方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哪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所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

第三，革命的根本改造的思想，革命变革的思想。依据唯物史观的原理，说明经济构造的改变，是其他一切社会上层复杂变化的基础。因此根本的解决，是要从经济构造做起。而在改造运动的问题上，着重提出阶级自觉运动的重要。反对对于唯物史观

的片面了解，反对等待经济变革的到来，而着重提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对于经济变动的重大作用。“专取这唯物史观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变动是必然的，是不可免的，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斗争说）并不注意，丝毫不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有许多马克思派社会主义者，很吃了这个观念的亏。”

这就是与自由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论和改良主义完全不同的，中国最初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

（原载《解放日报》1942年5月4日；曾收入《“有的放矢”及其他》和《艾思奇文集》第一卷）

“有的放矢”及其他

——学习杂记

(1942.5)

一

为什么用“有的放矢”来说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这就是说，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不只是要以中国的事例来解释理论原则，而且必须是依理论原则为指南，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不能解决革命问题的理论，即使用极其丰富的例子来说明，仍然是死教条。

死教条不能有真正的活的理论。

对比喻不能生硬了解。用“矢与的”作为理论与实际的比喻，必须着眼在说明前者对于后者的作用，这样就可以指示出两者的密切联系。“矢”的作用是为要射“的”，没有“的”，也就没有“矢”可言，有些人以为离开了“的”，仍不失为“矢”，这是生硬的错误的了解。理论的作用在于解决实际问题，一旦离开实际，就转化为死教条，成为主观的空调头，不再是真正活的理论。在有些资产阶级学者眼里看来，也许这仍是“理论”，但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

理论本身的成立，是紧紧地依赖于实际的，应该这样来了解两者的统一性。

因此，理论之变为教条，是非常容易的事，一不注意，你手

里所有着的东西就会变成另外一回事了。中国民间传说中有一种专门捣蛋的五通神，得罪了他时，你明明拿在手里的黄金不觉就会变成粪土。理论自然是真金子，你常洋洋得意，以为掌握了这些财宝了，却不知什么时候，你的手里就只有一把毫无用处的粪土，这不是因为你得罪了五通神，而是因为你自己违背了实际精神。

不但马恩列斯书本上的黄金，搬到中国来会不知不觉变成粪土，就是党的决定、指示，这是已经把马恩列斯的理论精神正确应用于中国的实际了的，它也常常会在我们的手里不知不觉变为泥土。

马恩列斯的原则和精神是指南，依据它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就有党的决定。党的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条件之下真正活的应用。它对于各个工作岗位上的同志，又成为理论原则，又成为指南，只有依据它的方向，来具体解决各工作岗位上的实际斗争问题时，它才能够成为活的决定，才是真正有黄金价值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生硬了解"矢与的"的比喻，会以为暂时离开了实际，理论本身仍然可以成立。不错，是可以成立的，然而只是在词句上，不是在实际上。

生硬了解"矢与的"的比喻，会以为离开了对自己岗位上的工作的具体考虑，单从词句条文上来研究和讨论党的决定，也可以对决定获得正确的了解。这是错误的。这样的了解至多仅只能限于在词句上，而不是实质上，真正的精神上。

读文件，然后再检查工作，这是整风运动规定的学习程序，也是必要的程序，但不能只从形式上来划分这程序。以为读文件，目的只在于掌握"矢"，而射"的"是在以后的事，以为读文件时可

以不同时就联系着工作来理解，以为必须在理解了文件的“纯粹精神”以后，然后才来考虑工作问题，这都是不对的。

二

想起了中国旧时有名的故事。

《吕氏春秋》的《察今篇》，说到荆人要进攻宋国，路隔着澭水，先使人去测量澭水，把可以渡的地方记下来，准备晚上从那里涉过去。晚上水涨，荆人不注意，仍就原路前进，结果死了千多人，进攻计划失败了。

把白天决定了的事情当作教条死守着，而在情况已完全变化了的晚上照样的做去，不知道依据新的情况作具体的补正，其危险，中国几千年前的人已经看见了，但我们现在仍常常要糊里糊涂地向危险地方钻。

“察今”，这是非常重要的。要了解今天的情况，今天的特点，解决今天的问题。理论与今天的实际相结合、依据今天的情况而具体化，这就是进入成功之门的正道，否则就是走向失败的邪道。

荆人渡河的比喻，也不可生硬了解：白天和晚上，情况是完全变化了，要采取全然不同的行动指导原则，但要进攻敌人这个总方针，则是不论白天晚上都不变的。以全国情况的总结为基础的党的决定，在全国情况未起基本变化的时候，虽然在各个岗位上要灵活地具体实现，但始终规定着我们工作的总的方向。例如统一战线是总的方向，在一定的具体环境里，固然会需要展开激烈的斗争，然而在斗争中仍不能忘记统一的方向，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具体地打通这个方向。

荆人渡河的比喻自然也有完全适合的情形，例如全国的根本情况变了，在行动方向上也就会要有基本的改变。

三

最近《解放日报》登载了边区一个乡下小孩的故事，里面有一段，说他出嫁了的姊姊回到娘家来就哭泣诉苦，他却只是站在窑洞角落里睁大了眼睛望着，小小的心灵不能了解姊姊为什么痛苦。

我也曾经有过这类似的经验。很小的时候，在亲戚家里看见出嫁不久的女人回家来哭诉苦情。我当时也知道，而且事后能向人说明她是在伤心。然而这伤心，并不能深刻搅动儿童的心灵，引起真切的同情。我所感到的，宁可说一大半是奇异的心情。这一种伤心，对于小孩的认识，似乎是很隔膜、神秘和遥远。

我想，我也一定曾经睁大了眼睛，望着那伤心的人。

对同一件事，经历不同的人，所能理解的程度是完全不同的。没有相当经历，即使能朦胧地意识到某一件事是什么，却不能深刻理解其所以然。小孩和大人一样，能用同一名词来说明出嫁女人的哭泣现象：这是伤心。但对于伤心的意义，小孩所能理解的深度和广度，是和大人完全有差别的。

小孩懂得伤心，因为他也有自己的伤心的经验。但他的伤心的观念，也只能以他的贫乏的经历为内容：或是吃不到自己所想吃的糖果，或是失去了心爱的玩物。除了这些直接的刺激之外，伤心对于小孩是生疏的，对于那不以眼前的痛苦刺激直接相联系的哭泣诉苦，小孩是会感到新奇的。一般地说，伤心的概念，在小孩的认识领域中，是抽象的，内容空洞的。

同一句话，同一概念，同一理论原则，没有经验的人说出来，和有经验的人说出来，所代表的意义完全会不同，所包含到的精神完全会两样。虽然词句上可以完全相同。

黑格尔曾说，小孩和老人同样说着各种宗教的格言。但“对于老人，宗教的格言是包含着他的全生涯的意义。小孩也同样了解宗教上的内容，但对于他，除此而外就没有更多的意义。全生活和全世界，是还隔绝在它的外部的。”（摘自列宁：《逻辑学笔记》）

黑格尔并且认为，老人和小孩的肉体上的差别，并不等于他们的精神上的差别。肉体上的老人，是表示走向衰亡，所以小孩是更优越的。但精神上，思想上的老人，却是更成熟、更完全的阶段，因为它包含着全生活和全世界的具体内容。

这个比较，自然也不一定完全恰当。在事实上，顽固不化的老人，尽管生活到一百岁，在思想上有时仍往往赶不上三十岁前后的青年。但道理的实质是对的。能够包含全生活和全世界的丰富内容的思想，比较仅仅以名词概念为表帜的思想，是更优越，更高级的东西。最成熟、最完全的思想，是以最多的经验为内容的具体思想，而不是抽象的思想。

概念，名词和原则尽可以说得完全一样，但在了解上，有成熟和不成熟的分别，有具体和抽象的分别。我们需要的，是对于理论的具体了解，而不是抽象的了解。

我们有许多专门研究理论的人，过去差不多都不懂得这一个真理。我们满足于书本的背诵，词句的推敲，满足于烦琐派的、玄学的穿凿，而不能将马列主义的理论原则，作具体的领会。我们也曾想到要以事实的证例作为理解的基础，然而不是满足于书本上告诉我们的现成例证，就是只能从中国社会历史上拉一些随便割裂下来的个别例证，却不能对历史和现状作有系统的研究。我们讲的理论，全没有这样的成熟的内容，只在词句上似乎背得烂熟，而在实际上，它对于我们，却一直是生疏的。就像出嫁姐姐的哭泣对于小孩一样，是那么隔膜，那么神秘而且遥远，真正的

生活内容，全然隔绝在它的外面。我们并没有触到它的精神的深处，而始终只是睁大了眼睛，对它奇异地望着。

四

讲一讲哲学上的情形吧。不用说，我们没有从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中国革命史的精细研究中来理解辩证法唯物论的规律，我们接受苏联反对德波林孟什维克唯心论的斗争的结论时，对于苏联之所以要展开这斗争，这斗争与社会主义建设以及联共（布）党史的关系，我们也没有认真研究过。

不研究苏联历史，不以这历史内容作基础，要充分了解反德波林的斗争的意义，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所接受过来的，是一套抽象的公式，教条，这样的接受，实际也等于小孩子对老人的哑哑学语，不能真正理解其完全的意义。

列宁研究黑格尔的态度，是值得仔细学习的，他说要批判地研究黑格尔的辩证法，而批判研究的方法，就是要以现代帝国主义发展史及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研究作为基础，用这些实际经验和事实来验证和理解黑格尔辩证法中的许多合理因素，而不是单就黑格尔的著作来作词句上的穿凿。

德波林的研究违背了列宁的遗教。他是就黑格尔来研究黑格尔，就黑格尔的书本词句来抽象地说明辩证法，而不能依现代社会发展及革命运动的历史来正确地批判理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因此实际上他仍然成了黑格尔唯心论的俘虏。他满足于书本的背诵，以文章的引证宏博为夸耀，而忘记了战斗唯物论的现实任务。

我们从苏联接受反德波林斗争的结论，也违背了列宁的遗教。既不依据苏联的历史以及现代无产阶级的革命史来理解这些结论，更不能有毛泽东同志的精神，依据中国的革命历史经验来领

会这些结论，却埋着头在这些结论的字句上实行反刍。这是在言词上跟着人反对了德波林，却在实际上学了德波林。

五

理论容易变成死教条，反德波林的结论也容易变成德波林主义。这是必须随时警戒的。在我们研究党的决定和文件的时候，也不要一刻放松了这警戒哨。

听了“整顿三风”的报告，有人会这样说：“还不是这一套!”不错，从词句上说，党的决定似乎常常不过是这一套！因为小孩用的名词和老人用的名词不会有什么分别，所以小孩会嘲笑老人说，你讲来讲去还不是这一套！

不错，决定的文字并不深奥，一读就懂，三读就熟，似乎很容易了解。但请仔细分析你所了解的是否真正的实质？我看很有问题！不然，为什么“反三风”（即当时有一些人对“整顿三风”的不正确的说法）差不多竟成了反大小厨房，反干部骑马，反看旧戏，反离婚结婚，反津贴一、二、三、四、五元了呢？党的决定的全部具体内容，主要的，就在这里吗？或者更应该把眼界放宽些，把思想用得更深些呢？

不错，吃饭，走路，娱乐，“终身大事”……是我们眼前迫切的问题，这里面当然有许多关涉到“三风”的东西，把它提出来是应该的。然而把太多的脑力和最大的热情用在这些问题上，是不是就能完成研究文件整顿三风的任务呢？局促在食物和玩具的直接刺激范围内的小孩的苦痛经验，能够用来完全理解和解决姊姊伤心的问题吗？

你不解决我吃饭的问题：主观主义；你让他吃不让我吃：宗派主义；你解释困难的原因吗？我不听；你说的一套都是党八

股！——这就是现在有些地方有些人们整顿三风的全部逻辑。二十年流血斗争所凝结成的党的决定，在一些人的头脑里是这样庸俗化了。沉没在琐末的“小事件”中，缺少了更深广的政治意义。

在“反三风”的斗争以及党的决定的研究上，应该用主要的精力放在中国革命史的经验和现在抗战经验的学习上，应该放在自己的工作检讨上，不应该放在小事情的挑剔上——这并不是说不应该揭发和解决那些对工作有影响的小缺点和小问题。把胸襟扩大些，多注意些复杂的政治问题吧。不这样，决定的实质，对于你就会成为隔膜，神秘，而又遥远的东西。

这似乎又是一套党八股！的确，“政治，政治”，这些字眼讲得太多，“自由”思想家就会要说“这是党八股”的。然而党八股之为党八股，并不因为它有充分的政治内容，相反地却因为把政治词句变成了空调头。充实的政治意识决不是党八股，相反地，在反党八股的旗帜下，向琐末的小事堆里爬行，并离开了政治原则的，倒是走向党八股去的另一极端。

六

生活的小事件不是不应作为“整顿三风”的问题来谈论，重要的是莫把精神沉没在琐事里；这是一。还有，谈的结果，必须能够引导出积极解决的办法。简单的揭发，消极的冷嘲——不对的是这一种。

问题的提出，同时包含着解决问题的条件，这首先是就客观事实而言。在主观的反映方面，有时我们只看见某些问题，却还看不到解决的条件，于是对问题本身的了解也就带上许多空想的成分，成为无结果的、没有实践力量的思想之流产。大的例子，是空想社会主义，小的例子，是由反对当前生活中某些个别不合理

的现象而走到绝对平均主义的意识。绝对平均主义，其实也就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

实在的可能性必须能够转化为现实，不具备转变为现实性的条件，就叫做抽象的可能性。抽象的可能性是主观主义的东西。我们的脑子里常常会装满了许多抽象的可能性，而不肯依据实际的条件来加以纠正——特别是没有经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常常会这样做。思想里的这一种可能性，是对于客观事物的不完全的认识和夸大的反映，也正是一种主观主义。

革命的唯物论者，每提出一个问题的时候，必定恰当地估计着事实条件，同时提出一套解决问题的办法。理论与实际，是这样联系的。而理论的正确与否，也直接关联到办法的正确与否。办法错误，也证明了这理论的了解也并不周到。这一定是只在抽象原则上把握了理论，而没有对理论获得最正确最完全的了解。

墨子论“言有三表”，我以为值得吟味。“言必有三表”：“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这里不研究墨子的全部体系，也不分析墨子这些话的时代条件和全部内容，只依据我们的革命历史经验来探求这些话里有无可贵的因素。言论必须以历史的研究（古者圣王之事）为本源，以当前实际情况的调查（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为基础，再必须作用于实践（发为刑政）——这就是中国古代哲人对理论与实际统一的原则，虽然是很粗略地，却也多少正确地为我们指明出来的要领。

“知之非艰，行之唯艰”的旧道德，为中国许多人所深信，孙中山先生把它看作大敌。现在也还经常有人说：“说话漂亮容易，

做起来就很难。”是古人对呢？还是孙中山有道理？我以为我们应有自己的理解。“知之非艰”，并不是指的周到的具体的认识。所以会“行之唯艰”，是因为所知也并不完全，至少并不知道行之主要条件。只知道自己头脑里片面夸大了的空想，就难实现于行，不但难，简直就不可能。知行不能一致，是因为“知”不足，真正活的知识，周到的理论，必定是伴随着可以实行的办法。

罗亭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其实并不是这么一回事。行动是矮子，则言语也一定是瘪三，至少“三表”中缺少“用之者”的一表。表面上漂亮，只因为善于“装腔作势”，仔细分析起来，一定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

但“知难行易”的学说，也未见得完全得当。行是艰苦的斗争，至少并不比知容易。知的任务在于指导行动克服困难，但知是在行的当中求得的，理论是以实践经验为基础。知的困难条件，同时也就存在于行的当中。如果周到的“知”难，那么，正确的行也同样难。正确的行有待于周到的知，周到的知，也有待于克服困难的精神和努力，才能够实现。——这也是理论与实际的一致。

特别“不知亦能行”的思想，是有害的。能行必须能知。知的发展到什么程度，行的效果也才能达到什么程度。工人依工程师的计划建筑房屋，中国人做豆腐，是“不知亦能行”的重要例子。其实工人必须熟练他的工作规律，才能进行工作，例如石匠，对于他的本行是会有一定程度的精确知识的。所以必须服从工程师的计划，是因为他没有全部建筑过程的知识。做豆腐不要化学知识，但也必须熟悉豆浆变成豆腐的规律。而因为这些知识是粗糙的经验中获得的知识，所以中国人做豆腐，并不能适应一切地方条件而做得都一样好。要扩大我们的行动能力，必须努力求获

完全的知识。粗枝大叶，不求甚解，朦朦胧胧地走向前去，就难免要变成英雄们的阿斗，或敌人的俘虏！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5月5日；曾收入《“有的放矢”及其他》和《艾思奇文集》第一卷）

学习观念的革新

(1942.5)

学习些什么？不仅是要学习“理论”，更重要的是要学习把工作做好。

研究文件报告，是为着“改变思想”和“改造工作作风”，这是学习的不可分的两个因素。必须在工作上也“面目为之一新”了，才能算是达到了“思想革命”的目的。思想革命不是仅仅在头脑里翻几个筋斗的事，它同时也应该是实际行动上的变革。如果工作作风是老一套，那就证明你的思想也仍是老一套，证明你仍然是用旧的思想方法来处理实际问题，不管你嘴上加添了多少新名词，说出了许多新原则。

什么是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是正确解决革命的实际问题的武器。是否掌握了这武器，就要看你在各种具体行动中能否获得正确的方针。只能增加言词上的漂亮词藻，而不能增加工作能力的那种“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哪怕在这种“理论”里，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词句。

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仅仅在“想通了”或“说通了”的时候，而且是要在“做通了”的时候。

以前许多人都误解了，以为学习理论就仅只是学习理论；以为只要把书本上的、一般的、抽象的原理原则记清楚了，学习的任务也就完毕。在这种观念之下，出现了大批书呆子。他们埋头专啃马恩列斯原著，而对实际工作的问题毫无研究兴趣。对一切

周围事变麻木不仁，没有新的感觉，不能提出和解决问题，工作上到处发生漏洞，以为都不要紧，认为只要在理论上有正确的认识就够了。

“理论上有正确的认识”，这成了许多人自慰自满的盾牌，用来抵御批评的枪和箭。工作上的缺点可以多少承认一点，但不允许把账目归结到认识的错误上去。脱裤子，可以，然而最后却还坚持着一块遮羞布：“理论认识上还没有错误”，“立场总是正确的”。不能联系群众，到处闹不必要的磨擦，仍然可以毫无愧疚地说：“不过运用上多少不得法罢了，联系群众的理论，我是完全懂得的，我的立场是没有错的。”

“脱裤子”要彻底，把最后的遮羞布也要丢了：工作上有缺点，就是理论的认识不够，就是立场还没有站稳。不能在实际运动中发现问题和正确解决问题，而仍泰然地以“懂得理论”、“立场正确”自骄自欺的人，一定是最没出息的一个阿Q！

如果“思想革命”只限于脑子里翻斤斗，那是最容易没有的事，这只要熟读文件，再加上一番思索，或者再讨论一番，吹一阵，革命就成功了。但如果要改造工作作风，把每一个人的工作态度都加以革新，那却不是很简单的事。那就要下大的决心，和一整套的旧工作习惯战斗，要破坏旧习惯，养成新习惯。而这新的习惯，不是一套死板的公式，不是只能应付一二件事情的狭隘经验，而是要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前面都能够正确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是要能够实事求是地、灵活地、适当地解决工作中的每个问题。

旧习惯破坏难，新习惯的养成更难。思想之所以常常落后于实际，就因为旧的思想常常会凝固。一种凝固的思想方法，也正

是一种凝固的习惯。变革习惯，就需要恒久的努力。一转念间，就会“恍然大悟”，这句话用来表示我们悬崖勒马、转变方向的精神，是完全对的，但如果以为一下子就可以解决一切具体问题，那就是太夸大了。

思想革命可以经过一个短时期的突击来纠正发展的方向，但在发展的道路上又有它的长期性。今天的整风学习，有两方面，第一，阅读文件，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第二，检查工作，改造工作作风。两个方面都需要把短期突击和长期的努力相结合。长期努力方面来说，文件既是一百年无产阶级革命经验和二十年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就不是读一两遍和讨论一两次便能充分了解的，只有经常不断地增加我们关于世界和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的知识，才能不断地加深我们对于文件的理解；这是就第一个方面来说。就第二个方面来说，工作作风的转变，决不是一两个月检查突击之后，就可以完全成功的。在检查以后长期的工作过程中，我们要不断地遇到新的问题，也就是要不断地受到新的考试，以考验我们是否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立场和方法，是否真正脱除了死的公式习惯。很可能在眼前的短时期能把这问题解决好了，而一遇到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又没有能力应付。只有在长期变化的复杂的过程中受到锻炼，并且通过了这些锻炼，才能养成新的正确的工作习惯。

三个月阅读文件，一个月检讨工作，这是我们整风中思想革命开始时的一个突击。突击的效果如何，对将来的成功有决定的意义，但同时更要注意以后的持续的努力。不断地积累新的工作经验，不断地依据新的经验来温习文件，来回味理论上的许多原理原则，这样来学习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正确解决一切工作问题。这就是我们在学习上应该采取的新的态度和新的观

念。

“猛火攻，慢火烹”，这是一句中国的老话。学习的规律像煮肉：要用大的火力来进行几个月学习检查的突击，也要在学习检查之后，用日常工作的文火，耐心地烹煮，然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于你才不至于半生嚼不烂。

一方面要认识思想革命的长期性，另一方面又要认识这是一个革命，要在尽量短的时间中实现一定的目标，不能以长期性为借口，拖到遥远的将来。所以在领导方面，必须加紧督促，在自学方面，必须加倍努力，先把22个文件研究清楚，并在研究22个文件的时候，就将22个文件所指出的方法，当场兑现，应用于学习的过程中。

（原载《解放日报》1942年5月21日；《新华日报》1942年6月20日和1943年2月13日两次转载；曾收入《“有的放矢”及其他》）

谈 讽 刺

(1942.5)

一

把平常人所不注意的生活和斗争中的某些真实情况，用特别尖锐的、露骨的形象刻划出来，是艺术上常用的手法。这种手法用来揭露缺点，就是讽刺的艺术。

对于常见的缺点，人们常常会“熟视无睹”，或把它看做当然的事实。一旦露骨地揭露出来，才觉得不大自在。像生了多年顽癣的人，虽然天天搔抓，却毫不在意，有人指着他的鼻子说：“看呀，你这块顽癣！”于是脸红耳热，浑身不安，这就有了被刺的感觉。

不要误解讽刺的意义，以为这是讽刺家从外部加给对方的中伤，讽刺者不过是指出了真正的病症，使对方知道自己的创痛，或使人知道这种病痛。

讽刺必须有真正的事实做基础，它是反映真理的。对事实略一歪曲，就变为轻薄；严正的讽刺，是很难能的。仇视真理的反动人群，只能造谣诬蔑，而不能讽刺。

二

讽刺既是反映真实，它就会因对象的不同而有差异，对敌人的讽刺和对自己的讽刺，不是，也不应是一样的。

对敌人，讽刺是一种战斗的武器。讽刺敌人，是揭露人所不

易注意或不易深刻注意的罪恶，使人看清楚那禽兽相，不再为冠冕堂皇的衣饰所眩惑。敌人不能改过自新，希特勒不会变成革命家，因此我们的讽刺是打击性的；其目的在于使人人避开他，使他孤立，队伍瓦解，力量减弱——这就是对敌人讽刺的任务。

对自己，讽刺可以用作教育与自我批评之一种。自我批评，可以用讽刺。不过这种讽刺必须是善意的，而不能是恶意的，打击的。

毛泽东同志对教条主义的讽刺，可以用作最好的例子：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我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么用处呢？这样的讽刺，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就在于：故意挖苦那些把马列主义看作教条的人，使他们大吃一惊，苏醒过来，好用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列主义。

“大吃一惊，苏醒过来”，这就是讽刺用在自己教育上的目的和效果。

三

鲁迅先生的话是应该尊重的，但太简单地用到我们今天的情况上来，是不对的。

譬如，一般地说讽刺必是出于善意，这并不完全妥当，首先要看事实本身是不是需要善意。对同志，对友人，对可以争取的动摇分子以至于暂时的敌人，可以运用善意的讽刺，但态度和方法，就要有种种分别。对顽固不变的大敌，就说不上善意。善意不会被这样的敌人所接受，好心是愚蠢，有时甚至于是罪恶。

讽刺决不是从“爱人类”的立场出发——一般的“人类”、“人性”之类的观点，都是小资产阶级的唯心空想的表现。讽刺服从于阶级的、民族的斗争任务。讽刺的内容和形式，决定于阶级

立场和斗争对象。"爱你的敌人"的抽象说教，是包含着毒素的。被侵略者所欺骗的群众，在一定形式下要加以爱护，加以争取，但法西斯主义者本身却决不可爱。

讽刺并不一定是冷嘲。但"专制使人变为冷嘲"，所以讽刺在一定情况下可以是冷嘲性质的。专制下面冷嘲的讽刺，是反映敌人和压迫者不可挽救的没落，并非讽刺者故意要作不负责任的嘲谑。"与人为善"的态度，对这样的敌人没有用处，因此讽刺才成为消极的单纯打击性的东西。

在自我批评和同志教育上，不应随便乱用讽刺方式，更不能使用冷嘲的讽刺。在自己的队伍中间用冷嘲的态度批评缺点，就违背了真理，歪曲了事实，同时也是忘记了自己的立场。因为这不能帮助同志进步，不能增强自己的队伍，相反地会瓦解和削弱自己的队伍。

在同志教育中的讽刺，应该是治病救人，而不是人身攻击。我们需要揭露缺点的讽刺，但并不是说我们中间可以使用一切讽刺。对于看错了事实的轻薄挑剔，尤其应该戒忌。"揭发自己的缺点，不怕为敌人所利用。因为即使自己不批评，敌人也要造谣诬蔑的。"这话是对的，但用来为不正确的批评作辩护，就完全错误。问题是：自我批评和敌人的造谣诬蔑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东西。如果自我批评的态度，竟然与反动派的造谣诬蔑相类似或相接近，以至能给他们以这样的方便：几乎不费修改一字之劳就登上小报；那就得要仔细检查一下：你的脚跟是站在哪里？

自己开刀是要割疮，敌人开刀是要杀死自己；因为敌人要杀死自己，就说自杀也不算什么——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逻辑！

（原载《解放日报》1942年5月24日；《新华日报》1942年8月8日转载；曾收入《"有的放矢"及其他》）

谈延安文艺工作的立场、态度和任务

(1942.6)

前进的文艺，是革命的政治事业之一部分。表面上挂着“自由”招牌的反动文艺家，对这一点是坚决反对的。“艺术不应有任何功利的目的”，文艺“与抗战无关”，这就是他们得意的口头禅。然而在实际上，他们的文艺活动，首先就有着一个功利的目的：让自己舒舒服服地被豢养在剥削阶级的什么学院或什么机关里，好从容地磨炼一套漂亮的工具，来帮助反动政治进行欺骗青年的事业。

前进的文艺家，必然会、也应该会参加在革命的政治事业中，通过他自己的专门技术，来为革命的政治目的服务。

我们在抗战，我们的文艺反映抗战中民众的英勇光辉的斗争，来鼓舞最大的民族战斗热情，来争取胜利；我们要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我们的文艺通过所刻画的各阶级人物的典型，和他们的相互关系，来指示新民主主义的具体道路；我们必须团结和组织广大的人民共同战斗，我们的文艺，也面向人民大众，用自己的特殊形式来发挥宣传动员的作用。文艺要首先赞扬和鼓舞工农劳苦群众的革命事业，因为他们是中国革命的最基本和最先进的力量。文艺要成为知识分子与工农劳动群众互相了解的桥梁，因为他们的相互结合和团结，是革命成功的保证。我们需要打击敌人，揭露敌人的罪恶，需要联合友人，需要推动群众作英勇的斗争，需

要集体的英雄主义。对这一切政治方向的要求，文艺工作都必须与它合拍。

我以为，在延安，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这样的。因为这里的文艺工作者，谁都愿意为人民大众服务，谁都愿意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来工作，而上面所说的任务正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今天所要努力完成的。

违反这些任务，就违反我们自愿的立场；不能、或不善于在我们的文艺工作中表现这些任务，就是失去了或站不稳这些立场。

我们常常会站不稳这样的立场，是用不着奇怪的。我们的作家和文艺青年，都不是无产阶级出身，更不会天生就一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头脑。相反的，我们几乎都是从小资产阶级中间走过来的，小生产者的自私自利和个人主义意识，常顽固地盘踞在我们头脑里。它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集体主义思想相矛盾，它常常违反着我们自愿的方向，使我们所做的和我们所说的背道而驰。

个人主义表现在文艺里，使它对于延安的现实情况作了不正确的反映。不论对于延安的光明方面和缺点方面，都经过了个人主义的哈哈镜，射出一套歪斜的影子。

文艺工作者说：青年来到延安，是为着找“爱和热”的。这就是说，延安有这样一个光明方面，才能吸引青年到来。一些诗人，就歌颂着延安的光明所给与个人的感激：我自由，我快乐，我年轻，我回忆，我想念，我在恋爱，我为伟大事业所感动。……不错，延安确有这样一个光明方面，青年诗人的歌颂也是应该的。然而这只是一个方面，一些诗人却过分偏爱这个方面，并且用个人主义的激情来欣赏这个方面，把延安渲染成自由主义的天地。这样的激情和想像，不能不碰到和它对立的东西，那就是：在延安，

我们又都是被组织在战斗的队伍里，战斗的纪律，是幻想和自由的“紧箍咒”。我们的个人主义的灵魂，经常为“紧箍咒”而受伤，爱和热的希望经常感到幻灭。许多短篇里所写出的知识分子的苦闷，正反映延安的生活还缺少着他们理想中最美满的东西。

有许多作品，写出一些下层工作人员的生活，如伙夫、马夫之类。作者和这些人接近，用个人英雄的趣味来玩赏他们的性格，爱好他们的直率、倔强、单纯，或用温情主义的态度，来同情他们生活的艰苦和孤寂。这虽然表现作者开始走向工农群众，从他们中间寻找光明的方面，然而对于这些人物的了解，仍然是通过个人主义思想的滤器的。事实上我们的工农，并不是这样的个人理想的英雄。因此，在另一方面，真正在群众中斗争的英雄，如“老干部”之类，又被一些作品写成与高雅的人物相反的性格，如粗鲁，无教养，事务主义，土包子气等等。

作者说，我们写的都是事实。不错，延安的生活和人物中，确有一些光明和缺点的事实。然而经过个人主义的着色眼睛来看这些事实，就模糊了它的真正的本色，不能如实地看清它的真面目。

在今天，就延安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们来说，要正确地看清现实，第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意识。生活的体验，自然也是非常重要的条件，然而体验生活的深入过程，和思想意识的锻炼过程是分不开的。不有意识地努力锻炼自己的意识，扫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个人清高或个人英雄的思想情绪，要想对生活获得深刻的体验，是不可能的。

不能无条件地把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果戈里等的例子作为今天文艺工作者努力的标准。他们的作品所展开的生活内容超过了他们的思想范围，指示出他们的阶级意识和政治立场所不能容

受的现实真理。我们之所以赞美这一点，乃因为他们是前时代的作家。对于他们，也只有经过这一条道路，才能成就其伟大。生在这更前进的时代，并且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自任的作家，如果满足于仅仅写出了事实，那所得的结果就会与自己的愿望恰恰相反。

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果戈里——他们所属阶级的思想意识和政治立场是与历史发展规律相违背的。因此，他们作品里所表现的事实场面愈广大，内容愈丰富，历史的真理就愈暴露，愈不易为他们主观立场所掩蔽，他们的作品也就愈有高度的价值。对于这些旧时代的作家，我们只能这样来评价。今天如果有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甚至于更旧的作家，我们也只能依据他们的作品所反映的现实内容，来给予这样的评价。但我们这里是更前进的文艺工作者，我们所愿掌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却是与历史发展的规律一致的。这样的思想立场，不是妨害认识进步的绊脚石和一切反动阶级的思想立场，相反的，它是远远地照在前途上的明灯，能够引导我们正确地认识生活发展的道路和方向。在我们，丢开思想立场而满足于写出事实，就等于抛开了引路明灯，满足于摸索前进。这样的前进方法，虽也有可能达到目的，但第一，免不了有时会摸了错路，自以为走向马列主义的前途，而实际上却违背了光明的方向；第二，即使终于不走错路，那也就必须积累无数的摸索失败的经验，才能自发地走上正轨。这就必须等到你在生活中作了长期的体验，能够综合地认识了各种生活方面的相互关系，如巴尔扎克等等的大作家之后，才可能在你的作品里超出落后意识的限制，正确反映现实的真理。这就会是过分消耗精力的迟缓过程，对于今天的复杂多变的现实，是不能适应的；就能适应，也只是最少数的人才能做到

的。

片断地抓着生活中的某些事件，割裂地描写出来，并且是通过个人主义的色镜反映出来。就说这是现实主义，并以巴尔扎克等比拟，这种主观上的自满，恰恰形成了客观上的讽刺，使自己只成为伟大作家前面的一个最卑微的影子。

写出丰富的事实场面，旧时代的作家就能超出落后的意识立场而揭发历史前进的规律。写出某些事实而忘记了意识和立场的正确性，现代文艺家就可能歪曲了现实的生活关系。这似乎是有些奇怪的对照，却又是真实历史的辩证法的真理。

有一个误会是必须解除的：即强调无产阶级的正确意识立场的重要，并不是把它作为文艺创作的固定公式，而是要掌握认识事物的正确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在我们去体验工农生活的时候，不失去明确的行动指南。

不是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或个人主义的爱憎上去看人民大众各方面的斗争生活，而是站在人民大众自己的立场上，首先是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使自己的爱憎与无产阶级的爱憎相合拍；不是用自由主义的主观理想去衡量革命地区的生活人物的优点和缺点，而是用唯物的观点，依据历史条件来理解这些优点和缺点；不是割裂地，孤立地，凝固地来看事实和人物，而是要看事实和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来源去路。

采取革命的策略知识，与掌握正确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是分不开的。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党的战略策略，是对于中国民族斗争事实的科学的概括。它指出我们进攻、打击和联合的正确方向。文艺自然不必是单纯的、直接的、普遍的政治宣传，但也不是不可以根据这些知识，为自己规定一个工作方向：怎样去选择题材

和理解题材，怎样正确地处理爱和憎的情感，同时通过形象的刻画，向正确的方向去鼓舞读者的爱和憎的情感。

这就是说，文艺工作者的态度在一定的意义上是与革命的政治策略相一致。后者指示着战斗的原则和办法，文艺作品却把这些原则体现于血和肉的具体形象中。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可能常常要牺牲一些对艺术形式的偏爱，为着一定斗争的目的，适当地运用自己的武器（为害怕政治破坏艺术而担忧，乃是自由主义的意识残遗之表现）。在这一方面，鲁迅先生曾有许多可以学习的。《呐喊》时代的鲁迅的心情，是阴暗而又寂寞，然而为着“遵从”“五四”文化运动的“将令”，他就在作品里“删削些黑暗、装点些光明”。他的杂文的写作，也是为着适用于一定战斗任务的艺术武器。

文艺的战斗任务，要求作者有这样的正确态度：“爱憎分明”。文艺必须鼓励对于敌人的坚强打击，和对于友人同志的友爱团结。在自己的友人同志中间可以批判缺点，但那批评的态度，与对敌人罪恶的打击态度是完全不同的。以对敌人的态度攻击自己营垒中的缺点，在事实上是帮助了敌人，这不但有悖于自己的立场，而且也歪曲了真理。因为所谓真理，正是说明敌人之应该被恨和友人之应该被爱，而不是其他。

文艺是革命的友人同志中间相互了解的桥梁，通过这样的了解，革命的营垒才更能团结一起。在今天，知识分子和工农中间的相互了解，是一个重要问题，需要文艺家给予解答。为着这个目的，文艺家自己就需要对双方有正确的了解。出身于小有产阶级的文艺家，对知识分子的性格趣味会比较偏爱，而对工农成分的人物却缺乏深的理解。在作品里，就常常会原谅前者的错误和强调后者的弱点。这是一个偏向，文艺作家必须克服这个偏向。这就要以全身心走入工农群众中，把自己的趣味、情趣溶合于工农

群众，进行生活体验和意识锻炼。

不是在生活的丰富体验已经完成，才自发地创造正确反映现实的作品，而是在生活体验的过程中，就掌握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明灯，随时正确地观察和理解事实，随时为必要的战斗任务而展开自己的工作。

（原载《谷雨》第1卷第5期，1942年6月15日）

关于唯物论的几段杂记

(1942.9)

一、实际、经验、理论

谈唯物论很容易，要使思想成为唯物论性质的，却很难。但我们却必须获取唯物论的思想，没有这样的决心和努力，就不要想接近马克思列宁主义。

谈唯物论，只是背诵辞句的问题，能够引用或说明“物质决定精神”，“实践优于理论”之类的命题，问题就算解决了。但尽管我们善于各式各样地解释这些命题，我们的思想仍然可以不是唯物论的。因为，是否真正唯物论的思想，不是靠口头上的言词可以证明，而是要靠行动上、生活上、工作上的实践来证明。真正的唯物论思想不是表现在抽象的名词上，而是对于我们的行动中，生活中，工作中的各种事物规律能有确切清醒的认识，而是对于我们的革命斗争有正确指导作用的思想。为什么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行动的指南”呢？这并不是说，随便引用的马列主义书本上的词句都可以作为行动的指南，而是说，必须锻炼你自己的思想，使它能够正确反映周围的事变，并因此能够有指导行动的威力，你才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前一种是教条主义的解释，后一种才是正确的了解。许多专研究“理论”的人，虽然也常常谈到“行动指南”的名词，但实际上是由前一种误解出发的。

在一定岗位上长期工作的革命者，由于经验的积累，他熟习自己的工作，以及有关这工作的各种情况和条件，有能力正确完成自己的任务，即使他对于唯物论的名词毫无所知，但就他的工作范围来说，他的思想仍比任何熟读经典的教条主义有更多唯物论的性质，更多实际的价值。

但这种唯物论的思想，是局部的，经验性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却不能以此为满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要我们能够在任何工作环境中看出周围事变的发展规律，而不只限于一定的工作岗位上的局部的经验知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是长久停止在一定的生活圈子里的小企业家，而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道路来领导革命走向胜利，因此他必须有在任何环境中的工作能力和认识能力，他需要能够在任何环境中去洞察事变规律的理论，而不是狭小范围的经验知识。经验是必须着重的，但一种经验只在一种环境条件下有它的唯物论的价值。满足于经验知识，忽视了他的条件性，任意引用，就成为经验主义，这也不是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理论是经验的综合。所以，经验的价值只在于：第一，它是在一定条件之下有价值的，它包含着某一方面的事物规律知识。第二，它是理论认识的原料，没有经验也就不可能真正掌握理论。

每一个参加革命工作的人，都至少有某一方面的革命经验，这是他自己的直接经验。每一个人的直接经验都是可贵的，但同时也是有限的，只在适当的情况之下应用，是合乎客观实际的，有指导行动力量的，因此也是唯物论性质的，一旦超出这适当的情况，它就会无用，就会造成错误。中国旧医中有什么孙大黄、吴附子之类，对一切病症都只会用同一种类的方药，有时可以有大效，有时也会出大乱子。在整风初期有这样的硬骨头论：在民族

敌人面前要有硬骨头，在自己的党小组长面前也要有同样的硬骨头。——这是某些知识分子的狭隘经验主义，造成了一个时候的典型的偏向，并且为王实味所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解决问题必须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经验出发；这里所说的经验，就是指片面的狭隘经验。这就是说，经验并非完全要不得，并非在解决问题时要排斥经验知识。相反地，对于实际的认识了解，第一步还是要通过经验。实际之于思想，是一个客观对象，它本身并不直接就成为我们的认识。走到乡下去，把田几亩，人几何，房屋几间之类登记起来，是不是立刻就使我们能了解农村情况呢？这是一些死的数目字，它提供一些材料的知识，这些知识也是必要的，但单单这些，并不能把农村社会关系的规律的认识给予我们。这些规律的认识，仍然要通过农村生活和斗争的经验去取得。这些经验可以是、也可以不必一定是我们直接亲身去体验过的，然而至少是早已为群众所取得了的。我们自己没有亲身体验过的，叫做间接的经验。无论如何，如果不通过直接的和群众间接的经验，是不能够对农村的实际情况得到活的了解的。

为什么要向老百姓学习呢？因为老百姓中间保有着我们任何个人所万不能企及的丰富的经验。对于调查研究，我有这样一个了解：我们所需要的调查研究，其中心的一环，不在于形式上的数目字的统计（虽然这是必要的），不在于各种死的材料知识的搜集（虽然这也是必要的），而在于学取群众的经验，并且根据群众的经验去了解这些数目字的统计和材料知识。实际是出发点，目的却是要求得到对于实际的理论的了解，而当中的一环却是经验知识。要调查实际，更要研究实际，不依靠经验，无从研究起，只依靠片面的个人的直接经验，也不容易获得正确的结果。经验主义之所以要反对，是因为它是偏向于片面的经验（主要是自己的，

直接的)，而轻视间接的经验，对于别人的意见看不上眼。克服经验主义的方法，第一步正是要扩大经验知识的范围，考虑自己的经验，学习他人的经验（首先是群众的，老百姓的经验)，甚至于学习敌人的经验（必须估计到这是从敌人的立场上的认识，而加以适当的纠正)。把多方面的经验加以分析，综合，然后对于所要研究的东西，才能够达到理论的了解。

这就是为什么要说理论是经验的综合。这就是从实际出发到理论认识，到掌握唯物论的思想所必经的过程。

二、谈 分 析

分析，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要找出条理。我们所要研究的，任何一件实际的东西，都是在许多复杂的条件之下存在的，因此，乍看上去，常常像是混沌一团，是无数零碎事件的堆积，但它总包含着某些基本的方面，包含着某些重要的矛盾和联系。

要用思想来反映现实，不是记忆个别的零碎事实就可以达到目的。姑毋论完全的记忆是不可能，就是能够记住无数的事实，也还不算是对于所要研究的东西有了认识。能够背诵字典的人，并不算是懂得了文字。认识，是在零碎的事实堆里找出条理的时候，才开始获得的。事实本身原来不是单纯的一团混沌，而是依一定的规律发展的。我们所要找的条理，就是事物本身各方面的规律的条理。经验的认识，就必须是有相当条理的，然而是片面的。理论的认识是要对各方面的规律作全面的了解。这样的认识，必须认真应用分析的方法，深入地研究事物的各个方面、矛盾和联系，才能够达到目的。

譬如最近我们总结整风学习的第一阶段，这就是一个需要分析的工作。在这运动中所发现的具体事件是多么复杂多样，如果

总结是为了记述这些事件的全部，那总结就不可能。但这里包含着几个重要的方面，如思想意识和思想方法的改造，学习方法的变化，领导和组织的工作等，各个方面在这全运动中都依一定的规律向前发展，运动中的一切复杂多样的事件，都包含在这些规律的条理当中，把这些方面分别地加以深入研究，找出其中的矛盾，概括这些矛盾的克服过程（例如在什么情形下，用什么主要的方法战胜主观主义思想的方法），就是我们要做的分析工作。总结的成功如何，就要看我们是否能进行正确的分析。

分析，是要求对全体中的各个部分获得明确深刻的认识。但部分是全体中的部分，它只是在全体上居于一定的位置和起一定作用的分子。要正确认识部分，就不能不照顾全体。认识部分，不外就是要弄清楚它在全体中的这种地位和作用。离开全体来孤立地看部分，是不会得到正确的结果的。譬如手是人体的一部分，要认识手，必须说这是在人体上的拿东西和使用工具的器官，倘若离开这对于全体的作用，单指出这是有五个指的肢体，那虽然能描画出手的外表形态，而对于手之为手之性质，却一点也没有了解。

批评和自我批评也要分析；要指摘缺点，也要发扬优点，并且要分别主要的和次要的。这就是不要把优点和缺点各自孤立起来指摘，而要注意它们在全体中各自的位置。整风开始时许多人在批评中片面地夸大缺点，成为一时的偏向，当“四三决定”上指出要“避免有害的片面性”时，有的人却用一种俏皮的语调暗示抗拒，说：“写批评文字，用不着随时随地都要提到‘基本上是正确的’的字样。譬如你鼻上有白点，我只能说你鼻上有白点。用不着附带说你的脸一般还是漂亮的。”诚然，“基本上正确”，常是党八股的套语，而且事实上也不一定有那么多的基本上正确，所

以我们用不着随时随地提到它。但这儿的问题，却不是任何巧妙地被曲解利用了的“反党八股”的文字可以辩护搪塞的，对部分的正确分析认识，和滥用“基本上正确”的套语，本来不是一件事。问题是怎样适当地估计部分在全体上的地位和作用。例如说现在的黑暗是“黎明前的黑暗”，这已经指明了当前局势中的困难的地位和性质，用不着说“我们基本上已有了光明”，也就能够了解目前局势中另外还有光明的因素，而且这因素是正在生长扩大的，而黑暗却是不久就要没落的。

部分在任何时候都是在全体中的部分，不是在这一个全体中就是在那一个全体中。哪怕是同样的一种部分，它所依存的全体不同，它本身也就有不同的作用和意义。飞机坦克是杀人的武器，然而同盟国方面的飞机坦克是反法西斯和争取人类和平自由的武器，在轴心国家它们才是侵略的武器。地主士绅是封建的剥削阶级，在抗战的中国，他们中的个人却也有可能成为抗战的一分子，甚至于成为参加民主政权的一分子。

《庄子》的故事：一个以漂洗衣料为职业的人，用一种“不龟手之药”，使得他在冬天也能够工作，另外的人用百金买了他的药方，应用到军事上，却使兵士在冬天的寒气中也能愉快的进攻取胜，因为手足可以不致冻裂。同一药方，在一处是漂洗的工具，在另一处却是战争的工具。所以，任何部分，都不可离开全体来作孤立的了解，离开中国全局来论某一阶级的动态，离开使用武器的集团来论武器的性质，至多只能得到一个一般的概念，而不能成为正确反映现实的估计。

分析既必须照顾全体，因此，当分析任何对象之前，对于该对象的全体，必须先在我们心目中大体上掌握一个全盘的轮廓。“庖丁解牛，目无全牛”，这是为要把牛当作死的各个肢体的机械

结合来解剖的缘故，倘要当做活牛来加以分析认识，那在剖析每一部分的时候，必须在心里先有全牛的观念。科学家的解剖，和屠户的宰割，究竟是不同的。有人会非难说："不肯先弄清部分，对全体也不可能有明确的认识。"这是对的；明确深刻的全体的认识，是在各部分都清楚分析之后。但这也是对的：虽然不能弄到那么深刻明了，而在分析之先，对于全体一个大概轮廓的掌握，却也可能，而且必要。只有这样一个全盘轮廓的掌握，才能过渡到正确的分析，也只有这样正确的分析，才能更进一步上升到深刻明了的全体的认识。这就是分析与综合的辩证法的过程。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研究问题之先，必须详细占有一切材料，材料是混乱的，然而详细的占有，是可以首先给我们一个全盘的轮廓（虽然详细占有材料的目的不仅在此，而为此目的，也不一定要完全占有材料，才能做到），以便于正确的分析的。在分析今天中国各阶级的动态之前，把一个抗战的全局放在心中，不是完全可能的吗？

最近整风运动第一阶段作总结，有些人不知道怎样正确地着手进行。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做总结的人不知道正确的分析方法。例如一个组的负责者，在总结的时候，常只是临时召集有关者来座谈一下，把这零碎发表的意见集合起来，加以整理排列，就算完结。这样的方法，至多只能做成有系统的感想集录，全然做不到运动的总结。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负责的人对于本部门或本组的学习运动的各方面情况，事先就有经常的、周密的注意，全盘的情势大体上已有成竹在胸，把座谈讨论的意见，作为补充参考的资料，而不是代替全盘情况的掌握。分析，是要应用自己的思想，就这全盘的实际情况和补充材料中，找出运动发展的各个重要方面，估计哪些方面是全运动中最主要的或次要的。总结的

条理，就依着这实际情况本身各部分的重要和次要以及其相互关系发展过程等等来排列，而不是许多个人的零碎意见的机械的结合。

这里有唯物论和主观主义的分别：同是思想的条理化，但从全盘的实际中（这也就是全面的观察）去分析，所得到的是现实运动的反映，而单纯的零碎意见的整理，只是主观感想的集录，即使这些意见个别地可能是实际情况的反映。这两种东西表现在文字上或口头报告上，外表看起来可能似乎没有分别（似乎都是有条理的思想），但实质上却有天和地的分别，有事物真理和唯心虚构的分别。这个分别只要是参加了实际运动的人，都有可能辨别，也只有参加了实际运动的人，才能深刻辨别。这就是对于真理的实践的检证。

又譬如反省：反省，就是分析自己，就是为自己的思想意识作总结。深刻的反省，必须能够把自己思想意识的各个方面作正确的解剖。这首先也就要回顾到自己全盘的历史，以全部的历史作为对象来分析。“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许多人都不能这样做。有这样的一些不正确的反省：或是零零碎碎，罗列一些事实，没有分析；或是专门宣扬自己得意的历史，片面的夸张优点；或是用套公式的方法照着文件一条一条地指说这里我有或那里我没有。这一切都不是深刻的反省，或者全然算不得反省。

深刻的反省是：必须就自己全部的历史，从感性的认识达到理性的认识。所以第一，不是零零碎碎摆事实，说家常；第二，不是专门褒扬，为自己戴高帽子；第三，也不是公式主义，在自己的头上乱戴大帽子，而是要认识自己思想意识发展的全部规律；自己所经历过来的重要的历史环境条件，这些条件产生了一些什么

样的思想意识；各种思想意识的相互矛盾和斗争过程，哪些思想意识曾被（在什么条件和方式之下）克服了，或者发展了，或者还有残遗；各种思想意识在今天自己的意识里所占的位置，怎样才能克服残遗的不正确的意识等等。这一切都要从自己的具体历史中，分析出它们的各种具体表现形式，而不是空洞洞地引用文件上的某条来塞责。文件自然不能丢开，但文件所涉及的内容，应该当作分析的指南，而不要当做可以硬套的公式。文件并不曾为每一个人做了详细的八字，它只指出一个基本的方向，而真正对自己的思想意识的了解，却必须从头向自己具体的历史实际中去寻找。

三、谈　综　合

有两种对于综合的误解：

第一，以为综合是人工的结合。例如前面所举，把许多人的零碎意见集合起来，加以整理，以为这就是"综合"。这样的方法，决不能反映出客观事物各个方面的自然的相互关系，只能成为"甲乙丙丁开中药铺"式的感想集录。

第二，认为综合的认识，是只要找出各方面中的一个基本点，提出最基本的意见，其他的方面可以不管。

唯物论的思想方法，是为着要把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在人的思想里反映出来。综合的结果，必须能够把握研究对象各个重要方面之间的自然的相互关系。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是怎样，我们的思想上的综合也应该怎样。综合是以现实的自然关系为依据的综合，而不是人工的任意结合——形式的，机械的结合。"甲乙丙丁开中药铺"，按照人工的计划来任意排列，是违背唯物论的原则的。这一种错误的主观的综合，常常跟着教条主义同时孪生。思

想上的懒虫，不肯耐心地艰苦地在复杂的事实中运用思索，寻找事物本身的具体的自然的条理，因此就把书本上文件上的某些文句做成一个公式的框子，把事实材料任意割裂，只检合意的一部分装到框子里去。教条主义者就是这样的懒虫，严格地说，教条主义算不得真实的思想，相反地却是没有思想没有头脑的表现。

综合与分析，是思想方法中分不开的两个方面。综合的任务既然在于掌握客观对象各个方面的自然的相互关系，那么，正确的综合，就要以正确的分析作基础。正确的分析，使我们能够适当估计各个方面在全体中的地位和作用，依据这样分析的结果，依据各部分的本来的地位和作用，在思想上把它们贯串起来，就得到反映现实的自然的综合。例如一个人的思想意识有几个方面，由于分析的结果，知道小资产阶级意识是主要的，封建意识略有残遗，无产阶级意识正在萌芽，把这些方面连串起来，自然就能够了解这一个人的思想意识的总的情状。愈是正确的分析，愈能引到正确的综合。正确的分析本来就是照顾着全体的分析，它本身已经包含着必要的条件，使我们能够把它综合而成为一个全体的认识。

再说一遍：综合是把事物各个方面的认识，按照它们自然的地位和作用给以思想上的条理和排列。因此，单只提出最基本的一点和最基本的意见，并不就是综合的认识。相反地，这仍只是一个分析，是把基本方面和从属方面分离出来。固然，基本的方面，可以作为全体的代表，找出这一个方面，在认识上是头等重要的。说中国今天的基本矛盾是民族矛盾，说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抗战的胜利，可以指示出解决当前中国问题的一个总的方向；说自己的思想意识的缺点主要的是自由主义，也可以代表自己的思想意识的总特征。然而这并不是说，从属方面的认识是可

有可无的，是不必一定要包含在抽象的综合了解之内的。事实恰恰相反，不把从属的方面联系在一起，基本方面的认识，也是悬空的，不具体的。基本方面之所以成为基本的，还因为有其他从属的东西存在着的缘故。

在读 22 个文件的时候，就常常有人作这样的误解。逐段逐句的解剖，是对文件的分析研究，这一点是很少有人怀疑的。但一谈到综合的了解，那在许多人的意见，就似乎是说：用一两句话把文件的基本内容或中心问题提示出来；而不是说，把已精读了的各段各句的心得，总的联系起来，作一个全面的把握。这样的一种了解，使得读文件的结果，只孤立地记忆着这一些基本的方面（虽然这是第一重要的），而对于文件的其他方面的问题就采取忽视的态度。这样的态度，仍不脱粗枝大叶的一套，对于把握马列主义精神实质的要求，是颇有阻碍的。

（原载《解放日报》1942 年 9 月 17 日；曾收入《“有的放矢”及其他》和《艾思奇文集》第一卷）

怎样改造了我们的学习

——在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学习总结报告

(1942.10)

中央研究院半年多来的整风运动，从两方面获得了成绩：一方面是改造了我们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另一方面是改造了我们的学习。关于思想意识的改造的总结，已有另外的同志的报告，我这里只讲，怎样改造了我们的学习。

今年3月18日的动员大会，开始了我们的整风运动。动员大会使全院卷进了热潮之中。大家知道，在这时候，“四三决定”还没有发表。由于本院的成分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出身的青年党员，由于大多数的人过去都曾受过长期的教条主义教育的毒害，而又缺少实际的工作经验，也由于领导方面对于这一个新的运动没有充分的准备和布置（虽然也指出了一般的正确的方针和采取了一些适当的布置），没有将积极分子团结起来。因此，这时期的整风运动是在不正确的道路上发展着的。这时，一方面暴露了我们思想意识上的许多偏向，另一方面也暴露了我们在学习上的不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四三决定”发表后，领导方面才根据这一决定的指示，根据本院前一时期的经验，采取了许多办法，逐步地改造了我们的思想意识和改造了我们的学习。现在先要问：在“四三决定”以前，——

一、我们学习上有哪些主要的缺点呢?

第一,“四三决定”以前,我们是站在不正确的立场上来进行整风学习的。在当时,大多数的同志都没有把学习的立场看做一个重要的问题,也就没有认识到整风运动是一个思想革命,是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克服小资产阶级意识。大多数人对于整风运动是这样认识的:一,整风运动和过去的检查工作没有什么基本的区别;二,检查的对象是局部的,主要是领导者和“名流大师们”;三,检查的内容,是所谓“老一套”的作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是专指的老干部们的邪风。这样的认识是表明什么呢?这就是认为,本院的大多数同志们的立场是不成问题的,他们的思想意识是用不着改造的,他们的任务只在于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检查领导者、老干部和“名流大师们”的思想和工作。这就是说,他们误认为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就是正确的立场,就是整风学习运动中的指导的立场,就是改造思想和改造党的立场。在这样的认识之下,使大多数人不论在学习文件和批评实际问题的时候,都把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为评判一切的标准。

第二,“四三决定”以前,在学习上暴露了我们所受过的教条主义教育的恶果。我们的教条主义态度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首先表现在我们对于报告文件的不重视,听了整顿三风的报告,就说:“还不是这一套!”我们以为报告文件太粗浅,太容易了解,不耐烦细心地反复研读它。我们没有认识到:文件报告是改造思想的理论武器。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想法?这就是教条主义的遗毒的表现。因为教条主义使我们有这样的观念,只有外国的,难懂书籍上面的条文,才是理论武器,文件报告至多不过是这些理论的

具体应用而已。其次由于不重视文件报告的缘故，使我们对于文件的内容，用一种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我们对文件的内容，是满足于望文生义的，纯概念的，以至于咬文嚼字的了解，而不深入地研究真正的精神和实质。有的人随便抓着文件上的一两句话，就长篇大论地乱发感想，也有些人专门在文件的“理论结构”上用工夫，费许多时间来说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等概念的“相互关系”和“一贯性”，而对于实际问题全然不去联系。再次，我们是不是全然不谈到联系实际这一类的话呢？并不，我们是常常谈到这一句话的。但是我们之所谓联系，只是一种形式的、应付性质的。事实上，我们是迂回地回避了真正的联系。例如，我们所谓“联系”到的，一般的都只是院外的，过去的，别人的，或领导者的问题，而绝少联系到院内的，现在的，自己的，和一般同志的问题。这样的联系，就我们整风学习的目的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是不发生真正的有的放矢的作用的。

因为不能把文件联系到院内的当前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在运动中接触到这些问题时，我们就不是以文件的精神实质作为理论武器来加以批评和解决，而是依据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狭隘经验来加以各式各样的说明。有的人把党外对待反动阶级和敌人的经验来对待党内的领导者，把党内领导者和《阿Q正传》的赵太爷看做同样的人物，有的人说对于党的小组长，要用对待帝国主义一样的“硬骨头”去对付。有的人纠缠在许多无原则的争论里，把“流氓态度”和“臭袜子”等的问题当做攻击的目标。这种狭隘经验的无原则的批评，形成了我们整风初期教条主义学习态度的一个分不开的补充的方面。

第三，对于思想斗争的自由主义态度，也是“四三决定”以前我们学习中的一个主要缺点。这种自由主义的态度，一方面表

现在对于王实味托派反党思想的没有警惕，不进行驳斥，甚至于在许多观点上反而加以同情；另一方面，也表现在对于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意识的袒护或容忍。许多人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即使认识到了偏向的不对，也没有勇气出来批评。我们的自由主义还表现在一种自发论，在墙报上理论地反映出来。这就是以“强调民主”和“真理一定会胜利”为理由，主张让各种思想自由地发展，反对从领导方面自觉地有计划地纠正错误思想。

以上三点，就是整风初期我们的学习上所表现的主要缺点，这些缺点的存在，使我们不可能在学习上获得积极的成果，使我们无法掌握文件报告的精神和实质，使我们没有能力来反对错误的思想，并驳斥王实味的挑拨离间和反党宣传，使偏向始终占了上风。不过，从积极方面说，这一时期的运动热潮中，大大地暴露了我们的思想意识的偏向，暴露了我们的学习上的弱点，使我们便于根据偏向的性质，根据错误的学习经验，适当地决定了改造的方针和办法，使我们以后能够较迅速地获得了好的成绩，这又不能不说是弱点中的强点。

二、什么是我们改造学习的方针和办法呢？

根据“四三决定”的精神，领导方面改造本院学习的方针，是在于把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具体应用到院内来，把文件学习和院内当前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密切联系起来。当前的问题是偏向表现得很严重，小资产阶级意识亟待改造，我们必须引导全院同志，在学习中联系这些偏向和批评改正这些偏向。在这样的方针之下，我们采取了以下的具体的办法。

第一，为着容易和当前实际问题联系，提前学习党风文件，特别把《反对自由主义》等和本院偏向有关的几个文件放在最前面

学习。这是看“的”用“矢”，针对着具体的“的”，选择适当的“矢”的办法。但为着首先使同志们对于整风运动获得一个总的概念，在党风文件之先，先讨论“四三决定”和《改造我们的学习》、《联共党史》结束语、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等，作为一个“总论”，而不是学习全部党风文件。

第二，学习方法上的具体领导。由领导方面规定的文件一定要反复精读，深思熟虑，做笔记，逐条讨论，在笔记和讨论上要反省自己和批评别人，联系院内偏向等。

第三，领导方面以身作则。估计到对于偏向的问题一定会受到抵抗，反省和批评展开一定会发生困难，各研究室主任在参加讨论中，首先自我批评，作为模范，来引导大家反省。

第四，领导组织的改造。以前在学习方面没有领导核心，动员大会所选出来的检查委员会和常委会，不适合作思想领导，因此由各院研究室主任和院部负责人，共同组织一个中心学习小组。文件的学习，首先在中心组讨论过，在领导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然后到各室领导讨论。这中心小组以后又改为常委会，不但领导文件学习，而且领导学习运动的全部计划和布置。这样使我们有计划地把运动引到正确方面。

以上就是我们改造学习的方针和办法。

三、我们的学习是怎样改造过来的呢？

“四三决定”以后，到党风学习完毕，我们的学习，是经过了三个时期，才完成了我们在基本上改造了学习的过程。第一，是学习“总论”的时期；第二，是从党风学习开始到反王实味大座谈会的时期；第三，是反王座谈会之后到党风学习完毕时期。这三个时期，各有以下的特点：

第一个时期的特点，是对于学习的改造作了一个认识上的准备。首先起决定作用的是4月7日中宣部为本会召开的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凯丰同志婉曲地指出了偏向的存在，指出研究院的同志必须学习在党的立场上来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指出在整风运动中一方面大家要自由说话，另一方面也要设法把大家的意见引导到正确的方向。接着讨论了“四三决定”，使大家了解整风运动是党的思想革命，是要改造每一个同志的思想意识，而不是专对一部分人。在以上的指示和认识之下，我们的学习开始有了转变。我们都精读文件，普遍地做笔记，认真地进行讨论，个别同志开始对自己的偏向作了反省，把文件学习与自己联系起来。虽然大多数同志还不能这样切实地做，还对偏向的反省表示反抗，但对于整风学习的方向，已获得了一个初步的认识，为以后的改造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第二个时期的特点，是根据党风文件研究所得，每个人作了初步的自我反省，并对于王实味的思想宣传进行了揭露和驳斥。认真地研读文件和领导方面的以身作则的引导，使大家能够相当地掌握了文件的精神实质，按照文件的内容，部分的反省了各个人自己的错误思想，在个别问题上作了自我批评。同时也使大家有能力来批判地研究王实味的反动文章《野百合花》和《政治家与艺术家》，并进一步开展了反王实味的全院大座谈会的斗争。在反王大座谈会上，我们仍然具体运用了有的放矢的原则，选择了《斯大林选集》和《联共党史》上反托派的文献，作为更具体的理论武器，这就帮助了大家能够把王实味的面目揭露无遗。

第三个时期的特点，是根据文件学习所得和前一阶段的斗争经验，对每一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学习态度学习方法，进行了深入的全面的改造。这个时期的成绩主要表现在三项作业：第一是反

王座谈会后各研究室的检讨会全面地检讨了每一个人在整风以来的思想意识和偏向的表现，反省了各个人从王实味方面所受到的影响。这次检讨会和以前的检讨会不同的一点是，以前党风学习会上主要只有各个人的自我反省，而绝少对别人的严正批评，这一次却展开了互相批评，不批评别人以避免别人批评自己的坏现象被纠正了。其次是思想自传的写作。每个人根据党风文件学习所得，来对自己的思想意识作一个历史的全面的检讨，从社会的根源上，历史的发展上，分析了自己的思想意识的具体形态和现在的矛盾，并考虑以后努力的方向，这一种历史的（也可以说是科学的——虽然做得不够）检讨，使每个人对于自己获得了一个清楚的认识，规定了更切实的改造自己的方法，它的作用，比较那部分的反省和各个问题上的自我批评有更大的意义。再次是：学习总结的讨论，根据“四三决定”和“总论”文件的精神，各研究室首先对整风以来的学习经验作了一个全面的检讨，进一步又开了全院的学习总结座谈会，集中地交换了全院的学习经验，使我们系统地认识到，什么是新的马列主义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

经过了以上的过程，我们的学习，就在基本上被改造过了，我们开始走上了马列主义的正确的学习道路。缺点自然还有：第一，是个别的人仍然落后，仍然不能认真研读文件和改造自己，思想自传写得非常马虎。又，大多数的人虽然已经走上了正确的道路，然而在这新的道路上还走得不惯，走得不稳。在理解文件和反省自己的学习中，表现出我们的不够熟练，我们的自我批评和相互批评，都有许多不足和过火的地方。这一切缺点，还需要我们不断地继续努力加以克服。然而，在这半年多的学习过程中，我们已获得了成绩和许多可贵的经验，真正地体验到了什么是马列主

义学习态度，懂得了正确的学习方法的许多要点。

四、我们得到了一些什么经验呢?

第一，我们对于理论与实际的联系，获得了一个生动的正确的了解。以前我们也常常谈到理论与实际要联系，但这只是一句空话，所谓联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受到教条主义毒害的我们是并不曾真正懂得的。首先我们对于什么是理论，认识就非常模糊。我们事实上是把外国的名著里所抽出来的原则公式看做惟一的理论，而把其他只看做应用。因此，对于中国的理论，对于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报告，对于党的文件，就不当做理论而加以重视，这是整风初期我们对待文件的态度所明白表现着的观点。现在我们是真正懂得了，我们的理论必须是“与实际密切联系着的理论”，“是从实际中抽出来，又在实际中得到证明”的理论。我们已经看见，22 个文件，也就是这样的理论，这样的理论在指导我们解决实际问题上，有着很大的力量，我们亲身的体验证明了，这些文件是怎样能够改造了我们的思想意识和我们的学习。这样，我们就获得了一个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关于理论的概念。其次，对于实际，我们过去的概念也是非常模糊的。我们常把实际看做随便拉来的，零碎的个别事例，因此我们所了解的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只是两者的机械的结合，一方面把握着一个“理论”的公式，另一方面随便拉一些例子来作为证明。这就叫做联系实际！这在“四三决定”以前的学习中也有表现。现在我们懂得了，以上的观念是完全错误的。所谓实际，必须是与我们当前的斗争有关的、一定的具体的实际问题。所谓联系实际，必须是把适当的理论作为指导武器，来解决当前的一定的实际斗争问题。而且，要判断我们是否能正确地把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就要看我们是否

能够正确地解决了当前的问题。我们的学习，使我们亲身体验到怎样把文件作为理论武器，来解决我们的思想改造和学习改造的问题。我们已经开始能够做到这一种正确的联系了，这有什么证明？证明就是我们的思想改造和学习改造已经获得了的成绩。

我们现在开始懂得了，怎样才叫做能掌握理论。掌握理论不是在口头上背熟了原则公式的词句，而是要能把理论的精神与实质，应用于实际。实践是真理的检证，只有在应用当中，才能证明我们是否掌握了真理。有的同志对于文件的理论结构可以讲一大套，而对于具体的问题毫不接触，这算不算掌握了文件的理论？现在大家都能答复：不算！其次，理论既然要加以应用，就必须按照实际的具体情形，把理论具体化，不硬搬公式，乱戴帽子，而要按客观情形灵活应用。有的人在反省或写思想自传的时候，把文件上的条文，逐条套在自己身上，这算不算掌握了文件的理论？我们也能够答复：不算。真正的掌握，是必须采取文件的精神，作为指导的方针，来具体分析自己的思想意识，找出它的产生根源以及各种意识的矛盾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只有依据这种具体的分析，认识了自己的思想意识的具体的表现和具体的改造办法，而不是简单地把文件当做现成的公式拿来硬套，这才是掌握了理论。这就是实事求是。这一点，是我们大多数人在整风学习中都做了的，但我们还做得不够熟练，不够完全正确，这是我们以后还要努力锻炼的。

我们懂得了所谓“理论是行动的指南”的意义。实在说，我们以前学习马列主义，是为理论而学习理论，不是为把这些理论变为实际行动。因此，我们喜欢学习一大堆的条文，头绪愈繁杂多样愈好，内容愈新奇难懂愈妙，这就是我们过去学习理论的态度！这种态度，使我们对于文件报告中的简明的文字，觉得很不

“够味”，有些人说整顿三风的报告“还不是老一套”。现在我们才明白，这一切观念都错误了，理论之为理论，不在于它的原则条文的多少，而在于它对当前的实际运动是否能指出明确的方向，能正确指导我们的行动，使我们的行动能发挥伟大的力量。尽管我们能背诵千百条文，尽管这些条文是从马恩列斯的名著里抽取出来的，如果与当前的实际运动不切合，不能推动实际行动，那我们所记诵的，仍变成了一些空洞的教条（虽然在原著上是与实际密切联系的理论）。相反地，尽管某些文献是简明易懂，尽管它在文字形式上对教条主义者似乎很“不够味”，然而它和当前的实际问题密切联系，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它就能够推动一定的具体的运动，发生伟大的行动力量，那它就是生动的，新鲜活泼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于这种与实际密切联系的理论，如果轻视，如果说它是“老一套”，是“不够味”，那就是大错特错，那实际上是用教条主义的立场来反对活生生的马列主义理想。整顿三风的报告，在原则上只简单提出了三个问题，但对于我们今天的思想革命斗争，却有着伟大的指导行动的力量，我们的一切思想改造的工作，都要循着（而且事实上已经循着）这一个报告的方向前进。这样的理论，从文字形式上看，似乎非常明白易懂，但从它真正的内容和作用上看，却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掌握的。因为要真正掌握这样的理论，不是在口头上加以说明的问题，而是在实际上去做的问题，必须在行动上我们的确能照着它的方向去做了，而且做到有了成绩了，才算是真正掌握了这理论。——这也是我们在此次学习中所经验到了的。这样的经验，我想，不只是对整顿三风的理论才可以适用，对于一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都可以适用的。

第二，这一次的学习运动，使我们体验到：我们的学习是一

种思想斗争，而且也只有经过思想斗争，才能使学习获得成绩。我们的整风学习是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斗争，其中也交错着对托派的反党反革命的思想意识的斗争。我们半年多的学习一直是在这些斗争中度过来的。这和整风以前的教条主义的学习全然不同。以前我们的学习，是一方面大量地记诵文句，而另一方面旧的思想意识仍然照样保留着，马列主义的文句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可以在我们的头脑里和平共居！这使我们的学习得不到任何成效，使我们不能言行一致，使我们在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经典之后仍然不能成为真正的马列主义者。相反地，这一次的整风学习，因为经过了思想斗争过程的缘故，我们就能够改造了自己的思想意识，真正走到了马列主义的立场上来。

我们的学习，是两种性质的思想斗争交互错综和交互渗透的过程。一种是党内性质的思想斗争，这是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与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斗争，这是整风运动中我们一般同志本身的思想斗争；另一种是党外性质的思想斗争，这是对于与党的立场完全敌对的王实味托派反革命思想斗争。我们的斗争过程，是这样交错着发展的："四三决定"以前，在王实味的挑拨影响之下，小资产阶级意识占了上风，正确的思想是处在劣势的状态中。"四三决定"到反王座谈会之前，是开始展开了党内思想斗争，无产阶级意识开始抬起头来，初步战胜了某些小资产阶级意识。反王座谈会的开展，是表现党内思想斗争转化为党外思想斗争。反王座谈会后，又由党外思想斗争转入更深刻更全面的党内思想斗争。在这些斗争的过程中，领导上曾把两种斗争加以区别而又适当地加以联系：在反王座谈会上，我们曾指出，王实味的思想和一般同志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有本质上的不同，而我们对于两种思想的斗争中所采取的态度也有区别。对于王实味的思想我们是采取

尽量揭露和驳斥的态度，而对于一般同志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则采取说服教育的态度。另一方面我们又指出，王实味的思想是怎样严重地影响着我们，他怎样利用了我们的小资产阶级意识，进行了种种挑拨活动，并指出我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某些方面有与他的言论相类似的地方。这一个联系方面的揭露，大大地提高了同志们的警惕性，使大家深切感觉到改造自己的迫切需要，这样，党外思想斗争的展开，就进一步刺激党内斗争的发展，使我们的思想改造过程加速地获得了成绩。

在斗争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的自由主义的缺点逐渐被克服了。“四三决定”后，领导方面首先注意把各种各样的思想斗争引导向正确的方面，克服了以前的自流现象。党风学习中的反省，各个人初步放弃了对于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意识的袒护和容忍的态度。反王座谈会的展开，又提高了一般同志们对于敌对思想的警惕性，对于王实味的思想行为，共同表示了唾弃的感情和高度的义愤。反王座谈会后展开了相互批评，克服了许多同志中的“明哲保身”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坏习惯。

自由主义是我们在思想斗争中的主要的缺点。我们中间有没有“左”的过火的斗争？自然也有的，但不是主要的倾向，而只有个别的表现，并且还只是限于思想斗争范围以内的表现，而没有采取任何思想斗争以外的手段。这种表现只是：个别先进的同志，在群众认识准备不够的时候，过早地提出自己的意见，以致成为脱离群众的现象；其次，也有个别同志，在材料不充分的情形下，对问题下过早的结论，以致有不适当地乱戴帽子的现象。但是这些例子，都是个别的，一般的情形，还是对于错误思想的认识表现得过右或过迟，不能尖锐地、迅速地加以揭发。自由主义的倾向，一直到现在还在许多同志中间有着残遗，虽然一般地我

们已认识到了和体验到了自由主义的危险性，但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我们还没有能够充分纠正，这主要的原因，应该说是我们思想的改造还不够完全，认识能力还不够坚强，还没有能够深刻地钻研问题，尖锐的揭发错误，一句话，就是由于我们思想嗅觉还锻炼得不够锐敏，不能嗅出最细微的于党有危害的错误思想。要彻底清除我们的自由主义的毛病，必须以后更加努力学习，使我们有更大的能力能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上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第三，在学习组织方面我们也获得了一些经验。首先是学习的领导核心组织，对于学习的改造和进程有很大作用。“四三决定”以后我们在学习组织的改造上，第一，就是成立了中心学习小组；其次，就是学习过程中对积极分子的团结。我们把中心组作为思想领导的核心，而在中心组的周围，又团结了许多积极分子，他们是最先转到正确的方向来，又能够最快地吸收正确的学习经验的人们，通过了这些积极分子，去影响中间分子和带动落后分子，领导方面才有可能把全院的同志普遍地引到正确的道路上去。应该说，“四三决定”以前的自由主义，不但表现在思想上，而且表现在组织上，那就是缺少这样一个领导的核心，缺乏对于积极分子的团结，而在“四三决定”以后，是把这一缺点纠正了。

个人学习与集体学习的适当配合，也是学习组织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的学习组织形式，有个人学习，漫谈会，各研究室讨论会，全院大座谈会等。全院大座谈会，是集体学习的最高形式，在要讨论有关全院的大问题时，召开这样的座谈会，教育意义是很大的。在座谈会上我们能够集中地交换本院的学习经验，使大家的认识大大开展起来，能解决个人学习以至于讨论会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反王大座谈会所发生的教育力量，就是一个典型的

例子。但这样的会，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召集和任何情形下都能够获得大的效果的。必须在两个条件之下，大座谈会才能发生它应有的作用。第一，是所提出讨论的，必须是有关全体的具体而内容丰富的问题，如像反王实味的问题，否则不容易展开热烈的论战；第二，在开会之前必须有相当的准备，充分的酝酿。所讨论的问题必须经过个人学习和讨论会的初步研究，在问题的本质已经相当暴露出来，而各方面的意见已相当成熟了的时候，再召开座谈会讨论，否则也不可能展开充分的思想斗争。

这就是我们在半年多的学习过程中所获得的经验。这只是一些主要的。自然，除此以外，我们还有很多个别的、零碎的、学习方法上的经验，在这里都不提了。

（原载《解放日报》1942年12月26日；曾收入《“有的放矢”及其他》和《艾思奇文集》第一卷）

哲学战线上的列宁时代

——为列宁逝世纪念日作

(1943.1)

列宁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战线，有着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不但要反对自己营垒之外的思想敌人，而且要对自己营垒内隐蔽着的异己的或敌对的思想进行斗争。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文献中，第一次揭露了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伪装着的唯心论。这一个特点，是和列宁时代的条件分不开的。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已经走上了直接实践的日程。在思想的领域里，马克思主义已成为国际工人阶级中公认的指导思想。以前存在的许多工人中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派别，已经在工人阶级中丧失了威信。在这种时候，无产阶级思想上的敌人要公开使用反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就愈来愈不容易。就像在实际运动中，由于无产阶级阵容日益壮大，敌人就要偷进无产阶级阵营内部来进行破坏一样，在思想斗争中，与无产阶级敌对的思想，也就要偷窃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来伪装自己，以便于在无产阶级队伍中发挥瓦解的作用。因此无产阶级就不能不一方面和自己营垒外部的实际行动中和思想领域中的敌人斗争，而另一方面又要揭露自己营垒内部的暗探、奸细和隐蔽在自己旗帜下面的敌对思想。

《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具体条件下写成

的。那时正是1905年革命失败之后。沙皇政府利用时机，从外面和内部来向革命进攻。在思想战线上展开了“批评”和“谴责”马克思主义的攻势，使批评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时髦的运动。革命营垒内的一小部分悲观失望立场不稳的分子，在这种影响之下，竟与敌人的攻击遥相呼应，企图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法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加以“改善”和“修正”，企图用一种资产阶级的哲学唯心论（经验批判论）来代替辩证法唯物论。这一种现象，在无产阶级党的前面提起了一个迫切的任务：要维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要消灭党内的这种思想动摇的现象，要揭露这种冒牌马克思主义的荒谬的面目。《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就是针对着这样一个实际的任务而写的，并且曾十分圆满地完成了这一个任务。

《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是列宁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战线上对伪装着的内部敌对思想的第一个大战役。在这个战役里，列宁把内部的“修正主义者”的假面具摧毁得干干净净，连带也胜利地打击了外部的思想敌人，俄国经验批判论者的德国老师：马赫和阿文那流斯一派的主观唯心论。这样使无产阶级革命营垒内的理论基础得到巩固和发展。这是列宁时代马克思主义在哲学战线上第一个胜利的战役，然而并不是最后一个战役。革命的斗争向前发展，规模愈更扩大，影响愈更深入，反动势力就要进行更疯狂阴险的挣扎，在思想方面，也就要用更狡猾的方式来伤害马克思主义，愈更精巧的伪装的唯心论思想，也就要在种种机会之下偷送到马克思主义的营垒内部，而马克思主义的党也就要不断准备着再来迎接大大小小的这类的战斗。

另一次对马克思主义营垒内部伪装的唯心论的大战役，是在列宁死后，苏联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由斯大林同志领导进行

的。这就是对德波林孟什维克唯心论的斗争。德波林的唯心论，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出现的，在这样的条件下，要公开地表示反对马克思主义是完全不可能的，要直接表示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企图，也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德波林主义就必须以更加巧妙的伪装来掩盖自己，才能施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唯心论修正。经验批判论者虽然标榜马克思主义的旗帜，然而曾明白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改善一下”，明白表示反对唯物论的企图，而德波林的唯心论则不但采取拥护马克思主义的姿态，而且采取保卫辩证法唯物论的姿态，它在外表上以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的言辞巧妙地遮着自己的面目，甚至于不惜用尖锐的形式，反对某些唯心论思想（如卢卡契型的黑格尔唯心论），不惜对机械唯物论进行激烈的论争。

德波林的唯心论，在本质上有三个方面：第一，是理论与实际脱离，哲学和政治脱离。德波林的哲学的研究，是纯粹抽象理论的研究，这就是只在范畴的相互关系和抽象概念的体系之内兜圈子，不联系当前的实际政治问题，不注意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因此在言辞上虽然谈到辩证法唯物论，在实质上却已经是把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了的唯心论。第二，不承认哲学的党性原理，不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研究必须为着拥护党的一般方针而斗争，必须为着反对离开这一方针的偏向而斗争。第三，过低估计列宁之作为一般的理论家的地位，特别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地位，不承认列宁曾把辩证法唯物论发展到新的阶段，对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的哲学上的许多错误却加以掩护，并重复和深化这些错误。

斯大林曾指出了德波林派哲学的实质，说这是孟什维克的唯心论，并且，在理论与实际脱离，哲学与政治脱离这一点上，它

是复活了“第二国际的最有害的传统和教条之一”。德波林主义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斗争条件下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是包围着无产阶级的敌对阶级势力对无产阶级的压迫之表现，它的思想上的作用，在于引人沉醉于抽象的研究，脱离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斗争，对党的政策方针采取消极漠视的态度。为着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特别是为着动员苏联理论家，自然科学家（德波林哲学在苏联自然科学家中间有某些影响，而社会主义建设又需要有自然科学家，技术家参加）来积极参加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斗争，苏联哲学界就面对着这样一个重要任务：必须揭破1928至1930年初成为权威的德波林派哲学的假面具，粉碎它的隐蔽的唯心论。

马克思主义者再一次对自己营垒内部隐蔽的唯心论的大战役，是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中国党内今天的整顿三风运动。这一次斗争，现在还只是开始不久，但从它的发展前途看来，它的深入和广泛的程度，是难以计量的。这不只是对某一部分伪装的唯心论思想的斗争，而且是对每一个党员在工作中，思想中，生活中的具体而微地隐藏着的唯心论（主观主义）的斗争，这不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一般原则的拥护，而是要使全体党员学习怎样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并在革命的实际工作中能具体运用它。这不仅仅是在理论工作者的范围内进行斗争，而且也要在一切实际工作者中进行广泛的思想改造；这不仅是要教育全党拥护唯物论反对主观主义，而且同时与反对非无产阶级意识的斗争联系起来，进行一个全面的党的思想革命。

整顿三风运动，在今后中国革命发展前途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这一次，思想战争的胜利，必能加速地推进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任务是极其复杂而且艰巨的，没有正确的马克思

主义的指导，要完成这任务是不可能的。党员的头脑中如果隐藏着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以及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领导，这就要使革命受到损害，这是中国共产党二十几年来的经验证明了的。正是针对着这二十几年来的经验，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和整顿三风的任务。

一年来的整风运动，获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在党的生活的各个角落里，激起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争论的热潮，许多党员的思想和面目起了根本的改变，许多工作部门作风表现了新鲜的气象，运动正在发展，今后在毛泽东同志的指导之下，在全党热烈响应之下，我们的斗争任务必能充分贯彻，是毫无疑义的。

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论争，都不是所谓“纯理论”的斗争，而是和党的一定的实际任务紧密联系着的。对于党内的唯心论思想的揭露，是为着要在理论上巩固党的基础，以便于完成当前的实际斗争任务。过去我们许多做理论工作的人，对于理论与实际的这一种联系是认识不到的。我们常常沉醉在一般的理论的研究上，而很少注意到怎样去解决革命的实际问题，我们总是在现成的外国书本知识上兜圈子，而懒于研究中国现状和历史，我们不能从这样的研究中找出规律，来指导革命的实际斗争。这是教条主义的态度。就理论与实际脱离这一方面来说，是和德波林主义没有本质上的分别的。在哲学方面，许多人学习了反德波林派斗争的著作，但却不知道根据这些反德波林的精神，来反对中国的唯心论，来反对党内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以便促进中国革命队伍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巩固和发展。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的，正是由于以教条主义的态度来接受苏联哲学界所进行的斗争，没有注意到斯大林同志指导反德波林主义的意义和实质之所在，只学到了一些范畴和法则的形式上的说明，而没有学到怎样去具

体应用辩证法唯物论。

这就是说，要肃清自己内部隐蔽的唯心论，是需要努力的，从反德波林主义的著作中学习的结果，可以仍然又陷入德波林主义——理论与实际脱离，教条主义。由于反对自己内部隐蔽的唯心论之困难，我愿对我们的理论工作者提议注意以下的两件事：

一、在整顿三风反主观主义斗争中，要警觉地彻底肃清一切形式的唯心论，不要让唯心论又采取新的伪装混进我们的思想里来。如果没有严肃认真的态度，唯心论是会在我们不知不觉中隐蔽在我们反主观主义的名词之下出现的。例如在整风运动中，有些人说，“我自来就是‘从实际出发的’，所以难说有教条主义主观主义。”说这话的人有两种，或是做过一些实际工作的，或是研究过一些实际材料的。表面上看，他们的工作确是“从实际出发”的。然而他们不知道：第一，主观主义或者唯物论的问题，是思想方法上的问题，而不是研究对象的问题。思想方法如果是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那么，即使研究了实际材料或做了实际工作，所得到的知识仍是主观的感想式的知识，或教条的套公式的知识，而不是正确反映客观规律的科学知识。第二，单单从“实际出发”，并不就能够一定获得唯物论的科学知识。因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实际抽出来又向客观实际得到了证明的理论”。“从实际出发”，只完成了上半段，没有下半段，仍然不能成为真正的理论。因此，仅仅片面地强调“从实际出发”，那往往又会成为唯心论的一种新的伪装。有些做理论工作的同志，在检讨教条主义之后，自己失去了信心，想放弃自己的岗位，说要到乡下去，说到了实际工作中，逼着自然要从实际出发，就不会有教条主义，这样的想法，也是出于同样的认识错误。

二、希望全国曾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的同志们，把

过去的理论工作做一番清算。首先就自己和自己部门的教条主义加以反省，然后来总结一下全部理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整风运动现在在许多实际工作部门和教育工作部门中有了较深入的发展，而在理论工作部门却还说不上开始，这是应该注意的。

纪念列宁，就把以上两点希望贡献出来，还望做理论工作的同志们共同努力。

（原载《解放日报》1943年1月21日；曾收入《“有的放矢”及其他》）

人民的成功

(1943.2)

1943年确是胜利在望的年头。就全世界来说，德意法西斯的军队已经开始了大的崩溃。就中国来说，第一月就看见了值得庆幸的大事——中英美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协定。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向着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境地深陷下去，到现在已经挨过了一百零一年被压迫被屈辱的光阴。历史的发展是辩证法的，我们的民族现在开始翻身了。中国的国际平等地位，虽然早已获得了苏联的实际承认，但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手里争取这样的仅仅法律上的地位，却是在抗战坚持了五年以后的今天。这是一个不容易获得的巨大成就，是值得我们以高度的兴奋和热情来庆祝的。

但是在心头十分欢欣鼓舞的时候，却不要失去了头脑的冷静。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是中国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一个胜利。这个胜利，在日寇还没有被最后击败以前，还只表现在条约的条文上。在我国广大的领土上，还有侵略者的武力在盘踞着。不把日本帝国主义完全打败，我国国际地位的完全平等，还是谈不到的。一切都还要我们的人民用更多的牺牲和流血去争取。今后我们要做的事还多得很。在欢欣鼓舞之中，我们要更慎重地思考：为什么我们百年来会陷入那样的境地？为什么今天又能争取得这一些胜利？为着保证这些条约成为现实，我们应当做的又是什么？

百年来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中，中国的人民一直没有停止过斗争。第一次鸦片战争，广东几万民众所组织的平英团的反抗，

就曾经使侵略者丧胆。每一次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加深了中国经济的困难，也就激起了更广大人民的反抗和起义。鸦片战后的太平天国运动，中日战后的义和团运动，庚子后的辛亥革命，二十一条后的五四运动及大革命，是一次比一次高涨的人民的民族斗争。大革命在五四启蒙运动之后，在苏联十月革命影响之下，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在国共两党合作之下，表现为高度的自觉的民族革命斗争，明确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七七抗战，是继续发扬了大革命的传统，动员了更广大人民的自觉的斗争。这样才坚持了五年多的抗战，争取到能够看见今天一线的曙光。

中国人民的斗争为什么要拖延到百年的长时间？为什么这些斗争不能早日争取到中国民族的解放？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少数统治者的卖国求荣。这一些民族败类的无耻行为，不但阻碍了人民为争取解放的斗争，而且加深了中国被屈辱的地位。在林则徐被撤职、广东民众反抗被镇压之下，有 1842 年《南京条约》的签订。太平天国覆灭之后，有甲午之战的失败。八国联军的《辛丑条约》是义和团运动被出卖的结果，二十一条的耻辱是袁世凯破坏辛亥革命的产物。以后的历史也不乏同样的例证。这少数民族败类，就只为着自己的荣华富贵，而违反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出卖民族利益。百年来的中国，就是在这些人的阴谋诡计之下，渐渐丧失了独立和自由的。

历史是人民的历史。一切违反人民意志和要求的恶行，都是不能长久的。少数人的卑劣无耻的伎俩，纵然能偷取得个人的暂时的荣华富贵，但结果是不但丧权辱国，而这些人本身也不免终于身败名裂。他们虽然可以在自己的帝国主义主子的帮助之下，暂时维持权位，一旦在人民面前暴露了丑态时，虽然依靠了帝国主

义枪炮的保护，也不能挽回自己的没落命运。这是历史的事实确凿地证明了的。孙中山先生在民国十三年《北上宣言》里有一段话说的好：

"二年东南之役，袁世凯用兵，无往不利。三四年间叛逆渐著，人心渐去，反对帝制之兵起，终至众叛亲离，一蹶不振。七年以来，吴佩孚用兵亦无往不利，骄气所中，以为可以力征经营天下，至不恤与民众为敌，屠杀工人学生，以摧残革命之进行，及人心已去，终至于一败涂地而后已。犹于败亡之余，致书北京公使团，请求加以援助，其始终甘为帝国主义之傀儡，而不能了解历史之教训如此。由斯以言，帝国主义之援助，终不敌国民之觉悟。"

卑劣自私的民族败类，是不能也不愿了解"历史的教训"的，一旦遇到了"国民的觉悟"，他们就非至"一败涂地"不止。"国民的觉悟"是最伟大的力量，依靠着这个力量，我们可以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不但受帝国主义帮助的军阀在它前面要"一败涂地"，就是侵略者帝国主义自己，碰到了也要得到一个头破血流的结果。我们不能忘记，1927年武汉工人群众的斗争，曾使当时的国民政府有力量收回英租界，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实现开了一个端倪。我们尤不能忘记，目前中英美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是在坚持了五年抗战之后，而这坚持的成绩，是无数民众忍受了极大的苦难和巨量的流血牺牲换来的。

这是历史的规律。要争取中国民族的彻底解放，只有根据历史的规律去行事，才可能有所成功。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最主要的作用，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方法应用到中国革命实际上来，第一次明确地掌握了这个规律。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革命历史发

展规律知识的掌握，提出了解放中华民族斗争的正确的纲领，使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第一次有了高度自觉的领导。1922年《中共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就是用废除不平等条约及特权，打倒军阀，建立民主政治，改善工农生活，保护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及发动人民斗争的积极性为中心内容的。

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在不屈不挠的奋斗中，终于认识了历史的规律。他能考虑俄国革命的国际经验，承认中国革命“有俄国的方法以为模范”，他承认革命尚未成功，而要达到成功，必须“唤起民众”。在这样的认识之下，改组了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实行三大政策。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上，明白规定要求“中国民族之解放，其所恃为后盾者，实为多数之民众”，说“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大革命时代的许多成就，就是在国共合作之下，依靠了人民的力量的结果。

革命事业的成功，实质上都是人民奋斗的成功，我们自然不能轻视政府和领袖的领导作用，但这必须是人民的政府和领袖，而其作用只在于能集中人民的意志和要求，依靠人民的斗争力量，并根据革命规律的知识给人民斗争以自觉的指导。

没有人民的斗争，不能坚持五年的抗战，没有坚持五年抗战的成绩，友邦不会把好意白白的送来，不会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协定。就是友邦的好意本身，也必须看做是他们的人民的力量的表现，是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力量的表现。在今天庆祝废约协定的时候，必须联想到抗战以来英美以及全世界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对中国的同情和援助，必须联想到许多国家人民的抵制日货援华运动，必须联想到英美码头工人为拒绝装载军火赴日的罢工斗争，必须联想到苏联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伟大胜利的战果，

以及各国人民各民族反法西斯的斗争。谁也明白，法西斯的野蛮的侵略行为，不但危害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也危害了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生存。为着挽救自己的危机，英美友邦也不能不依靠人民的力量，依靠世界反法西斯的力量，当然也要依靠中国民族斗争的力量。废除不平等条约，对于英美本身也是必须的和有益的——这是为什么我们能争取得英美在条约上正式承认我们的平等地位的最重要的原因。

要想使中美、中英新约的条文完全变为现实，首先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一切失地，并且要在战后中国能将自己建立成一个政治经济上基础巩固的新的民主主义国家。这仍然要依靠广大人民今后的努力，用科学的历史规律知识来正确发动和领导这人民的斗争。

（原载《解放日报》1943 年 2 月 7 日；曾收入《“有的放矢”及其他》）

共产党的本领在哪里

(1943.3)

共产党已经做了很伟大的工作。苏联共产党领导着苏联人民，建设了社会主义，独力抵住了德意法西斯军队的进攻。中国的共产党，抗战以前创造了红军，在绝对优势的敌人包围之下战斗了十年，抗战以来，领导着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北华中敌后方的人民，在危险艰难的条件下坚持游击战争，又经过了五年。这五年中间，不但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拖得无可奈何，并且在根据地建设了三三制的民主政权，按照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方向发展了生产运动。像陕甘宁边区这样的根据地，老百姓都安居乐业，没有饭吃的都找到饭吃，有饭吃的都渐渐富裕起来，这是人人都看到了的。

这样的事业，在没有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是做不到的。但共产党决不满足于这些成绩，将来还准备做更大的事业，那就是要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地主、农民、资本家、工人之类的阶级，没有贫富的分别，一切人都尽自己的能力做工作，一切人都能取得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这叫做“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样的社会，一下子是建立不起来的，而且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是要经过很大很多的困难的。但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工农劳苦大众的支持和努力之下，将来是一定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的。共产党有这样的本领，有领导人民克服一切困难的本领。

共产党为什么有这样大的本领？

有些糊涂的人，以为共产党能够做大的事业，是因为命运好。

例如问：在陕甘宁边区，老百姓为什么能够过好光景呢？有人就说，这是因为毛主席福气大，带来了好年成，或者说，贺龙同志是“活龙”，带来了雨水。所以老百姓能过得这样好。

这是迷信，完全错误的。说到命运，边区比别的地方不一定更好，例如延安去年也有水灾，有些地方也有霜灾，有些地方也有旱灾。但共产党领导边区人民建设了好的经济，因此这些灾荒并没有使老百姓的生活变坏。

有的人又说，共产党员做事英勇，不怕牺牲，所以能够把事业做好。不错，共产党员做事，确是不怕艰难困苦的，这是共产党能够成功的原因之一。但共产党的最主要的本领并不在这里。如果只有英勇，并不真正能够抵事。“有勇无谋”的人，还常常会把事业弄坏，这是谁都知道的。又有人说，共产党的领导人很聪明，毛主席“神机妙算”，赛过孔明，所以能够做出大的事业。不错，共产党的领导人是英明的，共产党员一般也都是比较思想清楚的人。但是，共产党人不一定是生来就聪明的，非共产党人中也不缺少很聪明的人，为什么只有共产党人的聪明才能成大事，非共产党人就差一点呢？这是要找另外的理由，才能说明白的。

还有人说，共产党的本领，是因为有群众，群众跟着共产党走，所以什么事都能做成功。也不错，共产党有群众，而且群众的力量是共产党的革命事业的基础。但是，为什么群众只跟共产党走，不跟别人走呢？群众决不是无缘无故随便跟着共产党走的。所以，这仍然还要找另外的理由，才能够讲得通的。

共产党的最主要的本领是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共产党在进行革命斗争当中，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来指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科学理论，是包括着社会发展规律和革命斗争规律的科学理论，或社会科学的理论。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为什么能有那样大的作用？应用它来指导革命斗争，为什么成为共产党的主要的本领呢？

举一个例来说明吧。譬如军队行军，常常要遇到自己陌生的，不会走的道路，怎样办呢？大家都知道，这时就会请一个引路的向导。谁能做这向导呢？必须是很熟悉这些道路的人，他必须很清楚地知道应该走的一切路线，和通过这些路线的一切方法。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就是一切被压迫求解放的革命人民的向导人。共产党要引导着人民走上许多陌生的新的道路，例如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道路，抗日的道路，统一战线的道路，共产党为什么能引导人民走这些路呢？因为共产党能认识清楚这些路线，能知道应该用什么方法走这些路线。

共产党怎样才能够认识这些路线和走这些路线的方法呢？认识地上的路和认识革命的路是不同的。地上的路，容易熟悉，只要在某地方多走两次，就弄清楚了，就可以做向导了。认识革命的路，却不是这样简单的，革命的新的道路，常常是从来没有人走过的，例如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路，就是以前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革命中所没有过的，那么，共产党怎样来认清楚这些路呢？那就是要靠科学的研究，要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是怎样变化，革命怎样发展，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一个任务。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社会科学的理论，是革命的向导人所不可缺少的路线图案，是共产党认识革命道路的指南针。就凭着这一个理论的指南针，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进行革命运动，才能完成那样伟大的事业。

共产党之所以聪明，就因为有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做指导，能比别人更看得清楚革命的道路，并不是党员生来都是这样聪明的。

共产党人之所以英勇，就因为看清楚了革命的道路，所以走

起来就有充分的信心，不会因为困难危险而畏惧退缩。

共产党之所以有群众，是因为依靠了科学的理论，能给被压迫的群众找出求解放的正确道路，所以群众才拥护党，跟着党走。正如刘建章同志，给延安南区老百姓指示出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道路，所以老百姓都跟了他走。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社会科学理论，是共产党克服困难，战胜一切的思想武器，共产党的主要本领，就是能够使用这一件武器。所以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好好研究社会科学知识。

（原载《解放日报》1943年3月20日）

社会科学要研究什么

(1943.3)

我们都知道世界是会变的，我们的生活也会变的。例如边区的老百姓，生活一天天变好了。劳动英雄吴满有，模范党员申长林，从前都是穷苦的贫农，曾经没有衣穿，没有饭吃，现在都成了光景很好的富农了。这些事实，使我们相信，穷苦的被压迫的人们，不一定永远穷苦的，压迫和剥削别人的人，也不一定能长久保持他们优越的地位。

为什么世界会变，我们的生活会变呢？说到会变，我们的意见是不难一致的。但要说到为什么变的原因，各人的说法就不一定会相同了。

例如，迷信的人，说世界变动的原因，是鬼或神的力量，一切变化，都是冥冥中“鬼使神差”的结果。在这样的人的眼中，世界就是鬼神的世界，鬼神高兴怎样，一切事物就会怎样。变化的原因不在事物本身里，而是在鬼神的心里。

又有一种人，可以叫做英雄主义者吧？他们以为世界变化的原因，完全是伟大人物的力量。英雄豪杰的思想，可以左右一切。他们想要世界怎样变，世界就会怎样变。这也就是说，变化的原因，不在事物本身里，而是在伟大人物的心里。

如果这两种说法有一种是对的，那么，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变化，都是偶然的了。鬼神或英雄的心里偶然想要做什么，就有什么新的事情发生，他们偶然想要毁灭什么，什么也就被消灭了。一

切都只凭他们偶然的高兴来决定。这样，任何事物的变化，就不会有一定的方向，一定的道路，也就是没有一定的规律了。倘若这种说法是对的，那么，我们对于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加以研究了，即使研究，也得不出什么道理来了。因为，鬼神或英雄在什么时候一定要怎样想，你怎么能知道呢？

这就是说，科学的研究是不可能的了。因此，这种说法，是和科学不能相容的，这是唯心论的说法，认为心意（英雄的或鬼神的）可以决定一切。如果我们要用科学的观点来研究世界的事物，如果我们要研究社会科学，首先就要反对这种说法。

这种说法，本来是错误的。因为在事实上，任何东西的变化，都有一定的变化的道理，也就是都有一定的规律。吴满有的庄稼长得好，不是鬼神让它好起来的，是吴满有的辛勤的劳动换来的。如果吴满有懒得劳动，如果他不肯鸡叫就起来工作，而要到太阳很高以后才工作，如果他不肯多上粪多锄草，那他的庄稼就不会比一个普通的农民好，这是一定的道理。又譬如申长林的羊，从来没有害过病，并不是因为这位英雄想要它们不害病，就不害病，而是全靠他对羊群小心注意，管理得法，才有这样的好结果，这也是人人可以承认的，一定的道理。

“功到自然成，苦下在什么地方，就能有什么样的收获”，这就是种庄稼成功的规律。

各种各样的东西有各种各样变化的道理。种棉花，要阳光，要温暖，落了霜就不能生长。麦子却相反，可以在秋末播种，经过冬天也不会冻死。“晒不死的棉花，下不死的南瓜。”一种事物有一定的变化规律，不同的事物就有不同的变化规律。就如一条路常有一定的路线，不同的路就有不同的路线一样。

事物的变化，不是因为鬼神或英雄人物想要它们这样变化，而

是因为事物本身有一定的规律，它是按照着自己本身的规律变化的，变化的原因，不在人的心（或鬼神的心）里，而是在事物的本身里。这就叫做唯物论的说法，是科学的正确的看法。

既然每一事物都有一定的变化规律，我们就可以研究它，发现出它的这些规律，发现出它变化的一定的道理，认识清楚这些道理。

我们如果认识清楚了这些规律，这些道理，在一件事物还没有变化完结以前，我们就可以预先知道它会向着什么方向发展，和在什么情形下会怎样发展。就好像熟悉道路的人，在路还没有走完以前，早已经知道将来应该走的是什么方向，和应该走些什么路线一样。

我们如果认识清楚了事情的规律，那我们只要顺着这规律去做事，就可以顺利地把事情完成，就可以成功。倘若违反着规律去做事，事情就不可能完成，就会遭遇失败。

棉花的规律是要多有太阳和温暖才能生长，照着这规律，把它种在向阳的地方，再加上其他必要的培植方法，种棉就会成功，违反这个规律，把它种在阴冷的地面，种棉就要失败。种一切庄稼，都要懂得一切庄稼的生长规律，懂得愈更清楚，愈更仔细的照规律去劳动，收成就愈更好。吴满有和杨朝臣，对于庄稼生长的规律都懂得比别人多，也比别人更用心照着这些规律去劳动，所以比别人能得到更多的收获。黄立德和孙庆仁种菜有丰富的经验，比别人懂得更多的菜类生长规律，所以他们的菜比别人的长得好。

领导革命也是一样，领导革命必须懂得社会变化的规律和革命发展的规律。按照这些规律去推动革命工作，就可以完成任务。能够这样做的人，就如吴满有成为劳动英雄一样，他也可以成为革命英雄。

科学，这种学问，就是要研究各种事物的变化规律的，社会科学，就是要研究社会变化规律和革命发展规律的学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就包含着正确的社会科学理论。

共产党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导来推动革命工作，也就是顺着社会变化和革命发展的规律来进行革命工作。就和懂得庄稼规律的劳动英雄，在生产竞赛中一定胜利一样，正确懂得社会变化和革命发展规律的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一定能够成功。

共产党有信心，将来一定能领导全世界人民建立起共产主义社会。共产党相信这样的目的终有一天会达到，这样伟大的事业一定可以做成功。因为，根据社会科学的研究，共产党可以清楚地知道，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共产主义社会的出现，是完全可能的。并且还可以知道，要达到这样的社会，必须经过一些什么样的革命的道路（例如在中国要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知道顺着什么样的革命道路去进行斗争，就可以达到自己远大的目的。共产主义的前途是在社会本身内部包含着这种可能，不是党员或党的领袖一时高兴的空想。

人类社会是按着什么规律发展到共产主义的前途，我们要经过一些什么样的革命斗争的道路，才能够达到共产主义的前途，这就是我们的社会科学所要解决的问题。

（原载《解放日报》1943 年 3 月 23 日）

旧的恶习惯应该抛弃

(1943.3)

教条主义也可以称做书本主义，这种说法，以前我以为只是对某些理论工作者或实际工作者才适合，而对于文艺工作者则应该从另外一方面去看才行。

最近忽然有了新的发现，即文艺工作者中原来也有书本主义。

做文艺工作的同志们要下乡了。其中一位一次遇到了我，诉述他下乡后的一个愿望：要带着一些世界名著去，常常看看，可以提起创作情绪，否则就有从此停笔的危险。

第一次听到这种议论，我很有些奇怪，以为只是这一个同志的怪脾气。不幸后来又在另外几个同志的口里，也听到同样的言论。再仔细想一想，才觉悟到这不是一个特殊现象，而是某些文艺工作者中相当普遍的习惯。

要从世界名著阅读当中来提高创作情绪，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创作情绪是从书本中才得到启示的。我们的许多文艺工作者曾经是习惯于这样做的！

什么是现实主义？我们的新文艺工作者常常谈到现实主义，而且承认这是创作方法上的正确道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也常说要从现实生活中（现在更知道要着重从工农大众的生活中）去找写作的题材，他们不但这样承认，而且也似乎想要这样做。但是他们的创作情绪，却不是从现实生活中的观察研究中得到启示和提高，却要从另外的地方，从书本上去求得启示和提高。

现在我才了解了一个谜：为什么有些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尽管他们写的是工农兵的题材，尽管他们自以为是在自己的作品里反映着大众生活的现实，尽管他们标榜是为大众服务，而他们所写出来的作品，却离工农大众好像很远；不但现在工农大众不能了解他们的作品，就是要求将来——等工农兵大众的文化提高了——为工农大众所喜闻乐见，也似乎是不可能的。证据是，我们有许多较高级的干部，就是曾经从工农出身而文化提高了的，他们就不能够喜欢这样的作品。

主要依靠书本，其次才是“搜集”现实材料。从外国名著里取得基本的形式，从中国人民的生活里随便拾来一些贫乏的内容。这样的作品。在工农大众看来，自然是形式方面格格不入，而内容方面又索然无味，要他们喜闻乐见，怎么会可能呢？

这样的现象，不单只在文学方面相当普遍，就在其他艺术部门，例如美术、音乐方面，又何尝不是一样呢？音乐比较抽象而难了解，但只要看现在大量的作品中很少为民众所爱唱的，很少能够与民歌争地位的，这就可以想到外国范本在作曲者的头脑中所起的作用了。至于美术，情况尤其明显；不是有许多美术工作同志只善于画外国人而几乎不会画中国人吗？

这是文艺工作同志们的一个恶习惯，是旧知识分子的一个沉重的负担。不坚决克服这个恶习惯，像垃圾一样的抛弃这负担，崭新的创作的诞生，是会陷于难产以至于流产的险境的，即使下乡去，也是很少有益的。

书本决不是完全要不得，学习先进的高级的技术是有好处的，是必要的，但不能把这作为创作的出发点，以至于脱离了书本就没有方法提高创作情绪。创作的情绪，主要的应该从人民大众生活的观察和研究中去取得。要能够热爱工农大众的生活，深刻认

识他们的生活，由此自然地涌出创作的情绪，自然地发生必须要写出来的要求，这才是新的文艺工作者所需要的创作情绪。

我们已经有同志这样做了。只就最近来说，古元的木刻，鲁艺的秧歌舞等作品中所表现的新作风，以及还有许多文艺工作同志们的作品，都是打破旧习惯的模范或先锋。希望文艺工作同志们，不管下乡的，或暂不下乡的，都一起向着这个方向努力。

（原载《解放日报》1943年3月27日；署名：崇基。曾收入《“有的放矢”及其他》和《论文化和艺术》）

两个相反的传统

（1943.3）

今天是黄花节的第三十二个纪念日，32年前的这一天，满清的反革命政府，用武力镇压了广州的民主革命起义，并谋害了72位忠勇的志士。虽然施行了这样残酷的杀害，反革命政府并没有因此延长多少寿命，才不过几个月之后，辛亥革命就爆发了。

满清政府虽然在当年就被推倒，但我们仍年年纪念黄花节。一直到今天，这纪念仍然有生动的意义。原因是，一个反动政府虽然推翻了，而另一个反动政府（袁世凯的军阀政府）接着就建立起来。革命并未因此完全成功。无数的民主革命的志士，仍继续着流血的战斗，一直到今天，我们前面还有着日本帝国主义汉奸等反革命力量，要我们用生命去换取胜利。

黄花节要我们纪念的是什么？

我们要纪念的是革命志士的坚贞的气节。72烈士慷慨就义、视死如归的英勇态度，一直是革命史上壮烈的美谈。他们虽然牺牲了，他们的精神却鼓舞了后来的革命者，这是我们民族的光荣的传统，我们有着这样的传统，所以能渡过像中国这样复杂艰难而又漫长的革命道路，以至于达到今天曙光的前夜时期。二十几年来，共产党人更发扬了这样的传统，在最困难的物质条件下，与力量大到不知多少倍的敌人坚持进行了斗争，无数的党员被敌人残酷杀害了，但我们并不气馁，相反地却再接再厉，愈战愈奋。我们的无上坚贞的气节不是偶然的。因为我们有科学的马列主义作

我们的行动指南，清楚地看见社会发展前途，看见革命事业一定是有希望的。另一方面我们也看见反革命势力终久会要死亡，不管你对革命施行任何残酷的镇压、阴谋陷害、威迫利诱的手段，你至多只是摧残一部分的革命者个人的生命，而不能维持你永久的胜利。革命的高尚气节的继承者更加不可遏止的涌现出来，死了72个，会新生出72万个，一直到把反革命势力完全打垮！

另一点值得我们纪念的，也是要我们大大提高警惕的，是反革命力量在对付革命的时候，会采取一切无耻的阴谋手段。72烈士的牺牲，一个重大的原因，是广州提督派到革命营垒内部的侦探的破坏，这种内奸活动，是反革命的最毒辣的传统，一直到现在仍继续不断地施行着。我们不要忘记日寇、汉奸、托派等反革命者，是大规模地，多种多样地使用着特务内奸的手段来阴谋破坏我们的。就延安这样一个地方来说，也并不能例外。旗鼓相对的正面战斗，对于革命者不会有太多损害的，在内部心脏中的破坏，却是非常危险。为着减少牺牲，缩短革命胜利的时间，使我们的民族不要遭受太多不必要的灾难，每一个共产党员，革命者，抗日战士，有责任对一切反革命的特务活动采取最大的警觉态度，把反特务斗争作为我们的一个重要的经常工作。

黄花岗纪念节中的两个相反的传统。我们要努力发扬一个好的传统，革命者的坚贞不变的气节，我们要努力打倒一个坏的传统，反革命敌人内奸特务阴谋。

（原载《解放日报》1943年3月29日；署名：崇基）

谈　　起

(1943.3)

几个人聚在一块吹牛，谈起整风以前各人的思想行动，觉得总有点特别，像是谈别人的事情似的。“你曾经因为平均主义的思想而对于生活条件不满；我曾经因为极端民主的思想而有反对领导者的行动；你有一次听到反革命的言论毫不在意，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这一些歪三邪四的思想意识，竟然和你我发生关系，倒似乎有点不对头；好像是另外的人身上才会有的思想意识，和“你”“我”这两个代名词不应该发生联结似的。

整风到现在，不过一年多，如果缩短些说，从“四三决定”算起，那才只将近刚刚一年。以前的你我，和现在的你我，前后还是同一个人，即使大病一场，肉体上还不会有什么大变化，为什么竟有上面所说的那种感觉呢？原因是，思想意识变化了。从前基本上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现在开始懂得从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看问题了。人的本质不是自然，而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肉体上的我虽然同是一个，而作为人的我的本质，前后却不同了。以现在的我这个人，去看过去我那个人，自然会觉得陌生了。

这是整风学习的结果，整风学习成绩好的地方，应该有这样的结果。如果没有这样的结果，那就证明整风运动还没有深入。倘若谈到过去自己的错误，仍觉得是“我”的错误，倘若过去的我和现在的，连在自己看来也没有什么两样的感觉，那就证明自己的思想并没有被改造过。

明明是谈过去的我的事情，却觉得是在谈别人的事情，这种心境，是说明对于自己的过去能够采取客观的观察态度。有这样心境时，对于自己过去的错误才能够不以主观的成见去看待，而可能科学地加以分析研究。在我们学习文件反省自己时，这种态度就是正确的态度，只有抱这种态度，才有可能认真地，坦白，无顾忌地来正确解剖自己。也只有这样，才可能彻底改造自己。

整风学习的目的之一，本来就是为着改造自己。这就是说，要把一个旧的思想不正的我“整”死，另外创造一个新的意识正确的我。旧我，在事实上，是新我的敌人。把旧我看成另外的人，甚至于看成“异类”的人，都是合理的。现在有许多人，在反省中，还总是畏首畏尾，不肯彻底揭露自己的缺点，这完全是思想上没有自觉，还留恋旧我的死尸，还不肯决然把异类、敌人和自己分别开来的缘故。

中国老早就有人这样说：“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这句古训，我们倒值得好好学习。既然能认定昨日死了，那么，把过去拿来解剖，分割，还有什么可以顾忌的呢？解剖过去，而害怕疼痛，那就是昨日未死，今日未生的表现。现在整风学习中的坦白运动，正是号召大家采取那种客观的科学的态度。它的积极意义就在于：我们愈能坦白反省，思想意识的病就愈更有救，哪怕是很重的病症，只要有勇气把病源病状全盘揭露出来，医治就有办法。讳疾忌医的蠢事，是保重自己的人所不取的！

掩蔽错误，是进步的障碍；在彻底的反省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扫除一切犹豫和误解。

（原载《解放日报》1943年3月30日；署名：崇基）

建立新的劳动观念*

(1943.4)

今年边区的生产运动，已表现了很大的成绩，在党和政府的号召和具体推动之下，群众的劳动的热忱空前地提高了。生产竞赛纷纷发动，到处出现了劳动英雄。他们的事迹，成为动人的光荣故事，流传在各地老百姓的口中。在中国，这是有史以来的新事件。从来只有战争中或政治舞台上的英雄，而现在劳动者也可以成为英雄了。这不是偶然的，因为中国的历史，现在已换了一个新面目了。边区的政权，是中国从未看见过的新民主主义政权。这个政权尊重劳动群众，尤其尊重劳动战线上的积极先进分子，承认他们是真正的英雄。这些劳动英雄，他们本身也是一种新的人物。他们是解放了的人，他们懂得自己的劳动的意义，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劳动。他们有许多就是共产党员。他们不但自己本身有高度的劳动的自觉性，而且能领导其他群众也跟着他们一样的积极劳动。他们不是旧型的、狭隘的个人英雄，而是能够带领全村全乡的人共同前进的集体英雄。他们具有新的劳动观念，这种新的劳动观念是使他们能够积极劳动，并影响别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在许多群众中，以及知识分子中，还有着旧的劳动观念的残余，而这旧的观念是会阻碍劳动积极性的提高的，是会限制生产运动的开展的，是必须加以彻底清除的。

---

* 这是作者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

我们的群众，习惯于把劳动叫做“受苦”，这是旧的劳动观念在语言上的表现。这就是说，劳动是对穷人的刑罚，劳动者是命定了没有快乐和幸福的。有许多群众，直到现在，还不但在语言上把劳动叫做受苦，而且在实际上也确认为劳动是刑罚。由于这种思想的存在，他们就不愿把劳动的积极性提高起来。对于有这种观念的人，我们要设法让他们知道：劳动曾经是受苦，但这是过去时代的事，是剥削阶级在统治地位时代的事。在那样的时代，一切劳动的果实，差不多都要归统治的剥削阶级所有，他们一生不要劳动，坐享一切幸福和快乐，而终年劳作的老百姓，却常常不得吃饱。劳动者把自己的劳动果实交给统治的剥削阶级。在这样的情形下，劳动自然仅仅是苦事，自然是等于刑罚。现在却不同了，边区的政权，已是三三制的新民主主义政权。这个政权是能照顾各阶级人民的利益，特别是要照顾穷苦劳动人民的利益的。因此，现在就有了这种可能，劳动是为了劳动者自己的享用，劳动的果实终于是要为劳动者自己所有。自然，有一部分劳动是为着抗战，为着政府需要；而帮助抗战，缴纳公粮，也是间接为了保护劳动群众自己的利益，和为了争取自己更加远大的利益。因此，在这里，劳动虽然也是辛苦的工作，但已不是旧的意义上的那种苦事，不是对穷人的刑罚。劳动的结果，对于自己，是要达到丰衣足食，过好光景；对于民族，对于全国人民，是争取抗战的胜利与民族的解放。劳动应该被看做是能创造愉快的前途的，应该被看做是光荣的。

在有些知识分子中间，还残留着轻视劳动的观念。三八节前，《中共中央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决定》上，曾指斥有些同志“浮在上层，空闲无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观点”。实际上，不仅仅在妇女方面，就是在一般知识分子中间，有许多人还

是保留着这样的观点的。由于这些观点的存在，使他们不能真正自觉地积极地参加生产和经济工作。他们应该深刻地知道，轻视劳动是剥削阶级的思想。“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在有“天子”的时候，读书人自然是被看成最高的人物，而劳动人民却处在下贱的地位。但我们不是“天子”的臣民，而是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公民。在这里，在目前的边区，浮在上层，空闲无事，脱离实际的读书人，是不应该有地位的，是可耻的。而参加劳动，对于经济生产工作的发展有所贡献的人，都应该得到很大的光荣，正如在前线上和敌人英勇战斗的人，应得到很大的光荣一样。

边区今年把发展生产规定为第一个任务。要增进我们的生产力，依靠着两个因素的提高：技术和劳动。要发展生产，一方面必须努力改进生产技术，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是处在落后的农村里，物质条件有种种困难，我们改进技术的速度，因此不能不是比较迟缓的，有限制的。在这样情形下，要发展生产，不能不多多依靠劳动效率的加强，不能不依靠劳动群众的积极性的增高，就是技术本身，也必须与劳动相结合，才成为活的力量。几月来生产运动的经验已经证明，劳动者的积极性的提高（通过奖励、竞赛、宣传等等方法），和劳动力的有效的组织（用变工札工等方法），对于我们生产力的发展，可以说起着主要作用。要很好地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有效的组织劳动力，就必须改变我们劳动的人，这就是要教育他们，革新他们的思想，获得新的劳动观念。

我们要建立新的劳动的道德观念，把劳动看做光荣的事，把游手好闲看做绝大的耻辱。这种新的道德观念在生产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已经渐渐从群众内部生长起来了。在生产运动高涨的地

方，劳动英雄已成为群众第一个尊敬的对象，而二流子却受到群众普遍的鄙视。这种社会道德的力量，已成为农村中改造二流子的一个重要依靠。在知识分子中间，也要造成这种思想，像群众鄙视二流子一样，鄙视一切以“浮在上层，空闲无事”为荣的分子，使重视劳动，重视生产工作，成为一个宏大而不可抗的思想潮流。

（原载《解放日报》1943年4月8日；曾收入《“有的放矢”及其他》）

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

(1943.4)

去年5月党中央召集了文艺座谈会后，文艺界开始向着新的方向转变。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为这运动提示了明确的方针。十个月来，经过了一些反省、讨论和实践尝试的过程，文艺界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步调渐渐归于一致。许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倾向逐渐受到清算，而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成为众所归趋的道路。尤其是今年春节前后，关于庆祝废除不平等条约，庆祝红军胜利，拥军拥政爱民运动和发展生产运动的宣传活动及创作表现，可以说是新的运动发展成绩的一个检阅式。这一个检阅的结果，证明我们的文艺界已经获得了第一步的成功。在文学、音乐、美术、戏剧、舞蹈等各部门，都以新的面目，鼓舞了群众的斗争热情，收到了很大的教育的效果。单就延安来说，鲁艺、西北文工团、青年剧院以及各学校的秧歌舞及街头歌舞短剧，古元的木刻和许多美术工作者的街头画，孔厥的小说《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都是值得特别提出的一些收获。延安以外如晋西北的战斗剧社和警备区的民众剧社的许多新的活动，也有很多的成绩。其中鲁艺的秧歌舞，因为形式更宜于直接接触群众，在延安市、延安县的群众与干部中，在南泥湾、金盆湾的部队中，尤其受到了空前的欢喜赞叹，那里

* 这是作者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

面的歌曲，至今还在人们的口边流传着。

春节文艺活动前后所表现出来的新方向，有哪些特点呢？

第一，是文艺与政治的密切结合。文艺与政治的结合，本来是党所领导的革命文艺运动的光荣传统。从来进步的文艺界和过去红军时代的文艺活动、八路军新四军中的文艺活动，都是革命运动的一个战斗部门。但由于文艺工作者中很多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他们的自由主义的思想，他们对于外国的和旧时代的文艺作品的偏爱，他们强调文艺特殊性的成见，他们的片面的提高技术的错误主张，影响了文艺运动，以至于在抗战以来，特别是在延安这样后方地区，在许多文艺工作者中发生了脱离实际政治斗争的偏向。许多文艺工作者用主要的精力去学习外国的、旧时代的作品的技巧，音乐台上舞台上原封不动地搬上外国音乐、外国戏和中国的旧戏。至于怎样使我们的文艺工作充满着革命斗争的内容，怎样根据现实的政治任务来创造新的文艺作品，怎样在作品里把我们的抗战、生产、教育的具体运动反映出来，在这些问题上来注意的人却不算多。很多的文艺作品是用来表现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和情调。对于政治的这种麻木态度甚至为反共特务分子所利用，使他们能够戴着文艺工作者的假面具来在我们中间散布危害革命的思想毒素。春节前后的宣传活动和创作活动表明这种脱离实际政治斗争的偏向是在被克服着。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开始抛弃了那些小资产阶级的艺术趣味，努力使自己的工作中表现出革命的战斗的内容，把抗战、生产、教育的问题作为创作的主题了。

其次，是文艺工作者的面向群众。文艺走向工农大众，本来也是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的传统。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的部队文艺工作，陕甘宁边区的民众剧团以及其他各根据地的地方文艺

工作团体的活动，是这个传统的具体表现。抗战前的大众文艺问题的讨论，也反映着这样的要求。但我们有许多文艺工作者，他们本身既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阶层，他们的作品也表现着同一阶层的思想和感情，并且也在同一阶层中找到自己的读者。他们在理论上可以抽象地承认文艺要和大众结合，而在创作的实际行动上却是脱离群众的；他们幻想着万世不朽的伟大艺术，而不肯用力来创作能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作品；他们空谈要为工农兵服务，而对于当前的工农兵的需要却漠不关心。春节前后的创作表现，表明这种错误的思想开始被纠正，文艺工作开始从知识分子的小圈子走向工农群众，街头上和群众中的文艺活动成为这时期的重要工作方式。在内容上力求反映群众的生活和要求，在形式上力求能为群众所接受。许多文艺工作者开始下乡参加工作，访问和开会欢迎劳动英雄。文艺工作者已经在实际行动上开始表现他们的群众观点，他们认识到文艺工作的正确道路是为群众服务并向群众学习。

再次，文艺的普及和提高问题，在春节前后的创作表现里，也看出了解决的方向。毛泽东同志在文艺座谈会上的指示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这个指示的正确性在这次是得到了新的证明。春节中的文艺活动虽然在提高与普及两方面一般都远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但是它却打破了那种把两者完全对立的错误观点，显示了提高与普及的正确途径。就提高方面说，春节文艺活动在艺术上所以获得许多可以满意的成绩，产生了许多新鲜活泼，有生命力，有感召力的作品，不但不是什么关门提高的结果，而且正是开始与群众结合的结果。它们的成功，首先是因为反映了群众的现实生活、实际斗争，反映了群众的思想感情；其次是因为它们的表现形式符合于群众的实际，语汇语法

是群众的语汇语法，容貌服饰是群众的容貌服饰，腔调姿势是群众的腔调姿势，离开了这些，则内容的真实性就无法表达；第三是适当地采取了并提炼了群众旧有的某些艺术传统，譬如歌谣、年画、戏装、秧歌舞、秦腔、郿鄠等等，利用了其中可以利用的东西，而舍弃了其中应该舍弃的东西。前两个条件，是真正“提高”(产生真正高级的优秀的艺术作品)的必要条件，后一个条件，则是艺术与广大群众直接结合所需要的补充条件。春节的文艺活动证明，离开了群众生活的内容与形式，任何高级艺术品的产生都是不可能的；套用非群众的、旧时代的与外国的内容与形式，嵌入群众的口号，现代的人物与中国的姓名，不但在群众中要失败，在艺术上也是失败的、恶俗的、低级的。春节的文艺活动又证明，适当的采用群众的艺术习惯，并不会因此降低了艺术品的身份，相反的，真正伟大的作家，一样可以从秧歌剧产生伟大的作品（古希腊的“拟曲”和“牧歌”，就是一个最相近的榜样）。我们现在的秧歌剧虽然远不能说是伟大，但是有些也确已达到了一定水平的艺术性。因为这种形式在今天中国的农村环境中还大有发展的余地，因为广大的农民群众很需要这种融合音乐、诗歌、戏剧、跳舞和装饰美术于一炉，富有伸缩性且不受舞台限制的综合艺术，文艺工作者在这个方向上作更大的努力是必要的。再就普及方面说，春节文艺活动也证明了，艺术的普及不但迫切需要，而且充分可能。边区的工农兵群众不但热烈欢迎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活动，而且只要他们的作品真正正确反映了群众的思想感情，群众也是能接受的。鲁艺的秧歌虽然题材与旧秧歌完全两样，在形式上也有了不少的加工和改造，但是群众却更加“喜闻乐见”。那种以为群众不能接受艺术，或不能接受新的高级的艺术，以为群众的艺术必须要迁就落后等等偏见，都是没有真实根据的。在这个方向的

诱导之下，我们不但看到了“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的可能前途，也开始看到了群众自己中间的实际尝试。延安机关学校杂务人员和鲁艺附近（桥儿沟、川口等）老百姓所表演的秧歌舞，就显然是传播了鲁艺等处秧歌舞的影响。

以上三点，表明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已开始走上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正确的道路。但同时还应该说，我们的工作仅只是开始。我们只是开始努力使文艺从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走向工农兵群众；就整个文艺界来说，文艺与实际的结合，文艺与工农兵的结合的问题，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因此我们的文艺工作中还有着许多缺点，而最主要的是：第一，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对于群众的语言、生活以及民间艺术等等，还是不熟悉的，对于他们的思想意识还是不够理解的，因此在工作上就受到很多限制，许多作品，特别是有些戏剧，还不能正确地反映真正群众的面目和群众的感情；第二，我们的新的作品，都还只是初级的，还有大大提高的余地，例如鲁艺秧歌舞中的《兄妹开荒》，是很好的新型歌舞短剧，但同时也是比较简单的作品，表现还不够深刻，不从各方面加以发展，是不可能表现更丰富、更真实的生活内容的；第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文艺活动本身，还很狭小很肤浅，还是主要限于延安附近的活动，还是少数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的活动，我们还需要把运动扩大、深化，使它普及到全边区，使它成为在工农兵群众自己内部生根和繁荣起来的东西。

为着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就需要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下更大的决心，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和工农兵群众中去，去熟悉他们的生活、情感和语言，去帮助他们中间的艺术活动的普遍发展，并在这个基础上去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创作质量。为着达到这样的目的，文艺界同志们的下乡工作，是有重大意义的。3 月 10 日党中央文委

为着下乡问题所召开的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上，凯丰同志指出下乡的任务就是为着要解决文艺与实际结合，文艺与工农兵结合的问题，这就是使文艺运动照着毛泽东同志的方向更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步骤。我们相信，文艺工作者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之下，一定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得到比这一次春节宣传更为美满的成就。

（原载《解放日报》1943年4月25日；曾收入《论文化和艺术》）

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的人生观问题

——答陈俊三同志

(1943.6)

问：某些参加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他们从天文学和地质学上，认识到地球必然要渐渐冷却，死亡，甚至随时都有因其他天体的变动而突然毁灭时，他就会减低或丧失革命的积极性，而浸沉到无可奈何的忧郁中。对于这种人，我们应该怎样说服他？

答：如果因为自然科学证明地球要毁灭，因而就“减低或丧失革命的积极性，而沉浸到无可奈何的忧郁中”，这对于具有别种人生观的知识分子，或者还有可说，但对于“参加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不应该的。不但这样，就算对于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要想抗日救国的知识分子，也是不应该的。

日本帝国主义正在要灭亡中国，我们正处在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如果不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民族在几十年或百多年中就要灭种，这是顶现实的问题。地球的毁灭，那不是几十年百余年的事情，而是几十万万年以后的事情。如果现在“丧失革命积极性”，我们的民族，包括自己和子孙在内，就要绝灭，而且在几十年百余年的短短的时间中就要绝灭。这种“丧失革命积极性”的人，自己在民族危机的面前束手待毙的人，有没有资格来担忧地球的毁灭呢？我们以为，他是谈不上有这种资格的。他在

地球毁灭之前老老早早就因为自己“减低或丧失革命积极性”而要毁灭。他并且是对民族有害的，对人类有害的，因为整个民族，整个人类，现在正在与那要毁灭他们的法西斯酣战，而他呢，却在旁边“泄气”，在那里动摇人心。如果他觉得自己对民族对人类还有些责任，就不会这样做了。

再进一步说，地球是要毁灭的，但地球的毁灭是不是等于人类的毁灭？人类有没有可能改变这种“盲目的必然”，使它有利于自己？在回答这样的问题时，我们辩证唯物论者与别人有些不同，而且有很大的不同。我们认为，人类既然是有理性的动物，那么我们不但能认识自然，而且能改变自然，使它的发展有利于自己，就在“地球毁灭”这个问题上也毫无例外。我们人类还只有几十万年的历史，有文字的历史还只有五千年，但我们人类在征服自然的工作上，已有不少成绩。我们现在处于激烈的社会斗争中，还没有能用全力来研究自然，征服自然。只有共产主义实现了，我们才能有条件，以全力来研究自然，征服自然。如果怕地球毁灭因而人类毁灭，为什么不更提高革命积极性，使共产主义社会早点实现，造成人类研究自然、征服自然的更好的条件呢？为什么反而“减低或丧失革命积极性”，延缓革命胜利的实现呢？

无产阶级对于将来，是充满了胜利信心的，对于社会发展是这样，对于自然发展也是同样。无产阶级知道前面有非常巨大的困难，但从来也不灰心丧气。灰心丧气，“无可奈何的忧郁”，这是没落的阶级看到自己前途无望而发生的心理反应。无产阶级的哲学是革命的哲学，战斗的哲学，而束手待毙的哲学决不是无产阶级的。为什么这种没落阶级的气氛会浸染到自己呢？望要那“某些参加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好好检查自己的思

想。大凡一种思想的发生，决不会凭空而来，必有其现实的基础，我们很希望能提出更现实的问题来，我们是很愿意解答的。

（原载《解放日报》1943年6月5日）

六·二三纪念

(1943.6)

1925年6月23日，广州民群为抗议五卅惨案，举行了伟大的斗争。这一个斗争，坚持了很久，一直发展到广州革命军的北伐。这是1925—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中很重要的一个斗争，它本身就直接准备了革命军的北伐。

以后我们每年纪念这一个日子，这就是“六·二三”沙基惨案纪念。

五卅惨案，引起了全中国人民为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的革命斗争的高潮。这个高潮，普及了全国各大小城市以至于农村。但是，几个月以后，在反革命势力种种残酷镇压和阴谋破坏的手段之下，在许多地方，斗争的热潮就渐渐低落了，惟有在广东一个地方、却一直坚持下去，而且向各个方向继续发展，由民众的政治经济斗争，发展为革命军的武装斗争。

为什么广东的革命斗争能坚持和发展呢？凡是知道一些历史事实的人，就很容易明白的。那第一个原因，就因为广东是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广州的政府是孙中山先生手创的革命政府，和当时北方的反革命政府截然不同。北方的反革命政府，对于要求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的民众革命运动，用一切方法来破坏镇压。而广东革命政府，却是相反地，对于民众的革命斗争，用一切力量来加以援助。因此，在这里，民众的革命力量就能够持续和发展，使伟大的北伐战争获得了坚强的基础，这一件事实，证明革命根

据地的存在，在中国革命运动中是有着多么大的意义。

当时的广州政府，是在国共两党合力支持之下的政府。那时国共早已合作，国民党已经改组，并实行了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广州革命政府组织了民众，训练了革命的军队。“六·二三”的斗争，是以工人阶级为先锋队伍的。省港大罢工，一年多的艰苦支持，表现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及其对革命事业的忠诚。而在这个伟大的斗争中，站在领导地位的乃是共产党员苏兆徵、陈延年、邓中夏、张太雷等同志。

当时把持北方反革命政府的军阀们，会对广州政府加以种种无耻的诬蔑，他们谩骂广东政府，说它是破坏国家统一，说它是“割据”。他们和帝国主义者勾结，用各种方法想来破坏这革命根据地。他们想从革命政府的内部来组织一些右派分子的阴谋叛变，也从外部组织了陈炯明、邓本殷等辈的武装进攻。这一切的阴谋破坏和无耻的进攻，在革命政府和革命民众的拳头之下，都被打碎了。一个有着广大民众拥护的革命政府，是巩固的，是不容易被破坏的。因为在事实上，并不是广州政府“割据”和“破坏统一”，而是当时北方反动军阀——窃据了政权，是他们破坏了中国人民的真正利益。因此，他们的一切行为都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他们诬蔑为“割据”的广东政府，是为全国民众所维护的，真正代表中国民族利益的政府，而他们所窃据的政府，事实上却是仇视全国人民利益，为广大民众所反对的卖国机构。

“六·二三”的斗争之所以能坚持和发展，就因为它是发生在那样的一个革命根据地上，和那样一个革命政权之下。——这是我们每年纪念这日子的时候不应该忘记的一个经验。这个经验也说明了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孙中山先生是首先懂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的人。孙中山先生积40年的革命经验，创造了革命根据地

的学说，并躬行实践之，虽然曾经几次遭到失败，虽然被反革命分子骂作“割据”和“破坏统一”，却始终坚持，再接再厉。孙中山先生曾说，以前革命根据地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方法不好”，于是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和三大政策。北伐之胜利，乃孙中山先生革命政策的功劳，证明他的革命根据地的学说是对的，证明他的国共合作与三大政策的革命方法是对的，而与此相反的则是不对的。

（原载《解放日报》1943年6月23日；署名：崇基）

向“瓢虫”子孙们警告

(1943.7)

早在1939年，德意法西斯强盗还没有对苏联发动进攻，而苏联的英明领导者已经看出他们正在处心积虑，想要在这工农人民的国家里进行无耻的掠夺。这时苏联的领导者一方面号召全国人民提高警觉性，“防备意外事变”；另一方面又警告那些疯人们，说如果你们梦想以瓢虫的肚皮，来并吞巨象，是非常愚蠢的事。

但是，冥顽不灵的瓢虫，是不懂得人话的。好意告诉你，想并吞巨象，不是那样好玩的事情，自己爱惜一点罢。偏不肯相信，一定要把头脑向硬石头上碰！好吧，前年在莫斯科大门前真的碰得头破血流了，还不肯信，去年又碰斯大林格勒的坚城，又是连滚带爬，被碰回去了。已经只留了最后一口气，仍然不肯信，今年又发动第三碰，看来法西斯瓢虫的一切所作所为，本来就只有一个目的！向死亡的路上走！而在今年内也就非送掉老命不可了。

瓢虫这一种东西，似乎在生物进化的过程上是永不会向进步的方向演变的。它的老子一代生就一种爱送死的根性，儿子孙子一代也照样保存着这种根性。它自以为披着一层无耻的硬壳，外表上涂着许多俗不可耐的骗人的花纹，就可以在世界上横行霸道，目空一切。它从来也不想一想，世界上到处都有着广大人民的巨象，在为它准备着碰破头颅的石头。不，它即使明明已经尝到了石头的味道，也还是一样要望上面去碰。今年希特勒匪徒们所表演的，不就正是这样的一幕丑角戏吗？

在中国，许多法西斯瓢虫的子孙们，也要效法着它们的父祖辈，来发挥这种送死的根性了。不看看自己是多么寒碜，微渺，丑恶。九个瓢虫，十分钟的集会，就居然鼓起肚皮。向着二百万边区革命的人民，向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说："我要把你全部吃光了。"而且居然调兵遣将，真的要来碰一番了。"算了吧，停止这种幻想和疯子的行动吧"，我们是革命者，我们希望生物会进化的，因此我们虽然很知道瓢虫的根性是多么顽固不化，不会听话，我们仍然要预先警告你们："你们的这种幻想和疯子的行动，既有害于国家民族，而你们自己也要头破血流的。"

自然，在巨象没有十分充分准备的时候，瓢虫也可能侥幸咬上一两口，以人民的血泪来润一润那贪得无厌的肚皮。苏联的国土，也曾被德意匪徒咬了这么一两口，虽然这并不能挽救瓢虫碰死的前途。我们的立场，是要更好的准备着，就是这么偷窃式的一两口，也不要让瓢虫咬上来。只要它一咬上来，就给它一个有力的回击，把它的无耻的厚甲壳打个粉碎！我们现在是以充分准备好的姿态站立着！瓢虫们！再一次向你们下警告："住手吧！倘若你们有些微进化的转机，就请好好听一听我们七七纪念大会上千千万万人民的义愤的吼声！"

（原载《解放日报》1943年7月11日；署名：崇基）

希特勒之流乃是白痴

——兼答流激同志的问

(1943.7)

最近一位读者同志来信，说他们那里曾争论到一个问题："希特勒是否有才能?"争论的结果，是把肯定的意见打倒了；但还希望我们更详细地给一个解释，使得这个问题得到彻底的了解。

当着现在中国的特务分子、反共分子、德意日帝国主义的第五纵队分子们在大后方拼命宣传法西斯思想，宣传破坏团结，违反真正三民主义的思想，并且配合日寇企图灭亡中国的"新政策"，对真正实行三民主义的边区发动军事进攻的时候，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一下，也不是全然没有意义的。因为一切法西斯宣传内容之一，就在于要把一种有白痴性以至于奴性的希特勒式的人物，渲染成万能的英雄。中国的法西斯主义者对于希特勒之能够一时成为德国许多青年心目中的偶像，是非常向往着的；因此他们也在努力研究着和效学着以至于公开赞美希特勒及其走狗们欺骗青年的伎俩，想利用一些青年们幼稚的崇仰英雄伟人的情绪，也在他们心目中造成一个中国的希特勒式的偶像，好借此来驱使他们，奴役他们，把他们作为出卖民族和反革命赌博中的牺牲品。

为什么希特勒之流乃是白痴而不是"有才能"的?为什么这些家伙是侏儒小丑而不是英雄伟人?

真正历史上有才能的英雄，只有一种，就是与工农兵人民大

众有密切联系的人，善于回答社会上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劳动群众的斗争要求的人。他的才能，就在于能够明确地认识历史发展的趋势，敏锐地看出周围事变变化的方向，因此他就能够及早指出社会前进所向的目标，指出广大人民斗争应走的道路；他就能够有信心地坚定不移地领导人民进行斗争，使斗争走向胜利。唯物论的真理告诉我们，历史乃是人民的历史，劳动者的历史，谁要是想逆阻着广大人民的前进要求去胡作妄为，他迟早一定失败，一定要头破血流，一定要遗臭万年。这种人就叫做想把历史开倒车的唐·吉诃德，他对于历史就是盲目和白痴。而有才能的人，真正的英雄伟人，首先就必须能够与人民在一起，能够按照历史前进的道路和广大人民的要求去办事。他之所以能成为英雄伟人，就因为他这样做的结果，对于社会的进步可以有很大的贡献。因为有了他，广大人民就更清楚自己应走的道路，他们在斗争中就可以少摸许多黑路，少碰许多障碍，他们斗争的牺牲就会更少，成功就会更快，而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发展也就会加速。

这一个真理的绝对正确性，为从来的人类历史实践所证明。我们不必举远的例子，眼前的事实就是铁证。同是属于抗日的营垒，在八路军新四军所在的区域，由于毛泽东同志指出了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的方向，这方向正确反映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正确反映了中国广大抗日人民的斗争要求，因此虽是处在全国抗战最困难的地区和其他条件之下，抗战仍然能够胜利地坚持下来，军民的战斗情绪始终是高涨的，以至能够在华北华中牵制了鬼子侵华军队的半数，使他们束手无策；而由于精兵简政的实施，生产运动的推动，人民生活不但不因长久的坚苦抗战而下降，在许多地区，尤其是陕甘宁边区，生活反而日愈提高，走向丰衣足食的道路，造成了当前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也找不到的“奇迹”。毛泽

东的事业，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是人民的事业，是工农兵的事业，因而是英雄伟人的事业。反过来，试看一看大后方：那里人民大众和许许多多正义人士和忠实的国民党员，是在努力抗战，但是由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制独裁，由于他们的所作所为违背着广大人民的要求，由于他们信任德意日法西斯第五纵队特务反共分子，对于中国历史前进要求的种种倒行逆施，现在竟弄到“民气消沉”，“民怨沸腾”，“民不聊生”的状态！

以上的事实对照，很可以使我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英雄伟人，就可以看出，有真正英雄伟人存在的地方，历史是会怎样飞跃地前进。

希特勒是一个最大的白痴，由于他对于世界大势的盲目无知，由于这样一个混蛋竟能成为统治者，而在千千万万欧洲人民的头上冒险横行，全欧洲人民以至于苏联的一部分几年来竟陷入了无限苦痛的深渊，使欧洲的历史倒退了许多世纪，使无数青年和劳动人民的宝贵生命变成了炮弹与炸弹下的灰尘。说希特勒之流是白痴和无能，就因为他们除了把社会生活弄得满目凄凉，一团混乱之外，不能够做出更多的什么，而同时也没有能力挽救他们自己的灭亡。希特勒的败象现在谁也看得很清楚了，不出今年也许就是他的死期，这不也是很明白吗？

你会因为他现在还是德国法西斯匪徒的“元首”，威风凛凛，因此就对于他有“固一世之雄也”的印象吧。那我可以告诉你说，这只是一个暂时的假象。这一个假象，是由于现在德国以至于世界许多地方，还存在着一些同类的白痴，哄哄然幻造出来的。这些白痴，就是那些顶懒的寄生虫，那些顶大的资本家，和他们所收买的流氓走狗。既然德国有这样一批白痴把他尊为“元首”，既然如像我们中国也有这些一些白痴把他尊为祖宗，因此希特勒就

俨然好像是一大人物了。而且即使不是法西斯一流的白痴，如果他的思想意识里有着某些严重的毛病（如个人英雄主义之类）时，也会惑于假象把希特勒的影子在自己的脑子里构成一个巨大的印象。但是，在病态的脑子里反映着的现象，决不能作衡量问题的标准，真正的评判员是历史发展的事实之本身。就一时的现象来看，白痴、庸人、流氓、骗子、冒险家、堕落卑鄙的禽兽之流，在有没落的阶级为之扶持的时候，也未尝不可以在历史上显赫一时，那例子也并不少。然而那只是极暂时的，过了一定的时期，那丑恶，渺小，无能的原形就要毕露了。卑鄙龌龊的小人物、伪君子，是绝对经不起历史考验的。唐的周兴、来俊臣，宋的秦桧、韩胄、贾似道，明的吴三桂、洪承畴，清的曾国藩、西太后，民国的袁世凯、段祺瑞、张宗昌、吴佩孚之流，当他们大权在握，为将为相的时候，谁不是煊煊赫赫，不可一世？现在又怎样？那些辉煌的印象飞到哪里去了？然而另外一切真正的志士仁人，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等，他们生前鞠躬尽瘁，遭受困难、迫害，甚至于也要失败，不一定如前面那一些人的显耀，然而在历史上却永远留下光彩。反之，那一些历史的叛逆者，却除了供人唾弃和笑谈的资料之外，不能留下什么更多的东西。希特勒之流，不论在今天怎样声势逼人，而在不久以后的历史上，很快就会变成唾弃和笑谈的资料的！

如果有人反问，倘若希特勒之流不是有能力的，他们为什么又能横行一时呢？这个问题，对于懂得历史唯物论的人，对于懂得阶级斗争的规律知识的人，是很容易明白的。希特勒不是以个人的资格走出历史的舞台上来，站在他背后并且捧着他的，有一个德帝国主义的将近死亡的大资产阶级。不是希特勒个人有什么特异的“能力”使他自己浮上国家政治机构的上层来，而是那些

腐朽的大资产阶级统治者群选中了这一个白痴小丑，作为他们垄断政治的傀儡。他们不可能选拔出真正有才能的人，因为真正识时务有才能的人，决不屑于做这样的傀儡，他们懂得这样的傀儡不可能在历史上做出真正的事业来。只有希特勒这样无知无能的流氓，才会甘心向没落阶级献媚，为他们承担一切政治上的暴恶秽行的担子。这就是事情的秘密；希特勒之所以能在德国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之下风云一世，并不因为他是德国人中真正有才能的人，相反地，正是由于他的愚蠢无能。

这正是一切没落阶级的本质。当这样的阶级成为统治者而存在的时候，他们只能选择白痴来做为自己的代表者，而排斥一切真正英明的才能。因为他们要挽救自己没落的危机，要阻碍历史向前发展，他们就要排斥，摧毁一切懂得历史道路的有才能的人，因此他们要专门选拔白痴，人为地制造白痴。德国民族在过去和现在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生过不少伟大的天才。歌德、海涅、康德、黑格尔等等，随便一计数，就可以举出很多伟大的名字。马克思、恩格斯是德国人，在自然科学上造成一个革命的相对性原理的发现者爱因斯坦，也是德国人。这些名字，使德国民族在世界上成为很光荣的民族。由于这些人物的产生，德国民族就配称为有优秀才能传统的民族。然而这样一个民族现在竟被希特勒小丑窃据了“元首”的地位，却是他们的奇耻大辱，只要看那毫无常识胡说八道的《我的奋斗》，就足以证明德国民族的这奇耻大辱是多么不可计量。德国的大资产阶级统治者为了自己少数人的利益，不惜污辱了德国民族的光荣，把社会的一切最污秽的渣滓当做宝贝。他们让希特勒及其匪帮人物横行霸道，让他来排斥、驱逐和虐待许多天才（爱因斯坦、台尔曼等），屠杀进步的劳动人民和青年（这些人正是德国真正有才能的人），摧毁一切德国的才能的结晶

——德国的一切进步交化的成果。使德国青年受不到这些文化传统的教育，使他们在愚昧黑暗的政治之下生长，把他们造成白痴，造成盲从的机械，无思想的傀儡。在德国法西斯的统治下，只容许这样人工造成的白痴或自甘于做白痴的人公开立足，因为这样的人便于奴役、欺骗，便于大批大批的送上侵略战争的前线去送死。德国没落的大资产阶级统治者就是这样的来毁灭文化，毁灭才能，制造愚昧、黑暗和野蛮的。而希特勒，只不过是作为愚昧、黑暗、野蛮的代表者而被选拔出来吧了。

没落阶级统治者选拔庸人白痴作为自己的代表，这在中国历史上的例子也不是很少的。每一朝皇帝（除了少数几个开国的君主之外）无不昏庸愚鲁，就是一个明证。清末的光绪皇帝因为比较稍有一些才能和远见，就被庸愚到极点的西太后压得出不了气。现在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派，也正在选拔着大大小小的法西斯白痴，来进行反对进步，摧毁文化和才能的罪行。他们既公开的反对着自由主义共产主义，也实际上反对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他们甚至于愚蠢到这样的程度，竟敢企图发动内战，不知死活的来进攻陕甘宁边区。他们为着这目的，是如此可惊地把中国社会中最污秽的渣滓集合拢来：投敌卖国的吴开先居然可以在首都冠冕堂皇地自由活动，和汪精卫走过一条路的陶希圣居然成为他们思想的支柱，托派叶青已不必说，叶青的徒弟蛆虫如张涤非，也竟被当作宝贝，被委任为伪造民意，发动反对共产党的先锋，而中央政府的通讯社且竟为之大吹特吹，俨然国府要人的派头。这样无耻的丑戏，除了堕落腐化无聊到已极的没落阶级，是做不出来的。而我们中国的许多大大小小声势赫赫的希特勒子孙们，不都是扮演这一类丑戏的白痴、木偶者群吗？

愿我们的进步青年，好好地认清楚什么是真正的才能，学习

获取真正的才能。不要为欺骗阴谋流氓手法所迷惑，不要为任何表面的声势气焰所迷惑，抛弃那有害的无原则的英雄崇拜观念，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学习掌握马列主义的科学方法，站稳革命的立场，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一切宣传和行动，反对内战，保卫抗战的成果，在切切实实的工作中来锻炼自己，努力求取能有所贡献于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由。

（原载《解放日报》1943 年 7 月 12 日）

《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

(1943.8)

以蒋介石的名义出版的《中国之命运》里，论到了几个哲学问题。这些问题，蒋介石是当作“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来提出的，这就是说，蒋介石对这些问题的答复，是全书里所表白的一套政治思想的方法基础。这一套政治见解和哲学思想，是以“国父”主义的名义为标榜的，这就是说，作者自认为是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真正的三民主义和“知难行易”的思想。但事实上是怎样呢？事实上很可惜，在《中国之命运》里并没有真正的三民主义和知难行易的思想，而只有关于这些思想的一些空洞的名词，以及在这些名词装饰下的中国式的买办封建性的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学，和反对科学唯物主义，提倡迷信盲从的法西斯主义的唯心论哲学。

《中国之命运》里的哲学思想，是一种极端不合理的唯心论。由于它的不合理，它和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思想里任何一点进步因素都是绝缘的。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来看，孙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和科学的辩证法唯物论哲学是有很大距离的，它有着保守的唯心论的方面，但同时不能否认，它也有进步的唯物论方面，但在《中国之命运》里，却完全抛弃了它的进步的唯物论的方面，并用种种附加的引申，扩大了它的保守的唯心论的方面。下面就要说明《中国之命运》里有着怎样一种极端不合理的

唯心论，它是怎样和中山先生“知难行易”思想中的进步因素“风马牛不相及”。

一、关于“诚”的思想

在“国民今后努力之方向及建国工作之重点”一节里，蒋介石开头就引用了孙中山先生的一段话：“国者人之积。人者心之器。而国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夫心也者，万事之源也。”从这一唯心论的说教里，《中国之命运》的作者蒋介石进一步引申出自己的许多论点，因此我们不妨从这里谈起。

任何事情，任何主张计划，只要“吾心信其可行”，就一定行得通吗？拿事实来证明，恰恰就有无数相反的例子。秦始皇自以为皇位可以传到万世，因此自己叫做始皇，那信心可够大了，但结果是第二世就归于灭亡。墨索里尼要在意大利实行法西斯主义一千年，信心虽比秦始皇小一点，但看来也似容易些，结果只维持了 21 年，还算一切法西斯国家中寿命最长的。纳粹的军队，曾自称是世界无敌的，的确有足够的信心，但现在在苏联也算碰得头破血流了。国民党统治区的限价政策，在开始实行之前，据说是“成功之券，决可计日而至”的，但差不多一开始就失败得一塌糊涂了。推而言之，就是《中国之命运》里所宣传的一套反民主的法西斯政治主张，反“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狂妄企图，以及辽远渺茫的“实业计划”的诺言等等，虽然说得津津有味，好像眼前差不多实现了的样子，但实际上也必终归是梦想。谓予不信，请看将来的事实吧。

事实证明，信心并不能决定一切，同样抱着信心去做的事，有

的可以成功，有的必归失败。问题在于我们的主张和计划的本身，在于信心的本身，有没有可以成功的客观条件。没有一定的客观条件，即使抱着天大的信心去做，也不过是唐吉诃德对风车的斗争，无结果的盲目冒险。什么是那一定的客观条件呢？一般的说，就是广大民众（尤其是工农劳动的人民）的物质生活发展的要求，就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合乎这些发展要求的事情、主张、计划，加上人的主观的努力，是可以成功的。违反了这些要求的行为，无论主观上如何有信心，终归是要失败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并不否认“心”的重大作用，马克思自己就说：“理论只要一掌握群众，就立刻成为物质的力量。”一年多来，我们在整风中间，学到了一个规律：“一切问题要从思想上来解决”，我们不否认思想对于工作的重大意义，但首先的问题是：我们的思想必须是正确的思想，必须是合乎广大民众的物质生活发展要求的思想，必须是合乎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实质上本来就是民众自己的思想，不过被领导机关、领导者集中起来，将民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思想，变为集中的有系统的思想。因此再把这种思想宣传出去，就能够为广大民众乐意接受，通过他们的行动，发生伟大的实际力量，使工作能够有很好的成效。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思想，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这样一种思想。这种思想的正确性，为中共二十二年来所实行的伟大革命事业所证明，为抗战以来的成果所证明，为两年以来实行三三制、生产运动、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军拥政爱民运动与审查干部的成功所证明。所谓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并不是说任何思想都可以解决问题，而是要掌握正确的、合乎中国具体情况的、合乎中国广大民众的要求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毛泽东的思想。这种思想之所以能够有解决问

题保证斗争胜利的力量，并不是单纯由于思想本身的缘故，而是由于这种思想在中国社会上有坚强深厚的物质基础，是中国人民实际斗争的反映。

我们唯物论者，对于任何一种思想，必须根据广大民众的物质生活发展要求，来检查它的好坏。有些不合实际的思想，例如《中国之命运》里的反动思想，虽然自己夸张为"如日月经天样明白"，但如果把它拿到地上的民众的行动中间来考验，它就会失败得一塌糊涂。如果一个人，例如蒋介石，在他的政治主张里给民众提出了很多好听的空洞的诺言与计划，而在他的实际行动上却给民众带来了无限的穷困和灾难，那么，不管他的信心怎样高，这种思想，这种主张和计划之必然要破产，也正是"如日月经天样明白"的。

如果说，"心为万事之源"在孙中山先生的思想里，有时还有某些接近合理的因素——当他把这"心"解释为"万众的心"，解释为"人群之需要"的时候，那里面就有着某些可以接近唯物论的桥梁，那么，经过了《中国之命运》的作者蒋介石的引申，附加上中国旧封建时代的"诚"的思想，那合理的因素就完全没有了。蒋介石向"国民"要求说："国民只须遵循主义，按照方略，顺着成功的路线，穷理致知，实践力行……所谓力行与致知，皆须出于至诚。"什么是诚？干脆地说，这里之所谓诚也者，不外就是迷信的代名词。庙宇的菩萨，都要向善男信女要求诚心诚意地去敬它，蒋介石说："诚者成也"，"不诚无物"，又说："不诚则天下无能成的事，至诚则天下无不成之事。"这是说，信仰可以决定一切，不管什么思想，什么主张，只要你诚心诚意，不问是非，硬干下去，蒋介石都可以为你写一张包票："一定成功！"这样一种见解的错误，这种包票之不可靠，只要根据前面所说的一切，就

很容易明白。

唯心论的“不诚无物”是完全不对的。在事实上，在唯物论者看来，第一个命题是“无物不诚”，第二个命题方可提出“不诚无物”。任何精神、思想、志愿、信心，如果没有客观物质基础，就一切都是空谈。因为物质是本源的，第一位的；精神，“诚”，是派生的，第二位的。只有具备了充分物质基础的精神，“诚”，才有成功的希望。我们唯物论者的思想日程与工作日程是：一、“无物不诚”，必须使自己的一切思想意识都符合于广大民众的政治经济要求；二、“不诚无物”，将我们的正确的思想意识，坚持下去，绝不动摇，绝不灰心丧志，一定要达到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完全成功。我们的唯物论哲学是与蒋介石的唯心论哲学完全相反的。

对于一切唯心论的说教，我们还可以提出和蒋介石完全相反的证明。“不诚有物”，“诚则无物”——对于法西斯主义就是这样。法西斯主义者以“国家”、“民族”的名义来欺骗青年，没有经验的青年们都万分真诚地为他们牺牲了，有什么“物”可得呢？以德国的例子来说，成百万成千万的青年变成了炮灰，德国“民族”“国家”所得到的除了巨大的灾难又有什么？倘若德国的青年不受纳粹党的欺骗，对希特勒没有那样大的诚心，无数青年的生命又何至于变为无物，德国民族的灾难又何至于如此深重呢？在这样的意义上说，“不诚”反而可以“有物”。问题的关键是在于：法西斯主义者自己的“诚”是没有物质基础的，是违背客观要求的错误思想；法西斯的欺骗宣传，本来是违背社会经济发展潮流的，法西斯主义者的目的，只是要把极少数最大的地主资产阶级养得更肥，而对于大多数民众，对于国家民族，并不打算真正贡献任何一点东西，相反，只是下决心压迫民众，剥削民众。他们口口声声讲“至诚”，并不是他们自己真正有什么为国家为民族的

诚意，而只是为着要求民众和青年诚心诚意地像羊一样地受他们愚弄，只是为着要得到受骗者的“至诚”。对于这样一些骗子表示诚意，自然要一切落空，在这种情形下，“诚则无物”是必然的。因此，站在广大民众的立场上，站在青年的前途和幸福的立场上，对于任何人的任何一种思想主张，都要看一看它在实际上做得结果怎样，而不要只听他说得怎样。我们的哲学首先是“无物不诚”。如果你对于国家民族的任何意见没有科学的客观物质条件，对于广大劳苦人民（他们是国家民族的真正代表者）以及青年（他们是国家民族将来的主人）的现状与前途没有真正“物”的贡献，那我们就说：这证明你的所谓“诚意”是空的，是假的，是骗人的；而我们也就不能那么便宜地对你抛出自己的一片诚心了。

唯心论和宗教是相通的。“诚”字在中国的运用，常被当做是一个迷信的符号。我们的许多寺庙里，许多测字摊上，常常挂着“诚则灵”的招牌，求神问卦的人，必须恭恭敬敬，把纸烛贡品和自己血汗换来的金钱送给和尚道士，以表自己的诚心。至于这样表示之后，是福是祸，仍要靠你自己的运气，和尚道士是管不着的。如果有祸，只算你自己倒霉，不必问为什么，若一定要问为什么，那反而要给你加上一个罪名：“不诚”。在“诚则灵”的号召之下，实际的结果，只是要无数善男信女节衣缩食，把少数寄生的和尚道士养得更肥更胖。蒋介石也有一块“诚则灵”的招牌，其作用正和和尚道士的招牌一样，不过是勒索贡品的幌子罢了。

法西斯主义者的唯心论的哲学，原来是一张空头支票，它所以要对“国民”发出这张“诚”字号的空洞精神说教的支票，就因为它没有任何物质的准备金付给广大民众，尤其是工农劳动人民。试就《中国之命运》里对“国民”所允诺的“三民主义”来看，实际上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就民族主义来说，谁不知道当前

的大问题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还在我们的国土上横行着，而蒋介石对这事却倒对“国民”表示满不在乎，反而说：“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就民权主义来说，蒋介石没有一个字提到要给全国人民以民主权利，却公然主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就民生主义来说，孙中山先生所常常关心的中国民生的最大问题：“耕者有其田”，以及国民党统治区眼前迫切要解决的（或者说早就应该解决的）改善工农劳动人民生活的问题，蒋介石也一字不提，却长篇大论地侈谈着30年50年以后的“实业计划”。也不怕有人要问：眼前的死生问题尚且解决不了，三五十年后的遥远计划又有什么途径能够实现呢？如果眼前的人民都饿死了，如果抗战不幸失败了，三五十年以后还有谁来建国，还来建谁的国呢？

蒋介石主张建国工作必须从心理建设开始，在他所举的五个要目——心理建设，伦理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中，他认为“心理建设与伦理建设，实为各项建设的起点”，而把政治与经济建设放在程序的最后一步，这一个唯心史观的颠倒程序的意义，就是要把物质的诺言推到渺茫的将来，同时又梦想用这空洞诺言来换取国民今天的愚忠。“必须改变国民过去消极和被动的心理，与提高国民对国家和民族的道德。”这种说法，完全是似是而非的。如果所谓“国民”，是指全中国广大的民众（以工农占最多数）而言，那么，他们对于国家民族的心理，倒并不是那样消极和被动的，他们的道德，比起少数达官巨富来，是高尚得不可比拟的。现在的问题并不是国民的心理需要达官巨富们来改变，国民的道德需要达官巨富们来提高。现在的问题是贪官污吏腐败政治和经济剥削打击了广大民众，压抑了广大民众对国家民族的高尚道德的发挥，所以现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恰恰不

在于“心理建设”、“伦理建设”，而在于怎样整顿贪污之风和那种官僚资本垄断下的破产经济和腐败政治，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只有这样来解决问题，民众对“和平建国”的积极性才会发挥出来，人民对于国家民族的高尚道德才能充分表现出来。这并不是空论，而是事实。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以及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实现了真正民选政治的地区就是活的例子。

所以，从广大人民的阶级立场看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制主义者以唯心观点来责备“国民”的心理“消极”、“被动”，责备他们对国家和民族道德不够，说需要“改变”、“提高”，完全是无的放矢。但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制主义者的阶级立场来说，提出这样的问题来，是有其深刻用意的。从统治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看来，国家民族就是他们自己，不是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民利益代表国家民族利益，而是他们百分之一以下的人的利益代表国家民族利益，他们责备“国民”，是因为大多数人民为他们少数人利益的牺牲、拥护始终是消极和被动的，而不是因为“国民”对抗战建国事业被动和消极。他们所要提高的道德，乃是大多数人“诚心诚意”给少数人欺骗愚弄的道德，而不是因为民众真正缺少对国家民族的道德。蒋介石关于心理建设的问题的提法，在事实上就只有这样一个解释；而蒋介石自己对于国家的政治经济统治的实际情况，又证明的确只有这样一个解释。

总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所以要宣传唯心论的哲学，就因为他们需要把一切道理加以颠倒，而唯心论正符合了他们的这个需要。唯心论可以把白的看做黑的，好的看做坏的。不过为要普遍宣传唯心论，压制唯物论，首先还得要一个物质基础，就是用一切手段剥夺人民的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在物质上垄断了政权，在思想上也就垄断了真理，仗着权力，把道理都霸占到自己一方面。

一个声明，投敌叛国的军官就被渲染成抗日英雄；一纸“军令”，就可以把坚决抗战的军队诬作“叛军”。明明是腐败政治摧毁了民众的抗战积极性，却说“国民”对国家民族的道德不够高尚。嘴上“公”，实际上是借此为私。嘴上说要“不知有私”，要打破个人利己主义，而反对的锋芒却是向着真正公忠体国的抗日党派和广大民众。“国家”、“民族”是少数人垄断的，所以“公”也是少数人垄断的。不适合于这统治的少数达官巨富的利益的事，就被认为“私”。这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道理，我们领教得太多了，中国的人民，受蒙蔽也不会太久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言论、出版自由也有了自己的一部分物质保障，这就是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存在。所以唯心论的垄断，在中国境内已不能绝对横行，若论唯心论的将来结果，那也只能是唯心的幻想罢了。

二、关于知与行的思想

《中国之命运》里宣传着反理性的唯心论哲学。在“诚”的名义下，蒋介石提高了信仰和迷信，贬低了科学的客观知识。蒋介石对于知识来源的见解，就是明显的证明。依蒋介石的意见，知识不是来自客观事物规律的反映，而是来自人类生来的本性。“知的本源在于人类的本性，不必外求。”“就表面说，我们求知，要接受民族的经验和教训，要学习外国的科学和技术。然而就实质上说，知识如果‘无得于己’，便不能算是真知。”

何等荒谬、何等腐朽的唯心论！居然可以把民族斗争经验教训所证明的知识和科学技术知识都叫做“表面”的知识，而把人的所谓“本性”里的一种莫名其妙的什么东西（究竟是什么东西，蒋介石没有说清楚）当做所谓“真知”。在20世纪的40年代，竟

来宣传这种反科学的思想，除了法西斯主义的狂言呓语之外，是找不到它的任何比拟的。请看已经毁灭的法西斯老祖宗墨索里尼怎么说：

“法西斯主义是宗教的概念，人们把握它不是用内在的知觉的报告的观点，而是依据至高无上的信条的观点，用客观意志的观点。它引导个人提高，使它自觉自己是精神界的一员。”

试问这里所说的一切，和《中国之命运》里的见解有什么本质上的分别？法西斯主义的知识论，就是要破坏科学的合理的知识，对人民灌输一种神秘的宗教信仰。汉奸周佛海还未公开投敌的时候说：“相信主义要做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做到盲从的程度。”《中国之命运》里所谓出自“人类的本性”的“真知”，除了把它看做这种盲目的信仰与盲目的服从之外，是找不到别的解释的；因为它把经验的科学的知识都降低到“表面”知识的地位。试问世界上除了实际经验所证明的知识，除了科学知识之外，还有什么真正合理的知识？轻视这种知识，就是轻视理性，反对真理。所以，《中国之命运》里所说的“真知”，实际上是等于“无知”；而蒋介石在“真知”的名义下向“中国人民”要求的，只是糊里糊涂的盲目信仰与盲目服从，浑浑噩噩地跟着腐朽到顶点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去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冒险，借以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党专政的中国式法西斯主义的统治。中国境内蒋介石辈一切反动唯心论宣传，其真正的目的全在于此。

举例来说，蒋介石对于有些革命先烈的英勇牺牲精神所给予的赞扬和解释，就包含着这样的意义：

“为什么清末民初革命的先烈，能够赴汤蹈火，视死如归呢？他们笃信只有革命才可以救国救民，他们就力行革命工作，死生荣辱，置于度外。他们的‘知’本于天性，他们的‘行’发于真

知，才造成推翻三千多年君主政体与二百多年满清专制的伟大事业。”

这里包含着以下的见解：第一，所谓“本于天性”的“真知”，就不外是能“笃信”。第二，革命先烈之所以能赴汤蹈火，视死如归，就是由于有了这种“真知”。第三，只凭着这种“真知”，就能够完成伟大的事业。这些见解，是对于革命先烈的牺牲精神作片面的赞扬，而对于他们的思想和事业，不给与任何忠实的客观的估计。不错，对于每一个时代的真正革命者的英勇牺牲精神，我们是应该赞扬，应该学习的。但作为一个现在的革命者的我们，作为历史上一切革命事业的真正继承者的我们，对以往的革命者首先应该关心和研究的，是他们的具体的思想和事业，是他们的正确和错误、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先烈们的牺牲精神是一回事，他们对革命的认识是否能达到了绝对的“真知”，又是一回事。除非人类的思想永远不会进步，否则我们就要忠实地承认，过去的革命者，由于时代的限制，他们对于革命的认识，是有限制的。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革命者，由于没有完全的科学方法，只凭形式逻辑或经验主义看问题，他们对于革命的认识是常常不够或错误的。以孙中山先生自己的例子来说，在国民党改组时他就承认过去革命方法的不对，如果说他的“知难”学说有进步意义，那意义就在这里。真正有革命良心的人，应该学习孙中山先生的榜样。所以，对革命事业能够“笃信”，并不等于所“笃信”的就全是“真知”；而能够笃信，能够“赴汤蹈火，视死如归”，也并不就能保证事业一定成功。要保证事业成功，不是空洞的“笃信”可以奏效的，第一，要有正确、完全的认识作为指南；第二，在这正确、完全的认识上建立我们坚强的信心，或所谓“笃信”，这就是说，我们的信心或“笃信”是和正确、完全的认识一致的，

是分不开的；第三，必须要有群众的力量——物质的力量作基础，必须通过群众的革命斗争去推行我们的事业，才能保证成功——这些就是我们唯物论者的了解。辛亥革命推翻了三千多年的君主政体与二百多年清朝专制，这自然是一大成绩。但民主革命并没有成功，中国的半殖民地制度与半封建制度并没有被推翻。这一方面固然也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另一方面也由于先烈们对革命的认识不够，而这认识不够是包括当时孙中山先生自己在内的。中山先生曾经以为辛亥革命已经是“破坏的革命”的成功，而没有看到，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来说，辛亥革命在破坏方面也是根本没有成功的，这一个不正确的认识，不正是使中山先生的活动始终束缚在军人政客的圈子里，不能与真正革命的群众相结合，而一直到十三年国民党改组以前，总是在自己阵营里碰钉子的原因吗？

把“笃信”当做“真知”，用信仰代替知识，以先烈的牺牲精神作为神圣的崇拜的偶像，不谈他们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这不是尊重先烈，而是想利用先烈的白骨，来骗取青年的热血和头颅，好使青年们跟着买办封建性的法西斯主义者去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冒险，借以维持国人皆曰可废、天下人皆曰可废的中国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腐败统治，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这里已转到了行的问题：蒋介石对“行”是非常看重的，蒋介石自己并认为是在倡导着“力行哲学”，有时甚至于把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学说抹去一半，简单地称做“国父的‘行易’哲学”。什么是“行”？如果只满足于字面上的解释，那么，蒋介石的答复自然也是“革命工作”的“行”。但就实际上来看，蒋介石所谓的“力行”，和真正的革命的实践，是根本不同的。第一，蒋介石所要求的“力行”，如前面说过的，是凭借“诚”，凭借着所

谓出于“本性”的“真知”，凭借着对于“主义”、对于“领袖”、对于先烈、对于“国父”的偶像化的信仰，那就是宗教式的崇神行为。这是反动的行为，而不是真正革命的行为。真正革命的行为，必须有科学的客观规律知识为指导，必须具体而深刻地了解周围的实际情况，必须正确地认识民众，尤其是工农劳苦民众的希望和要求，必须和广大人民在一起，依照着地上的现实的人民所要求的方向，而不是依照着任何偶像化了的个别人物的要求和他们所谓“如日月经天一样”的什么“主义”去行动。其次，与上面相关联，蒋介石所要求的“力行”，是盲从的行为，是要求“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是想把封建时代愚民政策的统治施行到今天，所不同的，只是曲解和利用了“科学方法”的名义。蒋介石说：“依照科学方法，每一个人的工作，必遵循分工专职的原理，知者与行者虽有合作的必要，然仍须分工。”这就是说，知者不一定要力行，而行者也不必要有知，这也叫做科学方法吗？真是冤枉了科学方法！实际上正是按照科学方法，每一个人的工作虽然有分工专职，而每一个人对于他自己所专的一部分职务，必须具有正确的完全的知识，同时对于整个工作也要具有一般的正确知识，否则就无从完满地担负起自己的分工专职。真正的革命工作，也决不能让一些无知无识的人，例如达官巨富们来干。革命工作里，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固然是一种分工，然而这种分工决不是知者与不知者的分工，领导者指示总的斗争方向，被领导者也必须善于领会这个方向，并把它正确的应用到自己所处的具体情况里。在这一方面说，被领导者的“知”，常常比领导者还需要更加具体，否则是不能完成任务的。这就证明蒋介石所谓的“科学”完全是胡说。再次，蒋介石所要求于“国民”的“力行”，不是破坏旧社会建立新世界真正进步革命的行为，而是保守旧社会，遵循既有

秩序的行为，这只要看蒋介石反复称赞孔子的"六艺教育"，要学者"从六艺的实行得到真知"，要学习孔子一流的"礼、乐、射、御、书、数"，就可以明白。在革命的时代来宣传孔子一流的"六艺教育"，要国民学习封建时代统治者所崇尚的行为，试问这有一丝一毫的革命气味没有呢？

总而言之，《中国之命运》的哲学是愚民哲学，在"真知"的名义下要求人民无知，在"力行"的名义下要求人民盲从。我们应该反对这种欺骗人民的极端有害的哲学，我们应该揭破它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封建买办性的法西斯主义的真面目！

三、关于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思想

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思想，和蒋介石的所谓"力行哲学"，是有根本不同之点的。"力行哲学"是反革命的反理性的愚民哲学，而中山先生的思想则有进步的方面，有合乎科学和理性的方面。在某一方面说，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思想是反映着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一些真实情况的。

中国革命，由于它的特殊条件，经过了一个复杂的、长期的过程。这种客观过程，反映在人的认识上，反映在中国革命者对于革命规律知识的掌握上，也就表现为一个长期的摸索和试验的过程。为着这摸索和试验，中华民族曾付出了它的千万优秀儿女的头颅和鲜血。毛泽东同志说："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这是中国革命的认识史上的最真实的情形。

中国的革命，是在帝国主义国家侵略刺激之下发展起来的。中国的被侵略，是由于中国本身的落后。封建社会的万里长城，抵挡不了资本主义的洋枪大炮，旧封建社会统治者的思想文化，不

仅便利于清朝的统治，更便利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支配。为着挽救中国的危亡，中国必须进步，中国革命中的志士仁人必须从先进国家学取进步的革命思想学说，并善于应用于自己国家的具体情况中。因此，在认识过程上，一方面要依据自己民族的斗争经验和具体国情的认识，另一方面又要吸收先进国家的革命思想学说；这就表现为外国的先进革命理论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从太平天国采用基督教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起，到“五四”以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为止，思想上的摸索过程和革命的发展过程，是互相照应的。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毛泽东）

这一个思想上的摸索过程，也曾是长期的，艰难的，但这种艰难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已经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找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了。虽然在找到这条道路以前，中国民族曾经过不知多少的失败和痛苦。

孙中山先生亲身经历了这艰难苦痛的过程。他比他以前和同时的资产阶级革命者都伟大的地方，就在于能够自觉到摸索的艰难，因此也就能够不断地向前进步，能够“以俄为师”，探求新的革命方法，抛弃旧的方法，不停止在固定的一点。他在实际行动中，几次和资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的妥协保守的倾向斗争。“辛亥以前反对立宪派，辛亥以后反对和袁世凯北洋军阀妥协，十三年改组国民党又反对西山会议派。”在思想上，能够和旧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已经腐朽、已经过时了的公式作斗争，在屡次试验失败之

后，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之下，毅然采取了新三民主义的方法。

中山先生之提出“知难”的思想，是表明他能够自觉地认识到把握中国革命规律知识之艰难。就在这一点上，他的思想是有着进步的唯物论的因素的，是合乎中国的客观实际，合乎科学和理性的。就在这一点上，有着孙中山先生对于新事物新知识的不断追求向往的精神，有着在行动上不妥协不灰心丧气的坚毅的精神，这是他以前和同时的一切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都不能相比的。

孙中山先生说：“吾人之在世界，其智识要随事物之增加而同时进步，否则渐即于老朽颓唐，灵明日锢，是以智之反面则为蠢，为愚。”（《军人精神教育》）这是一种素朴的唯物论思想。这种思想说明人的“智识”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不是如蒋介石所说，出自什么神秘的“人的本性”。这种思想，说明人类的认识要跟着事物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能停止于任何一个旧的立脚点。“孙文学说”关于“十事”的论证里，也流露着这一种发展的思想。这是中山先生的思想精华，是使中山先生能够在政治上从旧三民主义走向新三民主义的方法基础。既然蒋介石口口声声说要“遵奉国父遗教，继承遗志”，那就要首先懂得这一个最重要的遗教和遗志。否则就是口头上的信徒，实际上的叛逆！

这是“知难行易”学说里的进步精神。但我们应该看到，这一个“学说”是五四运动以前中山先生对于自己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在时代上，他是中国的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一个构成部分：他本身基本上没有超出旧资产阶级启蒙哲学的范围。他具备着启蒙哲学的进步方面，那就是对于世界的一般的唯物论的理解，对于科学的客观的合理知识的重视。但他同时也有启蒙哲学的弱点，那就是对于社会和革命的认识，不能贯彻唯物论的观

点，而依然是唯心论观点。

中山先生不能从物质的经济的基础上去看社会的变化，不能依据社会阶级关系的分析来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因此，他对于自己的革命经验的总结是错误的。第一，说辛亥革命在破坏方面已经成功，却不知道，辛亥以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基础既然根本没有推翻，所以革命对旧社会的破坏，也并没有成功。第二，说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其原因单纯地在于人的“心”中，单纯地在于“‘知’与‘不知’之故”，却不知道，辛亥以后革命之所以仍然不成功的基本原因，是由于没有找到坚强的革命阶级作为基本的动力，是由于革命营垒的活动依靠了一些反动阶级的军人政客和这些家伙之背叛革命，是由于没有找到反映广大人民要求的反帝反封建的明确的革命纲领，是由于旧民主主义的方法与纲领已经过时，已经无力，并不是由于人们“不知”这一套旧方法旧纲领。这一点，在 1924 年至 1927 年的大革命中完全证明了。

“知难”的思想也有消极的一面，过分夸大这困难，于是得出结论，认为广大群众与知识无缘，只有少数贵族能获得正确知识。其实，本质地说来，正是与此相反。孙中山先生摸索到中国革命“必须唤起民众”的道路确是很困难的，甚至直到国民党改组以后孙先生也还是常常动摇，这正是孙先生本人在历史上长久地自居先知先觉，而视民众为不知不觉，与他们自觉地相脱离相隔绝的缘故。中国的广大农民，不但在知道中国需要土地革命，需要民主政权，需要抗日战争的问题上，并没有像许多大人先生们所经历的那样困难，即在学会分田查田，学会自己办事，学会放枪打游击的问题上，也没有像许多大人先生所断定的那样困难。应该公平地说，只有群众才是真正的先知先觉者，联系群众的领导者，

集中了群众的经验，在这一点上说来，实在是后知后觉者，而脱离群众的所谓领导者，则是不折不扣的不知不觉者。孙先生在这一方面的错误见解，就是把领导者看成脱离群众的天生的圣贤才智，而把群众看成盲目无知、平庸愚劣、只能闭着眼睛跟领导者走的“阿斗”。因为这一些基本观点和错误，就产生了孙先生所谓的“真平等”、“假平等”、“权能分开”、“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等一连串的错误观点。三民主义所以能被法西斯主义者和汉奸汪精卫辈所利用，这正是主要原因之一。孙中山先生不知道这样的唯物辩证法：革命领导者是群众的学生，又是他们的先生，领导者只有向人民学习，才能体会人民的思想、感情、要求，这就是给人民当学生，领导者将人民的分散的、无系统的思想、感情、要求总合起来，化为集中的有系统的理论、纲领、方针、政策、办法，再拿此去向人民作宣传，并使之见于行动，这就是给人民当先生。孙中山先生强调当先生的一面，不知当学生的一面，所以变成了唯心论的见解。

“知难行易”学说的这一弱点，就使孙中山先生对于知行问题解决得不正确。知首先是行的反映，其次是行的指导，同时又须受行的考验，这是孙先生所不曾了解的。孙先生把感性的知与理性的知混成一谈，又不知道感性的知正是理性的知之基础，于是把知与行完全对立、完全隔离起来，讲了一大堆“不知亦能行”、“能知必能行”等不符合于事实的玄学。孙先生这种二元论的和唯心论的解释，不仅使后来蒋介石的法西斯化的愚民哲学得到了一个根据，并且使一切食言而肥的诺言专家们得到了一个护符。

这些就是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学说的弱点。这些弱点，当中山先生与共产党人合作，并且采取了革命行动的新方法以后，是在许多具体的问题上都克服了，例如在改组国民党的时候，中山

先生检讨过去的失败经验，已不再认为是革命党人“不知”的缘故，而是依照了“俄国有个革命同志”的说法，认为是国民党内有反革命分子“能乘隙以入”，“卒至破坏革命事业”的缘故。又在他临终不久以前的“唤起民众”的主张，以及希望“在最短期间促其实现”的“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则是把划分建国为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的“阿斗”主义的思想取消了。

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里，完全抹煞了中山先生思想上的这一个进步，尽量利用和扩大了他的旧的弱点，这样，借着中山先生“行易”哲学的名义，来制作一套极不合理的唯心论的、鼓励盲从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中国式法西斯主义的愚民哲学。

只有当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应用到中国来之后，中山先生的旧民主主义启蒙哲学对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认识上的唯心论的弱点，才完全克服了。根据历史唯物论的科学方法，中国共产党指出革命不成功的原因是由于与帝国主义相结合的封建制度仍然存在，因此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推翻中国封建剥削制度的纲领。中山先生领导下改组后的国民党也接受了这个纲领，使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充实了新的内容。又根据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条件，中国共产党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已不能成为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坚强的力量，要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必须首先依靠广大工农人民群众的力量，尤其是依靠工人阶级和他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山先生接受了这一个思想的某些要点，在改组国民党后规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使中国的民主革命，使三民主义的实现，获得了真正坚强有力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结合的过程，是根据了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和

中国工农群众广大人民的斗争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和广大的人民在一起，发动人民积极斗争的精神，并以“甘当小学生”的态度，从群众中学取领导革命的知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的知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领导者决不以唯心主义的“先知先觉”自居，决不把人民简单地看做不知不觉的“阿斗”，相反地，共产党人知道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的积极性与创造力，只有他们，只有人民才是一切革命的真正主人翁。同时共产党人又知道，人民由于长期处在反动统治下面，造成了文化落后，而人民的意见与力量又是分散的不集中的，所以人民迫切需要自己的政党，自己的领袖，自己的先锋队。这种政党、先锋队不是高踞人民之上，而是处在人民之中，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向人民学习，又教育人民，这样的政党、领袖、先锋队，就是中国共产党。因此，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掌握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知识，才能自诞生以来领导中国人民连续不断地进行了三次惊天动地的革命事业，才能坚持抗战到今天，并在各根据地建立了真正新的三民主义的中国。

这一切事业和思想，都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名字分不开。到了今天，铁的事实已经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了和具体化了的辩证法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才是能够把中国之命运引到光明前途去的科学的哲学，才是人民的革命哲学。

（原载《解放日报》1943年8月11日；曾收入《“有的放矢”及其他》和《艾思奇文集》第一卷）

扒手的诡计

(1943.8)

国民党“中央社”近来有些神经错乱的征候：一向是标榜封建复古的“中国固有文化”、标榜反理性反自由的“中国文化统一性”的，现在忽然好像忘记了这吃饭的招牌，借了外国人黑格尔的教条，发出一篇《专论》：“不合理者不存在”。为什么竟这样弄昏了头脑呢？把那《专论》一读之后，我们就恍然大悟。原来所论是涉及了法西斯主义的开山老祖墨索里尼倒台的问题。

墨索里尼一倒之下，中央社及其流亚的宣传机关，显然受到了巨大的震恐，好多天说不出一句话来。那狼狈的样子，和共产国际解散时他们的兴高采烈，语无伦次的状态对照起来，是颇有一观的价值的。但中国既因忝列反法西斯的同盟国家才被称为世界四强之一，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的倒台又是铁的事实，代表中央政府喉舌的中央社之类的机关，就不能默不做声，既要做声，又不能不站在民主国家的立场上，对法西斯主义有所指斥。这可是在墨索里尼门下称过弟子的人们所极端不愿为的。然而又有什么办法呢？迟疑又迟疑，仍然要勉强凑一篇稿子。这中间的神志昏乱，是理所当然的。

但这些做徒弟的宣传家们，有一点却始终不会昏乱，那就是对于他们的师父祖宗所要尽的孝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孝子的本分，就是虽然父母祖宗死了，而对于父母祖宗的“道”，却始终坚持不改。所以，虽然以民主国家一员的资格来说，

对于法西斯主义是应该无条件鄙弃的，而中央社却于假情假意的诅咒之中，转弯抹角，仍然在主要点上把法西斯主义赞扬起来。

一方面咒曰："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剧烈的帝国主义……他是一种侵略主义，这种侵略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恢复中世纪的神权迷信，并将神权迷信由个人的扩张为民族的……"

另一方面又赞曰："法西斯主义中有民族主义成分。""何以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横行（按这两个字的应用，包含有"打在儿身上，痛在娘心头"的情绪）廿一年之久呢？这便是因为法西斯主义者中还有一点民族主义的成分。法西斯主义者爱自己的国家，这是合理的。这便是法西斯主义之所以兴起……"

呜呼痛哉！这样"合理的"法西斯主义竟闹倒台了，岂不伤感人也！

中央社把黑格尔的教条运用得很巧妙：既然倒台了，当然有些不合理。既然"兴起"了，当然一定又合理。总而言之，法西斯主义至少有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合理成分，而这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合理化，就正适合中国的墨索里尼徒子徒孙们的需要。偷贩法西斯主义的大人先生们倒很懂得要按中国国情这一条道理。中国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而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本来就不可能向人侵略。因此，骂一骂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性，在法西斯主义的中国走私专家看来，到也无关大体。因为法西斯主义一被偷运到中国，就不是要侵略别人而是要受人侵略，不是要征服别人，而是要投降别人，不是要并吞别人而是要与人同化（如同化于"大东亚秩序"之类），所以必须略加变通，才可以把它拿在中国来翻版。只有一点是万万不能放松的，那就是因为中国正在抗战，全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始终在高涨状态中。要把法西斯主义的劣货混过全国人民的警戒的眼光，就必须将它的毒害国家民族这一个极

大丑恶之点加以隐蔽，加以粉饰，加以颠倒混淆；这就是说，必须强词夺理，模糊现实，把毒害国家民族的法西斯主义渲染成爱国家爱民族的漂亮脸孔，用假招牌来投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之机，才可望伪货有销行的市场。至于其他方面如侵略性之类，是多骂一骂也无妨的，岂但无妨，而且还相当有利，下面一个比方可以作为证明。

城市里做扒手的人，有一种诡计：行窃的时候，总在自己周围布置一个帮手。万一被发觉，给人抓起来了，那帮手就挺身而出，摆起“仗义执言”的姿势，给扒手打一记耳光，趁这机会，推推挤挤，扒手就能够脱身而走。

一记耳光，像是责罚了扒手，实际上是为了保护扒手。中央社神经错乱的《专论》，可作如是观。

（原载《解放日报》1943年8月16日；署名：崇基）

逼 上 梁 山

(1944.1)

中央党校新编的平剧“逼上梁山”，在二号的晚上彩排了一次。这是一个很好的历史剧，在旧的故事里添进了新的观点、新的内容，使原来带有浓厚封建性的平剧，也能发挥很大的进步教育作用，在平剧改革运动中，这算是一个大有成绩的作品。

剧本采取了《水浒传》林冲的故事。这里的林冲，是一个有民族意识的英雄人物。他用“穿沟战法”训练士兵，准备抵御侵略中国的金人。但他最初有一个错误的思想：他看不见人民群众的力量，一心想依靠腐朽的封建统治机构，来达到反抗侵略的志愿，结果是在事实前面碰得头破血流了。“利害自私”的封建统治代表者高俅，是不知道什么民族利益的。为着巩固个人的权势，他所采取的手段是对内排除异己，对外勾结敌人。忠诚为国的林冲一流人物，于是就成了反动统治者打击的目标。林冲被陷害，他的家庭被破坏，他自己被判处流刑，并且生命也几乎被特务奸细所暗害，要不是平日和一些群众有联系，得到鲁智深的救援，那他是连头也保不住了。不管高俅在他身上施行了种种“残忍阴谋”，使他受尽了人间痛苦，他却仍然那样“宽宏大量”，一心想到边防地带去等待杀敌立功的机会，并不把私仇放在心里。但边防地带仍然有高俅一流人的统治，这里的人民一样是受到苛捐杂税的重重剥削，一样是饥寒交迫、“民不聊生”；一样是“民怨沸腾”，人人在叫“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而且高俅的魔手还不肯

放弃他，派来特务奸细紧紧跟在他的身边，一定要把他害死。最后他在山神庙里看见了人民起义的信号，他发现高俅的奸细放火烧了大军草料场，不但是为着要陷害他个人，而且是为着要破坏国防资材，便利敌人进攻……这样经过了种种事实的教训，和人民群众力量的推动，才使他最后清楚了自己的道路，下定了决心，和起义的人民站在一起，去反抗出卖民族利益的反动统治者。——故事的梗概大体上就是如此。

在《逼上梁山》的曲折的故事里，编剧者穿插进了多方面的新的政治内容，这里暴露了反动的统治者的荒淫无耻；流氓出身的高俅做了太尉，他的统治的成绩是灾鸿遍野。在门外有大群的难民在啼饥号寒，门里的他却和贪官污吏们在花天酒地里庆祝自己的升官发财，他勾结敌人，压制爱国言论，废弃抗敌战术，破坏国防设施；他千万百计地陷害忠良……他的一切罪恶行为的暴露使观众不能不发生满腔的义愤。这里又写出了真正有民族良心的英雄典型林冲，他的大公无私，他的坚苦卓绝，使观众的精神也跟着振作起来；这里又有群众中的英雄鲁智深，他是那么爽直豪勇，疾恶如仇；最后又写了群众的斗争，热烈的场面，激发起观众的斗争热情，能使观众兴奋鼓舞。《逼上梁山》的主题，是群众的反抗斗争，在群众的伟大力量的推动下，才使林冲得到了锻炼和改造，走上了正确的斗争道路。因此，全部剧情给予观众一种积极的教育作用，作为改良的平剧，能做到这样是不容易的。

演员的技术和努力，也是值得介绍的，这对于舞台效果的好坏，有很大的决定作用。“逼上梁山”的演员的技术都能称职，而几个主角尤其出色，任何人看了那鲁智深的一角，一定是赞不绝口的，没有很高的平剧技术修养，不能那样生动逼肖的把鲁智深的性格刻画出来。主角林冲，也很能胜任，他确能相当表现出坚

忍卓绝的英雄气概，而这种气概对观众是有感染的力量的。

平剧的定型化了的形式，使它的改革成为一个困难问题。延安现在已经尝试了两种改革的方法：或者是把平剧的“完整”的一套全然打破，使它和其他种类的歌谣戏曲混合起来，创造新的歌剧，延安平剧院的《上天堂》、《难民曲》就是这样做，而且曾经收到相当的效果的；或者是利用平剧原型演历史故事，加入新的内容，排除那些忠孝节义、怪力乱神的内容——《逼上梁山》和《史可法》，都属于这一种，而且也得到了应得的成绩的。由于内容有了新的因素，《逼上梁山》在形式上也做到了相当的改革。第一是多了群众的场面：开场不久的饥民群众，末场的救火的农民群众，都是一二十人同时上场，在普通旧剧里，除了“全武行”之外，是很少看见的，这种形式，似乎还可以多多大胆应用。第二是脸谱问题，在普通旧戏里，被压迫的群众大概都是小花脸，“逼上梁山”却把反动统治阶级的人群都扮成丑角，而被压迫的群众，如开酒店的李小二，却是眉清目秀的英俊后生，这是做得非常对的！

这次各处新年晚会里，无条件演旧剧本的情形没有了。这些改良的平剧都得到了成绩，事实证明改革平剧是可以做到的，它的困难决不是不可克服。《逼上梁山》还只是“彩排”，就已得到了很好的成绩，他们现在正在研究演出的效果，搜集观者的意见，加以进一步的修改，正式的出演，想来一定会更加精彩的。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1月8日；署名：崇基）

群众需要精神食粮*

(1944.1)

去年一年的生产运动，使边区面目一新，经济上向丰衣足食的接近，使广大工农兵在文化上提出了新的要求。在部队方面，学习运动的热烈，战士们学习兴趣的高涨，从学习模范朱占国的出现可以看得出来。在工农方面，如全边区工农通讯运动的发展，关中唐将班子提倡读报和卫生，延安南区合作社提倡办小学，孙万福在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上，把扩大办学校列入今年计划，赵占魁和其他许多工人劳动英雄把文化学习列为竞赛条件，以及若干妇女纺织小组提出识字的要求，都是文化运动普及的表现。而今天本报（按：延安《解放日报》）第四版所发表的黎文同志的文章，生动地指出了群众对于出版物的需要，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新现象。

书店的统计告诉我们，一年来通俗书籍销路的百分比是增加了。部队的战士要求大量的通俗书报，劳动英雄要买各种小册子，石匠也背着他的工具走进书店，老婆婆为他的小孩子寻找读物。文化水平较高的群众，则除了这些通俗出版物之外，还要买《新民主主义论》和《评中国之命运》了。这许多动人的事实，给我们的文化工作者和出版工作者一个很大的启示：丰衣足食的条件提高了老百姓的文化要求，他们有了较丰裕的物质食粮，现在就进

* 这是作者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

一步要丰裕的精神食粮。

在这种情况之下，为着进一步发展今年的生产运动，把毛泽东主席的“组织起来”的号召和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上创造模范乡和模范村的口号很好地实现，为着我们今年提出的“自卫备荒”的任务，我们站在文化战线的同志们，就有了比以前更大的责任。一个大问题提在我们前面：我们需要根据党和政府的政策，做更多的文化上的普及工作，使工农兵群众对于当前的政策与任务，获得更深刻更具体的认识，使他们的热忱和信心更加提高。

一直到现在，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不够。前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主席明确指出文艺要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方向，指出“对于人民，第一步最严重最中心的任务是普及工作”。这一个指示，对一般文化工作也是适用的。从那时起，延安文艺工作在各方面都有了些新的尝试。但就文艺方面来说，除了在延安附近做了一些群众的文艺活动之外，真正深入农村的工作，现在才算开始；这表现在目前几个剧团下乡的事实上。就出版方面来说，虽然除《边区群众报》、《部队生活报》及各分区的通俗小报外出版了一些通俗读物，并且书店也用种种方法（在骡马大会上摆摊子，组织流动供应等）把读物送到群众的手里，但是在数量上和质量上是很不够的。

给群众丰裕的精神食粮，还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严重任务。除文艺工作应该照现在已经开始的方向努力去做之外，在写作出版方面，我们希望文化工作者（文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各方面的写作者）方面，要肃清轻视或忽视普及工作的思想残遗，肃清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思想残遗，真正眼睛向下，向群众学习，考察群众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根据实际政治任务，以群众斗争中的生动活泼的材料为内容，为群众有系统地编写他

们所需要的作品和读物。

我们的出版发行工作者，必需切实调查群众的文化上的需要，出版工农兵群众所容易接受的东西，更设法增加纸张产量，大大增加出版的数量，并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把这些东西送到群众手里。不要只是在城市里开店，专等群众上门，而要深入到乡村去，走上群众之门，使更广大的工农士兵群众都有机会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精神食粮。

为着这个目的，出版发行工作者特别需要对过去的工作作一番检讨。有一个时期，出版发行工作者对于自己在宣传教育战线上所负的严重政治责任曾是盲目的，他们把自己的工作看做是纯粹技术的甚至商业的工作，对于书店里或图书馆里所陈列的书报究竟是否符合群众的需要，甚至是否对群众有害，他们是不负责任的。这个现象在边区现在是消灭了，但是用满腔热情积极向群众介绍好的出版物，却还做得很差。要把出版发行工作做好，必须与各县区乡、各团营连的党政军干部密切联系，取得他们在这一方面的帮助。党政军方面负责宣传教育工作的同志们，必须重视这一工作，把供给群众精神食粮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之一，要帮助出版者推广群众报以及各种通俗读物，要调查群众的文化需要，经常向出版者和文化工作者提供意见和要求，要组织群众推动他们来阅读群众报和各种通俗读物。

广大群众对于精神食粮的要求，明显地增长起来了。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给了革命的文化工作以无限发展的远景。让我们看到这个远景，并实事求是地向着它前进吧。我们的努力将使边区文化的发展，在全中国放一异彩。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1月20日）

人民的军队

(1944.2)

军队帮助人民生产的运动，是不止在陕甘宁边区成为热潮，而且普及到敌后各根据地了。八路军、新四军是钢铁一样坚强的部队，虽然在敌后异常艰苦的环境里，虽然担当着紧张繁重的战斗任务，仍然有足够的力量，来开展生产运动，来帮助人民的生产，为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获得了巨大的成绩。

动人的例子，是随便都可以找得到的。例如前月31日的本报就有这样的标题："太行三、六军分区，去年帮助群众耕地四万亩"。在战斗环境和自己生产的余暇，为群众耕地四万亩，这是一个可惊的数目字，是对人民的极巨大的帮助。要做到这样的成绩，那么，这部队对生产的热忱必须至少不低于他们战斗的热忱，而对于革命军队爱护人民的责任又必须有高度的自觉。事实证明我们的军队是有这样的热忱和自觉的，他们懂得自己是为人民打仗，懂得把一切人民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他们在战场上能够不怕牺牲，在生产中，在克服物质困难的斗争中，也能够以献身的精神去帮助人民。在边区，我们的部队不吃老百姓一顿饭，为老百姓耕地、锄草、收割，而且要做得比老百姓自己更仔细更迅速。在前方，天灾人祸双重的威胁着老百姓的生活，我们的军队节衣缩食，尽一切力量来加以救济，最动人的是太行一带的救灾运动，上自总司令，下至每一个士兵，普遍的节约了伙食，作为救济灾民之用。

我们的军队从各方面帮助人民的生产，而且都是以战斗的不怕牺牲的姿态出现的。试看本月5日本报所载张云逸同志的报告："去年淮北大水，我四师部队由彭师长邓政委亲自督促，抢筑堰堤，奋不顾身，几遭水淹。"从高级将领一直到士兵，在为人民谋利益时，都不惜用自己的生命作代价，这是八路军、新四军的特色，这是何等高尚的革命军人的道德品质！我们的军队是忠于人民的，因此也受到人民的爱护和赞扬。老百姓到处在宣传着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群众常常是很正确的批评家，这一句众口同声的赞语，简单明了地反映出了一个真理：我们的军队，的确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过的最好的人民的军队。

人民的军队，是不可被战胜的，是一定能够战胜一切的；列宁在1919年发现群众不怕带枪的人时，就确定这是革命胜利的保证。我们不妨把他的一段话引出来看一看：

我现在将我自己所经过的一件事情讲给同志们听。有一次我在芬兰铁路的车厢内听到几个芬兰人和一位老太婆谈话。我当时不能参加这些谈话，因为我不懂芬兰话。可是有一个芬兰人向我说："你知道这位老太婆讲出一件何等新奇的事吗？她说：现在不要怕带有枪械的人了；有一次我到森林中去找干柴，碰到了一个带有枪械的人，他不仅没有夺去我的干柴，而且还帮助我找了许多。"

当时我听了这一番话，我自己就想到：让千百份报纸……让千百个非常响亮的喉咙，来叫我们是"专政家""暴力者"等等，而我们知道，现在在民众中，却高唱着别种呼声；民众自己向自己说：现在不要怕带有枪械的人，因为他们护卫劳动者，而无情地压服剥削者的统治。这就是民众所感觉到了的东西；因此，平常未受教育的人们的鼓动，说赤卫队用自己的力量反对剥削者，这

样的鼓动，就是必胜不败的鼓动。这个鼓动能普及千百万群众，它能够巩固地完成19世纪时代法国公社所已经开始创造的事业。

如果在列宁的时候群众不怕带枪的人，还只是“新奇的事情”，而列宁已看到它的重大意义；那么，在现在的中国，人民久已认识到八路军、新四军是自己的军队，对于我们的胜利，还能有丝毫怀疑吗？“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好的军队！”这也是群众的鼓动，这一个鼓动是非常普遍，非常有力的。在这一个鼓动中，群众所表现的，不仅仅是不怕带枪的人的情感，而且是把军队看做自己的一家人，自己亲密子弟的情感。

现在已有无数的事实证明军民的亲密团结是必胜的保证。八路军、新四军因为在事实上证明自己是人民的军队，所以能够有今天的发展和壮大。由于能够爱护人民、依靠人民，任何敌人都把我们的军队无可奈何，而我们却有办法对付任何敌人。前方的战斗虽然愈更残酷了，物质条件虽然愈更困难了，却不能妨害我们胜利的消息一天天的加多起来。我们已经能够如像在沁源一样地长期地围困敌人，能够如像在赣榆一样攻破敌人重要的据点，能够像在山东南北岱崮一样，以93人的指战员抵御敌人三个步兵大队、一个炮兵中队、一个空军中队和一个伪军团，即十倍以上的敌人陆空军的联合进攻，而却坚持半月以上！我们能够粉碎山东敌人的“扫荡”，除灭横行华北30年的惯匪和汉奸刘桂堂，我们能够粉碎敌寇对晋察冀、太行、晋西北的大“扫荡”，击破华中敌寇的“清乡”进攻，我们能够不断的俘虏成队的敌寇，缴获一批批的战利品。这一类胜利消息是一天天增多了。它证明在我们的人民和军队中间日益增长着一种新的更大的力量，足以最后战胜敌人的力量。这些力量是从哪里来？是从我们人民的军队的自觉中来，从军队与人民的兄弟一般的亲密团结中来。

人民的军队是不能自满的，他们要不断地克服自己本身的缺点。他们谨守着毛主席的指示，要精益求精地学会三套本领：打仗、生产和群众工作；如果有一点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灰尘，那就要像天天洗脸一样的洗掉。去年的拥政爱民运动，已经使军队和军民关系面目一新。尽管我们的敌人想尽千方百计，要窥伺我们的一切空隙来做破坏活动，但是我们的团结仍是更加紧密了。今年的拥政爱民运动中，我们的军队，还要在思想上及日常具体工作上来锻炼自己，使自己的优良的品质得到更高度的发扬，使自己中间产生更大的能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

（原载《解放日报》1944 年 2 月 14 日；署名：崇基。《新华日报》1944 年 7 月 7 日转载；曾收入《“有的放矢”及其他》）

劳动也是整风

(1944.2)

在生产运动里，我们的知识分子也参加了劳动，其中有不少是能够像工农劳动群众一样艰苦工作的。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而能够认真的和工农士兵群众站在一块工作。他们都是新的知识分子的模范，并且获得了劳动英雄的光荣称号。

以前人们常说：青年是将来世界的主人，这有一面的道理，却并不完全确切，现在的正确的说法是：劳动者是将来世界的主人，如果是青年二流子，在将来也还是要被淘汰的。

但在我们边区，已不必等到将来，而是现在就能看到的事实了。好的劳动者被选为英雄，比中状元还光荣，而他们在经济上的贡献和在政治上的作用，又是旧社会里的状元之流不能比拟的。状元之流是剥削者，是社会的寄生虫，而劳动英雄们却创造了新社会，这才是真正的主人。我们只要想像一下，那荒无人烟的山地里在几月之内竟布满了村落，就不能不对劳动英雄的创造奇迹惊叹和敬服！他们都是目不识丁的劳动者，而他们的组织和创造的魄力却可以使有些只会说漂亮话的知识分子羞愧无地。劳动英雄大会后，这些新的状元们回到家乡，都把老百姓团集在自己周围，这不简单是一种荣耀，而是新的创造和发展的开始。

中国古来就有两个相反的传统，一个是只能“坐而言”的孔子的传统，一个是主张“起而行”的墨子的传统。墨子的传统，在这些劳动英雄们的身上，是大大地发扬了，但在知识分子方面，许许多多的

人，虽然都好像受过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化的洗礼，虽然早已知道“打倒孔家店”的故事，然而根本的传统在他们的身上却还没有改变，仍然对于“坐而言”的恶习惯有很大兴趣。“浮在上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是去年我们已经指出来的了。经过了一年的生产运动的推动，我们的知识分子也有了很多转变。劳动英雄大会的一切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告诉我们边区一年来之所以能够面目一新，是由于有这些优秀的劳动人民站在先头，他们是社会进步的代表人物，不怕你是读书万卷的学问家，不向这些人物学习，是一定会落伍的。

对于知识分子，劳动也是整风的实践，需要自觉地以整风的精神参加生产运动。在“自卫备荒”的号召之下，今年的生产运动，是非常普遍的开展了，没有一个人站在生产运动之外，这是革命的任务，但对于知识分子，这又不仅仅是为着革命的任务，而且也是为着改造自己。轻视“自食其力”，以“不劳而获”为荣的剥削意识；好高骛远，虚浮夸张，对普通的现实事物缺少兴趣的主观主义思想方法，都可以在劳动的实践当中逐渐清洗干净。

要十分认真地参加劳动，养成遵守劳动纪律的习惯。我们的劳动英雄，对于劳动是有着高度的兴趣的。以业余消闲的态度对待劳动，或把生产看做多余的负担，都是缺乏新的劳动观念的表现。我们的劳动英雄在劳动中的热烈兴趣，是表现他们在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之下作了主人。他们是自由地自觉地为自己建立了劳动纪律，与旧社会里在饥饿和鞭策下面进行劳动是根本不同的。新社会的条件形成了他们的新的劳动观念。从劳动英雄学习这种新的劳动观念，学习作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劳动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在知识分子改造自己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事情。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2月19日；曾收入《“有的放矢”及其他》）

向日本弟兄们致敬

(1944.2)

日本工业学校的"暴行座谈会"，揭露了日本法西斯军阀在中国施行的种种暴行。座谈会的记录只到第二次，所反映的情形也许还只能算是很小的一部分。但一读内容，那血淋淋的"杀戮、放火、掠夺"的事实，异想天开的残忍狠毒的杀人花样，已够十分令人惊心动魄，令人非常愤恨了。

报上常常把希特勒称作生番，其实生番的野蛮，还不够形容法西斯主义者的残暴。生番只是野蛮落后而已，虽然有时吃人肉，那是迫于生产力太低，不能不胡乱找一些补助的食物。法西斯军阀却在野蛮上面加以近代的技巧，在残忍的暴行里要出千种万样的花头。单就杀人一项来说，枪杀刀砍已是太平凡了，还要创造出打靶、活埋、挖眼、破脑、挖肝狗、吃活人等等的极尽残忍的方法，残暴的行为在法西斯军阀已成为嗜好，一定要在被杀者的身上造成极大的痛苦，才以为是最大的快乐！纯朴的生番哪里懂得这样多复杂玩意？我们座谈会的日本弟兄们，也不能不愤激地说："太残酷了，这是人干的事吗？"

的确，日本的军阀不是人，而是野兽，它们在中国土地上及太平洋上横行着，逢人便要伤害。不但中国及世界反法西斯国家民族要一致来打死这些野兽，日本的国民也要打死这些野兽，才能继续生存发展。日本工农学校同学们的义愤的言词，是代表着日本广大人民的心声。上述的暴行表明日本军阀不但把日本国内

的人民压制得牛马不如，而且在战场上，把日本人民的子弟——日本的兵士们——逼着和野兽同化，饥寒交迫的日本人民如果再知道了他们的子弟是怎样被军阀强迫着试练胆量，以便学着野兽在无辜的中国人民身上施行惨绝人寰的暴行，是会更觉悟到自己与中国人民有共同的命运，共同的敌人，共同的战斗目标的。

前月 15 到本月 16 日，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开了扩大执委员会，议决成立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创立准备委员会，并组织了日军暴行调查委员会，日本工农学校的座谈会，就是在这同时召开的。由日本弟兄的口中，把亲身经历的日军暴行揭露出来，那意义是很大的，这对于全世界是一个最有力的控诉，对于中国的抗战会有很大的帮助，而对于日本人民的解放运动，也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我们感谢日本工农学校的同学们对中国革命人民的兄弟的友谊，我们觑视日本人民解放联盟领导日本人民斗争的胜利！

（原载《解放日报》1944 年 2 月 28 日；署名：崇基）

新 办 法

(1944.2)

战卫部在拥政爱民工作中，创造了许多新办法，这些办法看起来好像很平常，却使他们和老百姓搞得很好，譬如他们“帮助群众写对联，最受群众欢迎。”(2月16日《解放日报》)

创造新办法，是很重要的事。我们各方面的工作，是在不断进步着的，但有的进步很快，有的工作成绩比较差些，这是为什么呢？其原因之一，是由于或者善于创造新办法，或者只会重复已经做过的一套。

创造新办法，不是脑子里随便一想就可以做到的，在群众中工作，必须研究，找出适合群众的办法。战卫部的办法好，是因为他们能利用老百姓自己的形式：写对联。把这种形式加上我们所要宣传的新内容，老百姓就非常乐于接受。这比花费很多纸张写成标语，到处张贴，成效还大得多。

组织劳动，利用合耕队、互助社等等，老百姓不熟悉的形式，都没有很多发展。去年采用变工、札工、唐将班子的形式，就有了空前的好成绩。在老百姓中喊出“斯达哈诺夫运动”的口号，一定没有人理睬，由劳动英雄发起，组织竞赛，就会很快地掀起生产的热潮。“劳动英雄顶秀才”、“一担粪顶一升米”的口号，在动员生产中起了大作用，就因为利用了老百姓所熟悉的形式。

这样的形式，只要我们认真去找，一定可以找到，供我们创造新的工作办法。然而我们是不是都充分注意到这样做了？

用宣传工作的例子来说吧。我们的敌人久已知道在过旧年时利用灶君老爷的书，在端午节用钟馗吃鬼的书来灌输奴化意识。我们的宣传者似乎还不会去很好地利用这些形式，来宣传抗战的进步的思想。

群众观点这四个字，不是一句空话，而且要具体来做才行的。不能按照上述的方法来工作，证明对于群众所喜欢接受的形式还存着轻视的心理，也就是群众观点不够。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2月29日；署名：崇基。曾收入《“有的放矢”及其他》）

群众自己的秧歌队

(1944.3)

延安今年春节的秧歌活动中，最有特色的秧歌队之一，是新市场商会所组织的市民秧歌队。

市民秧歌队的特点，在于它是完全由群众自己所组织的新秧歌队。参加市民秧歌队的有铁匠、木匠、商人等各项的群众，有山西、河南、陕西等各地的人民，因为都是老百姓，所以很熟习应用各种各样的、各地方来的群众艺术形式，因此也最能吸引观众。就曲调来说，河南坠子、山西梆子、郿鄠调等都用到演唱里了，就服装来说，单单那色彩的鲜明一点，就是最适合群众心理的。此外如抬阁、高跷，都是极能引起群众兴趣的形式，尤其是在高跷上演唱，使成千的观众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就平地广场的演出上来说，也是一个对观众较好便利的方法。

有了以上的条件，市民秧歌队就成为今年规模最大观众最多的秧歌队，群众不仅在生产方面有强大的创造力，在文化艺术上，也有无限丰富的创造力。市民秧歌队所采用的这许多适合群众兴趣的形式，是值得我们学校机关的秧歌队来参考、学习和加以提高的。另一方面，帮助群众建立自己的新秧歌队，又是在丰衣足食之后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市民秧歌队是一个开始，绥米、安塞、陇东等地的群众，据说也正在改造自己的秧歌队。我们希望各地文艺工作同志，县区乡工作干部，以及劳动英雄们，大家密切地注意这一件工作，让它在边区各地大大发展起来，这一方面

可以提高群众的文化生活，一方面对于政府的各种工作号召也是大有推动作用的。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3月17日；署名：崇基）

前方文艺运动的新范例

(1944.4)

今天本报（按：延安《解放日报》）登载了一则晋察冀文艺运动的消息，民兵英雄神枪手李殿冰被戏剧工作者表现在舞台上，获得了当地老百姓大大的赞赏，这在我们所知道的前方文艺运动中，是一个崭新的消息。

艺术要为工农兵服务，首先就要能表现工农兵，把他们放在作品主人翁地位。在陕甘宁边区，自从文艺座谈会以来，我们的艺术工作者依照毛主席所指示的方向，用秧歌剧以及其他的形式，表现了工农兵们以生产运动为中心的英雄事业。由于方向正确，在今年的春节秧歌运动中，文艺工作有了群众性的扩大的开展。在前方，对敌斗争是直接的中心任务，因此在文艺中，也必须表现工农兵们在战斗中以及战斗与生产结合中的英雄事业。晋察冀的新闻报道剧《李殿冰》，是前方文艺工作者在创作中的一个很好的新范例，是毛主席所指示的文艺方向在前方实现的一个重要表现，因此他就得到成功；"看戏的人数之多，打破了过去任何一次晚会的纪录。"

善于向群众学习，也是《李殿冰》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论作者演者，都到实地去搜集材料，征求被扮演者及其周围人们的意见。在临扮演的时候，还直接向被扮演者学习了他们的外貌、动作和语言，群众在事实上参加了导演，这种方法，在延安的秧歌运动中也大都应用了的，特别《钟万财起家》和枣园的《动员

起来》，是最好的例子，而且延安经验也证明这样做是很成功的。

希望前方的文艺工作者学习晋察冀的经验，使新的文艺运动在前方各地大大的开展起来。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4月23日；署名：崇基）

《惯 匪 周 子 山》

(1944.5)

鲁艺文工团的《惯匪周子山》，在延安演出三次以上了。很多的群众，已学会了剧中的歌曲，绥米一带流行的道情调，这一下在延安也可到处听到了。延安的秧歌剧多用郿鄠调，道情调一来，群众会觉得新鲜有味，这是流行的一个原因吧。但更重要的，还因为《惯匪周子山》是个好剧本，编得好，演唱得也好，群众爱剧中的情节，也爱它的歌曲。

用民间歌曲，正面表现革命与战争的壮烈场面，在以前还没有人试过。有些人认为不容易，有些人根本怀疑这种可能性。《惯匪周子山》的成功，证明这样的怀疑只是一种成见，是对于民间文艺潜伏力量缺乏认识的错误观点。民间歌曲在旧社会里常表现被压迫的痛苦和调情的内容，在新秧歌里可以表示生产，表现二流子转变，难民起家，军民互助等多方面的内容，而处理得法，如《惯匪周子山》，也可以表现革命与战争，并且表现得那么紧张热烈，使观众自身也仿佛卷在暴风雨当中，随着戏剧中革命的成功和失败的情节变化，而产生出欢喜或忿怒的情绪，使人爱革命，爱革命的英雄人物，恨革命的敌人和破坏者。这是鲁艺文工团下乡的一个最大收获，也是延安新的戏剧运动的重要收获之一。

《惯匪周子山》的主题是防奸，它表现了一个带有旧社会污点的，为个人打算而“不实心干革命”的投机分子周子山，在反动势力的威胁利诱下而变节，成了革命的内奸。它表现革命群众的

力量，粉碎了敌人的内奸活动。《惯匪周子山》反映了陕北革命的一段历史，它是以革命历史戏的资格得到群众的欢迎。它反映了革命事业的一段艰难缔造的过程，激发观众珍惜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它表现了革命群众怎样与外部的敌人和内部的破坏者进行斗争，以及在这斗争中他们的机智和勇敢；当表演到革命群众纷纷挂上红带子，向反动势力的营垒进行总攻击的场面时，观众没有不兴奋鼓舞的；这种轰轰烈烈的剧情，使观众感觉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不由的生出无限的革命信心。

用革命历史进行教育，是很有力量的教育，我们建议戏剧工作同志们在这方面要多用些力。已经有了《惯匪周子山》的成功经验，就可以更进一步来创造一些其他题材（特别是正面英雄人物）的革命历史歌剧。譬如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造者刘志丹同志的事迹，不是应该在戏剧里表现的吗？同时群众不是也很愿意看到这样的戏剧吗？以表现革命领袖的事业，来教育群众，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的一个重要任务。

边区文协要奖励这一次戏剧工作中的优秀作品，《惯匪周子山》将和《血泪仇》、《模范城壕村》、《逼上梁山》、《拉壮丁》等几个好剧本同列在第一奖之内，这是我们很赞同的。希望这一次奖励推动更多的好创作出现，而革命历史剧也包含在内。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5月15日；署名：崇基。曾收入《论文化和艺术》）

改善家庭关系，建设新家庭*

(1944.7—8)

在陕甘宁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劳动农民家庭里，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几千年来中国人民的家庭从未有过的现象：在家庭的内部关系上（父子、婆媳、兄弟、男女之间），渐渐形成着一种民主的关系。从许多新闻报道里，我们看到，民主的家庭会议，被一些家庭采用了（本报今年3月14日第四版所载李树厚家，6月2日第二版载靖边劳动英雄王国保家，5月5日第

---

* 这篇稿子是艾思奇于1944年7—8月间撰写的。现题为毛泽东所改，原题是《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建立在家庭里》。当时，艾思奇任《解放日报》副刊部主任。1944年，是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开展大生产运动的一年，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改造封建家长制的旧家庭、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式家庭的新气象。《解放日报》从1944年5月至8月，连续报道了很多新式家庭的典型。为了广泛宣传这种新式家庭在抗日根据地人民生活中的意义和作用，《解放日报》社编辑部决定由艾思奇起草一篇社论。文稿写好后，艾思奇将稿子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长的张闻天审阅。张闻天对文稿做了一点修改，批注了一些意见，随后送毛泽东阅示。毛泽东十分重视，从标题到内容作了很大修改（文中黑体字均为毛泽东所改，方框中的字为毛泽东所删去）；并批示："此文不发表"。1944年8月31日，毛泽东致《解放日报》社长博古的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第237—239页）中，说明不发表的原因，是观点有所不同，"改的与原文各部分颇不调和"。1945年底，艾思奇撤离延安时，匆忙间遗失此稿。于光远同志时任《解放日报》评论部主任，兼管党支部的保密工作，撤离前检查时，发现了这份由艾思奇用毛笔撰写的经毛泽东用毛笔修改的原稿，一直妥为保存，并加整理，于20世纪60年代送交革命博物馆。这是一份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文献，今收入本书。

三版晋察冀王世兴、张树风家)。由于采用了民主的方式，改善了家庭关系，使家内关系和睦起来，家庭经济发展起来(襄垣李来成家、安塞赫起荣家)。家庭关系的改革，解放了家庭中的生产力。最典型的是今天本报所载的庆阳蔡德旺家和襄垣李来成家。他们的大家庭，因为贯彻了民主作风，因此，与旧式封建家庭纠纷重重的情形相反，是充满了团结、和谐、尊长敬老、勤劳互助、人兴财旺的幸福空气，并且影响全村，使周围别的家庭也来学习它。这些新的现象，虽然还只是开始发[出]现，还不普遍，但已足够给我们很好的启示，使我们看出在新民主主义政治之下的家庭问题解决的[新]方向。

像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国家，一直到现在，仍是以**分散的**家庭**个体经济占着优势**，在社会关系上家庭的作用仍是很大的。①历来封建统治阶级及其代言人，都非常重视家庭关系，他们努力建立适合于封建统治要求的家庭制度，这就是家长专制的旧家庭制度，这种家庭制度在中国普遍地存在，使封建社会获得根深蒂固的基础。因此，当二十几年前，“五四”运动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号召彻底反对封建的旧中国时，家庭问题就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而被提出，而反对旧式封建家庭的任务，就被看做争取民主中国的战斗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侧面。另一方面，反动的封建势力的维护者，则用一切方法反抗着这一潮流，在思想上想把旧家庭制度神圣化、永久化，说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说这是不可改变的制度，这样来为旧社会作辩护，这样来反对民主主义，说民主是中国不需要的，是不合中国国情的，是“赤化”等等。在家庭问题上的对立和斗争，是与“五四”以来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发展分不开的。

从“五四”以来，我们对于家庭问题的解决方向，曾经号召

人民反抗旧家庭，走出旧家庭。现在，在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样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环境里，我们的要求却是改善家庭关系，建设新家庭。②

"五四"新文化运动，曾经号召青年男女知识分子反抗旧家庭。当时，半封建势力是国家社会和家庭的统治势力。青年男女，不但在社会上找不到民主自由，而在家庭里，首先就受到封建家庭制度的束缚和压迫，成千成万的优秀男女青年，在封建旧家庭制度下，牺牲他们的前途、幸福和生命。作为当时民主革命先锋队伍的青年男女，必须首先脱离封建家庭的羁绊，才有可能参加到革命运动的洪流之中。因此，反抗旧家庭的运动在当时的确起了很重大的革命作用，许多先进战士，在这一个动员令下，在某种意义与某些情况下，都做了旧式家庭的叛徒，这是不可免的，也是完全需要的。现在，在一切存在了这种严重封建束缚的情况下，还是有这种必要的。民主革命的目的，就在脱离封建压迫，解放人民，建立近代民主的工业社会，中国正是向着这个历史任务前进。③

但在今天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我们有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我们面对着的家庭是新的农民的家庭，是劳动者的家庭。在我们的区域里，议会与政府的选举，抗战的兵役动员与勤务动员，各种民众团体的组织，工厂的组织，自卫武装的组织，合作社与变工队的组织，党校、识字组、秧歌队等文化团体的组织，以及各种临时集会（例如联合国纪念日延安四万人的群众大会）等等，都把分散的个体家庭的成员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按照各种不同的情况与程度，使他们集体地组织起来了。在这里，一方面仍是家庭，一方面却以个人为单位组织成为许多新式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团体，个性被极大地发展了。这

样，就改变了社会的面貌，也极大地影响了家庭。而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发展生产，则成了这种改变的经济基础。我们的情况既已如此不同，因此我们不能以“五四”以来的旧观点，来对待现在这里的家庭问题。不是要反抗家庭，走出家庭，而是要巩固团结家庭，使每个农民，每个劳动人民与每个抗战分子的家庭成员都能团结一致，同心协力，成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有力分子。

生产运动的开展，首先就需要我们有这样巩固团结的新的家庭。因为我们现在的经济仍然是农村经济，我们发展生产的基础，仍是以分散的农村家庭为单位的小农业生产和家庭手工业生产。因此，我们必须能够在家庭里，动员每一个男子努力农耕，每一个妇女参加纺织，并动员一切老幼担当起他们所能胜任的生产职务，这样，使农民劳动者家庭的经济发展起来，才能发展整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经济，并在这个经济基础上去进行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动员。因此，我们就需要团结和谐的家庭，需要家庭的男女老幼能够同心同德、勤劳互助、共同努力于生产事业与抗战事业，使每个人的个性能够发展。因此，团结家庭，使每个家庭都成为有力坚强的生产单位，进一步建立与发展各种集体活动，在现在战胜共同的敌人，在将来建设和平的社会，这就是我们对待家庭问题的正确方针，就是群众所欢迎的方针，而反抗家庭，脱离不务生产，用过去对待不同情况“五四”以来的，对我们已经不同了的观点来对待今天这里的家庭问题，就是错误的，为老百姓所不欢迎的，对于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建设有害的。

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农村现有的家庭状况，不必加以改造，就可以达到团结巩固的目的。正是相反，我们需要改造家庭。我

们的农村的家庭，虽然与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家庭不同，在我们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条件下有了新的内容，但两千多年封建统治的严重影响，使它内部仍保留着家长专制制度的残遗。有这种残遗之存在，就会妨害家庭关系的真正巩固团结，就会妨害家庭经济的顺利发展，也就会妨碍抗战建国。因此，必须加以改造，在家庭内部建立民主的关系，才能免除这种弊害。

旧式家庭制度为什么会有妨碍家庭的巩固和团结，为什么会妨害经济的发展与妨碍抗战建国的事业呢？

旧式家庭制度是按照封建的等级制度建立的。在这种家庭里，作为家长的父母或其他管家人，享有绝对的统治权，而子女，尤其是妇女，则被放在无权利的地位，父子、男女的关系有些像君主和人臣民的关系，这就是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父母对于子女，即使为所欲为，仍不致受社会道德的责怪，因此有“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的成语。子女在父母面前，则必须准备牺牲一切，甚至于自己的生命。子女是不应有政治自由权利的，因为孝道是在于“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是要“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如果子女有违反了父母意志的政治主张，那就算是不孝。子女是没有财产上的自由权利与平等权利的，子女有孝养父母的义务，而“父母在，别籍异财”，就被认为“十恶”中的“大不敬”即“不孝”的罪行，在满清的律例里，还要受法律的处分。子女的人权也是不存在的，打骂自然算不了什么，就是“父命子死，不得不死”，也成为道德上的当然的律令。至于妇女，《礼记》上就有这样的定义：“妇人者，伏于人者也”，因此在人格上要受到“三从四德”的束缚，在经济上，则有“子妇无私货，无私蓄，不敢私假，不敢私舆”的戒律（《礼记·内则》），人权财权在法律上、道德上都是被剥夺了的。这些旧经典旧法律上的规

定，自从资本主义在中国发生与发展以后，事实上有了许多的变动，但是严重的封建宗法遗迹，依然存在；我们新民主主义占优势的区域，这种封建形态被破坏的更厉害，但是遗迹还有存留。又，这种家族等级制，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内部与农民阶级内部各有不同，在前者是等级森严的，在后者，虽亦有家长制，但是家庭内部民主商量的成分还是有的。这是经济条件决定了它们的这种不同。

我们再看在政治上，中国的旧封建统治者，是非常重视这种家长专制的家庭制度的，因为，这样的家庭，是他们社会统治的基础，同时又是他们训练干部的学校。依照封建道德规矩来进行“修身、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这被他们看做人才晋升的理想的步骤，“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成为他们选拔干部的一个方便门径。就是为着这些原因，所以目前的反动派，中国的独裁政治的拥护者们，还总是要拼命宣传“修、齐、治、平”的一套封建思想。

然而，家长专制制度虽然便利于封建的剥削阶级的统治，但对于抗日战争、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的要求，是非常有害的，对于家庭的团结也是非常有害的。

不论封建的社会道德怎样表扬这种不平的制度，把旧家庭内部一部分人的无权地位加以合理化以至于神圣化，但物质的不平，决不会因为精神的粉饰而被泯没，被压抑的家庭成员的不满状态，是与这种制度的存在共始终，随着它的发展而加重的。封建家庭愈是繁荣增大，则内部的不和愈是激烈，这是一定不移的规律。当着经济利益的分配，为着家长继承权的争夺，兄弟可以变为仇敌。妇姑勃豀，叔嫂斗法，争风吃醋，勾心斗角，是每一个封建大家庭里不可少的家常便饭。权利不平和明争暗斗的局面，必然会减

弱家庭成员的生产情绪，而增长怠工、游惰、浪费、损坏公共利益的倾向，必然阻碍家庭经济的发展以至于使之衰落，封建家庭愈大，纠纷益多，经济破产愈更容易。这也是一定不移的规律。**这种情况在大后方当然是普遍存在，就是我们区域也还是有很多存在的**。这种制度的残余如果仍保留在农民的家庭里，是必然会妨害家内的团结和经济发展的。只要看没有改造以前的李来成和郝起荣家的例子，就可以看出旧家庭制度残遗的弊害的一斑。

几年来的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动员起广大的劳动力，参加到生产战线上来，普遍的男耕女织，老人幼孩，也担负了一定的劳作。无数以前在生产上曾经是无足轻重的人员，现在在家庭里和社会上都有了相当的经济地位。妇女在生产中作用的提高尤为显著，若干妇女劳动英雄被发现出来，与男劳动者竞取光荣。经济地位的提高，要求社会地位也有所改进。就家庭来说，一个家庭成员在生产中既担负了一定的任务，他在家庭关系上也必须受到一定的重视，例如对于家庭的生产计划及劳动果实的分配，他必须有相当的发言权，这样才能启发他在生产中的积极性。这就是说，生产的发展，要求家庭关系的改变，在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下，就必然要产生新民主主义的家庭。从新闻报道里，我们已经看到许多农民的家庭正在自发地进行着这种改革，而这种改革又大大地推动了他们的家庭经济向前发展。**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里，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们对敌斗争，这种改革更加普遍**。但**从另一方面**看封建制度的残遗，现在还在我们农村[民]的家庭制度里和思想里有相当深固的存留，这**不但**会成为阻碍我们的家庭经济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而且会阻碍抗日战争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起来**指导人民**改造他们的家庭，打破旧的关于家庭的封建观点，除去封建家长

专制制度的遗迹，建立新的民主的家庭关系。这是我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任务。

什么是我们所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的家庭关系呢？第一，在家庭行政上，应争取建立民主集中制度而废除家长专制制度。④家庭的经济计划，工作分配，检查督促等等事宜，自然需要有能力有经验的人出来领导，因此有威信、有办法的家长或当家人是必需的，不可少的。但家长的领导，应使家长们明白以一切家庭成员的意志为基础，他要能够集中大家的意见和要求，来决定管理家政的方针和办法。使家庭的每个成员对家内事务都有发言权，都有责任心，重要事件由家庭会议的民主讨论来决定执行。这样的家长，在大家庭里，也可以由家庭会议实行民主选举，不必一定要年老长辈照例担任（在那种长辈不适宜担任当家人的情况下）。对不能劳动的年老长辈的尊敬孝养，应作为年轻一代的共同义务。在民主的基础上，不是虚伪的勉强的而是真实的自然的“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的家庭关系便可以建立起来。有些人说，我们共产党人反对这种“父慈、子孝……”的家庭关系，是不对的，相反，只有我们的民主主张，才能建立这种关系。第二，应使家长们明白，在家庭经济上建立民主合作的关系。生产任务的分担和劳动果实的分配应使公平合理。各个成员必须依自己的能力分担一定的工作，在总的家庭生产计划中担当一定的任务。反对寄生者和懒汉（不能劳动的长辈及需要抚育学习的小孩除外）。在生产中适当地采用集体劳动和变工互助，在分配上实行“公私兼顾”、“公私两制”、“先公后私”的原则⑤（像现在学校、机关、部队中所实行的那样）。妇女都参加生产劳动，并允许积蓄自己的私房。对生产节约超过任务的给以分红或奖励，家庭账目公开，生产计划的决定和完成任务的检查都通过家庭会议的民主讨

论。第三，必须能够帮助别人，帮助政府同军队，照顾自己“小公家”之外的“大公家”。帮助抗属，帮助荣誉军人，帮助移难民，参加抗战动员，参加武装组织，参加各种必要的社会活动，参加变工互助组织，帮助别家改造懒汉二流子等。例如李来成家，对于帮助别人的好的家庭成员特加奖励，这是值得学习的作风。

以上三项就是关于民主新家庭的要点。实行时，必须通过群众的了解与自愿，党的工作人员负提倡劝导之责，任何强迫命令都是不许可的。

[原稿第一页上毛泽东同志还在旁边写了“红杠是洛甫打的”和“此文不发表”两句。]

注释：

①艾思奇同志的原稿上此处有这样一段“在我们的家庭里，有家庭政治、家庭教育、家庭娱乐等等的生活制度。这一套生活制度，是以家长制的精神贯串着，构成从来的旧式封建家庭。封建的旧式家庭，是两千年来封建社会的基本单位。”张闻天同志在审阅稿件时删去了。

②此句艾思奇的原稿是“但是，在陕甘宁边区以及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我们对于家庭问题的解决方向，从‘五四’以来民主斗争中所要求的方向应该是有区别的，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新的环境、新的阶段上。以前的阶段，我们曾号召反抗旧家庭，走出旧家庭，现在的阶段，在陕甘宁边区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样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环境里，我们的要求都是巩固家庭，改善家庭关系。”张闻天同志改稿为“我们对于家庭问题的解决方向，从‘五四’以来，我们曾号召人民反抗旧家庭，走出旧家庭，现在在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样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环境里，我们的要求却是巩固家庭、改善家庭关系。”

③“在这一动员令下”后艾思奇同志的原稿是“都做了旧式家庭的叛徒，没有这一个动员的成功，今天讲的许多优秀的革命干部和领袖的产生是不可

想像的”，被毛泽东同志删去。

④张闻天同志在艾思奇同志写的“民主集中制”五字旁打了红杠，并且在页旁打了两个问号。

⑤艾思奇同志原稿中所写的“在生产中适当采用集体劳动和变工互助，在分配上实行‘公私兼顾’、‘公私两制’、‘先公后私’的原则”旁，张闻天同志打了红杠，并在页旁打了三个问号。

美术工作与群众的进一步结合

(1944.8)

今天登载了三边几位同志关于美术工作的文章，很值得我们注意。那里的美术工作同志，在抗战七周年纪念宣传活动中，创造了许多重要的新方法，使美术工作更密切地和群众结合起来，这些方法，是值得推广，值得发扬的。

在边区，由于文艺工作者努力实践了毛主席所指的方向，两年多来，文艺工作是的确向群众深入了。然而就文艺各部门来说，发展是不平均的。直到现在，成绩最大的是秧歌剧，其他的文艺部门，比较起来还是不够得很。就美术方面来说，我们不能否认，美术工作同志们是努力的，相当的成绩是有的。例如我们现在已有优秀的，堪称全国第一的木刻，在纪念节日有很多宣传画，去年的生产展览会及今年的卫生展览会上有许多好的连环画，美术工作同志们为劳动英雄画像，有些同志在乡下为老百姓作画，都得到群众的欢迎。但比起秧歌剧来，与群众密切结合的程度仍大有逊色。这原因，固然由于秧歌剧有它的特点，使它容易为群众接受，而其他文艺部门却没有那样便利的条件，但并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其他文艺部门，如美术，就始终应该比秧歌剧更少为群众所爱好。因为文艺部门本身的特点决不是最主要的原因，而最主要的，应该还是在于美术工作者本身是否找到更好的与群众结合的方式的问题。

现在，三边的美术工作同志们的方法，证明要使美术更深入

群众，的确还有许多新的道路可以开辟。他们的方法，已经在今天登载的文章里有了总结，它的基本要点：第一，是要使美术创作的内容反映群众的实际生活，第二，是要多用连环画的形式，克服单幅画面在表现上的限制性，第三，尤其重要的，是与其他文艺形式和宣传方式结合起来，使画的内容容易为群众所充分了解。

用了这些方法，美术宣传工作就大大为群众所欢迎，尤其是美术与音乐结合的方法！“斗争洋片”和“图画大鼓”，它的受群众欢迎的程度，看情形是不下于秧歌剧的。“洋片的观众，每天总和潮水一般热闹，其中尽有的是重复过很多次而还觉得恋恋不舍的观众。”这显然已经是为群众十分“喜闻乐见”的情景了。

农村群众是喜欢综合艺术的，秧歌剧之首先为群众接受，在形式方面的第一个原因就由于它是把歌、舞、音乐、戏剧熔为一炉的综合艺术。美术是依靠静止的有限画面来表现生活，虽然比起文学来，在群众前面它少一重识字的阻碍，在这一点上它是较容易接受的，但是单单依靠它的画面，来表现复杂多变的生活，是不容易的，这是美术形式本身的限制。要克服这困难，使群众在美术创作前面能看见更多的生活内容，需要其他文艺形式和宣传形式的帮助，使美术工作也成为综合性的文艺工作，这样才适合群众的情绪和要求。三边工作同志就在这一点上有了新的创造，并获得了很大成功。

希望美术工作同志多多学习三边同志的经验，例如在延安，去年的生产展览会和今年的卫生展览会以及几次群众大会上，如果用了这些方法，那效果一定不知要大若干倍。今年冬季的劳动英雄大会、生产文化教育展览会以及骡马大会上，我们期待着延安的美术工作同志有新的活动，而这些活动所采用的方法，应当更

适合于当地群众的接受程度。例如洋片演唱不一定用河北话，大鼓不必要“京音”，而适应当地情形采用陕北普通的方言等。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8月28日）

祸首

(1944.10)

天灾人祸，常是孪生兄弟，在历史上如此，现在也仍然如此。河南在今年日寇进攻以前，就有“河南四荒，水、旱、蝗、汤”的民谚，这不但反映了天灾人祸的联系，而且反映了两者怎样地联系：“汤”者，河南地方当时的首脑人物也；人祸以汤代表，言制造人祸者，乃国民党寡头专制政府之统治者也。

人祸天灾，又是以人祸为首。专制政府制造了人祸，同时就加强了天灾。如果没有自私自利、丧心病狂的统治独夫们作祸国殃民的买卖，天灾决不至一发而不可收拾，如河南的情形那样。华北太行地区，和河南只有一水之隔，也遭遇了连年的灾患，同样是水、旱、蝗各色俱全，其来势有的地方比河南更凶。不同的是少了一个“汤”祸，多了一个“皇”祸，但因为有八路军和抗日人民政府在，“皇”祸既蔓延不起来，水、旱、蝗灾的凶劲，也出乎几千年历史的老例，一样一样的在政府与人民合力之下被压伏了。同是灾荒，河南三千万人民在它前面只有一条死亡流离的道路，太行在扑灭天灾的斗争中，无数的移难民却被收容救活了，还包括河南逃来的五十多万，这就因为河南的国民党统治者，是人祸之首，而太行却有能够抵抗“皇”祸的人民自己的政府的缘故。

国民党一党专政已经是中国人民的灾难了。这样说决不是“故作惊人之谈”，而是全国全世界人都看得见的平凡的事实。说起来自然不免令人有些不寒而栗，无如总还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当

权要人的一篇演讲，一个声明，往往就预示着几千万甚至成万万人民的血和眼泪。例如现在又声明“全国丰收”了。很明白的，既然年成已被钦定为“丰收”，那么，如果事实上并不丰收，而是荒歉、穷困或力量不能支压苛重的敲诈勒索，都在违反“政令法令”之列，要受到“明正典刑”的处分了。在好听的名词后面，藏进无量的杀机，这是专制主义者传统的绝妙艺术！

制造灾难者决不能消灭灾难，所以对于“皇”祸就没有办法。河南、湖南今年可耻的败绩，是最好的明证。“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是不可原恕的罪恶，如果提倡“法治”者有一丝一毫以身作则的“守法”思想的话，就首先要自己承认这一个滔天大罪，并立刻向全国人民请求惩处！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10月25日；署名：奇）

"军人乐"

(1944.10)

凡知识分子，自然都会有些知识的，但有时也会变得好像毫无知识。例如有人指鹿为马，硬要做一篇文章，来证明鹿的确是马，有真理良心的知识分子，在这种时候，无论怎样博学，都靠得住要交白卷。暴君魔王经常把些下劣愚笨的谎言当做真理，为的要证明暴行合乎仁义道德。如果在他势力范围下的知识分子觉得不对，不能照做文章，一定要被斥为糊涂，不识时务，并且也许就有去掉脑袋的危险，或者被集中到什么地方去受一番教训。

例如现在是抗战期间，做人民的应该以从军杀敌为光荣，这是最简单的道理，对知识分子，是最起码的知识。然而当国民党在大后方号召十万知识青年从军时，知识青年忽然好像变成什么也不懂的傻瓜了。你看这个运动搞得多么吃力，对内有省、市、县青年从军委员会的组织，对外有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牛皮，要人签名，"领袖"演讲，新闻宣传，电台广播，哄哄嚷嚷，好不热闹，最好看的，是蒋委员长竟也不顾惜尊贵的脸面，把自己少年时代在军阀部下当兵的烂底子也翻了出来，说明从军是"生平最快乐的事"。这样现身说法，可谓大众化了，足以显见蒋委员长盼望青年的苦心。而我们的知识青年竟那么难于开导，好像现在还不领悟，从军的应征者竟是寥寥无几，呜呼，我为蒋委员长，也不能不大叫："其愚不可及了！"但这是蒋介石和国民党统治者的看法，知识青年们却是另有一番见地。

从军可能是最快乐的事，也可能是最光荣的事。但并非一切从军的行为都值得人引为快乐和光荣。抗日从军是光荣，杀敌致胜是快乐，但在狗肉将军屁股后面从军，在残害人民的军阀如张宗昌之流的部下当兵，却是绝对的晦气！蒋介石对自己的少年从军时代，是否真的曾经觉得那么快乐，本来就值得怀疑，就算无可怀疑，那也只是军阀内战时代某一少年的糊涂思想，哪能作今天革命知识青年的典型？但蒋介石竟然以此作为典型，无意中自己坐在张宗昌的地位上来说话。这叫知识青年听了毛骨悚然则有余，要人从这里面找到什么“最大的快乐”，则无异说冬天的冰雪里有暖气，除了疯子，谁会相信这些鬼话！

中国知识青年完全懂得从军的快乐和光荣，但这只限于参加革命的正义战争。在革命战争中慷慨赴义，是中国知识青年光荣传统。在这种时候，他们是不声不响地埋头苦干，用不着那么吃力的动员，用不着煞有介事地，像那些有逾节保险的要人们一样，假惺惺地签名登报，到处张扬。大革命初期的广东，抗战初期的延安，就有全国千万青年前来从军，并没有谁故意去推动。知识青年的知识之可贵，就在于懂得什么是真的革命，但现在号召知识青年从军的是这么一个不三不四的政府和统帅部，它的练兵成绩，是勇于反共反人民，怯于反对民族敌人，它擅长的战略战术是叉手观战和连续不断的退却战，它不三不四，非鹿非马，名义上做民主国家的朋友，实际上是法西斯魔鬼的门徒，这样的政府和统帅部，如果说也有资格在盟国中“分担作战任务”，有能力保证对敌战斗胜利，那真可以使天下的真知识都宣告破产！在这样的政府和统帅部下面，要知识青年相信蒋介石等人的那一套“军人乐”的道理，要他们对国民党所努力的那一套运动不表现冷淡消极，那除非他们的思想忽然倒退到迷信时代，相信世界上真的

有神怪故事，或者被逼丢掉了真理的良心，承认“指鹿为马”是神圣的知识。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10月31日；署名：奇）

改变面目改变脑筋

（1944.11）

回顾历史，就容易看出一件事情的意义和地位。例如在边区，我们是认真的在做群众的文化运动了，能够走到这条路上，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几千年来，老百姓都在黑暗愚昧中过日子，封建统治者不容许把文化的光辉射到他们身上。二十几年前有五四运动，提倡“平民文学”，第一次大革命后又有“大众化运动”，都有不可磨灭的成绩，但始终没有把文化运动真正推到知识分子的圈子之外。有的人开玩笑，说这仍是属于“小众”的范围。

只在有了陕甘宁边区这样的地方，情形才是两样。现在在开边区文教代表大会，证明我们这里才有真正名副其实的大众文化工作。土生土长的工农兵出身的文化工作者做了代表，与知识分子一起，表现自己的才能，贡献自己的经验，共同讨论提高边区一百多万人民的文化程度的问题。

没有边区这样的政治条件，要开这样的会是不可想像的。什么叫提高老百姓的文化程度？就是要老百姓变得更聪明，更懂事。聪明和懂事的老百姓，对于专制主义者是可怕的敌人，因为聪明和懂事的反面意义，就是不受欺骗、剥削和侵略。所以凡是专制主义者统治的地方，群众的文化活动就要受到各种各样的阻碍，为人民服务的文化工作者就要受压迫，热情的嘴就要被封闭，正义的笔就要被剥夺，战士的人身自由就要被侵害，就要被逮捕、监禁、放逐，以至于杀害。在这种情形下，志士仁人要与他们所热

爱的人民接触，是非常困难的。不幸除了边区以及和边区相同的敌后解放区之外，在中国政治上从来就没有脱离专制主义者的统治，这就是为什么新文化运动长时期不能跳出知识分子圈子外的基本原因之一。

什么叫民主？就是要老百姓做主，而且是做国家之主。愚昧的老百姓，做一家之主也困难，怎能做一国之主。为了迷信巫神，就是在边区，也往往有老百姓弄得财破人亡，毁坏了辛苦建立的丰衣足食的家计。只有让老百姓聪明起来，才善于自己建立家务，管理国事，反抗法西斯强敌。因此一个真正的民主政治运动必须同时，或者先有一个文化上的启蒙运动，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府必须不但不害怕，而且要努力使老百姓的文化程度提高起来，使他们聪明，善于了解在自己的立场上应该做些什么和怎样做。如果不是这样，如果这个政府是实行愚民政策，压制言论自由，提倡封建迷信思想，反对进步的真知识，那么，即使讲了非常好听的宪政的诺言，也一定是假的，即使一千篇声明不反对民主，也是没有人相信的。这个假民主的玩意儿，从满清末年以来，专制政府已做得很多。中国人民已经很能看破其中的欺诈。现在来要这样的花头，明明是愚笨，骗不了人了。但专制主义者到今天已经是“黔驴技穷”，除了这样的照例一套，实在也要不出更多的花头来；最多也不过在欺骗之上再加暴力，逼着你心里不信也得要嘴里说信。重庆 9 月 24 日各党派四百多人要求改组政府的聚会，会后有些发言人都被迫更正自己的说话内容，就是这样的一幕趣剧。但这仍然是老一套把戏，作用也最多只能暂时塞人的嘴，不能服人的心。

在边区，人民的愚昧和文化落后，是旧社会反动黑暗势力的残遗，我们的民主政府把它看做敌人，要动员起一支有力的文化

军队，来向这敌人宣战。文教工作代表会议就是动员会议，并且在这里决定战斗的策略。经过文教大会，把知识分子和工农兵文教工作者团结起来，把文化上的新旧形式都应用起来，对共同的敌人斗争——就是毛泽东主席教我们要坚持的方针。

边区文化工作同志的斗争是艰苦的，参加大会的知识分子和工农成分的代表，有不少曾经埋头苦干了七八年，才得到某些具体的成绩：或是打破了一村的迷信，或是消灭了几百个文盲，或是改造了民间的秧歌，或是组给了老百姓喜欢的剧团。我们的文化工作者在极困难的物质条件限制之下，一点一滴的努力，才慢慢凿穿几千年封建社会囚禁老百姓的黑暗的牢墙，让知识的光辉，一线一线地放射到老百姓的眼前。

我们的努力，使中国出现了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新农民，他们不但在物质上卸脱了穷困的枷锁，在精神上又开始突破了愚暗的网罗。作为主人，作为民主的政治经济建设者，作为保卫国家、解放民族的战士，他们已开始能掌握文化的利器，来改进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他们正在扫除从来农民固有的保守、固执、安于落后等等陋习，成为光明和知识的追求者了。通过读报，分散闭塞的农村成员，能够在相隔数百里之外互相交换经验，他们能够关心到别的村庄有些什么进步，政府有些什么号召，国内政治怎样，国际情况如何。新的秧歌，使他们学到了生产、防奸、养娃、卫生等等新的知识。新的学校，使儿童和成年人学到了许多在农村生活中有实际用处的东西。新文化的内容，告诉老百姓自己就是边区的主人，人民、军队、政府是一家，这一家人要怎样团结，互相帮助，共同努力求得全家的生活富裕，身体健康，人口繁茂。新的文化运动，已经为老百姓所接受，并引起了他们的兴趣，许多农民已能够热烈追求知识，他们爱好新事物的如饥如渴的眼光，他

们的进步精神，有时会使人回忆起五四时代的新知识分子。老百姓自己中间也产生了启蒙工作者，他们用自己所熟悉的旧形式，来反映、歌唱新的民主社会的政治、经济内容，来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黑暗、愚昧、疾病作战。他们中间有中医，有老艺人，有私塾先生。他们有的就成了今天大会上的代表。

愚昧的黑夜渐渐淡薄下去，昏睡的人们愈更清醒起来，这是边区群众的新生活中“文化翻身”的景象。老百姓正在改变着面目，改变着体质，也改变着脑筋。老百姓愈更聪明，有能力，民主的中国就愈更有坚强的基础．就更有力量战胜法西斯恶魔。在这里，文化工作所占的地位是很重要的，我们等望着边区文教工作同志更大的成绩。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11月6日；曾收入《“有的放矢”及其他》和《论文化和艺术》）

“中国大众的立场”

(1944.11)

不久以前,《解放日报》转登了重庆几千人追悼韬奋先生的报道。读了那报道,不由的联想起1936年鲁迅先生逝世,上海的千万群众公葬时的情形。人物不同,时地不同,国内外情况也不同了,但仍有些共同的东西,使人容易发生联想。第一,抗战前那种闷人的空气,如群众在鲁迅先生公葬时所表现的悲愤沉郁的情绪,显然又在重庆出现了;第二,一个文化工作者的死,使千百万人有如此痛惜哀悼的表示,除了鲁迅先生以外,也不曾有过。

韬奋先生的工作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影响?他为什么能受到广大人民如此深切的爱护和关心,这是值得我们深思追念的。

从第一次大革命前后起,韬奋先生就开始了写作的生活,差不多二十年的期间,他几乎每天不停笔的工作。这是中国政治上多变的期间,是中国民族灾难深重到极顶的期间,同时也是中国人民为自己的解放进行了空前激烈的斗争的期间,这里有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建立,有“剿共”和军阀内战,有九一八事变,有全国人民的爱国运动和救国会活动,有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抗日的号召,……在这中间,韬奋先生的工作,是跟着人民的斗争而不断前进的。他抓着了人民政治上生活上所遇到的许多问题,给予了适当的回答,他的影响之所以能很快的扩大起来,就因为他的文章,能够反映斗争中的中国广大人民的要求和情绪。

韬奋先生常说自己的立场是“中国大众的立场”,他是名副其

实地站在大众的立场上工作的。他自称为“新闻记者”，同时他也的的确确尽了公正的新闻记者的义务，把自己的文章，严格地用作民众的喉舌。在中国，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这不但要有为群众服务的满腔热诚，要有不屈不挠主持正义的坚定节操，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能实事求是，善于了解群众的切身要求，体察人民的思想情绪，为群众说出他们心里真正要说的话。要这样为民众代言，是一件极吃重的工作，必须出以很大的努力，用全副心力来对付，如果仅仅凭着知识分子的主观兴趣，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要想被称为人民的作者，那是靠不住的。

在他的自传性的《经历》一书里，讲到他怎样编辑《生活周刊》时，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苦心呕血的情形，“每期的小言论，虽仅仅数百字，却是我每周最费心血的一篇，每次必尽我心力就一般读者所认为最该说几句话的事情，发表我的意见，这一栏也最受读者注意，后来有许多读者来信说，他们每遇到社会上发生了一个轰动的事件或问题，就期待着这一栏的文字。其次是信箱里解答的文字，也是我所聚精会神的工作。”

“聚精会神”研究怎样说出读者群众所要说出的话，解答读者所提出的问题，这是韬奋先生工作的力量的泉源。必须有这种集中的努力，才有可能使他密切地和“大众”站在一起，成为一个最好的新闻记者（虽然新闻记者只是他的职业的一部分），使他能正确地替人民说话，而为人民所爱护，使我们能够在他身上，看见新闻记者的职业的光辉——这一个职业，在一些为法西斯主义及专制主义歌功颂德的新闻界败类身上，是被渎污了。

知识分子走向大众，是有一定过程的。他首先必须清算了自己思想中的各种个人主义的因素，然后用集体的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韬奋先生也不是天生的大众思想家，他并不是有什么超

人的特点，他的最大的长处，不过是虚心学习，勇于批评和放弃一切不适合群众需要的思想，热烈地追求和接受对人民有利的新事物和新思想。他的学习，主要是在群众中，在工作中，他没有个人的虚伪自尊心以及各种主观成见的包袱，只有为群众服务的高度责任心，和不断追求有益于人民的新知识的热烈欲望。"我个人是且做且学，且学且做，做到这里，学到这里。"就是这一种责任心和学习的精神，使他的思想能够经常进步，能够不断地愈更密切地和大众靠拢起来。在早年参加职业教育社工作的时候，他就已经善于在群众生活的实际情况中学习，并根据实际观察所得，来校正自己的思想：

"在各处接洽若干中学举行职业指导周运动，我所感到兴趣的是乘着这个机会和各地青年谈话，并到各处观察观察社会的情形……可是说来也许有点奇怪，我愈研究职业指导，愈在实际方面帮着职业指导呐喊，愈使我深刻感觉到在现状下职业指导的效用有限，愈更使我想逃出职业指导的工作……说句笑话，我在这里参加了职业指导运动，对于青年究竟有什么实际的效果，我实在不敢说，可是对于我自己确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这现实的教训使我的思想不得不转变。"(《经历》)

职业指导为什么没有效果呢？他的思想是怎样的"转变"了呢？他后来解释得明白：

"现在不是由个人主义做出发点的所谓独善其身的时代了，要注意怎样做大集团中一个前进的英勇的斗士，在集团中能获得个人的解放。关于这一点，有一点虽然细微而却显明的事实可以做例子。从前实施所谓职业指导的人们，总是把应该怎样努力吃苦的话劝导青年，这对于当时有业可就而不肯努力不肯吃苦的青年说，当然不能算错。但近来有不少很努力很吃苦的青年，因为次

殖民地的经济破产，不是因他们自己个人过失而遭着失业的痛苦，指导者再对他们发挥‘拼命努力拼命吃苦’的高论，便是犯着牛头不对马嘴的毛病了。”（《大众集》）

能够向群众学习，能够接受“现实的教训”，能够依据现实的教训来“转变”自己的思想，就能够在思想上有开展、有进步，不至于钻进牛角尖，越钻越出不来，就会在工作上有创造、有改进，不至于停滞不动、因循敷衍、没有生气。韬奋先生的思想和工作，就由于有以上的优点，而能够表现出不断精进，不断创造的精神，而这些创造改进，归根结底，仍然以群众的需要、群众的利益为依归，适合于群众需要和利益的东西，就被采取，否则就要被突破、被打碎。就由于这些原因，韬奋先生能够使他所编的《生活周刊》迅速进步，由职业指导的刊物，进而成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从偏重个人生活修养的内容，转变为讨论社会政治问题的读物；由讨论一般社会政治问题的刊物，转变为事实上为救国运动的宣传和组织中心。每进一步，就会更深入地与中国人民大众的生活和斗争相结合，并获得愈更广泛的群众的拥护。

“聚精会神”为服务人民而工作，从“现实的教训”中虚心学习，从群众的实际要求出发，来创造工作、改进工作，这就是韬奋先生的思想和工作的力量的泉源，这就是韬奋先生自己所谓的“中国大众的立场”，他的大众立场，不是空洞的，而是有具体内容的，不只是说说的，而是在他的行动的不断的进步中得到证明的。

韬奋先生自己坚定地站在“中国大众的立场”上工作，因此，凡是能够真正为大众谋利益的人，他就热烈地引为同志。早在抗战以前，他就说过：“我的立场既是大众的立场，不管任何党派，只要它真能站在大众的立场努力，真能实行有益大众的改革，那

就无异我已加入了这个党了，因为我在实际上所努力的也就是这个党所要努力的。”谁是真能实行有益于大众改革的“这个党”？他是早已看得清白的，而在临死时他就正式宣布了，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他在死后的现在已经是一个共产党员了，而且他不愧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因为他的一生工作，也是真正做了许多有益于大众的改革。我们应向他学习，学习他的精神，学习他怎样实践“中国大众的立场”。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11月22日；《新华日报》1944年12月25日转载；曾收入《“有的放矢”及其他》）

降　魔

(1944.11)

《西游记》上的妖怪，牛魔王是最凶顽的一个，降服它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动员了无数的“天兵天将”，布置了“天罗地网”，才算把它困住了。先是哪吒用斩妖剑砍它的头，却没有用，砍了，脖子里又长出一个来，砍了，又长出一个来；一连砍了十几个头，还是白费力气。后来是取出风火轮儿，挂在老牛的角上，便吹其火，浑身上下烧，才肯改变本性，服服帖帖地“情愿归顺佛家也”。

这是荒诞的神话，但也是聪明的寓言。文学的想像，是在现实世界里有根苗的。世界上虽然从来没有过牛魔王，但人类中出现的恶棍，凶顽的程度也不比牛魔王差。古时的不说，单说今天，法西斯主义者的罪恶行为，就不知比牛魔王大多少倍。牛魔王虽狠，不过是霸占一个山头，做些拦路抢劫的生意罢了。法西斯却要撞到一切和平的家里，把人类的生命和快乐一概毁灭。要打倒它也真不容易，要动员全世界民主人民的总力量；要消灭它，同样也不是砍掉个把头就可以了事的。惩办罪魁，就是砍法西斯的头，这当然是要紧的事情，但更重要的，是把一切法西斯的根除尽。

欧洲的情形已经很显然，希特勒这一个头快要被砍掉了，但狡猾的法西斯蒂正在用尽一切方法准备，好在十年八年之后，又可以攒出第二个头来，以便再来制造一次屠杀人类的惨祸。现在的民主世界也有了经验，很懂得这个狡计，三国会议的决定，就是既要把法西斯拿来砍头，又要用新的民主政治的三昧真火烧毁

魔体。要彻底做到这一点，是今天全世界民主人民努力的目标。

为什么一定要努力?因为除了法西斯自己要拼命挣扎之外，在反法西斯阵营里，还躲着许多牛魔王的帮手。在南斯拉夫有过米海洛维奇，在波兰有索森科夫斯基等等。他们仇视人民力量，留恋专制主义，害怕世界上民主主义的三昧真火燃烧起来。专制主义就是法西斯牛魔王的脖子，只要有专制主义残留的一天，纵使希特勒和日本帝国主义都打倒了，法西斯野兽的头，仍还有从这里伸长出来的可能。专制主义者是最多只愿杀法西斯主义的头，而不愿烧毁法西斯的本性形体的，因为它害怕连带也烧坏了自己，但在这一点如果不彻底，便帮助了法西斯蒂。

对于现在的"天兵天将"，麻烦是多一重了。除了剿除牛魔王之外还要在自己阵营内反对牛魔王的帮手。而反对的方法，有些原则和对付牛魔王本身大致差不多，更重要的倒不一定是要去掉一两个头儿，而是要用三昧真火浑身上下烧，使之改变本性。例如在中国蒋介石统治区人民都要求实行民主，这也决不是简单换一两个头的问题。想用一两个部长院长的调任，来哄骗全世界和中国的人民，是没有用处的，因为现在的人民也有经验，很懂得这些狡计了。脖子里又伸出来的，仍是牛魔王的头，这是天下人的眼里看得清清白白的。牛魔王的本性不变，将来天下总不会太平。"变"就会"乱"么，恰恰相反，现在就是因为硬不肯变，所以蒋介石统治区就乱个一团糟，在日本法西斯进攻的前面打这样可耻的大败仗，就是乱得多么糟的证据。因此，事情是不能再那么苟延下去了。如果不肯自己让民主主义的三昧真火来烧一烧，那么迟早就会被人民怒火烧得一塌糊涂。全国人民要求的是真正的民主政治，而且不管你专制主义者愿不愿意，真正的民主政治是一定要实现的。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11月27日；署名：崇基）

打击与回击

(1944.12)

“一二·九”运动，已过到第九个年头了。

“一二·九”运动，是北平青年学生的救国运动，同时也是全国各阶级各党派蓬蓬勃勃的救国运动高潮的开端，是推动全国走上抗日战争的一个有力因素。

青年学生的政治运动，不是随随便便闹起来的。在“一二·九”以前，单就北平来说，有五四运动，有“三·一八”惨案，都是在政府正要签订卖国条约，或敌人的炮口已对准在中国土地和人民面前的时候，也就是民族国家处在危急存亡千钧一发的时候。青年学生为了自己和全国人民的生存自由，不能不奋起呼吁。“一二·九”运动前所处的情形更是危急，没有“一二·九”运动，全华北早就怕跟着殷汝耕实行“自治”之后，而被日本帝国主义兵不血刃的据有了。

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不怕水龙大刀的打击，不怕牺牲热血性命，在冰天雪地下，奔走呼号，这是哪里来的勇气？如果不是有比他们个人生命更加紧迫的需要，谁能这样“铤而走险”？一国的独立和生存问题，竟弄到要首由青年学生抛开案上的书本，走出平静的书斋，自己来打冲锋，找寻解决的办法，可以想见情势之危急，可以想见专制主义的当权者，在民族危机的前面是多么无能，他们因为自私自利，已经把国家的事情弄得一塌糊涂到什么程度了。

把持着军权、政权、财权等三大权的人，在这种情形下，还要污蔑青年学生是“不安分”、“别有企图”等等，其无耻的程度，已经很够人想像！但还要进一步用大刀、水龙，逮捕杀戮之类暴力来进行镇压，想用血和恐怖来污染青年学生们对民族和自由的热情，以为这样就可以歼灭这些热情！这简直是愚蠢荒唐的行为。这种暴行只有使悲愤的群众更加悲愤，纵然能在一时一地地给运动以打击，却会促成更大的运动爆发。“三·一八”的屠杀之后，跟着来的是大革命，“一二·九”的水龙大刀，打出了全国轰轰烈烈的救国运动。这是青年学生们在斗争中吃苦牺牲的宝贵代价，又是专制主义者罪恶行为的真实后果。

手无寸铁的人，并不就是可以欺侮的。当青年学生们挺身出来斗争时，跟着他们背后冲来的就是全中国人民不可战胜的力量。在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和民主运动前面，统治者只能选择两条路：或者把摆惯了的专制独裁的架子丢掉（这是很难的），规规矩矩向人民低头，让出民主的道路；或者执迷不悟，坚持着寡头专制的堡垒，而迟早却让人民运动的大浪潮淹没。要想永远躺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是做不到的。今天是“一二·九”的第九周年了，我们还可以在蒋介石统治区看见这样的例子：成都警察对于市中800学生给予打击之后，立刻就变成一个更大的回击，变成万余人的游行示威——历史规律之如铁一样的不可违抗，不是在这一件事实里又看得明白的吗？

“一二·九”的精神不死，它的光辉，一直要照耀到误国殃民的专制主义走向末日的时候！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12月9日；署名：崇基）

谈 面 子

(1944.12)

面子，本来只是遮丑的东西。妖怪的本形实在难看，所以每天早晨乘人不觉时，就要自己画一张美人的皮披在身上。愈是做坏事情的人，愈看重面子问题；愈是爱讲面子的人，愈靠得住总有些不可告人的丑事。“满嘴的仁义道德”和“满肚子的男盗女娼”之不能分开，并不是偶然，而是历来封建专制主义者的一切言行之总结。

法西斯主义者也最会讲面子。在疯狂地向前侵略、屠杀、劫掠的时候，会说这是在建立“欧洲新秩序”、“大东亚新秩序”，被打败了，弃甲曳兵而逃的时候，会说这是“摆脱战术”、“弹性防御”、“预定计划”、“什么堡垒”之类。物资不足就大吹其从阿Q学到的“精神战胜”，飞机缺少就用“撞击战术”助以驴嗥来吓唬人。失败临头不能逃避惩罚的希特勒，曾经不断伸出过“和平触角”，也曾准备飞往南美洲逃难。现在是话都说不出来了，但能说话的时候，仍然要假装硬气，说“决不投降”，“决不逃走”。

中国的专制主义者，承继了几千年的传统，粉饰面子的技术自然是很高明的。尽管“日蹙国土百里”，半年的短时间丢了三省以上的土地，却仍有脸皮自夸对于盟国战争有了什么帮助和贡献，并谴责别人帮助太少。对人民施行了残酷的压制剥削，特务横行，黑夜捕人，却能够毫无愧色的声明一向即主张实行民主政治。

对于爱面子的人，戳破面子，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原形

一旦为大家所知道，做坏事就不很方便了。于是面子问题就与生存问题分不开，谁要戳破了他的面子，他就要急急惶惶，找一切方法来弥补。试看最近斯大林同志把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面目轻轻戳穿了一下，小矶以下的敌酋就弄得多么窘态可掬！但这只是一种情形，如果遇到戳面子的是力量薄弱者，那么，青面獠牙一旦显露出来时，就索性毫无顾虑，用一口吞下的办法，把眼中钉消灭了事。这种事情并不少，证据是在这种威胁下，还使软弱的人们中间产生了一种偷生的哲学，叫做“明哲保身”。

在孤立无援而又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或青年学生面前，专制主义者有时也并不害怕戳破面子，但在全中国或全世界人民的面前，面子就非常贵重起来。成都万余学生的示威游行，为什么会使那些虐待青年的统治者慌张起来呢？一个重要的原因，而为他们自己也不由自主的惨叫出来的，就是“有碍国际观瞻”。对于没有骨头的政府，国际观瞻有时的确等于生命，而国内观瞻，受一点妨碍倒不算什么一回事情，因为他们这般想：“顽童”（某报对成都学生的称呼）们的事，反正可以关起门来施刑的，而在国际正义的阳光下面，恶鬼邪神就难乎用技了。

但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现在又轰轰烈烈地起来争民主自由了，“国内观瞻”也是不可以轻视的，国民党统治者们要清醒一点。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12月11日；署名：崇基；曾收入《“有的放矢”及其他》）

不 埋 没 人

(1944.12)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是中国的老话，但在从前，这不是真话。在旧中国里，各行之间就没有平等的地位。封建统治者把人分为士农工商等几大类，却把士类捧得最高，把其他几类都压在下面。“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因此，只听见读书人考中状元，从没有听说农人、工人、做经济工作的人也可以成为状元。

只在实行了新民主主义的边区及敌后各解放区，情形才不同。去年边区有了许多的农民劳动英雄、工人劳动英雄，就是做伙夫的也出了英雄。今年还要出更多方面的英雄，如作经济工作人员，都要选出英雄来。这些英雄周围的人都自然而然地称他们做状元。这才是真正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但我们的英雄、状元，和旧社会的英雄、状元是性质上根本不同的，现在我们所尊重的英雄、状元，是为人民服务的，是能够发展自己，也善于帮助别人发展的。只要你能忠于自己的业务，改进自己的业务，于人民于革命有了利益，政府、人民就会公举你做英雄。而在旧社会里，处在统治地位的，都是压迫人的剥削阶级，统治者只能推崇和提拔善于压迫人的人，而打击能为人民服务的人。因此，旧社会里为统治者所表扬的英雄、状元，实际上都是寄生者、剥削者、压迫者的代表。

在旧社会里，农、工都是被压迫者，他们连头也抬不起来，更

说不上成为英雄、状元。只有地主资产阶级和代表他们利益的读书人，在社会上处在优越的地位，也只有他们有机会做英雄、状元。我们现在的政府，却是新民主主义的政府，把一切行业的人，从军政首长到伙马夫，都看做平等的，只要真心为人民服务，做出成绩来的人，哪怕你是做最简单的行业，都会受到尊崇，都有做英雄的机会。中央印刷厂的一位同志，只管一个水灶，但因为工作成绩好，又非常节省，能帮助别人，就成为边区的特等劳动英雄。

在现在劳动英雄运动中间，在我们思想上必须要注意的一件事，就是要深刻了解到，在我们新社会里，任何一个工作职业，都是为人民、为革命服务的，没有什么高下，只要能忠于工作、改进业务，就是高的，否则不管你的职业表面上好像很高，也只是“下品”，迟早要翻斤斗，跌架子。在我们这里，就是做伙夫、马夫，也是值得骄傲的，只要做得好。我们不能轻视这些职务。看不起这些职务，就是旧思想，就是剥削阶级的思想。

深刻认识了这一点，我们就知道，不管做什么工作，都应安心、努力，做到尽善尽美；也只有这样认识了，才能把工作做到尽善尽美。而且，只要能这样做，我们的政府、人民，都不会埋没人的。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12月12日；署名：崇基；曾收入《“有的放矢”及其他》）

再 谈 面 子

(1944.12)

既会讲面子，必然也会丢脸。猴子戴上了花花绿绿的面具，在锣鼓声中耍戏，的确是得意非凡。一旦戏毕了，锣鼓声停止了，就仍然要露出一副毛脸来，这可以叫做5分钟的英雄美人，一辈子的禽兽。

表里不一致的把戏，在观众面前，迟早总要被揭穿。不是货真价实的英雄美人，不能对人民永远遮住那凶恶、丑陋，其实也很寒碜的面孔。希特勒曾经挂过一块英雄脸，说要为欧洲，以至于为人类防止什么什么主义的灾害，现在丢脸了，谁都看见原来他自己才是专门制造灾害的恶魔。其下场也很凄惨，竟至消息不明：发了疯呢，还是包了一块绷带从什么门口走过？连纳粹走卒们也莫名其妙。满清的慈禧太后专制主义的老妖精，曾带上了美人脸来欺骗人民，说就要实行宪政，开放民主了，但人民都知道那是装门面的假招牌，所以不久之后，就来了辛亥革命，让她连她的面具一同完蛋。

人民欢迎的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英雄，说起来也不神秘，就是能忠实地为人民谋利益，于是自然而然地有人民拥护。劳动英雄之被称为英雄，是因为他们的努力不但发展了自己，也对周围的群众有了很大的好处。随便举例来说，晋西北的劳动英雄张初元，在自己的村子里，就帮助了10户雇农和贫农翻了身，10户在两年中就买了73垧地，购回了19垧地，买了9条牛，14间房子。

谁只要一想旧中国农村里民穷财尽的惨状，就懂得这些数目字重大的意义。这些真实的账目一笔一笔地深深刻记在群众的心中，化为高度爱戴的热忱，劳动英雄的威信，就是建立在这种真挚的群众感情之上的。这比钢铁坚固百倍，永远不会垮台。这样来说，为寡头财政资本和贵族地主要戏的猴子英雄如希特勒之类，在赵占魁、佟玉新、张治国等人前面，就会显得渺小极了，而且实际上简直不能相比！

要辨别英雄美人的真和假，最好的方法，就是打一盆水来，看他们肯不肯“洗脸”。挂上去的英雄脸壳和涂脂抹粉的美人，越洗必然越更丑陋不堪，如果是冒牌货，你立刻就可以欣赏到他那一副“恐水病”的神情。就为着这原因，专制独裁者才要仇视言论自由。真正的英雄美人，脸上的光彩，全是本来健康血液的表现，不同于从具外表的泥菩萨，一洗之后，恰恰可以把污浊空气中所染上来的某些尘土涤净，光彩就会更焕然起来。因此，真正人民英雄，应不怕“天天洗脸”，不怕被指出缺点，不怕自我批评。目前参议会和劳动英雄会上之能展开批评讨论，就因为来参加的是真正的人民代表和人民英雄。对于他们，既没有装上去的面子，也就没有丢脸的问题。

怕批评，怕丢脸，喜欢把缺点当宝贝一样深藏起来的人，在我们中间，也还不是没有。谁有这样的情形，谁就要警惕一下：因为有了这样的毛病，虽然并不表示就是猴子，但也可能是进化不够，在身上遗留了某些猴性。不除掉这样的猴性残遗，就难于保持我们血液的完全健康，难于发扬我们脸上真正的光彩。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12月16日；署名：崇基）

柱　子

(1944.12)

丢了衡阳，降了敌人，最近又“脱险归来”的方先觉，到重庆竟成为最红的人物了。有政治部请客，有委员长接待，“同乡”们奉命欢迎，妇女们又来献花，开大会晚会不足，还加上中央社的广播，一定要吹得全世界周知，一个丧师失地而又践踏了民族气节的败将的光临，竟当作这么一件大不了的事情；国民党统治者们平常提得那么高的什么“国际观瞻”问题，这一下不知道怎的又给他们丢到屁股下面去了。

※　※　※　※

中央社17日重庆电，说：湖南同乡在重庆欢迎方先觉时，还送了他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四个大字，曰：“天南一柱”。——衡阳垮了，湖南垮了，老百姓到处逃难，而负责指挥的将军却巍然独立在嘉陵江口，神气活现，大概就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算得是“一柱”。

但是这样的柱子，在“天南”其实也并不只有方先觉那么一根，看吧，大大小小共一整批，都在国民党的军令之下，各自颤巍巍的立着，在这些柱子上面，并没有什么东西能被支撑得住！

国民党的欢迎者们给方先觉歌功颂德，最主要的一项功德，就是他把衡阳守了47天，然后再奉送敌人。的确，对国民党腐朽的军队来说，47天是破天荒的大事，这就算是起了作用的柱子了。

※　※　※　※

但不管47天或不到47天，在丧城失地一点上，国民党军官们却都是天上的老鸦，一般乌黑。为什么张德能丢了长沙，就遭枪毙，方先觉送了衡阳，却受欢迎？孟子书上所谓五十步笑百步的道理，难道竟被提倡读经的国民党将军们忘得这样干净了？

“彼一时，此一时。”国民党里的柱子们，一般都有种种办法，能够自己保持不倒。例如何应钦之流，虽然在麻将桌上换了座位，实际上还不是照样很神气地坐着。张德能只算是一个稀有的倒霉鬼，他的倒霉，跟曹操的粮食部长王垕差不多，不过是因为别人的威信有垮到地上的危险了，迫不及待，连忙把他的头借去维持一下，在他自己原是“猝不及防”。至于方先觉的特点，则是走了“曲线”，由敌人的飞机送回，有贵州边境的铁拳保镖，这根柱子之能得到国民党统治者们五体投地的恭维，原来因为它是横着的：一头被抓在日本军阀的手掌里，一头却顶在国民党统治者们的胸膛上！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12月24日；署名：崇基）

人类科学文化的胜利*

——庆祝苏联科学院二百二十年纪念会

(1945.6)

苏联科学院最近正在莫斯科召开第二百二十周年纪念会。在欧洲法西斯国家打败之后，作为反法西斯战争主力国家的苏联召开了这样一个科学文化的纪念会，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仿佛是向全世界说明，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就是人类科学和文化的胜利。希特勒法西斯主义者在横行猖獗、蹂躏欧洲人民、无情摧残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整个期间，曾不断地散布所谓“布尔什维克恐怖”的鬼话，想在一些被蒙住了眼睛的人们头脑中造成一个对苏联的恐怖现象。但事实上是法西斯主义者才把人民推进野蛮恐怖的深渊里，而布尔什维克主义却是一个标志最高人类文化水平的光辉名词。谁只要一看苏联科学院的规模之大、人才之广和成就之高，就不能不以惊叹的心情承认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苏联科学界对于世界科学文化本身的伟大贡献和影响，是不需要特别说明的。英美科学家对被邀参加这次会议非常重视，就是一个铁证。值得在这里提到的是，苏联科学家的研究，决不是限于少数专门学术的圈子里，而是与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的事业之发展分不开的。苏联科学家和他们的国家、人民在一起，胜利

* 本文是作者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

地进行了决定人类历史发展的两大斗争：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和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侵略的战争。这些斗争的胜利，和苏联科学家的劳绩是分不开的，没有他们的参加，这两大斗争的胜利是不可想像的。由于苏联国家、人民、和科学界的努力，社会主义建设在苏联已得到完全的成功，并且，如果没有希特勒的破坏侵略的话，已走上共产主义的阶段了。这一个胜利，把几千年来全世界人类中最优秀、最有思想和良心的伟大人物们所梦想追求并为之牺牲奋斗过来的最美妙的社会理想变成了生动的现实存在，使全世界一切被压迫的、希求解放的苦难人民们看见了实实在在的光明前途，生出了不可动摇的斗争信心。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使苏联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的无敌的力量已在这次战胜希特勒德国的战争中得到了无可置疑的证明。法西斯主义的祸害之所以能够被遏止，世界人民所以能够走上和平的道路，虽然是全体同盟国人民的努力，但主要的仍是由于苏联的力量，而这一个主要的力量中间，苏联科学界的力量（例如单就供给新式武器和增产物资和粮食来说）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苏联科学院的年龄已是220岁了。它是继承了俄罗斯民族的进步文化传统而加以发展的成果。它的前身，是俄国有进步思想的皇帝彼得一世在1725年诏令建立的俄罗斯科学院。在十月革命以前，科学院已产生许多大科学家，如杰出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罗曼诺索夫、大数学家车比雪夫、大天文学家勃莱第金、大化学家齐宁、大生物学家考瓦莱夫斯基、大心理学家巴甫洛夫、大生理学家塞捷诺夫以及近代流体力学的创立者楚可夫斯基等等人物。但在十月革命前，在半封建农奴制的沙皇统治之下，俄罗斯科学院和它的科学研究是不发展的，它只是具备着很简陋的科学研究设备和很少数的研究员和科学技术工作者。而在这少数人中

间，还有许多思想陈腐，对真正的进步学术怀着敌视态度的反科学的人物。因此，在十月革命以前的俄罗斯科学院，虽然经过了一百多年的长时期，它的发展是非常迟缓的。只有在十月革命以后，在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下，才不过二十几年，苏联科学院的规模和它的事业就飞速地扩张起来了。只就人数来说，由十月革命前的 45 个研究员和 112 个科学技术工作者发展为 380 名研究员和 4700 名科学技术工作者。全俄国的科学家，在十月革命前只有 5600 人，现在苏联却有 10 万个科学家了。这就是说，二十几年的发展，比以前的一百几十年的成果，超过了二十倍的数量！这就证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人类的科学、文化、个性，是得到了空前迅速发展的条件了。

苏联科学院主席科马洛夫说："在爱国战争中，强烈表现了苏联科学底两个非凡的特色：一、苏联科学不是以个人为代表，这些人的活动不是局限于小实验室里，而是以科学家的大团体，以有明确的发展方向的科学研究计划为代表。第二个特色是：苏联科学家从没有把为前线与工业服务的工作和先进文化与科学的重要发见和成就分裂开来；相反地，我们越加紧与亲切地为前线需要而工作，苏联科学与文化前进的速度就越快。这就是为什么苏联知识分子以其全力贡献给对敌斗争的爱国战争，不仅增强了红军的力量，而且建立了不朽的文化与艺术的成就，给世界科学贡献了非凡的发现。"的确，苏联科学界不是个人的集合，而是伟大的科学文化军队，它站在苏联的爱国战线上，也站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将来共产主义建设）的战线上。有了它，爱国战线就成为天下无敌的；有了它，社会主义战线就达到胜利；有了它，全世界人类文化科学就飞速地推进，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所特有的科学文化军队的非凡的特点。这和法西斯国家把科学作为侵略战争的

奴隶，并因此破坏了许多科学发展的优秀成果，放逐和摧残了许多伟大科学家的情形，是根本不同的。

面对着苏联科学院的纪念盛会和苏联科学文化的惊人发展，我们不禁要想起毛泽东同志最近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论联合政府上所说的一段话:“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这是确定的与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示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与最高理想的方向。我们每个人入党之时，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与为将来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

苏联的国家和它的科学文化，证明这一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与最高理想的方向”，是多么令人憧憬！它已经不是仅仅存在于思想家们头脑中的梦想，而是存在于现实世界上了。自然，中国的条件，使我们还不能很快地达到这一个目标，在一个长时期间，我们还必须坚定不移的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但同样坚定不移的，是我们始终向往着苏联人民和苏联科学家们所已达到的境地。

苏联人民的科学文化胜利万岁！

（原载《解放日报》1945 年 6 月）

血 肉 相 连

(1945.7)

去年，韬奋先生逝世的消息刚到延安，一个学校的同志告诉我说："我们同学听到韬奋先生逝世的消息，难过极了，有的连饭也不要吃，有的掉下泪来。"

已是一周年了。当同志们商量要写些文章纪念时，我立刻回想起上面这件事实。十几年来，韬奋先生和中国广大群众——主要是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结成了一种精神上的血肉联系。尽管和他从未谋面、个人方面完全陌生的人，仍可以把韬奋先生看做异常亲切的人物。在精神上他是经常站在他们的中间，能真正了解他们的痛苦，能为他们指出解除痛苦的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而又曲折不平的历史上，韬奋先生是提着争取抗战民主胜利的明灯，引导广大青年前进的一个重要人物。

韬奋先生劳作一生，他在青年群众（也不限于青年群众）心目中就留下了这样一个不朽的印象。

我想讲一讲由这件事情所引起的一些感想。像韬奋先生这样的人，的确称得上人类先进分子中的一个代表。凡是作为先进分子的人，必须有一个条件，即是如像韬奋先生一样，在群众中建立起一种血肉不可分的关系。譬如做一个共产党员，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员，在中国的条件下，同时就是全民族和全体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和先锋队员。所贵乎要被称为先锋队员，其重要的条件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要能团结群众，和群众紧密地结合在一

起，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坚决奋斗，克服困难，打败敌人，完成工作，完成任务——不论所担负的工作性质是如何不同，责任范围的大小有多少差异，都应该这样做。如果不能这样做，或不愿这样做，如果东西南北走来走去，都是一个孤家寡人，“空军司令”，不在精神上或物质上联系着或大或小的一个队伍，那就没有很多必要站在先锋队列里，无须乎挂着一块共产党员的招牌了。

单就这一点来说，韬奋先生临死时要求加入共产党，并终于获得了这个光荣的称号，在他已是当之无愧的。

团结群众是革命工作成功的保证，团结本身也就是一种成功。千百万人的大事业固然需要团结，三两个人的工作也不容许离心离德。走进革命队伍中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村的与城市的），多少都在身上带着些狭隘小生产所培养成的个人主义的突角和尖刺。这些突角和尖刺具备着各种各样的外形，例如自私自利，自高自大，宗派与山头，热狂与消沉，吹牛与牢骚，个人突出与孤陋寡合，拉拉扯扯与吵吵闹闹，固执偏见与明哲保身。……这一切都是团结群众的有害物，能够在革命队伍中间引起纷扰和不安。在我们的队伍里，团结群众的根本基础是不可摧毁的，为人民服务的大原则引导着我们，在这个原则之下斗争，曾使得我们克服了革命沿途上无数的阻碍和困难，进行了二十几年来惊天动地的伟大革命事业。但是，但凡身上带着病毒、尖刺的人所在的地方，同志和同志，先锋队和群众之间就会引起或多或少互相拒斥的作用，彼此就要发生距离，就不能建立血肉相联的关系。要使我们的队伍成为不可摧毁的长城，就必须把一切病毒的突角和尖刺磨掉、削掉或砍掉。

要除去思想上的病毒、尖刺，常常需要外力的帮助，需要说服，批评，思想斗争；但更重要的需要自觉的努力。如果没有敢

于忍受疼痛的勇气，就无法割去身上的赘瘤。因为赘瘤虽然是病态，和身体仍是血肉相连的东西。两种血肉相连，任你自己选择：或是与病毒的突角尖刺相连，或是与健康的思想及广大同志和群众血肉相连。要达到后一种血肉相连，必须忍痛割断前一种血肉相连。二者不可得兼，看你怎样下决心！

团结有真假之分。鲁迅先生曾谈过一种豪猪的关系：一群豪猪，在晚上睡觉的时候，相互相靠拢抵御寒冷，却被身上的硬毛互相刺痛，结果只得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外表上看，俨然一群，在实际上，彼此都隔着空间，这是一种“貌合神离”，鲁迅先生用来比喻压迫人民的伪善绅士中间的关系，这里不可能有真的团结。真的团结是血肉相连，而不是“貌合神离”。我们能够真的做到血肉相连的团结，因为我们和广大人民，都不是豪猪，不至于像豪猪一样，把身上的毒刺，当作生命一样的不可分离。我们走向团结，有什么互相触痛了，暂时也会跳开，然后看清痛的来由，把它除掉，又走向团结。这里虽然也不免有血肉的痛苦，但决不会成为剥豪猪毛一样的致命伤，而且除去了的是病毒，有什么可惜？

但这就是说需要自觉了。如果顽冥不化，硬要把病毒的赘物当作自己的生命，硬要不拔一刺，那你就会等于豪猪，就会成为豪猪！

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毒刺，在思想方法上的特征就是片面、偏激。片面而偏激的思想是阻碍团结的，而不团结又能生长片面、偏激的思想。有了关门主义，人就不能向群众学习，人的思想就不能开展，不能全面。为着学习周密地思考问题，也必须努力团结群众，联系群众，这才有可能在群众中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以补救个人认识的狭隘性。

一方面要善于认识别人的长处，另一方面要善于辨别对方的

错误和缺点，这就是说要善于向周围的一切人学习。——这包括对别人的缺点的批评，另一方面，要善于反省自己的缺点，努力改正缺点（不是说不坚持正确的原则），除去身上的病毒赘瘤，这就是说要能够自我批评。对敌人要狠，对自己要和。虚心学习，力求进步，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达到“和”、达到团结群众的必要方法。这是整风中大规模采用的方法，是拥政、爱民、拥军，以及一切革命营垒内的团结运动的基本方法。

扯得似乎远了。为纪念韬奋先生逝世一周年写文章，结果是借题发挥，谈了一些自己在学习中的所见所感。但如果还算有些道理的话，贡献出来想来还不至于冒渎了已死的先进者，因为这些真理，韬奋先生是曾经追求过或实践过的。

（原载《解放日报》1945年7月24日；曾收入《“有的放矢”及其他》）

难

(1945.7)

很多人在学习中间提出这样的问题，说:“读懂文件并不困难，要从文件背后找更深的意思，才是大难。”这自然是有些道理的，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是:“在文字上读懂文件并不困难，要真正懂得和记牢文件内的道理，在一行一动中都不要忘记这些道理，才是大难。”

由于各人的斗争经验、学力基础不同，对于文件的理解就有深浅之分。深者见深，浅者见浅，浅者加上努力，可以渐渐加深。一步登天，自然做不到，但一般的了解，却做得到；力求进步，也做得到。问题是要能够学到一点，就变为行动，就能够在这一点上，革除旧的思想感情，脱胎换骨，这就是整风运动所要求的思想革命；要做到这一步才是大难，才是真正找到了文件背后的更深的意思。而不做到这一步，就不算真正懂得和记住了文件内的道理，就不能达到学习的目的。

譬如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道理，就文字上来说，怕没有人不能理解了。有谁敢于在讨论会上、读书室里，反对这一个指示吗？人们不立刻骂他捣乱，也要笑他糊涂。然而笑人糊涂的人，往往自己也糊涂了而毫不自觉。这就是要看实践的考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遇到这样的情形：在讨论会上、读书室里把“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道理作了滔滔雄辩的人，在另外的场合，受到别人批评的时候，却把自己曾经亲口

讲过的名言忘得干干净净，或者在事实上，在行动中把它修改成“言者有罪，闻者见怪”的道理了？

很显然，这种情形是一定会遇到的，而且不会是很个别的情形！

在整风运动的长征中，小资产阶级的灵魂所要跋涉的改造路途是艰难而苦痛的。在每一个大小的站口上，每一个具体的行动步骤上，都要进行一个或大或小的内心斗争。旧的思想要反抗，要企图复辟，一有机会，它就要起来支配一切。新旧思想的矛盾常常要引起当事人很大的苦恼，甚至于引起一时的或长久的消沉。常常要经过周围的人多方帮助，打气，甚至鞭挞和本人自觉的努力，才能够挣扎起来，才能够继续前进。

“原则我都了解，但我的感情受不了！”这是在铁砧上被锤炼的小资产阶级灵魂的痛苦悲鸣。从本人的主观方面看来，这是原则和感情的矛盾，这就是说，思想上没问题了，已经完全前进了，但，感情还是落后的。但在实际上，仍是新旧思想原则的矛盾。痛苦是由于感情与旧原则紧密地结合着，而这旧原则的废渣又必须要被革命的铁锤所捶下。悲鸣，是从留恋旧原则的感情中发出的，因为在思想改造的铁砧上面，要用强力把感情和新思想打成一片。

整风是要反对教条主义，但要警戒，不要又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来进行学习，以致使整风落空。旧的思想非常善于施行借尸还魂的魔法，它能够用整风的言词把自己伪装起来，而到处留下歪风的实质。实际上教条主义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言行不一致。警戒教条主义，首先要注意是否言行一致。“听其言而观其行。”不要把讨论会上和读书室里所讲到的和想到的，在工作中行动中忘记了。

我很喜欢读荀子《劝学篇》里的这一段话：

“君子之所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

有一只耳朵里进、一只耳朵里出的学习，这等于不学习。有耳朵里进、只从嘴里出来的学习，这是教条主义的学习。这样的学习，的确是荀子所说，是很不漂亮的。要做得漂亮，就必须收进耳里，深深地记在心里，结合在影响全身的感情里，表现在一行一动里。

自然，荀子的话有一点必须批判改正：他指出的是“君子”之学，就是说学做压迫人民的统治阶级。然而压迫人民的统治阶级，都是需要欺骗的，都不能言行一致的。我们的学习，则是要努力站到相反的立场上：即学习做“老百姓的勤务员”，学习“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只有为着这样的革命目的的学习，才能真正做到言行一致，才能够漂亮，“足以美七尺之躯”，也就是能在广大人民面前显得光彩。

（原载《解放日报》1945年7月25日；曾收入《“有的放矢”及其他》；后改题名为《学习与行动结合》，又收入《论主观主义》中，天津知识书店1949年2月版）

类　推

(1945.7)

吃屎的狗难改吃屎的脾气，国民党反动派竟又敢向关中及其他解放区发动进攻了。

不是没有预见。这些阴谋勾当，早在报上不止一次地揭露得清清楚楚。不是没有劝告，“大敌当前，调动军队来反对自己的同胞，这是犯了滔天大罪。真的要打的话，那就无异玩弄一把燎原的大火。”（新华社延安3日电）这一类的忠言，几年来也向国民党反动派重复了多少次了。玩弄这样的大火，玩弄全国人民的怒火，这是要使你自己彻底、干净、完全烧毁了的。满清皇帝被烧毁了，从袁世凯起，民国以来一切妄想专制独裁反对人民的军阀都连续不断地被烧毁了。现在更有了空前觉悟的人民，有了人民的军队，有全世界及法西斯人民的伟大力量，火力不知旺盛多少倍，国民党反动派还总是想要到这里面来打滚，究竟这些家伙为什么这样大胆？难道被火烧的滋味竟会被他们那样地爱好吗？

是的，世界上没有这种蠢人，居然欢迎自己被火烧死，反对人民的家伙们，自有他们聪明的如意算盘。我们从另外一件事情里，可以找到类推的例子。

（重庆合众社21日电）大公报载：外交部吴次长称：逃避到美国的高级官吏李泰初已入籍为美国公民。李泰初案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在昨日闭幕时，本届参政会中曾发生屡次的质问。当被质问及为何发给李泰初出国护照时，吴次长今发现并未曾发给此

种护照，直至两个月前逃离其官办的“中国茶叶公司总经理”之职时，他还掌管着对美苏英澳输出中国茶叶业务。李泰初案涉及不知多少百万元之数。

李泰初的大贪污案是和黄金案一样轰动全国的，它自然和发动内战不同，不是拿枪杆子屠杀人民，但却是在算盘珠子上狠狠地刮削人民，也是一种反对人民而又激起了人民的怒火的滔天罪行。然而人民的怒火暂时竟然没有来得及烧到他，因为他还有这样的两项神通：一、飞到西半球去；二、丢掉中国国籍。

原来反人民的反动派还可以压这么一宝，这往往会被人忽视了的——因为他们天天口头上叫着“国家至上”和“民族至上”，别人就会注意不到他们肚子里还有一个“国家至下”和“民族至下”，而他们实际上准备实行或已在实行的乃是“西半球至上”、“亚美利加至上”。

反动派这样想：滔天罪行之所以要被惩罚，只因为身为中国人而反对中国人民，我早晚或现在就摇身一变而成为洋鬼子，你们就把我莫可奈何了。从前人说，“拼着命不要，皇帝娘娘可以拉来睡觉”，现在却有了新的格言了：“拼着国籍不要，人民头上可以横行霸道!”啊，岂不妙哉!

发动内战的反动派现在和李泰初自然还有些不同，首先他们还没有飞到西半球去，“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口号还继续在叫，所以也还没有公开取得洋鬼籍。然而，并不是说他们没有实行李泰初的格言，相反的，他们是做得更巧妙了。李泰初究竟是小人物，要亲自卑躬屈节飞到西半球去才请得美国国籍。现在发动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却能做到不用自己劳动，而使西半球的大使飞来，因此就用不着到华盛顿去请求入籍，只要把中国的土地让赫尔利老爷之流“化”一下，就可以使自己自然而然的有点

像美国大人了，于是虽然还在中国的土地上，也可以放心大杀中国人民而自以为可以满不在乎了。

但是，反动派老爷们的如意想法是太片面了。中国人反对中国人民，固然是滔天罪行，外国人压迫中国老百姓，一样要遭到人民怒火的焚烧。火焰是不认人，也不会留情的，谁拂逆了它的脾性，它就要烧毁谁。火焰要烧毁国内封建的专制主义反动派，也要烧毁外来的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一个榜样。换了国籍，只不过由中国的反动派变为帝国主义的反动派，而请外国大使来"化"一下，就恰恰是在中国封建反动派头上再加上帝国主义反动派的身份，滔天大罪变成双重的。不洗心革面，要逃过人民的最后惩罚吗？哼！太妄想了！

（原载《解放日报》1945年7月26日；署名：思奇）

一 往 无 前

(1945.8)

在《论联合政府》的《人民战争》一节里，毛主席告诉我们，八路军、新四军之所以能够具备战胜一切的力量，乃是由于它是人民的军队，它的“宗旨”是“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在这个宗旨下面，它就表现出许多特点，就是：“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这是八路军新四军已经有的和应该有的（或应该发扬光大的）特点。但是，事实上又岂止革命军队才应该有这些特点，一切革命工作者，一切不同工作岗位上的共产党员，还不应该是这样？为着“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不是都应该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吗？

我以为我们应该常常把这样的思想当做一面镜子，来照照自己。我们是否能够认真地这样做了？

我们的队伍的英勇的确是无可比拟的。不仅仅军队的队伍如此，一切工作岗位上的队伍都是如此，25年来轰轰烈烈的事业和抗战以来的伟大成绩就是铁证。但在有些工作和某些情况下，在有些人身上，这样的精神还是缺少的。

有种种的原因，使这些人在工作中消极、畏缩、精神沮丧。有由于计较职位低微、工作单调而不甘心，有由于职务繁杂、麻烦

太多而没有耐心，有因为人事关系搞不好而想退却，有由于生活条件不如意而情绪不好，有对于领导的某些缺点不满而表示消极，有借口不适合自己的趣味和特长而求调换，有因为对于个人前途没有好处而不安心，有些人经常在自己前面悬着许多空洞的理想，见异思迁，朝秦暮楚，一山望着一山高，到处都无法安定……原因有种种，表现有种种，但本质都是一样，缺乏为着人民利益而一定要克服困难、一定要完成任务的坚决精神。

革命的英雄气概，自然应该表现在对敌人的斗争上，首先应该表现在军事的斗争上，但同时也应该表现在对各种工作的态度上。我们需要每一个同志不只在战场上能一往无前，在自己的家里，在建立自己的革命家务上也能一往无前。在轰轰烈烈的生与死的斗争中能不怕牺牲叫做一往无前，在细腻平凡的日常工作上能埋头苦干也仍然是一往无前。人民中的英雄往往有了前一个的一往无前，而缺少或轻视后一个一往无前。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中有无数善于对敌冲锋陷阵的猛将，而在自己阵营内做建设工作却常常显得没有能耐，其结果是走上两条失败道路：或者是直接被打败了，或者是为野心家所利用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尽，谋臣亡。”这一个谚语，在有些场合会是反映一种人民的历史悲剧。革命者在胜利前进的英勇斗争中，往往不注意有暗藏的猎人跟在后面，随时在找机会想把革命果实和栽培革命果实的人一起烹食，而革命者也就常常由于自己的不小心而部分地一时地曾被烹食了。被烹的原因之一，自然也常是由于把猎人误认作人民的好朋友，不知道警惕某些特别残暴狡猾的猎人，但归根结底，勇敢积极以及聪明机智只善于发挥在战场上，而没有很好地用来建立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不善于为自己的阵地打下深固的基础，这不是过去革命人民方面常常吃亏的更根本的原

因么？

共产党员的责任或义务之一，是要精通业务，我们每次学习党的建设及党章时，这一个问题都要被提起。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熟虑的问题，也常是日常工作中被许多人忽略了的问题。在苏德战争的第二年，斯大林同志曾号召前线的每一个战士都要精通技术，成为驾驭自己所使用的武器的专家。如果每一个普通战士都应该成为自己的技术的专家，那么，作为共产党员，更是责无旁贷地应该成为一个更高明的专家了。这道理，也是不论在战争中或在日常工作中都同样适用的。共产党员在工作中，在不论任何或大或小或繁或简的工作当中，如果不能至少努力求成为专家，如果在工作的掌握上时时只能跟在群众屁股后面，那就于先锋员的资格也大有亏损了。

精通业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不但是要熟练，而且要能创造，这就是要能掌握工作中的一切大小规律。要达到精通的目的，必须克服路途上的一切困难和阻碍。这些困难和阻碍常常不是像面对战场上的敌人那样迫切和明显的，但却是不比后者更轻松的困难和阻碍。为着克服这些困难和阻碍，同样需要大的勇气，同样需要忍受锻炼，吸取经验，同样需要思想意识上的坚定，需要不屈不挠，不怕失败，有时也需要克服所谓人们的兴趣和特长之类的限制。

我们不否认个人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兴趣特长之类，在工作中是可以起很大影响的。照顾个人的特长，在分配工作时给以适当位置，这是领导组织者的责任，这也是我们党内，我们的新社会新政治下面一般执行着的原则。正是因为一般地执行着这样的原则，而不是如旧社会旧政治下面，通过经济、生活的压迫，通过政治的阴谋诡计，通过思想文化上的欺骗麻醉，逼迫

大多数人埋没自己的特长，蹂躏人们的人格自尊心，使之走进各种各样屈辱、困苦、违背自己的愿望和良心的职业或失职的圈子里去，破坏人类的优良的个性，造成某些无志气者的卑劣的个性——正因为在我们的新社会、新政治和党的领导下不是这样，而是一般能够让大家在工作上各得其所，发挥自己的特长，培养个人优良的兴趣，以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因此不论在对敌斗争中，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建设工作中，都能把人的力量空前有效地施展出来，获得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成绩。但是，对于一个革命先进者，有时由于环境的需要，必须担负起一种陌生的工作，即不针对个人素来的特长，也不是那么适合小资产阶级的个人兴趣，在这样的情形下，如果是工作所必需而没有其他更适当的人来承担的话，共产党员是决不能辞责的。这就面临着要克服素来的特长和兴趣的限制，要一定养成新的特长和新的兴趣，这也就需要勇气，要能够这样做，也叫做有了一往无前的精神。

因为困难不易克服，因为个人的所愿不遂，或因为什么原因，而在工作中消极、畏缩，精神沮丧，或中途退伍、丢手，都是脆弱、怯懦、勇气不足的表现，也是革命责任心不高的表现。我们担当起一件工作，就必须把它做好，或者努力尽可能做好，才可以丢手。如做不好，或做得一团糟，留一条麻烦尾巴给后来者，这就应该引为罪过，应该深深地自疚。这种情形，责任可能不只在当事人一方面，但作为当事人者，应该首先主要责备自己，这也是义务。

我们赞美许多优秀同志，他们在最平凡的甚至看起来好像最低微的工作中也能热心研究业务规律，成就了许多同样工作中千百人所没有想到的不平凡的创造，如像一些模范的民办小学教员，如像许多伙夫和饲养员中的劳动英雄，如像有些从大学生中学生

一变而做起磨豆腐工作，做跑堂以及总务工作，并能和马夫、伙夫打成一片的知识分子。我们赞美我们前方回来的战士，他们在前方善于打仗，留在后方，也能认识清楚当前的任务，一面善于警卫地方，一面又能很热心的很快的学会生产，学会帮助老百姓建立家务，学会帮助地方工作同志做政权、经济、文化等等工作。这都是我们革命队伍里的一往无前的精神的典型。我们需要无数这样辉煌的典型，在日寇投降的今天尤其需要他们。要把他们的勇敢、坚定沉着、细心谨慎的为人民、为革命负责的精神广泛地发挥出来，不但要在前线彻底消灭敌人，使其不至于留下一点足以死灰复燃的残遗，也要能在后方以高度的积极性坚决完成一切细小的日常工作任务，能够稳步地逐步地在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的伟大基础上建立起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民主主义中国。

（原载《解放日报》1945年8月17日；《群众》第11卷第2期，1946年1月31日转载；曾收入《“有的放矢”及其他》和《艾思奇文集》第一卷；后曾改题名为《论精通业务》，收入《论主观主义》中，天津知识书店1949年2月版）

东方强盗就缚以后

(1945. 9)

日寇投降条约正式签了字，扰乱地球和平的两帮大强盗，西方的希特勒、墨索里尼匪帮和东方的日本法西斯匪帮——一个已经被杀死，一个现在又被绑起来了。全世界人民经过了西方四年和东方八年的最激烈的苦战，终于获得了剿匪的空前胜利，再没有比这更值得大大的欢欣庆祝的事了。就中国来说，日本帝国主义是几十年间天天守在我们大门口上的一个最凶恶的强盗，中国人民在长期间受尽了这个强盗所给予的一切压迫和凌辱，中国人民很懂得，除去了日本强盗，就是免除了自己身边最严重的灾难和威胁。

中国人民几十年来不断的遭受着日本强盗的劫掠屠杀。在这悠长黑暗日月中，我们对于怎样对付敌人问题，内部有着两种基本分歧的意见。一种人主张并且实行了“开门揖盗”的办法，另一种人主张并且努力争取合力御盗的办法。前一种是满清皇帝、北洋军阀、汪精卫党以及一切仇视人民的反动分子们所一贯继承的传统办法，后一种是中国广大人民和代表人民利益的党派和人物的办法。

现在让我们检讨一下民族内部的功过，把这几十年的历史作一回顾，我们可以发现，实行了开门揖盗，结果是鼓励、助长、培养了强盗的贪欲，是喂养虎狼来伤害自己。由于主张开门揖盗的反动分子曾经盘踞在统治地位上，使敌人能够步步进逼，得寸进

尺，中国民族和人民的灾难才长期的拖延和不断的加深。然而中国人民终于没有灭亡，终于最后得到了胜利，那就是因为始终还有另一方面的力量：广大的人民和人民代表者们为合力拒盗而进行的前仆后继的斗争。在这一个力量打击之下，满清政府垮台了，北洋军阀被打倒了，汪精卫、陈公博之流也完蛋了，尽管一切反对人民反对民主的反动势力也前仆后继地几次起来干那断送民族图谋私利的买卖，但每一个作恶的罪人结果还是无例外地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现在东方的大强盗已被捆起来，但还没有像西方的大强盗一样被杀死。马尼拉的投降条约签字，只起了捆起来的作用，今后还要继续贯彻盟国宪章和波茨坦宣言的精神——要发挥杀死法西斯强盗的作用。但这也还需要人民的斗争，当西方法西斯刚被打败投降不久，那里就很快出现了许多装着慈善家面孔的伙计们到处宣传要对被捕了的盗魁们施行“宽恕”的道德。这一类的吵嚷声同样也会在东方散播起来。因为不论西方东方，直到现在都还有一批“开门揖盗”的拥护者，他们既然对于强盗撞入人民家庭中实行劫掠、屠杀、破坏的兽行能表示宽恕，那对于待死的囚犯就更要表示其大慈大悲的温情了。最近的情况显然地可以看见，日寇在还没有被正式绑起来但已承认无路可逃的这些日子里，已经开始在他们那凶恶暴戾的面孔上，渐渐做出种种驯顺可怜的媚色，来向那一类人探求和刺激他们的温情了。

人民用合力拒盗的精神，使巨匪受缚，也要用合力拒盗的精神，坚持把罪魁处死。大门口的巨匪一天不彻底剿除，屋里的人就一天不能安稳睡觉——非常简单明了的理由就在这里。

（原载《解放日报》1945年9月5日；署名：崇基；曾收入《“有的放矢”及其他》）

文艺工作者到前方去*

（1945.9）

最近，延安有大批文艺工作者到前方去，或是正在准备到前方去。就其规模，可以说是几年来延安文艺界的一个空前未有的壮举。但它的意义，不仅是在它的规模的宏大，同时也在于这次到前方去，是在我们文艺工作者已经经过几年来的整风并已实际上找到了自己的方向的时候。

近几年来，我们的文艺运动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文艺创作有了很大的收获，而更可贵的，便是我们有了一个已经在实际中证明了的惟一正确的方向，这便是文艺为工农兵、文艺工作者和工农兵结合的方向。过去的事实证明：凡是内容真实、形式活泼因而得到群众欢迎的作品，首先都是由于作者能够在实际生活中，在工农兵中学习的结果。尽管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有着怎样的不同，但从实际生活出发，是这一切成功的作品的共同的特点，而如果我们看到许多作品还存在着缺点，那重要的可以说是由于作者还没有深入的接触到实际，由于对实际生活的认识不足的结果。

我们可以指出这样的事实：有许多最近二三年来才开始学习写作的同志，由于他们本身便是实际工作的干部，由于他们对实际生活有比较深入具体的认识，他们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尽管还有着缺点，尽管或则是缺少足够的加工或

---

* 本文是作者为《解放日报》写的评论。

则处理的题材比较狭小，但是，它往往有一种许多专业的文艺工作者的作品中所缺少的朴素、生动和真实。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过一些有着较高的文学修养的同志，由于他们还没有到实际中去，他们不得不写他们未经深入体验和观察的题材，结果往往显得内容贫弱、不够真实。

我们可以说：公式化倾向，是在我们不少作品里存在着的。拿关于前方的战争故事来说，我们过去看到的大部分是关于打碉堡，抢粮斗争，老百姓掩护八路军人员，被敌人俘虏后的老百姓的不屈等方面的。这些，从原来的事实说来，每一件事，都会由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候，不同的人物，以及不同的具体过程，而有多种多样不同的表现的。但是，我们看到的不少的原稿中，有很大的一部分却往往只有着差不多同样的一个故事的情节。在这里，每个故事往往缺少各自的面貌，缺少有血有肉的人物。这个原因，有人说是技术的问题，这对于部分的初学同志，自然也是对的，但实际上却有许多像上面所说的作品恰巧是出在有相当技术修养的老同志之手。缺点的真正的原因是他们很多都是根据一个听来的故事从事写作的，对于那些听来的故事，他们往往连类似的情况也没有经验过的。

这些事实，都给我们指出了：深入到实际中去，和实际生活结合，仍然是我们许多文艺工作者的主要的问题。

两三年来，由于必要的整风的学习，我们延安的许多文艺工作者还没有能深入到实际中去。但我们并未停止了我们在可能范围内的努力，许多事实都在证明：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有着走到实际中去的高度的热情。例如许多文艺工作者去参加文教会、参议会的工作，他们首先都有着一个一致的认识：对于他们所接触到的作为群众代表者的英雄、模范，他们都抱有一种学习的态度。

但是，要说和实际和群众相结合，正如萧三同志所说，这还只是工作的“第一步”，这种短暂的、会议性质的工作，我们还大致只能限于谈话和访问，我们还不可能更进一步的对实际生活作深入的体验和观察。但是要做到这点，却是我们许多文艺工作者所一致企盼着的。

现在，正是我们深入到实际中去的时候了，我们将走进前线、工厂、矿山、城市……我们得到这样的机会来更加扩大我们的视野。我们所希望于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便是和自己的这个走进新的现实的过程一起，能够给我们带来反映我们这个激变的时代的作品。

首先，文艺工作者给我们带来更多生动的通讯和报告吧。因为这是以它的能够及时反映现实的动态而获得大多数读者的注意的。在这样的一个人民大翻身的时代，前方经常发生着对于我们是完全新鲜的事件。昨天的事情，我们是迫切的希望今天便能知道它。而过去的事实也说明：许多通讯和报告的作品，虽然一方面未必尽如许多戏剧、小说那样的精雕细琢，但它的新鲜、泼辣，往往还带着战壕的火药气味，却又不是许多经过精雕细琢的戏剧、小说所可企及的。

在这方面，苏联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在和德国的战争中，据估计苏联共有八百个作家到前线中去。他们中间包括着苏联大多数有世界声誉的大作家，而除了他们的巨型的作品，写作通讯和报告，也成为他们一种自觉的经常的责任。

苏联的作家和民众，把这种文艺的工作看成是一种战斗，不是没有理由的。而这种战斗——这种文艺的战斗，却首先要求我们的作家以战斗的姿态出现，因此，更锐敏的观察，更快速的构思，能够在无论什么环境下从事写作，对于他们每一个到前线去

的作家，都是必要的。

在几年来走上新方向的文艺作品中，我们许多文艺工作者，已经开始打破向来文艺创作上的许多陈旧的习惯，开始打破某些对于创作的神秘观念。我们有不少同志，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都能写作了，并且是迅速的前进着。但是我们还需要他们进一步的准备能力去应付那新的、更复杂的环境。

自然，我们的希望还不只于此。典型的、纪念碑式的长篇作品，我们无疑也是需要的。事实是，过去在这方面的创造还是太少。正如刘少奇同志所说：我们中国共产党“在这二十二年中，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共产党都经历了更多的重大的事变，有更丰富的革命斗争的经验”（《清算党内的孟塞维主义思想》）。而关于抗日战争，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过又是最复杂，最多样，最丰富的。这样的中国的现实，有权利要求我们创作百十部和它相应的文艺作品。

自然，要新产生这样的作品，是有待于我们文艺工作者长期深入的对于实际生活（乃至于它的历史）的观察研究，但现在的到前方去，也正是这样的开始。我们预祝在不久的将来，能有那种典型的纪念碑式的作品，拿到我们读者的面前。

（原载《解放日报》1945年9月22日；曾收入《论文化和艺术》）

反面文章

（1945.9）

中国向来就有从反面看文章的方法，把这种方法用来对付法西斯强盗匪徒们的许多言论，会百发百中地得到真理。他说白，那一定是黑，他说坏，那必然会好。1935年汪精卫在南京被刺下台，日本的报纸曾有表示非常惋惜的，称赞他，说他的所作所为对于大东亚和平有伟大贡献，堪与李定用、郑孝胥并称为三杰。那时汪精卫还不是公开的汉奸，然而敌人的这一称赞，就无异在黑夜里投了一个照明弹，使中国人民清楚地看见了他身上的那种令人永久唾弃的、人世间最肮脏的东西！

这是一方面的例子，和这相反的例子，是敌人近来对于苏联的诅咒。同盟社东京19日关于日本陆军复员问题的电讯里，有这样几句："在大陆部队约三百万人，特别是在朝鲜满洲，由于苏军的不法行为，治安恶化陷于值得忧虑之状态。……苏军占领区域之我同胞，其生命财产没有保证，处于极为忧虑之状况。"

真是闻所未闻的狂妄态度！战败投降了的法西斯罪犯，竟然好像忘了自己是正在等待判刑的囚徒身份，肆无忌惮地大谈其法律问题，并且敢于张开血嘴，向裁判者反噬。然而，善于读反面文章的人，正好从这些地方来辨别是非。第一，凡是被强盗骂做"不法"的，正表示他真正执行了人民正义的法律。愈被骂得厉害，就愈证明执行的公正彻底。第二，当强盗为"治安恶化"而"忧虑"时，人民恰恰就可以完全放心了，什么地方感到了忧虑，什

么地方的人民就得到了和平、自由和幸福。第三，强盗感到自己的“生命财产没有保证”，那就很好，这就是说战争罪犯和卖国巨憝要受到惩罚，非法掠夺来的赃物要被没收，而和平人民的生命财产恰恰就有了最妥帖的保证——这一切，就是从敌人的诅咒后面可以看得出来的，苏联红军值得我们歌颂的功绩。

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者虽然已是被缚的囚犯，但只要他有一口气的时候，还要装出各种各样的脸谱，要弄着形形色色的阴谋。有时你看见他做笑脸，讲“联络”、讲“提携”、讲“道义”；有时你又看见他的凶相，听他的咒骂，他的诬蔑。其目的很明白，只有一个：挑拨离间，寻找空隙，以便钻出正义的法网之外，慢慢恢复和修整已被打折了的利爪和獠牙，然后准备再向和平的人民反扑。因此，这里就有值得十分注意的事了；如果敌人只有大骂，那倒是我们的光荣、胜利，如果强盗居然向你赞美，那事情就有些不妙，一定是你脸上有了什么可耻的污点，被他看中了。那就应该快快自己洗刷，或者让别人来替你洗刷。自然，最干净的办法，还是完全塞着了敌人的嘴，立刻结果了大盗的生命，使他既不能称赞，也不能咒骂。对罪犯是不能给予任何言论自由的。为罪犯多留一分自由，和平人民就多有一分麻烦、束缚、祸害，就得不到完全的安宁。

（原载《解放日报》1945年9月25日；署名：崇基）

一 个 声 援

(1945.10)

重庆最近发动了人民检举汉奸的运动，这运动由报纸的个别读者投书，展开为有组织的运动，这首先表现在文艺界抗敌协会的“附逆文化人调查委员会”和工业界人士组织的“工业汉奸检举委员会”的组织上。这个运动，是今天大后方人民为民主斗争的一个很重要的行动，它与文化界自动废止书报新闻检查和工业界反对经济垄断的斗争，同是表现大后方人民的一些最紧迫的要求。

抗战胜利了，但胜利的果实，是否能落在广大抗日人民的手里，或者是要被无形断送——这是在国民党一党统治下今天严重地逼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令人痛心的问题，是今天人民的民主要求中的一个最主要的内容。大后方的许多人民已看出国民党对敌伪的政策是“忠奸不分”，“是非不明”，是对敌伪“宽恕”，而对人民苛酷，这种悖谬的政策，使中国人民虽然在日寇投降之后，仍继续面临着民族危机的打击。要最后克服这种危机，显然必须首先反对国民党当局的这种倒行逆施，而要争取实行“是非分明，忠奸有别”的对策。然而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一切思想言论都不自由，人民受到种种的欺蒙，许多人民往往不能明了事实的真相，谁忠谁奸，在他们眼前常被颠倒。不打破这种黑暗状态，那么悖谬的政策就可能有强行的机会，而真正人民的意愿就不能抬头。大后方人民检举汉奸的运动，在群众中做一个广泛的调查研究和宣

传工作，这样来把忠奸和是非在广大人民面前弄个清白，使一切汉奸头子们在“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之下，没有地方可以找到庇护，没有空隙可以逃脱法网，这在大后方的环境下，为着维护民族正义，保证抗战胜利，是很必要的措施。

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八年来不断和敌伪的战斗，对于奸伪的情形是看得清楚的。在民主政府的下面，我们的眼睛，没有像大后方那样受到蒙蔽。我们坚持分清是非，辨别忠奸，依照奸伪罪行的大小，实行正确的对策。因此，对于大后方人民的检举运动，我们是同情的，并且应该尽我们的力量，给他们的运动以声援和帮助；希望解放区的人民大家注意。

（原载《解放日报》1945年10月5日；署名：崇基）

欢迎叶挺将军

(1946.3)

在全国人民的热烈待望中，叶挺将军终于出狱了。这位献身于两次伟大的中国革命战争（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创造了许多英勇的胜利的战绩，为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立下了极大的功勋的英雄，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曾遭受了五六年的磨折。头发也花白了，灰黑的军服带着破了的袖子，不仁的待遇在他的身上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但反动派没有达到自己的愿望，他们没有能够把叶挺将军加以污辱和谋害，而且相反地，由于叶挺将军的坚强不屈，全国人民与民主人士的声援和民主运动的高涨，叶挺将军终于被释放了。

全国人民欢迎叶挺将军出狱。因为他的出狱表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增加了一份巨大的力量。叶挺将军也的确不负中国人民的希望，一出狱就立刻加入了共产党，表示他不但要继续战斗下去，而且要更前进一步。

中国共产党欢迎叶挺将军出狱！尤其欢迎他的入党。中国共产党以叶挺将军的入党引为自己党的光荣！叶挺将军在给中共中央要求入党的信中这样说："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中国共产党所引为光荣的，是因为有这样一个人民的英雄和民族的英雄作为党员，是因为他的入党，乃是为着要找到一个

组织，来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贡献自己的一切”，而不是为着其他的目的。中国共产党所引为光荣的，是叶挺将军的入党，更证明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为中国人民中国民族服务的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都是为着这一个纯洁高尚的目的，而不是为着其他。

中国共产党欢迎叶挺将军这样的民族英雄入党，他因忠诚为人民服务而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本身也是忠诚为人民服务而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就是依靠着这一条，而能够战胜一切敌人，冲破一切逆流，克服一切困难，完成自己在革命斗争中所担负的伟大任务。

（原载《解放日报》1946 年 3 月 9 日；署名：崇基）

从理论工作方面看博古同志

(1946.4)

“四·八”的不幸事件，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失去了一批卓越的、各方面工作的领导人才。单就理论介绍的工作来说，博古同志的被难就是一个很大的损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介绍，不是博古同志的专业，但他在工作的余暇做了很多极有价值的翻译工作。他译过《苏联共产党历史简明教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卡尔·马克思》、《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书，最近又校改了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他的外文条件以及理论知识的修养，都使他成为翻译介绍工作中全国特出的人才。他对于这些工作是认真、严肃、充满热爱的心情去做，他在这一方面有着很大的计划和抱负，他常常表示希望能够亲自把一切古典名著翻译出来，或者把既有的译本从新加以校改。

理论的介绍和研究工作，在目前的中国仍是非常需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时间比较短，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准备工作尤其做得很不充分。中国共产党经过了廿五年来的艰苦斗争，在毛主席的领导之下，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建立了惊天动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创造了中国人民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但就一般的情形来说，我们的理论工作水平还很低，不谈别的，仅仅翻译工作一项，就有着很大的空隙。整风运动清算了

教条主义，使我们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前进了一步。但要解决复杂的多方面的中国革命问题，还远非我们今天的水平所赶得上的。毛主席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曾号召全党同志要重视理论的研究和翻译工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号召，而博古同志，就是很有决心和热忱要依照着这一个号召来认真做一番工作的。

博古同志的生性，是聪敏、乐观，在工作上随时随地表现出朝气勃勃的前进精神。在整风以来几年中间，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都眼看着他在各方面很快地进步，对于毛主席的思想的学习更表现了日愈高涨的热情。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加上他的理论上和文化上的修养，加上他在党内工作的长期经历，加上他的年轻，他对于中国革命所能做到的贡献，将是不可限量的，仅就理论的介绍和研究方面来说，我们对于他的期望，也是同样不可限量的。

不幸得很，在博古同志一生的工作中，可以说还只是向着更有意义和更伟大的前途走出了第一步的时候，就意外地被难了！就像“四·八”同难的其他先烈一样，博古同志把他所担负的一部分沉重的责任加到了后死者的身上。他们的死所造成的损失，要由一个人来代替和补偿，是不容易的，必须以全党同志的进一步的努力才能做到。理论的介绍和研究工作，也须要更多的同志来做。当悼念博古同志的时候，在这一方面也特别值得提起注意。

（原载《解放日报》1946年4月20日；署名：崇基）

悼念我们的社长和战友博古同志

（1946.4）

博古同志领导我们《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总社全体工作人员，以及遍布全解放区的新闻从业员在党和人民的新闻战线上作战，已经快五年了。他为了参加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离开延安，还不到两个月，竟和王若飞、叶挺、邓发等同志遇难于黑茶山，使中国人民失去了几位伟大的领袖，遭受重大的损失。而对于我们从事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的人们来说，是丧失了一个最有权威的指挥官和最亲密的战友。

我们悼念博古同志，不能不想起他对于新民主主义新闻事业的卓越贡献。根据党中央所给予的方针，他和杨松同志（42年积劳逝世）创办了《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五年以来，由于博古同志的精心策划和指导有方，解放区的新闻事业已经形成了一套有系统和统一的战斗机构。这个机构是由许多通讯社和报纸组成的；在这个机构中，《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总社是他的神经中枢，各解放区的报纸和通讯社（现有总分社九个，分社四十余个）、地方报纸、部队报纸是其躯干脉络，而墙报、黑板报是其基层支柱。这一机构，除了职业新闻从业人员，还拥有近三万业余通讯员。这一机构天天把人民的意见和活动集中起来，又广播出去，它天天向整个解放区、全中国和全世界广播我党的主张，指出中国人民斗争的方向，它不仅是解放区人民的喉舌和武器，而且也是全中国人民的喉舌和武器。在历史上，中国人民有这样一

个全心全意为他们利益服务的，规模宏大与群众密切联系的战斗的新闻事业，这还是第一次。博古同志对于这一伟大事业的创造性的贡献，的确是不可磨灭的。

我们悼念博古同志，不能不想起他的许许多多值得我们景仰和学习的长处。他常对我们说："我将终身从事于革命的新闻事业。在我们党领导下，已建立了很好的人民政权和人民军队；我们还必须有很好的人民的新闻事业。"为了这"终身事业"，他竟整天劳作，深夜不寐，虽在疾病之时，亦倔强地拒绝休息。他还说："我们吃革命的新闻饭，就是这样的。"博古同志经常悉心揣摩毛主席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对毛主席的每一指示和对报社文章的每一修改，他必反复和我们探讨，有所领会，往往高兴地说："这是毛主席的独特见解，大家要好好掌握。"几年以来，博古同志日益熟练地把毛主席的思想具体运用在实际工作中，例如报纸与群众结合、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思想，职业记者、基干通讯员和广大通讯员结合的思想，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用事实和说理进行宣传，使我们的宣传有"驳不倒"的论据的思想，进行宣传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的思想等等。特别是最近两三年以来，我们经过很多的巨大事变，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之下，在博古同志坚强和机敏的直接指导之下，我们在宣传方针上从来没有迷失过方向，我们并开始积累一些经验。博古同志对于业务是极其认真和负责的，他对于报社和通讯社的每一项工作，都能不时提出精辟的意见。他对重要工作，常常亲自动手，树立榜样，在去年解放区大进军时，他曾亲制卡片，部队番号位置一目了然。他曾三番四覆地说："有了正确的政治方针，业务就有决定意义。请问业务如果不精，正确的政治方针又何从表现呢？"他很注意写作技巧，他经常地指示记者们："要忠实地报道，精确地报道，生动

地报道，迅速地报道。”他最痛恶陈腐烂调，他看了之后，往往叹口气说：“语不惊人辞不修。”博古同志有博览群书的习惯，所以他的知识特别渊博。他对于翻译工作尤其坚持不懈，他一有余暑，即伏案翻译。他说：“教条主义反掉了，更要多读书。过去读书方法不对头，不是书会害人。”他常恳挚地劝我们：“挤出时间多看书，对你们工作是有好处的。”博古同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朝气蓬勃，永不满足于现状。对于工作的成绩和优点，他的赞扬固然充满着热忱，可是他对缺点和错误的批评是直率和尖锐的，甚至于是挖苦的。他总是永无休止地转动他的灵敏活泼的头脑，研究宣传斗争的形势、方针和策略，策划把人民的新闻事业办得更好的方案和办法。他临行的时候，还提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城市内建立报纸和通讯社的计划，他一面整理行装，一面再三叮咛说：“时局更开展了，要多想办法，夺取新阵地！”

现在博古同志已和我们永别了！但是他的光辉业绩将永垂不朽。他的忠心耿耿，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他的认真负责，坚决机敏，勇于进取，精通业务，好学不倦的作风，以及指挥若定、谈笑风生的风姿，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他不仅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而且是我们从事于新闻工作的同志们的最杰出的导师和模范，我们要永远向他看齐，向他学习。他所遗留下来的事业和经验，我们要以十倍百倍的努力加以发扬光大。他日夜憧憬的雄伟理想，我们要逐步使它实现。

（原载《解放日报》1946年4月22日；本文是作者撰写，和余光生、陈克寒一起署名）

谁是杀人的凶手*

(1946.9)

全国同胞们，一切关心中国和平民主的朋友们！

我今天借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想向大家谈一谈关于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被害的问题。对于这一个震动全国的事件，我早就想说几句话了。李公朴先生是我的老朋友，闻一多先生也是中国文化界的先进。他们惨遭暗杀，我是非常地悲痛，非常地愤慨。偏偏国民党特务机关又异想天开地造了一个谣言，竟造到我的头上来了。一个月以前，当李、闻两先生的案件发生不久之后，有一天晚上，我已经睡了，矇眬之中突然听到隔壁住的一位朋友叫了我的名字，并且说："怪事怪事！国民党特务机关说你把李公朴杀了！"我绝对想不到世界上会有这样奇怪的消息，总以为自己是在做梦。第二天早上我半信半疑地去找那朋友一问，果然接到了这样一个电讯，果然在李公朴先生被杀之后，昆明的街头到处出现标语、传单和谣言，说"李公朴是共产党杀的"，"李公朴是艾思奇杀死的"。这个荒谬的谣言，更加激动了我，使我想讲几句话。

但我今天并不想来为自己个人辟谣。国民党的造谣已经太出名了，他们这批谣言专家实在太大胆，也太不高明了。用不着我

---

* 本文是艾思奇于1946年9月11、12日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所作的广播词。

来辟谣，谣言本身的荒唐无稽，就够使它自己完全破产了。谁也不会相信，住在延安的艾思奇，会有这么神奇鬼怪，能够把远在万里之外的李公朴先生杀死。从封神榜上学来的特务造谣技术，是万万骗不了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人民的。对于这一个谣言，我只想说一句话，这就是说：国民党当局是在“做贼喊贼”。

我说国民党当局是在“做贼喊贼”。我相信全国人民一定都能够同意我这种说法。真正的贼，真正杀死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的凶手，不是别人，就是国民党最高当局和它们所指挥的特务机关，这是很明显的事实，用不着做什么调查，只要把大家都知道的情形研究一下，就够证明一切了。

举一些例子来说吧。李公朴、闻一多两位先生被害之后，全国人民以及一切关心中国和平民主的人士都表示非常哀悼。全国各地纷纷通电唁慰、开会追悼、募款救济家属，许多地方组织了后援会。如果两位先生不是国民党当局杀死的，那他们至少也应该有些起码的表示。但是，我们看，国民党当局曾经直接发了一个唁电、或者开了一个追悼会没有呢？这样重要的人物被暗杀了，国民党当局都表示得非常冷淡，这说明什么呢？除了说明他的对于死者抱着绝大的仇恨之外，又能说明什么呢？

全国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对于李、闻两先生被害的案件，都非常重视，要求彻底追究凶手，由各党派代表、社会贤达、和国民党当局共同组织公审。如果李、闻两先生不是国民党当局杀死的，他们就应该表示坦白，表示认真，应该毫无顾忌地接受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要求，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但是他们这样做了没有呢？他们是再三地拒绝这样做。为什么在昆明审讯闻一多先生的案件时，除中央社以外的记者就不许参加观审呢？梁漱溟先生要求把案子移到京沪公审，上海的美国报纸《大陆报》也提出同样要求，为什

么国民党当局竟不敢接受呢？为什么全国人民这样重视的大暗杀案，国民党当局的代表偏要说是小事情，警告民主同盟不要深究，一定只许马马虎虎草率了事呢?这种遮遮掩掩的态度，除了证明他们自己“做贼喊贼”之外，又能证明什么呢？

全国人民对于两位民主战士的死，是万分的悲痛，对于杀害两位群众领袖的凶手，是万分的憎恨。如果两位先生不是国民党当局杀死的，那么国民党当局所表示的态度至少也不应该和全国人民完全相反。但是，请大家听一听顾祝同说了什么话？他是代表南京最高当局到昆明去专门处理这一个案件的，他在审讯闻一多先生的案件之后发表了谈话。他的谈话的惟一特点，就是对死者完全的仇视，而对于凶手却完全一鼻孔出气，顾祝同的谈话，完全重复了所谓凶手李文山、汤时亮的话，重复他们在法庭上对闻一多先生的诬蔑，说闻先生“辱骂政府、诋毁军人”，并且向“全国人民”作了一个威胁性的暗示：表示如果有人再像李公朴、闻一多两位先生一样，坚决要为中国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争取和平、反对内战，那么，顾祝同就要按照李文山、汤时亮的办法，把闻所做的事情加上“辱骂政府、诋毁军人”的罪名，用美国制造的枪弹把他打死。国民党当局的这种态度，除了证明他们和凶手是同谋者之外，又能证明什么呢？

李、闻两先生被害之后，其他许多民主人士的安全都发生了问题，这使全国人民都非常关心。如果国民党当局不把民主人士当做自己的死对头，如果他们不是杀害两位先生的凶手，他们就应该表示同样的关心，他们就应该懂得，在自己的统治之下出现了法西斯暗杀案件，乃是国民党政府的一件很丑的丑事，他们就应该用一切力量、一切方法，使国民党统治区的暗杀恐怖减少或者消灭。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李、闻案发生后，国民党统治区

的恐怖空气绝不是减少，而是空前增大了，许多民主人士的名字都被列入暗杀的黑名单，潘光旦等十一位教授还因此逃到美领事馆去避难，民盟的北平负责人之一孙中原先生失踪了，张澜先生在成都又被打了。顾祝同当了钦差大臣飞到昆明以后，第一件大事情就是杨竹庵等许多地方人士无缘无故地被抓去受刑。连龙云将军的公子也被看管起来了。国民党当局的一切措施都助长了恐怖空气，使全国人士、民主人士以及地方人士都不得不更努力来反抗这恐怖，更坚决地进行斗争。由这些事实看来，国民党当局是已在有计划地布置暗杀，制造恐怖，难道还不明显吗？

要证明国民党当局就是杀人的凶手，还可以举很多的证据，但我想不应该再浪费大家的宝贵时间了。如果大家要问，国民党当局为什么要采取这样卑劣的手段，那么，只要看一看被杀的是什么人，就可以完全明白。李公朴、闻一多两位先生，是全中国公认以至国际上也公认的民主人士，他们为了中国的和平、民主事业，奋不顾身的工作了多年，中国人民对他们是十分的爱戴。只有仇视和平、仇视民主的法西斯反动派，才会仇视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这样的民主人士，才一定要把他们置之死地。国民党当局暗杀李公朴、闻一多先生等民主人士，就因为国民党当局正是仇视和平、仇视民主的法西斯反动派。国民党当局要破坏和平、扩大内战、绞杀民主、加强独裁，实行暗杀恐怖政策，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看，自从日本投降以来，国民党曾三次破坏和平协定，向解放区发动了三次大规模进攻，同时也就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三次大规模的恐怖和屠杀。第一次破坏了去年的双十协定，发动了津浦、平汉、同浦、平绥的四路进攻，在国民党统治区就发生了12月1日屠杀学生群众的昆明大惨案。第二次破坏今年1月10日的停战协定和3月27日的苏北停战协定，在东北发

动了本溪、四平街的进攻，同时国民党特务就在东北暗杀了李兆麟将军和于树中等许多抗日民主人士，在西安杀了主任律师并且几乎杀死了李敷仁先生，在南通惨杀了新闻记者孙平天。国民党当局这次暗杀李公朴、闻一多先生，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呢？是正当他们把百分之九十的兵力，投到中原、苏皖、豫东、山东、山西、冀东等许多解放区前面，来发动全国规模的大内战。在这样的时候，国民党当局暗杀李公朴、闻一多先生并且制造种种恐怖案件，是想达到什么目的呢？我看他们主要的目的有三点：第一，他们想镇压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不许他们要求和平民主，以便他们顺利的实行内战计划；第二，他们想利用暗杀案造谣挑拨，来分裂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破坏中共和民盟的关系，以便加强他们的独裁统治；第三，他们想制造借口，进一步吞并云南的地方势力。

国民党当局的这些企图能不能达到目的呢？我敢说他们一定不能达到。国民党当局现在出卖中国的领土主权，从美国换来两把屠刀，一把用来屠杀解放区的人民，另一把用来屠杀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他们跟全国人民做敌人，就遭受全国人民有力的反击。看吧，从 7 月到现在，国民党进攻解放区的军队已经到处碰得头破血流，损失了二十万人以上，如果他们再不停止进攻，我敢说结果一定是一败涂地。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力量，也一天比一天加强，要求和平民主，要求自由生存的运动正在高涨。国民党特务的造谣挑拨，其结果是使全国人民更加鄙视他们。消灭异己、并吞地方势力的阴谋也在不断的暴露和破产。全国人民和各党派现在都有充分的信心，把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切内战独裁阴谋打垮，把中国法西斯特务恐怖政治打垮，实现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

（原载《解放日报》1946 年 9 月 15 日，《人民日报》〔晋冀鲁豫〕转载）

反对经验主义

(1948.7)

一

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四八年土地革命和整党工作的指示》里，提出要反对经验主义的工作方法。中央宣传部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的前言，号召全党干部“迅速克服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或经验主义”。两个文件把经验主义作为目前我们干部中一种主要的不正确的思想方法，指出这种思想方法在实际工作中曾经造成了许多严重的错误，并使中国人民在争取全国民主革命胜利的事业中遭受了损失。因此，我们的干部必须把反对经验主义作为目前学习中的主要课题之一。

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一种，它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一个共产党员的思想方法如果为主观主义所支配，他就不可能保持坚强的党性，就不可能成为真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为着反对主观主义，1941 年 5 月，毛泽东同志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演讲，1942 年 1 月，又作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演讲，并领导全党进行了整风运动。在《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演讲里，毛主席很强调地把“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当作整风运动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提了出来。

毛主席说：“我们党中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反对主观主义，就是一方面要反对教条主义，

而另一方面又要反对经验主义，就是要正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所谓正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说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与实际经验的结合。主观主义却没有这样的一种结合。主观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分裂，就是理论知识与实际经验的分裂。教条主义的分裂，就在于它仅仅满足于书本的理论知识，并使书本的理论知识绝对化，不问时间、地点、目的、对象以及其他具体条件如何，把单纯的书本知识做为征服一切的法宝，盲目地机械地到处使用这一个法宝，去解决各种不同的具体问题，而完全轻视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的一切有价值的经验和已由毛泽东同志从这种经验所概括出来的理论，完全不懂得理论本身也就是实际经验的总结，书本中所学得的一般理论知识只能作帮助我们总结自己经验的指针。经验主义的分裂，则在于仅仅满足于自己狭小工作范围内的局部经验，而不肯学习各方面的经验，不会集中和坚持有普遍性的经验，不会在一般的理论指导之下来总结这些经验，因此，也就不能领会毛泽东同志从中国革命实际经验中所概括出来的理论。不论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都只能具备片面的革命知识，不能掌握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而如果不能掌握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这种缺少马克思主义经验的人，在主观上往往还是很骄傲地自以为是完美的革命者，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常常做出许多于敌人有利而于人民有损的错误行为。

毛主席说：“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必须使上述两种人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必须使两种人互相结合。有书本经验的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知识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

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到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的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的真理才可以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两者都是主观主义，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的东西。”（《整顿学风党风文风》）

二

1942年以后的整风运动，收到了很大的成效。在整风的号召之下，许多有书本知识的同志纷纷走到实际中去，或从事实际的研究工作，许多有实际经验的干部也开始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程度和理论知识。两种人和两种片面知识，开始由分裂转向结合，许多干部的思想水平因之提高了一步，在党内产生了一批既有丰富的革命经验，又能掌握理论指导的干部和领导者，这就成为今天中国革命战争和各方面革命运动向全国胜利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对于这样的事实，毛主席在去年12月25日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演讲里作了总结说：“整风运动，是一般地收到了成效，主要地是在于使我们的领导机关及许多干部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之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

但是必须注意，毛主席在这里只说整风运动是“一般地收到了成效”，并不是说，经过了整风运动，党的干部思想就已经完全没有问题，或者说主观主义已经完全肃清了。不是的，事实并不是这样的。主观主义的毛病，还必须继续努力，才能完全克服；教条主义的残余在某些干部思想中还起着坏作用；特别是经验主义，还是今天很多实际工作同志的思想方法上所必须克服的主要危险。

1942年的整风运动，特别强调反对教条主义，因为那时在思想方法上成为党内主要危险的东西，正是教条主义。在两种主观

主义之中，教条主义是居于主要的地位。毛主席对当时的情形这样说："现在我们党内主要的还是教条主义最为危险。因为教条主义最容易装出马恩列斯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把土包子俘虏起来，充作自己的用人，而工农干部不易识破他们的面孔。也可以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因此，自整风运动以来，对于两种主观主义的斗争，着重点是反对教条主义，在这方面所收的成效也比较大。教条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在一般干部中被认识得比较清楚，它已失去了当年的威风，不再有吓唬工农干部和俘虏青年的力量了。自然，教条主义就在今天也还有不少的残余，例如，许多干部在执行党的政策时，还不懂得使一般的号召和个别的解决相结合，还不注意去了解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和条件，不懂得依照各种不同的具体环境条件而采用不同的步骤来实现这些政策。不少干部还不能脱离命令主义官僚主义的恶劣习惯，把一般的号召和一般的政策生硬地带到各种工作环境里去，他们常常采取强迫命令的方法要群众接受这些号召和政策，而不会逐步引导群众提高觉悟程度来自愿地加以接受。这些就是教条主义表现在目前实际工作中的一种具体形态。但是，从整个说来，教条主义已经不是像当年那样居于主要地位了。

经验主义的情形却有些不同。在整风运动中，经验主义也受到批判，但因为当时的重点是反对教条主义，许多同志对于经验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性质还没有认识得很透彻，对于它所产生的危害性还没有足够的估计和重视。这是第一。其次，多年来的游击战争与革命根据地被分割为许多独立单位的分散环境，使很多同志的思想被束缚于狭小的工作范围，使他们习惯于从个别地方的条件和个别地方的经验来考虑和解决问题，而不善于从革命全局的观点上来考虑和解决问题，不善于把地方上的问题联系于

党的总的路线和政策。由于以上主观的和客观的两种原因，就使经验主义在目前还成为我们很多干部在工作中的一种重要的错误的思想方法。在着重地反对了教条主义之后，反对经验主义就成为当前反对主观主义思想方法之主要的方面了。在目前中国革命的发展形势之下，努力克服经验主义，已成为我们迫切的课题。中央宣传部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的“前言”里，关于目前的革命形势这样说：“由于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我们中国共产党已在拥有一亿六千万人口并在某种程度上连成一片的地区当政。没有疑问，随着革命的胜利，我们党行将成为统一的全国人民民主政权的领导政党。”这种情势所提给我们党的任务是：“全国的革命形势，要求我们全党全军在一切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的政策完全统一，而行政制度与行政机构也要求逐渐实行必要的与可能的统一，要适当地缩小各个地方和各个兵团的自治权，要将全国一切可能统一与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的领导之下，以便集中力量进行全国规模的解放战争和着手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各种新建设。”很明显的，这样的形势和任务，就需要我们各地和各工作部门的干部，在思想上超脱出狭小工作范围的束缚，学习在各种重要问题上联系着目前中国革命的全局趋势来加以考虑和解决，学习把一定范围或一定条件之下的具体的个别问题和党的总路线和政策联系起来。而如果我们各地方和各部门的干部，还保持着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如果他们的思想还只停止在个别的地方条件和局部经验的圈子里，而忘记了党的总的路线和政策，那么，这种思想方法无疑地就要与党在目前形势下的统一领导的要求发生矛盾，就要发生地方主义和无纪律的倾向，就要阻碍正确的路线和政策之实现。

三

中央宣传部的“前言”这样说：“过去由于长期游击战争与革命根据地被分割为许多独立单位的分散环境，在各个单位中，又有各种不同的敌情、地形和政治经济条件的差异，因此我们就不能不高度地发展地方性，不能不高度地发展各个单位的地方自治权，因而也就高度地发展了各个单位的地方积极性与创造性，克服了当时的极为复杂的困难，把中国革命推向了全国规模的胜利。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方针。但是，正由于这样，也就在我们不少的同志中造成了一种分散主义或地方主义的习惯，造成了党内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这些，则是错误的与有害的。”必须注意一定地方一定部门的特点，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有许多同志在工作中常常过分地强调一定地方一定部门的“特殊”，或带着尾巴主义的思想，不加分析地认为“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并以这些为借口，违反马列主义的原则，拒绝实行上级的指示，拒绝党的总的路线和政策之有步骤的实施。这就破坏了党的领导和纪律，这就对于党的全国统一领导之要求形成了思想的障碍。这就表示，经验主义已成为地方主义或分散主义，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之思想基础，而某些地方主义或分散主义，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之成为习惯，又成了经验主义顽固地存在的条件。因此，在克服地方主义或分散主义、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的斗争中，必须同时在思想上与经验主义作斗争。

反对经验主义，当然决不是在任何意义上承认或回到教条主义，也决不是否定一切实际革命工作经验的价值。相反地，马克思主义者十分重视一切有益的革命经验，而马克思主义的各方面的理论，正是革命的各方面经验之总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决不

是什么神秘的天才脑筋之偶然发现，而是无产阶级及一切人民群众的斗争经验之集中化、条理化。因之，问题并不在于经验本身，而是在于是否会分析经验，总结经验，从经验中找出关于事变的发展和问题的解决的规律知识。而经验主义的毛病，正是在于停止在分散、零碎的经验圈子里，而不会把经验提高到理论，来指导我们的革命斗争。有经验主义毛病的人，常常是眼光短浅，看不清事变发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因此也就不可能做有理论指导性的、有预见和有通盘计划的工作。

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在我们不少的干部中是表现得相当普遍的，例如：第一，仅仅满足于狭小工作范围内的局部经验，而不肯虚心学习各方面的新经验。其弊害是不能够在时间、地点、条件变化了的情形之下灵活地改变工作方法，硬把不适合的或旧的经验搬来应用。如把农村中反封建斗争的方法硬搬到城市里去，把长期游击战争时期分散独立工作的经验硬搬到目前解放区已经大块地连成一片的局面里去。第二，眼睛里充满了各种各样分散零碎的经验，跟着不同的经验左右摇摆，而不能保持思想上和工作上的主动性，不能用科学头脑对纷纭繁杂的经验加以分析和总结。如群众运动中的尾巴主义，强调一切要听群众意见，而放弃了无产阶级政党对于群众所必需的领导和教育。又如 1948 年土改和整党工作的指示里指出的一种经验主义的开会方法："事前毫无准备，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向干部作精心准备好了的内容文字都有斟酌的报告，而听凭到会人无目的杂乱无章的议论，致使会议时间延长，得不到周密的结论。"此外，在我们今天的新闻通讯工作中流行的片面性、孤立性的报道，也是这种经验主义的反映之一；这种报道把一时一地一人一事的个别细节充满了我们的报纸（当然，毫无疑问的，在这些细节报告

中，是有许多极有价值的和必须发表的东西），但是不能告诉我们任何广大范围内任何重要问题的全盘动向，动态，运动的进度，运动中的矛盾（一方面是成绩和正确的东西，另一方面是困难和错误的东西），产生这些矛盾的症结和解决它们的关键。所有这类方法之所以叫做经验主义的，也正是在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个别，不见一般，任随分散零碎的经验之支配，而不能予以概括，使之上升到理论。这种思想方法上的经验主义，表现在工作方法上就成为事务主义。第三，有些同志采取一种更低级的完全无原则的立场，他们似乎自居为经验的百宝箱，在里面贮藏着各种不同的甚至于互相矛盾的经验，而对于这些经验的正确与错误，并不加以分辨，只看你要什么，就拿出什么来。这种经验主义，常常是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的领导之一种补充，教条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有了这种经验主义者的帮忙，就可以高高在上，而为自己的任何主张和任何“指示”找到“经验”的证明。经验主义之所以成为教条主义的俘虏，正是由于它有着这样一种盲目性的缘故。

四

反对经验主义，就是要学习总结经验，把分散零碎的感性知识，提高到有综合性、条理性的理论知识。

要能总结经验，首先自然要学习各方面的经验，而不要仅只满足于狭小的局部经验。倾听各种群众的意见，可以帮助我们学到各方面的经验，因此，向群众学习，是很重要的。但是，总结经验，并不等于各种经验的简单积累，而须经过一番分析、研究。分析、研究，又需要有正确的方法指导，因此，必须首先学会总结经验的方法，分析、研究各种现象的方法。即是要学会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及其关于社会发展和阶级分析的理论。而

经验主义，就是缺少这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分析研究，我们的经验，一般来说不外就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斗争经验。人民大众中包含着许多阶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等等，中国共产党是通过自己的各种纲领政策来团结这些阶级，去反对代表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的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我们分析经验，就是要从许多经验中，认清革命斗争中各阶级的面目，他们的各种要求，趋向，以及我们的政策是否能引导他们对革命运动发挥积极的作用。要进行这样的分析研究，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的指导，是不可能的。同一个阶级在斗争中可以有各方面的要求，这些要求对于革命起着不同的甚至相反的作用。例如农民要求平分土地及封建财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这种要求是有革命的进步作用的，是我们应该赞成的。但农民中间，又有一种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思想；这种绝对平均主义，不但要破坏封建的土地和财产关系，而且要用平均主义的方法破坏中农、新式富农的土地和财产关系，并要用平均主义的方法破坏城乡资本主义的工商业。这就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是一种落后的反动的思想，是我们所必须反对的。分析经验，就是要分清这些阶级的不同要求及其不同的作用，以及如何确定适当的政策，以便引导群众发挥他们的进步的革命的要求和作用，防止和纠正他们的错误的要求和作用。没有阶级分析方法作为指导，要做到这样的研究，是不可能的。经验主义者，把尾巴主义代替了有领导的群众路线，认为群众的意见一切都是对的，这种错误的来源之一，就是没有阶级分析的方法。

要学会总结经验，还要能够分析各种经验所依据的条件。如果经验告诉我们，某一政策在一定的地方和一定的时间实施起来，

有很大成效，而在另外的地方和另外的时间却没有很大成效甚至发生了许多恶果，那么，就要了解这种不同的结果所以产生的原因，就要分析当地当时的各种主观和客观的条件。经过了这样的分析，我们就可能得出结论，确定某一种政策必须要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才能实施。《关于一九四八年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的指示》里，确定土地改革必须在三种条件完全具备的地方（环境安定，基本群众大多数已有土地改革要求，干部在数量和质量上确能掌握土改工作）才能实行，而在这些条件不完全具备的地方，即不应列入土改工作范围。这样的决定，就是分析了土改工作各方面经验的结果。

自从1941年7月党中央发布调查研究决定以来，党的许多组织一般都已认识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的重要，并且在这方面也已做了许多工作，积累了许多材料。但是许多同志还不懂得怎样去正确地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我们的许多同志，还缺乏分析的方法，因此常常积累了大批材料，还是不能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甚至把原因归之于材料还不够。毛主席曾经用过杀猪的比喻，反问这些同志道：杀猪的人难道是要把世界上的各种猪都杀过，把一切大猪、小猪、公猪、母猪、黑猪、白猪、花猪、中国猪、外国猪都杀过，然后才能总结杀猪的经验吗？不是的，一只通常的猪，就可以代表一切通常的猪。猪的年龄、性别、毛色、国籍，对于杀猪的方法是无意义的。同样，撇开一切无意义的表面现象不论，一个真正典型的事物，也可以代表一般同类的事物。如果对这个典型的事物，加以真正科学的分析，那么就完全可以发现必要的问题，并且提出正确的解决的方法。当然，社会性的事物彼此之间的差异，是要比猪与猪之间的差异复杂些，这里就发生了选择典型的任务，就发生了选择几种典型以代表几种情况的任务，就发

生了判断某些事物是否具有普遍性和本质性的任务，而所有这一切，就叫做分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经验主义方法的表现；但是为了见森林，而去数一棵一棵的树木，仍然是经验主义方法的表现，仍然达不到见森林的目的。为了了解森林，就要了解森林的一种或几种树木。同样，为了了解一种社会性的事物，也需要观察它的全貌并研究它的一种或几种典型。如此，就使得我们有可能提出一般解决问题的指示，而决不需要等候全部经验都收集齐备，要“等候几个月，或半年，甚至更长时间，下面才向上面作总结性的报告，上面才向下面作一般性的指示”，像今天在党的许多组织内流行的办法那样。这种办法，也是一种错误的、必需改正的经验主义的办法。此外，由于缺乏分析的方法，在我们同志总结经验的时候，还常常如同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中所说：“不去思考问题的本质，而满足有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不表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说来说去，还是一个中药铺，没有什么真切的内容”。这样，即使作出了总结性的报告和一般性的指示，对于工作也还是没有帮助，问题还是不能解决。由此可见，虽然作了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的工夫，但如果不解脱经验主义的束缚，不学会分析的方法，那么我们就仍然不能提高我们的工作，仍然不能及时地掌握动态，解决问题，并交流经验，纠正错误，发扬成绩。也就是说，仍然不能解脱主观主义的错误。

五

为了反对经验主义，我们的领导干部应当做些什么呢？

第一，应当提倡的事情，就是利用各种可能，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哲学（辩证唯物论，特别是历史唯物论）和

政治经济学。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必须进一步努力争取时间，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在我们许多同志中，目前还很缺乏“认真读书”的热烈空气。整风以来，在某些同志中还产生了一种错误的思想，以为凡读书翻译之类，都是“教条主义”，而否定了一切书本理论知识的价值。这种错误思想，足以阻碍党的理论水平之进步和提高。死钻在书本的牛角尖里，不知道把书本中的一定的知识结合于实际，用以帮助总结实际经验和解决实际问题，这才是教条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并不是反对阅读书本，而是反对把这种书本理论知识与实际经验相分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是无产阶级领导革命运动的国际经验之总结。从这些书籍里面，我们可以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许多普遍真理，学到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理论和阶级分析的理论，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之具体应用，即学到马克思和列宁怎样去解决各种具体问题。整风运动，是要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也就是要我们学会把这些普遍真理作为指导，来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使之上升为指导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正确理论。因此，我们必须依照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的报告里所给予的指示，在可能的一定时间来“认真读书”。我们尤其要认真研读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应该说：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无产阶级领导革命运动的国际经验的一种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的一部分。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特别总结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各时期和各方面的经验，因此也就是我们学习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之最好的模范。

第二，要认真研究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经验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不重视这些纲领、路线和政策的研究，因此在实际行

动中常常把它们忘记了，或者只记得某些个别的具体的路线和政策，而忘记了总的路线和政策。这样就使得许多同志在执行政策的时候，不断发生左右摇摆。所谓认真研究，自然不是说要一字不漏地死背文件，或是不管具体情况如何，一字不改地死搬文件。应当指出：与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的方法相反，中央的指示文件总是谨慎地区别着不同的情况而提出不同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并且反复地教育干部按照具体情况来执行的。中央规定：各地党的组织发现这些文件“如有不适合当地情况的部分，可以和应当提出修改的意见，但必须取得中央同意，方能实行修改”。今天的严重情形，主要地并不在于死背或死搬中央的文件（这无疑是错误的），而在于许多干部根本不认真研究和严格执行中央的文件，反而任意借口情况特殊，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级的政策，执行自以为是的错误的政策，事前既不请示，事后也不报告，这就形成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因此，反对忽视中央的指示文件，要求干部对于中央文件实行认真的详细的研究，以便透彻了解中央的路线、政策，深刻领会中央的思想方法，乃是克服经验主义的必要条件。

第三，除了以上两个办法以外，为了克服经验主义，还要提倡全党干部在自己的工作中学习正确地调查研究，分析情况，分析经验，随时随地养成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的习惯。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也好，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也好，中央的指示文件也好，究竟不可能把我们每天工作中所遇到的每个问题都给以具体的解答。相反地，所有这些著作和文件，都是坚决要求我们多多独立地思想，而坚决反对那些一切希图现成的思想上的懒汉的。毛主席说：“有些人虽然有联系群众的长处，但是不善于思索，不愿用脑筋多想苦想，结果仍然做不成事业。列宁经常劝人要善于思索，我们也要这样劝

人。"如前所说，现在党内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的一般习惯是有了，所缺乏的乃是分析的方法；而提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和中央的指示文件，其主要目的之一，也就是要学习这个分析的方法。这个学习，一方面需要认真读书，一方面尤其需要实际应用。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灵魂，这是正确执行中央路线政策的关键，这是我们全党干部在每天工作中不可以片刻离开的武器。我们学会了使用这个武器，就会使我们既能解脱教条主义，也能解脱经验主义。

（原载《人民日报》1948年7月17日；香港版《群众》第2卷第22期1948年7月22日转载；曾收入《论主观主义》和《艾思奇文集》第一卷）

附录一：

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

（1942 年主编）

---

* 本书原是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交给的任务，任命艾思奇为主编。参加编辑和摘录工作的有当时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全体和政治研究室部分同志，由艾思奇筛选、编排、拟题、校阅，不少是他从原著中翻译的。最后，经毛泽东审核批准，以“本书编辑委员会”名义，由延安“解放社”出版。这本书成为当时十二本干部必读之一，对于提高广大干部的哲学理论水平，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加深理解毛泽东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精神，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1983 年间，经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胡耀邦同志的推荐和指示，由中央党校教务办公室和中央党校出版社，将本书原版重印，发给中央党校学员学习。重印时除几处仍保留旧译文外，其余都已改用新译文。删去了原书附录的七个材料。我们这里采用的就是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 年 6 月的第 1 版。考虑到此书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编辑很有特点，艾思奇曾付出许多心血，所以，作为附录收入本卷。

例　言

（一）本书是在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号召之下编纂起来的，目的是要帮助同志们掌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方法，来整顿我党的学风、党风和文风，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战斗。为要说明本书编纂的动机及其精神，我们把毛泽东同志《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作为代序。

（二）本书章节与内容的编列，在各部分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放在某一章与某一节的东西，有的也可以放在另一章与另一节。问题是需要读者善于领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每段思想的实质。

（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文献，在中国还是不足，本书所搜集到的东西，当然也还是很不完全的，我们希望此后能继续补充。至于译文方面，有些不完善之处，我们也希望将来得有重新校勘的机会。

本书编辑委员会

1942 年 4 月 22 日

改造我们的学习
（代　序）

（1941.5）

毛泽东

我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其理由如次：

一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则现在我们对于这些的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抗日战争以来，我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研究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是进一步了，研究

中国历史也有某些开始。所有这些,都是很好的现象。

二

但是我们还是有缺点的,而且还有很大的缺点。据我看来,如果不纠正这类缺点,就无法使我们的工作更进一步,就无法使我们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

首先来说研究现状。像我党这样一个大政党,虽则对于国内和国际的现状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绩,但是对于国内和国际的各方面,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二十年来,一般地说,我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真理。

其次来说研究历史。虽则有少数党员和少数党的同情者曾经进行了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组织地进行过。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

其次说到学习国际的革命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

真理。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

上面我说了三方面的情形：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

确实的，现在我们队伍中确有许多同志被这种作风带坏了。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具体情况，不愿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这种主观主义的作风，不是还在许多同志中间存在着吗？

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检来的。

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

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

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他们既然违背了这条原则，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在延安学了，到鄜县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

当然，上面我所说的是我们党里的极坏的典型，不是说普遍如此。但是确实存在着这种典型，而且为数相当地多，为害相当地大，不可等闲视之的。

三

为了反复地说明这个意思，我想将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对照地讲一下。

第一种：主观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

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我们的许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其中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

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的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

第二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

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如果有了这种态度，那就既不是“头重脚轻根底浅”，也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了。

四

依据上述意见，我有下列提议：

（一）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为此目的，就要引导同志们的眼光向着这种实际事物的调查和研究。就要使同志们懂得，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们懂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夸夸其谈地乱说一顿和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都是无用的。例如关于宣传工作，如果不了解敌友我三方的宣传状况，我们就无法正确地决定我们的宣传政策。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都必须先有情况的了解，然后才会有好的处理。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二）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

（三）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应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中心的材料。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

我们走过了许多弯路。但是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在如此生动丰富的中国革命环境和世界革命环境中,我们在学习问题上的这一改造,我相信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第一章　绪论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特点

一、列宁论马克思主义与旧唯物主义旧社会主义的分歧

马克思在1844——1845年就阐明了旧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缺点在于不能了解革命实际活动的条件和评价革命实际活动的意义，他毕生除了从事理论写作外，还毫不松懈地注意着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问题。马克思的一切著作，特别是1913年出版的四卷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都为这方面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这种材料还远未收齐、综合、研究和整理。因此，我们现在只能作最一般最简短的说明，同时着重指出，马克思公正地认为唯物主义缺少这一方面就是不彻底的、片面的和毫无生气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是严格根据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切前提确定无产阶级策略的基本任务的。只有客观地考虑某个社会中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全部总和，因而也考虑该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考虑该社会和其他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成为先进阶级制定正确策略的依据。而在观察各个阶级和各个国家时，不应当认为它们是静态的，而应当认为它们是动态的，也就是说，不应当认为它们处于不动的状态，而应当认为它们处于运动的状态（这个运动规律是从每个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中产生出来的）。观察运动时又不仅要着眼于过去，而且要着眼于将来，并且不是按照只看到缓慢变化的“进化论者”的庸俗见解进行观察，而是要辩证地进行观察：……（列宁：《卡

尔·马克思》。见《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602 页）

尽可不同意马克思，但决不能反驳这样的事实，就是马克思万分确定地表述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对从前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完全是“新东西”。其所以是新东西，是因为从前的社会主义者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认为只须指明群众在现代制度下受压迫的事实，只须指明使每个人都可获得自己生产的东西的那个制度的优越性，只须指明这个理想制度的适合“人类天性”、适合理性道德生活概念等等就足够了。马克思认为不能以这种社会主义为满足。他并不限于评论现代制度，评价和斥责这个制度，他还对这个制度做了科学的解释，把这个在欧洲各国和非欧洲各国表现得不同的现代制度归结为一个共同基础即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并对这个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做了客观分析（他指明了这个制度下的剥削的**必然性**）。同样，他认为不能满足于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及其渺小的后裔即主观社会学家所说的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适合人类天性的断语。他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这种客观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见《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24—25 页）

二、列宁论科学精神与革命精神相结合

这一理论①对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是偶然地结合起来（即不仅因为学说的创始人本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是把二者内

① 指马克思主义。

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实际上，这里直接地提出理论的任务、科学的目的是帮助被压迫阶级去进行他们已在实际进行的经济斗争。

“我们并不向世界说：停止斗争吧，你的全部斗争都是无谓之举，而是给它一个真正的斗争口号。”①

因而在马克思看来，科学的直接任务就是提出真正的斗争口号，即善于客观地表述这个斗争是一定的生产关系体系的产物，善于了解这一斗争的必然性、它的内容、它的发展进程和条件。要提出“斗争口号”，就必须十分详细地研究这一斗争的每种形式，考察它由某一形式转为另一种形式的每一步骤，以便善于随时判定局势，不忽略斗争的总性质和总目的——完全地最后地消灭任何剥削和任何压迫。（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附录三。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81—82页）

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不同，它既能以非常科学的冷静的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进化的客观进程，同时又能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同某些阶级的联系，并实现这种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力、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并且把这两方面卓越地结合起来。马克思根据自己的全部历史观点对人类发展的革命时期作了很高的评价，因为正是在这种时期，解决了所谓和平发展时期慢慢积累起来的许多矛盾。正是在这种时期，最有力地表现出了各个不同的阶级在确定社会生活形式方面的直接作用，建立了后来长期固

① 引自马克思1843年9月给卢格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8页。

定在更新了的生产关系基础上的政治“上层建筑”的根基。同时，马克思和自由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不同，他认为这种时期不是脱离了“正常”的道路，不是“社会病态”的表现，不是过激和谬误的可悲的结果，而是人类社会历史中最有生气、最重要、最本质、最具有决定性的关头。(列宁:《反对抵制》。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729页)

三、列宁、斯大林论“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编者按**：关于此节，可参看第二章第四节：《论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需要最大的灵活性》，以及第四章第三节：《论考察、研究民族的特点》，特别是其中恩格斯的几封信和列宁关于马克思学说的一段名言)。

恩格斯在谈到他自己和他那位赫赫有名的朋友时说过：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①。这个经典式的定义异常鲜明有力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往往被人忽视的那一方面。而忽视那一方面，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就会破坏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的一定的实际任务，即随着每一次新的历史转变而改变着的任务之间的联系。

正是现在，在那些关心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命运的人们中间，往往有一些人恰恰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方面。然而谁都知道，

① 参看恩格斯1886年11月29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6页。

俄国近年来发生的急剧变化异常迅速、异常剧烈地改变了客观形势，改变了密切地、直接地决定着行动条件，因而也决定着行动任务的社会政治形势。当然我所说的并不是总的基本的任务，这样的任务在各阶级间的根本关系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是不会随着历史的转变而改变的。非常明显，俄国经济(不仅是经济)演进的总趋势，也像俄国社会各阶级间的根本关系一样，近六年来并没有改变。

但是在这一时期中，因为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改变了，最近的直接行动任务也有过极大的改变，**因此**，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列宁:《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见《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398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很多次，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我想，我们应当首先特别注意这一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不是我们熟读死背的教条。应该把它当做行动的指南。我们一直这样说，而且我认为，我们的行动是适当的，我们从没有陷入机会主义，而只是改变策略。这无论如何不是背弃学说，无论如何不能叫做机会主义。(列宁:《莫斯科党工作人员大会关于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的报告的结论》。见《列宁全集》第 28 卷第 199 页)

马克思主义中的俄国机会主义即现代孟什维主义的特点，就在于它用教条主义态度把马克思主义的规定简单化、庸俗化和加以歪曲，背叛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工人事业派和司徒卢威主义也曾是如此)。(列宁:《给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的一封信》。见《列宁全集》第 16 卷第 115 页)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现成的**经验**，并且认为不能臆造出**资产阶级的**运动，因此自然不可能**在革命开始以前**提出正确的土地纲领。但是，他们是犯了一种错误，就是**在**革命开始**以后**没有把马

克思的理论**运用到**俄国的特殊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常教导我们说，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却毫无批判地重复别人在不同条件下、在**另一个**时代运用马克思的理论所得出的结论。（列宁：《社会民主党在 1905—1907 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见《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773 页）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非常深刻、全面的学问。因此，在那些背弃马克思主义的人提出的"理由"中，常常看到引自马克思的只言片语，特别是引证得不对头的地方，这是不足为奇的。（列宁：《给同志们的信》。见《列宁全集》第 26 卷第 192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①；卡尔·考茨基、奥托·鲍威尔这类"享有专利权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大错误和最大罪恶，就是他们不懂得这一点，不善于在无产阶级革命最紧要的关头运用这一点。马克思以前的俄国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常说："政治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涅瓦大街是彼得堡一条笔直的主要街道，它的人行道清洁、宽广而平坦。）自车尔尼雪夫斯基以来，俄国革命家由于忽视或忘记了这个真理，遭受了无数的牺牲。（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见《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226 页）

列宁的伟大，正在于他没有做马克思主义字句的俘虏，而善于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并从这个实质出发，向前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斯大林：《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见《斯大林全集》第 8 卷第 222 页）

要善于区别马克思主义的字句和实质，区别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和方法。列宁所以能够发现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

① 参看恩格斯 1886 年 11 月 29 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56 页。

真理，因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没有做字句的奴隶，他善于抓住马克思主义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斯大林：《〈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报告的结论》。见同上书第272—273页）

你们看，季诺维也夫像小学生那样引证马克思，抛开马克思的**观点**，抓住马克思的个别词句，他不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作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来应用这些引文。

修正派引证马克思的手法是什么呢？修正派引证马克思的手法就是离开一定时代的具体条件，从马克思的个别原理中引出一**些话**来顶替马克思的**观点**。

季诺维也夫引证马克思的手法是什么呢？季诺维也夫引证马克思的手法就是引证马克思的**词句**，割断这些词句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发展条件的有机联系，把它们变成教条，用它们来顶替马克思的**观点**。

…………

……把恩格斯这个适用于资本主义的旧时期的原理①机械地应用到资本主义的新时期即帝国主义时期，这就是歪曲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观点，以迁就那些离开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期的实际发展条件而引来的个别词句。我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已经说过，恩格斯的这个公式在当时是惟一正确的公式。可是应该了解，不能把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还谈不上垂死的资本主义的时期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现时期，即整个资本主义成了垂死的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时期混为一谈。从前认为不可能的，现在在资本主义新的条件下已经成为可能的和必要的了，这难道难以了

① 这里是指恩格斯在1847年所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一书中关于社会主义不能在单个国内建设胜利的命题。

解吗？(斯大林：《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见《斯大林选集》上卷第562—563页)

季诺维也夫的引证手法使我想起了关于社会民主党人的一个很可笑的“故事”，这个“故事”是瑞典一个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在斯德哥尔摩讲的。这是在1906年我们党的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开会时候的事情。这位瑞典同志把某些社会民主党人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时所表现的书呆子气描绘得十分可笑，我们这些代表听了，笑得全身发软。“故事”的内容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克里木水兵和步兵起义的时候。水兵和步兵的代表去见社会民主党人说，近几年来你们号召我们起义以反对沙皇制度，我们深信你们的号召是正确的，我们水兵和步兵约定起义，现在特来请求你们指示。社会民主党人慌张了起来，回答说他们不召开专门代表会议不能解决起义问题。水兵们示意说，不能再迟延了，事情已准备好了，如果他们得不到社会民主党人明白的答复，社会民主党人不来领导起义，事情就会失败。水兵和步兵随即离去，等候指示，而社会民主党人就召开代表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拿出《资本论》第一卷，拿出《资本论》第二卷，最后拿出《资本论》第三卷。他们寻找马克思有关克里木、塞瓦斯托波尔的指示，有关克里木起义的指示。但是找遍三卷《资本论》，都没有找到一个，确实没有找到一个有关塞瓦斯托波尔、有关克里木、有关水兵和步兵起义的指示。(笑声)他们又翻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寻找指示，还是任何指示也没有找到。(笑声)怎么办呢？水兵们已经来了，等着答复。结果怎样呢？社会民主党人只好承认，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不能给水兵和步兵任何指示。瑞典同志结束自己的故事说：“水兵和步兵的起义就这样失败了。”(笑声)

无疑地，这个故事夸大了事实。但是，同样无疑地，这个故

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季诺维也夫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法的主要毛病。(斯大林:《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见《斯大林选集》上卷第565—566页)

不能要求距今四十五至五十五年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预见到每一个别国家在遥远的将来所发生的所有一切历史曲折。如果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对每一个别国家在五十至一百年以后可能发生的一切理论问题都给我们作出现成答案，使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后代可以安然地躺在暖炕上来咀嚼这些现成的答案，那就太可笑了。(全场大笑)但是我们可以而且应当要求现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局限于背熟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的一般原理，而要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学会经常考虑到社会主义国家在我国存在二十年的经验，最后，并学会根据这个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的一般原理具体化，使其更加确切和完善。(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68页)

党的历史教导说，工人阶级的党如果不掌握工人运动的先进理论，不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就当不了本阶级的领导者，就当不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力量，就在于它使党能判明局势，了解周围事变的内在联系，预察事变的进程，不仅洞察事变在目前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而且洞察事变在将来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

只有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党，才能信心百倍地前进，并引导工人阶级前进。

相反，没有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党，却不得不徘徊摸索，对自己的行动失去信心，没有能力引导工人阶级前进。

有人也许以为，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只要做到用心熟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中的某些结论和原理，学会及时引证这些结论和原理，就算不错了。他们是指望把熟读的结论和原理用于各种环境、用于实际生活的一切场合。但这样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完全不正确的。决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看成是教条汇编、看成是教义问答、看成是信条，而把马克思主义者本身看成是一些咬文嚼字的人和书呆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关于工人运动的科学，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它既是一种科学，就不会也不可能停留不前，而会不断发展和不断完善。显然，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不能不用新的经验和新的知识来丰富自己；它的某些原理和结论不能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不能不用适合于新的历史条件的新结论和新原理来代替。

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决不是说要熟读它的一切公式和结论，抱住这些公式和结论的每一个字句不放。要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首先必须学会把它的字句和实质区别开来。

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说要领会这个理论的**实质**，学会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各种条件下运用这个理论来解决革命运动的实际问题。

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说要善于用革命运动的新经验来丰富这个理论，善于用新原理和新结论来丰富这个理论，善于**发展和推进这个理论**，不怕根据这个理论的实质去用适合于新的历史形势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来代替它的某些已经陈旧的原理和结论。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在俄国第二次革命（1917 年 2 月）以前，各国的马克思主义

者都认为，议会制民主共和国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对社会最适宜的政治组织形式。固然，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曾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最适宜的形式不是议会制共和国，而是巴黎公社式的政治组织。但可惜马克思的这一指示没有在著作里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于是就被人遗忘了。此外，恩格斯在 1891 年对爱尔福特纲领草案的批判中所作的权威性声明，即“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①，也无容置疑地表明马克思主义者继续认为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恩格斯的这个原理后来成了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列宁在内——奉行的准则。但是，俄国 1905 年的革命，特别是 1917 年 2 月的革命，提出了工农代表苏维埃，即一个社会的新的政治组织形式。列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根据他对俄国两次革命经验的研究，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专政最好的政治形式不是议会制民主共和国，而是苏维埃共和国。根据这一点，列宁在 1917 年 4 月，即在从资产阶级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时期，提出了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最好的政治形式的口号。当时各国机会主义者都抱住议会制共和国不放，责备列宁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破坏了民主。但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是列宁，而不是机会主义者，因为列宁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用新的经验丰富了这个理论，而机会主义者则把这个理论向后拉，把它的一个原理变成了教条。

如果列宁为马克思主义的字句所束缚，不敢用苏维埃共和国这一适合新的历史形势的新原理来代替恩格斯所表述的马克思主义的旧原理，那末党、我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会是什么情况呢？党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274 页。——译者注

就会在黑暗中徘徊，苏维埃就会瓦解，我们就不会有苏维埃政权，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会遭到严重的损害。无产阶级就会遭到失败，无产阶级的敌人就会获得胜利。

恩格斯和马克思在研究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时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它只有在一切或大多数文明国家同时举行进攻的条件下才能获得胜利。这是在十九世纪中叶说的。这个结论后来成了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奉行的准则。但是，到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已经转变成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上升的资本主义已经变成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根据他对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的研究，得出结论说，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旧公式已经不适合于新的历史形势，社会主义革命完全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当时各国机会主义者都抱住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旧公式不放，责备列宁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但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是列宁，而不是机会主义者，因为列宁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用新的经验丰富了这个理论，而机会主义者则把这个理论向后拉，把它变成木乃伊。

如果列宁为马克思主义的字句所束缚，如果他在理论上没有足够的勇气抛开马克思主义的旧结论，而代之以关于社会主义能够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一适合于新的历史形势的新结论，那末党、我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会是什么情况呢？党就会在黑暗中徘徊，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失去领导，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会开始衰退。无产阶级就会遭到失败，无产阶级的敌人就会获得胜利。

机会主义并不总是意味着直接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或它的某些原理和结论。机会主义有时还表现在企图抱住马克思主义中某

些已经过时的原理不放，把它们变成教条，以便阻碍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从而也阻碍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恩格斯逝世后，最伟大的理论家列宁，以及继列宁之后的斯大林和列宁的其他学生，是惟一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新条件下的新经验丰富了这个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

正因为列宁和列宁主义者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以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新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获得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如果布尔什维克党的先进干部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果他们没有学会把这个理论看作行动的指南，如果他们没有学会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经验来丰富这个理论，那末布尔什维克党就不会有 1917 年十月革命的胜利。

恩格斯在批评那些担负着美国工人运动领导工作的侨居美国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时写道：

> “德国人一点不懂得把他们的理论变成能推动美国群众的杠杆；他们大部分连自己也不懂得这种理论，而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应付一切。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1 版第 27 卷第 606 页）①

列宁批评加米涅夫和某些老布尔什维克在 1917 年 4 月，即在革命运动已经向前发展而要求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仍抱住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56 页。——译者注

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旧公式不放时写道：

> “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说，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们公正地讥笑了只会背诵和简单重复‘公式’的人们，因为‘公式’至多只能指出**一般的**任务，而这些任务随着历史过程中每个特殊阶段的**具体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必然有所改变。……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0卷第100—101页）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0—394页）

四、斯大林论两派马克思主义者

有两派马克思主义者。这两派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工作，都认为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毕竟大不相同。不仅不同，他们之间还横着一道鸿沟，因为他们的工作方法正好相反。

第一派通常只限于表面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堂皇地标榜马克思主义。他们不善于或不愿意探究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不善于或不愿意实现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活的原理变成毫无意思的死的公式。他们的活动不是以经验、以考虑实际工作为基础，而是以摘引马克思的词句为基础。他们不是从分析活的现实，而是从类比和历史比拟中求得指示和指令。言行不一——这就是这一派的主要毛病。因此，他们灰心失望，永远抱怨命运，命运也总是愚弄他们，使他们“上当”。这一派的名字是孟什维主义（在俄国），机会主义（在欧洲）。梯什卡（约吉希斯）同志在伦敦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4—26页。——译者注

代表大会① 上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这一派，说他们不是站在而是躺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

第二派恰巧相反，他们把问题的重心从表面上承认马克思主义转到实行和实现马克思主义。规定适合环境的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手段，环境改变时就改变这些方法和手段，——这一派主要就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这方面。这一派不是从历史类比和历史比拟中，而是从研究周围条件中求得指令和指示。他们的活动不是凭借引证和格言，而是凭借实践经验，依据经验来检查自己的每一个步骤，用自己的错误来教育自己并教导别人建设新生活。这其实也就说明在这一派的活动中为什么言行是一致的，为什么马克思学说完全保持着它的革命活力。这一派完全符合马克思所说的话：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停留于解释世界，而应当更进一步去改变世界②。这一派的名字是布尔什维主义，共产主义。

这一派的组织者和领袖是弗·伊·列宁。（斯大林：《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见《斯大林选集》上卷第 129—130 页）

---

① 伦敦代表大会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于 1907 年 4 月 30 日至 5 月 19 日在伦敦举行。

② 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9 页）。

第二章　理论与实践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

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事实是共产主义的出发点，实践是真理的标准

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被共产主义者做为自己前提的不是某种哲学，而是过去历史的整个过程，特别是这个过程目前在文明各国的实际结果。共产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大工业以及和大工业相伴而生的一些现象：世界市场的形成和随之而来的无法控制的竞争；具有日趋严重的破坏性和普遍性的商业危机，这种危机现在已经完全成了世界市场的危机；无产阶级的形成和资本的积聚以及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共产主义作为理论的时候，那么它就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个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11—312页）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同上，第 17 页）

一般说来，一个政党的正式纲领没有它的实际行动那样重要。（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1 页）

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马克思：《给威·白拉克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 页）

正如在日常生活中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629 页）

对头脑正常的人说来，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579 页）

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在 1845 年，恩格斯在 1888 年和 1892 年，都把实践标准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①。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里说：离开实践提出“对象的〈即客观的〉真理同人的思维是否符合”② 的问题，乃是经院哲学。恩格斯重复说：对康德和休谟的不可知论以及其他哲学怪论（Schrullen）的最有力的驳斥就是实践。他反驳不可知论者说：“我们行动的成功

① 指下列著作：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和《论历史唯物主义》，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1892年）（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16—19页，第4卷第210—254页，第3卷第379—403页）。

② 即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中的“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对象的真理性”这句话的另一种俄文译法。

证明我们的知觉是和知觉到的物的对象〈客观〉本性相符合的(Йbereinstimmung)。"①(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137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说过，人类的实践证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正确性，并且把那些想离开实践来解决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尝试称为"经院哲学"和"哲学怪论"。(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139页)

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而把教授的经院哲学的无数臆说一脚踢开。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如果我们的实践所证实的是惟一的、最终的、客观的真理,那末,因此就得承认:坚持唯物主义观点的科学的道路是走向这种真理的唯一的道路。(同上,第142—143页)

对恩格斯说来，整个活生生的人类实践是深入到认识论本身之中的，它提供真理的**客观**标准。当我们不知道自然规律的时候，自然规律是在我们的认识之外独立地存在着并起着作用，使我们成为"盲目的必然性"的奴隶。一经我们认识了这种**不依赖于**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意识而起着作用的（马克思把这点重述了千百次）规律，我们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在人类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对自然界的统治是自然现象和自然过程在人脑中客观正确的反映

① 参看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第4卷第221页,第3卷第387页)。

的结果，它证明这一反映（在实践向我们表明的范围内）是客观的、绝对的、永恒的真理。（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见《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191—192 页）

黑格尔
论实践和认识的客观性

理论的认识应当提供在必然性中、在全面关系中、在自在自为的[1]矛盾运动中的客体。但是，只有当概念成为在实践意义上的"自为存在"的时候，人的概念才能"最终地"把握、抓住、通晓认识的这个客观真理。也就是说，人的和人类的实践是认识的客观性的验证、准绳。……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见《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227 页）

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实践不仅有普遍性的优点，并且有直接的现实性的优点。（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见《列宁全集》等 38 卷第 230 页）

认识……认为在自己面前真实存在着的东西就是不以主观意见（设想[2]）为转移的现存的现实。（这是纯粹的唯物主义！）人的意志、人的实践，本身之所以会妨碍自己目的的达成……就是因为意志把自己和认识分隔开来，并且不承认外部现实是真实存在着的东西（是客观真理）。必须**把认识和实践结合起来**。

注 意

（同上书，第 232—233 页）

---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an—und. für—sich. ——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etzen. ——译者注

社会民主党人不会忘记，可以用来进行教育的不单只是书本，甚至书本还不如革命的进程本身，它打开群众的眼界，使群众受到政治锻炼。（列宁：《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见《列宁全集》第8卷第257页）

先生们，让将来的历史学家在将来的《俄国旧事》① 上去确定究竟哪些资产阶级革命任务是由我们和你们或者由某个政府完成的吧！——这是过三十年再去做也不算迟的事情，而我们现在必须拿出为共和制而斗争并促使无产阶级最积极地参加这个斗争的口号和实际指示来。（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见《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534 页）

新火星派表达自己的思想时所采取的方式，使人联想到马克思对根本和辩证法观念不相容的旧唯物主义的评语（见马克思的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说明**世界，而问题却在于**改变**这个世界②。新火星派也能差强人意地描写和解释眼前的斗争过程，但是完全不能够提出进行这个斗争的正确口号。他们虽然走得很起劲，但是领导得很不好，他们忽视那些认识了革命的物质条件并且领导着先进阶级的政党所能够而且应当在历史上起的积极的领导作用和指导作用，因而降低了唯物史观的意义。（同上书，第 535 页）

然而这样毫不提及党的实践纲领，不适当地在决议中讲授起历史来，难道这不是表明书呆子的说教和革命者的软弱无能吗？（同上书，第 572 页）

每个有头脑的人都知道，如果某个问题引起了激烈的斗争，那末为了确定真理，就不要只看争论双方的声明，而要自行审查

① 《俄国旧事》（《Русская Старина》）是一种历史杂志，主要刊载历史文献和回忆录等，1870 年至 1918 年在彼得堡每月出版一次。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9 页。

事实和**文件**，自行考察，看看有无**证人**的证词以及这些证词是否确实。

不消说，这不是时常都容易办到的。把凑巧碰到，**偶然**听到的较为“公开地”叫喊的东西等等信以为真，自然要“容易”得多。但是，以此为满足的人，就叫做“轻率的”、轻浮的人，谁也不会认真地理会他的。不用相当的**独立**功夫，不论在哪个严重的问题上都不能找出真理；谁怕用功夫，谁就无法找到真理。

因此，我们这里只是向那些不怕用这种功夫，而有决心去**独立**研究和努力**找到事实**、**文件**以及**证词**的工人发表一些意见。（列宁：《几个争论问题》。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457—458页）

凡是没有亲自掌握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情况的确切材料的人，都难以了解真相。但是，如果根据文件探求真相并审查它们的含义，不相信空话，那仍然是可以了解真相的。（列宁：《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状》。见《列宁全集》第18卷第199页）

我不能不承认，这样提问题，即**仅仅**拿一种人的坏心肠和另一种人的好心肠来解释政治现象，总使我联想到一副故意炫耀的堂堂仪表，一见之下不由得就产生一种想法：“大概这是骗子吧”。（列宁：《论调和分子或好心人的新派别》。见《列宁全集》第17卷第246页）

检查工作，寻根究底，或者对他们严加训练和教导，或者就狠狠地把他们鞭笞一顿。要研究人，要寻找**能干的**干部。现在关键就在这里；没有这一点，一切命令和决议只不过是些肮脏的废纸而已。（列宁：《给亚·德·瞿鲁巴》。见《列宁全集》第35卷第541—542页）

至于第二国际各党的政治口号和政治决议，只要回忆一下“以战争对付战争”这一口号的历史，就足以了解这些以堂皇的革

命口号和决议来掩饰自己的反革命勾当的党的政治实践是如何虚伪和腐败。大家都还记得第二国际在巴塞尔代表大会① 上举行的堂皇的示威，当时第二国际恐吓帝国主义者说，如果帝国主义者敢于发动战争，那就要遇到可怕的起义；他们提出了“以战争对付战争”的吓人口号。可是过了不久，在战争就要爆发的时候，却把巴塞尔决议束之高阁，而向工人提出了新的口号，即为了资本主义祖国的光荣而自相残杀的口号，这一点有谁不记得呢？革命的口号和决议如果不加以实现，是一个钱都不值的，这难道还不明显吗？（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见《斯大林选集》上卷第 197 页）

领导——这并不等于写决议和发指示。领导——这就是检查指示的执行情况，不仅检查指示的执行情况，而且检查指示本身，从生动的实际工作的观点来检查这些指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如果以为我们所有的指示都百分之百的正确，那就可笑了。同志们，这样的事情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检查执行情况正是要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实践的烈火中，不仅检查我们指示的执行情况，而且检查指示本身是否正确。因此，这方面有缺陷，也就是我们的整个领导有缺陷。（斯大林：《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 30—31 页）

斯卢茨基认为党的现有的文件还不够。为什么呢？根据什么理由呢？难道第二国际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党党内斗争方面的那些尽人皆知的文件还不足以十分明显地表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反

① 第二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于1912年11月24—25日举行。这次代表大会是由于巴尔干战争和世界大战危险的迫近而召开的。代表大会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共同反对战争这一个问题。代表大会在通过的宣言中号召工人运用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力量进行反对战争危险的革命斗争，宣布“以战争对付战争”。

对机会主义者和中派主义者斗争中的革命的不调和性吗？斯卢茨基究竟看过这些文件没有？他还需要什么样的文件呢？

假定除了大家已经知道的文件以外，又找到一堆其他的文件，比如说布尔什维克的又一次论述必须消灭中派主义的决议。这是不是说，仅仅有了纸上的文件就足以表明布尔什维克对中派主义的真正革命性和真正不调和性呢？除了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分子以外，还有谁会单单凭信纸上的文件呢？除了档案库的老鼠以外，还有谁不懂得，检验政党和首领首先必须根据他们的行为而不只是根据他们的宣言呢？历史上有不少的社会主义者愿意签署任何革命的决议，以便应付那些讨厌的批评家。但这还不是说，他们实行了这些决议。其次，历史上还有不少的社会主义者口沫飞溅地要求其他各国的工人政党采取最革命的行动。但这还不是说，他们在自己党内或自己国内没有屈服于自己的机会主义者和自己的资产阶级。列宁教导我们检验革命政党、派别和首领时不要根据他们的宣言和决议，而要根据他们的行为，不就是这个缘故吗？

如果斯卢茨基真想检验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对中派主义的不调和性，那末他用来作为他的论文的基础的就不应该是个别文件和两三封私人信件，而应该是对布尔什维克的行为、历史、行动的检验，这不是很明显吗？难道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不曾有过机会主义者、中派主义者吗？难道布尔什维克没有对所有这些派别进行过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吗？难道这些派别无论在思想上或组织上都同西方的机会主义者和中派主义者没有联系吗？难道布尔什维克也像世界上任何一个左派集团一样没有把机会主义者和中派主义者击溃吗？既然如此，怎么能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对中派主义的危险估计不足呢？为什么斯卢茨基忽视了这些对评定布尔什维克有决定意义的事实呢？为什么他不运用根据列宁和布尔什

维克的行为和行动来检验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这种最可靠的方法呢？为什么他宁愿采取在偶然检到的一些纸片中翻寻的那种不大可靠的方法呢？

这是因为采取更可靠的方法，即根据布尔什维克的行为来检验布尔什维克，立刻就会根本推翻斯卢茨基的整个立场。

这是因为根据布尔什维克的行为来检验布尔什维克，就会表明布尔什维克是世界上彻底击溃了机会主义者和中派主义者并把他们驱逐出党的惟一的革命组织。

这是因为以布尔什维克的实际行为和真正的历史为根据，就会表明斯卢茨基的老师托洛茨基分子是在俄国培植了中派主义并为此成立了八月联盟这个专门组织作为中派主义策源地的主要的和基本的集团。

这是因为根据布尔什维克的行为来检验布尔什维克，就会完全揭穿斯卢茨基是我们党的历史的伪造者，他企图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对中派主义的危险估计不足这种诬蔑性的责备来掩盖战前托洛茨基主义的中派主义。（斯大林：《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见《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85—87页）

“科学”的反对意见，即否认建立面积四至五万公顷的大规模谷物工厂是可能的和适当的那种意见，已经破产而且被粉碎了。实践推翻了“科学”的反对意见，再一次表明了不仅实践应当向“科学”学习，而且“科学”也不妨向实践学习。（斯大林：《大转变的一年》。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204页）

有些人在谈论科学。他们说：科学上的规定，技术指南和技术规则的规定，是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对新的更高的技术定额的要求矛盾的。但是，他们所说的究竟是哪一种科学呢？科学上的规定向来都是由实践，由经验来检验的。如果科学和实践、和经

验断绝了关系，那它还算是什么科学呢？如果科学就是像我们某些保守主义同志所形容的那样，那它对于人类早就没有作用了。科学所以叫作科学，正是因为它不承认偶像，不怕推翻过时的旧事物，很仔细地倾听经验和实践的呼声。否则，我们就根本不会有科学，譬如说，不会有天文学，而直到现在还会信奉陈腐不堪的托勒密体系了；那我们就不会有生物学，而直到现在还会迷信上帝造人的神话了；那我们就不会有化学，而直到现在还会相信炼金术士的预言了。（斯大林：《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84页）

例如拿交通人民委员部来说吧。不久以前，在这个人民委员部的中央机关里，有一些教授、工程师以及其他专家，其中也有共产党员，硬说每小时十三至十四公里的火车旅行速度已经到了极限，如果不想违反"运营科学"，就不能超过这个极限。这是颇有威信的一部分人，他们在口头上和刊物上鼓吹自己的观点，并向交通人民委员部有关机关发出种种指示，而且他们本来就是铁路运营人员中的"权威"。我们虽然不是内行，但是根据铁路事业方面许多实际工作人员的建议，也奉劝过这些有威信的教授说：十三至十四公里的速度，决不能当作极限，在工作组织得当时，是可以超过这个限度的。但他们不仅没有倾听经验和实践的呼声，改变态度，反而拚命反对铁路事业方面的先进分子，加紧宣传他们的保守主义观点。当然，我们只好把这些受人尊敬的人物轻轻打击一下，并客客气气地请他们离开交通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鼓掌）结果怎样呢？我们现在的火车旅行速度已经是每小时十八至十九公里了。（鼓掌）（斯大林：《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87页）

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理论与实际的关系，理论对于实际的重要性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同上书，第15页）

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同上书，第15页）

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2页）

理论和经验：牛顿在理论上确定了地球是扁圆的。很久以后，

卡西尼① 及其他几个法国人根据他们测量的经验断言：地球是椭圆的，并且以极轴为最长。（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 1971 年版第 185 页）

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只有抛弃幻想，在俄国现实的而不是合乎心愿的发展中，在现实的而不是可能的社会经济关系中去寻找支撑点，才能指望自己的工作获得成效。同时，他们的理论工作的方向应当是**具体地研究俄国经济对抗的一切形式，研究它们的联系及其一贯的发展，凡是这种对抗为政治史、法制特点和业已固定的理论偏见所掩盖的地方，都应加以揭露**。这个工作应当把**我国现实作为一定生产关系的体系来给以完备的说明，应表明劳动者在这个体系下遭受剥削和剥夺的必然性，并指明经济发展所昭示的摆脱这个制度的出路**。

这种以详尽地研究俄国的历史和现实为基础的理论，应当解答无产阶级急需解答的一切问题，——如果说这种理论合乎科学要求，那末，无产阶级的反抗思想一旦觉醒就必然会纳入社会民主主义的轨道之中。制定这种理论的工作愈有进展，则社会民主主义就会增长得愈加迅速，因为最狡猾的现代制度的保护人也不能阻止无产阶级思想的觉醒，其所以不能，是因为这个制度必然

---

① 卡西尼（在恩格斯的手稿中，这个姓用的是复数：die Cassinis）是法国的一个天文学世家：(1)从意大利迁来的卓万尼·多美尼科·卡西尼(1625—1712)，巴黎天文台第一任台长，(2)儿子雅克·卡西尼(1677—1756)，(3)孙子塞扎尔·弗朗斯瓦·卡西尼·德·屠里(1714—1784)，(4)曾孙雅克·多米尼克·卡西尼伯爵(1748—1845)。他们四个人依次担任了巴黎天文台台长之职(从 1669 到 1793 年)。前三人所持的关于地球形状的观念都是不正确的、反牛顿的，只有最后一个卡西尼在对地球体积和形状的更精确的测量的影响下，被迫承认牛顿关于绕轴旋转的地球的扁率的结论是正确的。

使生产者更被剥夺，使无产阶级及其后备军日益壮大，同时社会财富不断增长，生产力大大发展，资本主义造成劳动社会化。虽然制定这种理论还要做很多工作，但社会主义者完成这种工作是有把握的，因为唯物主义，即要求任何纲领都是对现实过程的确切表述的唯一科学方法，已在他们中间传播着；因为接受这种思想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已获得很大的成功，这种成功甚至使得我国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也只好把他们的厚本杂志（像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指出的那样）弄成不再是枯燥无味的了。

我这样强调社会民主主义者理论工作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艰巨性，完全不是想把这个工作放到**实际**工作的前面①，更不是想把后一工作推延到前一工作完成以后。只有“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的崇拜者或空想社会主义的信徒，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当然，如果认为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在给国家寻找“另外的〈除现实道路而外〉发展道路”，那末，实际工作也只有在天才的哲学家发现和指明了这“另外的道路”时才有可能进行；反过来说，这种道路一旦被发现和被指明出来，理论工作就告结束，而应把“祖国”引上“新发现的”“另外的道路”的人的工作就开始了。可是，如果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要做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者，是要领导无产阶级进行现实斗争去反对横在一定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道路上的现实的真正的敌人，那末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这种条件下，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就会融合为一个工作，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老战士李卜克内西说得极为中肯，这就是：

① 恰恰相反。实际的宣传鼓动工作始终应放在第一位，因为第一，理论工作只是解答实际宣传鼓动工作急需解答的问题。第二，社会民主主义者往往被客观情势所迫不得不只做理论工作，所以他们非常重视每一可以进行实际工作的机会。

研究，宣传，组织（Studieren，Propagandieren，Organisie-ren）。

不做上述理论工作，便不能做思想领导者；不根据事业的需要进行这项工作，不在工人中间宣传这个理论的结论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也不能做思想领导者。

这样提出任务就能保障社会民主主义者免除各种社会主义者团体所常患的毛病，即免除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只要以是否合乎现实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为学说的最高的和唯一的标准，就不会有教条主义；只要认为任务在于协助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因而“知识分子”的作用在于使特别的知识分子的领导者成为不需要的，就不会有宗派主义。（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75—77页）

凡是稍微了解我国运动的实际情况的人，都不能不看到，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理论水平有了某种程度的降低。有不少理论修养很差甚至毫无理论修养的人，由于看见运动有实际意义和实际成效而加入了运动。由此可见，《工人事业》杂志得意洋洋地提出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①，是多么不合时宜。在理论混乱的时代来重复这句话，就如同在人家送葬时高喊“但愿你们拉也拉不完！”② 一样。而且上面

---

① 见马克思1875年5月5日给威·白拉克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页）。

② “但愿你们拉也拉不完！”这句话出自俄罗斯民间故事《十足的傻瓜》。傻瓜伊万努什卡看到农民在脱粒，叫喊道：“你们脱三天，只能脱三粒。”为此挨了一顿打。傻瓜回家向母亲哭诉。母亲告诉他应当说：“但愿你们运也运不完，抬也抬不完，拉也拉不完！”第二天，傻瓜遇见人家送葬，就叫喊道：“但愿你们抬也抬不完，拉也拉不完！”结果又挨了一顿打。

马克思的这句话，是从他评论哥达纲领① 的信里摘引来的，马克思在信里**严厉地斥责**了人们在说明原则时的折中主义态度。马克思写信给党的领袖们说，如果需要联合，那么为了达到运动的具体目标，可以缔结协定，但是决不能拿原则来做交易，决不要作理论上的“让步”。马克思的意思就是这样，而我们这里却有人假借马克思的名义来竭力贬低理论的意义！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偏向同时髦的机会主义宣传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下，必须始终坚持这种思想。而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来说，由于还存在三种时常被人忘记的情况，理论的意义就显得更为重要了。这三种情况就是：第一，我们的党还刚刚在形成，刚刚在确定自己的面貌，同革命思想中会危及运动、使运动离开正确道路的其他派别进行的清算还远没有结束。相反，正是在最近时期，非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派别显得活跃起来了（这是阿克雪里罗得早就对经济派说过的）。在这种条件下，初看起来似乎并“不重要的”错误也可能引起极其可悲的后果；只有目光短浅的人，才会以为进行派别争论和严格区别各派色彩，是一种不适时的或者多余的事情。这种或那种“色彩”的加强，可能决定俄国社会民主党许多许多年的前途。

① 哥达纲领是1875年在哥达举行的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合并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这个纲领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纲领，它根本不提无产阶级专政，否认农民参加革命的可能性，要求把国家资助工人生产合作社作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法，并要求用一切合法手段建立所谓自由的人民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两派在机会主义纲领基础上的合并，并对哥达纲领草案作了毁灭性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5页）。

第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就其本质来说是国际性的运动。这不仅意味着我们应当反对民族沙文主义。这还意味着在新国家里开始的运动，只有在运用别国的经验的条件下才能顺利发展。但是，要运用别国的经验，简单了解这种经验或简单抄袭别国最近的决议是不够的。为此必须善于用批判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经验，并且独立地加以检验。只要想一想现代工人运动已经有了多么巨大的成长和扩展，就会懂得，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需要有多么雄厚的理论力量和多么丰富的政治经验（以及革命经验）。

第三，俄国社会民主党担负的民族任务是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政党都不曾有过的。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把全体人民从专制制度压迫下解放出来的这个任务所赋予我们的种种政治责任和组织责任。现在我们只想指出一点，就是**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读者如果想要稍微具体地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请回想一下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者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七十年代的那一批杰出的革命家；就请想想俄国文学现在所获得的世界意义；就请……只要想想这些也就足够了！（列宁：《怎么办?》。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241—242页）

恩格斯认为，社会民主党的伟大斗争**并不是有两种**形式（政治的和经济的），像在我国通常认为的那样，**而是有三种**形式，**同这两种斗争并列的还有理论的斗争**。他对实践上和政治上都已经巩固的德国工人运动的嘱咐，从现代各种问题和争论的观点来看是非常有教益的，因此我们希望读者不要因为我们从那部早已成了非常罕见的珍本书的《德国农民战争》①的序言中，摘引很长一段话而埋怨我们：

① 1875年莱比锡第3版，合作书局发行。

“德国工人同欧洲其他各国工人比较起来，有两大优越之处。第一，他们属于欧洲最有理论修养的民族，他们保持了德国那些所谓‘有教养的’阶级几乎完全丧失了的理论感。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么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如果工人没有理论感，那么这个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深入他们的血肉。这个优越之处无限重大，从以下的事实就可以看出：一方面，英国工人运动虽然单个行业有很好的组织，但是前进得非常缓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于一切理论的漠视；另一方面，法国人和比利时人由于原有形式的蒲鲁东主义的传播而发生混乱和动摇，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则由于被巴枯宁滑稽化了的蒲鲁东主义的传播而发生混乱和动摇。

第二个优越之处，就是德国人参加工人运动，差不多比各国人都迟。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虽然这三位思想家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同理论上的社会主义一样，德国的实践的工人运动也永远不应当忘记，它是依靠英国和法国的运动而发展起来的，它能够直接利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用很高的代价换来的经验，而在现在避免它们当时往往无法避免的那些错误。如果没有英国工联运动和法国工人政治斗争的榜样，如果没有特别是巴黎公社所给予的那种巨大的推动，我们现在会处在什么境地呢？

必须承认，德国工人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自己地位的有利之处。自从有工人运动以来，斗争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方面——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反抗资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

有计划地进行着。德国工人运动所以强大有力和不可战胜，也正是由于这种可以说是向心的攻击。

一方面由于德国工人具有这种有利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英国工人运动具有岛国的特点，而法国工人运动又受到暴力的镇压，所以现在德国工人是处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事实究竟容许他们把这种光荣地位占据多久，这是不能预先断言的。但是，可以相信，只要他们还占据这个地位，他们就能很好地执行这个地位所加给他们的种种责任。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斗争和鼓动的各个方面都加倍努力。特别是领袖们有责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越来越多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词句的影响，而时时刻刻地注意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日益加强团结党组织和工会组织……

……假使德国工人将来还是同样地前进，那么虽然不能说他们一定会走在运动的前列（只是某一个国家的工人走在运动的前列，这并不符合运动的利益），但是一定会在战士的行列中占据一个光荣的地位；而将来如果有意外严重的考验或者伟大的事变要求他们表现出更大的勇气、更大的决心和毅力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有充分的准备。"①

恩格斯的话果然有先见之明。几年之后，德国工人遇到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这样意外的严重考验。而德国工人确实是有充分准备地迎接了这次考验，并且胜利地通过了这次考验。

---

① 列宁摘译自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一书第二版序言的补充（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0—302页）。

俄国无产阶级将要遇到更加无比严重的考验；将要同凶猛的怪物作斗争，宪制国家中的非常法同这个怪物比较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历史现在向我们提出的当前任务，是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当前任务都更革命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即摧毁这个不仅是欧洲的同时也是（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亚洲的反动势力的最强大的堡垒，就会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我们有理由指望，只要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先驱者七十年代的革命家那种献身的决心和毅力，来鼓舞我们的比当时更广阔和更深刻千百倍的运动，我们就一定能够获得我们的先驱者在当时已经享有的这个光荣称号。（列宁：《怎么办?》。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242—245页）

但这个理论不是教条，它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才能最终形成。

布尔什维主义所以能够制定并且在1917—1920年异常艰难的条件下顺利地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铁的纪律，其原因仅仅在于俄国有若干历史上的特点。

一方面，布尔什维主义是1903年在最坚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产生的。而这个——也只有这个——革命理论的正确性，不仅为整个十九世纪全世界的经验所证实，尤其为俄国革命思想界的徘徊和动摇、错误和失望的经验所证实。在上一世纪差不多半个世纪期间，大约从四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俄国进步的思想界在空前野蛮和反动的沙皇制度的压迫之下，曾如饥如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专心致志地、密切地注视着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最新成就”。俄国在半个世纪期间，经受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表现了空前未有的革命英雄气概，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去探索、学习和实验，经受了失望，进行了验证，参

照了欧洲的经验，真是饱经苦难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由于人们在沙皇政府的迫害下侨居国外，革命的俄国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同国际的联系相当广泛，对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形式和理论十分熟悉，这是世界上任何一国所不及的。

另一方面，在这个坚如磐石的理论基础上产生的布尔什维主义，通过十五年（1903—1917 年）的历史实践，获得了举世无比的丰富经验。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在这十五年内，在革命经验方面，在各种运动形式——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和平的和激烈的、地下的和公开的、小组的和群众的、议会方式的和恐怖主义的等运动形式更替的迅速和多样性方面，都没有过哪怕类似这样丰富的经历。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在这样一个短短的时期内，集中了现代社会一切阶级进行斗争的如此丰富的形式、特色和方法，而且由于俄国的落后和沙皇制度的残酷压迫，这个斗争成熟得特别迅速，它特别如饥如渴地并卓有成效地掌握了欧美政治经验方面相宜的“最新成就”。（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见《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182—183 页）

有些人认为列宁主义是实践重于理论，就是说，列宁主义的主要点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变为事实，是“执行”这些原理，至于理论，列宁主义似乎是很不关心的。大家知道，普列汉诺夫曾经屡次嘲笑列宁对于理论，特别是对于哲学的“不关心”。大家也知道，现在许多列宁主义的实际工作者不很喜欢理论，特别是因为他们由于环境关系而不得不忙于浩繁的实际工作。我必须指出：对列宁和列宁主义所持的这种非常奇怪的见解是完全不正确的，而且是丝毫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实际工作者忽视理论的趋向是和列宁主义的全部精神相矛盾的，而且对工作是有很大的危险的。

理论是概括起来的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当然，离开革命实

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可是，理论如果是在和革命实践密切联系中形成的，那末它就能成为工人运动的极伟大的力量；因为理论，而且只有理论，才能使运动具有信心，使它有确定方针的能力，使它能了解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因为理论，而且只有理论，才能使实践不仅了解各阶级在目前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而且了解这些阶级在最近的将来会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不是别人而正是列宁说过和重复过几十次下面这个著名的原理：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①（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241页）

列宁比谁都更了解理论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对于我们党这样一个党的重要意义，因为我们党负有国际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的作用，因为我们党处于复杂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中。列宁还在1902年预察到我们党的这种特殊作用时，就认为必须指出：

“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242页）

几乎用不着证明，现在当列宁的关于我们党的作用的预言已经成为事实的时候，列宁的这个原理具有特别巨大的力量和特别重大的意义。

依据唯物主义的哲学，把从恩格斯到列宁这个时期最重要的科学成就概括起来，并从各方面去批判马克思主义者队伍里的反唯物主义的派别，这是一个极重大的任务，而负责完成这个任务的不是别人，正是列宁，——这个事实可以说是列宁异常重视理论的最明显的表现。恩格斯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注

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① 大家知道，不是别人，正是列宁在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② 这部杰作中为自己的时代完成了这个任务。大家知道，喜欢嘲笑列宁“不关心”哲学的普列汉诺夫竟不敢认真着手执行这个任务。（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见《斯大林选集》上卷第 199—201 页）

但是，如果说我们有理由以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实际**工作成就自豪，那么关于我们在一般经济方面特别是在农业方面的**理论**工作成就就不能这样说了。而且应当承认，我们的理论思想赶不上实际工作成就，我们的实际工作成就和理论思想的发展之间有些脱节。但是，理论工作不仅必须赶上实际工作，而且要超过实际工作，武装我们的实际工作者去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

我不想在这里多讲理论的意义。你们对于理论的意义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大家知道，理论如果是真正的理论，就能使实际工作者有能力确定方针，认清前途，对工作充满信心，相信我们的事业必定胜利。这一切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具有而且不能不具有莫大的意义。糟糕的是我们正是在这方面，在我国经济问题的理论研究方面开始跛脚了。

否则又怎样解释在我们这里，在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关于我国经济问题还流行着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理论呢？怎样解释这些大大小小的理论直到现在还没有受到应有的反击呢？怎样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基本原理，这些能消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理论的特效解毒剂，竟开始被遗忘，不在我们报刊上广泛宣传，没有被提到首要地位呢？不依据马克思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24 页。
② 见《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12—368 页。

列宁主义理论同资产阶级理论作不调和的斗争，就不能彻底战胜阶级敌人，这难道很难了解吗？

新的实践产生对过渡时期经济问题的新的看法。现在，新经济政策问题，阶级问题，建设速度问题，结合问题，党的政策问题，都应该有新的提法。为了不落后于实践，必须立即根据新的情况研究这一切问题。不这样就不能战胜那些引起我们实际工作者思想混乱的资产阶级理论。不这样就不能根除这些已经成为顽固偏见的理论。因为只有和理论上的资产阶级偏见作斗争，才能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斯大林：《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210—211页）

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论研究、分析具体环境、条件及历史特点是决定无产阶级政策的基础

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4页）

共产主义现在已不再意味着凭空设想一种尽可能完善的社会理想，而是意味着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3页）

这个政党① ……从来不抱这样的幻想：似乎它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随心所欲地进行那种必须在实践中实现它的思想的革命。它研究了1848年革命运动的起因及其失败的原因。（恩格斯：《最近

① 指共产党。

的科伦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8 卷第 450 页)

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关于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问题所提出的意见（第四章）虽然在原则上今天还是正确的，但是就其实际运用来说今天毕竟已经过时，因为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当时所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彻底扫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72 年德文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28—229 页)

至于专门谈到德国，那我们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也就是说，必须通过一种符合于改变了的环境的办法来利用革命热情。(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6 年 8 月 23 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第 523 页)

总委员会是沟通协会各国的全国性组织和地方性组织之间联系的国际机关，它应该使一国工人能经常知悉其他各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情况；使欧洲各国中的社会状况调查工作能同时并在共同领导下进行；(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137—138 页)

值得庆幸的是，在运动的第一幕闭幕之后和第二幕开幕之前，有一个大约很短的休息使我们有时间来做一件很紧要的工作：研究这次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原因。这些原因不应该从几个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震动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1848 年 2 月和 3 月突然爆发的运动，不是少数几个人活动的结果，而是人民的要求和需要的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表现，每个国家的各个阶级对这种要求和需要的认识程度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已清楚地感觉到，——这已经是一件公认的事实。但当你问到反革

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某甲或某乙“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解释半点东西，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而且，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就只是知道某某人不可靠这一件事，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01页）

如果我们能根据确凿的事实找出合理的原因来说明运动的主要事件和主要转折，使我们能够确定下一次、也许不远的将来就会出现的爆发将指示给德国人民的方向，那我们也就满足了。（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02页）

对局势的这一清醒看法在当时竟被许多人看做邪说，那时赖德律－洛兰、路易·勃朗、马志尼、科苏特以及那些不大显要的德国名人像卢格、金克尔、戈克等等一类人，群集在伦敦，他们不但为各自的祖国，并且为全欧洲建立了一些未来的临时政府，而全部问题不过是要用举借革命贷款的办法在美国取得必要的经费，以便马上实现欧洲革命，从而建立理所当然的各个共和国。（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03页）

由于古代阶级斗争同现代阶级斗争在物质经济条件方面有这样的根本区别，在由这种斗争所产生的政治人物之间，也就不能比坎特伯雷大主教与祭司长撒母耳之间有更多的共同点了。（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2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0页）

现在我们正在这里搞普选权问题，这个问题在这里同在普鲁士，当然是有**完全不同的意义**的。〔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5年2月23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56页〕

因为同一个国家的工人的各种队伍和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发展水平必然是极不相同的，所以，实际运动也必然以十分不同的理论形式反映出来。〔马克思：《致恩格斯》（1869年3月5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255页〕

读者从这些书信①中可以非常生动地看到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历史，看到这个历史中的最重要的时期和最重大的地方。尤其宝贵的是工人阶级的**政治**史。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各种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东半球各个不同的国家和西半球所发生的各种事件，探讨了有关工人阶级**政治**任务问题**提法**的最有原则意义的东西。（列宁：《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见《列宁全集》第19卷第557页）

如果要开一张包治百病的丹方，或者拟定一个适用于一切情况的一般准则（“不作任何妥协”！），那是很荒谬的。（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223页）

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把评价革命的客观进程作为谈论策略的基础。（列宁：《孟什维主义的危机》。见《列宁全集》第11卷第324页）

马克思主义是根据日常生活中千千万万件事实所表现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来判断“利益”的。（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634页）

马克思主义的真髓和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列宁：《共产主义》。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144页）

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里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以便首先了解，在这个具体环境里，**哪一个**阶级的运动是可能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1页）

---

① 指《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

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

…………

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时局时，不应当从可能出发，而应当从现实出发。

…………

在今天这样的现实面前，不顾事实，只谈“可能性”，简直是可笑的。(列宁:《论策略书》。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27页)

马克思主义是以事实，而不是以可能性为依据的。

马克思主义者只能以确切的、有凭有据的**事实**作为自己的政策的前提。

我们的(党的)决议① 正是这样的。(列宁:《给恩·德·基克纳泽》。见《列宁全集》第35卷第230页)

事实是我们政策的基础，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应该竭尽全力对种种事实进行科学研究的。(列宁:《政论家札记》。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266—267页)

实际的政治形势就是如此，我们首先应该力求尽量客观、准确地判明这一形势，以便把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建立在它应当依据的唯一稳固的基础上，即建立在**事实**基础上。(列宁:《远方来信》。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8页)

在我们的决议草案中，我们首先(在论据部分)是从一切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是基本问题的问题、即关于经济危机和群众的经济状况问题开始的。(列宁:《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见《列宁全集》第12卷第198页)

① 这里是指1915年2月在瑞士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上通过的关于战争的决议，这决议是列宁起草的。

我们不能“臆造出”什么特别的改革“方案”。我们应该研究在按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俄国，农民土地革命的客观条件是什么，根据这种客观的分析把某些阶级的错误思想同经济变革的现实内容区分开来，然后再来确定，在这些实际的经济变革的基础上，生产力发展的利益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所要求的究竟是什么。（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见《列宁全集》第13卷第237页）

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要从发展中观察一切现象，不要只满足于作表面的描述，不要相信漂亮的招牌，要分析各个政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要研究预先决定这些政党的政治活动的意义和结果的客观政治环境。（列宁：《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见《列宁全集》第10卷第190页）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有另外的见解。我们不应当谈论太一般的太容易遭到资产阶级歪曲的关于“全民资产阶级革命”的言论，而应当分析一定的阶级和政党在各个不同的革命时期的具体地位。（列宁：《革命界的庸俗习气》。见《列宁全集》第11卷第237页）

随着革命的进展，随着革命任务的增长，能够为实现这些任务而斗争的阶级和人的成分也在发生变化，谁要是忘记这一点，谁就会犯大错误。（同上书，第237页）

对俄国革命，即对革命头三年如何估计的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了。不弄清我国各政党的阶级面目，不分析各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利益和相互关系，在确定无产阶级的最近任务和策略方面是寸步难行的。（列宁：《沿着老路走去！》。见《列宁全集》第15卷第22页）

只有在这种基础上，即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个别情节），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认清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我们才能以此

为根据来估计这国或那国的更详细的特点。（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见《列宁全集》第 21 卷第 123—124 页）

但是，为了“不错过机会”，为了不成为“事后聪明”的政治家，——光向事件学习是不够的。必须**了解**事件的进程，**了解决定**各个政党的政策和整个杜马的政策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基本**对比关系。（列宁：《贫血的杜马或贫血的小资产阶级》。见《列宁全集》第 12 卷第 324 页）

政治适应经济是必然要发生的，但是不会一下子发生，不会顺利地、简单地、直接地发生。（列宁：《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见《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870 页）

尤尼乌斯说阶级斗争是反对侵略的最好手段，只是运用了一半马克思辩证法，在正确的道路上走了一步之后，马上又离开了这条道路。马克思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至于阶级斗争是反对侵略的最好手段的说法，**不论**对推翻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或**对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来说，都是正确的。正因为这对**任何**阶级压迫来说都是正确的，**这过于一般化**，所以对这一**特殊**场合是**不够的**。（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见《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857 页）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民主革命的时代竟看不见民主主义的各种程度上的差别，看不见民主主义各种形式的性质上的区别，却专门“卖弄聪明”，说什么这反正是“资产阶级革命”，反正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果实，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是了不起。（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见《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543 页）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如何都不应当像现在许多革命民主主义者（如加邦之类）那样，让自己迷恋于“革命”或“俄国大革命”之类的**词儿**。（同上书，第 547 页）

脱离了阶级基础的民主派，专爱讲漂亮话，喜欢提出廉价的流行的（特别在土地问题上）口号，我们根本不想追赶这种人的革命性；恰恰相反，我们对于这种革命性永远采取批判态度，揭露字句的真义，指出被美化的伟大事件的真正内容，同时教导人们在革命最紧张的关头清醒地估计各阶级以及各阶级内部的各种派别。（列宁：《社会民主革命党和临时革命政府》。见《列宁全集》第 8 卷第 260 页）

然而有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即党内的右翼，始终都用资产阶级革命这一笼统、抽象、死板的概念来敷衍搪塞，不了解当前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是农民革命。（列宁：《社会民主党在 1905—1907 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见《列宁全集》第 13 卷第 329 页）

我们并不苛求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切具体情况。这是痴想。我们只知道这条道路的方向，我们只知道在这条道路上前进的有哪些阶级的力量；至于具体情况，实际情况，那只有千百万人的实践经验才能表明。（列宁：《政论家札记》。见《列宁全集》第 25 卷第 273 页）

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困难，应该唤起无产阶级的拥护者更仔细更具体地研究完成这些任务的方法。（列宁：《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见《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307 页）

七月事变① 后，由于克伦斯基政府抬举我，给我一种特别关心的照顾，使我不得不转入地下。当然是工人把我们隐藏起来的。有一次，在离彼得格勒市区很远的工人区的一所小小的工人住宅里，正在准备开午饭。女主人拿出面包来，男主人说："你看，多

① 指 1917 年俄历 7 月 3 日彼得堡工人和兵士群众的示威遭受反革命临时政府的血腥镇压。

么好的面包。‘他们’现在大概不敢给坏面包。我们早就不去想，在彼得格勒能给好面包。”

给七月事变作的这个阶级评价使我感到惊奇。我常常思索这次事变的政治意义，衡量这次事变在整个形势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分析从什么形势中产生了历史的这种曲折的道路，它又将造成什么局势，想到我们应该如何改变我们的口号和我们党的机构，以便适应改变了的形势。关于面包，我这个没挨过饿的人还没想到过。面包对我来讲自然就像是写作的副产品一样。要运用极其复杂的方法，通过政治分析，思想才会接近最根本的问题，接近争取面包的阶级斗争。（列宁：《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见《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324—325 页）

革命策略决不能只根据革命情绪来制定。制定策略时，必须清醒而极为客观地估计到本国的（和邻国的以及一切国家的，即世界范围内的）**一切**阶级力量，并且要估计到许多革命运动的经验。仅仅咒骂议会机会主义，仅仅否认参加议会的必要，来标榜自己的“革命性”，这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正因为这太容易了，所以不是解决困难的、极困难的任务的办法。（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见《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218—219 页）

必须有新的党，战斗的党，革命的党。这个党要有充分的勇气，能够引导无产者去夺取政权；这个党要有充分的经验，能够认清革命环境的复杂条件；这个党要有充分的机智，能够绕过横在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暗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见《斯大林选集》上卷第 260 页）

我认为任何一种人民革命，只要是真正的人民革命，就是创造性的革命，因为它打破旧的制度而创造新的制度，建立新的制度。

某些落后的国家里有时也发生一些部落反对另一些部落的儿戏似的“起义”，这样的所谓“革命”当然是不会有丝毫创造性的。可是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把这种儿戏似的“起义”看作革命。这里指的显然不是这种“起义”，而是发动被压迫阶级去反对压迫者阶级的群众性的人民革命。这样的革命不能不是创造性的革命。马克思和列宁正是主张这样的革命，并且只是主张这样的革命。同时很明显，这样的革命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发生的，它只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具备了一定的有利条件时才能爆发。（斯大林：《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见《斯大林选集》上卷第 616 页）

有人在争论：哪一种倾向是主要危险，是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倾向还是地方民族主义倾向？在目前条件下，这是一种表面的因而也是空泛的争论。如果想提出一种对任何时间和条件都适用的辨别主要危险和非主要危险的现成方法，那就愚蠢了。世上根本没有这种方法。主要危险就是人们停止和它作斗争因而让它发展到危害国家的那种倾向。（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 340 页）

在我们反法西斯独裁的斗争中特别危险的，就是把愿望和事实混淆起来。我们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实在的具体情况为根据。（季米特洛夫：《法西斯的进攻与共产国际的任务》。见《季米特洛夫选集》1953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81—82 页）

要顺利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就要求：共产党人在仔细研究实际情况和发展着的阶级力量的对比时，必须熟练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武器，由此而策划他们的活动和斗争。我们必须无情地消灭在我们同志中常常见到的缺点，那就是搬弄刻板的格式、僵死的公式和现成的型式。我们必须结束这样一种情况：若干共产党员，因为不懂或不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法，就代

之以“摆脱危机的革命道路”一类的笼统空话和口号，而一点也没有严肃认真地企图解释：必须有怎样的环境，阶级力量的对比必须如何，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成熟性须达到什么程度，共产党的影响水平必须如何，才可能开辟一条摆脱危机的革命道路。没有这种分析，一切口号就变成“无用的”炮弹、空洞的废话，徒然模糊我们当前的任务。

没有具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法，我们永远不能正确地提出并解决关于法西斯的问题，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和人民战线的问题，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态度问题，统一战线政府的问题，在工人阶级内部、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们中间发展的过程问题，或是实际生活和阶级斗争的发展现在对我们提出、将来也要对我们提出的其他新奇而复杂的许多问题。（季米特洛夫：《工人阶级统一起来反对法西斯》。见《季米特洛夫选集》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29—130页）

我要发出一声警告：不要在这问题上过分简单化或应用呆板的公式。生活比任何公式都复杂。（同上书，第143页）

某些同志不能具体地对待实际生活的各种现象，他们由于思想懒惰，采用一套笼统的、含混的公式，而不去仔细地、具体地研究阶级力量的实际情况和对比。他们不像那些百发百中的神枪手，而像那些百发百不中的“第一流的”枪手，他们的射击不是太高就是太低，不是太近就是太远。可是同志们，我们是工人运动中的共产主义的战士，我们是革命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我们要成为真正百发百中的神枪手。（同上书，第135页）

大会极力坚持：共产党所采取的一切策略步骤，必须以冷静分析实际情况、考虑阶级力量的对比和极广泛的群众政治水平为根据。（季米特洛夫：《代表大会的收获》。见同上书，第174页）

四、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论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需要最大的灵活性

德国人①一点不懂得把他们的理论变成能推动美国群众的杠杆；他们大部分连自己也不懂得这种理论，而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应付一切。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此外，他们原则上是不学英语的。因此，美国的群众不得不自找出路，看来他们首先在“劳动骑士”②里找到了这种出路，这一团体的混乱的原则和可笑的组织看来是同他们自己的混乱情况相适应的。但是根据我所听到的一切来判断，“劳动骑士”已经成了一种真正的力量，特别是在新英格兰和西部地区，而且，由于资本家的疯狂反对，这种力量将日益增大。我认为，必须在他们中间进行工作，在这批还完全可塑的群众中培养一个核心，这一核心了解运动和运动的目的，因而在目前的“骑士团”必然发生分裂的时候能把该团的领导权（至少是一部分领导权）抓到自己手中。“劳动骑士”的最大的弱点就是他们在政治上的中立态度，结果出现了鲍德利等人的十足的欺诈行为。可是这种中立态度已经在11月选举时期，特

① 指当时移居在美国的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者。

② “劳动骑士”即“劳动骑士团”的简称，是1869年在费拉得尔菲亚创建的美国工人组织，在1878年以前，是一个带有秘密性的团体。骑士团主要联合了非熟练工人，其中包括许多黑人，它的目的是建立合作社和互助组织，并参加工人阶级的许多发动。但是，骑士团的领导实际上拒绝工人参加政治斗争，并主张阶级合作；1886年，骑士团的领导反对全国性罢工，禁止它的成员参加罢工，尽管如此，骑士团的普通成员还是参加了罢工。此后，骑士团失去了它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到九十年代末就瓦解了。

别是在纽约，由于群众所采取的行动而不起作用了。每一个新参加运动的国家所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步骤，始终是把工人组织成独立的政党，不管怎样组织起来，只要它是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党就行。而这一步已比我们所预期的还要快得多地实现了，这是主要的方面。这个党的第一个纲领还是混乱的和极不完备的，它还打着亨·乔治的旗号，这都是不可避免的缺点，然而也是暂时的缺点。群众需要有时间和机会来发展自己，而只要他们有了自己的运动（不管这种运动采取什么形式，只要是**他们自己的**运动），他们就会有这种机会，因为在这种运动中，他们将通过本身的错误、通过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而前进。

美国的运动正处在我们的运动在 1848 年以前所处的那种阶段上，真正有才智的人物首先应当在那里起共产主义者同盟在 1848 年以前在各个工人联合会中所起的那种作用。只是在美国，这一切目前将进行得无比迅速；运动开展不过 8 个月，就能在选举中取得那样的成绩，这简直是闻所未闻的。……如果那里存在着有清醒的理论头脑的人，能预先告诉他们，他们自己的错误会造成什么后果，能使他们弄清楚，任何一个运动，要是不始终把消灭雇佣劳动制作为最终目标，它就一定要走上歧途，遭到失败，那末，许多蠢事都可以避免，整个过程也将大大地缩短。可是，这必须按英国的方式进行，德国的特点必须抛开，《社会主义者报》①的先生们是未必能胜任这一工作的，而《人民报》② 的先生们也只是在**做生意**方面比他们聪明一点……〔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

---

① 《社会主义者报》（《Der Sozialist》）是一家周报，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1885 年至 1892 年在纽约用德文出版。

② 《人民报》（《Volkszeitung》）即《纽约人民报》（《New Yorker Volkszeitung》）是美国的社会主义日报，1878 年至 1932 年用德文出版。

(1886 年 11 月 29 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56—458 页〕

使运动扩大，和谐地向前进，扎下根子并尽可能地包括整个美国无产阶级，要比使它从一开始就按照理论上完全正确的路线出发和前进重要得多。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而对于整整一个大的阶级来说，特别是对于像美国人这样一个如此重视实践而轻视理论的民族来说，别的道路是没有的。最主要的是要使工人阶级**作为阶级**来行动；一旦做到了这一步，他们就会很快找到正确的方向，而一切进行阻挠的人，不论是亨·乔治还是鲍德利，都将同他们自己的小宗派一起被抛弃。因此，我也认为“劳动骑士”是运动中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不应当从外面嘲讽它，而要从内部使之革命化，而且我认为，那里的许多德国人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面临一个不是由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强大而出色的运动时，竟企图把他们那一套从外国输入的、常常是没有弄懂的理论变成一种唯一能救世的教条，并且和任何不接受这种教条的运动保持一个遥远的距离。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那种发展过程的阐明。希望美国人一开始行动就完全了解在比较老的工业国里制定出来的理论，那是希望实现不可能的事情。如果德国人像我们在 1845—1848 年那样懂得理论的话，那末他们就应当根据自己的理论去行动，他们应当参加工人阶级的一切真正的普遍性的运动，实事求是地考虑运动的实际出发点，并通过下列办法逐步地把它提到理论高度：指出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遭到的每一次失败都是原来纲领中的各种错误的理论观点的必然结果。用《共产党宣言》里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应当在当前的运动中代表运动的未来。可是，首先要让运动有巩固自己的时间，不要硬把别人在开始时还不能正确了解、但很快就会

学会的一些东西灌输给别人，因而使初期不可避免的混乱现象变本加厉。一两百万工人在明年11月投票拥护真正的工人政党，在目前来说，要比十万人投票拥护一个在理论上十全十美的纲领更有价值得多。〔恩格斯：《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1886年12月28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8—459页〕

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愈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愈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愈会深入他们的心坎。当我们在1848年春天回到德国的时候，我们参加了民主政党，因为这是唯一能引起工人阶级注意的一种手段；我们是该政党的最先进的一翼，但毕竟是它的一翼。当马克思创立国际的时候，他草拟的总章程使当时**一切**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分子、比埃尔·勒鲁分子、甚至英国工联中比较先进的部分都可以参加国际；就是由于国际所容纳的范围这样广泛，它才成为它当时的那个样子，即成为逐步溶解和吸收除无政府主义者外的各个比较小的宗派的一种工具，无政府主义者在各个国家里的突然出现不过是公社失败以后资产阶级的极端反动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泰然地让他们寿终正寝，事实上也已经是这样了。如果我们在1864—1873年间坚持只和那些公开承认我们纲领的人合作，那末我们现在会处于什么境地呢？〔恩格斯：《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1887年1月27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0页〕

社会民主党不能用某种事先想好的政治斗争的计划或方法来束缚自己的手脚，缩小自己的活动范围。党承认一切斗争手段，只要这些手段适合党的现有力量，并且在现有条件下能够使我们得到最大成绩的一切斗争手段，党都是承认的。（列宁：《我们运动的迫

切任务》。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211页）

目前新的条件要求有新的斗争形式；利用杜马的讲坛是绝对必要的；长期的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群众的工作被提到了首要地位；秘密组织同合法组织的结合向党提出了一些特殊的任务；普及和解释被自由派和取消派知识分子弄得声誉扫地的革命的经验，无论是为了理论的目的或是实践的目的，都是必要的。但是，党所制定的必须善于在斗争手段和斗争方法方面估计到新条件的策略路线，现在仍旧没有改变。（列宁：《走上轨道》。见《列宁全集》第15卷第323页）

……爱尔威的草案要求用罢工和起义来“回答”任何战争，这就表明他完全不懂得，采取哪一种斗争手段不取决于革命家事先的决定，而取决于战争所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客观条件。

……罗莎·卢森堡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列宁和马尔托夫，他们两人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一起对倍倍尔的决议提出修正案，在修正案中强调指出：必须在青年中进行鼓动工作；必须利用战争所引起的危机加速资产阶级的崩溃；必须注意到斗争的方法和手段必然随着阶级斗争的加剧和政治形势的改变而改变。这样一改，倍倍尔原来那个教条主义的、片面的、呆板的决议终于面目为之一新，再不会让人作福尔马尔式的解释了。决议重申了一切理论上的真理，教训了那些为了反对军国主义而忘记社会主义的爱尔威分子。但是这些真理并不是要我们去为议会迷辩护，去一味推崇和平手段，歌颂当前比较和平与安静的局势，而是要承认一切斗争手段，要估计到俄国革命的经验，要发扬运动中有积极作用的和创造性的方面。（列宁：《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748—749页）

应当善于使公式适应生活，而不是背诵一些早已失去意义的

关于一般“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的词句。(列宁:《论策略书》。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27页)

我国革命中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革命造成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这一事实是要首先认清的，否则就不能前进。对于旧“公式”，例如布尔什维主义的旧“公式”，要善于补充和修改，因为这些公式总的说来是正确的，而到具体实现时却有所不同。关于两个政权并存的问题，以前谁也没有想到，而且也不可能想到。(列宁:《论两个政权》。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19页)

在历史急剧转变的关头，往往连先进的政党也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能理解新的局势而重复旧的口号，这些口号在昨天是正确的，但在今天已经失去任何意义。历史的急剧转变来得如此“突然”，这些口号也是如此“突然”就失去了意义。(列宁:《论口号》。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107页)

革命政党应当补课。它们学习过进攻。现在应当了解，除了学会进攻以外，还必须学会正确地退却。必须了解，——而且革命阶级已经从本身的沉痛经验中领会到，——不学会正确的进攻和正确的退却，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在所有被击败的反对党和革命政党中间，布尔什维克退却得最有秩序，他们的“军队”损失得最少，他们的骨干保存得最多，党内的分裂最小(就其深度和难于挽救的程度来说)，颓丧情绪最轻，他们最广泛最正确和最积极地去恢复工作的本领也最高。布尔什维克所以能够如此，只是因为他们无情地揭露并且驱逐了专事空谈的革命家，这些人不愿了解必须退却，必须善于退却，必须学会在最反动的议会、最反动的工会、合作社以及保险会等组织中进行合法工作。(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185页)

社会民主党在任何时候都要警惕冒险主义，无情地揭穿那些

最终必将大失所望的幻想。我们应当记住，革命政党只有真正领导起革命阶级的运动，才称得上是革命政党。我们应当记住，任何人民运动都有千变万化的形式，不断地创造新形式，抛弃旧形式，或者对运动形式作某些改变，或者把新旧形式配合运用。我们的责任就是积极地参加制定斗争方法和斗争手段的过程。（列宁：《革命冒险主义》。见《列宁全集》第 6 卷第 169 页）

他们① 破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只是“死盯着”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某一形式，而忘记了这个形式的片面性，他们害怕看到由于客观条件的改变而必然发生的急剧变化，而继续重复那种简单的、背熟了的、初看起来是不容争辩的真理：三大于二。然而政治与其说像算术，不如说像代数，与其说像初等数学，不如说像高等数学。实际上，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切旧形式都已充满了新内容，因此在数字前面，出现了一个新符号即“负号”，可是我们的聪明角色过去一直（现在还在）固执地向自己和别人担保说，“负三”大于“负二”。（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见《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255—256 页）

左倾学理主义则固执地绝对否定某些旧形式，看不见新内容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不知道我们共产党人的责任，就是要掌握一切形式，学会以最快的速度，用一种形式去补充另一种形式，用一种形式去代替另一种形式，使我们的策略适应不是由于我们的阶级或我们的努力所引起的任何形式的变更。（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见《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257 页）

1905 年布尔什维克对“议会”的抵制，使革命无产阶级增加

---

① 指第二国际的领袖们。

了非常宝贵的政治经验，表明在把合法的同不合法的斗争形式、议会的同议会外的斗争形式互相配合的时候，善于放弃议会的斗争形式，有时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在**不同的**条件下和**不同的**环境里盲目地、机械地、不加批判地搬用这种经验，那就大错特错了。1906 年布尔什维克抵制“杜马”，虽然是一个不算大的、易于纠正的错误①，但毕竟已经是一个错误。至于 1907 年、1908 年以及以后几年的抵制，就是极其严重而难于纠正的错误了，因为当时一方面不能期望革命浪潮会非常迅速地高涨并转为起义，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君主制度正在维新的整个历史环境，使我们必须把合法的工作同不合法的工作配合起来。这个历史时期已经完全终结，它同以后各时期的联系也已经完全显示出来了，现在如果回顾一下，就会特别清楚地看出：假使布尔什维克当时不在最严酷的斗争中坚持**一定要**把合法的斗争形式同不合法的斗争形式结合起来，坚持**一定要**参加最反动的议会以及其他一些受反动法律限制的机构（如保险基金会等），那末他们就**决不能**在 1908—1914 年间保住（更不用说巩固、发展和加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坚强核心。（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见《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192 页）

现在当我听到人们，例如“社会革命党人”，攻击我们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策略的时候，或者当兰斯柏利同志和我谈话，讲到“我们英国工联的领袖们说，既然布尔什维克可以妥协，那他们也可以妥协”的时候，我通常是先用一个简单的“通俗的”比喻来

① 关于个人所说的话，作适当的修改，也适用于政治和政党。聪明人并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聪明人是犯的错误不太大同时又能容易而迅速地加以纠正的人。

回答说：

假定您坐的汽车被武装强盗拦住了。您把钱、身分证、手枪、汽车都交给他们，于是您摆脱了这次幸遇。这显然是一种妥协。《Do ut des》（“我给”你钱、武器、汽车，“是为了你给”我机会安全脱险）。但是很难找到一个没有发疯的人会说这种妥协“在原则上是不能容许的”，或者说实行这种妥协的人是强盗的同谋者（虽然强盗坐上汽车又可以利用它和武器再去打劫）。我们同德国帝国主义强盗的妥协正是这样的妥协。（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193页）

有各种各样的妥协。应当善于分析每一个妥协或每一种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应当学习区分这样的两种人：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和便于后来捕获、枪毙强盗；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入伙分赃。这在政治上决不总是像这个极其简单的例子那样容易分辨。但如果有人异想天开，要替工人们打一张包票，能包治百病，或者能保证在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中不会遇到任何困难和任何错综复杂的情况，那他简直就是一个江湖骗子。（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194页）

我们从上面引自法兰克福出版的小册子中的那段话里，已经看到“左派”何等坚决地提出“不作任何妥协”的口号。这些无疑是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并且愿意做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竟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真理，这实在使人感到遗憾。请看看1874年恩格斯反驳三十三个布朗基派公社活动家的宣言时说的话吧；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是少见的和极少见的著作家之一，这种著作家的每一巨著中的每一句话，都有极为深刻的内容。

恩格斯说：

"'……我们所以是共产主义者，'——布朗基派公社活动家的宣言中说，——'是因为我们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在中间站停留，不作妥协，因为妥协只会推迟胜利到来的日子，延长奴隶制的时期。'

德国共产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通过一切不是由他们而是由历史发展进程造成的中间站和妥协，清楚地看到并始终不懈地追求最后目的：消灭阶级和建立不再有土地私有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制度。三十三个布朗基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以为，只要他们愿意跳过各个中间站和各种妥协，那就万事大吉了，只要——他们确信如此——日内'干起来'，政权落到他们手中，那末后天'就会实行共产主义'。因此，如果这不能立刻办到，那他们也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了。

把自己的急躁当做理论上的论据，这是何等天真幼稚！"（见弗·恩格斯《布朗基派公社活动家的纲领》，载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人民国家报》1874年第73号，引自《1871—1875年论文集》俄译本1919年彼得格勒版第52—53页）①。（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221—222页）

为了推翻国际资产阶级而进行的战争，要比国家之间通常进行的最顽强的战争还要困难百倍，费时百倍，复杂百倍；进行这样的战争而事先拒绝采用机动办法，拒绝利用敌人之间的利益矛盾（哪怕是暂时的矛盾），拒绝同各种可能的同盟者（哪怕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动摇的、有条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协，这岂不是可笑到了极点吗？这岂不是正像我们想攀登一座崎岖险阻、未

① 见恩格斯《流亡者文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93—594页）。

经勘察、人迹未到的高山，却预先拒绝有时要迂回前进，有时要向后折转，放弃已经选定的方向而试着向各种不同的方向走吗？而那些如此缺乏觉悟、如此没有经验的人（如果这真是因为他们年轻，那还算好：上帝本来就让青年在一定的时间内说这种蠢话的），居然还能得到荷兰共产党的某些党员的支持（不管是直接或间接的，公开或隐蔽的，完全或部分的支持，都是一样）!!

在无产阶级进行了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在一国内推翻了资产阶级之后，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很长时期内**，依然要比资产阶级**弱一些**，这只是因为资产阶级有很广泛的国际联系，而且在这个推翻了资产阶级的国家里，小商品生产者自发地、经常地使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恢复和再生。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力量，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益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一般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谁要是没有**在实践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和在相当复杂的各种政治情况中，证明他确实会运用这个真理，谁就还没有学会帮助革命阶级去进行斗争，使全体劳动人类摆脱剥削者的压榨而获得解放。以上所说的一切，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时期，都是一样适用的。（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225—226页）

如果害怕同这个党的这一翼①“妥协”，那真是可笑的。恰恰相反，共产党人**必须寻找而且一定会找到**一种同他们妥协的适当形式，一方面可以便利和加速共产党人同这一翼实现必要的完全的溶合，一方面丝毫不妨碍共产党人对“独立党人”机会主义右翼进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斗争。要制定这样一个适当的妥协形式，大概是不容易的，然而只有骗子才会应许德国工人和德国共产党人一条“容易”致胜的道路。（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228—229页）

第一个原则。在共产国际给各国工人运动作出指导性的指示时，一定要估计到每个国家的民族特殊的东西和民族独有的东西；

第二个原则。每个国家的共产党一定要利用最小的可能以保证无产阶级有数量众多的同盟者，即使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也好；

第三个原则。一定要估计到这样一个真理：在政治上教育千百万群众，只有宣传和鼓动是不够的，必须要有群众自身的政治经验。（斯大林：《时事问题简评》。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98—299页）

另一种方法就是和那些处在社会民主主义阵营里的迷失方向的弟兄取得相互的了解，帮助他们走出社会民主主义的丛林，使他们容易转到共产主义方面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德国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见《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05页）

第二个问题：集体农庄运动中的主要错误是什么？

答：主要错误至少有三个。

………………

（2）违背了列宁的在进行集体农庄建设时必须估计到苏联各

① 指当时德国的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左翼。

个不同地区的各种不同条件的原则。忘记了苏联有各种各样的地区，这些地区各有不同的经济结构和文化水平。忘记了这些地区有先进、中间和落后的差别。忘记了集体农庄运动的速度和集体农庄建设的方法对于这些远不相同的地区**不能是一样的**。

列宁说："如果我们简单地按照死板格式来为俄国各地抄录法令，如果乌克兰和顿河区的布尔什维克党员、苏维埃工作人员不加分析地笼统地把这些法令推行到其他地区去，那就错了。……"因为"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用千篇一律的死板格式来束缚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一成不变地认为我们的经验，俄国中部的经验，可以完全搬到一切边区"。(《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125—126页)①

其次，列宁说：

"如果死板地把俄国中部、乌克兰和西伯利亚混为一谈，使它们服从于一定的死板格式，那将是极为愚蠢的。"(《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第243页)②

最后，列宁责成高加索的共产党员，要他们

"了解他们的特殊情况，即他们共和国的情况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情况和条件不同的地方，了解决不可以抄袭我们的策略，而必须深思熟虑地把它加以改变，使它适合于不同的具体条件"(《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第191页)③。(斯大林：《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247—250页)

在实现苏维埃自治的道路上的另一个同样严重的障碍，是某

① 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133页。
②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210页。
③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500页。

些同志在边疆地区苏维埃化的工作中所表现的那种急躁情绪，这种情绪常常变成粗暴无礼的行为。如果这些同志决意要在那些比俄国中部落后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的地区，在那些还没有完全消灭中世纪经济结构的地区用“英雄的努力”来实行“纯粹的共产主义”，那末可以肯定地说，这种骑兵式袭击，这种“共产主义”是不会带来什么好处的。……

…………

简单地说：必须放弃使落后人民群众“立即共产主义化”的骑兵式袭击，采取谨慎小心和深思熟虑的把这些群众逐步引入苏维埃发展总轨道的政策。（斯大林：《苏维埃政权对俄国民族问题的政策》。见《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320—321页）

列宁曾一再告诫我们，不要采用这样“刻板的方法，不要把策略的法则、斗争的法则这样机械地平均化、同等化”。这一告诫现在是特别中肯的，因为问题是我们在和这样的敌人作战，他为着大资本的利益，非常巧妙而狡猾地利用群众的民族情感和偏见以及群众反资本主义的倾向。我们必须彻头彻尾地从各个方面去了解这样的敌人。我们必须毫不迟延地反抗他的阴谋诡计，发现他的秘密行动，准备随时随地打退他的进攻。我们甚至必须毫不踌躇地向敌人学习，倘若那样做就能帮助我们更迅速而有效地扭断敌人的脖子的话。

如果要给一切国家和一切民族规定出法西斯发展的任何一般公式，那就大错而特错了。这样一个公式不仅不能帮助我们，反而会阻碍我们进行实际的斗争。其他一切姑且不论，这样做，结果就会不加区别地驱使某些部分的人投入法西斯阵营，而这些部分的人如果得到适当的对待，在一定发展阶段中，是会被带到反法西斯斗争中来的，或者至少是会保持中立的。（季米特洛夫：《工人阶级统一

起来反对法西斯》。见《季米特洛夫选集》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32页）

我们在向群众说话时，必须学习用那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们的语言，而不用书本上公式的语言，这种战士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意思，都反映着千百万人内心最深处的思想和感情。（季米特洛夫：《工人阶级统一起来反对法西斯》。见《季米特洛夫选集》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31页）

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论主观主义、革命空谈与革命的实际背道而驰

“有过一个发疯的时刻，有感觉的钢琴以为它是世界上仅有的一架钢琴，宇宙的全部和谐都发生在它身上。”

〔**编者按**：这是列宁著《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从狄德罗的著作引来的一段话（见《列宁全集》第14卷第26页），说明主观主义是常会出现的，因为人们（用钢丝琴作喻）常常会有这样的“发疯的时刻”，以为自己就是一切，而一切都全包含在自己主观里。〕

弱者总是靠相信奇迹求得解救，以为只要他能在自己的想象中驱除了敌人就算打败了敌人；他总是对自己的未来以及自己打算建树、但现在还言之过早的功绩信口吹嘘，因而失去对现实的一切感觉。（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7页）

很少看到什么事情比山岳党当前的进军喧嚷得更厉害；很少看到谈论什么事情像现在吹嘘民主派必然胜利这样自信、这样迫不及待。显然，民主党人是相信使耶利哥城的墙壁应声倒塌的喇

叭声音① 的力量的。(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34页)

没有一个政党像民主党这样夸大自己的力量,也没有一个政党像民主党这样轻率地错误估计局势。……民主党人认为,和他们对立的是一个特权阶级,但他们和全国所有其他阶层一起构成了**人民**。他们所维护的都是**人民的权利**;他们所关心的都是**人民的利益**。因此,他们没有必要在临近斗争时考察各个不同阶级的利益和状况。他们不必过分仔细地估量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只要发出一个信号,**人民**就会用它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冲向**压迫者**。可是,如果事实表明民主党人的利益并不使人关心,他们的力量是软弱无力,那末这就应该归罪于危险的诡辩家,他们把**统一的人民**分成了各个敌对的阵营,或者是由于军队太残忍,太盲目,因而不能把民主党人的纯正目的当做自己的利益,再不然就是由于执行中的某种细节使全部事情垮了台,最后,或者是某种意外的偶然事件使事情没有成功。不管怎样,民主党人逃出最可耻的失败时总是洁白无瑕,正像他进入这种失败时是纯洁无辜一样;他摆脱失败时信心更加坚定了,他以为他一定会胜利,以为不是他自己和他的党应该放弃旧的观点,相反地,是情势应该来适应他。(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34—635页)

1848年以来,在全欧洲大陆上流行着一种特殊的病症,即**议会迷**,染有这种病症的人就变成幻想世界的俘虏,失去一切理智、

① 根据圣经传说,公元前2000年的下半年,占领巴勒斯坦的以色列兵士用吹羊角的声音使耶利哥城攻不破的城墙塌陷(见圣经《约书亚记》第6章第2—5、12—20节)。

一切记忆，失去对外界世俗事物的一切理解。（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65页）

虽然公社是由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组成的，但它的措施却往往是正确的。很明显，对于公社在经济方面的各种法令，无论是这些法令的优点或缺点，首先应当由蒲鲁东主义者负责；而对于公社在政治方面的行动和失策，则应当由布朗基主义者负责。正如政权落到空谈家手中时常有的情形那样，无论是蒲鲁东主义者或布朗基主义者，都按照历史的讽刺，做出了恰恰与他们学派的信条相反的事情。（恩格斯：《〈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3页）

他们想按自己的理想来改造这些不为他们所了解的关系，这种企图和努力是不能不遭到失败的。（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55页）

目前，表明俄国工人运动中各派力量的**客观**材料愈来愈多了。我们应该尽一切力量收集、核对和研究这些客观材料，因为这些材料所说明的不是个别人和个别集团的活动和情绪，而是**群众**的活动和情绪。这些材料是从各种**怀有敌意的**报纸上拿来的，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可以**核对**。

只有根据这样的材料，才能学习和研究本阶级的运动。民粹派和取消派以及各种知识分子集团，如"前进派"、普列汉诺夫派、托洛茨基派，它们的一个主要缺点，甚至可说是最主要的缺点（或者说对工人阶级所犯的罪孽）就是**主观主义**。他们处处都把自己的愿望、自己的"意见"、自己的估计、自己的"希望"当作工人的意志，当作工人运动的要求。（列宁：《表明工人运动中各派力量的一些客观材料》。见《列宁全集》第20卷第384—385页）

闪光的东西不一定都是金子。托洛茨基的词句虽然灿烂夺目，

娓娓动听，可是没有丝毫内容。（列宁：《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490页）

把无产阶级的策略建筑在主观愿望上就等于把它毁灭。（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见《列宁全集》第24卷第207页）

用抽象的概念来代替具体的东西，这是革命中一个最主要最危险的错误。（列宁：《论口号》。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113页）

德国“左派”……以为只要唱唱高调，怒气冲冲地把“反动的”和“反革命的”工会大骂一顿（克·霍纳骂得特别“庄重”和特别粗鲁），就足以“证明”，革命家、共产党人不需要，甚至不容许在黄色的、社会沙文主义的、妥协的、列金派的、反革命的工会里做工作。

不管德国“左派”怎样确信这种策略是革命的，但实际上这种策略是根本错误的，它只是几句空话，毫无内容。（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202—203页）

德国“左派”把**自己的愿望**，把自己思想上政治上的态度，当作了客观现实。这对革命家是最危险的错误。在俄国，沙皇制度的异常野蛮和残暴的压迫，在一个特别长的时期里，用特别多样的形式造成了各种派别的革命家，造成了无限忠诚、热情、英勇和意志坚强的革命家；在俄国，我们曾经对革命家所犯的这种错误，作过特别真切的观察、特别仔细的研究、特别透彻的了解，所以我们对别人的这种错误，也看得特别清楚。在德国共产党人看来，议会制度自然“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可是问题恰恰在于**不能把对于我们**已经过时的东西，当作**对于阶级**也已经过时的东西，当作**对于群众**也已经过时的东西。正是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左派”不善于作为**阶级**的党、作为**群众**的党来判断事理，处理事

情。（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213—214页）

荷兰人和一般“左派”在这方面的言论活像空谈革命的学理主义者，那种人从来没有参加过真正的革命，或者没有深刻地探讨过革命史，或者天真地以为主观上“否认”某种反动机构，便算是实际上用许多客观因素的共同力量把这种机构破坏了。使一种新的政治（不仅是政治的）思想声誉扫地，受到损害，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以维护为名，把它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因为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得“过火”（如老狄慈根所指出的那样），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所能应用的范围以外去，便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而且在这种情形下，甚至必然会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217页）

共产党人要竭尽全力来指导工人运动以及整个社会发展沿着最直最快的道路走向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的胜利。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然而，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只要像德国和英国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那样，说什么我们只承认一条道路，一条笔直的道路，我们不容许机动、通融、妥协，这就是错误，这会使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最严重的危害，而且共产主义运动部分地已经受到或正在受到这种危害。（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257页）

“拒绝”参加议会所以幼稚，就是因为他们想用这种“简单的”、“容易的”、似乎是革命的方法，来“**解决**”在工人运动**内部**对资产阶级民主影响作斗争这一困难任务，其实他们只是妄想逃开自己的影子，只是闭眼不看困难，只是用空话来回避困难罢了。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265页)

我在一次党的会议上说，鼓吹革命战争的革命空谈会断送我们的革命，当时有人责备我，说我的提法过火了。但是，当着党和革命有受到无法补救的损害的危险的时候，就必须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一语道破真情实况。

革命政党在它直接或间接实行无产阶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联系、联合和结合的情况下，在革命事变进程发生巨大的、急剧的转折的情况下，最容易害革命空谈病。革命空谈就是不顾当前事变转折和当前形势下的客观情况，一味重复革命口号。口号很漂亮，很诱人，很醉人，但是毫无根据，——这就是革命空谈的本质。(列宁:《论革命空谈》。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1页)

“革命公社”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概念和“临时革命政府”有区别吗？如果有，那末区别在哪里呢？代表会议派先生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的革命思想是混乱不清的，结果就——这是很常见的事——尽说**革命的空话**。的确，社会民主党代表的决议中使用“革命公社”这样的字眼，不过是说革命的空话而已。马克思屡次斥责过这种用**早已过时的**“动听的”名词来遮盖将来的任务的空话。在历史上起过作用的动听的名词，在这种情形下就会变成空洞而有害的华而不实的东西，变成装饰品。(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571页)

你们说，德国人不可能进攻。根据你们的策略，便得出了可以宣布战争状态已经结束的结论。但是历史已经给你们上了一课，它推翻了这种幻想。是的，德国革命在发展着，但是并不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并不像会使俄国知识分子感到满意的那样快，并不像我国历史在十月革命时期发展的那样迅速，——在十月革命

时期，我们无论到哪个城市去宣布成立苏维埃政权，几天以内十分之九的工人都会站到我们这方面来。德国革命的发展，可惜还没有这样快。谁应该顾及谁呢？是我们应该顾及德国革命还是德国革命应该顾及我们呢？你们曾经希望，要德国革命顾及你们，而历史却给你们上了一课。（列宁：《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462页）

我们不知道、任何人也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也许在几星期以后，甚至在几天以后就会胜利，——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我们决不能以此作为赌注。应该准备应付特别艰巨的困难，应付特别严重的失败，这些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欧洲的革命即使在明天开始，但毕竟还没有开始，……（同上书，第463页）

同样，如果你们向人民说，德国内战一定会到来，并且担保说，不会和帝国主义发生冲突，只会爆发战场上的国际革命，那末，人民会说你们在欺骗他们。这样，你们只是在自己的见解中，在自己的愿望里，越过历史所造成的困难。如果德国的无产阶级将来能够发动起来，这当然很好。但是，这种情况你们是否已经计算好了，是否已经找到了一种能够确定德国革命在哪一天爆发的仪器呢？不，这一点你们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你们孤注一掷。如果革命爆发了，当然，一切都得救了。但是，如果革命的爆发不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即使爆发了，但不能明天就取得胜利，那时怎么办呢？那时群众会对你们说：你们的行动和冒险家一样，——你们把赌注押在这种侥幸的事件进程上，这种进程没有到来，结果你们就不能适应国际革命没有到来的情况，国际革命必然会到来，但是目前还没有完全成熟。（列宁：《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466—467页）

亲爱的朋友们，我来给你们解释，为什么你们会发生这种不幸的事情，这是因为你们对于革命口号背诵得多，死记得多，而思索得却很少。因此你们把“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这句话加上引号，大概想借此来表示你们的讥讽，但实际上这个引号正表示出你们的思想一塌糊涂。你们惯于把“护国主义”看作卑鄙龌龊的东西，你们背熟了这一点，你们把这一点背得烂熟，以致你们中间有些人竟弄到荒谬地步，以为在帝国主义**时代**保卫祖国是不能容忍的（实际上，只是在资产阶级所进行的帝国主义的、反动的战争中，保卫祖国才是不能容忍的）。但是你们没有很好考虑："护国主义”为什么是并且在什么时候才是龌龊的。（列宁：《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536—537页）

亲爱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他们的坚决性那么多……而思考力却那么少！……

……关键却在于：要**由**国有化和没收过渡**到**社会化，即使有世界上最大的“坚决性”，也是不够的。（同上书，第538页）

根据目前劳动条件，这个任务① 无论如何不容许像我们从前解决国内战争任务那样用高呼“乌拉”的方式来解决。（列宁：《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455页）

在这里，由于客观情况的不同，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像过去和卡列金分子进行斗争时那样只用高举大旗胜利进军的方式。（同上书，第456页）

---

① 指社会主义革命的“内部组织任务”和“组织统计工作，监督各大企业，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个使几万万人都遵照一个计划工作的经济机体”等。

我们要从胜利进军的时期过渡到异常艰难的时期，当然，这种情况不是用空话和漂亮口号所能躲开的（虽然这样做很痛快）……（同上书，第458页）

我们欢呼“乌拉”是捉不住德国强盗的，也不能像打垮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那样打垮德国强盗。（同上书，第464页）

我们不需要疯狂的热潮。我们需要有无产阶级铁军的整齐步伐。（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528—529页）

所谓共产党员的骄傲自大，就是说，一个置身于共产党内而还没有被清洗出去的人，以为用共产党员的名义发号施令，就能完成他的一切任务。（列宁：《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局的任务》。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59页）

总之应该说，借以在我国实现一个阶级的政权即无产阶级的政权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是一种颇为复杂的东西。我知道这种复杂性是有些同志所不喜欢的，是不合他们口味的。我知道，其中有许多同志从“最省力的原则”出发，宁愿与比较简单比较容易的制度打交道。但有什么办法呢，第一，列宁主义实际上怎样，就应当怎样了解它（不能把列宁主义简单化和庸俗化），第二，历史证明，最简单和最容易的“理论”并非常常是最正确的。（斯大林：《论工农政府问题》。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69—170页）

你们看见过这样的船夫吗？他们老老实实地划船，划得汗流满面，但是不知道流水会把他们冲到哪里去。我在叶尼塞河上看见过这样的船夫。这是一些诚实的、不知疲倦的人。但是他们的不幸，就在于他们不知道而且不愿意知道波浪会把他们冲到使他们遭到灭亡的危险的礁石上去。

我们有些同志也是这样。他们老老实实地双手不停地划船，随

波逐流，至于流水会把他们冲到哪里去，他们不仅不知道，甚至不愿意知道。没有前途的工作，没有舵没有帆的工作，——这就是只想随波逐流的心理所造成的后果。

结果怎样呢？结果是很清楚的：起初他们身上渐渐发霉，接着他们就变得暮气沉沉，随后他们就陷入庸俗的泥潭，末了他们就变成十足的庸人。这就是真正蜕化的道路。（斯大林：《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见《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85—286页）

为什么全党以及跟它一起的工人阶级能这样急遽地把反对派孤立起来呢？要知道，领导反对派的都是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善于给自己作广告的人物，（喊声："对！"）不谦逊的人物，（鼓掌）善于自吹自擂的人物。

其所以这样，是因为反对派的领导集团原是一些脱离实际生活、脱离革命、脱离党、脱离工人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组成的集团。（喊声："对！"鼓掌）（斯大林：《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见《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88页）

布哈林反对派的领导者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发言中完全避开了我们国内的阶级变动问题，一句话也没有提到阶级斗争的尖锐化，甚至丝毫没有暗示一下我们的意见分歧正是和这种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有关的。同志们，这一点你们是否注意到了呢？他们无所不谈，既谈哲学，又谈理论，但是对于决定当前我们党的方针和实际工作的那些阶级变动却一句话也没有提到。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怪事呢？也许是因为健忘？当然不是！政治家是不能忘记主要东西的。这是因为他们看不见和不了解目前我们国内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内所发生的新的革命过程。这是因为

他们忽略了主要东西，忽略了政治家没有权利忽略的阶级变动。正因为如此，布哈林反对派在我们党的新任务面前就显得张皇失措和束手无策。（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119—120页）

胜利有时能冲昏人的头脑。胜利往往使人产生过分的自负和骄傲。这特别容易发生在执政党的代表人物身上。尤其是像我们党这样一个几乎具有无比的力量和威望的党。列宁所激烈反对的那种共产党员骄傲自大的事实，在这里是很可能产生的。相信法令、决议和命令万能的心理，在这里是很可能产生的。党的革命措施在我们辽阔广大的国家的某些角落变成党的个别代表的空洞的官僚式的命令手段的危险，在这里是很现实的。我指的不仅是地方工作人员，而且是个别州委委员和个别中央委员。（斯大林：《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252页）

他们① 不懂得进攻的阶级本质。他们大叫进攻。但是向**哪个**阶级进攻，联合**哪个**阶级去进攻？我们是联合中农向农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因为只有这种进攻才能使我们取得胜利。但是，如果这种进攻因为党的个别队伍陶醉于胜利而开始离开正确的道路，把自己的锋芒转向我们的同盟者，转向中农，那怎么办呢？难道我们需要的是**任何一种**进攻，而不是联合一定阶级去反对一定阶级的进攻吗？要知道唐·吉诃德② 也以为他向风车冲锋就是向敌人进攻。可是大家知道，他在这种所谓进攻中曾碰得头破血流。

---

① 指苏联全盘集体化时期的“左”倾急性者。

② 唐·吉诃德是西班牙作家米·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诃德》中的主人公。他读骑士文学迷了心窍，竟异想天开地要模仿书中人物，做一番骑士的事业。他把虚妄的幻想当成现实，结果到处碰壁。后来，唐·吉诃德就成了脱离实际、充满幻想的人物的代名词。

大概我们的“左”倾过火分子不甘心让唐·吉诃德专美于前吧。(斯大林:《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256页)

人们在办公室里坐着,洋洋得意地要笔杆,却不知道集体农庄是在官僚主义的办公室外面发展着的。(斯大林:《关于农村工作》。见《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01页)

也有这样一种危险,就是我们某些同志为这些成就所陶醉而骄傲自满到极点,开始用一些吹嘘的话来安慰自己,说什么“我们现在可以徒步过海”,“我们一拳就能把敌人打倒”等等。同志们,这种危险并不是绝对不可能有的。这种情绪是再危险不过的,因为它能解除党的武装,瓦解党的队伍。(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见《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31页)

现在来谈第二种工作人员。我指的是那种爱说废话的人,可以说是一些爱说废话的老实人,(笑声)是一些忠诚于苏维埃政权但是没有能力做领导工作,没有能力做组织工作的老实人。去年我曾经和这样一个同志谈过话,这个同志很受人尊敬,但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爱说废话的人,能够把任何一件活生生的事情淹没在废话中。下面就是这一次的谈话。

我问:你们的播种工作怎样了?

他答:斯大林同志,你问播种工作吗?我们已经动员起来了。(笑声)

我问:那么结果怎样呢?

他答:我们把问题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了。(笑声)

我问:那么以后又怎样呢?

他答:斯大林同志,我们有了转变,马上就会有转变。(笑声)

我问：究竟怎样了？

他答：我们那里有了一些进展。（笑声）

我问：可是你们的播种工作究竟怎样了？

他答：斯大林同志，我们的播种工作暂时还毫无头绪。（全场哈哈大笑）

这就是爱说废话的人的面目。他们动员起来了，把问题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了，他们既有转变，又有进展，可是工作却没有动起来。

这和不久以前一位乌克兰工人所描述的某一组织的情况完全一样，当有人问他这个组织有没有路线时，他回答说："路线吗……路线当然是有的，只是工作看不见。"（全场大笑）看来这个组织也有爱说废话的老实人。

当我们把这些爱说废话的人撤职，把他们远远地调离实际工作的时候，他们就摊开双手困惑不解地问道："究竟为什么要把我们撤职？难道我们没有把一切必要的事情都做了吗？难道我们没有召集突击队员大会吗？难道我们没有在突击队员会议上宣布党和政府的口号吗？难道我们没有把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选为名誉主席团吗？（全场大笑）难道我们没有给斯大林同志拍致敬电吗？——你们究竟还要我们做些什么呢？"（全场哈哈大笑）

对这些不可救药的爱说废话的人该怎么办呢？要知道，如果仍然让他们担任实际工作，他们就会把任何一件活生生的事情淹没在滔滔不绝的废话中。显然，必须撤销他们的领导职务，派他们去做别的非实际的工作。实际工作中是不容许有爱说废话的人的。（喊声："对！"鼓掌）（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46—347页）

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关门主义，我们在决议的草案中把它叫

做自满的关门主义，特别阻碍我们为实现统一战线而作的斗争：关门主义自满于教条主义的狭隘观念，自满于脱离群众的实际生活，自满于以其极简单的方法按照一成不变的公式，来解决工人运动中极复杂的问题；关门主义自命为无所不知，用不着向群众学习，用不着从工人运动的教训中学习。总之，在关门主义看来，如大家所说的，高山不过是踏脚石。自满的关门主义不会而且不能了解，共产党对工人的领导权不是自然得来的。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是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争取得来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那就不需要夸张共产党员的领导作用，而是需要凭日常的群众工作和正确的政策去获得和争取劳动群众的信任。只要我们共产党员在政治工作中认真地顾到群众阶级觉悟的实际水平，顾到群众革命化的程度，只要我们不凭自己的愿望而凭实际的情况，清醒地估计实际的情势，那末，这一件事是可以做到的。我们必须有耐心地、一步一步地使广大群众更容易投到共产党的阵地来。我们决不应该忘掉列宁的话，他曾尽力警诫我们：

> "……问题正在于不要把我们所认为过了时的东西，当作是阶级也认为过时了的，群众也认为过时了的东西。"①

同志们，在我们的队伍里面仍有不少这样的教条主义分子，他们随时随地只感觉到统一战线政策的危险，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在这样的一些同志看来，整个的统一战线就是一个不可挽救的危险。可是，这种关门主义的"坚持原则"，不过是遇到直接领导群众斗争的困难时在政治上束手无策罢了。

关门主义的主要表现，在于过高估计群众革命化的程度，在于过高估计群众放弃改良主义立场的速度，在于企图跳过这个运

①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动的困难阶段和复杂任务。实际上，关门主义常用领导狭小党组的方法来代替领导群众的方法。它过低估计群众与其组织和领导者之间的传统关系的力量，并且在群众不立刻割断这些关系的时候，对他们采取的态度正像对他们反动领导者一样的粗暴。由于不顾每一个别国家实际情况的特点，它对一切国家所施行的策略和所用的口号已趋于千篇一律。它忽略了就在群众本身中间进行顽强的斗争来争取群众信任的必要，忽略了拥护工人局部要求的斗争以及在改良主义工会和法西斯群众组织中的工作。它常常使用空洞的呼吁和抽象的宣传来代替统一战线的政策。

关门主义的观点同样阻碍了正确地选拔人才，训练和培养干部——与群众有联系的、为群众所信任的干部，其革命品质曾经在阶级斗争中受过考验的干部，能够把群众工作实际经验与布尔什维克坚持原则的精神结合起来的干部。

因此，关门主义曾经大大地阻碍各国共产党的成长，使真正的群众政策难于实行，使我们不能利用阶级敌人的一些困难来巩固革命运动的阵地，并使我们不能争取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到共产党这边来。

在极坚决地为彻底克服和消灭自满的关门主义残余而进行斗争时，我们必须尽量提高我们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警惕，并加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它的一切具体表现的斗争，不要忘记，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会跟着广大统一战线的发展而增加的。现在已经有些倾向足以削弱共产党在统一战线队伍中的作用，并且足以造成与社会民主党思想的妥协。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这个事实，即统一战线的策略乃是一种方法，要使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们确信共产党的政策是正确的而改良派的政策是不正确的，并且统一战线的策略不是对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和行动的妥协。要使建立统一战

线的斗争得到胜利，那就一定需要在我们的队伍中不断地进行斗争，来反对削弱我们党的作用的倾向，反对合法主义的幻想，反对在扑灭法西斯以及指挥统一战线上靠自发和自动，反对在决定胜负时的任何动摇。（季米特洛夫：《法西斯的进攻与共产国际的任务》。见《季米特洛夫选集》1953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118—120 页）

实际上我们所提拔的，举例来说，常常是善于写作或善于讲话的同志，而不是一个能实行的人，因而这个同志做斗争工作就不如另外一个适宜，另外一个或许不那样善于写作或讲话，但确是一个忠实的同志，具有创造力、接近群众、能参加战斗并且能领导别人参加战斗。关门主义者、教条主义者或空谈家把我们忠实的群众工作者、工人阶级的真正领袖排挤出去，不已经是常有的事吗？（季米特洛夫：《工人阶级统一起来反对法西斯》。见同上书第 157 页）

六、列宁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与怯懦的改良主义

（一）

这几天我翻阅了一下苏汉诺夫[①] 论革命的札记。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我国一切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和第二国际全体英雄的学究气。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对过去的盲目模仿，至于他们非常胆小，甚至其中比较好一些的人，一谈到稍微离开一下德国的榜样，也要抱保留态度，这种一切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在整个革命时期

① 尼·苏汉诺夫是俄国政论家，农业经济学家。早期为民粹派，后来成为孟什维克。十月革命后在苏维埃经济机关工作。1931 年因领导孟什维克地下组织而被判刑。

充分表现出来的特性，就更不用说了。

他们都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却迂腐到了极点。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是一窍不通的。马克思说在革命时期要有极大的灵活性①，就连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完全不了解。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马克思——我记得是——在 1856 年的通信中曾谈到德国的农民战争能够造成一种革命的局面，他希望农民战争能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②。就连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要回避，绕道而行，就像猫儿围着热饭兜圈子一样。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他们是些畏首畏尾的改良主义者，惟恐离开资产阶级一步，更怕跟资产阶级决裂，同时又用毫无内容的、大言不惭的空谈来掩饰自己的怯弱。即使单从理论上来看，也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根本不能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下述见解：直到现在为止，他们只看到过西欧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发展的这条固定道路。因此，他们不能想象到，这条道路如果不作相应的改变（mutatis mutandis），也就是说，如果不作某些改正（从世界历史总的进程来看，这种改正是微不足道的），是不能当作模范的。

第一，这是和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相联系的革命。这样的革命不免要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或者正是由于战争而有所改变的一些特征，因为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过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这样的战争。我们看见，最富强的国家的资产阶级从战后起一直到

① 参看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和马克思 1871 年 4 月 12 日给路·库格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378 页，第 4 卷第 392 页）。

② 参看马克思 1856 年 4 月 16 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34 页）。

现在还不能把“正常的”资产阶级关系调整好，而我们的改良主义者，即俨然以革命家自居的小资产者，却一直认为正常的资产阶级关系是一条界限（不能再越过了），而且他们对于这种“常态”的了解是极其死板、极其狭隘的。

第二，他们根本不相信任何这样的看法：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他们甚至没有想到，例如，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次战争完全拖进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或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可能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固然并不越出世界发展的共同路线，但是使俄国革命显得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在转向东方国家时这些特殊性又会带有某些局部的新东西。

例如，他们在西欧社会民主党发展时期背得烂熟的一条论据，已成为他们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这条论据就是：我们还没有成长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或像他们的各种“博学的”先生们所说的那样，我们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的经济前提。可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自问一下：遇到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时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影响下，难道不能挺身起来斗争吗？这种斗争至少会使他们有一些机会为进一步发展文明争得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

“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第二国际的一切英雄们，当然也包括苏汉诺夫在内，把这个论点真是当做口头禅。他们把这个无可争辩的论点，用千百种腔调一再重复，他们觉得这是对评价我国革命有决定意义的论点。

但是第一、既然特殊形势使俄国卷入了西欧各个多少有些势力的国家也被卷入的世界帝国主义战争，使俄国的发展（近似东

方正在开始和部分已经开始的革命）纳入一种可以实现“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联合的环境中，而关于这种联合，像马克思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在1856年谈到普鲁士的时候，就认为是一种可能的前途，——那又怎样呢？

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那又怎样呢？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路线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正在卷入和已经卷入世界历史总进程的每个国家的各基本阶级的基本相互关系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

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怎样，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

（二）

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末，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究竟在哪些书上看到，说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有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的呢？

记得拿破仑这样写过：《On s’ engage et puis …onvoit》，意译出来就是：“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再看分晓。”我们也是首先在1917年10月投入了真正的战斗，然后就看到了布列斯特和约或新经济政策等等这样的发展中的细节（就世界历史来说，这当然是细节）。现在已经毫无疑问，我们基本上是胜利了。

我们的苏汉诺夫之流，更不必说那些比他们更右的社会民主

党人了，做梦也没有想到，不这样就根本不能进行革命。我们的欧洲庸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

考茨基式的教科书，不用说在当时是很有益处的。不过现在毕竟是丢掉那种认为这本教科书规定了今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切形式的想法的时候了。应该及时宣布，有这种想法的人简直就是傻瓜。(列宁：《论我国革命》。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689—692页)

七、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与客观主义及自发论、自流论

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俏皮的攻击。事变本身在他笔下却被描绘成了晴天的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作用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写成伟人了。蒲鲁东呢，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他对这次政变所作的历史的说明，却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的那些所谓**客观**历史家所犯的错误。相反，我则是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99页)

马克思学说把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谁把冷静地肯定客观情况的理论曲解为替现状辩护，以至于尽快地使自己去应付每次革命的暂时低潮，尽快地抛弃“革命幻想”而去从事“现实主义的”小事情，那他就不是马克思主

义者。（列宁：《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686—687页）

我们对司徒卢威先生给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一项批评不能不表示异议。作者说："在他看来，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即一方面应当成为个人和社会集团有目的的活动的出发点，另一方面应当成为这种活动所必须遵守的界限的那种历史趋势是不存在的。"（11页）

这是客观主义者的语言，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唯物主义者）的语言。这两种概念（观点体系）是有差别的，我们应当加以说明，因为司徒卢威先生这本书的主要缺点就是没有完全弄清这一差别，这表现在他的大部分的论断中。

客观主义者谈论现有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唯物主义者则是确切地肯定现有社会经济形态和它所产生的对抗关系。客观主义者证明现有一系列事实的必然性时，总是不自觉地站到为这些事实做辩护的立场上；唯物主义者则是揭露阶级矛盾，从而确定自己的立场。客观主义者谈论"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唯物主义者则是谈论那个"支配"当前经济制度、造成其他阶级的某种反抗形式的阶级。可见一方面，唯物主义者运用自己的客观主义比客观主义者更彻底，更深刻，更全面。他不仅指出过程的必然性，并且阐明正是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形态提供这一过程的内容，**正是什么样的阶级**决定这种必然性。例如现在，唯物主义者不会满足于肯定"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而会指出存在着一定的阶级，这些阶级决定着当前制度的内容，使得生产者不自己起来斗争就不可能有出路。另一方面，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见《列宁全集》第1卷第378—379页）

非党性是资产阶级思想。党性是社会主义思想。这个原理总的来说适用于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当然，必须善于把这个普遍真理运用于个别的问题和个别的场合。（列宁：《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660页）

我们说，必须用七十年代的那种献身的决心和毅力，来鼓舞我们的比那时更广阔和更深刻得多的运动。的确，直到现在，似乎还没有人怀疑过：当前运动的力量在于群众（主要是工业无产阶级）的觉醒，而它的弱点却在于身为领导者的革命家缺乏自觉性和首创精神。

但是，最近有人作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大有把至今对这个问题的一切流行观点全部推翻之势。作出这个发现的是《工人事业》杂志，它在同《火星报》和《曙光》杂志进行论战的时候，不仅提出局部性的反驳，而且力图把“总的意见分歧”归结到更深的根源上去，即归结为“对自发因素和自觉的‘有计划’因素相比哪个意义大，有不同的估计”。《工人事业》杂志提出的指责是：**“轻视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因素或自发因素的意义”**①。对此我们回答说：如果说同《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论战，只是促使《工人事业》杂志想到这个“总的意见分歧”，而完全没有产生任何其他的结果，那么单是这个结果也就使我们很满意了，因为这句话的含义很深，它把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当前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意见分歧的全部实质都非常清楚地点明了。

正因为如此，自觉性同自发性的关系问题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普遍的关注，对这个问题应当十分详细地加以讨论。

---

① 1901年9月《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第17页和第18页。着重号是《工人事业》杂志编者加的。

（一）自发高潮的开始

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指出，九十年代中期俄国有教养的青年醉心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很普遍**的。大约同一时期，在有名的1896年彼得堡工业战争① 之后，工人罢工也带有同样的普遍性。工人罢工遍及全俄，清楚地证明了重新高涨起来的人民运动的深度；假使要说什么“自发因素”，那么首先当然应当承认，正是这种罢工运动是自发的。但自发性和自发性也有不同。在七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甚至在十九世纪上半叶），俄国都发生过罢工，与此同时还有“自发地”毁坏机器等等的现象。同这些“骚乱”比较起来，九十年代的罢工甚至可以称为“自觉的”罢工了，可见工人运动在这个时期的进步是多么巨大。这就向我们表明：“自发因素”实质上无非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甚至原始的骚乱本身就已表明开始有了某种程度的自觉性，因为工人已经不像历来那样相信压迫他们的那些制度是不可动摇的，而开始感觉到，还不能说是理解到，必须进行集体的反抗，坚决地抛弃奴隶般的顺从上司的态度。但这种行为多半是绝望和报复的表现，还不能说是**斗争**。九十年代的罢工所表现出来的自觉色彩就多得多了，这时已经提出一定的要求，事先考虑什么样的时机较为有利，并且讨论别处发生的一些事件和实例，等等。如果说骚乱不过是被压迫人们的一种反

---

① 指1896年5—6月彼得堡纺织工人的大罢工。罢工是在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领导下进行的，罢工的基本要求是缩短工作时间。这次罢工是彼得堡的无产阶级第一次结成广大阵线向剥削者进行的斗争，参加罢工的工人达三万人以上。彼得堡罢工促进了俄国全国罢工运动的发展，迫使沙皇政府加快了工厂法的修改并于1897年6月2日（公历14日）颁布了关于把各类工厂工作日缩短至十一个半小时的法律。

抗，那么有计划的罢工就已经是阶级斗争的萌芽，但也只能说是一种萌芽。所有这些罢工本身都是工联主义的斗争，还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这些罢工标志着工人同厂主的对抗已经激发起来，但是工人并没有意识到而且也不可能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同整个现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可调和的对立，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九十年代的罢工比起“骚乱”来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然是纯粹自发的运动。

我们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① 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的、历史的和经济的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俄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到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时期，即到九十年代中期，这个学说不仅已经成了“劳动解放社”的完全固定的纲领，而且已经把俄国大多数革命青年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了。

由此可见，当时既有工人群众的自发的觉醒，趋向自觉生活

① 工联主义决不像人们有时认为的那样排斥一切“政治”。工联一向都是进行一定的（但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鼓动和斗争的。关于工联主义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政治之间的区别，我们将在下一章里加以说明。

和自觉斗争的觉醒，又有一些用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武装起来而竭力去接近工人的革命青年。这里特别要指出那个常常被人忘记的（也是不大有人知道的）事实，就是这个时期的**第一批**社会民主党人，在**热心地从事经济鼓动**（而且在这方面他们充分注意到了当时还是抄本的小册子《论鼓动》①中那些真正有益的指示）的同时，不仅没有把经济鼓动当作自己唯一的任务，而且相反，**一开始**就提出了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最广泛的历史任务，特别是推翻专制制度的任务。例如，创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②的那些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党人，早在1895年底就编好了定名为《工人事业报》的创刊号。但是这个准备好要付印的创刊号，在1895年12月8日夜里突然被宪兵从一个会员阿·亚·瓦涅也夫③那里搜走了，于是第一次创办的《工人事业报》就没有能够问世。这张报纸的社论（也许过个三十年，会有一家像《俄国旧事》④那样的杂志把它从警察署档案中找出来）说明了俄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并且把争取政治自由作为首要任务。其次，有一篇《我们的大臣

---

① 《论鼓动》一书的作者是阿·克烈美尔，写于1894年。该书总结了社会民主党人在维尔诺的工作经验，号召放弃闭塞的小组宣传活动，而在工人中开展日常的群众性宣传工作。该书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有很大影响，但夸大纯经济斗争的意义和作用，包含了后来的"经济主义"的萌芽。

② 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是列宁在1895年秋天组成的。该协会统一了彼得堡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领导斗争协会的是以列宁为首的中心小组。……

③ 阿·亚·瓦涅也夫曾在拘留所被单独拘禁，因患肺病于1899年在西伯利亚东部去世。所以，我们认为可以把正文中所引证的情况公布出来，对于这些情况的确实性，我们可以担保，因为这些消息是从直接了解并最熟悉阿·亚·瓦涅也夫的情况的人们那里得来的。

④ 《俄国旧事》是一种历史杂志，主要刊载历史文献和回忆录等，1870年至1918年在彼得堡每月出版一次。

们在想些什么?》的文章①,是揭露警察摧残识字运动委员会的;此外，还有许多不仅从彼得堡，并且从俄国其他地方寄来的通讯(如记载雅罗斯拉夫里省工人流血事件的通讯)。可见，九十年代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所作的这个可以说是“初次的尝试”，并不是要办一个狭隘的地方性的报纸，更不是“经济主义”性质的报纸，而是要办一个想把罢工斗争同反专制制度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的，吸引当时一切受反动黑暗政治压迫的人来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凡是稍微知道一点运动实况的人都不会怀疑，这样的报纸一定能够既获得首都工人又获得革命知识分子的完全同情，并且会得到极广泛的传播。而这件事没有办成只是证明，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由于革命经验和实际修养不够而不能适应形势的迫切要求。《圣彼得堡工人小报》② 也是如此;《工人报》以及 1898 年春季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所发表的《宣言》③ 更是如此。当然，我们根本没有想到把这种缺乏修养归罪于当时的活动家。但是，为了利用运动的经验，并且从这个经验中吸取实际的教训，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各种缺点的原因和意义。因此极为重要的是要明确，一部分(也许甚至是大多数)在 1895—1898 年间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在那个时候，即“自发”运动一开始的时候，就可以提

① 见《列宁全集》第 2 卷第 65—68 页。

② 《圣彼得堡工人小报》是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秘密报纸。共出版过两号:第一号在 1897 年 2 月出版(报上印的日期是 1 月。这一号在俄国油印了三、四百份);第二号于 1897 年 9 月在日内瓦出版。

③ 指 1898 年 3 月在明斯克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公布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宣言》宣布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把争取政治自由和推翻专制制度的斗争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任务，并提出把政治斗争同工人运动的一般任务结合起来。

出极其广泛的纲领和战斗策略①，这是完全正确的。至于大多数革命家缺乏修养，则是很自然的现象，不应引起什么特别的忧虑。既然任务提得正确，有不屈不挠地试图实现这些任务的毅力，那么暂时的失利就不过是一种小小的不幸。革命经验和组织才能是可以学到的东西。只要有养成这些必要品质的愿望就行！只要能认识到缺点就行，因为在革命事业中，认识到缺点就等于改正了一大半！

可是，当这种认识开始模糊的时候（这种认识在上面提到的那些活动家中本来是很明确的），当有一部分人，甚至还有些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刊物，竟想把缺点推崇为美德，甚至想从**理论上**论证自己**对自发性的屈从和崇拜**时，这个小小的不幸可就成了真正的大不幸了。对于这个派别，用“经济主义”这一过于狭隘的概念来说明它的内容是很不确切的，现在该是做总结的时候了。（列宁：《怎么办?》。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245—250页）

自发“论”是机会主义的理论，是崇拜工人运动自发性的理论，是实际上否认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即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的理论。崇拜自发性的理论坚决反对工人运动的革命性质，反对

---

① “《火星报》对九十年代末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抱否定态度，而忽略了那个时候除了为细小的要求而斗争之外没有条件进行别的工作”——经济派在他们《给俄国各社会民主党人机关刊物的一封信》（《火星报》第12号）中这样说道。正文中所援引的事实证明，所谓“没有条件”的说法是**同真实情况绝对相反的**。不仅在九十年代末，即使在九十年代中期，除了为细小的要求而斗争之外，进行别的工作所需要的一切条件也是完全具备了的，当时只是领导者缺乏足够的修养。“经济派”不公开承认我们这些思想家、我们这些领导者缺乏修养的事实，却想把一切都归咎于“没有条件”，归咎于物质环境的影响，而物质环境决定着运动的道路，任何思想家都不能使运动脱离这条道路。试问，这不是屈从自发性是什么？这不是“思想家”酷爱自己的缺点是什么？

使工人运动循着反对资本主义基础的路线行进，而主张使工人运动仅仅循着资本主义“可以履行的”“可以接受的”要求的路线行进，完全主张采取“阻力最小的路线”。自发论是工联主义的思想体系。

崇拜自发性的理论坚决反对使自发运动带有自觉的和有计划的性质，反对党走在工人阶级的前面，反对党把群众提高到自觉的水平，反对党领导运动，而主张使运动中的自觉因素不致妨碍运动循着自己的道路行进，使党只依从自发运动，做运动的尾巴。自发论是降低自觉因素在运动中的作用的理论，是“尾巴主义”的思想体系，是一切机会主义的逻辑基础。

还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以前，这个理论就已经登台，而在实际上使它的那些信徒即所谓“经济派”否认俄国有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必要，反对工人阶级进行推翻沙皇制度的革命斗争，鼓吹运动中的工联主义政策，把工人运动完全交给自由资产阶级去领导。

旧《火星报》的斗争和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对“尾巴主义”理论的精彩批判不仅粉碎了所谓“经济主义”，而且还建立了俄国工人阶级真正革命运动的理论基础。

当时如果没有这个斗争，就休想在俄国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就休想使这个党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

可是，崇拜自发性的理论不仅是俄国的现象。它在第二国际所有的党内都是流行得最广泛的，虽然形式稍有不同。我指的是被第二国际的首领们庸俗化了的所谓“生产力”论，这个理论为一切事物辩护，使所有的人都调和起来，当某些事实已经被大家听厌以后，才指出这些事实并加以解释，而指出以后，就万事大吉。马克思说：唯物主义的理论不能只限于解释世界，它还应当

改变世界①。可是，考茨基及其同伙却不管这一点，他们宁愿停留在马克思的公式的前半段上。

请看应用这个“理论”的许多例子中的一个吧。有人说，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前，第二国际各党曾经发表恐吓言论，说如果帝国主义者发动战争，它们就宣布“以战争对付战争”。有人说，在战争就要爆发的时候，这些党却把“以战争对付战争”这个口号束之高阁，而实行了一个相反的口号——“为帝国主义祖国而战”。有人说，这样变更口号的结果，几百万工人牺牲了生命。可是，如果以为这里应该归咎于什么人，这里有什么人叛变了或出卖了工人阶级，那就错了。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情！所有这些已经发生的事情都是一定要这样发生的。第一，因为国际是“和平的工具”，而不是战争的工具。第二，因为在当时的那种“生产力水平”下，再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应该归咎于”“生产力”。考茨基先生的“生产力论”正是这样向“我们”解释的。而谁要是不相信这个“理论”，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党的作用呢？党在运动中的意义呢？可是，党对于像“生产力水平”这样的决定因素又有什么办法呢？……

这种假冒马克思主义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大堆来。

几乎用不着证明，这个以掩盖机会主义的真面目为使命的冒牌“马克思主义”，不过是还在俄国第一次革命前就受到列宁攻击的那个“尾巴主义”理论在欧洲的翻版罢了。

几乎用不着证明，打破这种理论上的假冒，是在西方建立真正的革命政党的先决条件。（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见《斯大林选

①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19页）。

集》上卷第 201—203 页）

现在来谈政治经济学中的第二种偏见，即第二种资产阶级类型的理论。我指的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自流”论，这种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但是，我们右倾营垒中的同志们竭力鼓吹这种理论。

这种理论的编造者的论断大致如下：我们这里有过资本主义，当时工业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的，而农村是自发地、自流地跟着资本主义城市走，按照资本主义城市的形象进行改造的。既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这样，为什么在苏维埃经济制度下不能也是这样呢？为什么农村，小农经济不能自流地跟着社会主义城市走，自发地按照社会主义城市的形象进行改造呢？这种理论的编造者根据这一点就断言农村能自流地跟着社会主义城市走。由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既然农村本来就能跟着社会主义城市走，我们何必为建立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操心，我们何必争吵呢？

你们看，这又是一种从客观上说来目的在于给农村资本主义分子一种新武器来反对集体农庄的理论。

这种理论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丝毫用不着怀疑的。

而我们的理论家直到现在还没有抽出时间去痛斥这种引起我们集体农庄实际工作者思想混乱的奇怪理论，这不是很奇怪吗？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城市对个体小农农村的领导作用是巨大而不可估量的。正因为如此，工业对农业有改造的作用。但是，单靠这个因素是否就能使小农的农村自己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自流地跟着城市走呢？不，不能。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村自发地跟着城市走，因为城市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农民的小商品个体经济就其基础来说是**同一类型的**经济。当然，小农商品经济还不是资本主义经济。但是就其基础

来说它和资本主义经济是同一类型的，因为它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列宁在评论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时说得万分正确，他说："农民的商品**资本主义**趋势"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趋势"①是完全相反的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③（列宁）。

能不能说农民的小商品经济就其基础来说和城市中的社会主义生产也是同一类型的呢？很明显，如果不离开马克思主义，是不能这样说的。否则列宁就不会说："只要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资本主义在俄国就有比共产主义更牢固的经济基础。"④

因此，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自流"论是一种腐朽的反列宁主义的理论。

因此，要使小农的农村跟着社会主义城市走，除了其他一切办法以外，还必须在农村中**培植**社会主义大经济，即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作为能**带领**基本农民群众跟着社会主义城市走的社会主义基地。

因此，社会主义建设"自流"论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城市只有在农村中**培植**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按照新的，即社会主义的方式来改造农村，才能**带领**小农的农村前进。

奇怪的是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自流"论直到现在还没有受到我们的土地问题理论家应有的反击。（斯大林：《论

① 黑体是列宁用的。——约·斯大林注

② 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197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4页。

③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81页。

④ 同上书，第399页。

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214—216页)

八、列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论两条战线的斗争

欧美现代工人运动中的基本的策略分歧，归结起来就是同离开实际上已经成为这个运动中的统治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两大流派作斗争。这两个流派就是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无政府社会主义）。在大规模工人运动的五十多年来的历史上可以看到，这两种离开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策略的倾向，是常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表现出来的，不过带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和各种不同的色彩罢了。

单从这个事实来看，就可以明白，这两种倾向不是偶然出现的，也不是由某些个人或集团的错误造成的，甚至也不是由民族特点或民族传统等影响造成的。经常引起这两种倾向的根本原因，显然就在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和发展性质。去年出版的荷兰马克思主义者安东·潘涅库克所著《工人运动中的策略分歧》(Anton Pannekoek.《Die taktischen Differenzen inder Arbeiterbewegung》. Hamburg, Erdmann Dubber, 1909）这本小册子，是用科学态度研究这些原因的一次值得注意的尝试。下面我们就要向读者介绍潘涅库克所作出的那些不能不认为是完全正确的结论。

工人运动的增长这个事实本身，是经常引起策略分歧的最深刻的原因之一。如果不是根据某种虚幻的理想的标准来衡量这个运动，而是把运动看成是一些普通人的实际运动，那就会很清楚，在一批一批“新兵”被吸收进来，一群一群新的劳动群众被卷入

运动的同时，也必然会发生理论和策略方面的动摇，重复旧错误，暂时回复到陈旧观念和陈旧方法上去等等。为了“训练”新兵，每个国家中的工人运动，都要经常耗费或多或少的精力、注意力和时间。

其次，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在各个国家和各个国民经济部门中间是不一样的。在大工业发展程度最高的条件下，工人阶级和它的思想家领会马克思主义最容易，最迅速，最完整，最扎实。落后的或发展速度落后的经济关系，往往使一些拥护工人运动的人只能领会马克思主义的某几方面，只能领会新世界观的个别部分或个别口号和要求，而不能坚决抛弃一般资产阶级世界观，特别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世界观的一切传统思想。

再其次，在矛盾中实现和通过矛盾而实现的社会发展的辩证性质，也是经常引起分歧的一种根源。资本主义是进步的，因为它消灭了旧的生产方式，发展了生产力，但它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又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资本主义一方面启发着工人，把他们组织起来，培养他们的纪律性，另一方面又压制和压迫工人，使他们退化堕落，受穷受苦等等。资本主义自己替自己造成了掘墓人，自己造成了新制度的因素，但是，如果没有“飞跃”，这些单个的因素便丝毫不能改变事物的总的状况，不能触动资本的统治。马克思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理论，能够把握住实际生活中的这种矛盾，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实际历史中的这种矛盾。但群众当然是从生活中学习而不是从书本上学习的，因此某些个人或集团常常把资本主义发展的某种特点或某一“教训”加以夸大，发展成片面的理论和片面的策略体系。

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自由派和民主派——都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不懂得现代工人运动，所以他们经常从一种没有办法的极

端跳到另一种没有办法的极端。他们一会儿说一切都是由于心怀恶意的人“唆使”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结果，一会儿又以工人政党是“和平改良的政党”来聊以自慰。应当看到无政府工团主义和改良主义都是这种资产阶级世界观及其影响的直接产物，因为它们只抓住工人运动中的**某一**方面，把片面观点发展为理论，把工人运动中形成工人阶级在某一时期或某种情况下活动的特点的那些趋向或特征说成是相互排斥的东西。而实际生活和实际历史本身却**包含有**这些各不相同的趋向，正好像自然界的生命和发展过程既包含有缓慢的进化，也包含有迅速的飞跃，即渐进过程的中断一样。

修正主义者认为，所有一切说明“飞跃”、说明工人运动与整个旧社会根本对立的议论，都是空话。他们认为改良就是局部实现社会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拒绝“细小的工作”，特别是反对利用议会讲坛。其实，这种策略就是等候“伟大日子”的到来，而不善于聚集力量，来创造伟大的事变。无论前者或后者都阻碍了最重要最迫切的事情：把工人团结成为规模巨大、力量坚强、动作敏捷、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很好地行动的组织，团结成为充满阶级斗争精神、明确认识自己的目标、受着真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教育的组织。

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误会，我们要稍微离开本题而附带声明一下，潘涅库克分析问题时**仅仅**引用了西欧各国特别是德法两国历史中的例子，而**完全没有**提到俄国的情形。即使有时也使人觉得他在暗示俄国，那只是因为在我们这里也表现出那些引起离开马克思主义策略的倾向的基本趋向，虽然俄国在文化、生活方式和历史经济方面，都是与西欧大不相同的。

最后，引起工人运动参加者彼此分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一般统治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的策略的改变。如果资产阶级的策略始终是一个样子，或至少是一个类型，那工人阶级就能很快学会同样地用一个样子和一个类型的策略去对付它了。其实，世界各国资产阶级都不免要规定出两种管理方式，两种保护自己的利益和捍卫自己的统治的斗争方法，并且这两种方法时而相互交替，时而错综复杂地结合起来。第一种方法就是暴力的方法，拒绝对工人运动作任何让步的方法，维护一切陈旧腐败制度的方法，根本反对改良的方法。保守主义政策的实质就是这样，这种政策在西欧各国日益成为不再是地主阶级的政策，而是一般资产阶级的一种政策。第二种方法就是“自由主义的”方法，就是趋向于扩大政治权利，实行改良、让步等等的方法。

资产阶级从一种方法转而采用另一种方法，并不是由于个别人的恶意，也不是由于什么偶然的原因，而是由于它本身地位的根本矛盾性。正常的资本主义社会要顺利发展下去，就不能没有稳固的代议制度，就不能不使人民有相当的政治权利，人民在“文化”方面也不能不具有较高的要求。这种一定程度的文化要求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连同它的高度技术、复杂性、灵活性、能动性以及全世界竞争发展的迅速性等等条件所造成的。因此，资产阶级在策略方面的动摇，从暴力方式转到仿佛是让步的方式，乃是一切欧洲国家最近五十年来历史的特点，而各个不同的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又总是主要采用某一种方法。例如英国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是采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策的典型国家，而德国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则始终采取暴力方法等等。

当这种方法盛行于德国的时候，对这种资产阶级管理方式的片面反应便是无政府工团主义或如当时所称的无政府主义在工人

运动中增长起来（九十年代初的“青年派”①，八十年代初的约翰·莫斯特②）。在1890年转而采取了“让步”，这种转变照例是对工人运动更加有害的，因为它引起了一种同样片面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反应，即引起了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潘涅库克说:“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策的积极的实际的目标就是诱惑工人，在工人中间制造分裂，把工人的政策变成软弱的，始终软弱不堪的和朝生暮死的所谓改良运动的一种软弱的附属品。”

资产阶级利用“自由主义”政策，往往能在一定时期达到自己的目的，潘涅库克正确地指出，这种政策是一种“更加狡猾的”政策。一部分工人，一部分工人代表，有时被表面上的让步所欺骗。于是修正主义者就宣布阶级斗争学说已经“过时”，或者开始实行事实上已抛弃阶级斗争的政策。资产阶级策略上的曲折变化，使修正主义在工人运动中间加强起来，往往把工人运动内部的分歧弄成公开的分裂。

所有上述一类原因，都在工人运动内部，在无产阶级中间，引起策略上的分歧。况且，在无产阶级与那些同它接近的小资产者阶层（包括农民在内）之间，并没有隔着而且也不可能隔着一道万里长城。个别人、个别集团和阶层从小资产阶级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自然也不能不引起无产阶级的策略方面的动摇。

---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青年派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集团，1890年成立。集团的基本核心是“未毕业的大学生”和青年文学家（集团由此而得名）。集团提出的纲领，反对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任何议会活动。恩格斯把“青年派”称为玩弄“革命空谈”的英雄，说这些人是企图“通过内讧和阴谋来瓦解党”。1891年10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青年派被开除出党。

② 约翰·莫斯特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后来成为无政府主义者。

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帮助我们根据具体实践问题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策略的实质，帮助比较年轻的国家更加清楚地认识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倾向的真实阶级意义，并更顺利地去同这些倾向作斗争。（列宁：《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见《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392—397 页）

约诺夫责备“旧派别的领导者”，说他们极力阻碍统一的实现，说他们在全会上的表现也是这样，说“每使他们前进一步都得经过斗争”，他写道：

“列宁同志不愿意用‘扩大和加深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办法去‘克服各种危险的倾向’。他过分热中于把‘两条战线的斗争’的理论当作党的一切事业的中心。他甚至根本没有想到要在党内取消‘戒严状态’。”（第 22 页第 1 条）

这是指关于党内状况的决议的第四节第 2 条。这个决议的草案是由我提交中央委员会的，而决议中的这一条在经过草案委员会研究以后已经由全会自己加以改动，这种改动是根据托洛茨基的提议，而我是反对这个提议的；但是，我的反对没有见效。在我提出的草案的这一条里，尽管没有写上“两条战线的斗争”这些字样，但至少里面是表示了这样的意思的。“用扩大和加深的办法去克服”这些字是根据托洛茨基的提议加进去的。约诺夫同志提起我反对这个提议的事，给了我一个适当的机会来说明这些“修正”的意义，这使我很高兴。

在全会上再没有别的东西能像“两条战线的斗争”这种思想引起人们无比的（往往是可笑的）愤怒了。一提起这一点，前进派和孟什维克就暴跳如雷。这种愤怒在历史上是完全可以得到解释的，因为布尔什维克**实际上**从 1908 年 8 月—1910 年 1 月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即同取消派和召回派进行了斗争。这种愤怒

所以可笑，是因为这样一来只是证明了对布尔什维克发脾气的人自己有过错，只是证明了对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的一切指责仍然刺痛着他们。真是做贼心虚！

托洛茨基提议以“用扩大和加深的办法去克服”来代替“两条战线的斗争”，这个提议得到了孟什维克和前进派的热烈支持。

现在无论是约诺夫或《真理报》，无论是维也纳的决议或《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都因为这个“胜利”而兴高采烈。但是试问，从这一条里删去了关于两条战线的斗争的词句，是不是也就从这个决议中删去了对这个斗争的必要性的确认呢？**绝对不是**，因为既然确认有“倾向”存在，确认它们的“危险性”，确认有“解释”这种危险性的必要，确认这些倾向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表现”，那**实际上**也就是确认两条战线的斗争！为了照顾私人情面，可以在某个地方改掉一个“不愉快的”字眼，但基本的意思并没有改变！结果只是用一句空话把这一条的一部分加以冲淡，把它改得含糊不清，把它改坏罢了。

事实上，在这一段里谈什么用扩大和加深工作的办法去克服……等等，这只是空话和无力的遁词。这里没有任何明确的内容。扩大和加深工作，在任何时候都是绝对必要的；这一点在决议的整个**第三**节里，即在没有提到特殊的（不是任何时候都绝对必需的，而是由特别时期的条件产生的）“思想政治任务”以前已经详细地谈到了。第四节所说明的只是这种特殊的任务，在这一节里，在所包括的三条的前面直接指出，这些思想政治任务“已经**被提到日程上来**”。

结果怎样呢？结果得出了一个十分荒谬的结论，似乎扩大和加深工作的任务**也**被提到日程上来了！好像**可以**有这样的历史“日程”，即可以有不存在**这个**任务的时候，好象它并不是永远都

存在的！

试问，要怎样才能用扩大和加深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办法去克服各种倾向呢？在进行任何扩大和任何加深的时候，必然会产生怎样扩大和怎样加深的问题；既然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由社会条件产生出来的思潮，那它们就可能渗透到工作的任何扩大和任何加深中去，可以按照取消主义的精神去扩大和加深工作，像《我们的曙光》杂志和《复兴》杂志所做的那样；也可以按照召回主义的精神去做。另一方面，要克服各种倾向（真正地“克服”），就必然要分散本来用于直接扩大和加深正确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一定的力量、时间和精力。例如，同一位约诺夫在他论文的同一页上写道：

“全会结束了。参加会议的人走散了。现在中央委员会在整顿工作的时候不得不去克服难以置信的困难，在这些困难中，所谓的”（约诺夫同志！只是所谓的，而不是真正的，不是实在的吗？）“取消派的行为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而取消派的存在却是马尔托夫同志所坚决否认的。”

这个材料虽然字数不多，但是相当典型，它说明托洛茨基和约诺夫的言论是多么空洞。为了克服米哈伊尔、尤里之流的取消主义行动，曾经消耗了中央委员会用于直接扩大和加深真正社会民主党工作的力量和时间。如果没有米哈伊尔、尤里之流的行为，如果不是在我们继续错当作是自己同志的那些人中间存在着取消主义，那末扩大和加深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也就会进行得更加顺利，因为那样党的力量就不至于为内部斗争所分散。这就是说，如果把扩大和加深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理解为按照真正社会民主党的精神去直接加强宣传鼓动工作和经济斗争等等，那末，克服社会民主党人的各种离开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对于这一工作就是一个

消极因素，可以说是“积极活动”中的一个折扣，因此，所谓用扩大什么什么的办法去克服各种倾向的这种话，是没有意义的。

实际上这句话是表示了一种模糊的愿望，一种善良的、天真的愿望，即希望社会民主党人减少一些内部的斗争。这句话仅仅是反映了这种天真的愿望；这可以说是所谓的调和派的一种叹息，他们说：唉，如果能少同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作些斗争，那该多好啊！

这种“叹息”的政治意义等于零，甚至小于零。如果党内有人觉得“坚决否认”取消派（和召回派）的存在对自己有利，那末这些人就会利用“调和派”的“叹息”来掩饰祸患。“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就是这样做的。因此拥护决议中的那些善意的空话的，只有那些所谓的“调和派”。实际上他们是帮助取消派和召回派的，实际上他们不是加深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而是加强离开社会民主党工作的倾向，加深祸患，因为他们把祸患暂时隐瞒起来，这样就使它更难消除。（列宁：《政论家的短评》。见《列宁全集》第16卷第211—214页）

我们说：哪里有右倾，那里就必定有“左”倾。“左”倾是右倾的影子。列宁谈到召回派① 时说过，“左派”也就是孟什维克，只不过是改头换面的孟什维克。这是完全正确的。关于现在的

① 召回派是俄国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在布尔什维克队伍中产生的“左”倾机会主义派别，代表人物是亚·亚·波格丹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格·阿·阿列克辛斯基、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等。召回派要求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召回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拒绝参加工会、合作社以及其他合法和半合法的组织，放弃一切合法斗争。召回派以“革命”词句作幌子，执行了取消派的路线。列宁把召回派叫作“改头换面的孟什维克”。1909年6月，布尔什维克机关报《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中央全体会议）斥责了召回派，把波格丹诺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组织。

“左派”也应该这样说。倾向于托洛茨基主义的人实质上也就是右派，只不过是改头换面的右派，是用“左的”词句掩饰起来的右派。

因此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右倾，又反对“左”倾。

有人会说：既然“左”倾实质上也就是右的机会主义倾向，那么它们之间的差别何在？两条战线究竟何在？的确，既然右派获得胜利意味着资本主义复辟的机会增多，而“左派”获得胜利也会引起同样的后果，那么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别？为什么把一些人叫作右派，把另一些人叫作“左派”？如果它们之间有差别，那么差别何在？两种倾向的社会根源是一个，两者都是小资产阶级倾向，这难道不对吗？如果这两种倾向获得胜利，它们所引起的后果是完全相同的，这难道不对吗？那么，它们之间的差别究竟何在？

差别就在于它们的政纲不同，要求不同，办法和手段不同。

例如右派说，**“不应当建设第聂伯河建筑工程”**，相反地，“左派”反对说，**“一个第聂伯河建筑工程对我们来说算什么，我们要每年建设一个第聂伯河建筑工程”**，（笑声）——应当承认，这里显然是有差别的。

右派说，**“不要碰富农，让他们自由发展吧”**，相反地，“左派”反对说，**“不仅要打击富农，而且还要打击中农，因为中农也和富农一样是私有者”**，——应当承认，这里显然是有差别的。

右派说，**“困难来了，还不是屈服的时候吗”**，相反地，“左派”反对说，**“困难对我们来说算什么，你们所说的困难我们根本不放在眼里，——我们要开足马力向前飞奔”**，（笑声）——应当承认，这里显然是有差别的。

这就是“左派”的独特政纲和独特手段的一幅图画。这也就

说明为什么“左派”有时能够用“左的”耸人听闻的词句诱惑一部分工人，并且能够把自己装扮成右派的最坚决的反对者，虽然全世界都知道，他们“左派”的社会根源和右派是一样的，他们常常和右派达成协议，结成联盟来反对列宁的路线。

正因为如此，我们列宁主义者必须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右倾，又反对“左”倾。

但是，既然托洛茨基主义倾向是“左”倾，这是不是说“左派”比列宁主义还左呢？不，不是这个意思。列宁主义是世界工人运动中**最左的**（不带引号的）一派。在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以前的时期，我们列宁主义者是作为社会民主党人中的极左派加入第二国际的。我们没有留在第二国际，我们在第二国际中宣传分裂，是因为我们正是作为极左派不愿意和小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叛徒，和社会和平主义者以及社会沙文主义者处在一个党内。

这个策略和这种思想后来就成了世界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基础。我们列宁主义者在自己的党内是**唯一**不带引号的左派。因此，我们列宁主义者在自己的党内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政党。我们在自己的党内不仅同那些被我们叫作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分子的人作斗争，而且同那些想比马克思主义“更左”，比列宁主义“更左”，以“左的”耸人听闻的词句来掩饰自己右的机会主义本质的人作斗争。

谁都会明白，把那些还没有摆脱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人叫作“左派”，这应当了解为讽刺。列宁把“左派共产主义者”叫作左派，有时候加引号，有时候不加引号。但是谁都会明白，列宁把他们叫作左派，是讽刺他们，是以此着重指出他们仅仅在口头上，在表面上是左派，而在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的倾向。

既然托洛茨基分子昨天还和公开的机会主义分子结成统一的

反列宁主义的联盟，真正直接地和国内反苏维埃的阶层勾结起来，那他们怎么能谈得上是左派（不带引号的）呢？“左派”和右派昨天还公开地结成联盟来反对列宁的党，这个联盟显然得到了资产阶级分子的支持，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而这难道不是说明了，如果“左派”和右派没有共同的社会根源，如果他们没有共同的机会主义本质，他们就不会结成统一的联盟吗？托洛茨基分子的联盟在一年前瓦解了。一部分类似沙屠诺夫斯基的右派分子退出了这个联盟。因此，联盟的右派今后将正是以右派的面目出现，而“左派”将以“左的”词句来掩饰自己的右的实质。但是，有什么保证能说“左派”和右派不会再搅在一起呢？（笑声）很明显，这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任何保证的。

既然我们坚持两条战线斗争的口号，这是不是说我们这样就是宣布我们党内必须有**中派主义**呢？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不是中派主义呢？你们知道，托洛茨基分子正是把事情说成这样的：有“左派”，这就是“我们”托洛茨基分子，“真正的列宁主义者”；有“右派”，这就是其余一切人；还有“中派”，他们摇摆在“左派”和右派之间。能不能认为对我们党的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呢？显然不能。只有那些把一切概念都混淆起来的、早已离开马克思主义的人才会这样说。只有那些看不见和不了解战前时期的社会民主党（无产阶级利益和小资产阶级利益**联盟**的党）和共产党（革命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党**）之间的**原则差别**的人才会这样说。

不能把中派主义看作一个空间的概念：比如说，一个地方坐的是右派，另一个地方坐的是“左派”，而中间坐的是中派。中派主义是一个政治概念。它的思想体系是迁就的思想体系，是**在一个共同的党内**使无产阶级利益服从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体系。

这种思想体系是和列宁主义相违背、相对立的。

中派主义对于战前时期的第二国际来说是自然的现象。第二国际中有右派（占多数），有左派（不带引号的），也有中派，中派的全部政策就是以左的词句来粉饰右派的机会主义，并使左派服从右派。

那时以布尔什维克为核心的左派的政策是什么呢？是同中派作坚决的斗争，争取同右派分裂（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以后），建立由真正的左派，由真正的无产阶级分子组成的革命的新国际。

为什么那时会产生第二国际内部的这种力量配置和布尔什维克在第二国际中的这种政策呢？因为那时第二国际是迎合小资产阶级社会和平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一个无产阶级利益和小资产阶级利益**联盟**的党。因为那时布尔什维克不能不集中火力反对企图使无产阶级成分服从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中派。因为那时布尔什维克必须宣传分裂思想，不这样无产者就不能建立自己的一个阶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

能不能断定说，在我们共产党内也有同样的力量配置，在我们党内也应当实行布尔什维克在战前时期第二国际各党内实行过的那个政策呢？显然不能。所以不能，是因为这就是不了解社会民主党这个无产阶级成分和小资产阶级成分**联盟**的党和革命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共产党之间的**原则差别**。在社会民主党人那里党的阶级基础是一种，在共产党人这里党的阶级基础完全是另外一种。在社会民主党人那里，中派主义是自然的现象，因为不同利益联盟的党不会没有中派，而布尔什维克也必须采取分裂路线。在共产党人这里，中派主义的存在是没有根据的，是和列宁的党性不相容的，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党，而不是不同阶

级成分联盟的党。

正因为我们党的统治力量是世界工人运动中的最左派（列宁主义者），所以从列宁主义的观点看来，在我们党内实行分裂政策是没有而且不能有任何理由的。（有人喊道：“在我们党内有没有分裂的可能？”）这里谈的不是分裂的可能性，而是在我们这个一个阶级的列宁的党内实行分裂政策，从列宁主义的观点看来是不能认为有理由的。

谁不懂得这个原则差别，谁就是和列宁主义背道而驰，谁就是和列宁主义决裂。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只有发了疯的和失去了最后一点点马克思主义的人才能当真断定说，我们党的政策，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政策是中派主义的政策。

列宁在我们党内向来都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派”，又反对明显的孟什维主义倾向。看一看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看一看我们党的历史，你们就会知道，我们党是在反对两种倾向，即既反对右倾又反对“左”倾的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一方面同召回派和“左派”共产主义者作斗争，另一方面，在十月革命以前，在十月革命期间以及在十月革命以后，同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这就是我们党在自己的发展中所经过的阶段。大家都知道列宁的一句话：我们必须进行既反对公开的机会主义又反对“左”倾学理主义者的斗争。

这是不是说列宁就是中派主义者，他实行了中派主义的政策呢？显然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的右倾分子和“左”倾分子究竟是些什么人呢？

说到右倾，它当然不是战前时期社会民主党人的机会主义。机会主义倾向还不等于是机会主义。我们知道列宁当时是怎样解释

倾向这个概念的。右的倾向，这是一种还没有形成机会主义的而且是可以纠正的倾向。因此，不能把右的倾向和已经形成的机会主义看成一个东西。

说到“左”倾，它是一种和战前时期第二国际中的极左派即布尔什维克绝对相反的东西。“左”倾分子不仅不是不带引号的左派，而且他们实质上也就是右倾分子，不过和右倾分子有差别，就是他们不自觉地以“左的”词句来掩盖自己的真正本质。看不到“左”倾分子和真正的列宁主义者这个我们党内的**唯一的**左派（不带引号的）之间的全部深刻差别，就是对党的犯罪行为。(有人喊道:“而使各种倾向合法化呢?”)如果同各种倾向进行公开斗争就是使它们合法化，那就应当承认，列宁早已使它们“合法化了”。

他们这些倾向分子，无论右派或“左派”，都是从非无产者阶层的各色各样分子中招募来的，这些分子反映着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对党的侵袭和党的个别环节的腐化。一部分来自其他政党的人，党内具有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人，从前党内各种派别的残余，国家机关、经济机关、合作社机关和工会机关中正在官僚主义化的（和已经官僚主义化的）并且和这些机关中明显的资产阶级分子勾结在一起的党员，我们农村组织中和富农结合起来的富裕党员，以及其他等等，——这就是离开列宁路线的各种倾向的培养基。很明显，这些分子不能接受任何真正左派的和列宁主义的东西。他们只能培养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或者培养以左的词句掩饰自己的机会主义的所谓“左”倾。

正因为如此，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是党的唯一正确的政策。

（斯大林:《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99—105页）

……我们不能不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只有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同我们建设工作中的主要危险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同地方沙文主义作斗争——我们才能取得胜利，不进行这两方面的斗争，俄罗斯的工农和其他民族的工农之间就不会有任何团结。不这样，就会助长地方沙文主义的气焰，造成奖励地方沙文主义的政策，这是我们不能容许的。

让我在这里引证一下列宁同志的话。我本来不想这样做，但是因为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上有许多同志随便引证列宁同志的话，歪曲了他的话，那就让我来读一下列宁同志的一篇人所共知的论文中的几句话：

> “无产阶级应当要求被‘它的’民族所压迫的殖民地和民族有政治分离的自由。不这样，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就仍然是一句空话，被压迫民族的工人和压迫民族的工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和阶级团结就不可能实现。”①

这可以说是统治民族或过去统治民族的无产者的义务。其次，列宁谈到过去被压迫民族的无产者或共产党员的义务时说：

> “另一方面，被压迫民族的社会主义者必须特别坚持和实现被压迫民族的工人和压迫民族的工人之间的无条件的（包括组织上的）大团结。否则在资产阶级的各式各样的诡计、叛变和欺骗下就不可能捍卫住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和它同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因为各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经常把民族解放的口号变成欺骗工人的手段。”

可见，如果要追随列宁同志前进（在座的有些同志是向他宣

---

① 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见《列宁全集》第22卷第141—142页。

过暂的)，那就必须把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作斗争和同地方沙文主义作斗争这两个提纲保留在决议案中，并把它们看做一种现象的两个方面，看做同沙文主义作斗争的提纲。(斯大林：《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的报告的结论》。见《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217—218页)

必须鞭策右派，迫使和教会他们去同民族主义作斗争，以便从本地人中间培养出真正的共产党干部。但是也必须鞭策“左派”，教会他们机动灵活，善于随机应变，以便掌握广大的居民群众。这一切都必须做到，因为正如霍札诺夫所正确指出的，真理在“中间”，在右派和“左派”之间。(斯大林：《有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地区负责工作人员参加的俄共（布）中央第四次会议，关于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地区内的右派和“左派”》。见《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255页)

大会为实现这一策略路线的决心所鼓励，也为这一道路将引导我们的党达到巨大成功的信心所鼓励，但同时也估计到，在执行这一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时，可能不常是一帆风顺，可能在前进的路上不是不常犯错误，可能不是没有忽而右倾、忽而“左”倾的偏向，或者偏向到迁就落后，或者偏向到关门主义的自陷孤立。“笼统地说来”，究竟哪个偏向是主要的危险，只有烦琐哲学家才去辩论这个问题。凡是在一定时间内，在一定国家中，对于执行我们大会的这一路线，对于开展共产党的正确群众政策，给予较大的障碍的，就是较大和较严重的危险。

共产主义事业要求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反偏向的斗争；对于一切有害倾向，必须在其发生时就迅速地坚决地予以排斥，对于一切错误，必须及时地予以纠正。以一种特别的打猎方式，搜寻想像中的偏向和偏向分子，来代替反偏向的必要的具体斗争，那是一种非常有害的歪曲。在我们党的实践中，必须以一切的鼓励，

来启发提出新问题的主动性。我们必须赞助从各个角度来讨论党的活动问题，如果党员在运动的实际问题上提出任何怀疑和批评的意见，不要马上就认为是偏向。必须让犯错误的同志在实践中有改正的机会，应该只对顽强地坚持错误的那些人，只对破坏党组织的那些人，才予以无情的打击。（季米特洛夫：《代表大会的收获》。见《季米特洛夫选集》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174—175 页）

九、列宁、斯大林论政治的明确性和肯定性，反对调和派

托洛茨基在他的决议的一开头就充分地表现了最恶劣的调和主义精神；这种“调和主义”是带引号的，是小组式的庸俗的调和主义，它看到的只是“现有的个人”，而不是现有的路线，不是现有的精神，不是党的活动中的现有的思想政治内容。

要知道，这就是托洛茨基之流的“调和主义”同主张清除党内的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的真正党性截然不同的地方；而托洛茨基之流的“调和主义”实际上是忠心耿耿地替取消派和召回派效劳，因此它愈是狡猾、愈是精巧、愈是动听地用所谓党的和所谓反派别主义的辞藻作掩护，它对党的危害也就愈大。

实际上在我们面前提出的党的任务是什么呢？

是“提出了”要把“现有的个人、团体和机关”“调和起来”而不问他们的路线如何，不问他们的活动内容如何，不问他们对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的态度如何呢？

还是提出了党的路线，提出了我们整个活动的思想政治方向和内容，提出了清除我们的活动中的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的任务，并且要不管那些“个人、团体和机关”是否同意，不顾那些不同意这条路线或不执行这条路线的人的反对而一定把这个任务付诸

实现呢？

对于实现任何一种党的统一的意义和条件，可以有两种见解。了解这两种见解的区别极为重要，因为在我们的“统一的危机”的发展过程中，这两种见解是互相错综地混合在一起的，如果不把一种见解同另一种见解区别开来，那就不能了解这个危机。

一种对统一的见解可能是把“现有的个人、团体和机关”的“调和”放在首要地位。至于他们对党的工作、对这个工作的路线的意见的一致，则是次要的事情。意见分歧应当竭力隐瞒起来，而不应当弄清它们的根源、它们的意义和它们的客观条件。把这些个人和团体“调和起来”，这是主要的事情。如果他们对实行共同的路线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那就应当把这条共同的路线解释得使它能为大家所接受。应当让大家都过得去。这就是庸俗的“调和主义”，它必然会产生小组式的外交手腕。这种“调和主义”的注意力主要地集中于“堵住”意见分歧的来源，把它们隐瞒起来，竭力把“冲突”“调解开来”，使敌对的方面互相中和。很明显，在秘密党需要国外的活动基地的情况下，这种小组式的外交手腕就是向那些为各种各样的“调和”和“中和”的企图充当“公平的经纪人”的“个人、团体和机关”大开方便之门。

请看马尔托夫在《呼声报》第19—20号是怎样叙述全会上的这样一种企图的吧：

“孟什维克、‘真理派’①和崩得分子曾建议由这样一些人来担任中央机关报的工作，即要能够保证党内两个互相对立的思潮得到‘**中和**’，不让这两个思潮中任何一方占有稳定的多数，从而迫

① 所谓真理派就是集合在托洛茨基于维也纳出版的《真理》报周围的那伙人。至于布尔什维克的《真理报》，在那时还没有出版。

使党的机关报在每个重要问题上都采取能够把大多数党的工作人员团结起来的**中间路线**”。

大家知道，孟什维克的建议没有被通过。托洛茨基想让自己选入中央机关报去充当**中和**剂的企图也失败了。被提出担任这个职务的一个崩得分子候选人（这位候选人是孟什维克在自己的发言中提出来的），甚至没有付表决。

这就是写出维也纳决议的“调和派”（坏的意义上的调和派）的**实际**作用，他们的见解表现在我刚才收到的《崩得评论》第4期上约诺夫的论文中。孟什维克**不敢**提出以**他们的**派别占多数的中央机关报名单来，——虽然他们承认（从我上面所引的马尔托夫的议论中可以看出）党内有**两个互相对立的思潮**。孟什维克根本没有想到要提出以**他们**的派别占多数的中央机关报名单来。他们甚至没有打算要使中央机关报有一定的方针（很明显，孟什维克在全会上并没有提出方针，因此当时人们还要求他们，还希望他们能够诚恳地和彻底地放弃取消主义）。孟什维克曾经企图使中央机关报中发生“中和”，并且提出过让崩得分子或托洛茨基作为**中和**剂。当时是要崩得分子和托洛茨基起媒婆的作用，使“现有的个人、团体和机关”（不管其中的一方是否已经放弃取消主义）“结成配偶”。

这种媒婆观点就是托洛茨基和约诺夫的调和主义的全部“思想基础”。如果现在他们怨天尤人，痛哭流涕地说统一没有成功，那末在了解他们的这种话时应当cum grano salis。① 他们的这种话应当了解为作媒没有成功。托洛茨基和约诺夫对统一所抱的希望，对同“**现有的个人、团体和机关**”（不管他们对取消主义的态度如

① 这是拉丁话，本义是用盐屑，借喻为打很大的折扣。

何)统一的希望的“落空”,只是意味着媒婆的落空,只是意味着媒婆的观点不正确,不现实,不值钱,而完全不意味着党的统一的落空。

对于这种统一还有另一种见解。这种见解认为，许多不以“现有的（应当出席全会的和实际出席全会的）个人、团体和机关”的某种成分为转移的深刻的客观原因，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两个旧有的主要派别中早已开始引起而且还在继续不断地引起这样一些变化，这些变化有时会违反“现有的个人、团体和机关”中一些人的意志甚至意识而替统一建立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这些客观条件根源于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俄国资产阶级发展的时代、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时代、专制制度企图以资产阶级君主制的形式来改造自己的时代——的特点。这些客观条件在同一时期内在工人运动的性质方面，在工人先锋队社会民主党的成分、形式和面貌方面，在社会民主运动的思想政治任务方面引起各种彼此密切联系的变化。因此，产生取消主义（＝希望把自己算作社会民主党的一部分的半自由主义）和召回主义（＝希望把自己算作社会民主党的一部分的半无政府主义）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也不是某种个人的恶意、愚蠢或错误，而是这些客观原因——和建筑在整个现代俄国工人运动之上、同“基础”不可分的上层建筑——发生作用的必然结果。认识这两种倾向的危险性、非社会民主主义性和对工人运动的害处，会使各种不同派别的分子接近起来，会“扫除一切障碍”为党的统一开辟道路。

这种见解认为,统一可能进展得很慢,很困难,可能动摇不定和不断发生波折,但它一定能够获得进展。这种见解认为,统一并不一定要在“现有的个人、团体和机关”之间进行,而是不以现有的

个人为转移，使现有的个人服从于统一，从“现有的”人中抛开那些不认识和不想认识客观发展要求的人，而提拔和吸收新的、不属于“现有的”人的那些人，使一切旧的派别、思潮、集团的内部发生变化，实行重新搀和和重新组合。这种见解认为，统一是同它的思想基础不可分的，统一只有基于思想上的接近才能建立起来，它是同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这些倾向的出现、发展、增长相联系的，这种联系不是指某些论战的言论或某种报刊上的争论之类的偶然联系，而是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就像因果的联系一样。（列宁：《政论家的短评》。见《列宁全集》第 16 卷第 206—210 页）

如果托洛茨基和约诺夫现在企图把党同现有的个人、团体和机关“调和起来”，那末在我们看来，在一切护党的布尔什维克和护党的孟什维克看来，托洛茨基和约诺夫简直就是背叛党，如此而已。（同上书，第 238 页）

我斥责他① 什么呢？我斥责他经常在俄国提出“中派”的政策。这是有事实根据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从 1912 年 1 月起就正式分裂了。我们党（团结在中央委员会周围的一派）斥责另一派即组织委员会（它的最有名的领袖是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的机会主义。托洛茨基曾经加入过马尔托夫的党，只是在 1914 年才脱离。那时候战争已经到来了。我们这一派的杜马党团的五个成员（穆拉诺夫、彼得罗夫斯基、沙果夫、巴达也夫和萨莫依洛夫）都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我们的工人在彼得格勒投票**反对**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实际问题；它对俄国是很重要的，就好像在法国关于参加政府的问题一样）。可是组织委员会最著名最有威望的著作家波特列索夫、查苏利奇和

① 指托洛茨基。

列维茨基等人却赞成“保卫祖国”，赞成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虽然提出抗议并且反对参加这个委员会，但是并没有同他们那个党断绝关系，其实党内有一派已经成了沙文主义者，同意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了。因此，我们在昆塔尔也责备过马尔托夫，说他想代表整个组织委员会，可是实际上他也许只能代表这个派别中的一个小派别。后来这个党在杜马里的代表（齐赫泽、斯柯别列夫等人）发生了意见分歧。这些代表有一部分赞成“保卫祖国”，有一部分反对。可是他们都赞成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并且使用了模棱两可的必须“救国”的说法，而这种说法实质上只是休特古姆和列诺得尔的“保卫祖国”口号的另一种表现。不但如此，他们也决不反对波特列索夫的立场（其实波特列索夫的立场同普列汉诺夫的立场是一样的；马尔托夫所以公开反对波特列索夫并且拒绝同他的杂志合作，是因为后者请了普列汉诺夫给杂志撰稿）。

而托洛茨基呢？他一方面同马尔托夫的党断绝了关系，但又继续责备我们，说我们是分裂派。他渐渐向左转了，甚至建议同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的领袖们分裂，但是他没有彻底向我们说明，他是愿意同齐赫泽党团统一还是分裂。而这恰恰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事实上，如果明天实现和平，那我们后天就会在杜马中实行改选。并且在我们面前立刻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同齐赫泽站在一起呢，还是反对他？我们是反对这种联合的，马尔托夫是赞成的。而托洛茨基呢？谁都不知道。俄国的报纸《我们的言论报》在巴黎已经出了五百号了，可是作为该报编辑之一的托洛茨基，却连一句肯定的话也没有说。因此我们不能同意托洛茨基。

但是问题不仅仅在我们。托洛茨基在齐美尔瓦尔得还不愿意同“齐美尔瓦尔得左派”联合呢。托洛茨基和亨·罗兰—霍斯特

同志是代表“中派”的。（列宁：《给波利斯·苏瓦林的一封公开信》。见《列宁全集》第 23 卷第 205—207 页）

赞成“不胜不败”这一口号①的人是自觉或不自觉的沙文主义者，至少也是调和主义的小资产者，但不管怎样，他都是无产阶级政策的敌人，是目前的政府和目前的统治阶级的拥护者。（列宁：《关于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失败》。见《列宁全集》第 21 卷第 257 页）

8. 现在俄国社会主义政府面临着一个必须立即解决的问题：是立刻接受这个割地和约② 呢，还是马上进行革命战争。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不可能作任何中间路线的决定，再也无法继续拖延了，因为我们为了故意拖延谈判，已经用尽了一切可能的和不可能的办法。（列宁：《谈谈不幸的和约问题的历史》。见《列宁全集》第 26 卷第 417 页）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接受崩得③ 的联邦制，那么俄国社会民主党就要根据按民族“划分”工人的原则来实行改组；或者是采取跨民族的组织形式，那么崩得就要根据地域自治的原则，按照高加索、拉脱维亚和波兰的社会民主党的榜样来实行改组，而为犹太工人和俄国其他各族工人的直接统一开辟道路。

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原则只会战胜，不会“调和”。（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见《斯大林选集》上卷第 117 页）

因为二者必居其一：

---

① “不胜不败”的口号，是托洛茨基在 1914 年帝国主义大战的时候提出的，目的在反对列宁的“失败主义”的口号。事实上，这个口号，正如列宁所说，只是把“保卫祖国”的口号换几个字而已。

② 列宁这里是指《布列斯特和约》而言。当时托洛茨基主张“不战不和”的折衷办法，事实上是帮助德帝国主义者。

③ 崩得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1897 年 10 月组成）的简称。

或者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不是列宁主义的，那末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既然在表决时赞成了这项决议，也就不是列宁主义者了；

或者这项决议是列宁主义的，那末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既然背弃了这项决议，也就不再是列宁主义者了。（斯大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结论》。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12页）

你们会问，结论怎样呢？

结论只有一个。反对派已经糊涂透顶，居然把自己驱入没有出路的绝境，以致不得不进行选择：或者倒向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党这一边，或者倒向马斯洛夫、路特·费舍和反党非法印刷所叛徒那一边。

永远在这两个阵营之间徘徊是不行的。现在是选择的时候了。或者跟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在一起，那就要反对马斯洛夫和路特·费舍，反对所有一切叛徒；或者是反对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那就滚到马斯洛夫和路特·费舍集团那儿去，滚到一切叛徒和蜕化分子那儿去，滚到各种舍尔巴柯夫分子和其他败类那儿去。（鼓掌）（斯大林：《俄国反对派的政治面貌》。见《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43页）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资本家阶级和已经掌握政权并建立了自己专政的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利益上的不可调和的对立；或者是没有这种利益上的对立，那就只有宣布阶级利益的协调。

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或者是**资本家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

或者是阶级利益的不可调和的对立；**或者是**阶级利益协调的理论。（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134—135页）

十、列宁、斯大林论共产党员要成为有头脑的政治家

为了能够分析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有自己的头脑。党组织的作用和名副其实的党的领袖的作用，也正在于通过本阶级一切肯动脑筋的分子① 所进行的长期的、顽强的、各种各样的、多方面的工作，获得必要的知识、必要的经验、必要的（除了知识和经验之外）政治敏感，来迅速而正确地解决各种复杂的政治问题。（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见《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223—224 页）

关于党的宣传工作的极重要意义，关于对我们工作人员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极重要意义，大概已没有必要再来大谈特谈了。我所指的，不仅是党机关中的工作人员，而且还包括共青团、工会、商业组织、合作社、经济组织、苏维埃组织、教育组织、军事组织及其他组织中的工作人员。调整党的成分和使领导机关接近基层工作的事情，尽可以做得很满意；提拔干部、挑选干部和配备干部的工作，尽可以做得很满意；这一切尽可以都做得很好，但是如果我们党的宣传工作却因某种缘故而搞得不好了，如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我们干部的工作松懈了，如果我们对提高这些干部的政治和理论水平的工作削弱了，而干部本身又因此而不再关心我们的发展前途，不再了解我们事业的正确性，而

---

① 每个阶级，即使是在最文明的国家里，即使它是最先进的阶级，并且由于当前的形势，它的一切精神力量得到最高度发挥，其中也总会有一些分子不动脑筋和不会动脑筋，而且只要阶级还存在，只要无阶级的社会还没有完全在自己的基础上加强、巩固和发展起来，就必然还会有这样一些分子。否则，资本主义便不成其为压迫群众的资本主义了。

变成一些前途茫茫、盲目地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的事务主义者，那么我们国家和党的整个工作就一定会削弱。在国家和党的任何一个工作部门中，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程度愈高，工作本身的效率也愈高，工作也就愈有成效；反过来说，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程度愈低，就愈可能在工作中遭受挫折和失败，就愈可能使工作人员本身庸俗化和堕落成为鼠目寸光的事务主义者，就愈可能使他们蜕化变质，——这要算是一个定理。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我们能够从思想上来培养我们所有工作部门中的干部，从政治上来锻炼他们，使他们能够随时判明国内外的局势，如果我们能够使他们成为有能力解决国家领导问题而不犯严重错误的十分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么我们就有一切根据认为，我们所有的问题十分之九已经解决了。而这个任务，我们无疑是能够解决的，因为我们有解决这个任务所必需的一切手段和可能。

我们年轻干部的培养和形成，通常都是按各个科学技术部门，按各个专业进行的。这是必要的，适当的。没有必要使一个医学专家同时又是一个物理学专家或植物学专家，反过来说也是一样。但是有一门科学知识却是一切科学部门中的布尔什维克都必须具备的，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社会发展规律、无产阶级革命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规律以及共产主义胜利的科学。因为，那种局限于自己的专业，譬如说局限于数学、植物学或化学，而对自己专业以外的东西一无所知的人，尽管他们自称为列宁主义者，但是决不能认为他们就是真正的列宁主义者。列宁主义者不能仅仅是他自己所喜爱的那门科学的专家，他同时还应当是个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应当密切关心本国命运，懂得社会发展规律，善于运用这些规律，并力求积极参加对国家的政治

领导。当然，这对于布尔什维克专家来说是一种附加的负担。但是，这是一种大有好处的负担。

党的宣传工作的任务，对干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任务，就是要帮助我们所有工作部门中的干部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斯大林：《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61—463页）

选民，人民，应当要求自己的代表始终胜任自己的任务；要求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中不堕落为政治上的庸人；要求他们始终不愧为列宁式的政治活动家；要求他们成为像列宁那样的明朗和确定的活动家；（鼓掌。）要求他们像列宁那样在战斗中无所畏惧和对人民的敌人毫不留情；（鼓掌。）要求他们在事情开始复杂化，在地平线上出现某种危险的时候，毫不惊慌失措，毫无任何类似惊慌失措的迹象，要求他们也像列宁那样没有任何类似惊慌失措的迹象；（鼓掌。）要求他们在解决复杂问题、需要全面地确定方针、全面地考虑事情的正反方面的时候，也能够像列宁那样英明和从容；（鼓掌。）要求他们也像列宁那样诚实和正直；（鼓掌。）要求他们像列宁那样热爱自己的人民。（鼓掌。）（斯大林：《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见《斯大林文选》第163—164页）

十一、列宁、季米特洛夫论必须终结书本与生活的脱离

如果说，学习共产主义只限于了解共产主义著作、书本和小册子里的东西，那我们就很容易造就出一些共产主义的书呆子或吹牛家，而这往往会使我们受到损害，因为这种人虽然把共产主

义书本和小册子上的东西读得烂熟，却不善于把这些知识融会贯通，也不会按共产主义的真正要求去行动。

资本主义旧社会留给我们的最大祸害之一，就是书本与生活实践完全脱节，过去有些书把什么都描写得好得了不得，其实大半都是最令人厌恶的胡言乱语，虚伪地向我们描绘资本主义社会的情景。

因此，单从书本上来了解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是极不正确的。（列宁：《青年团的任务》。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345—346页）

现在我还想来回答应当怎样学习这些东西的问题。我的回答是：只有把学校活动的每一步骤，把教育、训练和学习的每一步骤，同全体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列宁：《青年团的任务》。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357页）

在我看来，我们党校的主要任务是教育那里的党员和团员怎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应用到特殊国家的具体环境中，到具体条件中，到反对特殊的具体的敌人斗争中，而不是应用到反对"一般"敌人的斗争中。这就不仅需要研究列宁主义的文字，而且需要研究列宁主义的活的革命精神。

在我们党校中，有两种培养干部的方法：

第一种方法：教育人们以抽象理论，企图给予他们以最大量的枯燥知识，教他们如何以文学的笔调写提纲和决议，只是偶然地触及特殊国家的问题，触及特殊工人运动的问题，工人运动的历史和传统，以及该国共产党的经验。只是偶然地！

第二种方法：实施理论教育，使每一学生以切实研究本国无产阶级斗争的关键问题为基础，来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这种学生回到实际工作时，就能独立地找出他的方向，成为能领导群众从事反阶级敌人斗争的独立的实际组织者和领导者。

事实证明，我们党校的毕业生不都是适用的：有些人学到很多的空洞词句、抽象理论、一大堆书本知识和皮毛的学问。但是我们需要真正的、确有布尔什维克精神的群众组织者和领导者。我们现在很迫切地需要他们。这样的学生倘若不能写漂亮的提纲(虽然我们也很需要)，也并不要紧，但是他们一定要懂得怎样组织，怎样领导，不害怕困难，而能够克服困难。

革命理论是革命运动的总结起来的、综合起来的经验。共产党人必须在自己的国家中审慎地利用国际工人运动其他部队的，不只是过去而且是现在的斗争经验。但是正确地利用经验绝不等于把斗争的现成方式和方法从一个条件机械地搬到另一个条件，从一个国家机械地搬到另一个国家，如在我们某几国共产党内所常常发生的那样。

在资本主义还占优势的国家中，共产党人所单纯模仿和一意抄袭的，即使是苏联共产党的工作方式和方法，也可能用意虽好而结果是有害无益的，实际上就已经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形。我们正根据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学习如何把单一的国际路线有效地应用到每个国家的实际生活的特殊条件上去；在反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必须学习如何无情地唾弃、当众指斥并使大家嘲笑所有的玩弄辞令、运用陈腐公式、卖弄学问和空谈理论。

同志们，在每一阶段中，在斗争过程中，在自由的时候，在坐牢的时候，学习、经常地学习是必要的。学习，战斗；战斗，学习。我们一定要善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伟大学说与斯大林型的对工作和斗争的坚持结合起来，与斯大林型的对阶级敌人和脱离布尔什维克路线的分子在原则上的不可调和性结合起来，与斯大林型的面对困难的无畏精神以及斯大林型的革命现实主义结合起来。(季米特洛夫：《工人阶级统一起来反对法西斯》。见

《季米特洛夫选集》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61—163页）

十二、恩格斯论单纯的理论家不是真正的理论家

谁要是稍为注意一下最近十年国际社会主义文献的巨大增长，特别是马克思和我以前的著作的译本的数量，他就会同意我下面的看法：我很庆幸自己只能在有限的几种文字上对译者有所帮助，因而只能在有限的几种文字上不容推卸校订的责任。但是文献的增加不过是国际工人运动本身相应发展的一个象征。而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又赋予我新的责任。从我们开始公开活动的那些日子起，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人在本国进行的运动之间的联络工作，大部分落到马克思和我身上；这项工作随着整个运动的壮大而相应地增加了。但在马克思去世以前，这方面的工作主要由马克思担负，在他去世以后，这种不断增加的工作就落到我一个人身上了。不过在此期间，各国工人政党互相间的直接交往已经成为常规，而且值得庆幸的是，情况越来越是这样；虽然如此，从我的理论工作考虑，人们要求我给予的帮助还是太多了。但是谁要是像我这样五十多年来一直在这个运动中从事活动，他就会把由此产生的各项工作看作一种义不容辞的、必须立即履行的义务。在我们这个动荡不定的时代，也像十六世纪一样，在公共利益的范围内，只是在反动派方面还有单纯的理论家，正因为如此，这些先生们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理论家，而只是反动派的辩护士。（恩格斯：《〈资本论〉第3卷编者序》。见《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4页）

十三、斯大林论理论与实际一致的典型——列宁

在我们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当党的每一个口号和领袖的每一句话都受到事实检验的时候，无产阶级向自己的领袖们提出了特别的要求。历史上有过一些无产阶级的领袖，风暴时期的领袖，实践家领袖，他们是有自我牺牲和勇敢精神的，但是在理论上很弱。人民群众不会很快忘记这些领袖的名字。例如德国的拉萨尔和法国的布朗基就是这样的领袖。但是整个运动不能只靠回忆过日子，它需要有明确的目的（纲领）和坚定的路线（策略）。

还有另一种领袖，和平时期的领袖，他们在理论上很强，但是在组织工作和实际工作方面却很弱。这种领袖只是在无产阶级的上层中间有威信，而这也只能到一定的时期为止。革命时代一到来，当要求领袖们拿出革命实践口号的时候，理论家就退出舞台，让位给新人物了。例如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和德国的考茨基就是这样的领袖。

要始终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就必须一身兼备理论力量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组织经验。当巴·阿克雪里罗得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①他评论列宁说：他“成功地把优秀实践家的经验同理论修养和广阔的政治眼界集于一身”（见巴·阿克雪里罗得给列宁《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② 一书所写的序

① 巴·阿克雪里罗得是俄国孟什维克首领之一，曾参加“劳动解放社”工作。

②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一书是列宁于1897年底在西伯利亚流放时写的（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95—115页）。该书第一版附有巴·阿克雪里罗得的序言，于1898年在日内瓦由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出版。

言)。“文明”资本主义的思想家阿克雪里罗得先生现在会怎样评论列宁，这是不难猜想的。但是在我们这些深知列宁而又能客观地观察事物的人看来，毫无疑问，列宁完全保持着这个原有的品质。而且也应当从这一点来说明，为什么列宁，也只有列宁，才是现在世界上最强大最有锻炼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斯大林:《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见《斯大林选集》上卷第135—136页)

十四、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

要实现布尔什维克化，至少必须具备若干基本条件，没有这些条件，各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根本是不可能的。

(1) 必须使党不把自己看成议会选举机构的附属品，像社会民主党在实际上把自己看成的那样；必须使党不把自己看成工会的不用付出代价的附属品，像某些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有时翻来覆去所说的那样；而必须使党把自己看成无产阶级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它负有使命**领导**无产阶级组织其他一切形式的无产阶级组织——从工会到议会党团。

(2) 必须使党特别是党的领导者完全精通与革命实践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

(3) 必须使党在制定口号和指令的时候，不是根据背熟的公式和历史的比拟，而是根据对革命运动所处的国内外的具体条件的仔细分析，同时还必须考虑到各国的革命经验。

(4) 必须使党在群众的革命斗争的烈火中检查这些口号和指令的正确性。

(5) 必须按照新的革命的方式来改组党的全部工作，特别是当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在党内还没有清除的时候。这样，党的每个步骤和每个行动就能自然而然地使群众革命化，使工人阶级的广

大群众受到革命的训练和教育。

(6) 必须使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善于把最高的原则性（不能和宗派主义混为一谈!）和与群众最广泛的联系及接触（不能和尾巴主义混为一谈!）结合起来。不然，党不但不可能教导群众，而且也不可能向群众学习；不但不可能引导群众并把他们提高到党的水平，而且也不可能倾听群众的呼声和预料到他们的迫切需要。

(7) 必须使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善于把毫不妥协的革命性（不能和革命的冒险主义混为一谈!）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及随机应变的本领（不能和迁就行为混为一谈!）结合起来。不然，党就不可能掌握各种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不可能把无产阶级的日常利益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利益联系起来，也不可能在自己的工作中把合法斗争和不合法斗争配合起来。

(8) 必须使党不掩饰自己的错误，使它不怕批评，使它善于用自己的错误来提高和教育自己的干部。

(9) 必须使党善于把先进战士中的优秀分子选拔到基本的领导集团中去。因为这些先进战士十分忠诚，足以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意向的真正表达者；他们有丰富的经验，足以成为能运用列宁主义的策略和战略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

(10) 必须使党经常地改善自己组织的社会成分，清除那些腐化的机会主义分子，以便达到最大限度的团结一致。

(11) 必须使党制定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这种纪律的基础是思想的一致性、运动目的的明确性、实际行动的统一和广大党员群众对待党的任务的自觉态度。

(12)必须使党经常检查自己的决定和指令的执行情况。不然，这些决定和指令就有变成空洞的诺言的危险，而空洞的诺言只能

破坏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对党的信任。

没有诸如此类的条件，实行布尔什维克化就是空谈。（斯大林：《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见《斯大林选集》上卷第 311—313 页）

第三章　历史科学的创造

一、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论唯物辩证法

用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来改造全部政治经济学，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策和策略——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注意的事情，这就是他们做了最重要最新颖的贡献的地方，这就是他们在革命思想史上英明地迈进的一步。（列宁：《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见《列宁全集》第 19 卷第 558 页）

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的问题。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而唯物主义则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且向前推进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列宁：《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见《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357 页）

这位作者先生① 从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 年柏林版第 4—7 页②，在那里我说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中摘引一段话后说：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所研

① 指圣彼得堡《欧洲通信》的作者。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81—85 页。

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而且他认为重要的，不仅是在这些现象具有完成形式和处于一定时期内可见到的联系中的时候支配着它们的那种规律。在他看来，除此而外，最重要的是这些现象变化的规律，这些现象发展的规律，即它们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规律。他一发现了这个规律，就详细地来考察这个规律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后果……所以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过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一定的社会关系秩序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善地指出那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为了这个目的，只要证明现有秩序的必然性，同时证明这种秩序不可避免地要过渡到另一种秩序的必然性就完全够了，而不管人们相信或不相信，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这种过渡。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既然意识要素在文化史上只起着这种从属作用，那末不言而喻，以文化本身为对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识的某种形式或某种结果为依据。这就是说，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的现象。批判将不是把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一种事实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对这种批判唯一重要的是，把两种事实尽量准确地研究清楚，使之真正形成相互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尤其重要的是，同样准确地把各种秩序的序列、把这些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联贯性和联系研究清楚……但是有人会说，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不管是应用于现在或过去，都是一样的。马克思否认的正是这一点。在他看来，这样的抽象规律是不存在的……根据他的意见，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

受另外的规律支配。总之，经济生活呈现出的现象，和生物学的其他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似……旧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规律的性质，他们把经济规律同物理学定律和化学定律相比拟……对现象所作的更深刻的分析证明，各种社会机体像动植物机体一样，彼此根本不同……由于各种机体的整个结构不同，它们的各个器官有差别，以及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不一样等等，同一个现象却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例如，马克思否认人口规律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相反地，他断言每个发展阶段有它自己的人口规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就不同。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研究和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样，他只不过是极其科学地表述了任何对经济生活进行准确的研究必须具有的目的……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了支配着一定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马克思的这本书确实具有这种价值。”

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考察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

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

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

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将近三十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时，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模仿者们①，却已高兴得像莱辛时代大胆的莫泽斯·门德尔森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做一条“死狗”了。因此，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24页）

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参看拉萨尔所著《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第三篇（《论认识》）开头所引用的斐洛关于赫拉克利特的一段话②），是辩证法的实质

① 指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毕希纳、朗格、杜林、费希纳等人。

② 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396页。

(是辩证法的“本质”之一，是它的基本的特点或特征之一，甚至是它的最基本的特点或特征)。黑格尔也正是这样提问题的（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形而上学》中经常在这周围**兜圈子**，并跟赫拉克利特和赫拉克利特的思想**作斗争**。

辩证法内容的这一方面的正确性必须由科学史来检验。对于辩证法的这一方面，通常（例如普列汉诺夫）没有给以足够的注意：对立面的同一被当作**实例**的总和［“例如麦粒”；“例如原始共产主义”。恩格斯也这样做过。但这是“为了通俗化”……］，而不是被当作**认识的规律**（以及客观世界的规律）。

在数学中，十和一，微分和积分。

在力学中，作用和反作用。

在物理学中，阳电和阴电。

在化学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

在社会科学中，阶级斗争。

对立面的同一(它们的“统一”，也许这样说更正确些吧？虽然同一和统一这两个术语的差别在这里并不太重要。在一定的意义上二者都是正确的)，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要在世界的一切过程的“自己运动”、自生发展和蓬勃生活中认识这些过程，就要把它们当作对立面的统一来认识。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有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发展(进化)观：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根据第一种运动观，**自己**运动，它的动力，它的泉源，它的动因都被忽视了（或者这个泉源被移到外部——移到神、主体等等那里去了）。根据第二种运动观，主要的注意力正是放在认识

“自己”运动的**泉源**上。

第一种观点是僵死的、贫乏的、枯竭的。第二种观点是富有生命力的。只有第二种观点才提供理解一切现存事物的“自己运动”的钥匙；只有它才提供理解“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转化”、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的钥匙。

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

> **注意**：顺便说一下，主观主义（怀疑论和诡辩等等）和辩证法的区别在于：在（客观的）辩证法中，相对和绝对的差别也是相对的。对于客观的辩证法说来，在相对**之中有**绝对。对于主观主义和诡辩说来，相对只是相对的，是排斥绝对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常、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向我们表明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的发展，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总和中的、从这个社会的开始到终结的发展**既是**生长**又是**运动）。

一般辩证法的叙述（以及研究）方法也应当如此（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辩证法在马克思看来只是辩证法的局部情况）。从最简单、最普通、最常见的等等东西开始；从**任何一个命题**开始，如树叶是绿的，伊万是人，哈巴狗是狗等等。在这里（正如黑格尔天才地指出过的）就已经有**辩证法**：**个别就是一般**（参看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施维格勒译，第2卷第40页，第3篇第4章第8—9节：“因

为当然不能设想：在个别的房屋之外还有一般的房屋"）。这就是说，对立面（个别与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在个别中存在，只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任何个别经过千万次的转化而与另一**类**的个别（事物、现象、过程）相联系，如此等等。**在这里已经**有自然界的**必然性**、客观联系等等概念的因素、萌芽了。这里已经有偶然和必然、现象和本质了，因为当我们说伊万是人，哈巴狗是狗，**这**是树叶等等时，我们就把许多特征作为**偶然的东西抛掉**，把本质和现象分开，并把二者对立起来。

可见，在**任何**一个命题中，好像在一个"单位"（"细胞"）中一样，都可以（而且应当）揭示出辩证法**一切**要素的萌芽，这就表明辩证法本来是人的全部认识所固有的。而自然科学则向我们表明（这又要用**任何**一个最简单的实例来表明）客观自然界也具有同样的性质，表明个别向一般的转变，偶然向必然的转变，对立面的转化、转换、相互联系。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这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实质**）普列汉诺夫没有注意到，至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

*　*　*

不论是黑格尔（*参看《逻辑学》*），不论是保尔·福尔克曼（参看他的 Erkenntnistheoretische Grundzüge①，S.）这个自然科学的现

① 福尔克曼《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原理》1910 年莱比锡—柏林版第 35 页。见 1911 年圣彼得堡版第 40 页。

代“认识论者”、折衷主义者、黑格尔主义的敌人（他不懂黑格尔主义！），都把认识看作一串圆圈。

> 哲学上的“圆圈”：[是否一定要以人物的年代先后为顺序呢？不！]
> 古代：从德谟克利特到柏拉图以及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
> 文艺复兴时代：笛卡儿对伽桑狄（斯宾诺莎？）。
> 近代：霍尔巴赫——黑格尔（经过贝克莱、休谟、康德）。
> 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

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认识，这种认识包含着各式各样观察现实、接近现实的无数的细微差别（包含着从每个细微差别发展成整套的哲学体系），——这就是它比起“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来所具有的无比丰富的内容，而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就是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

从粗陋的、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不过**是胡说。相反地，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个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überschwengliches（狄慈根）① 发展（扩大、膨胀）为**脱离了**物质、

① 指约·狄慈根使用了 überschwenglich 这个词。这个词的意思是：夸大的、过分的、无限度的。例如，他在 1903 年斯图加特出版的《短篇哲学论文集》第 204 页上就曾用过。狄慈根在使用这个词时写道：“绝对的东西和相对的东西的区分不是无限度的。”也可参看约·狄慈根《人脑活动的实质》第 4 章第 2 节，那里谈到精神世界和感性世界之间区分的限度。

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唯心主义就是僧侣主义。这是对的。但（“**更确切些说**”和“**除此而外**”）哲学唯心主义是**经过**人的无限复杂的（辩证的）**认识的一个细微差别**而通向僧侣主义的**道路**。

注意这个警句

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能把人们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而僧侣主义（＝哲学唯心主义）当然有**认识论的**根源，它不是没有根基的，它无疑地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然而却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生生的树上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列宁：《谈谈辩证法》。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711—715页）

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同一的、是相互转化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当做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当做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111页）

辩证法的要素

(1) 观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

×

(2) 这个事物对其他事物的多种多样的**关系**的

全部总和。

(3) 这个事物（或现象）的**发展**，它自身的运动，它自身的生命。

(4) 这个事物中的内在矛盾的**倾向**(和#方面)。

(5) 事物（现象等等）是**对立面**的总和与**统一**。

(6) 这些对立面、矛盾的趋向等等的**斗争**或展开。

(7) 分析和综合的结合，——各个部分的分解和所有这些部分的总和、总计。

×(8) 每个事物（现象等等）的关系不仅是多种多样的，并且是一般的、普遍的。每个事物（现象、过程等等）是和其他的**每个**事物联系着的。

(9) 不仅是对立面的统一，而且是**每个**规定、质、特征、方面、特性向**每个**他者［向自己的对立面?］的**转化**。

(10)揭露**新的**方面、关系等等的无限过程。

(11)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

(12)从并存到因果性以及从联系和相互依存的一个形式到另一个更深刻更一般的形式。

(13)在高级阶段上重复低级阶段的某些特征、特性等等，并且

(14) 仿佛是向旧东西的回复〔否定的否定〕。

(15) 内容对形式以及形式对内容的斗争。形式的抛弃，内容的改造。

(16) 从量到质和从质到量的转化。

((15 和 16 是 9 的**实例**))

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

(列宁:《辩证法的要素》。见《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607—608 页)

在认识论上和在科学的其他一切领域中一样，我们应该辩证地思考，也就是说，不要以为我们的认识是一成不变的，而要去分析怎样从不知到知，怎样从不完全的不确切的知识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知识。(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见《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100 页)

《某一事物是可能的还是不可能的，要取决于内容，也就是说，取决于现实的各个环节的全部总和，而现实在自己的发展中表明自己是必然性。》(《哲学全书》，全集第 6 卷第 287 页〔242〕① 第 143 节的附释)

① 这里是指《黑格尔全集》1840 年柏林德文版第 6 卷的页码，方括号内是该书 1930 年俄文版第 1 卷的页码。

“**现实的各个环节的整体、总和**，现实在展开中表现为必然性。”

现实的各个环节的全部总和的展开（**注意**）＝辩证认识的本质。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166页）

认识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没有止境的接近。自然界在人的思想中的反映，应当了解为不是“僵死的”，不是“抽象的”，**不是没有运动的，不是没有矛盾的**，而是处在运动的永恒过程中，处在矛盾的产生和解决的永恒过程中的。 **注意**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08页）

思想和客体的一致是一个过程。思想（＝人）不应当认为真理是僵死的静止，是像精灵、数目或抽象的思想那样没有趋向的、没有运动的、惨淡的（灰暗的）简单的图画（形象）。（同上书，第208页）

真理就是由现象、现实的一切方面的**总和**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构成的。概念的关系（＝转化＝矛盾）＝逻辑的主要内容，并且这些概念（及其关系、转化、矛盾）是作为客观世界的反映而被表现出来的。**事物**的辩证法创造观念的辩证法，而不是相反。

黑格尔在概念的辩证法中天才地**猜测到了**事物（现象、世界、**自然界**）的辩证法#

#应当更通俗地表达这一警言，**不要用**辩证法这个字眼，大致可以这样说：黑格尔在一切概念的更换、相互依赖中，**在它们的对立面的同一中**，在一个概念向另一个概念的**转化**中，在概念的永恒的更换、运动中，天才地**猜测到**了的**正是事物、自然的这样的关系**。	正是**猜测到**了，再没有别的。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见《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210 页）

在旧逻辑中，没有转化，没有发展（概念的和思维的），没有各部分之间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①（第 43 页），也没有某些部分向另一些部分的“转化”②。 因此，黑格尔提出两个基本的要求：	**注意**

(1)《联系的必然性》

和

(2)《差别的内在的发生》。

> 非常重要!! 据我看来，这就是下面的意思：
> 1. 某个现象领域的一切方面、力量、趋向等等的**必然**联系、客观联系；
> 2. “差别的内在的**发生**”，是差别、两极性的进展和斗争的内部客观逻辑。

（同上书，第 95—96 页）

---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eines inneren，notwendigen Zusammenhangs》.——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Йbergang》.——译者注

《不只是抽象的普遍，而且是自身包含着特殊东西的丰富性的普遍。》(第 47 页)

参看《资本论》

绝妙的公式："不只是抽象的普遍，而且是自身体现着特殊、个体、个别东西的丰富性的这种普遍"(特殊的和个别的东西的全部丰富性！)！！ 好极了！①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见《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98 页)

如果我没有弄错③，那末黑格尔的这些推论中有许多神秘主义和空洞的④学究气，可是基本的思想是天才的：万物之间的世界性的、全面的、**活生生**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在人的概念中的反映——唯物地颠倒过来的黑格尔⑤；这些概念必须是经过琢磨的、整理过的、灵活的、能动的、相对的、相互联系的、在对立中是统一的，这样才能把握世界。要继承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事业，就应当**辩证地**研究人类思想、科学和技术的历史。

而"纯粹逻辑上的"研究呢？这是相符合的②。这**必须**相符合，就像《资本论》中的归纳和演绎一样。

---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Très bien！——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as fällt zusammen. ——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If I'm not mistaken. ——译者注

④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there is much mysticism and leeres. ——译者注

⑤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materialistisch auf den Kopfge stellter Hegel. ——译者注

黑格尔常用的“**环节**”一词，是指**联系**的环节，联结中的环节	一条河和河中的**水滴**。**每一水**滴的位置、它同其他水滴的关系；它同其他水滴的联系；它运动的方向；速度；运动的路线——直的、曲的、圆形的等等——向上、向下。运动的总和。概念是运动的各个方面、各个水滴（=“事物”）、各个“**细流**”等等的**总计**。按照黑格尔的逻辑学，世界的情景大概①就是这样的，——当然要除去神和绝对。

《如果某一事物具备了一切条件，那末它就是实存的》……（第116页）

好极了！这跟绝对观念和唯心主义有什么关系呢？

这样“引申出”……**实存**……倒是很有趣的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153—154页）

辩证法来源于希腊文“dialego”一词，意思就是进行谈话，进行论战。在古代，所谓辩证法，指的是以揭露对方论断中的矛盾并克服这些矛盾来求得真理的艺术。古代有些哲学家认为，思维矛盾的揭露以及对立意见的冲突，是发现真理的最好方法。这种辩证的思维方式后来推广到自然界现象中去，就变成了认识自然界的辩证方法，这种方法把自然界现象看作是永恒地运动着、变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àPeu Près. ——译者注

化着的现象，把自然界的发展看作是自然界中各种矛盾发展的结果，看作是自然界中对立力量互相影响的结果。

辩证法从根本上说来，是同形而上学截然相反的。

（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的基本特征是：

(1) 同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不是把自然界看作彼此隔离、彼此孤立、彼此不依赖的各个对象或现象的偶然堆积，而是把它看作有联系的统一的整体，其中各个对象或现象互相有机地联系着，互相依赖着，互相制约着。

因此，辩证方法认为，自然界的任何一种现象，如果被孤立地、同周围现象没有联系地拿来看，那就无法理解，因为自然界的任何领域中的任何现象，如果把它看作是同周围条件没有联系、与它们隔离的现象，那就会成为毫无意义的东西；反之，任何一种现象，如果把它看作是同周围现象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是受周围现象所制约的现象，那就可以理解、可以论证了。

(2) 同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不是把自然界看作静止不动、停滞不变的状态，而是看作不断运动和变化、不断更新和发展的状态，其中始终有某种东西在产生，在发展；有某种东西在破坏，在衰颓。

因此，辩证方法要求我们观察现象时不仅要从各个现象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角度去观察，而且要从它们的运动、它们的变化、它们的发展的角度，从它们的产生和衰亡的角度去观察。

在辩证方法看来，最重要的不是现时似乎坚固，但已经开始衰亡的东西，而是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哪怕它现时似乎还不坚固，因为在辩证方法看来，只有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才是不可战胜的。

恩格斯说：“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

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物（原始的活细胞。——编者注）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灭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484页）①

恩格斯说，因此，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头脑中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连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的”（同上书，第23页）②。

（3）同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不是把发展过程看作简单的增长过程，看作量变不引起质变的过程，而是看作从不显著的、潜在的量的变化到显露的变化，到根本的变化，到质的变化的发展，在这种发展过程中，质变不是逐渐地发生，而是迅速地、突然地发生的，表现为从一种状态飞跃式地进到另一种状态，并且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有规律地发生的，是由许多不明显的逐渐的量变积累而成的。

因此，辩证方法认为，不应该把发展过程了解为循环式的运动，了解为过去事物的简单重复，而应该把它了解为前进的运动，了解为上升的运动，了解为从旧质态到新质态的转化，了解为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

恩格斯说：“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自然界不是循着一个永远一样的不断重复的圆圈运动，而是经历着实在的历史。这里首先就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4页。——译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9—420页。——译者注

应当指出达尔文，他极其有力地打击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因为他证明了今天的整个有机界，植物和动物，因而也包括人类在内，都是延续了几百万年的发展过程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23页）①恩格斯在说明辩证的发展就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时写道：

“在物理学中……每种变化都是量到质的转化，是物体所固有或所承受的某一形式的运动的量在数量上发生变化的结果。例如，水的温度最初对它的液体状态是无足轻重的；但是由于液体水的温度的增加或减少，便会达到这样的一点，在这一点上这种聚集状态就会发生变化，水就会变为蒸汽或冰。……例如，必须有一定的最低强度的电流才能使电灯泡中的白金丝发光，每种金属都有自己的白热点和融解点，每种液体在一定的压力下都有其特定的冰点和沸点，——只要我们有办法造成相应的温度；最后，例如，每种气体都有其临界点，在这一点上相当的压力和冷却能使气体变成液体。……物理学的所谓常数（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转变点。——编者注），大部分不外是这样一些关节点的名称，在这些关节点上，运动的量的（变化）增加或减少会引起该物体的状态的质的变化，所以在这些关节点上，量转化为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527—528页）②接着，恩格斯讲到化学时又说：

“化学可以称为研究物体由于量的构成的变化而发生的质变的科学。黑格尔本人已经知道这一点……拿氧来说：如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0页。——译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7页。——译者注

果结合在一个分子中的有三个原子，而不是像普通那样只有两个原子，那末我们就得到臭氧，一种在气味和作用上与普通氧很不相同的物体。更不待说，如果把氧同氮或硫按不同的比例化合起来，那末其中每一种化合都会产生出一种在质的方面和其他一切物体不同的物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528页）①

最后，恩格斯在批评杜林，批评这位大骂黑格尔而暗中又剽窃黑格尔关于从无感觉世界王国进到感觉的王国，从无机界王国进到有机生命王国，是向新状态的飞跃这一著名原理的杜林时写道：

“这完全是黑格尔的度量关系的关节线，在这里纯粹量的增多或减少，在一定的关节点上就引起质的飞跃，例如在把水加热或冷却的时候，沸点和冰点就是这种关节点，在这种关节点上——在标准压力下——完成了进入新的聚集状态的飞跃，因此，在这里量就转变为质。”（同上书，第45—46页）②

(4) 同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的出发点是：自然界的对象、自然界的现象含有内在的矛盾，因为它们都有其反面和正面，都有其过去和将来，都有其衰颓着的东西和发展着的东西，而这种对立面的斗争，旧东西和新东西之间、衰亡着的东西和产生着的东西之间、衰颓着的东西和发展着的东西之间的斗争，就是发展过程的内在内容，就是量变转化为质变的内在内容。

因此，辩证方法认为，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不是通过现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7—488页。——译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4页。——译者注

象和谐的开展，而是通过对象、现象本身固有矛盾的揭露，通过在这些矛盾基础上活动的对立趋势的“斗争”进行的。

> 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说，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列宁《哲学笔记》俄文版第263页）①
>
> 其次：
>
> “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3卷第301页）②
>
> 简略说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的基本特征就是这样。

不难了解，把辩证方法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该有多么巨大的意义；把这些原理应用到社会历史上去，应用到无产阶级党的实际活动上去，该有多么巨大的意义。

既然世界上没有孤立的现象，既然一切现象都是彼此联系、互相制约的，那就很明显，在估计历史上每一种社会制度、每一个社会运动的时候，不应当像历史学家常做的那样，从“永恒正义”或其他某种成见出发，而应当从产生这种制度、这个社会运动的条件和同它们有联系的条件出发。

奴隶占有制度，从现代的条件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现象，是反常的荒谬事情。然而在原始公社制度瓦解的条件下，奴隶占有制度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合乎规律的现象，因为它同原始公社制度相比是前进了一步。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在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条件下，譬如说在1905年的俄国，是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正确的和革命的要求，因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当时意味着前进一

---

① 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8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12页。——译者注

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要求，从我们苏联现在的条件看来，却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和反革命的要求，因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同苏维埃共和国相比是后退了一步。

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

显然，没有这种观察社会现象的**历史**观点，历史科学就会无法存在和发展，因为只有这样的观点才能使历史科学不致变成偶然现象的糊涂账，不致变成一堆荒谬绝伦的错误。

其次。既然世界是处在不断的运动和发展中，既然旧东西衰亡和新东西生长是发展的规律，那就很明显，没有什么“不可动摇的”社会秩序，没有什么私有制和剥削的“永恒原则”，没有什么农民服从地主、工人服从资本家的“永恒观念”。

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制度可以用社会主义制度来替代，正如资本主义制度在当时代替了封建制度一样。

这就是说，不要指靠已经不再发展的社会阶层，即使这些阶层在现时还是占优势的力量，而要指靠正在发展的、有前途的阶层，即使这些阶层在现时还不是占优势的力量。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派斗争的时期，俄国无产阶级同当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个体农民比较起来，还是占极少数。但是无产阶级是一个发展着的阶级，农民则是一个日趋瓦解的阶级。正因为无产阶级是一个发展着的阶级，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就指靠无产阶级。他们没有错，因为大家知道，无产阶级后来从一个不大的力量发展成了历史上和政治上的头等力量。

这就是说，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要向前看，而不要向后看。

其次。既然从缓慢的量变进到迅速的、突然的质变是发展的规律，那就很明显，被压迫阶级进行的革命变革，是完全自然的和不可必免的现象。

这就是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摆脱资本主义压迫，不可能通过缓慢的变化，通过改良来实现，而只能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质变，通过革命来实现。

这就是说，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要做革命者，而不要做改良主义者。

其次。既然发展是通过内在矛盾的揭露，通过基于这些矛盾的对立势力的冲突来克服这些矛盾而进行的，那就很明显，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完全自然的和必不可免的现象。

这就是说，不要掩饰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矛盾，而要暴露和揭开这些矛盾，不要熄灭阶级斗争，而要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

这就是说，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要执行无产阶级的不调和的阶级政策，而不要执行使无产阶级利益同资产阶级利益相协调的改良主义政策，不要执行使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的妥协政策。

以上就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观察社会生活，观察社会历史的情形。（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 425—431 页）

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规律是从自然和历史中找寻出来，规律以合乎自然及历史为依归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20 页）

事情不在于把辩证法的规律从外部注入自然界，而在于从自

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里加以阐发。(恩格斯:《反杜林论》三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页)

……人类的历史……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思维的任务现在就在于通过一切迂回曲折的道路去探索这一过程的依次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3页)

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4页)

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6—187页)

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例如,英

国高教会宁愿饶恕对它的三十九个信条中的三十八个信条展开的攻击，而不饶恕对它的现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进行的攻击。（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一版序言，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页）

唯物主义承认“自在客体”或心外客体，认为观念和感觉是这些客体的复写或反映。与此相反的学说（唯心主义）认为：客体不存在于“心外”；客体是“感觉的组合”。（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20页）

……因为，唯物主义者既然承认现实世界、我们感觉到的物质是**客观**实在，也就有根据得出结论说，任何超出时间和空间界限的人类臆想，不管它的目的怎样，**都不是现实的**。（同上书，第183页）

如果你们① 不想用一些狡辩来支吾搪塞，如果你们真想“防止”主观主义和唯我论，那末你们首先应该防止你们哲学的唯心主义的基本前提，应该用唯物主义的路线（从外部世界到感觉）来代替你们哲学的唯心主义的路线（从感觉到外部世界）……（同上书，第51页）

“熟知的思想形式”是重要的开端，也是“没有生命的骨骼”②（第11页）。

需要的不是没有生命的骨骼③，而是活的生命。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85页）

人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面向着客观世界，依赖于它，以它来规定自己的活动。（同上书，第200页）

---

① 指经验批判主义者们。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die leblosen Knochen eines Skeletts》.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leblose knochen.

事实上，人的目的是客观世界所产生的，是以它为前提的，——认定它是现存的、实有的。但是人却**以为**他的目的是从世界以外拿来的，是不以世界为转移的（“自由”）。（同上书，第 201 页）

……《对真理的认识就是按照客体存在的样子，即把客体作为不掺杂主观反思的东西来认识》……（第 178 页）‖ 对客体的认识

（同上书，第 197 页）

＃＃＃……《无疑地，应当同意下面这点：当我们还未**理解概念**，还停留在简单的、不变的**表象**和**名称**上时，不论关于**自我**，不论关于任何东西，甚至关于概念，我们都一无所知。》（第 266 页）‖ 不能离开理解（认识、具体研究等等）的过程去理解

为了要理解，必须从经验上开始理解、研究，从经验升到一般。为了学会游泳，必须钻到水中。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见《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220—221 页）

约·狄慈根在他的著作《人脑活动的实质》（1903 年德文版）中说道：“客观的科学的认识，不是在信仰中，不是在思辨中，而是在经验中，在归纳中去寻找原因，不是在经验之前而是在经验之后去寻找原因。自然科学不是在现象之外，不是在现象之后，而是在现象之中或通过现象去寻找原因。”（第 94—95 页）“原因是思维能力的产物。然而它们不是思维能力的纯粹产物，它们是思维能力和感性材料结合起来而产生的。感性材料给这样产生的原因提供了客观存在。正如我们要求真理是客观现象的真理一样，我们要求原因是实在的，要求它是某个客观结果的原因。”（第 98—99

页）“物的原因就是物的联系。”（第100页）

由此可见，……约·狄慈根所阐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是承认“物本身中”含有“因果依存性”的。（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158页）

由此可见，费尔巴哈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承认被人类的秩序、规律等等观念仅仅近似正确地反映着的客观因果性。费尔巴哈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同他承认我们意识所反映的外部世界、对象、物体、物的客观实在性是分不开的。费尔巴哈的观点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而所有其他的观点，说得更确切些，在因果性问题上的另外一条哲学路线，即否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因果性、必然性的路线，被费尔巴哈公允地列为信仰主义的流派。因为事实上很明显，因果性问题上的主观主义路线，即不从外部客观世界中而从意识、理性、逻辑等等中引出自然界的秩序和必然性的主观主义路线，不仅把人类理性和自然界分隔开来，不仅把前者和后者对立起来，并且把自然界作为理性的**一部分**，而不是把理性看作自然界的一小部分。因果性问题上的主观主义路线就是哲学唯心主义（休谟和康德的因果性理论是它的变种），也就是或多或少减弱了的、冲淡了的信仰主义。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和这个规律性在人脑中的近似正确的反映，就是唯物主义。（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155—156页）

恩格斯举了波义耳定律（气体的体积同它所受的压力成反比）作为例子。这个定律所包含的“一粟真理”只有在一定界限内才是绝对真理。这个定律“只是近似的”真理。（同上书，第134页）

人的因果概念总是把自然现象的客观联系稍许简单化了，只

是近似地反映这种联系，人为地把一个统一的世界过程的某些方面孤立起来。（同上书，第 157 页）

恩格斯责备旧的自然哲学“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它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自然现象的联系）”（第 42 页）①。十分明显，恩格斯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因果性、必然性，同时着重指出我们人类用某些概念对这个规律性所作的近似的反映具有相对性。（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见《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157 页）

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感觉、经验等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识。在这两种场合下，意识都不过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恰当的、十分确切的）反映。（同上书，第 332 页）

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中，即使有七十个马克思也不能够把握住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变化的总和；至多是发现这些变化的规律，在主要的基本的方面指出这些变化及其历史发展的客观的逻辑。（同上书，第 331 页）

客观主义：思维的范畴不是人的用具， 而是自然界的和人的规律性的表现……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见《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87 页）

注意	《随着这样地对内容作逻辑的思考》，于是成为对象的就不是事物，而是事物的本质，事物的概念②。	注意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39、242 页。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He Dinge，a die Sache，der Begriff der Dinge.

不是事物，而是事物运动的规 律①，按照唯物主义的说法。

……《逻各斯，即存在着的东西的理性》（第21页）。（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91页）

规律是现象中巩固的（保存着的）东西。（同上书，第158页）

……规律把握住平静的东西——因此，规律、任何规律都是狭隘的、不完全的、近似的。（同上书，第159页）

现象比规律丰富。（同上书，第160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是：

（1）唯心主义认为世界是“绝对观念”、“宇宙精神”、“意识”的体现，而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却与此相反，它认为，世界按其本质说来**是物质的**；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现象是运动着的物质的不同形态；辩证方法所判明的现象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发展规律；世界是按物质运动规律发展的，并不需要什么“宇宙精神”。

恩格斯说：“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朴素的了解，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651页）②

古代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持着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世界是包括一切的整体，它不是由任何神或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按规律燃烧着，按规律熄灭着的永恒的活火”。列宁在谈到这个唯物主义观点时说：“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绝妙

① 手稿中在“规律”和下一段的“逻各斯”之间有一箭头相连。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7页。——译者注

的说明。”(列宁《哲学笔记》俄文版第318页)①

(2) 唯心主义硬说，只有我们的意识才是真实存在的，物质世界、存在、自然界只是在我们的意识中，在我们的感觉、表象、概念中存在，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却与此相反，它认为，物质、自然界、存在，是在意识以外、不依赖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物质是第一性的，因为它是感觉、表象、意识的来源；而意识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因为它是物质的反映，存在的反映；思维是发展到高度完善的物质的产物，即人脑的产物，而人脑是思维的器官；因此，如果不愿意大错特错，那就不能把思维和物质分开。

恩格斯说：“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马克思选集》俄文版第1卷第329页)②其次：

“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而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却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马克思选集》俄文版第1卷第332页)③马克思谈到物质和思维问题时说道：

“**不可能把思维同思维着的物质分开**。物质是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变化的基础。”(同上书，第302页)④列宁在说明马克思

① 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395页。——译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0页。——译者注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3页。——译者注
④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84页。——译者注

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时写道：

“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意识、感觉、经验……意识都不过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恰当的、十分确切的）反映。”（《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3卷第266—267页）①

其次：

“物质是作用于我们的感官而引起感觉的东西；物质是我们通过感觉感知的客观实在……物质、自然界、存在、物理的东西是第一性的，而精神、意识、感觉、心理的东西是第二性的。”（同上书，第119—120页）②

“世界图景就是物质运动和‘物质思维’的图景。”（同上书，第288页）③

“脑是思想的器官。”（同上书，第125页）④

（3）唯心主义否认认识世界及其规律的可能性，不相信我们知识的可靠性，不承认客观真理，并且认为世界上充满着科学永远不能认识的“自在之物”，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却与此相反，它认为，世界及其规律完全可以认识，我们关于自然界规律的知识，经过经验和实践检验过的知识，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知识，世界上没有不可认识的东西，而只有还没有被认识、而将来科学和实践的力量会加以揭示和认识的东西。

恩格斯在批判康德和其他唯心主义者所谓世界不可认识和“自在之物”不可认识的论点，坚持唯物主义关于我们的知识是可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332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选集》第2版 第2卷第146—147页。——译者注
③ 同上书，第361页。——译者注
④ 同上书，第153页。——译者注

靠知识这一著名原理时写道：

“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使它按照它的条件产生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末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动植物体内所产生的化学物质，在有机化学把它们一一制造出来以前，一直是这种‘自在之物’；当有机化学开始把它们制造出来时，‘自在之物’就变成为我之物了，例如茜草的色素——茜素，我们已经不再从田地里的茜草根中取得，而是用便宜得多、简单得多的方法从煤焦油里提炼出来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有三百年之久一直是一种假说，这个假说尽管有百分之九十九、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可靠性，但毕竟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后来加勒确实发现了这个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学说就被证实了。”（《马克思选集》俄文版第1卷第330页）①

列宁指责波格丹诺夫、巴札罗夫、尤什凯维奇以及马赫的其他信徒堕入信仰主义，列宁坚持唯物主义的著名原理，即我们关于自然界规律的科学知识是可靠的；科学的规律是客观真理，列宁写道：

“现代信仰主义决不否认科学；它只否认科学的‘过分的奢望’，即科学想达到客观真理的奢望。如果客观真理存在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222页。——译者注

着（如唯物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如果只有那在人类‘经验’中反映外部世界的自然科学才能给我们提供客观真理，那末一切信仰主义就被完全否定了。”（《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3卷第102页）①

简略说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的特征就是这样。

显而易见，把哲学唯物主义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该有多么巨大的意义；把这些原理应用到社会历史上去，应用到无产阶级党的实际活动上去，该有多么巨大的意义。

既然自然现象的联系和相互制约是自然界发展的规律，那末由此可见，社会生活现象的联系和相互制约也同样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社会发展的规律。

这就是说，社会生活、社会历史不再是一堆“偶然现象”，因为社会历史成为社会有规律的发展，对社会历史的研究成为一种科学。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党的实际活动不应该以“卓越人物”的善良愿望为基础，不应该以“理性”、“普遍道德”等等的要求为基础，而应该以社会发展的规律为基础，以研究这些规律为基础。

其次。既然世界可以认识，既然我们关于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知识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知识，那末由此应该得出结论：社会生活、社会发展也同样可以认识，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成果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成果。

这就是说，尽管社会生活现象错综复杂，但是社会历史科学能够成为例如同生物学一样准确的科学，能够拿社会发展规律来实际应用。

---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124页。——译者注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党在它的实际活动中，不应该以任何偶然动机为指南，而应该以社会发展规律、以这些规律中得出的实际结论为指南。

这就是说，社会主义从关于人类美好未来的空想变成了科学。

这就是说，科学和实际活动的联系、理论和实践的联系、它们的统一，应当成为无产阶级党的指路明星。

其次。既然自然界、存在、物质世界是第一性的，而意识、思维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既然物质世界是不依赖于人们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而意识是这一客观实在的反映，那末由此应该得出结论：社会的物质生活、社会的存在，也是第一性的，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社会的物质生活是不依赖于人们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实在，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是这一客观实在的反映，是存在的反映。

这就是说，形成社会的精神生活的源泉，产生社会思想、社会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①的源泉，不应当到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本身中去寻求，而要到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社会存在中去寻求，因为这些思想、理论和观点等等是社会存在的反映。

这就是说，社会历史的不同时期所以有不同的社会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在奴隶占有制度下是一种社会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在封建制度下是另一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又是一种，——那不能用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本身的“本性”和“属性”来解释，而要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的不同的

① 原文为“учреждение”，系指和一定的理论观点相适应的组织和机构。——译者注

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来解释。

社会存在怎样，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怎样，社会思想、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也就怎样。

因此马克思说：

>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选集》俄文版第1卷第269页）①

这就是说，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要不陷入空想家的地位，无产阶级党在自己的活动中就不应当从抽象的“人类理性原则”出发，而应当从具体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即从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出发；不应当从“伟大人物”的善良愿望出发，而应当从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

包括民粹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在内的空想派所以垮台，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不承认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首要作用，他们陷入唯心主义，不是把自己的实际活动建筑在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上，而是不顾这种需要并且违反这种需要，把自己的实际活动建筑在脱离社会现实生活的“理想计划”和“包罗万象的方案”上。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和生命力在于，它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正是以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为依据，任何时候也不脱离社会的现实生活。

但是，从马克思的话中不能引出这样的结论：社会思想、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在社会生活中没有意义，它们不反过来影响社会存在，影响社会生活物质条件的发展。我们在这里暂且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译者注

只是说到社会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的**起源**，只是说到它们的**产生**，只是说到社会精神生活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至于社会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的**意义**，至于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那末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不否认，相反，正是着重指出它们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中的重大作用和意义。

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想和理论。有旧的思想和理论，它们是衰颓的、为社会上衰颓的势力服务的。它们的作用就是阻碍社会发展，阻碍社会前进。也有新的先进的思想和理论，它们是为社会上先进的势力服务的。它们的作用就是促进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前进，而且它们愈是确切地反映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它们的意义就愈大。

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只有在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向社会提出新的任务以后，才会产生。可是，一经产生，它们就会成为促进解决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所提出的新任务、促进社会前进的最重大的力量。正是在这里表现出新思想、新理论、新政治观点和新政治设施的那种极其伟大的组织作用、动员作用和改造作用。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所以产生，正是因为它们是社会所必需的，因为没有它们那种组织工作、动员工作和改造工作，就**不可能**解决社会物质生活发展中的已经成熟的任务。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在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所提出的新任务的基础上一经产生，就为自己开拓道路，成为人民群众的财富，它们动员人民群众，组织人民群众去反对社会上衰颓的势力，从而有助于推翻社会上衰颓的、阻碍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势力。

可见，社会思想、理论和政治设施，在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即社会存在的发展所提出的已经成熟的任务的基础上一经产生，便反过来影响社会存在，影响社会物质生活，为彻底解决社会物

质生活的已经成熟的任务，为社会物质生活能进一步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

因此马克思说：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卷第406页）①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党为着有可能去影响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加速这些条件的发展，加速这些条件的改善，就应当依据这样一种社会理论和社会思想，这种理论和思想正确反映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因而能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能动员他们，把他们组织成一支决心粉碎社会反动势力、为社会先进势力开辟道路的无产阶级党的大军。

“经济派”和孟什维克所以垮台，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不承认先进理论、先进思想有动员作用、组织作用和改造作用，他们陷入庸俗唯物主义，把先进理论和先进思想的作用看成几乎等于零，从而要党消极起来，无所作为。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和生命力在于，它以正确反映社会物质生活发展需要的先进理论为依据，把这种理论提到它应有的高度，并且把充分利用这种理论的动员力量、组织力量和改造力量，看作自己的职责。

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这样来解决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社会物质生活发展条件和社会精神生活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31—439页）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译者注

三、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

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4页）

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甚至所有抽掉这个物质基础的宗教史，都是非批判的。事实上，通过分析来寻找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10页）

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29页）

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

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424—425 页）

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对于归根到底决定社会面貌、社会思想、观点和政治设施等等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应该作怎样的了解？

“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究竟是什么，它们的特征究竟怎样？

首先，“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一概念无疑包括社会所处的自然环境，即地理环境，因为地理环境是社会物质生活必要的和经常的条件之一，它当然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怎样呢？地理环境是不是决定社会面貌、决定人们的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从一种制度过渡到另一种制度的主要力量呢？

历史唯物主义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否定的。

地理环境无疑是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和必要的条件之一，它当然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加速或者延缓社会发展进程。但是它的影响并不是**决定的**影响，因为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比地理环境的变化和发展快得不可比拟。欧洲在三千年内已经更换过三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占有制度、封建制度；而在欧洲东部，即在苏联，甚至更换了四种社会制度。可是，在同一时期内，欧洲的地理条件不是完全没有变化，便是变化极小，连地理学也不愿提到它。这是很明显的。地理环境的稍微重大一些的变化都需要几百万年，而人们的社会制度的变化，甚至是极其重大的变化，只需要几百年或一两千年也就够了。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地理环境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的原因，**决定的**原因，因为在几万年间几乎保持不变的现象，决不能成为在几百年间就发生根本变化的现象发展的主要原因。

其次，人口的增长，人口密度的大小，无疑也包括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一概念中，因为人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必要因素，没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人口，就不可能有任何社会物质生活。人口的增长是不是决定人们社会制度性质的主要力量呢?

历史唯物主义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也是否定的。

当然，人口的增长对社会的发展有影响，它促进或者延缓社会的发展，但是它不可能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不可能是**决定的**影响，因为人口的增长本身并不能说明为什么某种社会制度恰恰被一定的新制度所代替，而不是被其他某种制度所代替;为什么原始公社制度恰恰被奴隶占有制度所代替，奴隶占有制度被封建制度所代替，封建制度被资产阶级制度所代替，而不是被其他某种制度所代替。

如果人口的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那末较高的人口密度就必定会产生出相应的较高类型的社会制度。可是，事实上没有这样的情形。中国的人口密度比美国高三倍，但是从社会发展来看，美国高于中国，因为在中国仍然是半封建制度占统治，而美国早已达到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比利时的人口密度比美国高十八倍，比苏联高二十五倍，但是从社会发展来看，美国高于比利时，同苏联相比，比利时更是落后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因为在比利时占统治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而苏联已经消灭了资本主义，在国内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人口的增长不是而且不可能是**决定**社会制度性质、**决定**社会面貌的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

(1) 既然如此，那末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体系中，究竟什么是决定社会面貌、决定社会制度性质、决定社会从这一制度发展到另一制度的主要力量呢？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这种力量就是人们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就是社会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食品、衣服、鞋子、住房、燃料和生产工具等等**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

要生活，就要有食品、衣服、鞋子、住房和燃料等等，要有这些物质资料，就必须生产它们，要生产它们，就需要有人们用来生产食品、衣服、鞋子、住房和燃料等等的生产工具，就需要善于生产这些工具，善于使用这些工具。

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以及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所有这些因素共同构成社会的**生产力**。

但是生产力还只是生产的一个方面，生产方式的一个方面，它所表现的是人们对于那些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自然对象和力量的关系。生产的另一个方面，生产方式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即人们的**生产关系**。人们同自然界作斗争以及利用自然界来生产物质资料，并不是彼此孤立、彼此隔绝、各人单独进行的，而是以团体为单位、以社会为单位共同进行的。因此，生产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是**社会的**生产。人们在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时候，在生产内部彼此建立这种或那种相互关系，即这种或那种生产关系。这些关系可能是不受剥削的人们彼此间的合作和互助关系，可能是统治和服从的关系，最后，也可能是从一种生产关系形式过渡到另一种生产关系形式的过渡关系。可是，不管生产关系带有怎样的性质，它们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制度下，都同社会的生产力一样，是生产的必要因素。

马克思说："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5卷第429页）①

可见，生产、生产方式既包括社会生产力，也包括人们的生产关系，而体现着两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统一。

(2)生产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它永远也不会长久停留在一点上，而是始终处在变化和发展的状态中；同时，生产方式的变化又必然引起全部社会制度、社会思想、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的变化，即引起全部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改造。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人们利用不同的生产方式，或者说得粗浅一些，过着不同方式的生活。在原始公社制度下有一种生产方式，在奴隶制度下有另一种生产方式，在封建制度下又有一种生产方式，如此等等。与此相适应，人们的社会制度、他们的精神生活、他们的观点、他们的政治设施也是各不相同的。

社会的生产方式怎样，社会本身基本上也就怎样，社会的思想和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也就怎样。

或者说得粗浅一些：人们的生活方式怎样，人们的思想方式也就怎样。

这就是说，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的发展史，是许多世纪以来依次更迭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史，是生产力和人们生产关系的发展史。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2页。——译者注

这就是说，社会发展史同时也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即作为生产过程的基本力量、生产社会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劳动群众的历史。

这就是说，历史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就不能再把社会发展史归结为帝王将相的行动，归结为国家“侵略者”和“征服者”的行动，而首先应当研究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劳动群众的历史，各国人民的历史。

这就是说，研究社会历史规律的关键，不应该到人们的头脑中，到社会的观点和思想中去寻求，而要到社会在每个特定历史时期所采取的生产方式中，即到社会的经济中去寻求。

这就是说，历史科学的首要任务是研究和揭示生产的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党要想成为真正的党，首先应当掌握生产发展规律的知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知识。

这就是说，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无产阶级党在制定自己的党纲以及进行实际活动的时候，首先应当从生产发展的规律出发，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出发。

(3) 生产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生产的变化和发展始终是从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首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化和发展开始的。所以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先是社会生产力变化和发展，然后，人们的生产关系、人们的经济关系**依赖**这些变化、**与这些变化相适应地**发生变化。但这并不是说，生产关系不影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不依赖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又反过来影响生产力，加速或者延缓它的发展。而且必须指出：生产关系不能过分长久地落后于生产力的增长并和这一增长相矛盾，因为只有当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的性

质、状况，并且给生产力以发展余地的时候，生产力才能充分地发展。因此，无论生产关系怎样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它们迟早必须适合——也确实在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不然，生产体系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就会根本破坏，整个生产就会破裂，生产就会发生危机，生产力就会遭到破坏。

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经济危机就是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性质的例子，是两者冲突的例子，在那里，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同生产过程的社会性，同生产力的性质极不适合。这种不适合的结果，就是破坏生产力的经济危机，而这种不适合的情况本身是以破坏现存生产关系、建立适合于生产力性质的新生产关系为使命的社会革命的经济基础。

反之，苏联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是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性质①的例子，这里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同生产过程的社会性完全适合，因此在苏联没有经济危机，也没有生产力破坏的情形。

所以，生产力不仅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而且是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

生产力怎样，生产关系就必须怎样。

生产力的状况所回答的问题是人们用怎样的生产工具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生产关系的状况所回答的则是另一个问题：**生产资料**（土地、森林、水流、矿源、原料、生产工具、生产建筑物、交通工具、通信工具等等）归谁所有，生产资料由谁支配——由全社会支配，还是由个人、集团和阶级支配并且被用来剥

①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性质完全适合的问题，可参看斯大林后来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译者注

削其他的个人、集团和阶级。

下面就是从古代到今天的生产力发展的一般情景。从粗笨的石器过渡到弓箭，与此相联系，从狩猎生活过渡到驯养动物和原始畜牧；从石器过渡到金属工具（铁斧、铁铧犁等等），与此相适应，过渡到种植植物和农业；加工材料的金属工具进一步改良，过渡到冶铁风箱，过渡到陶器生产，与此相适应，手工业得到发展，手工业脱离农业，独立手工业生产以及后来的工场手工业生产得到发展；从手工业生产工具过渡到机器，手工业—工场手工业生产转变为机器工业；进而过渡到机器制，出现现代大机器工业，——这就是人类史上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大致的、远不完备的情景。这里很明显，生产工具的发展和改善是由参加生产的人来实现的，而不是与人无关的，所以，生产工具变化和发展了，生产力的最重要的因素——人也随着变化和发展，人的生产经验、劳动技能以及运用生产工具的本领也随着变化和发展。

随着社会生产力在历史上的变化和发展，人们的生产关系、人们的经济关系也相应地变化和发展。

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

在原始公社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在基本上适合当时的生产力性质。石器以及后来出现的弓箭，使人无法单身去同自然力量和猛兽作斗争。为了在森林中采集果实，在水里捕鱼，建筑某种住所，人们不得不共同工作，否则就会饿死，就会成为猛兽或邻近部落的牺牲品。公共的劳动导致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公有制。这里还不知道什么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不过有些同时用来防御猛兽的生产工具归个人所有。这里没有剥削，也没有阶级。

在奴隶占有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占有生产工作者，这些生产工作者就是奴隶主可以把他们当作牲畜来买卖屠杀的奴隶。这样的生产关系基本上适合当时的生产力状况。这时人们拥有的已经不是石器，而是金属工具；这时，不知道畜牧业、也不知道农业的那种贫乏原始的狩猎经济，已经被畜牧业、农业、手工业以及这些生产部门之间的分工所代替；这时已经有可能在各个人之间和各部落之间交换产品，有可能把财富积累在少数人手中，而生产资料确实积累在少数人手中，这时已经有可能迫使大多数人服从少数人并且把大多数人变为奴隶。这里社会一切成员在生产过程中的那种共同的自由的劳动没有了，占主要地位的是受不劳动的奴隶主剥削的奴隶的强迫劳动。因此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公有制也没有了。代替它的是私有制。这里，奴隶主是第一个和基本的十足的私有者。

富人和穷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享有完全权利的人和毫无权利的人，他们彼此间的残酷的阶级斗争，——这就是奴隶占有制度的情景。

在封建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地占有生产工作者——农奴，封建主已经不能屠杀农奴，但是可以买卖农奴。除了封建所有制以外，还存在农民和手工业者以本身劳动为基础的个体所有制，他们占有生产工具和自己的私有经济。这样的生产关系基本上适合当时的生产力状况。铁的冶炼和加工更进一步的改善，铁犁和织布机的推广，农业、种菜业、酿酒业和榨油业的继续发展，除手工业作坊以外工场手工业企业的出现，——这就是当时生产力状况的特征。

新的生产力要求生产者在生产中能表现出某种主动性，愿意劳动，对劳动感兴趣。于是，封建主就抛弃奴隶，抛弃这种对劳

动不感兴趣、完全没有主动性的工作者，宁愿利用农奴，因为农奴有自己的经济、自己的生产工具，具有为耕种土地并从自己收成中拿出一部分实物缴给封建主所必需的某种劳动兴趣。

私有制在这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剥削几乎同奴隶制度下的剥削一样残酷，不过是稍许减轻一些罢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阶级斗争，就是封建制度的基本特征。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同时这里已经没有了私自占有生产工作者的情形，这时的生产工作者，即雇佣工人，是资本家既不能屠杀，也不能出卖的，因为雇佣工人摆脱了人身依附，但是他们没有生产资料，所以为了不致饿死，他们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家，套上剥削的枷锁。除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以外，还存在着摆脱了农奴制依附关系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以本身劳动为基础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且这种私有制在初期是很流行的。手工业作坊和工场手工业企业被用机器装备起来的大工厂所代替。用农民简陋的生产工具耕作的贵族庄园，被根据农艺学经营的、使用农业机器的资本主义大农场所代替。

新的生产力要求生产工作者比闭塞无知的农奴更有文化、更加伶俐，能够懂得机器和正确地使用机器。因此，资本家宁愿利用摆脱农奴制羁绊、有相当文化程度来正确使用机器的雇佣工人。

可是，资本主义把生产力发展到巨大的规模以后，便陷入它解决不了的矛盾中。资本主义生产出日益增多的商品并且减低商品的价格，这样就使竞争尖锐化，使大批中小私有者破产，把他们变成无产者，缩小他们的购买力，因而使生产出来的商品无法销售出去。资本主义扩大生产并把千百万工人集合在大工厂内，这样就使生产过程具有社会性，因而破坏本身的基础，因为生产过

程的社会性要求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而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却仍然是同生产过程的社会性不相容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

生产力性质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通过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暴露出来，在危机时期，资本家由于自己使居民群众遭受破产而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者，不得不烧掉产品，销毁制成的商品，停止生产，破坏生产力；千百万居民则被迫失业挨饿，而这并不是由于商品不够，却是因为商品生产太多。

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不再适合社会生产力状况，它同社会生产力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孕育着革命，这个革命的使命就是要用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来代替现存的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

这就是说，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目前还只有在苏联实现的这种制度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这里已经没有剥削者，也没有被剥削者。生产出来的产品是根据“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按劳动分配的。这里，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的特征，是不受剥削的工作者之间的同志合作和社会主义互助。这里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因为生产过程的社会性是由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所巩固的。

因此，苏联的社会主义生产没有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没有同危机相联系的荒谬现象。

因此，生产力在这里以加快的速度发展的，因为适合于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使生产力有这样发展的充分广阔的天地。这就是人

类史上人们生产关系发展的情景。

这就是生产关系的发展依赖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依赖于生产工具的发展的情况，因为有这种依赖关系，所以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迟早要引起生产关系相应的变化和发展。

> 马克思说："劳动资料①的使用和创造，虽然就其萌芽状态来说已为某几种动物所固有，但是这毕竟是人类劳动过程独有的特征，所以富兰克林给人下的定义是制造工具的动物。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马克思《资本论》1935年俄文版第1卷第121页）②

其次：

"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5卷第364页）③

"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产生都是不断变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才是停滞不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5卷第364页）④

---

① 马克思所说的"劳动资料"，主要是指生产工具。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4页。——译者注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8页。——译者注

④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9页。——译者注

恩格斯在说明《共产党宣言》所表述的历史唯物主义时说道：

“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恩格斯为《宣言》德文版所作的序言）①

（4）生产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新的生产力以及同它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的产生过程不是离开旧制度而单独发生，不是在旧制度消灭以后，而是在旧制度内部发生的；不是人们有意的、自觉的活动的结果，而是自发地、不自觉地、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发生的。其所以是自发地、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发生，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这种或那种生产方式，因为每一辈新人开始生活时，他们就遇到现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即前辈人工作的结果，因此新的一辈在最初必须接受他们在生产方面所遇到的一切现成东西，必须适应这些东西，以便有可能生产物质资料。

第二个原因，就是人们在改进这种或那种生产工具、这种或那种生产力因素时，不会意识到，不会了解到，也不会想到，这些改进将会引起怎样的**社会**结果，而只是想到自己的日常利益，只是想要减轻自己的劳动，谋得某种直接的、可以感触到的益处。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2页。——译者注

原始公社社会的某些成员在逐渐地摸索着从石器过渡到铁器的时候,当然不知道,也没有想到这种革新会引起怎样的社会结果;他们没有了解到,也没有意识到,从石器过渡到金属工具是意味着生产中的变革,结果一定会引起奴隶占有制度,——当时他们只是想要减轻自己的劳动和谋得眼前的感觉得到的益处,——他们当时的自觉活动只局限于这种日常个人利益的狭隘范围。

欧洲年轻的资产阶级在封建制度时期开始建设大工场手工业企业,同行会小作坊并存,从而推进了社会生产力,它当然不知道,也没有想到,这种革新会引起怎样的社会后果;它没有意识到,也没有了解到,这种“细微的”革新会引起社会力量的重新配置,结果会发生革命,这个革命不但会打倒它所十分感恩的国王政权,而且会打倒它的优秀人物往往梦想侧身其间的贵族,——当时资产阶级只是想要减低商品生产的费用,把更多的商品投到亚洲市场和刚发现的美洲市场,以便获得更多的利润,——它当时的自觉活动只局限于这种日常实践的狭隘范围。

俄国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一起加紧在俄国培植现代机器化大工业,丝毫也不触动沙皇制度,听凭地主们宰割农民,当时,他们当然不知道,也没有想到,生产力的这种严重增长会引起怎样的社会后果;他们没有意识到,也没有了解到,社会生产力方面的这种重大的飞跃会引起社会力量的重新配置,结果会使无产阶级有可能和农民联合起来实现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当时他们只是想要极度地扩大工业生产,掌握巨大的国内市场,变成垄断资本家,并且从国民经济中汲取更多的利润,——他们当时的自觉活动并没有超出他们日常的狭隘实践的利益。

因此马克思说: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即在人们生活所必需

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中。——编者注）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① 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马克思选集》俄文版第1卷第269页）②

但这并不是说，生产关系的变化以及从旧生产关系到新生产关系的过渡是一帆风顺、不经过冲突、不经过震荡的。相反地，这种过渡通常是用革命手段推翻旧生产关系、树立新生产关系的办法实现的。到一定时期为止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是自发地、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进行的。但这只是到一定时候为止，只是到已经产生和正在发展的生产力还没有充分成熟的时候为止。而在新生产力成熟以后，现存的生产关系以及体现这种生产关系的统治阶级就变成“不可克服的”障碍，这只有通过新兴阶级的自觉活动，只有通过这些阶级的暴力行动，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被扫除。在这方面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新社会思想、新政治设施和新政权的**巨大作用**，它们的使命就是用暴力消灭旧生产关系。在新生产力同旧生产关系冲突的基础上，在社会新的经济需要的基础上产生出新的社会思想，新思想组织和动员群众，群众团结成为新的政治大军，建立起新的革命政权，并且运用这个政权，以便用暴力消灭生产关系方面的旧秩序，建立新秩序。于是，自发的发展过程让位给人们自觉的活动，和平的发展让位给暴力的变革，进化让位给革命。

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

① 着重号是原书编者加的。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译者注

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共产党宣言》1938年俄文版第52页)①

其次：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同上书，第50页)②

“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马克思《资本论》1935年俄文版第1卷第603页)③

以下就是马克思在1859年为他的名著《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有历史意义的《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所作的天才的表述：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译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译者注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56页。——译者注

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克思选集》俄文版第 1 卷第 269—270 页）①

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应用于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的情形。（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 439—454 页）

四、列宁论历史唯物主义早已由假设变成科学上被证明了的原理——惟一的科学历史观

社会学中这种唯物主义思想本身已经是天才的思想。当然，这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82—83 页。——译者注

在那时暂且还只是一个假设，但是是一个第一次使人们有可能极科学地对待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假设。在此以前，社会学家不善于往下探究像生产关系这样简单和这样原始的关系，而径直着手探讨和研究政治法律形式，一碰到这些形式是由当时人类某种思想产生的事实就停留下来；结果似乎社会关系是由人们自觉地建立起来的。但这个充分表现于《社会契约论》①的思想（这种思想的痕迹在一切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中都表现得十分明显）中的结论是和一切历史观察完全矛盾的。社会成员把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看做一个由某种原则所贯串的一定的完整的东西，——这是从来没有过而且现在也没有的事；恰恰相反，大众是不自觉地适应于这些关系的，而且根本不了解这些关系是特殊的历史的社会关系，例如人们千百年来生活于其中的交换关系，只是在最近才得到了解释。唯物主义继续深入分析，发现了人的这些社会思想本身的起源，也就消除了这个矛盾；因此，只有关于思想的进程取决于事物的进程的唯物主义结论，才是唯一可与科学的心理学相容的结论。其次，从另一方面说，这个假设第一次把社会学提到了科学的水平。在此以前，社会学家总是难于分清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的主要现象和次要现象（这就是社会学中的主观主义的根源），不能找到这种划分的客观标准。唯物主义提供了一个完全客观的标准，它把“生产关系”划为社会结构，使

① 《社会契约论》(《Contrat Social》)是让·雅克·卢梭的主要著作之一（1762年出版），该书的中心思想是认为任何社会制度都应该是人们之间自由协商的结果。“社会契约”的理论虽然基本上是一种唯心主义理论，但它是在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夜提出的，终究起过革命的作用。这个理论表达了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号召消灭封建等级特权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我们有可能把主观主义者认为不能应用到社会学上来的一般科学的重复律应用到这些关系上来。当他们还局限于思想的社会关系（即通过人们的意识[①]而形成的关系）时，始终不能发现各国社会现象中的重复性和常规性，他们的科学至多不过是记载这些现象，收集素材。一分析物质的社会关系（即不通过人们意识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人们在交换产品时彼此发生生产关系，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这里存在着社会生产关系），立刻就有可能看出重复性和常规性，就有可能把各国制度概括为一个基本概念，即**社会形态**。只有这种概括才使我们有可能从记载社会现象（和从理想的观点来估计社会现象）进而极科学地分析社会现象，譬如说，划分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和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东西，研究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共有的东西。

最后，第三、这个假设之所以第一次使科学的社会学的出现成为可能，还由于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例如主观主义者虽然承认历史现象的规律性，但不能把这些现象的进化看做自然历史过程，这是因为他们只限于指出社会思想和人的目的，而不善于把这些思想和目的归结于物质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在四十年代提出这个假设后，就着手实际地（请注意这点）研究材料。他从各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取出一个形态（即商品经济体系）加以研究，并根据大量材料（他花了不下二十五年的工夫来研究这些材料）把这个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做了极详尽

① 这里当然始终说的是**社会**关系的意识，而不是其他什么关系的意识。

的分析。这个分析仅限于社会成员间的生产关系。马克思一次也没有利用这些生产关系以外的什么因素来说明问题，但他使我们有可能看出商品生产的社会经济组织怎样发展，怎样变成资本主义组织而造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对抗的（这已经是在生产关系范围内）阶级，怎样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并从而带进一个与这一资本主义组织的基础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地位的因素。

《资本论》的骨骼就是如此。可是全部问题在于马克思并不以这个骨胳为满足，并不以通常意义的“经济理论”为限；他专门以生产关系**说明**该社会形态的结构和发展，但又随时随地探究适合于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资本论》所以大受欢迎，是由于“德国经济学家”的这一著作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为活生生的东西向读者表明出来，将它的生活习惯，将它的生产关系所固有的阶级对抗的具体社会表现，将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政治上层建筑，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之类的思想，将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都和盘托出。现在可以看出，把马克思和达尔文相比较是完全正确的：《资本论》不是别的，正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的、彼此紧相联系的思想”。谁读《资本论》而不能看出这些概括的思想，那就怪不得马克思了，因为我们知道马克思甚至在序言中就已指出这些思想。而且这种比较不仅从外表方面（不知为什么这一方面使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特别感兴趣）看是正确的，就是从内容方面看也是正确的。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种看做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续性，同样，马克思也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做可按长官的意志（或者说按社会意志和政府意志，都是一样）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

观点，第一次把社会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确定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

现在，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在没有另一种想科学地说明某种社会形态（正是社会形态，而不是什么国家或民族甚至阶级等等的生活习惯）的活动和发展的尝试以前，在没有另一种想象唯物主义一样把“有关事实”排列得秩序井然、把某种社会形态生动地描绘出来并给以极科学的解释的尝试以前，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别名。唯物主义并不像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想的那样，“多半是科学的历史观”，而是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7—10页）

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应用

（1）马克思论由结论变成方法

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2）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应用不是依靠固执的教义和抽象的格式，不是从“一般”的概念出发

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

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致卢格》。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

我们就不是以空论家的姿态,手中拿了一套现成的新原理向世界喝道:真理在这里,向它跪拜吧!(同上书,第418页)

黑格尔的方法……是从纯粹思维出发的,而这里必须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一种自己承认是"从无,经过无,到无"① 的方法,在这种形式上在这里是根本不适用的。(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0页)

至于说到您用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② 的尝试,那末首先我应当说明:不把唯物主义的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导线索,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将历史的事实宰割和剪裁得适合于它,那末唯物主义的方法就变成和它相反的东西了。(恩格斯:《给保尔·爱因斯特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78页)

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92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做

---

① 见乔·威·弗·黑格尔《逻辑学》第1部第2册;《黑格尔全集》1834年柏林版第4卷第15、75、145页(G.W.F.Hegel.《Wissenschaft der Logik》,Ih.1,Abt.2;Werke.Bd.IV,Berlin,1834,S.15,75,145)。

② 指妇女问题。

处在经常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配搭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要研究这个机体就必须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必须研究该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32页）

我想这说得再明显不过了：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理论中无疑地只是借用了阐明社会关系所必需的宝贵方法，所以他们在评判自己对社会关系的估计时，完全不是以抽象公式之类的胡说为标准，而是以这种估计本身的正确性及其与现实的相符合为标准的。（同上书，第59页）

最可笑的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责备马克思，说他没有“重新审查〈原文如此！〉一切关于历史过程的著名理论”。这简直可笑极了。试问这些理论十分之九都是些什么东西呢？都是一些关于什么是社会、什么是进步等等纯粹先验论的、独断的、抽象的议论（我有意举出这些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心意相投的例子）。而且这些理论就其存在来说已是无用的，就其基本方法、就其彻头彻尾的暗淡无光的形而上学来说也是无用的。从什么是社会、什么是进步等问题开始，就等于从末尾开始。当你还没有专门研究过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甚至未能确定这个概念，甚至未能去认真研究事实和客观地分析任何一种社会关系的时候，你怎能得出关于一般社会和一般进步的概念呢？这就是任何科学所由以开始的那种形而上学的最明显的标志：还不善于着手研究事实时，总是先验地臆造一些毫无结果的一般理论。形而上学的化学家还不善于实际研究化学过程时，就臆造一种关于什么是化学亲合力的理论。形而上学的生物学家谈论着什么是生命，什么是生命力。形而上学的心理学家议论着什么是灵魂。这种方法就是很荒谬的。不分

别说明各种心理过程，就不能谈论灵魂：在这里要想有所进步，就必须摈弃那些关于什么是灵魂的一般理论和哲学议论，就必须有本事把对于说明这种或那种心理过程的事实的研究放在科学的基础上面。因此，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责备，正好像一个毕生撰写什么是灵魂这一问题的“作品”的形而上学的心理学家（连一个最简单的心理现象都弄不清楚）竟来责备一个科学的心理学家，说他没有重新审查一切关于灵魂的著名理论。他，这个科学的心理学家，摈弃了关于灵魂的哲学理论，径直研究心理现象的物质本体（神经过程），因而，譬如说，分析了并说明了某种或某些心理过程。于是我们这位形而上学的心理学家读起这部著作时，称赞过程描写得很好，事实研究得很好，但是他并不感到满足。这位哲学家听见周围的人说那位学者有崭新的心理学观点和科学的心理学的特别方法时，颇为激动并怒气冲冲地说，且慢，究竟在哪一部著作中叙述了这个方法呢？在这部著作中岂不是“仅仅只有一些事实”吗？其中岂不是丝毫没有重新审查过“一切关于灵魂的著名哲学理论”吗？这是完全不相称的著作呀！

在形而上学的社会学家看来，自然，《资本论》同样是不相称的著作。形而上学的社会学家看不出什么是社会这种先验论的议论的毫无用处，不懂得这种方法并不是研究和说明问题，而只是把英国商人的资产阶级思想或俄国民主派的小市民社会主义理想充做社会概念。正因为如此，这一切哲学历史理论就像肥皂泡一样，一出现就化为乌有，至多不过是当时社会思想和社会关系的征象，丝毫没有推进人们对社会关系、即使是个别的但是真实的（而不是那些“适合人类天性的”）社会关系的理解。马克思在这方面的伟大成就在于他摈弃了所有这些关于一般社会和一般进步的议论，而对一种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一种进步（资本主义

进步）做了科学的分析。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却责备马克思，说他从头开始，而不从尾开始；从分析事实开始，而不从最终结论开始；从研究历史上一定的特殊的社会关系开始，而不从关于什么是一般社会关系的一般理论开始！于是他问："相称的著作究竟在哪里呢？"呵，好一个绝顶聪明的主观社会学家呵！！（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11—13页）

马克思的理论是研究和说明一定国家的经济制度的演进；至于把这种理论"应用到"俄国来，那不过是**利用**已经创造出来的**唯物主义**方法和**理论**政治经济学方法来研究俄国生产关系及其演进情形①。（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见《列宁全集》第1卷第244页）

从来也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什么地方论证过：俄国"应当有"资本主义，"因为"西方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等等。从来也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的理论当做什么必须普遍遵行的哲学历史公式，当做一种超过对某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说明以外的东西。只有主观哲学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才弄巧成拙地暴露出自己不懂马克思，说马克思那里有一种普遍的哲学理论，而对于这种说法，他从马克思那里得到了一个十分明确的解释：他是找错人了。从来也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以理论符合于一定的即俄国的社会经济关系的现实和历史为根据，而是以别的什么为根据来论证自己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同时他也不能以别的什么为根据来论证这种观点，因为对理论的这种要求已由"马克思主义"创

① 再说一遍，这个结论对于每一个读过《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和《资本论》的人都很清楚，只有对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一个人才是需要特别解释的。

始人马克思自己十分明白而确定地声明过并被他用来作为全部学说的基础。(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57页)

(3) 马克思论解剖高级形态是解剖低级形态的关键

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8页)

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给劳动产品打上商品烙印、因而成为商品流通的前提的那些形式,在人们试图了解它们的内容而不是了解它们的历史性质(人们已经把这些形式看成是不变的了)以前,就已经取得了社会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因此,只有商品价格的分析才导致价值量的决定,只有商品共同的货币表现才导致商品的价值性质的确定。(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典型的研究

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页)

马克思为了写地租这一篇，在七十年代曾进行了全新的专门研究。他对于俄国1861年“改革”以后不可避免地出现的关于土地所有权的统计资料及其他出版物，——这是他的俄国友人以十分完整的形式提供给他的，——曾经按照原文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并且作了摘录，打算在重新整理这一篇时使用。由于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和对农业生产者的剥削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因此在地租这一篇中，俄国应该起在第一卷研究工业雇佣劳动时英国所起的那种作用。遗憾的是，马克思没有能够实现这个计划。（恩格斯：《〈资本论〉第3卷编者序言》。见《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11页）

马克思所以把中世纪经济制度的其他特征撇开不谈，是因为这些特征属于封建社会形态，而马克思所研究的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44页）

马克思只说到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换句话说，他研究的只是这个形态而不是别的形态的发展规律，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还得指出马克思用以得出其结论的方法，这种方法，像我们刚才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那里听见的那样，就是“精细研究有关事实”。（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4—5页）

（5）马克思、列宁论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把握事实的总和

英国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

大利亚金矿的发现①，资产阶级社会似乎踏进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使我决心再从头开始，批判地彻底研究新的材料。（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4页）

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3—24页）

本书的主要任务，无论过去或现在，都是根据各国不容争辩的资产阶级统计的综合材料和资产阶级学者的自白，来说明二十世纪初期，即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前夜，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其国际相互关系上的**总的情况**。（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732页）

要知道，能够证明战争的真实社会性质，确切些说，证明战争的真实阶级性质的，自然不是战争的外交史，而是对**各**交战国统治**阶级**的**客观**情况的分析。为了说明这种客观情况，不应当引用一些例子和个别的材料（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而一定要引用关于**各**交战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基础**的材料的**总和**。（同上书，第732—733页）

（6）恩格斯、列宁论考察基本的历史联系

黑格尔……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

---

① 指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和1851年在澳大利亚发现了丰富的金矿，这一发现对欧美各国的经济发展起了很大影响。

联系的人，尽管他的历史哲学中的许多东西现在在我们看来十分古怪，如果把他的前辈，甚至把那些在他以后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在《现象学》、《美学》、《哲学史》中，到处贯穿着这种宏伟的历史观，到处是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的（虽然是抽象地歪曲了的）联系中来处理材料的。（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1页）

马克思的辩证法是最新的科学进化论，它正是不容许对事物作孤立的即片面的、歪曲的考察。（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642页）

要最科学地来看这个问题，至少应该对国家的产生和发展情况作一个概括的历史的考察。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为了真正获得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被一大堆细节或各种争执意见所迷惑，为了用科学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列宁：《论国家》。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43页）

无论在自然界或社会中，“纯粹的”现象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它向我们指出，纯粹这个概念本身就表明，人的认识由于没有彻底把握事物的全部复杂性而带有某种狭隘性和片面性。世界上没有而且也不会有“纯粹的”资本主义，而总是有封建主义、小市民意识或其他某种东西**掺杂其间**。因此，当帝国主义者分明用“民族的”词句来掩盖赤裸裸的掠夺的目的，肆无忌惮地欺骗“人民群众”的时候，说战争不是“纯粹”帝国主义性的人，那就是愚蠢透顶的学究或滑头的骗子。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642—643页）

现代的俄国地主经济包含有资本主义的和农奴制的特点。现在农民同地主的斗争，按其客观意义来说，就是农民同农奴制残余的斗争。但是如果企图把一切单个的情形都一一列举出来，把每个单独的情形都加以权衡，用药房的天平毫厘不差地确定哪里是农奴制的终点，哪里是纯粹的资本主义的起点，这就是把自己所有的学究气硬加在马克思主义者身上。我们不可能计算出，从小商人那里买来的用品的价格中，哪一部分是劳动价值构成的，哪一部分是欺诈等等构成的。先生们，这是不是可以说，劳动价值学说应当被抛弃呢？（列宁：《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643页）

（7）恩格斯论历史的方法与论理的方法之一致

……**彼·法尔曼**曾尝试解决这个问题（《康拉德年鉴》第3辑第3卷第793页）。我不谈他对马克思的论述的其他方面所作的评论。这是出自他的误解，即认为马克思进行阐述的地方，就是马克思要下的定义，并认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但是，不言而喻，在事物及其互相关系不是被看作固定的东西，而是被看作可变的东西的时候，它们在思想上的反映，概念，会同样发生变化和变形；我们不能把它们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在此之后，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马克思在第一卷的开头从他作为历史前提的简单商品生产出发，然后从这个基础进到资本，——为什么他要从简单商品出发，而不是从一个在概念上和历史上都是派生的形式，即已经在资本主义下变形的商品出发。这一点，当然是法尔曼决不可能理解的。（恩格斯：

《〈资本论〉第3卷编者序言》。见《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7页）

既然在历史上也像在它的文献的反映上一样，整个说来，发展也是从最简单的关系进到比较复杂的关系，那末，政治经济学文献的历史发展就提供了批判所能遵循的自然线索，而且，整个说来，经济范畴出现的顺序同它们在逻辑发展中的顺序也是一样的。这种形式看来有好处，就是比较明确，因为这正是跟随着现实的发展，但是实际上这种形式至多只是比较通俗而已。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并且，写经济学史又不能撇开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这就会使工作漫无止境，因为一切准备工作都还没有作。因此，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2页）

（8）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细胞的分析。从最单纯的、最大量的、最直接的“存在”开始

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而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在浅薄的

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像是斤斤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镜下的解剖所要做的那种琐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页）

我们采用这种方法，是从历史上和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关系出发，因而在这里是从我们所遇到的最初的经济关系出发。我们来分析这种关系。既然这是**一种关系**，这就表示其中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我们分别考察每一个方面；由此得出它们相互关联的性质，它们的相互作用。于是出现了需要解决的矛盾。但是因为我们这里考察的不是只在我们头脑中发生的抽象的思想过程，而是在某个时候确实发生过或者还在发生的现实过程，因此这些矛盾也是在实际中发展着的，并且可能已经得到了解决。我们研究这种解决的方式，发现这是由建立新关系来解决的，而这个新关系的两个对立面我们现在又需要加以说明，等等。

政治经济学从**商品**开始，即从产品由个别人或原始公社相互交换的时刻开始。进入交换的产品是商品。但是它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在这个**物**中、在这个产品中结合着两个人或两个公社之间的**关系**，即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两者已经不再结合在同一个人身上了。在这里我们立即得到一个贯穿着整个经济学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头脑中引起过可怕混乱的特殊事实的例子，这个事实就是：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诚然，这个或那个经济学家在个别场合也曾觉察到这种联系，而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它对于整个经济学的意义，从而使最难的问题变得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现在也能理解了。（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2—123页）

开始是最简单的、普通的、常见的、直接的“存在”:个别的商品(政治经济学中的“存在”)。把它当做社会关系来加以分析。两种分析:演绎的和归纳的,——逻辑的和历史的(价值形式)。(列宁:《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357页)

(9) 马克思论分析的方法——从单纯到复杂的思维过程与历史的真实过程相适应

当我们从政治经济学方面观察某一国家的时候,我们从该国的人口、人口的阶级划分、人口的城乡海洋的分布、在不同生产部门的分布,输出和输入,全年的生产和消费,商品价格等等开始。

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末这就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经过更切近的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第一条道路是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例如,十七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

工、货币、价值等等。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后一种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中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因而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举例来说，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如交换价值，是以人口、以在一定关系中进行生产的人口为前提的；也是以某种形式的家庭、公社或国家等为前提的。它只能作为一个既与的、具体的、生动的整体的抽象**片面的**关系而存在。相反，作为范畴，交换价值却有一种洪水期前的存在。因此，在意识看来——而哲学意识就是被这样规定的：在它看来，正在理解着的思维是现实的人，因而，被理解了的世界本身才是现实的世界——范畴的运动表现为现实的生产行为（只可惜它从外界取得一种推动），而世界是这种生产行为的结果；这——不过又是一个同义反复——只有在下面这个限度内才是正确的；具体总体作为思维总体、作为思维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被思维的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

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一定要经常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

但是，这些简单的范畴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以前是否也有一种独立的历史存在或自然存在呢？要看情况而定。比如，黑格尔论法哲学，是从主体的最简单的法的关系即占有开始的，这是对的。但是，在家庭或主奴关系这些具体得多的关系之前，占有并不存在。相反，如果说有这样的家庭和氏族，它们还只是**占有**，而没有**所有权**，这倒是对的。所以，这种比较简单的范畴，表现为简单的家庭的或氏族的公社在所有权方面的关系。它在比较高级的社会中表现为一个发达的组织的比较简单的关系。但是那个以占有为关系的具体的基础总是前提。可以设想有一个孤独的野人占有东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占有并不是法的关系。说占有在历史上发展为家庭，是错误的。占有倒总是以这个“比较具体的法的范畴”为前提的。但是，不管怎样总可以说，简单范畴是这样一些关系的表现，在这些关系中，不发展的具体可以已经实现，而那些通过较具体的范畴在精神上表现出来的较多方面的联系和关系还没有产生；而比较发展的具体则把这个范畴当做一种从属关系保存下来。在资本存在之前，银行存在之前，雇佣劳动等等存在之前，货币能够存在，而且在历史上存在过。因此，从这一方面看来，可以说，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可以表现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后面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102—105 页）

（10）恩格斯、列宁论分析与综合

以分析为主要研究形式的化学，如果没有它的对极，即综合，就什么也不是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955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185 页）

《哲学方法是综合的同时又是分析的：但这决不是说，有限认识的这两个方法并列于哲学方法中或简单地交替着，而是这样的：它们二者以被扬弃的形式包含在哲学方法中，而哲学方法在**自己的每个运动中**，同时既起分析的作用，又起综合的作用。哲学思维起分析的作用，因为它仅仅感受自己的对象——观念，让它无阻碍地活动，并且似乎只注视着它的运动和发展。所以哲学活动完全是被动的。但同时哲学思维也是综合的，并表现自己是概念本身的活动。……》（第 411 页）（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见《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257 页）

好极了！

非常好！（而且非常形象）

应用分析的方法还是应用综合的方法，这决不是（如通常所说的①“我们随心所欲的事”②（第 398 页），——这取决于“那些必须认识的对象本身，这是这些对象的形式”③（第 399 页）。（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

①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man pflegt zu sprechen——译者注

②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Sache unseres Beliebens》——译者注

③ 这里俄文版用的是：《es ist die Form der zu erkenn endeh Gegenstände selbst，Von welcheres abhängt》——译者注

书摘要》。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54页）

（11）恩格斯论从不同的观点观察同一的对象

……从不同的观点观察同一的对象，从而，把同一的思想复述几遍，殆已成为马克思的习惯……（恩格斯：《〈资本论〉第3卷编者序》。见《资本论》第3卷1937年读书生活版序第3页，参看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序第4页）

（12）恩格斯论术语的革命

某些术语的应用，不仅同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含义不同，而且和它们在普通政治经济学中的含义也不同。但这是不可避免的。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化学是最好的例证，它的全部术语大约每二十年就彻底变换一次，几乎很难找到一种有机化合物不是先后拥有一系列不同的名称的。政治经济学通常满足于照搬工商业生活上的术语并运用这些术语，完全看不到这样做会使自己局限于这些术语所表达的观念的狭小范围。例如，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完全知道，利润和地租都不过是工人必须向自己雇主提供的产品中无酬部分（雇主是这部分产品的第一个占有者，但不是它的最后的唯一的所有者）的一部分、一份，但即使这样，它也从来没有超出通常关于利润和地租的概念，从来没有把产品中这个无酬部分（马克思称它为剩余产品），就其总和即当做一个整体来研究过，因此，也从来没有对它的起源和性质，对制约着它的价值的以后分配的那些规律有一个清楚的理解。同样，一切产业，除了农业和手工业以外，都一概被包括在制造业（manufacture）这个术语中，这样，经济史上两个重大的本质不同的时期即以手工分工为基础的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和以使用

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业时期的区别，就被抹杀了。不言而喻，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作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作是永恒的最终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恩格斯：《〈资本论〉第1卷英文版序言》。见《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4—35页）

（13）马克思论从事物的表现形式到本质关系的发现

……“劳动的价值和价格”或“工资”这个表现形式不同于它所表现的本质关系，即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我们关于一切表现形式和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基础所说的话，在这里也是适用的。前者是直接地自发地作为流行的思维形式再生产出来的，而后者只有通过科学才能揭示出来。（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93页）

……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3页）

（14）恩格斯论由假设到纯粹定律的建立

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一个新的事实被观察到了，它使得过去用来说明和它同类的事实的方式不中用了。从这一瞬间起，就需要新的说明方式了——它最初仅仅以有限数量的事实和观察为基础。进一步的观察材料会使这些假说纯化，取消一些，修正一些，直到最后纯粹地构成定律。如果要等待构成定律的材料**纯粹化**起来，那末这就是在此以前要把运用思维的研究停下来，而定律也就永远不会出现。（恩格斯：《自然辩

证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1页)

(15) 恩格斯论马克思的抄引法

最后，我说几句关于马克思的不大为人们了解的引证方法。在单纯叙述和描写事实的地方，引文（例如引用英国蓝皮书）自然是作为简单的例证。而在引证其他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的地方，情况就不同了。这种引证只是为了确定：一种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思想，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的。这里考虑的只是，所提到的经济见解在科学史上是有意义的，能够多少恰当地从理论上表现当时的经济状况。至于这种见解从作者的观点来看是否还有绝对的或相对的意义，或者完全成为历史上的东西，那是毫无关系的。因此，这些引证只是从经济科学的历史中摘引下来作为正文的注解，从时间和首倡者两方面说明经济理论中各个比较重要的成就。这种工作在这样一种科学上是很必要的，这种科学的历史著作家们一直只是以怀有偏见、不学无术、追名逐利而著称。——现在我们也会明白，和第二版跋中所说的情况一样，为什么马克思只是在极例外的场合才引证德国经济学家的言论。(恩格斯：《〈资本论〉第1卷第3版序言》。见《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2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论科学上没有平坦的道路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6页)

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

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8页）

六、列宁论辩证法与折衷主义

现在重新提出这样初步的、属于起码的常识的问题，当然是很奇怪的。但遗憾的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迫使我们不得不这样做。他们两人责难我，说我把问题“偷换”了，或者说我是“从政治上”看问题，而他们是“从经济上”看问题的。布哈林甚至把这点放在他的提纲里，并且企图把自己说成“凌驾于”争论双方“之上”，他说：我正在把双方统一起来。

这种理论错误令人吃惊。我在自己的发言里曾经重复说过，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为我在以前就听到过这种对我“从政治上”看问题的非难，听到过这种非常荒谬的、完全不应当由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讲出来的话。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

我的政治估计也可能不正确。如果是这样，就请指出并且加以证明。可是，如果说（或者只是间接地表达了这种思想）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有同等的价值，“二者”都可以采用，这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

换句话说，从政治上看问题，意思就是说：如果对待工会的态度不正确，就会使苏维埃政权灭亡，使无产阶级专政灭亡（在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里，如果由于党的错误而造成党和工会的分裂，那就会使苏维埃政权遭到灭亡）。可以（而且应当）从本质上来检查这种考虑，就是说，来分析、研究、判断这样看问题究竟对不对。而如果说：我“尊重”你从政治上看问题的态度，“**但是**”，这只是从政治

上看问题，而我们“**还**”需要“从经济上”看问题，这就等于说：我“尊重”你所说的采取这种步骤就是自取灭亡这种见解，**但是**，也请你权衡一下，是否丰衣足食要比饥寒交迫好些。

布哈林宣传把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结合起来，这样就在理论上堕落到**折衷主义**立场上去了。

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把事情说成这样：我们所关心的是提高生产，而你们所关心的只是形式上的民主。这样说是不对的，因为**全部**问题就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

……

托洛茨基同志也责备了我，他说：关于“那种被称为工会机关的杠杆起着怎样的作用和应当起怎样的作用”，“列宁却一个字也没有提”（第66页）。

对不起，托洛茨基同志，我全文宣读了鲁祖塔克的提纲并表示同意，我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比你的整个提纲、整个报告或副报告和结论**更多，更充分，更正确，更简洁，更明白**。因为，我再说一遍，就掌握经济、管理工业、加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来说，实物奖励和同志纪律裁判会的价值要比“生产民主”、“结合”之类的完全抽象的（因而也是空洞的）字眼大过百倍。

在提出“生产”观点（托洛茨基）或克服从政治上看问题的片面性以及把从政治上看问题同从经济上看问题结合起来（布哈林）的借口之下，使我们看到的是：

（1）忘记了马克思主义，这表现在对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作了理论上错误的、折衷主义的规定。

（2）为贯串托洛茨基**整个**纲领性小册子的整刷政策所表现的

政治错误辩护和掩饰。而这种错误，假如不认识，不改正，那就会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灭亡。

(3)在纯粹生产的即经济的问题方面，在怎样增加生产的问题方面，倒退了一步；就是说，从鲁祖塔克的**实事求是**的提纲，从这个提出了具体的、实际的、迫切的和切实的任务(开展生产宣传，学会很好地分配实物奖和更正确地采用同志纪律裁判会这种形式的强制)的提纲，退到抽象的、空洞的、“不切实际的”、理论上错误的、知识分子式的、一般的**提纲**上去，**忘记**了最实际的东西。

在关于政治与经济的问题上，季诺维也夫和我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这两方面的相互关系，事实上就是如此。(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441—443页)

布哈林同志在这里所犯的错误的理论实质，就在于他用折衷主义偷换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辩证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所教导我们的）。“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一方面，另一方面”——这就是布哈林在理论上的立场。这就是折衷主义。辩证法要求从相互关系的具体的发展中来全面地估计这种关系，而不是东抽一点，西抽一点。在政治和经济的例子上我已经指出过这一点。

在“缓冲”的例子上，这同样也是毫无疑问的。如果党的列车有倾覆的趋势，那末缓冲是有益的和必要的。这一点无可争辩。而布哈林是用折衷主义的态度提出“缓冲”的任务的，他从季诺维也夫那里抽了一点，又从托洛茨基那里抽了一点。作为一个“缓冲者”，布哈林本来应当独立地确定，是这个人还是那个人，是这些人还是那些人犯了错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问题上犯了错误，是犯了理论上的错误，还是犯了政治上不策略的错误，是犯了派别性言论的错误，还是犯了夸张的错误，等等，然后再**全力**来抨击**每种**错误。但是布哈林并没有了解他自己的这种

“缓冲”任务。下面就是明显的例证之一：

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铁路和水运员工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常务局的共产党党团，这个组织是同情托洛茨基的，他们公开宣称：在他们看来，“在关于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这个基本问题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两位同志的立场，乃是一个观点的两种表现形式”，他们在彼得格勒把布哈林同志1921年1月3日在彼得格勒所做的副报告印成一个小册子（尼·布哈林《论工会的任务》1921年彼得格勒版）。在这个副报告里有这样一段话：

“起初，托洛茨基同志曾经说，必须撤换工会的领导人员，必须选拔适当的同志等等，更早以前，他甚至曾经有过‘整刷’的观点，但是现在，他已经抛弃这个观点了。因此提出‘整刷’作为反对托洛茨基同志的论据，是十分荒谬可笑的。”（第5页）

这段话里有很多不符合事实的地方，这我就不去多说了。（“整刷”这个词，是托洛茨基在11月2日至6日举行的全俄工会第五条代表会议上使用的。“选拔领导人员”这句话，是托洛茨基在他11月8日提交中央的提纲第五次中说的，——顺便提一下，这个提纲已经由托洛茨基的一个拥护者印出来了。托洛茨基12月25日的小册子《工会的作用和任务》，从头到尾都贯串着我在前面指出过的那种思想，那种精神。他的“抛弃”到底表现在什么地方、什么问题上，根本无人知道。）现在我来谈另一个问题。如果“缓冲”是折衷主义的，那末这种“缓冲”就要放过一方面的错误，而只提到另一方面的错误，即对1920年12月30日在莫斯科几千名来自全俄各地的俄共工作人员面前所犯的错误只字不提，而只提到1921年1月3日在彼得格勒的错误。如果“缓冲”是辩证的，那末这种“缓冲”就要全力抨击它从双方面或从各方面看到的每一个错误。布哈林却不是这样做的。他连想都没有想

到要从整刷政策的观点去分析一下托洛茨基的小册子。**他干脆就不提它**。缓冲者这样起缓冲的作用，难怪大家要觉得好笑了。

其次，在同一演说即布哈林在彼得格勒的演说的第七页上，我们看到这样的话：

“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在于他没有充分地为共产主义学校这个方面辩护。”

在12月30日的争论中，布哈林说道：

“季诺维也夫同志说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而托洛茨基同志说它是管理生产的行政技术机关。我看不出有任何逻辑上的根据，可以证明第一个不正确或第二个不正确，因为这两个原理都是对的，把这两个原理结合起来，也是对的。”（第48页）

在布哈林及其“集团”或“派别”的提纲第六条里，也包含着同样的思想：“……一方面，它们〈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另一方面，它们又是——并且愈来愈是——经济机关和整个国家政权机关的一个组成部分……”（1月16日《真理报》）

布哈林同志的基本理论错误正是在这里，正是用折衷主义来偷换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种折衷主义在各种“时髦的”和反动的哲学体系的作家当中是特别流行的）。

布哈林同志说到“逻辑上的”根据。从他的全部议论可以看出，他——可能是不自觉的——在这里所持的观点是形式逻辑或经院哲学逻辑的观点，而不是辩证逻辑或马克思主义逻辑的观点。我现在就从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开始来说明这一点，这个例子是布哈林同志自己用过的。在12月30日的争论中，他说：

“同志们，对于这里发生的争论，也许在你们很多人当中会产生这样的印象：有两个人跑来互相质问，放在讲台上的玻璃杯是什么东西。第一个说：‘这是一个玻璃圆筒，谁说不是这样，谁就

应当受到诅咒。’第二个说：‘玻璃杯是一个饮具，谁说不是这样，谁就应当受到诅咒’”（第46页）

读者可以看到，布哈林想用这个比喻，向我通俗地说明片面性的害处。我接受这个说明，并且表示感谢，而为了用行动来证明我的感谢起见，我也来通俗地解释一下折衷主义和辩证法的区别，以此作为答复。

玻璃杯既是一个玻璃圆筒，又是一个饮具，这是无可争辩的。可是一个玻璃杯不仅具有这两种属性、特质或方面，而且具有许许多多其他的属性、特质、方面以及同整个外界的相互关系和“中介”。玻璃杯是一个沉重的东西，它可以作为投掷的工具。玻璃杯可以用来压纸，可以用来装捉到的蝴蝶。玻璃杯可以作为带有雕刻或图画的艺术品。这些同杯子是不是适于喝东西，是不是用玻璃制成的，它的形状是不是圆筒形，或不完全是圆筒形等等，都是完全无关的。

其次，如果现在我需要把玻璃杯作为饮具使用，那末，我完全没有必要知道它的形状是否完全是圆筒形，它是不是真正用玻璃制成的，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底上不要有洞，在使用这个玻璃杯时不要伤了嘴唇，等等。如果我需要一个玻璃杯不是为了喝东西，而是为了一种使用任何玻璃圆筒都可以的用途，那末，就是杯子底上有洞，甚至根本没有底等等，我也是可以用的。

形式逻辑——在学校里只讲形式逻辑，在学校低年级里也只应当讲形式逻辑（但要加一些修改）——根据最普通的或最常见的事物，作出形式上的定义，并以此为限。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拿两个或更多的不同的定义，把它们完全偶然地拼凑起来（既是玻璃圆筒，又是饮具），那末我们所得到的就仅仅是一个指出事物的各个方面的折衷主义的定义。

辩证逻辑则要求我们更进一步。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

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这是第一。第二，辩证逻辑要求从事物的发展、“自己运动”（像黑格尔有时所说的）、变化中来观察事物。就玻璃杯来说，这不能一下子就很清楚地看出来，但是玻璃杯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玻璃杯的用途，它的用处，它同周围世界的联系，都是常常变化的。第三，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满的“定义”中去。第四，辩证逻辑教导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已故的普列汉诺夫常常喜欢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这样说。（我觉得在这里应当附带向年轻的党员指出一点：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觉悟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著作①。）

自然，我还没有把辩证逻辑的概念全部说完。但是就目前的问题来说这已经够了。现在可以从玻璃杯转到工会和托洛茨基的纲领上来了。

“一方面是学校，另一方面是机关”——布哈林这样说，并在他的提纲中这样写着。托洛茨基的错误，在于“他没有充分地为……学校这个方面辩护”，而季诺维也夫的错误，则在于没有充分

---

① 顺便说一下，不能不希望：第一，把现在正在出版的普列汉诺夫全集中的所有哲学论文汇编成一卷或几卷专集，并且附上详细的索引等等。因为，这种专集应当列为必读的共产主义教科书。第二，我认为工人国家应当对哲学教授提出要求，要他们知道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述，并且善于把这种知识传授给学生。不过这一切已经是离开“宣传”而转到“行政手段”上面去了。

估计到机关这个“方面”。

为什么布哈林这种议论是僵死而空洞的折衷主义呢？因为布哈林丝毫也不打算独立地即用自己的观点去分析目前这一争论的全球历史（马克思主义，**就是说**，辩证逻辑是绝对地要求这样做的），去分析在目前这个时候，在目前的具体条件之下对问题的整个看法，对问题的整个提法，——或者也可以说对问题的整个提法的方向。布哈林一点也没有这样做的打算！他对问题不作丝毫具体的研究，而纯粹搬弄一些抽象的概念，从季诺维也夫那里抽一点，从托洛茨基那里抽一点。这就是折衷主义。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来举一个例子。对于中国南部的起义者和革命者，我是一无所知的（我只是在好多年以前读过孙中山的两三篇论文，读过几本书和一些报纸论文）。既然那里发生了起义，那末在中国人中间想必也会有争论，某甲说起义是包括全民族的极端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产物，某乙则说起义是一种艺术。用不着知道更多的东西，我就能写出像布哈林的提纲那样的提纲来：“一方面……另一方面”。一个没有充分估计到艺术这个“方面”，另一个没有充分估计到“尖锐化这个方面”等等。这就是僵死而空洞的折衷主义，因为在这里没有**具体地**研究**当前这场**争论、这个问题和这种处理问题的态度等等。

工会一方面是学校；第二方面是机关；第三方面是劳动者的组织；第四方面是几乎纯属产业工人的组织；第五方面是按生产部门建立的组织① 等等，等等。布哈林并没有提出任何根据，并没有作

① 这里顺便指出，托洛茨基在这一点上也犯了错误。他以为产业工会就是应当支配生产的工会。这是不对的。产业工会就是按生产部门把工人组织起来的工会，这在一定的技术和文化的水平上，是必然的现象（无论在俄国或在全世界都是如此）。

任何独立的分析，来证明为什么要提出问题或事物的前两“方面”，而不提出第三、第四、第五等方面。所以说布哈林集团的提纲是彻头彻尾的折衷主义的空谈。布哈林关于“学校”和“机关”的相互关系的整个问题的提法，是根本错误的，是折衷主义的。

要正确地提出这个问题，就必须从空洞的抽象概念转到具体的即当前这场争论上来。关于这个争论，无论拿在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发生的情况来讲，或者拿托洛茨基本人在他 12 月 25 日的纲领性小册子中提出并加以阐明的情况来讲，都可以看出，托洛茨基的**整个**看法和整个方向都是错误的。他不了解，无论在提出“苏维埃工联主义”这个问题时，在讲一般生产宣传时，或者在像他**那样**提出“结合”问题即工会参加生产管理问题时，都必须而且可以把工会看做学校。而在最后这个问题上，从托洛茨基整个纲领性小册子中的提法来看，错误的地方就在于他不懂得工会是**学习在行政和技术上管理生产的学校**。不是“一方面是学校，另一方面又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从**各方面来看**，针对当前的争论来说，针对当前托洛茨基对问题的提法来说，**工会都是一个学校**，是一个学习联合的学校，学习团结的学校，学习保护自己的利益的学校，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学习管理的学校。布哈林同志不去了解并且改正托洛茨基同志的这个根本错误，反而作了一个可笑的修正：“一方面，另一方面”。

我们来更具体地研究研究问题吧。我们看一看，作为生产管理“机关”的目前的工会是怎样的。我们已经看到，根据不完全的统计，约有九百名工人、工会会员和代表在管理着生产。当然，把这数目字增加到十倍、甚至一百倍也未尝不可，为了向你们让步并且说明你们的根本错误，甚至也可以假定在最近的将来就能有这种难以置信的“发展”速度，——就算是这样，直接**进行管**

理的人，同总数六百万的工会会员比较起来，依然是微不足道的少数。由此可以更明显地看出，像托洛茨基那样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领导层”上，只顾谈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和生产管理，而不考虑到百分之九十八点五的会员（六百万减九万等于五百九十一万，等于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八点五）**正在学习，而且还应当长期地学习下去**，那就是犯了根本的错误。不是学校和管理，而是**学习管理的学校**。

托洛茨基同志在12月30日同季诺维也夫争辩，并且毫无根据和完全错误地责备他否认“委派制”，即否认中央实行委派的权利和义务，在争辩时，他无意中说出了一个极其典型的对比：

他说：“……季诺维也夫过分从宣传的观点去处理每个实际的具体的问题，而忘记这不仅是鼓动的材料，而且是应当用行政办法加以解决的问题。”（第27页）

现在我就来详细说明，如果以行政人员的身分来处理这个问题，会是怎样的情况。托洛茨基同志的根本错误，恰恰也就在于他对他自己在纲领性小册子中所提出的问题，是以一个**行政人员**的身分去处理（确切些说，是很粗糙地处理）的，而对这些问题他本来是可以而且应当**纯粹以宣传者的身分**去处理的。

实际上，托洛茨基的好的东西是什么呢？不是在他的提纲中，而是在他的**演说**中，——特别是当他忘记了他与工会工作者中的所谓“保守”派进行笨拙的论战的时候——那种**生产宣传**无疑是好的和有益的。如果托洛茨基同志能以全俄生产宣传局的参加者和工作者的身分在工会委员会里进行实事求是的“经济的”工作，发表口头上和文字上的言论，那他一定已经给工作带来（并且一定还会继续带来）不少的益处。错误是在于“纲领性的提纲”。用行政人员的态度来对待工会组织中的“危机”，对待工会中的“两

种趋势”，对待俄共党纲的解释，对待“苏维埃工联主义”，对待“生产教育”，对待“结合”，——这像是一根红线，贯串着这个“纲领性的提纲”。我现在已经把托洛茨基“纲领”中所有的主要问题都列举出来了，在目前，根据托洛茨基所握有的材料，要对这些问题作正确的处理，就只能是以宣传者的身分。

国家，这是实行强制的领域。只有疯子才会放弃强制，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采用“行政手段”和以行政人员的身分来处理问题，在这里是绝对必需的。党呢，党是无产阶级的直接执政的先锋队，是领导者。开除党籍而不实行强制，这是一种特殊的影响手段，是纯洁和锻炼先锋队的手段。工会是国家政权的蓄水池，是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在这一领域内，特殊而主要的**不是**管理，**而是**“中央”（自然也还有地方）“国家管理机关、国民经济和**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联系**”（我们党纲经济部分中关于工会问题的第五条是这样说的）。

对这个问题提法不正确，对这种相互关系不了解，就像是一根红线，贯串着托洛茨基的整个纲领性小册子。

可以设想一下，假定托洛茨基能从另外一方面去看整个问题，联系他的纲领中的其他问题来研究一下这个最有名的“结合”。可以设想一下，假定他的小册子是专门用来解决这样的任务，即详细地研究——譬如说——九百件“结合”中的九十件的情形，研究工会会员和固定的工会运动工作人员兼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管理工业的职务和工会中选举产生的职务的情形。可以设想一下，假定他把这九十件事，跟重点进行的统计调查材料，跟工农检查院及相当的人民委员部的检察员和指导员的报告一同加以分析，就是说，根据行政机关的材料加以分析，从工作的总结和结果、生产的成绩等等方面加以分析。总之，假定是用这样的态度

来对待问题，那末这样的行政人员的态度就会是正确的，只要是本着这样的态度，那就完全可以采用“整刷”的路线，就是说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谁应当被撤职、谁应当被调职、谁应当被任命的问题上，集中在对“领导层”现时应当提出些什么要求的问题上。在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印的布哈林1月3日在彼得格勒发表的演说中，布哈林说，以前托洛茨基主张“整刷”，现在则已经抛弃了这种观点。布哈林在这里也正是陷入了一种实际上令人发笑的、理论上同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相容的折衷主义。布哈林抽象地看问题，而不会（或者说不愿）具体地来对待问题。既然我们，党中央和全党，掌握着行政管理，就是说，管理着国家，我们就决不会拒绝而且也不能拒绝实行“整刷”，即拒绝采用撤职、调职、任命、开除等等办法。但是托洛茨基的纲领性小册子里所谈的，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那里面根本没有提出“实际的问题”。季诺维也夫跟托洛茨基争论过的，我们跟布哈林争论着的，全党现在争论着的，并不是“实际的问题”，而是关于“工会运动方面的**趋势**”的问题（托洛茨基提纲第4条末尾）。

这个问题从实质上说是一个政治问题。就事情的实质——当前这一具体“事情”的实质讲来，要像布哈林（他自然是充满最人道的感情和意图的）所希望的那样，用折衷主义的修改和补充去纠正托洛茨基的错误，那是办不到的。

这里有一个而且只有一个解决的办法。

这就是，正确地解决关于“工会运动方面的趋势”、各阶级的相互关系、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以及国家、党和工会（“学校”和机关等等）的特殊作用的政治问题。这是第一。

第二，在正确地解决政治问题的基础上，进行——确切些说是不断进行——长期的、有系统的、坚持不懈的、耐心的、多方

面的、反复的生产宣传，用国家机关的名义并且在国家机关的领导下，在全国范围内不断进行这种宣传。

第三，不要把“实际的问题”跟关于趋势的争论（这种争论是“全党讨论”和广泛争论必然有的东西）混为一谈，而要实事求是地提出这些问题，在实事求是地研究问题的委员会中提出这些问题，同时要询问见证人，研究报告和统计材料，然后在这一切的基础上（必须在这一切的基础上，必须在这样的条件下），根据相应的苏维埃机关、党的机关或这两个机关的决定来进行“整刷”。

而我们从托洛茨基和布哈林那里看到的却是这样一种混合物：在对待问题的态度上犯了政治错误，割断了中间的联系和引带，迫不及待要采取徒劳的、没有效果的“行政手段”。既然布哈林用他的“玻璃杯”提出了理论根源问题，那末他们的错误的“理论”根源是很清楚的。布哈林的理论错误（在当前情况下是认识论的错误），就在于用折衷主义偷换了辩证法。布哈林折衷主义地提出问题，结果自己弄糊涂了，竟然发表了工团主义的言论。托洛茨基的错误是：片面，狂热，夸大，固执。托洛茨基的纲领是：尽管玻璃杯没有底，但玻璃杯还是一种饮具。（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449—459页）

七、恩格斯论历史唯物主义与庸俗唯物主义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中最终决定性的因素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谬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对历史斗争的进程也发生

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决定着这些斗争的**形式**，这些因素是：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结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国家制度等等），法的各种形式，甚至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及其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一切因素间存在着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数的偶然现象（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之间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以证实，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不予注意）为自己开辟道路。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恩格斯：《致约·布洛赫》。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

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例如，国家就是通过保护关税、自由贸易、好的或者坏的财政制度发生作用的，甚至德国庸人的那种从1648—1830年德国经济的可怜状况中产生的致命的疲惫和软弱（最初表现于虔诚主义，而后表现于多愁善感和对诸侯贵族的奴颜婢膝），也不是没有对经济起过作用。这对于重新振兴曾是最大障碍之一，而这一障碍只是由于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使得慢性穷困尖锐化起来才动摇了。所以，并不像人们往往为了省力而设想的那样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而是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制约着他们的既定的环境中，是在既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这些现实关系中，经济关系不论会受到其他关系——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多大的影响，但归根到底还是具

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

至于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的领域，即宗教、哲学等等，那末它们都有一种被历史时期所发现和接受的史前的东西，这种东西我们今天不免要称之为愚昧。这些关于自然界、关于人本身的性质，关于灵魂、魔力等等的形形色色的虚假观念，大都只以消极意义上的经济为基础；史前时期的低级经济发展有关于自然界的虚假观念作为补充，但是有时也作为条件，甚至作为原因。虽然经济上的需要曾经是，而且愈来愈是对自然界的认识不断进展的主要动力，但是，要给这一切原始状态的愚昧寻找经济上的原因，那就的确太迂腐了。科学的历史，就是把这种愚昧逐渐消除的历史，或者说，是用新的、但愈来愈不荒唐的愚昧加以代替的历史。从事这些事情的人们又属于分工的特殊部门，并且认为自己是致力于一个独立的领域。只要他们形成社会分工之内的独立集团，他们的产物，包括他们的错误在内，就要反过来影响全部社会发展，甚至影响经济发展。但是，尽管如此，他们本身又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支配作用的影响之下。例如在哲学上，拿资产阶级时期来说这种情形是最容易证明的。霍布斯是第一个现代唯物主义者(十八世纪意义上的)，但是当专制君主制在整个欧洲处于全盛时期，并在英国开始和人民进行斗争的时候，他是专制制度的拥护者。洛克在宗教上就像在政治上一样，是1688年的阶级妥协① 的产儿。英国自

① 指1688年英国政变。由于这次政变，在英国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确立了建立在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妥协基础上的、以奥伦治的威廉(从1689年起)为首的君主立宪制。

然神论者① 和他们的更彻底的继承者法国唯物主义者，都是真正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法国人甚至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哲学家。在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中始终显现着德国庸人的面孔——有时积极地，有时消极地。但是，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因此，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十八世纪的法国对英国来说是如此(法国人是以英国哲学为依据的)，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但是，不论在法国或是在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普遍的学术繁荣一样，都是经济高涨的结果。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也具有最终的至上权力，这在我看来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这种至上权力是在各该领域本身所规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实现的，例如在哲学中，它是通过各种经济影响(这些经济影响多半又只是在它的政治等等的外衣下起作用)对先驱者所提供的现有哲学材料发生作用而实现的。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材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多半也是间接决定的，因为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恩格斯：《致康·施米特》。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84—486 页)

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面对论敌时，曾经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这个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关系到描述某个

① 自然神论者是一种宗教哲学学说的拥护者。这种学说认为神是非人格的、有理性的世界始因，但是神不干预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在封建教会世界观统治的条件下，自然神论往往站在唯理论的立场上批判中世纪的神学世界观，揭露僧侣们的寄生生活和招摇撞骗的行为。

历史阶段，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可能有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完全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在这方面，我不能不责备许多新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这里也制造了惊人的混乱。(恩格斯:《致约·布洛赫》。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9页)

编者按：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有关于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的关系的一些话，也可供参考，摘录如下：

(6) **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现代艺术等等。这种不平衡在理解上还不是像在实际社会关系本身内部那样如此重要和如此困难。例如教育。美国同欧洲的关系。可是，这里要说明的真正困难之点是：生产关系作为法的关系怎样进入了不平衡的发展。例如罗马私法（在刑法和公法中这种情形较小）同现代生产的关系。

(7) **这种见解表现为必然的发展**。但承认偶然。怎样。(对自由等也是如此。)(交通工具的影响。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

(8) **出发点当然是自然规定性**；主观地和客观地。部落、种族等。

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例如，拿希腊人或莎士比亚同现代人相比。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

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如果说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部的不同艺术种类的关系中有这种情形，那末，在整个艺术领域同社会一般发展的关系上有这种情形，就不足为奇了。困难只在于对这些矛盾作一般的表述。一旦它们的特殊性被确定了，它们也就被解释明白了。

我们先拿希腊艺术同现代的关系作例子，然后再说莎士比亚同现代的关系。大家知道，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成为希腊人的幻想的基础、从而成为希腊〔神话〕的基础的那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同自动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吗？在罗伯茨公司面前，武尔坎又在哪里？在避雷针面前，丘必特又在哪里？在动产信用公司①面前，海尔梅斯又在哪里？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在印刷所广场②旁边，法

① 动产信用公司（Société générale du crédit Mobilier）是法国的一家大股份银行，由贝列拉兄弟创办并为1852年11月18日的法令所批准。动产信用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充当信贷的中介和滥设企业（参加工业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创立）。该银行广泛地参加了法国、奥地利、匈牙利、瑞士、西班牙和俄国的铁路建设。它的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用它所开办的股份公司的有价证券在交易所进行投机。动产信用公司用发行本公司的股票得来的资金收买各种公司的股票，动产信用公司的股票只是以它持有的其他企业的有价证券作担保，而各种公司的股票则是以它们本身的财产价值作担保的。因此，同一项实际财产产生了两倍的虚似资本：一种形式是该企业的股票，一种形式是拨款给该企业并收买其股票的动产信用公司的股票。该银行同拿破仑第三的政府有密切的关系，并受它的保护。1867年，该银行破产，1871年停业。动产信用公司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作为新型金融企业出现，是由反动时代的特征所引起的，在这个时代里，交易所买空卖空、投机倒把活动异常猖獗。中欧的其他许多国家也仿照法国的动产信用公司建立了类似的机关。

② 印刷所广场是伦敦的一个广场，《泰晤士报》的总社设在该处。

玛还成什么？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这是希腊艺术的素材。不是随便一种神话，就是说，不是对自然（这里指一切对象，包括社会在内）的随便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埃及神话决不能成为希腊艺术的土壤和母胎。但是无论如何总得是一种神话。因此，决不是这样一种社会发展，这种发展排斥一切神话地对待自然的态度和一切把自然神话化的态度；并因而要求艺术家具备一种与神话无关的幻想。

从另一方面看：阿基里斯能够同火药和弹丸并存吗？或者，《伊利亚特》①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

但是，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着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它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它

---

① 《伊利亚特》是著名的古希腊史诗，据说是传说中的古希腊诗人荷马所写。

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它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112—114 页）

八、恩格斯对于口头“唯物主义”者的指斥

对德国的许多青年作者来说，“唯物主义的”这个词只是一种词句，他们把这种词句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杠杆。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与它们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出了很少的一点成绩，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利用大量的帮助，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但是，许多年轻的德国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词句（一切都可能变成词句）来把自己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

您自己确实已经做了一些事情，您一定会注意到，在依附于党的青年著作家中间，很少有人下一番功夫去钻研经济学、经济学史、商业史、工业史、农业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有多少人除知道毛勒的名字之外，还对他有更多的认识呢！在这里新闻工作者的自命不凡必定提供一切，而结果也不过如此。这些先生们往往以为一切东西对工人来说都是足够好的。他们竟不知道马克思

认为自己的最好的东西对工人来说也还不够好，认为给工人提供的不是最好的东西就是犯罪。（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5—476页）

九、马克思、列宁论庸俗经济学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些特征

在德国，直到现在，政治经济学一直是外来的科学。古斯达夫·冯·居利希在他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中，特别是在1830年出版的该书的前两卷中，已经大体上谈到了妨碍我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因而也妨碍我国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建立的历史条件。可见，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缺乏生存的基础。它作为成品从英国和法国输入；德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一直是学生。别国的现实在理论上的表现，在他们手中变成了教条集成，被他们用包围着他们的小资产阶级世界的精神去解释，就是说，被曲解了。他们不能把在科学上无能为力的感觉完全压制下去，他们不安地意识到，他们必须在一个实际上不熟悉的领域内充当先生，于是就企图用博通文史的美装，或用无关材料的混合物来加以掩饰。这种材料是从所谓官房学——各种知识的杂拌，满怀希望的①德国官僚候补者必须通过的炼狱之火——抄袭来的。

从1848年起，资本主义生产在德国迅速地发展起来，现在正是它的欺诈盛行的时期。但是我们的专家还是命运不好。当他们能够公正无私地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在德国的现实中没有现代的经济关系。而当这种关系出现时，他们所处的境况已经不再容许他们在资产阶级的视野之内进行公正无私的研究了。只要政治经

① 第3版和第4版中是：毫无希望的。

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5—16页)

我所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从威·配第以来的一切这样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相反，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而庸俗经济学却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它为了对可以说是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日常需要，一再反复咀嚼科学的经济学早就提供的材料。在其他方面，庸俗经济学则只限于把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关于他们自己的最美好世界的陈腐而自负的看法加以系统化，赋以学究气味，并且宣布为永恒的真理。(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8页)

亲爱的弗雷德：

……

关于你所提到的庸人和庸俗经济学家的不可避免的怀疑（他们自然忘记了，如果他们把**有酬劳动算做工资**，那他们就把**无酬劳动算做利润**等等），要是科学地把它表达出来，就可归结为下面的问题：

商品的**价值怎样转化**为它的**生产价格**，在生产价格中

（1）**全部劳动似乎是以工资的形式得到报酬**；

（2）但是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在利息、利润等等名称下，采取了**成本价格**（＝资本的不变部分的价格＋工资）**的增加部分**的形式。

回答这个问题的前提是：

一、阐明**例如劳动力的日价值转化为工资或日劳动的价格**。这在本卷第五章中已经谈到。①

二、阐明**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如此等等，要阐明这个问题首先必须阐明**资本的流通过程**，因为资本周转等等在这方面是起作用的。因此，这个问题只能在第三册里加以叙述（第二卷包括第二册和第三册）。在这里将指出庸人和庸俗经济学家的这种**看问题的方法**是怎样产生的：由于反映在他们头脑里的始终只是各种关系的直接的**表现形式**，而不是它们的**内在联系**。情况如果真像后面说的这样，那末还要**科学**做什么呢？（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1867 年 6 月 27 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第 317—318 页）

……庸俗经济学无非是对实际的生产当事人的日常观念进行训导式的、或多或少教条式的翻译，把这些观念安排在某种合理的秩序中。因此，它会在这个消灭了一切内部联系的三位一体②中，为自己的浅薄的妄自尊大，找到自然的不容怀疑的基础，这也同样是自然的事情。同时，这个公式也是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因为它宣布统治阶级的收入源泉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和永恒的合理性，并把这个观点推崇为教条。（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939 页）

资产阶级经济学特有的拜物教也就由此完成了。这种拜物教把物在社会生产过程中获得的社会的经济的性质，变为一种自然

---

① 马克思是指《资本论》第 1 卷第一版第五章最后一节。在该卷第二版和以后各版中，相当于该节的是第六篇第十七章。

② 指庸俗经济学所用的三位一体公式：土地——地租，资本——利息，劳动——工资和劳动价格。参看《资本论》第 3 卷，1975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923 页。

的、由这些物的物质本性产生的性质。例如，劳动资料是固定资本这个定义，是一个引起矛盾和混乱的经院式的定义。我们在论述劳动过程时（第 1 卷第 5 章）已经指出，各种物质组成部分究竟是充当劳动资料，充当劳动材料，还是充当产品，这完全取决于它们当时在一定劳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取决于它们的职能。同样，劳动资料也只有在下面两个条件下才是固定资本：第一，生产过程一般地说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因而生产资料一般地说是资本，具有资本的经济规定性即社会性；第二，劳动资料以一种特殊方式把它们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否则，它们仍然是劳动资料，而不是固定资本。同样，肥料之类的辅助材料虽然不是劳动资料，但是如果它按照和大部分劳动资料一样的特殊方式来转移价值，那它也成为固定资本。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把各种物品加以归类的定义。问题在于表现为一定范畴的一定职能。（马克思：《资本论》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252 页）

那些较近的经济学家，例如德尔、帕西等等，他们在整个古典经济学趋于没落，甚至即将终结的时候，又重拣起了关于剩余劳动和一般剩余价值的自然条件的最原始的观点，并且在地租早已被人阐明为剩余价值的一个特殊形式和特殊部分之后，还自以为对地租提出了某种新的和独到的见解，对于这些人，我们该说些什么呢？庸俗经济学的特征恰恰在于，当那种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是新颖的、创造性的、深刻的和正确的见解，已经变成平凡、陈旧和错误的东西的时候，又把它们重新拣起来。这样，它也就供认，它对于古典经济学已经研究过的问题毫无所知。它把这些问题，和那些只能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个较低发展水平上提出的问题混为一谈。至于他们无休止地、自以为是地反复咀嚼重农学派关于自由贸易的论点，我们也可以这样说。这些论点，尽

管在实际方面还使某些国家发生兴趣，却早已失去任何理论意义了。（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85—886页）

蒲鲁东先从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法权关系中提取他的公平的理想，永恒公平的理想。顺便说一下，这就给一切庸人提供了一个使他们感到宽慰的论据，说商品生产形式像公平一样也是永恒的。然后，他反过来又想按照这种理想来改造现实的商品生产和与之相适应的现实的法权。如果一个化学家不去研究物质变换的现实规律，并根据这些规律解决一定的问题，却要按照“自然性”和“亲合性”这些“永恒观念”来改造物质变换，那末对于这样的化学家人们该怎样想呢？如果有人说，“高利贷”违背“永恒公平”、“永恒公道”、“永恒互助”以及其他种种“永恒真理”，那末这个人对高利贷的了解比那些说高利贷违背“永恒恩典”、“永恒信仰”和“永恒神意”的教父的了解又高明多少呢？（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2—103页）

……蒲鲁东先生不是直接肯定**资产阶级生活**对他说来是**永恒的真理**；他间接地说出了这一点，因为他神化了以思想的形式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

…………

所以，蒲鲁东先生必然是一个**空论家**。（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8页）

我们可以判断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滑头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既想使商品生产永恒化，又想废除“货币和商品的对立”，就是说废除货币本身，因为货币只是存在于这种对立中。这么说，我们同样也可以废除教皇而保存天主教了。（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5页）

这些教授们虽然在化学、历史、物理学等专门领域内能够写

出极有价值的作品，可是一旦谈到哲学问题的时候，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相信。为什么呢？其原因正如政治经济学教授虽然在实际材料的专门研究方面能够写出极有价值的作品，可是一旦说到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时，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相信一样。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政治经济学正像认识论一样，是一门有党性的科学。总而言之，经济学教授们不过是资产阶级手下的有学问的帮办；而哲学教授们不过是神学家手下的有学问的帮办。

无论在哲学上或经济学上，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汲取和改造这些“帮办”所获得的成就（例如，在研究新的经济现象时，如果不利用这些帮办的著作，就不能前进一步），并且要善于消除它们的反动倾向，贯彻自己的路线，同敌视我们的各种力量和阶级的**整个路线**作斗争。（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349—350页）

十、列宁论共产主义思想是人类知识积累的总汇，一定的思想联盟之必要，应该用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黑格尔的辩证法

旧学校是死读书的学校，它强迫人们学一大堆无用的、累赘的、死的知识，这种知识塞满了青年的头脑，把他们变成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官吏。但是，如果你们试图从这里得出结论说，不掌握人类积累起来的知识就能成为共产主义者，那你们就犯了极大的错误。如果以为不必领会产生共产主义学说的全部知识，只要领会共产主义的口号，只要领会共产主义科学的结论就已经够了，这也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

你们读过和听说过：主要由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科学，即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不再是十九世纪一位天才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而成了全世界千百万无产者的学说；千百万无产者已经在运用这个学说同资本主义作斗争。如果你们要问，为什么马克思的学说能够掌握最革命阶级的千百万人的心灵，那你们只能得到一个回答：这是因为马克思依靠了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那些知识的坚固基础；马克思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了解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会走向共产主义，更主要的是他完全依据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最确切、最缜密和最深刻的研究，借助于充分领会以往的科学所提供的全部知识而证实了这个结论。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

例如，当我们谈到无产阶级文化的时候，就必须注意这一点。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途径，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都通向无产阶级文化，正如马克思改造过的政治经济学向我们指明了人类社会的必然归宿，指明了过渡到阶级斗争，过渡到开始无产阶级革命一样。

当我们听到有些青年以及某些拥护新教育制度的人常常非难

旧学校，说它是死记硬背的学校时，我们就告诉他们，我们应当吸取旧学校中的好东西。我们决不能像旧学校那样，用数不胜数的、九分无用一分歪曲了的知识来充塞青年的头脑，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可以只学共产主义的结论，只背共产主义的口号。这样是不能建立共产主义的。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我们不需要死记硬背，但是我们需要用基本事实的知识来发展和增进每个学习者的思考力，因为不把学到的全部知识融会贯通，共产主义就会变成空中楼阁，就会成为一块空招牌，共产主义者也只会是一些吹牛家。你们不仅应当领会你们学到的知识，并且要用批判的态度来领会这些知识，使自己的头脑不被一堆无用的垃圾塞满，而能具备现代有学识的人所必备的一切实际知识。如果一个共产主义者不用一番极认真、极艰苦而浩繁的工夫，不理解他必须用批判的态度来对待的事物，便想根据自己学到的共产主义的现成结论来炫耀一番，这样的共产主义者是很可怜的。这种不求甚解的态度是极端有害的。要是知道自己懂得太少，那就要设法使自己懂得多一些，如果有一个人说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同时又认为自己根本不需要知道其他任何事物，那他就根本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列宁：《青年团的任务》。见《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347—349 页）

共产党员（也和一般顺利地开始了大革命的革命家一样）如果以为单靠革命家的手就能完成革命事业，那将是他们最大的最危险的错误之一。恰恰相反，革命家只能起真正富有生命力的先进阶级的先锋队的作用，要使任何一件重大的革命工作得到成功，就必须懂得这一点，并且善于实现这一点。先锋队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在各种活动领域中，不同非党员结成联盟，就根本谈

不上什么顺利的共产主义建设。(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见《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603 页)

恩格斯早就嘱咐过现代无产阶级的领导者，要把十八世纪末叶战斗的无神论的文献翻译出来，广泛地传播到人民中去。①我们惭愧的是，直到今天还没有做这件事（这是证明在革命时期夺取政权要比正确地运用这个政权容易得多的许多例子之一)。有时人们用各种“动听的”理由来为我们这种软弱无力、无所作为和笨拙无能进行辩护，例如说十八世纪无神论的老文献已经过时、不科学、很幼稚等等。这种不是掩盖学究习气就是掩盖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的冒充博学的诡辩，是再坏也没有了。当然，在十八世纪革命家的无神论著作中有不少不科学的和幼稚的地方。但是，谁也不会阻止出版者把这些作品加以删节和附以短跋，指出人类从十八世纪末叶以来对宗教作科学批判所取得的进步，指出有关的最新著作等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以为，被整个现代社会置于愚昧无知和囿于偏见这种境地的千百万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只有通过纯粹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这条直路，才能摆脱愚昧状态，那就是最大的而且是最坏的错误。应该把各种无神论的宣传材料供给他们，把实际生活各个方面的事实告诉他们，用各种办法来影响他们，以引起他们的兴趣，唤醒他们的宗教迷梦，用种种方法从各方面使他们振作起来。

十八世纪老无神论者所写的那些锋利的、生动的、有才华的政论，机智地公开地打击了当时盛行的僧侣主义。那些政论在唤醒人们的宗教迷梦方面，往往要比充斥在我们出版物中的常常歪曲（这是不容讳言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字更适合千百倍，因为这

① 参看恩格斯:《流亡者文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591 页。

些文字写得枯燥无味，仅仅是转述马克思主义，几乎完全没有选择适当的事实来加以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有比较重要的著作我们都有了译本。担心在我国人们不会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修正意见来补充旧无神论和旧唯物主义，那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最重要的事情，也是我们那些貌似马克思主义而事实上却在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往往忽视的事情，就是要善于唤起最落后的群众自觉地对待宗教问题，自觉地批判宗教。

另一方面，你们看一看用现代科学态度批判宗教的那些代表人物吧。这些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驳斥宗教偏见时差不多总要“加上”一些自己的见解，这就马上暴露出他们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奴隶，是“僧侣主义的有学位的奴仆”。

举两个例子。罗·尤·维彼尔教授在1918年出版了一本题名《基督教的起源》的小册子（莫斯科“法罗斯”出版社印行）。作者叙述了现代科学的主要成就，但他不仅没有反对教会这种政治组织的武器，即种种偏见和骗局，不仅回避了这些问题，而且表示了一种简直可笑而反动透顶的奢望：他要凌驾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极端”之上。这无异是为现在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效劳，而资产阶级则从他们在世界各国劳动者身上榨取到的利润中拿出几亿卢布来维持宗教。

德国的著名学者阿尔都尔·德列福斯在他的《基督神话》一书中驳斥了宗教偏见和神话，他证明根本就没有基督这样一个人，但在该书末尾，他却主张要有一种宗教，要有一种刷新的、去芜存精的、巧妙的、能够抵抗“日益汹涌的自然主义潮流”的宗教（1910年德文第4版第238页）。德列福斯是一个明目张胆的和自觉的反动分子，他公开帮助剥削者用更为卑鄙龌龊的新的宗教偏见来代替陈旧腐朽的宗教偏见。

这并不是说，不应该翻译德列福斯的东西。这只是说共产党员和一切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要同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结成联盟，但是当这些进步分子变成反动的时候，就要坚决地揭露他们。这只是说不敢同十八世纪（资产阶级还是革命阶级的时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结成联盟，就无异是背叛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因为通过某种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同德列福斯一流人物结成"联盟"，是我们为了同那些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蒙昧主义作斗争所必要的。（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605—607页）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撰稿人就应该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组织系统的研究，即研究马克思在他所写的《资本论》及各种历史和政治著作中实际运用的辩证法。马克思把这个辩证法运用得这样成功，以致现在东方（日本、印度、中国）的新兴阶级，即占世界人口大多数但因在历史上毫无作为和沉睡不醒至今仍使欧洲许多先进国家处于停滞和腐败状态的数亿人民日益觉醒奋起斗争的事实，新兴民族和新兴阶级日益奋起斗争的事实，越来越鲜明地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

当然，这样来研究、解释和宣传黑格尔辩证法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这方面的初步尝试不免要犯一些错误。但是，只有什么事也不干的人才不会犯错误。根据马克思怎样运用他从唯物主义来理解的黑格尔辩证法的例子，我们能够而且应该从各方面来阐明这个辩证法，在杂志上登载黑格尔主要著作的节录，用唯物主义观点来加以解释，引用马克思运用辩证法的实例，以及引用现代史尤其是现代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提供得非常多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方面辩证法的实例来加以评注。（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609页）

十一、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论最伟大的科学家是反对偏见、打破传统的创造家

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

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3页）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甚至只要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肤浅地研究的。

---

① 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Segui il tuo corso, elascia dir legenti!)——套用了但丁《神曲》炼狱篇第五首歌中的一句话。

这位科学巨匠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例如，他曾经密切地注意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发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注意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①。

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斗争是他得心应手的事情。而他进行斗争的热烈、顽强和卓有成效，是很少见的。最早的《莱茵报》(1842 年)，巴黎的《前进报》(1844 年)，《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 年)，《新莱茵报》(1848—1849 年)，《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1 年)，以及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最后是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②，作为这一切工作的完成——老实说，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别的什么也没有做，也可以拿这一成果引以自豪。

---

① 在 1882 年慕尼黑电气展览会上，法国物理学家马赛尔·德普勒展出了他在米斯巴赫至慕尼黑之间架设的第一条实验性输电线路。

② 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1864 年秋由马克思创立。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持的第一国际，领导了各国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同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流派进行了激烈斗争，巩固了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第一国际在 1872 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实际上已停止活动，1876 年正式宣布解散。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见《列宁全集》第 29 卷第 274 页)。

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纷纷争先恐后地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做蛛丝一样轻轻抹去，只是在万分必要时才给予答复。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576页）

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说了什么新东西呢？为什么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好像晴天霹雳震动了一切文明国家，而所有他的包括洛贝尔图斯在内的社会主义前辈们的理论，却没有发生过什么作用呢？

化学史上有一个例证可以说明这一点。

大家知道，直到前一世纪末，燃素说还处于支配的地位。根据这种理论，一切燃烧的本质都在于从燃烧物体中分离出一种另外的、假想的物体，即称为燃素的绝对燃烧质。这种理论曾足以说明当时所知道的大多数化学现象，虽然在某些场合不免有些牵强附会。但到1774年，普利斯特列析出了一种气体，

“他发现这种气体是如此纯粹或如此不含燃素，以致普通空气和它相比显得污浊不堪”。

他称这种气体为无燃素气体。过了不久，瑞典的舍勒也析出了这种气体，并且证明它存在于大气中。他还发现，当一种物体在这种气体或普通空气中燃烧时，这种气体就消失了。因此，他称这种气体为火气。

“从这些事实中他得出一个结论：燃素与空气的一种成分相结

合时｛即燃烧时｝所产生的化合物，不外就是通过玻璃失散的火或热。"①

普利斯特列和舍勒析出了氧气，但不知道他们所析出的是什么。他们为"既有的"燃素说"范畴所束缚"。这种本来可以推翻全部燃素说观点并使化学发生革命的元素，在他们手中没有能结出果实。但是，当时在巴黎的普利斯特列立刻把他的发现告诉了拉瓦锡，拉瓦锡就根据这个新事实研究了整个燃素说化学，方才发现：这种新气体是一种新的化学元素；在燃烧的时候，并不是神秘的燃素从燃烧物体中**分离**出来，而是这种新元素与燃烧物体**化合**。这样，他才使过去在燃素说形式上倒立着的全部化学正立过来了。即使不是像拉瓦锡后来硬说的那样，他与其他两人同时和不依赖他们而析出了氧气，然而真正**发现**氧气的还是他，而不是那两个人，因为他们只是**析出**了氧气，但甚至不知道自己所析出的是什么。

在剩余价值理论方面，马克思与他的前人的关系，正如拉瓦锡与普利斯特列和舍勒的关系一样。在马克思以前很久，人们就已经确定我们现在称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价值的**存在**；同样也有人已经多少明确地说过，这部分价值是由什么构成的，也就是说，是由占有者不付等价物的那种劳动的产品构成的。但是到这里人们就止步不前了。其中有些人，即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至多只研究了劳动产品在工人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分配的数量比例。另一些人，即社会主义者，则发现这种分配不公平，并寻求乌托邦的手段来消除这种不公平现象。这两种人都为既有的经

① 罗斯科和肖莱马：《化学教程大全》，1877年不伦瑞克版第1卷第13页和第18页。

济范畴所束缚。

于是，马克思发表意见了，他的意见是和所有他的前人直接对立的。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他认为，这里摆在他面前的不是无燃素气体，也不是火气，而是氧气；这里的问题不是在于要简单地确认一种经济事实，也不是在于这种事实与永恒公平和真正道德相冲突，而是在于这样一种事实，这种事实必定要使全部经济学发生革命，并且把理解全部资本主义生产的钥匙交给那个知道怎样使用它的人。根据这种事实，他研究了全部既有的经济范畴，正像拉瓦锡根据氧气研究了燃素说化学的各种既有的范畴一样。要知道什么是剩余价值，他就必须知道什么是价值。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本身必须首先加以批判。于是，马克思研究了劳动形成价值的特性，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并确定了价值不外就是这种劳动的凝固，而这一点是洛贝尔图斯始终没有理解的。马克思进而研究商品和货币的关系，并且论证了商品和商品交换怎样和为什么由于商品内在的价值属性必然要造成商品和货币的对立。他的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货币理论是第一个详尽无遗的货币理论，今天已为大家所默认了。他研究了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并证明这种转化是以劳动力的买卖为基础的。他以劳动力这一创造价值的属性代替了劳动，因而一下子就解决了使李嘉图学派破产的一个难题，也就是解决了资本和劳动的相互交换与李嘉图的劳动决定价值这一规律无法相容这个难题。他确定了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就第一个详尽地阐述了剩余价值形成的实际过程，从而说明了这一过程，而这是他的任何一个前人都没有做到的；因而，他确定了资本自身内部的区别，这个区别是洛贝尔图斯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完全不可能作出的，但是这个

区别提供了一把解决经济学上最复杂的问题的钥匙，关于这一点，这第二卷又是一个最令人信服的证明，以后我们会知道，第三卷更是这样。马克思还进一步研究了剩余价值本身，发现了它的两种形式，即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并且证明，这两种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发展中起了不同的然而都是决定性的作用。他根据剩余价值理论，阐明了我们现在才具有的第一个合理的工资理论，第一次指出了资本主义积累史的各个基本特征，并说明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恩格斯：《〈资本论〉第2卷序言》。见《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22页）

……从事这种科学的人虽然懂得科学中已有的传统的力量和意义，并善于为科学而利用这些传统，但他们仍然不愿作这些传统的奴隶；当旧传统、旧标准和旧方针趋于陈腐而变成前进的障碍时，这种科学有勇气、有决心打破这些旧传统、旧标准和旧方针而建立新传统、新标准和新方针。（鼓掌）

在科学发展史上有不少勇敢的人，不管有什么障碍，他们都能不顾一切而破旧立新。这样的科学勇士，像伽利略、达尔文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是人所共知的。我想要说的一位科学大师，他同时又是当代的一位最伟大的人物。这就是我们的导师和我们的教养者列宁。（鼓掌）请回想一下1917年的情况。当时列宁根据对俄国社会发展的科学分析，根据对国际状况的科学分析而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在俄国胜利是摆脱现状的唯一出路。这是当时科学界的许多人根本意想不到的结论。科学界的一位卓越人物普列汉诺夫，当时曾经轻蔑地谈论列宁，硬说列宁是在“说梦话”。科学界的其他一些同样有名的人物则硬说“列宁发疯了”，应当把他藏到远一点的地方去。当时科学界形形色色的人都咆哮起来反对列宁，说他是科学的破坏者。但是，列宁不怕逆流而进，不怕

反对守旧习气。结果是列宁胜利了。（鼓掌）

你们看，这就是一个科学勇士的典范，他大胆地进行斗争反对陈旧了的科学，并为新科学开拓道路。（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招待高等学校工作人员时的讲话》。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21—422页）

第四章　国际经验、民族特点、革命传统

一、列宁论革命科学的两个要求

科学首先要求估计到其他国家的经验，特别是其他也是资本主义的国家正在经历或不久前曾经经历过的那种非常类似的经验；其次，它要求估计到本国内部活动着的一切力量、集团、政党、阶级和群众，决不能仅仅根据一个集团或一个政党的愿望和见解、觉悟程度和斗争决心来确定政策。（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235页）

二、列宁论用批判的态度采取别国经验

在年轻的国家里开始的运动，只有在运用别国的经验的条件下才能顺利发展。但是，要运用别国的经验，简单了解这种经验或简单抄袭别国最近的决议是不够的。为此必须善于用批判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经验，并且独立地加以检验。只要想一想现代工人运动已经有了多么巨大的成长和扩展，就会懂得，为了履行这个任务，需要有多么丰富的理论力量和政治经验（以及革命经验）。（列宁：《怎么办?》。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242页）

德国的实践的工人运动也永远不应当忘记，它是依靠英国和法国的运动而发展起来的，它能够直接利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用很高的代价换来的经验，而在现在避免它们当时往往无法避免的那些错误。（列宁：《怎么办?》。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243页）

三、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论考察、研究民族的特点

这里的情况表明：即使掌握了从一个大民族本身的生活条件中产生出来的出色理论，并拥有比社会主义工人党所拥有的还要高明的教员，要用空谈理论和教条主义的方法把某种东西灌输给该民族，也并不是那样简单的事情。……

……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他们①也必须从亲身经验中学习，从本身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1889年12月7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7—468页）

……美国工人已经行动起来了，但是和英国人一样，他们在走自己的道路。不能一开始就硬塞给他们理论，但是，他们自己的经验、自己的错误和这些错误的可悲后果最后会教育他们重视理论，那时一切都会就绪的。（恩格斯：《致海·施留特尔》（1890年1月11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39页）

德国的哲学家、半哲学家和美文学家，贪婪地抓住了这种文献②，不过他们忘记了：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7页）

……至于这些国家③要经过哪些社会和政治发展阶段才能同样到达社会主义的组织，我认为我们今天只能作一些相当空泛的假设。（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82年9月12日）。见《马克思恩格斯

---

① 指英国工人。
② 指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
③ 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

全集》第 35 卷第 353 页)

……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因此我们很愿意在我们的报纸上登载有关理论问题的文章,请全体同志来公开讨论争论之点。(列宁:《我们的纲领》。见《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203—204 页)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列宁:《论民族自决权》。见《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512 页)

……如果不估计到一个国家的所有这些一般历史条件和具体国家条件,就根本无法考察这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纲领。(同上书,第 513 页)

……这位著作家既然如此高明地斥责形而上学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就是反辩证法观点)和空洞抽象的观点,我们自然也就应该期待她给我们作出一个用具体历史方法研究问题的榜样。这里所说的是在一个一定的时代——二十世纪初期和一个一定的国家——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纲领。罗莎·卢森堡想必应当这样提出问题:俄国究竟处在**什么历史**时代?**这个**国家在**这个**时代的民族问题和民族运动究竟有**哪些具体**特点?

可是罗莎·卢森堡丝毫没有谈到这一点!(同上书,第 513—514

页）

当然不能说这些意见和引证有什么新奇之处，但不管怎么样，读者感兴趣的是再一次回顾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用什么态度分析各国具体的历史问题。只要重读一下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摘录来的那些大有教益的话，就会十分明显地看到罗莎·卢森堡已经陷入何等可笑的境地。她雄辩地义愤地鼓吹必须用具体的历史的方法分析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民族问题，但是她丝毫没有打算确定一下，二十世纪初期的俄国究竟是处在什么样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这个国家的民族问题究竟有哪些特点。罗莎·卢森堡举出一些表明别人怎样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问题的例子，好像是故意在强调善良的愿望往往把人引入地狱，人们用好心的忠告掩饰自己不愿意或不善于在实际上利用这些忠告。（列宁：《论民族自决权》。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514页）

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英美工人运动的言论，同有关德国工人运动的言论比较一下，是大有益处的。如果注意到在德国和英美两国，资本主义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及资产阶级在各该国全部政治生活中的统治形式各不相同这一事实，那末这种比较的意义就更加重大了。从科学观点来看，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唯物辩证法的典范，看到善于针对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具体特点，把问题的不同重点和不同方面提到首位并加以强调的本领。从工人政党的实际政策和策略观点来看，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共产党宣言》的作者针对不同国家的民族工人运动所处的不同阶段决定战斗的无产阶级的任务的典范。（列宁：《〈约·菲·贝克尔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见《列宁全集》第12卷第345—346页）

毫无疑问，在匈牙利革命的特殊条件下，生吞活剥地全盘仿效我们俄国的策略，会是一种错误。（列宁：《给贝拉·库恩的电报记

录》。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197页)

请记住，现在无论格鲁吉亚的内部条件或外部条件都要求格鲁吉亚的共产党员不要硬搬俄国的公式，而要善于灵活地制定以对任何小资产阶级分子采取巨大让步为基础的特殊策略。(列宁：《给格·康·奥尔忠尼启泽的信》。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151—152页)

……要善于把共产主义共同的和基本的原则应用到各阶级和各政党相互关系的**特点**上去，应用到向共产主义客观发展的**特点**上去，这种特点每个国家各不相同，我们应该善于研究、探求和揣测这种特点。(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243页)

现在全部问题就是要使每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十分自觉地既考虑到同机会主义以及“左倾”学理主义进行斗争这个主要的基本的任务，又考虑到这种斗争由于各国经济、政治、文化、民族成分(例如爱尔兰等)、所属殖民地以及宗教派别等等特征而具有的并且必然具有的**具体特点**。现在到处都可以感到对第二国际的不满，这种不满正在蔓延和增长，这一方面是由于它的机会主义，一方面是由于它不会或者不能建立一个真正集中的、真正领导的中心，一个能在革命无产阶级为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而进行的斗争中指导无产阶级的国际策略的中心。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样的领导中心无论如何不能建立在斗争策略规则的千篇一律、死板划一、彼此雷同之上。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运用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

使之正确地适应和运用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245—246页）

……以具体历史条件为出发点，把辩证地提问题当作唯一正确的提问题的方法，——这就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见《斯大林选集》上卷第81页）

决不容许把民族有权利自由分离的问题和某一民族在某一时期是否一定要实行分离的问题混为一谈。对于这个问题，无产阶级政党在每个不同的场合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截然有别地加以解决。（斯大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会议（四月会议）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见《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49页）

党对这些民族的劳动群众的任务……就是帮助他们消灭父权制封建关系的残余，并且以劳动农民苏维埃为基础，通过在这些民族中间建立坚强的共产党组织的办法帮助他们参加苏维埃经济建设，这些共产党组织要能够利用俄罗斯工人和农民在苏维埃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同时要能够在自己的建设工作中估计到每个民族的具体经济状况、阶级结构、文化和生活习惯的一切特点，而不是机械地搬用只适用于另一种经济发展较高阶段的俄国中部的经济措施。（斯大林：《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见《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22页）

……边疆地区共产党组织的发展是在某些特殊条件下进行的，这些条件阻碍了党在这些地区的正常成长。一方面，在边疆地区工作的大俄罗斯共产党员是在“统治”民族存在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民族压迫，往往缩小民族特点在党的工作中的意义，或者完全不重视民族特点，在自己的工作中不考虑某一民族的阶级结构、文化、生活习惯和过去历史的特点，因而把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政策庸俗化和歪曲了。这种情况就使他

们脱离共产主义而倾向于大国主义、殖民主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另一方面，当地土著居民中的共产党员经历过民族压迫的苦难时期，他们还没有完全摆脱民族压迫的魔影，往往夸大民族特点在党的工作中的意义，抹杀劳动者的阶级利益，或者把某一民族劳动者的利益和这一民族“全民族的”利益简单地混淆起来，不善于把前者同后者区别开来，根据劳动者的利益进行党的工作。这种情况也就使他们脱离共产主义而倾向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有时具有大伊斯兰主义、大突厥主义① 的形式（在东方)。(斯大林：《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见《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23页)

……显然，在实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政策时，一定要注意到我们在这些边疆地区所碰到的经济状况、阶级结构和过去历史方面的一切特点。更不用说有些荒唐的事情是必须消除的，例如柯尔克兹伊斯兰教居民从来不养猪，而粮食人民委员部却按摊派方式要他们交猪。(斯大林：《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的报告》。见同上书第33页)

……“左派”②的罪过在于他们不善于灵活地对待居民中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分子和仅仅对我们忠顺的分子，他们不善于也不愿意灵活地去吸收这些分子，他们歪曲了党的掌握国内大多数劳动人民的路线。可是这种既能灵活地同民族主义作斗争，又能灵活地吸收比较忠顺的分子加入我们国家机关队伍的灵活性和本

① 大伊斯兰主义是一种宗教政治思想，它宣传一切信奉伊斯兰教（回教）的民族联合成一个整体。大突厥主义所抱的目的就是使突厥语系的一切民族受土耳其的统治。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俄国反革命分子曾利用大伊斯兰主义和大突厥主义来反对苏维埃政权。

② 指苏共边疆党内民族问题上的“左派”。

领，无论如何必须培养和锻炼出来。只有估计到我们在我们各地区和各共和国内所遇到的全部复杂性和特殊性，只有不简单地搬用在中部工业区所创造的一套办法（这套办法是不能机械地搬到边疆地区去的），只有不抛开居民中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分子和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小资产者，只有学会吸收这些分子参加一般的国家工作，才能培养和锻炼出这种灵活性和本领。“左派”的罪过在于他们沾染了宗派主义习气，不了解党在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地区内的这些复杂任务的头等重要性。

……“左派”对于党的危险就在于他们醉心于他们的简单的轻率的“共产主义”，会使我们党脱离农民和当地居民中的广大阶层。

…………

……必须鞭策“左派”，教会他们机动灵活，善于随机应变，以便掌握广大的居民群众。（斯大林：《有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地区负责工作人员参加的俄共（布）中央第四次会议。关于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地区内的右派和“左派”》。见《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253—255页）

……在解决无产阶级战线和人民战线的问题时，不可能有适用于一切情况、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万应灵药。在这个问题上，要讲普遍性，要对一切国家应用同一药方，倘若允许我这样说的话，那就等于愚昧无知；而愚昧无知，即使在它趾高气扬的时候，不，特别在它披着千篇一律的公式的外衣而趾高气扬的时候，是应该予以打击的。（季米特洛夫：《工人阶级统一起来反对法西斯》。见《季米特洛夫选集》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38—139页）

……我们……应该根据明显的、通俗的论据，并根据那对待人民群众的民族心理特点的正确而周密的方法，来展开一种广泛的思想斗争。（季米特洛夫：《法西斯的进攻与共产国际的任务》。见同上书

第111页）

共产党员，如果觉得这一切事情都和工人阶级的事业毫无关系，不按正确的历史观点，不拿真正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列宁斯大林主义的精神，去向群众讲解本民族的历史，又不把今天的斗争与本民族的革命传统及革命历史联系起来——那就等于自愿地把所有本民族历史上一切可贵的东西交给法西斯的历史伪造者，让法西斯去欺骗群众。

不，同志们，我们关心一切重要问题，不仅现在和未来的问题，还有我们本民族过去的问题。我们共产党员并不追求那种基于工人行会利益的狭隘政策。我们不是气量狭小的工会工作人员，也不是中世纪手艺人和工匠的行会首领。我们是现代社会中最重要最伟大阶级——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的代表，而工人阶级所担负的使命就是要使人类解除资本主义制度的灾害，这个工人阶级已经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面上摆脱了资本主义的枷锁，而且成为统治阶级了。我们保卫一切被剥削的劳苦阶层的切身利益，即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里面绝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

我们共产党人在原则上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但我们并不是民族虚无主义的拥护者，也决不应该这样做。以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工人和一切劳动人民，是各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之一。可是，任何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以为这样就是允许他、甚至强迫他嘲笑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一切民族情感，那末，他就决不是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也没有了解列宁和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指示。

列宁始终一贯地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在他1914年所作《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傲心》的论文中，给了我们一个正确地对待民族情感问题的例子。他写道：

“我们大俄罗斯觉悟的无产者是不是歧视民族自傲心呢?当然是不歧视的！我们酷爱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祖国，我们最努力于把祖国劳动群众（即祖国十分之九的居民）提高到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觉悟生活的程度。我们因目睹皇朝刽子手，贵族和资本家对我们这个美妙祖国肆行横暴，压迫和侮辱而最觉伤心。我们因这种暴行在我们人民中间，在大俄罗斯人民中间受到反抗，因从这些人民中间产生了拉吉舍夫，十二月党人，七十年代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因大俄罗斯工人阶级在 1905 年造成了群众的强大革命党，……等等事实而自傲。

“……我们满怀着民族自傲心，因为大俄罗斯民族也造成了革命阶级，也证明它能够向人类作出争自由争社会主义的伟大模范，而不只是一些大规模的蹂躏，大批绞架和拷问室，大规模的饥荒，以及向神父、沙皇、地主和资本家逢迎献媚的极大丑态。

“我们满怀着民族自傲心，且正是因此，我们也就特别痛恨我们自己的奴隶式的过去……和我们自己的奴隶式的现在，因为现在这些地主和资本家帮助下，又为了压服波兰和乌克兰，为了镇压波斯和中国的民主运动，为了加强玷污我们大俄罗斯民族荣誉的罗曼诺夫、波布林斯基和普里什克维奇一流匪帮势力，而把我们骗去作战。”①

这就是列宁写的论民族自傲心的一段。

同志们，法西斯分子在莱比锡审讯中企图诬蔑保加利亚人为野蛮民族，我认为当时我是正确的，我保卫了保加利亚劳苦大众的民族荣誉，现在他们正在英勇地对法西斯强盗、真正的野蛮人作斗争；我认为当时我也是正确的，我曾声明说，我绝没有耻于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 21 卷第 84—89 页。

做保加利亚人的理由，相反地，我却因为自己是英勇的保加利亚工人阶级之子而引以自豪。

同志们，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必须像生物驯化那样，“适应”各国的环境，以便在它的所在地扎下深根。在个别国家，无产阶级斗争的和劳工运动的民族形式，并不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相矛盾，相反地，正是这些形式能够胜利地保障无产阶级的国际利益。（季米特洛夫：《法西斯的进攻与共产国际的任务》。见《季米特洛夫选集》1953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111—114 页）

四、列宁论在一定条件下利用革命传统

马克思非常珍视革命的传统，严厉斥责对革命传统的背叛和庸俗的态度，而同时要求革命家善于思考问题，善于分析采用旧斗争手段的条件，而不是简单地重复已知的口号。1792 年法国的“民族”传统可能永远是某些革命斗争手段的典范，但是，马克思于 1870 年在著名的第一国际《宣言》中，提醒法国无产阶级不要错误地在不同时期的条件下搬用这些传统。①

我们也应该这样。我们应该研究采取抵制的条件，我们应该向群众灌输这样的思想：抵制有时是革命高潮时期完全合理的和必要的手段（不管那些枉费心机地滥用马克思名字的学究说些什么）。但是现在是否存在着这个高潮，是否存在着宣布抵制的这个基本条件，这个问题必须善于独立地提出来，并且认真分析材料，

① 指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中写的一段话：“法国工人应该执行自己的公民职责，但他们不应该让人家用 1792 年的民族传统来迷住他们，如像法国农民曾经让人家用第一帝国的民族传统来骗住他们一样。他们不是应该重复过去，而是应该建设将来。”（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 1 卷第 476 页）

加以解决。我们的责任就是尽我们的力量准备这种高潮的到来，并在适当的时机，不要放弃抵制，可是，如果认为抵制的口号总是可以用来对付任何不好的或很不好的代议机关，那是绝对错误的。（列宁：《反对抵制》。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732页）

……西欧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历史、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我国工人运动的经验——这些就是我们在制定我们党的适当的组织形式和策略时所必须掌握的材料。但是对这些材料应该进行独立的“整理”，现成的范例是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俄国工人运动的条件与西欧工人运动完全不同，所以在这一点上抱某种幻想是很危险的。另一方面，俄国社会民主党同俄国过去的一些革命政党有根本的区别。我们固然必须向俄国老一辈的大革命家和大秘密活动家学习（我们毫不犹豫地承认这种必要性），但是我们不能因此不对他们抱批判的态度，不能因此而不独立制定自己的组织形式。（列宁：《我们的当前任务》。见《列宁全集》第4卷第193页）

附录二：

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

海涅著

（1931——1945 年译）

* 艾思奇对海涅的这本诗作，情有独钟，他从 1931 年开始，利用工作的余暇，断断续续，坚持不辍，到 1945 年夏才译完，交由当时调往重庆《新华日报》工作的林默涵同志，经千辛万苦，带给读书生活出版社负责人黄洛峰同志。1946 年在重庆读书生活出版社第一次出版。1951 年改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54 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第二版。译文系根据莫斯科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海涅选集》译出。

序

下面的诗，是我今年1月在巴黎写成的。当地的自由空气尖锐地贯注在许多章节里，远远超过了我原来的愿望，我曾继续把一些不适合德国气候的东西加以冲淡和删削。虽然如此，3月间当我把原稿寄给我的汉堡① 的出版者，仍然有许多的顾忌被提出来要我考虑。我必须再一次进行那令人讨厌的修改工作，修改到使严肃的声音不必要地更加钝滞，或者用幽默的铃声轻快地完全把它掩盖。有些赤裸裸的思想，我在急躁不安的心情中又把它们的无花果叶②扯掉，对于矜持而多忌讳的耳官，恐怕会有点伤害。这使我抱歉，但我用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比较伟大的作家，都曾犯过类似的过失。我不想把阿里斯托法涅斯③ 提出来为这样的辩解作证，因为他是一个执迷的异教徒，而且他的雅典读者们，虽然享受了一些古典教育，却很少懂道德。把塞万提斯和莫里哀给我作证要好得多；前者的著作是为着两大州郡的高等贵族们而写的，后者是为着凡尔赛的大君主和大宫廷！啊！我忘记了，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十分资产阶级化的时代，我很遗憾地预料到，斯普

---

① 汉堡(Hamburg)，德国的最大的城市之一，海涅在少年时期曾在那里住过很久。

② 无花果叶，裸体雕像上用以遮盖阴部的饰物。

③ 阿里斯托法涅斯（公元前448? —前380?)，古希腊第一个喜剧诗人，他的作品在谐谑中充满对社会政治的讽刺。

里[1] 河上（要不就是阿尔斯特[2] 河上）有教养的阶层中的许多妇女们，对于我寒伧的诗章会要轻蔑地皱起那多少有些弯曲的鼻子！但令我抱着更大的遗憾预想到的，是那国粹主义的伪君子们的救命呼声。他们现在怀着恶意，跟政府走着同一的步调，并享受着检查官们充分的宠爱和尊重，能在日报上说话，而那上面所要攻击的敌人，也就是他们的无上统治权的敌人。我们从心底里武装着来反对这些穿着黑、红、金三色制服的狂妄走卒们的责难。我已经听见他们合唱了："你竟敢诽谤我们的彩色，你这祖国的叛徒，法国人的朋友，你想把莱茵割让给法国！"放心吧你们！我会尊敬你们的彩色，倘若它是值得尊敬的，倘若它不再是懒惰而卑劣的儿戏。把黑、红、金色的旗子，培植在德国思想的高峰上，使它成为自由人类的旗号，那我就愿意为它付出满腔热血。放心吧你们！我爱祖国也不比你们差。正为着这样的爱，才使我十三年的生活都在亡命中度过。也正为着这样的爱，我又回到亡命中，说不定要永久流亡下去，而无论何时决不啜泣，或作出一种愁眉苦脸的难堪样子。我是法国人的朋友，也正如我是一切人的朋友，只要他们是有理性和善良的。同时因为我还不是那么愚蠢和卑劣，以至于希望那同属于人道主义之选民的我们德国人和法国人牺牲头颅，来满足英国与俄国的利益，来引起这地球上一切贵族地主与僧侣们幸灾乐祸的笑声。放心吧！我决不会要把莱茵割让给法国，只为着非常简单的理由：因为莱茵是属于我的。[3]我是自由莱茵河的更极自由的儿子，我的摇篮时代就在它的岸上，我不能设想莱

① 斯普里（Spree）河上，指柏林。

② 阿尔斯特（Alster）河上，指汉堡。

③ 莱茵河（Rhine）岸上的杜塞尔道夫城（Düsseldorf）是海涅诞生与成长的地方。

茵河可以属于任何其他人，而不属于土生土长的孩子。要我把亚尔萨斯洛林合并到德意志帝国来，自然不是想得那么容易的事情。因为那块地方的人民，由于他们在法国大革命中所获得的权利，由于那些非常适合资产阶级的兴趣，而对于广大群众的胃口却不够满足的平等法律和自由宪章，是密切地与法国联系着的。自然，亚尔萨斯和洛林人也可能和德国结合起来，倘若我们把法国开始了的东西完成，倘若事实上表现出这优越点，一如我们在思想上所作的，倘若我们能向这思想的最后结论突进，倘若我们把君臣关系加以摧毁，一直到它最后的藏身地，一直到天上，倘若我们把现世界人间里生活着的上帝，从堕落中挽救出来，倘若我们成为上帝的解放者，倘若我们使穷困的被剥夺了幸福权利的人民，使被蹂躏的天才和被污辱了的美丽获得他们的地位，如我们伟大艺人所说过的和歌唱过的一样，也如我们，我们年轻人所希望的一样——真的，不只是亚尔萨斯和洛林，就是全法国那时也将会归向我们，全欧洲，全世界，——全世界也会成为德意志的。我常常梦想到这样的使命和世界权威，当我在槲树荫下散步的时候。这就是我的爱国主义。

我将要在最近的一部著作里，再来发挥这一个主题，用最后的决心，用断然的大胆，总之，用忠诚。对于强硬的反对论，我将会给以尊重，只要它是出自一种确信。就是最粗鲁的敌对态度，在这种情形下我也将会忍耐地予以宽恕，我甚至于愿意向白痴进行解说，只要他表现了真诚。我的全部无言的轻蔑，是要送给那没有气节的小丑，他由令人讨厌的嫉妒心或肮脏的私人恶念出发，想要在舆论前面来毁损我良好的名声，为此还用了爱国主义的假面具，要不就用宗教的或道德的假面具。政治上和文学上的德国新闻界的无政府状态，就在这一点上，常常受到一种高度技巧的

利用，使我简直不能不为之惊异。实在的，舒服特列① 并没有死，他还活得很久，并且好多年来就是文学盗匪，在我们无法无天的日报森林里活动，隐藏在每一株灌木和每一片叶子下面，听从他们尊严的主子的最轻微的口哨指挥。

还有一句话，《冬天的童话》算是目前经霍夫曼和坎姆伯所出版的《新的诗章》的末卷，为着要能够单独出版，就必须把这诗交给监临在上的官厅去领受特别的照顾，而新的更改和删削，就是这更高裁判的收获。

亨利·海涅

1844 年 9 月 17 日于汉堡

① 舒服特列（Schufterle），意思是坏蛋，席勒的悲剧《强盗》中的一个次要的人物。

一、新的歌

凄凉的十一月，
日子已渐渐阴郁，
风把树叶摘落，
我走上德国的旅途。

来到国境，
强烈的心跳振撼着胸底。
并且，真的，
连眼泪也开始滴沥。

听见德国的语言，
使我有异样的感觉，
好像我心脏的血液溢出了，
它舒畅地衰弱下去了。

一位小小的琴女在歌咏，
用真实的感情，
和假的嗓音，但她的弹唱，
却使我非常动心。

她歌唱着爱，和爱中的恨，

歌唱着牺牲，
歌唱着那天上的、更好的世界里的重逢，
说那儿没有愁恨。

她歌唱着地上的眼泪，
歌唱那一瞬即逝的狂欢，
歌唱那被华光照耀着的灵魂，
他们是沉醉在永远的欢悦中，在彼岸。

她歌唱的是古时绝望的曲调，
是在民众痛苦哀泣的时候，
能将他们送入昏睡中的，
那天上的催眠曲调。

我知道这些旋律，这些歌词，
知道这些词句的作者大师们。——
他们在屋里私自饮酒，
在门外却假意用水劝人。①

新的歌，更好的歌，
啊！朋友，让我替你们制作——
我们要在地上
建筑起天国。

---

① 屋里饮酒，门外劝水，指伪善的僧侣，女孩所唱是宗教性质的歌，故作歌者为僧侣。

我们要在地上得到幸福，
再不愿老是饥肠辘辘，
再不愿把勤劳的两手获得的东西，
拿去饱那吃闲饭的肚腹。

为着一切的人们，
这地上有足够的面包产生。
玫瑰花呀，常春树呀，美呀，乐呀，
甜豌豆呀，也能同样孳生。

是的，豆荚裂时，
甜豌豆便是属于万人的，
天上的乐园吗？
让你们天使和麻雀拿去！

我们死后若能生出翅膀，
我们就到天上拜访你们，
在那儿我们要和你们一道，
同吃最幸福的蛋糕和点心！

新的歌，更好的歌，
它和笛、提琴一样畅快地响着。
忏悔的歌声止息了，
丧钟也沉默着。

处女欧洲，

和美丽的自由天使订婚，
他们拥抱，
他们正迷醉于最初的接吻。

虽然没有僧侣的祝福，
这仍是合法结婚，
万岁呀，这对新郎新妇，
万岁呀，他们未来的子孙！

我的歌，是结婚赞美歌，
是更好的、新的歌，
最高感激的星光，
在我的心中闪灼。

感激的星光，它会热烈地焚烧，
熔流而成火焰的河川。
我感到自己变得无比地坚强，
我甚至能把槲树折断！

踏上德国的国土以来，
灵妙的液体便流贯了我的全身。
巨人① 再一次触到了他的母体，
他身上就又有新的力量长成。

---

① 巨人，指希腊神话中的安泰。安泰是大地的儿子，他同人角力时，只要一触到自己的母亲大地，即能得到不可战胜的力量。

二、税关的检查

女孩颤动着歌喉，
弹唱着天国的幸福，
这时普鲁士的税关人员，
正在搜查我的行李什物。

他们都在搜求，
翻乱了手巾、裤子和衬衣，
他们要搜求的是，
花边、珠玉和违禁的书籍。

可怜虫们！你们竟在行李中搜求?!
在那儿什么也寻找不出！
我从旅途上偷运来的违禁物品，
只在我的头脑里藏着。

在头脑里我藏着精巧的花边①，
比布鲁塞尔② 或麦雪恩③ 所产的更为精良。

---

① 花边，原文是Spitze，兼有锥刺的双关意味。
② 布鲁塞尔（Brussels），比利时首都。
③ 麦雪恩（Macheln），亦名马里尼斯（Malines），比利时都市，与布鲁塞尔同以制造花边著名。

倘若打开了它，
它就锥刺你们，推倒你们！

在头脑里我藏着宝石，
有未来荣光的金刚石。
有新的神圣，未知的巨人们的
圣堂中的宝物。

并且还有许许多多的书籍
我敢保证说：
我的头脑是压缩了的
许多书籍鸣啭其中的鸟巢。

就是恶魔的文库里，
也没有比这更恶的书籍，
它是更极危险，
胜过法列士勒本① 的著作。

一个旅客站在我的身旁，
他告诉我，说我已在眼前

① 法列士勒本(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1798－1874),德国的资产阶级诗人,1842年因出版一本《非政治的诗》,被反动的普鲁士政府撤除在布累斯劳大学的教授职位。但他的诗没有真正革命的内容,海涅曾讽刺过他。

看见了普鲁士的关税同盟①，
看见了税关巨大的锁钥

“关税同盟”——他说——
“是我们国粹的基石，
分裂了的祖国，
借此可以统一。

“它把外表的、所谓物质的统一，
赐与了我们。
为着精神的、思想之真正的统一，
又有书籍的检查。

“检查把内的统一，
思考和冥想中的统一给与了我们，
内外同齐统一的德国，
是我们的必要物。”

① 关税同盟，1834年普鲁士发起的德意志各国（奥地利除外）的经济同盟。普鲁士靠它来支配全德意志的商业政策，奠定了以普鲁士为中心的德意志统一的基础。海涅为了统一的民主德国而斗争，反对反动的普鲁士所领导的关税同盟。

三、无聊的亚琛[①]

在亚琛市的古寺院里，
埋葬着卡欧路斯·麦格努斯②。
不要把他误认作那
活在夏本③ 的卡尔·麦耶尔④。

我不愿做皇帝而死，
埋在亚琛的寺院里，
这远不如做最小的诗人，
活在纳加河畔的斯徒凯尔特⑤。

---

① 亚琛（Aachen），在德国莱茵区，为德国最古市府之一。市内有查理曼大帝（742—814）陵墓。

② 卡欧路斯·麦格努斯（Carolus Magnus），查理曼大帝的拉丁名字的译音。

③ 夏本（Schwaben），德国南部一个地区，因德国种族支派夏本人而得名。

④ 卡尔·麦耶尔（Karl Mayer，1786—1870），夏本诗派的诗人，这个诗派，聚集了德国南部最落后与反动的诗人，以狭隘的民族主义著称，因此，海涅对他们不断地加以讽刺。这一整节是文字游戏：拉丁文 Carolus 在德文是 Karl，而 mayer 在拉丁文是 major，和 magnus 一样，都是“大”的意思。

⑤ 斯徒凯尔特（Stukkert），夏本人对斯徒加特（Stuttgart）的叫法。斯徒加特在莱茵河的支流纳加河畔，系夏本首邑，夏本诗派的诗人从事文学活动的中心地。

连狗也厌倦了亚琛，
匍匐着在街上求人：
“外来人啊！踢我们一脚吧！
给我们解一解忧闷！”

在这无聊的巢穴里，
我各处徘徊了一阵。
又看见了普鲁士的军人，
仍然没有多大变更。

仍是那高高的红领，
配着那灰色的大衣，
那红色，正如克尔纳① 歌唱的，
象征着法国人的血液。

仍是木头样迂腐的种族，
每一个动作仍然是直角，
而那面容里却有着
冻凝了的高傲。

仍硬直着像踩高跷，
仍蜡烛似的笔挺，

① 克尔纳（Karl Theodor Körner，1791－1813），德国诗人，在德国对拿破仑（Napoleon I，1769－1821）进行战争时期，曾写过不少民族主义的歌曲，海涅常嘲笑他和他的作品。

他们好像吞下了
人们用来鞭打他们的棍子。

是的，刑棍并没有消灭，
他们还把它放在心里，
亲昵的“尔”，会仍然
使他们追念旧时的“彼”。①

那长的髭须，不过是
新式的发辫罢了，
旧时向后垂的辫束，
现在却垂吊在鼻梢。

骑兵的新服装倒好，
我应该加以赞美，
尤其是那尖盔②，那有着
向天直指的钢铁尖头的盔。

这真有骑士风度，使人想起

---

① “尔”，原文作 Du，是对亲信人使用的第二人称。“彼”原文作 Er，原是第三人称，德国古语借用作对下级和亲信人的第二人称。海涅在这里引用的是军官对军人的第二人称。

② 普鲁士王腓得烈·威廉四世（Frederick Wilhelm IV，1795—1861）在 1842 年到 1843 年改良普鲁士军队的服装，开始采用中世纪式的有着钢铁尖头的钢盔。

前代优美的罗曼蒂克，
想起梦特浮根的城堡夫人约汉娜①，
想起福格男爵、乌兰、蒂克②。

使人美妙地想起中古时代，
想起那些扈从与卫士，
他们背上背着族徽，
内心里是一秉忠直。

使人想起十字军，骑士的竞技，
想起那求爱，和对女人的虔诚奉侍，
想起那没有印刷出来的信仰时代，
那时还看不见报纸。

真的，真的，我喜欢盔，
它表现着最高的机智，
这是一种壮丽的奇想，
有不少锥头和尖刺！

但是，只怕有了雷雨，

① 约汉娜是《梦特浮根的约汉娜》(Johanna von Montfaucon) 中的女主角，该剧为德国剧作家柯兹培（August Friedrich von Kotzebue，1761—1819）所作，取材14世纪，把中古时代加以理想化。

② 福格男爵（Freiherr Fouqué，1777—1843）、乌兰（Johann Ludwig Uhland，1787—1862）、蒂克（Ludwig Tieck，1773—1853），三人都是浪漫派作家，所作诗歌与小说多取材中世纪的传奇故事。这里海涅故意用乌兰、蒂克与罗曼蒂克（浪漫派）押韵。

像这样的尖头，就容易
把天空里现代的电闪，
引进你浪漫的头里。

并且，一旦若有战争，
就要买更为轻便的头巾，
因为中世纪的重盔，
会妨害你们逃遁。

在亚琛的驿舍招牌上，
我又看见了那大鸟①，
我深深厌恶的大鸟！
用毒眼，它注视着我。

你这丑恶的鸟，什么时候
你若落在我的手里，
我就撕去你的毛羽，
用斧斩断你的脚爪。

然后把你放在竿上，
高高地向空中撑起，
再召集莱茵州② 的枪手，

① 大鸟，指当时普鲁士专制政府的大鹰国徽。

② 莱茵州（Rhineland）与法国相邻，颇受法国影响，不论在工业或政治上，均为当时德国最先进的一州。

来一次痛快的射击。
谁为我把鸟射落，
我送给这勇士王笏和王冠，
我们要吹起喇叭，
向他高呼：“我王万岁！”①

① 在射击比赛的时候，通常这样欢呼，来迎接胜利者——“射手之王”。

四、科隆[1] 的大教堂

很迟的傍晚，我来到科隆，
那儿听见莱茵河的流水声，
德国的空气已经向我吹煽，
我感到了它的影响——

它影响我的口味，
我吃了火腿和煎蛋，
因为它咸得太够，
我只得再喝莱茵葡萄酒。

莱茵酒，总是像黄金一样，
在绿色高脚杯里放光，
你多饮了几杯，
就觉得一片芬芳。

芬芳的刺激是那么甜蜜，
使人快乐得无法自抑！
我不由地向朦胧的夜色中走出来，

---

① 科隆（Koln），莱茵河中游的一个商业都市。市内有著名的大教堂。下文所谓“圣都科隆”，即指此而言。

走进有回声的街巷里去。

石造的房屋都向着我注视，
好像要告诉我一些故事，
告诉我那无法稽考的
圣都科隆远古时代的历史。

是的，这儿曾经有修道的人，
度过他们虔敬的一生，
这儿有乌里希·封·胡腾① 所描写过的，
那支配一切的蒙昧人②。

这儿曾有僧侣和尼姑，
跳过中世纪的堪堪舞③。
科隆的门则尔④，霍赫斯特拉顿⑤，

---

① 胡腾（Ulrich von Hutten，1488－1523），有名的人文主义者、诗人、演说家，路德的主要信徒之一。

② 蒙昧人（Dunkelmann），这个称呼出自《蒙昧人信札》(Epistolae Obscurorum Virorum)，指科隆的反动僧侣，这部书一部分是胡腾所著。

③ 堪堪舞（Cancan），中世纪一种猥亵的舞蹈。

④ 门则尔（Wolfgang Menzel，1798－1873），德国反动的历史家和诗人，曾经告发进步作家，建议禁止他们的著作。他和杨（参看本书《秃陀堡的森林》一章）一党，是反动的普鲁士国家主义者，并曾著文反对过海涅。本书序中所抨击的就是他。

⑤ 霍赫斯特拉顿（Jakob von Hochstraeten，1454－1527），科隆反动僧侣的代表人物，也就是胡腾所攻击的蒙昧人中的一个，他是路德的最初反对者之一。

曾在这儿写他有毒的告密信。

这儿曾有柴堆发出火焰，
把书籍和人命一齐吞咽，
同时到处都发出钟声，
并歌唱着“天主矜怜我们”。

愚昧和恶行在这里献媚，
好像那没有管束的街头群狗。
从他们信仰的憎根上，
我们今天还认得出那血缘子孙。——

试看看吧！在那月光里，
一个庞大的躯体，
它耸立着，像恶魔般漆黑，
它就是科隆的大教堂。

它是精神的巴士底狱① ——
狡猾的教皇至上论者曾这样想道：
“有着这样巨大的囚牢，
德国的理性就会衰亡了！”

① 巴士底狱(Bastille)，原是一座古堡，法国的专制帝王把它改作监狱，用来囚禁革命者。法国大革命时为人民所击毁。

然而却走来了路德①，
喊出了他伟大的一声："停住！"
就从那一天起，
中止了大教堂的建筑。②

它没有被完成——这正好，
正因为它没有完成，
它就给德国的力量
和新教的使命作了纪念碑。

你们大教堂同盟③ 可怜的骗子，
你们想用软弱的手，
去继续那中断了的工作，
完成古旧的暴君的城堡。

愚痴的妄想！绝望地
你们摇振着募捐袋子，
甚至向异教徒和犹太人乞求施舍，
一切都是空的，都没有结果。

---

① 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的领袖。

② 科隆大教堂的建筑起始于1248年，宗教改革后曾有数百年建筑中断，到1880年才全部落成。

③ 大教堂同盟，1842年天主教教会人士在科隆组织的集团，目的是继续建筑科隆大教堂。

伟大的佛兰兹·李士特①，
来为大教堂奏乐，也是无益，
雄才大略的君主②，
来发表演讲，也于事无济。

它不会完成了，那科隆的大教堂，
即使有夏本的愚人们，
为着它的继续建造，
运来了满船的石块。

它不会完成了，不怕有一切
乌鸦和鸱枭的叫吵，
他们受惯了旧式的教育，
喜欢停伫在高高的教堂塔顶。

是的，甚至还有这样的时辰，
人们不但不把它完成，
还要把它内部的空间，
改变成一间养马的厩房。

“把大教堂变成马房，

① 佛兰兹·李士特（Franz Liszt，1811－1886），匈牙利音乐家，在19世纪30年代初期，他曾崇拜自由主义思想，但是在1842年9月，他却公开演奏，募集修建科隆大教堂的基金。

② 雄才大略的君主，指普鲁士王腓得烈·威廉第四，他曾发起修建科隆大教堂。

那么，还有三个圣王①，
他们是住在教堂内神龛里的，
我们将把他们来怎样办？”

我听见这样的质疑。但我们处在
我们的时代，还有什么顾虑？
三个圣王是东方来的，
他们也可以到别地方去。

就依我的劝告，把他们
装进那三个铁笼里，
它们高挂在明斯特② 的一座塔上，
塔的名字叫圣蓝伯蒂③。

三巨头中如有一个不在，
就把另外的人找来，
找一个西方的王，
来代替东方的王。

---

① 三个圣王，指《圣经》中的三个东方的博士。基督诞生时，他们曾到伯利恒来朝拜他（见《新约马太福音》）。三个博士的传说，到了7世纪演变为三个圣王的传说。1169年，三王的遗骨被移到科隆来，供在三个圣王的圣堂内。（参看本书《梦里的自由》一章第十八节。）

② 明斯特（Münster），威士特法仑省（Westfalen）的一个城市。

③ 圣蓝伯蒂（Sankt Lamberti）教堂，在明斯特，塔顶上有三个铁笼，在1536年，里边曾装着被处死刑的三个德国农民运动领袖的尸体示众。

五、父亲莱茵

我来到莱茵桥① 边，
歇息在岸旁堡垒的前面，
我看见父亲莱茵在流动，
流动在沉静的月光之中。

“久违了！我的父亲莱茵，
你一向过得怎样？
我常常记起了你，
对你怀着热望和想念。”

我说着，就听见水的深底里，
发出全然异样的、幽怨的声音，
就像老年人轻咳似的，
一种哓舌和轻微的呻吟。

“欢迎你，我的青年！我很高兴，
因为你没有把我忘记，
我已经十三年没有见你，

---

① 莱茵桥（Rheinbrücke），架在美因斯城（Mainz）和对岸卡斯提尔之间的桥，壁白利在这里的西北一英里远的地方。

在这中间我过得很不顺利。

“我在壁白利地方吞下了石头，①
那滋味真的够受，
但在我胃里压得更重的，
却是尼古拉斯·白克②的诗句。

“它歌吟着我，以为我
还是最纯洁的处女，
以为还不曾有人
把我荣誉的花冠夺去。

“我听见这糊涂的诗，
真想摘尽我这白色的胡须，
我真想淹死了我，
在我自己的水里！

“我并不是纯洁的处女，
法国人就知道得很详细，
我的水曾有多少次数，

① 由于利用河运，拿骚公国与莱茵流域的海森公国之间发生了争执。为了阻碍拿骚船只在莱茵河通过，海森政府在1841年在壁白利附近沉下了103只载着石头的驳船。根据联邦国会的决定，海森人得把沉下去的石头捞出来。

② 尼古拉斯·白克(Nikolas Becker，1809—1845)，德国诗人，1840年他风闻法国人拟进攻德国，曾写了一首咏莱茵河的诗，这首诗很受当时的民族主义者的欢迎，但是诗作得很坏。诗的第一句是：“不让他们占有莱茵河。”

被他们用来洗濯胜利的武器。

“糊涂的诗，糊涂的家伙，
他卑劣地毁谤了我，
他甚至使得我
在政治上丢了脸。

“因为如果法国人现在回来，
一定会把我羞死，
虽然我曾流泪祷告上帝，
希望他们再能回到此地。

“我是永远那么爱着他们，
那可爱的小小的法兰西人，——
他们还照常唱歌跳跑吗？
他们还穿着白色的短裤子吗？

“我很愿意和他们再见，
但我却害怕被人嘲笑，
为着那令人诅咒的歌，
为着那样的诽谤。

“阿弗烈·德·缪塞①，那顽皮少年，

---

① 缪塞（Alfred de Musset，1810－1857），法国诗人，他曾写了一首诗答复白克，有这样的句子：“我们占有过你们的莱茵河。”

也许会成为他们的先锋，
他也许会成为一个鼓手，
向我敲打出最坏的嘲讽。”

这样苦诉着的可怜的父亲莱茵，
他简直不能使自己平静，
我于是说了许多安慰的话，
想振作他的心情。

“哦！不要怕！我的父亲莱茵，
不要怕那些法国人的讥刺，
他们已不是从前的法国人，
他们所穿的也是另外的裤子。

“那裤子是红的，而不是白的，①
并且还缝着另外的扣子。
他们不再唱歌，不再跳跑，
他们垂着头，像在深思。

“他们也研究哲学，并且谈到康德、费希特② 和黑格尔。
他们吸烟，他们喝酒，

---

① 拿破仑的时代，法国士兵穿白裤子；拿破仑之后，改穿红裤子。
② 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和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德国哲学家，与海涅同时代的人。

许多人还要去玩九柱戏①。

“他们已成了俗物，全像我们，
而那结果还更恶劣。
他们已不再是伏尔泰② 的崇拜者，
他们成了恒斯登伯尔格③ 的信徒。

“不错，他还是一个顽皮少年，
那阿弗烈·德·缪塞。
但用不着害怕，我们有办法，
钳住他那卑劣的毒舌。

“他若向你敲出恶意的嘲讽，
我们就给他宣扬一个更坏的，
我们用喇叭大声给他吹出
他在美貌妇女中间的悲剧。

“安静了吧，父亲莱茵！
不要再去想那恶劣的诗句，
你马上就会有更好的诗——
我们再会吧！愿你安息。”

---

① 九柱戏，立柱九根而以大木球撞倒的一种游戏。

② 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法国作家、思想家，反对天主教会和封建主义，在1717年曾因抨击路易十四的朝政而被关入巴士底狱。

③ 恒斯登伯尔格（Ernst Wilhelm Hengstenberg，1802－1869），德国柏林大学教授，一个狭隘的反动的神学者。

六、属　　吏

帕格尼尼① 的身边，
常陪伴着一个随身的精灵，
有时是狗，有时是去世了的
乔治·哈理士② 的现形。

每一件重大的事情发生，
拿破仑总看见一个红衣男人，③
苏格拉底也有他的灵魔，④
而且不是头脑里的造作。

我自己，在夜间，
一坐到书桌前面，
就常常看见一个人，蒙着脸，
阴森森地站在我的后边。

---

① 帕格尼尼（Nicolò Paganini，1782—1840），意大利提琴家、作曲家。

② 乔治·哈理士（Georg Harrys，1780—1838），德国诗人，自 1831 年在汉诺威发行《大喇叭》（Posaune）杂志，他并且经常是帕格尼尼演奏会的主持者。

③ 这是关于拿破仑的传说。

④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纪元前 469—399）相信他身内有一个内在的灵魔，他听得到这个灵魔的声音，并且绝对服从它的指使。

在斗篷下面，他藏着一件东西，
奇特地闪着光的东西，
它露出来时，我觉得是屠刀，
是把杀人的屠刀。

他显现着矮胖的形体，
那眼球就像两颗明星；
他也不来妨碍我的写作，
只在那儿静静地站定。

我已经多年没有见他了，
这位奇怪的兄弟，
现在他又突然出现，
在科隆寂静的夜里。

我沿着街道漫步沉思，
又看见他在后面跟我。
就好像是我的影子，
我站定了，他也跟着停脚。

停着脚，好像他在等待什么，
我开始走起来，他又跟着我，
我们就是这样，
走到大教堂广场的中央。

我不能忍耐了，转过身来，

向他说："告诉我吧，
你为什么总在路途上跟我，
在这夜的荒地里？

"我常常在这样的时候和你相见：
当我的心胸里生出了
世界的感情，当我的头脑里
射过了精灵的闪电。

"你这样死死地盯着看我——
告诉我，你藏着的是什么，
那斗篷下面秘密地闪着光的？
你是谁？你要干什么？"

他却用嘶嗄的声音回答，
甚至还有点迂缓，
"我求你，不要驱逐了我，
并且也不要声张。

"我不是过去的幽灵，
也不是坟墓里的草帚，
我并不接近哲学，
修辞学也不是我的朋友。

"我有的是实践的天性，
我永远沉默而且安静，

但你知道，你心里想到什么，
我就做，我就实行。
“多少的年月都过去了，
我却从没有休息，
除非你所想的都变成实际。
你想着，而我，我就在处理。

“你是法官，我是差役，
我用仆人的驯服替你执行，
执行你所高兴的判定，
即使这判定并不公平。

“古时罗马的执政官，都有一个属吏，
替他拿着屠刀，走在他的前面。
我也是你的属吏，但你的屠刀，
却应该跟在后面。

“我是你的属吏，我始终不变地
拿着闪光的杀头的屠刀，
跟在你的后面，我是
你的思想的实践。”

七、梦里的自由

我回到屋里睡眠，
好像是天使摇我入睡，
德国的床是这样温柔，
因为被褥里都衬着毛羽。

我常常是多么怀念啊！
这故乡的被褥的甜蜜，
当我躺在坚硬的床板上，
在失眠的亡命夜里。

在我们这毛羽的床上，
人就会睡得很好，梦也甜美。
德国的灵魂在这儿就感到自由，
像脱却一切尘世的系累。

它感到了自由，并且
向高高的天空飞起。
德国的灵魂呀！你的飞翔
是多么值得骄傲，在你的夜梦里！

你飞近神灵，神灵也要失色，

在你飞行途程中，
甚至无数的星宿，
也要被你的翅膀扫走。

法国人和俄国人占有了陆地，
海洋是属于英国人的，
我们的支配权却不用说，
只是在梦中，在天空的王国里。

在这儿我们掌握着领导权，
在这儿我们就不会被割裂；
而其他国家的人民，
却是在平坦的地上发展。

当我睡熟了时，我就梦见，
我又在明朗的月光下面，
沿着古旧的科隆城里的
有回声的街市漫步游走。

并且在我的后面，又走着
那黑色蒙脸的随行者。
我是那么疲劳，膝盖战栗了，
但我仍不断地向前行走。

我们向前走去，我的心脏，
在胸中裂开了，

红色的血的点滴，
滑出这心的伤口。

我屡次用手指蘸血，
屡次在路途上，
用我的血液，
在人家的门柱上涂染。①

当我每次用这方法，
给一间房屋作标记时，
远处就传来一声丧钟，
悲哀地呻吟着，声音幽缈。

月亮在天上变成苍白色，
它变得越来越阴郁了，
粗犷的云影追逐着它，
就像黑色的骏马。

而那黑暗的人影，
却仍然带着隐藏的屠刀，
老是跟随着我，
我们就这样走了很久。

---

① 中世纪德国有一种秘密法庭，谁家的门口有了红色的记号，这家的主人就已被秘密法庭注册。海涅在这里所说的，是指对德国反动势力进行社会复仇的象征。

我们走了又走，
终于走近大教堂的广场。
门是大开在那儿，
我们就走进了教堂。

夜和沉默和死，
支配在巨大的空间里，
到处点燃着许多吊灯，
为的衬托出黑暗的势力。

我长久地沿着柱子漫游，
耳朵里只有那随行者的
脚步的声音，就在这儿，
他也还是步步紧跟着我。

我们终于来到一个场所，
那儿有乍明乍灭的烛火，
有闪耀着的黄金和宝石，
三个圣王的圣堂就在这里。

可是这三个圣王，
平时是静静地睡在这里。
哦！真奇怪！现在他们却在石棺上面，
坐得端端正正！

奇技地修饰着的三架尸骸，

把王冠戴在那发黄的、寒伧的
头盖骨顶，还有王笏，
也握在那枯骨的手里。

他们摇动着那久死的骸骨，
就像一些傀儡。
他们散布着霉臭，
也散布着香火的气息。

其中的一个还掀动了嘴，
发出一篇长长的长长的演讲，
他向我竭力解说，说为什么
他渴望着我的敬仰。

首先因为他是死人，
其次因为他是王者，
第三因为他是圣贤——
这全得不到我的同感。

我回报他以讥笑的心情，——
你的努力全是徒然！
我知道你是过时的东西，
不论在任何一点。

滚开！从这里滚开！深处的墓穴，
才是你们天然的住所，

生活马上就要前来没收
这个圣堂的财宝。

马上就有快乐的骑兵队，
要来驻扎在这大教堂里，
你若不好好走开，我就要
用暴力，用棍棒来赶你。

我说着，就转过身来，
看见沉默的随行者的可怕的屠刀，
发着骇人的光闪——
这随行者，他明白了我的目语。

他走近来，用屠刀，
把那迷信的骸骨
斫成碎粉，他无情地
把他们打倒了。

这打击的回声，从圆屋顶里
轰震出来，使人战栗。
我的胸中涌出了血的急流，
而我也就突然惊醒。

八、密尔海姆[1]的回忆

从科隆到哈根[2]的邮车，价钱是
普鲁士洋五他列尔六格洛舍。
不幸邮车都客满了，
我只好乘雇用的马车。

是湿润而灰色的秋末早晨，
泥泞中的车辆像在挣扎。
虽然是这样恶劣的路途和天气，
我全身却充满着甜蜜的快意。

这正是我故乡的空气！
发热的脸颊觉到了它的吹息！
那陆路上的粪土，
也是我祖国的污泥。

马儿摇动着尾巴，
像旧相识那么亲切，
它们粪便的小球，在我眼里，

① 密尔海姆（Mülheim），从科隆到哈根路上的一个城市。
② 哈根（Hagen），在科隆东北，是从科隆到汉堡路上的一个城市。

也正像阿塔兰塔[①] 的苹果一样出色。

我们驰过密尔海姆，这城市很秀丽，
人们是沉默而且勤力，
我前次来到这儿，
是在三一年的五月天[②] 里。

那时的一切都装饰着鲜花，
太阳的光线也在发笑，
鸟儿唱着热恋的歌，
人们都在希望，在思考。——

他们想："瘦瘪的骑士们，
不久该会走开了，
那时就要从铁制的长瓶里，
把饯行酒给他们倾倒。

"然后自由才会来临，带着游戏和舞蹈，
带着那旗帜，那白、蓝、红的三色旗[③]。
也许它还要从坟墓里

① 阿塔兰塔，希腊神话中美丽而善跑的少女，她要求她的求婚者赛跑，谁要是输给她，就被杀死，赢了，就能娶她。希波密内士从女神维纳斯那里得来三只金苹果，在赛跑时把它们抛在路上，阿塔兰塔俯身去捡，因而失败。

② 1831年4月底，海涅决定离开祖国，动身到巴黎去安身。他从汉堡到达莱茵河一带时，已是5月。

③ 白、蓝、红的三色旗，是莱茵州的旗帜，海涅希望莱茵州能脱离普鲁士的羁绊。

拥出拿破仑一世，即使是个死尸！”

啊！上帝！骑士是照样留在此地，
而且这些骗人的东西，
初来时是纺锤一样的瘦瘪，
现在却养成了肥大的肚皮。

这些苍白的恶汉，他们的外表
都像有着慈爱、希望和信仰，
后来都滥饮了我们的葡萄酒，
都长上了一个血红的鼻子。

自由也变成跛脚，
再也不能跳跃奔驰。
那巴黎的三色旗帜，
也只能在塔上悲伤地眺望。

那皇帝曾经再度崛起①，
无奈英国的虫蛆，
又把他改变成静默的人，

① 皇帝指拿破仑一世，1815年拿破仑从厄尔巴岛（Elba）逃回来，在很短的时期内重得了政权。在滑铁卢战役，他被联军击溃，第二次放弃帝位，被英国政府放逐到圣赫勒拿岛（St. Helena）上。

他只好任人再来葬埋了自己。①

我曾亲眼看见他的葬仪，
看见金色的灵车，
上面有金色的胜利天使，
载着那金色的棺材前进。

走过香榭丽舍②，
通过凯旋门，
穿过浓雾，踏过白雪，
迂缓地推进着送葬的行列。

音乐悲痛到不能成声，
寒气冻木了奏乐的人们，
军旗上的大鹰顾盼着我，
那样子也很忧闷。

人们都好像着了魔障，
旧时的回忆使他们茫然——
大帝国的美妙梦境，
再一次死灰复燃。

---

① 拿破仑在1821年5月5日死于圣赫勒拿岛，1840年12月19日在路易·菲力普（Louis Philip）的指示下，尸体改葬在巴黎残疾军人养老院(Hòtel des Invalides)。

② 香榭丽舍（Champs-Élysées），巴黎的一条大街。

那一天我哭了，
泪水涌出我的眼眶，
当我听见那久被遗忘了的、
亲切的呼声："万岁，国皇！"

九、哈根的中餐

从科隆出发，
是清晨的七点三刻时分，
午后三时我们才进中餐，
这时我们刚到了哈根。

桌上都罩着台布，这儿所吃的，
全是德国古式的肴馔。
你好啊？我的酸泡菜，
令人销魂的是你的芳香！

嫩绿的白菜加上炖栗，
这是我儿童时代吃过的东西，
故乡的干鳘鱼，你们好啊！
在黄油里看你们游得多么伶俐！

在一个痴情者的心里，
故乡总是永久地高贵，——
鸡蛋和熏鲱鱼，
蒸黄了更合我的口味。

香肠在滚油里欢唱，

画眉鸟加上苹果酱，
这是正直的烧烤小天使，
“欢迎”——她们这样对我叫唤！

“欢迎，老乡！”——她们这样叫唤——
“这儿你缺席太久了，
你跟着外国雀鸟，
在外国流荡得太久了。”

桌上还站立着一头鹅，
她是一个静默的、温良的家伙，
当我和她都还年幼的时候，
她也许还热爱过我。

她向我瞥了一眼，是那么有深意，
那么热诚，那么忠实，那么伤感。
她的确有着优美的灵魂，
但肉质却不很柔软。

又来了一个猪头，
放在锡盘的中央，
在我国，猪的嘴鼻上，
仍老是饰着月桂的圈环！

一〇、威士特法仑的弟兄

离开哈根时已是夜晚，
我感着一种奇特的寒意
透彻了五脏，到了乌那① 时
才在客店里取得了温暖。

那儿看见一位可爱的姑娘，
亲切地她给我倒出五味的酒浆，
金丝一般的是她的卷发，
两眼是柔和得就像月光。

轻细的威士特法仑语调，
我又能快乐地加以欣赏。
甜蜜的记忆从酒浆里蒸腾出来，
引起我对可爱的弟兄们的回想。

可爱的威士特法仑人，我常常
和他们痛饮，在格廷根② 地方；

---

① 乌那（Unna），在哈根东北，也是从科隆到汉堡路上的一个城市。

② 格廷根（Göttingen），海涅在格廷根大学时，曾加入当时的大学生社团威士特法仑同乡会。

我们要饮到互相交头拥抱，
一直醉倒在桌底的地上。

可爱的、善良的威士特法仑人，
他们那么永远令我喜欢，
那么忠实，那么可靠，而又坚强，
没有任何虚饰和夸张。

他们斗剑的姿势多么漂亮，
像有狮子的心一般勇敢，
在第四和第三段的冲刺① 上，
他们的手法显得多么专诚，多么坚强。

他们善于饮酒，善于打仗，
他们向人伸出手掌，
来表示友爱时，他们就会痛哭，——
他们是多情善感的槲树②。

上天保佑你，高贵的人民啊！
它会祝福你的种子兴旺，
它将保护你，不要受战争、虚名、

① 第四和第三段的冲刺，原文是 Quarte 和 Terze，是西洋击剑手法的术语。

② 槲树 (Eiche)，在德国生长很多的树，被德国人看作忍耐、坚强、勇敢的象征。

英雄和英雄行为的摧残。

它会让你的儿子，
常受到小小的试探，
再让你的女儿，
变成可爱的新嫁娘，——阿门！

一一、秃陀堡的森林

这是秃陀堡的森林，
曾被塔西陀描写过的，
这是古典的泥沼，
瓦尔乌斯① 曾在里面藏匿。

这儿他被柴鲁斯基的族长打败，
被赫尔曼，那值得尊敬的英雄，
德意志民族取得胜利，
就在这泥泞之中。

若不是赫尔曼和他的
金发的游牧人民一战而胜，
德意志就不会再有自由，
我们就都要变成罗马人。

那时我们祖国里支配着的，

---

① 瓦尔乌斯（Publius Quintilius Varus），古罗马帝国的将军，公元6年作了日耳曼人组成的军队司令，在向北侵略的行军中，引起了日耳曼人大反抗，9年被赫尔曼（Hermann，罗马名叫 Arminius）打败在秃陀堡（Teutoburger）森林，全军覆没而自杀。古罗马历史家塔西佗（Tacitus，55？—117）曾描写过这一战役。

将只是罗马的语言和规矩，
女灶神将被供奉在闵兴，①
夏本人都要被称作公民。

恒斯登伯尔格将是一个肠卜者②，
会在牛羊的肚肠里搜索，
奈安达③ 将是一个占卦人④，
守望着那一群群的鸟雀。

比尔希-裴费⑤ 会要喝松香酒，
就像那罗马妇女的行为。
(据说她们这样做了，
会叫小便也有特别的香味。)

劳麦⑥ 将不是德国的 Lump⑦，
他将是罗马的 Lumpazius⑧，

---

① 闵兴 (Munchen)，即慕尼黑 (Munich)。

② 肠卜者 (Haruspex)，古罗马时用牲畜的肚肠占吉凶的卜人。

③ 奈安达 (Johann August Wilhelm Neander，1789—1850)，柏林的神学者和教会历史家。

④ 占卦人 (Augur)，观察鸟群的飞向占吉凶的人。

⑤ 比尔希-裴费 (Birch-Pfeiffer，1800—1868)，德国女演员和剧作家。

⑥ 劳麦 (Friedrich Ludwig Georg von Raumer，1781—1873)，德国反动历史家，以其温和的自由主义观点而自夸。

⑦ 德文，意思是流氓。

⑧ 拉丁文，意思是流氓。

弗莱里格拉特① 将要写无韵的诗，
就像高贵的傅拉古斯·贺拉修斯②。

那粗暴的叫花子，杨③ 老爹，
他将被称作 Grobianus④。
Me hercule!⑤ 马斯曼也要讲拉丁语，
被称作 Marcus Tullius Massmanus⑥。

爱真理的朋友，将被驱到竞技场上，
去和狮子、鬣狗、狼犬等撕斗，
而不是在小册子上，
去对付那些走狗。

---

① 弗莱里格拉特（Ferdinand Freiligrath，1810－1876），19 世纪 40 年代德国政治诗人之一，最初以浪漫精神和怪诞的韵律写诗，海涅曾经嘲笑过他。后来他写革命的诗，海涅对他的评价很高。

② 傅拉古斯·贺拉修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纪元前 65—8），罗马诗人。Horatius 在德文里叫作 Horaz（贺拉兹），见本章第十四节。

③ 杨（Friedrich Ludwig Jahn，1778－1852），德国的体育学家和政论家，国家体育协会的组织者，极端的反动分子，宣传中世纪思想。海涅称他为叫花子，因为他曾得过普鲁士政府的津贴。

④ 这是文字游戏。Grobian 是德文，意思是粗暴的人。us 是拉丁文字尾。这里把德文 Grobian 加以拉丁化。

⑤ 拉丁文，意思是："赫尔库勒斯神啊!""天啊!"

⑥ 马斯曼（Hans Ferdinand Massmann，1797－1874），德国的体育学家和语言学者。海涅因为他强调德国国粹，把他和罗马的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 106—43）相比。

我们将只有一个尼禄① 皇帝，
而不是三打之多的君主②，
我们会切断了自己的血脉，③
为着反抗那奴隶的监督。

谢林④ 会是一个塞涅卡⑤，
在同样的困境里殒没，
对我们的柯耐流士⑥ 我们会要说道：
Cacatum non est pictum。⑦

谢谢上帝！赫尔曼打了胜仗！
他赶走了罗马的人们，
瓦尔乌斯和他的军团都败倒了，
我们还照样是德国人。

我们是德国人，还说着德国的语言，
就像我们曾经说过的同样语言，

---

① 尼禄（Nero，37－68），古罗马的暴君。
② 三打之多的君主，指当时德国国内还有很多各自独立的封建小诸侯。
③ 古罗马时奴隶受虐待过甚，往往切断自己的血脉自杀。
④ 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1775－1854），德国古典哲学家。
⑤ 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前4？—65），罗马哲学家，曾作过尼罗的师傅，后尼罗以反叛嫌疑罪命其自杀。
⑥ 柯耐流士（Peter von Comelius，1783－1867），德国历史与宗教画家。
⑦ 拉丁文，意思是：涂抹不算是绘画。

驴子仍叫作 Esel，不叫作 asinus①，
夏本人仍是夏本人，并不改变。

劳麦仍是一个德国的 Lump，
并获得了勋章，上面有大鹰的标帜。
弗莱里格拉特仍用韵语写诗，
并没有成了贺拉兹。

谢谢上帝，马斯曼并不讲拉丁语，
比尔希—裴费也只写点戏剧，
她并没有喝松香酒，
像那妖媚的罗马妇女。

哦！赫尔曼，我们都要归功于你！
人们为着你——这是当然的事情，
在德特摩尔② 建立一座纪念碑，
而我自己也曾列名。

① 拉丁文，意思是驴子。
② 德特摩尔 (Detmold)，秃陀堡森林东边的城市，民族主义分子提议在全德国募捐，在那里修建一座纪念碑，纪念赫尔曼。

一二、狼的嗥叫

在夜的森林里，车马颠簸着
向前进行，突然有爆折的响声，
一个车轮脱臼了，使我们停下来，
这实在令人有些气闷。

马车夫下了车，跑进村子里。
我独自留在森林的中心，
来度过这午夜的时光，
周围听见一种嗥叫的声音。

这是豺狼①，它们嗥叫得
这样粗野，还带着饥饿的声音，
就像黑夜里的明灯一样，
燃烧的眼睛闪出幽微的光明。

它们确知道了我的到来，
这些野兽们，为着向我表示敬仰，
它们给森林带来灯光，
并表演了它们的合唱。

---

① 诗人在这里指的是那些坚定的革命者。

这是一个小夜曲，我明白了，
这是来庆祝我，
我立刻振作我的姿势，
用热情的态度起来演说：

“狼弟狼兄们！我今天很荣幸，
得停留在你们的中心，
这儿有很多高贵的伙伴，
用着热爱来向我吼吟。

“这一瞬间给我的感动，
是宏大到无法计量，
啊！这样美丽的夜乐，
我永远也不会遗忘。

“我感谢你们的信任，
这是你们给我的光荣，
这在每一次的试炼开头，
你们都给与确实的证明。

“狼弟狼兄们！你们对我没有怀疑，
你们不会落进无赖们的陷阱，
他们曾向你们造谣，
说我已加入了狗群。

“说我就要作羊栏里的

枢密顾问官，说我将会背信，——
这样卑劣的谣言，
全不值得我来辩明。

“我有时也穿羊的衣装，
这只是为着取暖，
相信我，它决不能移动我，
使我对羊的幸福也存幻想。

“我不是羊，我不是狗，
不是枢密顾问，也不是阔嘴鳖。
我仍是一个狼，我有着
狼的牙齿和狼的心。

“我是豺狼的身分，也要永久
和豺狼们一起发出嗥声，
信赖我，并救助自己，
那时上帝也会救助你们。”

这就是我的演词，
是毫无准备的辞令，
柯尔卜① 拿来刊进一般新闻里，
却被删削而成了畸形。

---

① 柯尔卜(Gustav Kolb，1798—1865)，当时德国的《一般新闻》(Allgemeine Zeitung)的编者，他为了能通过审查，常常删改海涅的巴黎通讯。

一三、不幸的救世主

太阳在帕得波恩① 上升，
呈现着非常颓败的容颜，
它实际上度着可厌的生涯——
要照亮这顽劣的地面。

它把地球的一面照亮了，
又带着光辉飞跑，
当它赶去照另一面时，
原来那面又变成了黑牢。

西锡法斯② 的石头老向下滚，
达奈乌斯女儿③ 的桶永远不会装满。
太阳要照亮地球，
也只是徒劳往还！

---

① 帕得波恩（Paderborn），在科隆东北约120英里地远的一个城市。

② 西锡法斯，希腊神话里的人物，他建设了科林多市，而成为王。西锡法斯性情非常贪婪诡诈，死后被罚在地狱里把一块大石推到山顶上去，但是每当他快要推到的时候，这块大石又滚回到山脚下。

③ 达奈乌斯王有50个女儿，除了一个叫作海波姆涅斯查的以外，都奉父命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因此被罚在地狱里打水装满一个没底的桶。

当着晨雾已经消失，
我看见那个人的塑像，
耸立在曙光中的路旁，
他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每看见你一次，我总有
满肚子的忧愁，我的亲人，
你想要使世界解放，
你这全人类的救主，你这痴人！

他们把你虐待了，
那些高级议会里的大人先生，
谁叫你也毫无顾忌，
敢封教会和国家大发议论。

你不幸生在那样的时代，
那时印刷术远未发见，
否则你会写一本书，
发表你对天的意见。

倘有讽刺世人的文句，
检查官会替你涂去，
你蒙受了检查官的恩典，
也许就能把磔刑避免。

啊！只要你把你山上的教训，①
换成了另外的言语，
你有的是足够的才气和能力，
就能够保护你的利益！

兑换商人，银行家，甚至都给你
用鞭子赶出圣殿，②
不幸的狂信者啊！而你现在竟被吊在
十字架上，成为警戒后人的先例。

---

① 据圣经上的传说，耶稣曾在山上讲道，指责自私自利的教会的人（见《新约路加福音》）。

② 据圣经上的传说，耶稣曾把圣殿里所有做买卖的人赶出去，推倒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和卖鸽子的人的凳子（见《新约马太福音》）。

一四、太阳，你这控诉的火焰！

湿润的风，枯裸的地面，
车马在泥泞道上颠连，
我的内心在唱着，响着，
“太阳，你这控诉的火焰！”

这是古代歌曲的尾韵，
我的乳母① 曾常常唱吟——
“太阳，你这控诉的火焰！”
它响着号角般的声音。

歌词唱一个杀人凶手，
他生活得快乐而优游，
但终被吊死在树林里，
悬挂在老杨柳的枝头。

凶手的死刑判决宣言，
钉紧在杨柳树干上面，
复仇者这样处分罪行——

① 海涅的乳母名叫齐贝尔(Zippel)。海涅从她口里听到过许多童话、歌谣和民间故事。

“太阳，你这控诉的火焰！”

太阳是个控诉者，是它
使凶手的罪恶被发现。
娥悌里① 临死时也叫道：
“太阳，你这控诉的火焰！”

想到了歌，就也想到了
我那乳母，慈爱的老人，
我又见她那苍黄的脸，
和满脸的褶皮与皱纹。

她生长在明斯特地方，
她能讲可怕的妖魔传，
童话，以及民间的歌谣，
她都有着丰富的肚藏。

我的心脏是怎样悸动，

① 娥悌里（Ottilie），德国民歌中的女英雄；当她被凶杀的时候，叫着太阳为她复仇。

当老人讲到一位王女，①
她梳着那金色的头发，
孤寂地独坐在荒郊里。

她的职务是看守鹅群，
作了鹅女，她赶着鹅群，
傍晚再从城门通过时，
她站定了，她非常伤心。

因为她看见一个马头，
高高地悬钉在那城头，
那原是她的可怜的马，
她骑着它到异国漂流。

王女深深地叹息着说：
“哦！法拉达，你这样吊着！”
那马头也向下面叫道：
“哦！可怜，你是这样流落！”

王女深深地叹息着说：

① 指格林童话中有名的《看鹅的王女》的故事。一个死了丈夫的王后，决定把她的独女嫁给远方的一个王子。她叫王女骑一匹会讲话的马法拉达，并由一个侍女护送。在半途中，侍女威胁王女，把新娘的衣服骗过来自己穿上，冒充王女嫁给了王子，并把真的王女当看鹅女来使唤。侍女还下令杀死那知道一切秘密的法拉达，把它的头悬在城门上。但马头仍会讲话，看鹅的王女每次从城门走过时，便和它交谈。最后揭穿了侍女的秘密，把她钉在桶里处死，王女与王子乃得团圆。

“倘若呀被我妈妈察觉！”
那马头也向下面喊道：
“她的心呀一定要疼破！”

我听时是紧闭着呼吸，
当老人严肃地、轻声地
讲到那红胡子① 的事迹，
讲到我们神秘的大帝。

她安慰我，说他没有死，
学者们也相信是事实，
他平安地躲藏在山里，
同着他的武装的战士。

山的名字叫作基甫屋②，
那里面有着一个洞府，
有高高的圆顶的厅堂，
吊灯的光是那么阴郁。

第一间厅堂用作御厩，

① 红胡子，指神圣罗马帝国和德意志皇帝腓得烈一世（Friedrich Barbarossa，1123—1190），他在1152年即位，参加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190年骑马渡过小亚细亚则列夫河的急流时淹死。

② 基甫屋（Kyffhaeuser），位于图林根和瓦敦哈兹，哈茵莱之间的丘陵地带，山南有长达1300米的基甫屋洞府。德国民间曾非常敬仰红胡子大帝，传说他并没有死，却安全地回到德国来，一直坐在基甫屋洞府里的石凳上，把头支在手腕上睡觉，每百年醒一次。

里面饲养着良马数千，
它们装配得非常华丽，
它们都站在秣槽前面。

这些骏马都非常平静，
不踢一脚，也不发嘶声，
它们都装着鞍，带着辔，
默默地，好像用铁铸成。

在第二间厅堂的中间，
士兵们躺在枯草上面。
几千兵士，都有着胡须，
和武勇的、反抗的容颜。

从头到脚都配着武装，
他们，所有的这些好汉，
全都在那儿不摇不动，
只沉沉地进入了睡乡。

第三间厅堂里堆着的，
全是盔甲、钢铁和银器，
全是刀剑、长枪和战斧。
还有古法兰克的火器。

大炮很少，但已够多了，
因为这全都是战利品，

中间高插着一面大旗，
上面的颜色是黑、红、金。

大帝住在第四间厅堂，
已过了几百年的时光，
他坐在石凳上，石桌前，
他把头支持在手腕上。

他的胡须，拖长到地面，
是红色，好像一堆火焰，
他常蹙紧着他的眉头，
他有时也闪动着两眼。

他是在睡，还是在凝想，
没有人能够完全看穿，
然而，倘若是时候到了，
他就强烈地全身摇撼。

紧抓着那漂亮的旗帜，
他就大叫道："上马！上马！"
他的战士就醒来，跳起，
地上就响起一片嘈杂。

每个人都向马上飞身，
马踢动着脚，发出嘶声，
他们驰向嘈杂的世界，

队伍里有悠扬的号声。

他们很善骑，也很会打，
他们不顾一切地冲杀，
大帝下了严厉的判决，
他要把凶手拿来惩罚。

高贵、美貌惊人的少女，
金色卷发的日耳曼尼亚①
就是被这凶手陷害的，——
“太阳，你这控诉的火焰！”

多少人都以为能藏躲，
微笑地在城堡里坐着，
他逃不过报复的绞绳，
逃不过红胡子的怒火。

多么可爱呀！多么甜蜜，
这老乳母的童话语言，
我迷信的心欢呼着说：
“太阳，你这控诉的火焰！”

① 日耳曼尼亚（Germania），指日耳曼。

一五、红胡子的马匹

一阵细雨淅淅地落下了，
冰冷，就像缝针的尖端。
马儿悲伤地摇动着尾巴，
它流着汗，在泥泞里挣扎。

马车夫吹起号角，
他吹着我所熟悉的古歌——
“三个骑士向城门驰去了！”①
使我感到梦一样的情调。

它使我想睡，我竟睡了，
看呀！我终于进入了梦里，
我仿佛也在那奇异的山中，
陪伴着红胡子大帝。

他已不再坐在石凳子上，
不再凭在石桌前，像石像一样，
他也不再那样威严，
像人们平常的想像。

① 德国的古代歌曲。

在厅堂里他踱来踱去，
和我交谈着琐屑的言语，
他向我谈论他的奇珍和宝物，
显出一副骨董家的神气。

在武器的厅堂里，
他解说那战棍的使用方法，
他用鼬皮在一些剑上抚擦，
把上面的铁锈擦下。

他拿起一把孔雀麈尾，
来清扫各处的尘灰，
清扫了很多的甲，很多的胄，
也扫清了很多的尖盔。

他又拂落了旗上的尘灰。
而且他说："我最值得骄傲的是：
没有蠹虫来把绸料啮坏，
木料也完全没有蛀蚀。"

当我们走进第二间厅堂，
睡熟的几千战士在地上躺着，
他们全有着战斗的装备，
老皇帝很满意地说：

"我们要轻轻地谈话，轻轻地走，

免得惊醒了这些人员，
一百年的时光又流过了，
发饷的日子就在今天。”

看吧！大帝小心翼翼地走近
那熟睡着的兵士身旁，
他悄悄地在每个人的口袋里，
藏进了一个杜卡特①。

我惊奇地看着他，
他却带着微笑说道：
“我给每人一个杜卡特，
作为他一百年的酬劳。”

在饲马的厅堂里，马排成
长长的、静默的行列，
这时大帝搓着他的两手，
像有一种狂大的喜悦。

他数着驮马，一匹跟着一匹，
又拍拍它们的脊肋，
他数了又数，带着不安的焦躁，
他颤抖着自己的嘴唇。

---

① 杜卡特（Dukat），1284年在威尼斯开始铸造的中古时代的金币，曾流通欧洲各国。

“数目还没有足够，”
他最后焦躁地说道：
“兵士和武器我都够了，
战马我却仍然缺少。

“我曾派出许多马贩，
到全世界上
去替我买最好的马匹，
现在已积下了很大的数量。

“只等到数目够了，
我就要宣起战端，
来解救我的祖国，我的德意志民族，
他们是真诚地渴望着我的登场。”

大帝这样说时，我就叫道：
“开战吧！你这位老朋友
开战吧！你可以用驴子充数啊！
倘若你的马匹不够。”

红胡子微笑着回答说：
“开战还用不着慌忙，
罗马城不是一天建筑成的，
好的东西都得需要时光。

“今天不来的，明天一定会来，

槲树的生长都是很缓慢的。
Chi va piano，va sano，①
这是罗马帝国有名的谚语。”

① 意大利的谚语，意思是：谁走得慢，谁就走得稳。

一六、我们也能解放自己

马车的震荡惊醒了我，
但眼帘立刻又垂下来，
我立刻又入睡了，
又梦见了红胡子。

仍然和他哓舌着，走去走来，
走过一切有回声的厅堂，
他这样也问，那样也问，
热望着我说完一切。

他和世界隔离开来
已是很多很多年代了，
自从七年战争以后，
他已不再知道任何的世事。①

---

① 七年战争（1756—1763），普鲁士与英国联合对奥国、法国、俄国、瑞典、西班牙进行的战争，这是普鲁士王腓得烈二世（Frederick II，1712—1786）时代的事迹，而前两首诗所说红胡子大帝则是神圣罗马皇帝腓得烈一世（Frederick I，1123？—1190），本来是两个人，但德国民间传说认为红胡子大帝没有死，两人都是腓得烈氏，又都是有名的君主，所以往往就把腓得烈大帝（即腓得烈二世）幻想作红胡子大帝的后身。而腓得烈大帝是最后一个以腓得烈氏为称号的德国君主，所以诗中说他七年战争以后，就不知道世事。

他问到摩西·门德尔松①，
也问到卡尔新②，他很关心地
问到那伯爵夫人杜巴力③，
那路易十五的情妇。

“哦！大帝，”我叫道：“你是多么落后啊，
摩西早跟着他的利百加死去了，
就是亚伯拉罕，他的儿子，
也已经死亡，而且腐朽了。

“亚伯拉罕和列亚，生了
一个孩子，叫作费里克斯，
他在教会里很有名气，
作到了音乐队的大师。

“老卡尔新也同样去世了，

---

① 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1720—1786），德国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的妻叫弗罗美特，不叫利百加，海涅大概是因为圣经上摩西的妻叫利百加，故意把弗罗美特改为利百加。摩西的次子叫亚伯拉罕（Abraham，1776－1835），亚伯拉罕的妻叫列亚。亚伯拉罕的儿子费里克斯·门德尔松（Felix Mendelssohn，1809－1847）是德国大音乐家。

② 卡尔新（Karschin 1722－1791），即安娜·路易斯·卡尔西（Anna Luise Karsch），是德国浪漫派女诗人。

③ 杜巴力伯爵夫人（Contesse du Barry，1741－1793），法国路易十五的情妇。1774 年路易十五死后退出宫廷。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下令加以逮捕，将她送上断头台。

她的女儿克伦克① 也已经死去，
赫尔曼·赤西②，她的孙女，
据我想来也许还在人世。

“杜巴力诚然快活而且放荡。
当路易十五执政的时候，
到了她的老年时，
却在规罗亭③ 刑下被人处死。

“路易十五还算幸运，
是安静地在床上死去的，
十六世却又遭受了规罗亭刑，
和皇后安东尼特死在一起。

“皇后临刑还表示了她的勇气，
算完全符合了她的身分，
杜巴力却哭呀叫呀的，
当她被处规罗亭刑的时候。”

大帝突然站住了，

---

① 克伦克（Karoline Luise von Klenke，1754—1812），卡尔新的女儿，女诗人，但其作品很平庸。

② 赫尔曼·赤西（Helmine von Chezy，1783—1856），卡尔新的孙女，是浪漫派女诗人和小说家，和海涅很熟悉。

③ 规罗亭是断头台，系医生规罗亭（Josef Ignatz Guillotin，1738—1814）所发明，故名。

他用严厉的眼光看着我，
而且说："凭着上帝的意志，
告诉我，什么是规罗亭刑？"

"规罗亭刑"——我解释着说——
"是一种新的方法，
人们用这方法，
来处死任何阶级的活人。

"应用这方法的时候，
是少不了一种器械，
器械是规罗亭先生发明的，
所以叫作规罗亭刑。

"首先把你绑在一块板上，
这板压下来，很快地一送，
就把你送在两根柱子中间，
一柄三角屠刀高悬在柱子上面。

"人们曳动一根绳索，于是屠刀
那么轻快，那么有力地滑下——
就在这一瞬间，
人头就落到下面的筐内。"

大帝截断了我的话语：
"住嘴！你的什么器械，

我不愿意再听了，上帝绝不容许，
倘若我用这样的器械！

“皇帝和皇后，
被绑着，在木板上！
这简直违反了一切礼法，
忘记了一切畏敬。

“并且，你是谁，你竟敢毫不顾忌，
用‘你’字来称呼我？
等着吧！你这小子，
我真要斩去了你狂妄的翅羽。

“我简直从深心冒出了怒火，
当我听见了你的话语，
你的呼吸已经是叛逆，
已是在作乱造反。”

老人这样陷入了狂怒，
对于我这样凶暴无理，
于是我也讲出了
我自己的意见，毫不客气。

“红胡子先生，”——我高声叫道——
“你只是一个过了时的童话人物啊！
走开，你躺下睡吧，没有你，

我们也能解放自己。

“共和国的人们会要嘲笑我们，
而且会给我们难堪的嘲讽。
倘若他们看见你这王笏和王冠的幽灵，
也会成为我们的头领。

“你的军旗也不再使我们敬仰了，
旧德意志的傻子们
已在少年会① 里打破了
我对于黑、红、金三色的爱好。

“你最好就留在屋子里，
在这古老的基甫屋山里，
我已经把事情想透了，
我们实在用不着皇帝。”

① 少年会（Burschenschaft），德国民族主义大学生的组织，会员多爱好决斗与饮酒。

一七、半阴半阳的现在

我和大帝吵了嘴，
在梦里，当然只在梦里，——
在清醒状态中的我们，
谁敢对王侯们讲出敌对的言语。

只在梦中，在观念的梦里，
德国人才敢对他们提起，
自己的德意志的意见，
它是被深深地藏在忠诚的心里。

当我醒来时，正经过一片森林，
那许多树木的形影，
那赤裸裸的木质的现实，
惊散了我的梦境。

槲树严肃地摇着顶盖，
桦树和它的枝叶也把头降低，
这是警告的表示，——我于是叫道：
“请原谅我啊！我亲爱的大帝！

“原谅我，红胡子，原谅我急躁的言词，

我知道你是比我更聪明得多的，
而我却那么缺少耐性——
你只管快来吧，我的大帝！

“你若厌恶规罗亭刑，
就仍然用旧时的刑具，
对尊贵的人用剑来砍头，
对市民和粗衣的农人用绞绳吊起。

“要紧的是得常常掉换，
把尊贵的人也拿来吊起，
把市民和农人砍头，
因为我们同是上帝创造的。

“再建立起那惨毒的刑事裁判所，
那查理五世① 的创作，
把人民仍旧加以划分，
分成等级、行帮和组合。

“把旧日的神圣罗马帝国
再加以建树，建树起它的全部，
把最腐臭的垃圾也带回来，
连同一切的骗术。

---

① 指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Karl der Fünfte，1500—1558）。查理五世于1532年颁布了一部刑法法典，以严酷著称。

“中古时代，无论如何，
只要是真正的中古时代，
我还能够忍受——只要脱离了
这半阴半阳的现在。

“脱离这丑陋的骑士制度，
这令人作呕的混合物，
它混合着古式的玄想，和近代的欺骗，
它不像鱼，也不像肉。

“把小丑的队伍赶开，
把这戏院封闭，免得在这里，
让他们把前代的史实涂污。
你只管快来吧，我的大帝！”

一八、明登[①] 的恶梦

明登是一座坚固的城堡，
有优良的守备和兵库，
可是和普鲁士的要塞，
我不愿意有什么关系。

我们到达时是在傍晚时分，
吊桥的板，在我们走过时，
发着可怕的响声，
黑暗堑壕的大嘴，像要吞吃了我们。

高耸的城楼窥望着我，
是那么愤怒啊，那么凶恶！
巨大的城门在轧轧声中打开了，
又在轧轧声中重行关锁。

啊！我的灵魂多么忧闷，

① 明登（Minden），威士特法仑省的古老的城堡。

就好像奥狄索斯① 的灵魂，
当他听见那坡利费姆，
竟把崖石塞着了洞门。

一个军官向车前走近，
来查问我们的姓名，
“我名叫‘无人”，是眼科医生，
我给巨人们医治眼睛。”

更坏的是到达了旅馆，
我心情恶劣，甚至不能进餐，
我立刻躺到床上去，但不能入睡，
被盖是那么沉重地压在我的身上。

这是宽大的毛羽卧床，
帐子是用的红色绫缎，
顶罩是蚀褪了的金色，
垂吊着肮脏的流苏一串。

该诅咒的流苏，整夜里，
夺去了我可爱的休息，

① 奥狄索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带领希腊军队打下了特洛亚城，归途中曾遭受很多磨难，如在西西里岛上，就被独眼巨人坡利费姆杀死了部下，并被困在山洞中，几乎致死。后来设计用酒灌醉巨人，乘机刺坏了巨人的眼睛，才得免于难。奥狄索斯当时曾骗巨人说自己的名字叫作“无人”。

它威胁地悬挂在我的头上，
就像戴莫克利斯① 的剑一样锐利。

时而出现一个蛇头，
神秘地向我啾啾着说：
“你已经到城堡里来了，
你就没有方法逃脱！”

“唉！我只愿，”——我叹息——
“我只愿仍然是在家里，
在巴黎的鱼市区②，
和我亲爱的妻在一起。”

时而又觉到有件什么
轻轻地在我头上抚摩，
就像那检查官的冷酷的手，
使我的思想不能不退缩。

一群宪兵，裹着死人衣装，
一群白色幽灵的集团

---

① 戴莫克利斯，公元前4世纪塞拉库西暴君戴奥尼修斯的佞臣，因他常说帝王多福，暴君有一次为他设宴，命他坐在王座上，同时在他头上用马尾吊一把锐利的宝剑，使他明白帝王的忧患；“戴莫克利斯的剑”已成为谚语，意思是经常使人受威胁的危险。

② 鱼市区，巴黎的一区，海涅曾在那里住过。

围绕了我的卧床，我还听见，
神秘的镣铐的声响。

啊！幽灵们拖着我前进，
最后他们把我拖到了
一座很陡峭的崖壁上，
在那里将我捆得牢牢。①

流苏，这么讨厌而又肮脏，
它又来到我的头上，
但它现在变成一只秃鹰，
有着利爪和漆黑的翅膀。

它现在仿佛是普鲁士的大鹰，
它把我的身体抓得紧紧，
它从我肚里攫取了肝脏，
于是我大叫，我哀鸣。

我哀鸣，很悠长，——一直到鸡叫了，
这热病般的梦境才被惊散，
大鹰仍然成为流苏，
我仍睡在明登，流了满床大汗。

---

① 此处海涅把自己比作普罗米修斯。据希腊神话，普罗米修斯因盗天火给人类，而惹怒了天帝宙斯，宙斯把他绑在高加索斯山上，让老鹰来啄食他的肝脏。

我乘着驿车离开此地，
一直到华克堡① 的地区，
在这外界自由的大自然里，
我才算有了舒畅的呼吸。

---

① 华克堡（Bückeburg），一个疆土很小的德意志公国。

一九、汉诺威[1] 的国王

哦！丹东，你犯了极大的错误，
你必须为这个错误赎罪，
我们就能在自己的脚下，
在鞋边，带走自己的祖国。[2]

半幅公侯的领土，这毕克堡，
都粘着在我的鞋上了，
我生平从没有见过啊，
这样粘腻的路途！

我停留在毕克堡的城里，
来观看这祖先的城堡，
我的祖父就在这儿生长，
虽然祖母是生在汉堡。

正午来到汉诺威城，

---

① 汉诺威(Hannover)，德国的一个大城市，当时是汉诺威公国的首邑。

② 丹东（Georges Jacques Danton，1759－1794），法国大革命时候有名的活动家，代表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利益，后被罗伯斯庇尔处死。当他受危险威胁时，友人劝他逃走，他不肯逃，曾说过这样的话：“走？难道能把祖国系在鞋底上带走吗？”

来把我的长靴擦净，
我又去游览这城市，
一刻也不愿意辜负我的旅行。

我的上帝，这儿算显得清洁了！
街道上没有半点儿泥泞，
这儿有许多华丽的建筑物，
形成了非常庄严的一群。

我特别中意一块宽大的广场，
有漂亮的房屋围绕着它，
这儿住着国王，这儿有着他的宫廷，
它有着一个美丽的外表。

（这就叫宫廷），在大门两旁
一边有一个卫兵岗，
披着红色大氅，拿着火枪，
那样子真吓人，真野蛮！

我的古迹向导者说：“在这里住着的，
是恩士特·奥古斯脱①，是旧派的，
保守党的君主，是贵族，

① 恩士特·奥古斯脱（Ernst August，1771—1851），英王乔治三世的第五子，1837年作了汉诺威王。恩士特·奥古斯脱极反动，曾因为违反宪法，被格廷根七个教授反对。

虽然老了，仍然强健活泼。

“隐者似的，他安静地生活在这里，
因为我们亲爱的同胞们的
胆小怯懦在保护着他，
比一切的卫队还要安稳。

“我有时看见他，就听见他诉苦，
说他的职务啊，是多么无聊！
为了这国王的职务，
他现在贬黜在汉诺威。

“他过惯了大不列颠的生活，
这儿对于他是太窄狭。
他害忧郁病了，他非常害怕，
他好几次几乎自杀。

“前天，我见他很凄怆地弯着腰，
在壁炉前面，在早晨的时候，
用高贵的手，他亲自
替病狗煎调一剂泻药。”

二〇、会见了母亲的时候

从哈尔堡① 再一个钟头，
就到了汉堡，已是黄昏了，
天上的星星向我打着招呼，
空气是柔和而又畅爽。

会见了我母亲的时候，
她快乐得简直吃惊了，
她叫一声："我亲爱的孩子！"
于是紧紧地拥抱了我。

"我亲爱的孩子，
就这样十三年过去了！
你是非常饿了吧？——
说！你想吃点什么？

"我有鲜鱼和鹅肉，
也有甜美的橘子。"——
"那就给我鲜鱼和鹅肉，
也给我甜美的橘子。"

---

① 哈尔堡（Harburg），汉堡附近的一个小镇。

看着我吃得非常起劲，
母亲是幸福而且高兴，
她这也问我，那也问我，
有时把我问得很窘。

“我亲爱的孩子，在外国地方，
你也过得很如意吗？
你的妻子也会操持家务，
她会给你补袜子和衬衣？”

“鲜鱼很好，亲爱的妈妈，
但必须要静静地来剔它，
否则就容易刺痛人的喉管。
请你现在不要扰我。”

当我剔吃完了鲜鱼，
就又来了鹅肉。
母亲这也问我，那也问我，
有时把我问得发窘。

“我亲爱的孩子，在哪一个国家，
你觉得过得更好？
这儿？还是法国？是哪一个国民，
在你的眼中价值更高？”

“德国的鹅固然很好，

亲爱的妈妈，但法国人
他们把鹅填得比我们好①，
他们也有更好的肉汁。”

鹅又吃完了时，
就用橘子来款待我。
橘子是那么甜蜜，
完全出乎我的意想。

母亲又非常心满意足地，
在那儿开始发问，
问到我成千的事情，
甚至于非常讨厌的事件。

“我亲爱的孩子，你告诉我，
你还高兴干政治活动吗？
你属于什么党派？
对什么党派你确有信心？”

“橘子很好，亲爱的妈妈！
我抱着真正满足的心情，
吸食了它甜蜜的液体，
但却丢弃了它的外皮。”

---

① 填鹅，把菜和香料填在鹅的身内烹调。

二一、汉堡的大火灾

这烧毁了一半的城市，
它的恢复啊，多么迟迟！
像被剃光了一半的卷毛狗，
多么凄凉啊！这汉堡市！①

不见了多少条街巷，
使我气闷，使我茫然，——
那一间屋子哪里去了，
我第一次给爱人② 接吻的屋子？

那印刷所在哪里，
我刊印旅行记的印刷所？
哪里是卖牡蛎的店铺？
我在那儿吃第一次的牡蛎？

---

① 汉堡的大火是从 1842 年 5 月 5 日开始，延烧达三日之久，烧毁了四千多幢房屋，有两万多人无家可归。这场大火曾烧毁了海涅母亲的家和叔父的家。

② 爱人，指海涅的叔父所罗门 (Salomon Haine) 的女儿阿玛莉叶 (Amalie)。海涅在青年时代曾热爱过她。

哪里是得累克瓦尔街①，啊，得累克瓦尔街？
我找它，毫无踪影！
那园亭② 哪里去了，那园亭，
我曾在里面吃过许多点心？

市政厅又在哪里？那参议院
和众议院开会的地点？
啊！火焰的劫掠！这火焰啊，
它连最神圣的事物也不肯饶恕。

人们还恐怖地叹息着，
带着悲哀的容颜。
他们向我叙述
大火灾可怕的历史。

“是四面八方同时焚烧起来，
人们只见一片火焰和烟尘！
教堂的尖塔烧着了，
哗啦啦的响声中它崩溃下来。

“古旧的交易所也被毁坏，
我们的父祖曾经在这儿往来，

---

① 得累克瓦尔街（Dreckwall），又可译为“污秽的瓦尔街”，因“得累克”（Dreck）有污秽意。

② 园亭，指瑞士园亭，当时一家有名的点心铺。

几百年的长期里，他们相互间
是尽可能地以诚相待。

“那银行，那城市的银的灵魂，
那账簿，那为每一个人
记着存款数目的账簿，
谢谢上帝！都还没有失去。

“谢谢上帝，我们获得了捐款，
甚至从最远的国家里，——
这是好生意，——总的收入，
竟达到八百万数目。

“管义赈箱的，都是真正的
基督教徒和善男信女，
左手从来不知道，
右手拿去了多少。

“从一切国家流出金银，
流到我们伸开的手掌里，
我们还收下了食物，
我们不拒绝任何施舍。

“人们送来足够的衣服和床铺，
也给我们面包、汤和肉！
普鲁士的国王甚至要

送给我们他的队伍。

“物质的损害得到补偿，
它的价值并不难估量，
但那恐怖，我们的恐怖，
却谁也不能使它平复！”

我却鼓舞着说：“可爱的人们，
你们不必哀叹和啜泣，
特洛亚① 是更好的城市，
但还是被烧毁在火里。

“再把你们的房屋建筑起来，
把你们的污水掏空，
为你们造出更好的法律，
和更好的消火唧筒。

“不要把太多的查耶纳胡椒，
放在你们的犊头假龟汤② 里，
你们的鲤鱼也不很卫生，
它带着鳞，调味又那么浓腻。

① 特洛亚，古代小亚细亚的一个繁华都市，在特洛亚战争中，为希腊联军攻破，放火烧掉。

② 犊头假龟汤（Mockturtle-Suppe），用小牛头烹成的假龟汤。

"你们的大害并不是吐绶鸡，
要防备的是一种鸟的诡计，
防备那巧于下蛋的鸟，
它曾经下蛋在市长的假发里。①

"谁是那讨厌的鸟，
我用不着向你说起——
一想到了它，
我就由不得要发呕吐。"

---

① 这一段是讽刺普鲁士人的活动，他们正在努力把汉堡也拉进关税同盟里去，此处"鸟"系指普鲁士的鹰。

二二、人的改变

比城市更触目的
是人的改变，
他们走来走去，那么悲哀、颓丧，
就像活动的废墟。

瘦削的人现在更瘦了，
胖子却更加肥满，
小孩子都长大成人，
大多数的老人却变得幼稚。

多少人离我时远是小犊，
再见时却成了壮牛，
多少幼鹅都成了大鹅，
都带着自负的羽毛。

老年的古得尔①，还涂脂抹粉，
打扮得像一个海妖，
她戴上了黑色的卷发
还有洁白耀眼的牙齿。

① 古得尔（Gudel），得累克瓦尔街的一个女人。

那卖纸的商人① 我的朋友，
他的容颜最为苍老，
他的头发变黄了，在头上披着，
就像约翰，那位洗礼的施行者。②

我只从远处望见了某某③，
他在前面很快溜过了，
听说他的灵魂已被烧坏，
他在比伯尔④ 那儿放过保险金。

又见了我的老检查官⑤，
碰到他在鹅市场上，
在雾气里，他弯着腰，
那神气像非常沮丧。

我们握了手，
这人眼里竟浮出泪水了，

① 卖纸的商人，指爱得华·米哈艾里斯（Eduard Michaelis，1771—1847），他在汉堡很有名望，对市政有很大贡献，是海涅的朋友。

② 施洗者约翰曾经在旷野里苦修，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蝗虫野蜜（见《新约马太福音》）。

③ 某某，指海涅的堂妹德利撒（Theresa）的丈夫哈勒（Adolt Halle）。德利撒是海涅的叔父所罗门的次女，和她的姐姐阿玛莉叶同是海涅青年时代爱过的人，1827 年和哈勒结婚。

④ 比伯尔（Biber），汉堡的一个保险公司，大火后破产。

⑤ 老检查官霍夫曼（Hoffmann），他代表官方检查和删削过海涅的著作。

再见了我，他是多么欢喜啊！
真是一幅动人的图景。

找不到所有的人，
多少人都逝世了，
啊，甚至我的龚佩里诺①，
我也不能再遇见了。

这贵人的灵魂，
现在已经升天了，
他现在已在耶和华宝座的周围，
成了光辉的歌颂天使②。

我到处寻觅，看不到
那伛偻的阿多尼斯③，
他曾在汉堡的街市上
兜卖过陶制的夜壶和茶具。

---

① 垄佩里诺（Gumpelino），海涅的《鲁卡浴场》（Baeder von Lucca）里的一个人物，其原型为海涅叔父的朋友——汉堡银行家拉匝路斯·龚佩尔（Lazarus Gumpel）。这里的“我的龚佩里诺”是指拉匝路斯·龚佩尔。他在1843年11月9日死去，当时海涅在汉堡。

② 歌颂天使（Seraph），专门在上帝周围唱赞美歌的一种天使。

③ 阿多尼斯，希腊神话中半人半神的美少年。“伛偻的阿多尼斯”，汉堡一个古董商人的绰号。

小麦耶尔① 是否还在人世，
我却知道得不很确实，
他不见了，但我没有
向柯耐特② 问起他，我忘了。

萨尔拉斯③，那忠实的卷毛狗也死了，
是一个大的损失，我敢发誓，
与其失去了它，坎姆伯④ 宁愿
失去一整批的著作家。

有史以来，汉堡的市民成分，
是由犹太人和基督徒构成，
后者更为悭吝，
也是实际情形。

基督徒们都非常良善，
他们也吃很好的午餐，
他们交易支付得很准确，
决不把最后的限期超过。

---

① 麦耶尔（A. J. Heinrich Meyer，1788－1859），汉堡的著作家和戏剧批评家。

② 柯耐特（Julius Cornet，1794－1860），汉堡市立戏院的唱歌家和副经理。

③ 萨尔拉斯（Sarras），坎姆伯所养的狗。

④ 坎姆伯(Campe)，汉堡的一个出版家，海涅的著作就是由他印行的。

犹太人又有分派，
分成两个不同的党派，
老派要进犹太会堂，
进圣堂的却是新派。

新派吃猪肉
有反抗的表示，
是民主主义者，而老派
却带着贵族的性质。

我爱老派，我爱新派，
但凭着永生之神，我发誓，
我更爱的是某种鱼儿，
熏鲱就是它的名字。

二三、汉堡的守护神

作为共和国，汉堡并不像
威尼斯和佛洛伦斯那样大
但汉堡有更好的牡蛎，
最好的在罗伦兹的酒店里。

一个美丽的傍晚，
我和坎姆伯来到店里，
我们要在那儿一齐享受
莱茵的美酒和牡蛎。

那儿又找到很好的伴侣，
看见许多老友，
使我欢喜，像殊费皮①，
还有许多新的兄弟。

那是威勒②，看他的脸，
像一本纪念册，上面有

① 殊费皮（Hermann de Chaufepié，1801－1856），汉堡的医生。

② 威勒（Francois Wille，1811－1896），《文学批评报》（Literarische und kritische Blätter）的编辑，喜比剑。

学院里击剑的敌人，用伤痕
极鲜明地刻成的签名。

那是福克斯① 一个执迷的异教徒，
是耶和华的私人仇敌，
只相信黑格尔，或再加上
卡诺法② 的爱神维纳斯。

我的坎姆伯是安菲特里莪③，
在狂欢之中他微笑着，
他的眼里放射出幸福，
像一个充满光辉的圣母。

我又吃又喝，胃口很好，
内心里却寻思道：
“坎姆伯这人实在伟大，
是一切出版家的鲜花。

“另外的出版者，
说不定要我饿肚子，

① 福克斯（Frederick August Fuchs，1812－1856），汉堡教育家与著作家，思想激进。

② 卡诺法（Antonio Canova，1757－1822），意大利的雕刻家，他首先以对自然和人体的忠实态度来作雕刻，反对旧的不现实的作风。

③ 安菲特里莪，希腊神话中的一个人物，莫里哀的一个剧本《安菲特里昂》（Amphitryon）里的主人翁也以此为名，象征慷慨的主人。

他却肯请我喝酒，
愿永远和他携手！

“我感谢上天的造物，
它创造了葡萄的液汁，
又给了我这个出版者，
这朱里亚·坎姆伯。

“我感谢上天的创造者，
通过他伟大的变化，
把牡蛎生在海洋，
把莱茵酒产在地上。

“它又让长出了柠檬，
用它来滋润牡蛎——
天父，让我在今晚，
把食物好好消化！”

莱茵酒，总令我感到柔和，
它使我一切内心的烦扰
都得到缓和，并在我胸中，
点燃起渴望爱情的欲火。

它迫使我走出房屋，
我不得不到街头散步，
我的灵魂寻找一个灵魂，窥探着

洁白衣服的女子。

为着哀愁和渴望，
我曾消融在这样的瞬间，
我觉得一切的猫都是灰色的，
一切妇女都成了海伦①。

我来到得勒班街②，
在月光里我看见
一位尊严的女性，
一位娴雅得可惊的妇人。

脸庞是圆的，完全健康的，
眼神像土耳其的蓝玉，
玫瑰般的两夹，樱桃似的嘴，
鼻子也带着微红。

头上戴着一顶小帽，
是洁白的、浆硬了的麻布制成，
摺叠得像一顶胜利冠，
带着小塔，和锯齿状的尖角。③

---

① 海伦，古希腊的一个美人。
② 得勒班街（Drehbahn），当时妓女居住的一条街。
③ 指汉堡城的城徽。

穿一条白净的裙子，
拖长到她的小腿，
啊！是何等样的小腿，
像两座多利式柱脚① 一般优美。

最近人情的纯朴，
在她的容貌里流露，
而那不平凡的背影，
却泄漏着更高的质素。

她走近了我，对我讲：
“又在易北河上欢迎你，
虽然已经十三年的别离——
我看，你还是依然故我！

“你想找那些美丽的灵魂吧！
她们曾经时常和你相遇，
并在这美丽的地方，
通夜和你欢聚。

“生活，那怪物，吞噬了她们，
那多头的怪蛇②。

---

① 多利式柱脚，古希腊建筑柱式之一种，柱身中部微凸，以素朴为特色。

② 多头的怪蛇，指希腊神话中的九头怪蛇。

你再也找不到以前的光阴，
再也找不到青春时代的女友！

“你再找不到那些动人的鲜花，
那少年们心中的神圣，
她们开在此地，如今已经凋谢，
暴风雨摧毁了她们。

“凋谢，被摧毁，甚至被践踏，
在粗鲁的运命的脚底，
我的朋友，这就是人世上，
一切美丽甜蜜事物的遭际！”

“你是谁？”——我叫了——“你望着我，
如像一个古代的梦景——
你住在哪里，伟大的妇女？
我能不能陪你同去？”

妇人微笑着说：
“你弄错了，我是一个精致的、
高雅的道德化身，
你弄错了，我不是那样的人。

“我不是一个什么小侍女，

不是一个什么罗勒亭①，
要知道，我是汉莫尼亚②，
是守护汉堡的女神！

“这一下你要吃惊了，
虽然你也是勇敢的诗人，
还要陪我去吗？现在？
好吧！那就一刻也不要迟疑。”

我大笑起来，叫道：
“我立刻跟你！——
你走在前！我跟在后，
哪怕走到地狱里去！”

① 罗勒亭（Lorettin），巴黎人对一般妓女的称呼。

② 汉堡在古罗马时代的名字是汉莫尼亚（Hammonia）；在这里，汉莫尼亚是海涅所创造出来的一个空想的女神——汉堡守护神——的形象。

二四、我染上了怀乡病

说不出来，我如何
走上狭窄的台阶，
也许有无形的精灵，
把我搀扶上来。

在这汉莫尼亚的小屋里，
我的时间流得真快，
女神向我诉说，说出她
对我不变的同情。

“你看，”——她说——“在从前，
我最佩服的
是在虔诚的七弦琴上
歌颂救世主的诗人。

“在橱头上，还有我的
克洛普斯托克① 的胸像，
但多年来它的用处，
但多年来它的用处，

① 克洛普斯托克（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1724—1803），德国诗人，作有宗教叙事诗。

只作了我的帽架。

“你是我的亲人，你的肖像
挂在我的床头，
你再看，一个崭新的月桂冠
圈着那可爱的像框。

“只有一点要向你说明，你经常
对我的儿子们作残酷的批评，
这有时很使我伤心，
愿不要再有这样的事情。

“我相信有的是时辰，
会改变你这种蛮横，
那时你会有更大的忍耐，
即使对待愚顽的人。

“但告诉我，你怎样想起
要旅行到北方，
在这样的时季，
已到了严冬的天气？”

“啊！我的女神，”——我答说——
“有许多思想，在人心的深底里，
它睡眠着，又常常
苏醒起来，在意外的时期。

“我的外貌非常安泰，
内心里却有忧虑，
苦闷一天比一天增进，
我染上了怀乡病。

“原是多轻快的法国空气，
开始令我感到压抑，
我必须来这儿获取
德国的呼吸，以免使我窒息。

“我渴望着泥炭的臭味，
和德国的烟草气息，
焦躁使我的脚腿战栗，
它急于要踹上这德国的土地。

“夜里我常常叹息，渴望着
再见那位年老的妇女①，
她住在单姆朵耳，
洛蒂② 就住在附近。

“还有那可敬的老绅士③，
他常常给我严厉的申斥，

---

① 年老的妇女，指海涅的母亲。
② 洛蒂（Lotte），海涅的妹妹。
③ 老绅士，指海涅的叔父所罗门·海涅，海涅18岁以后，十余年当中曾不断受到所罗门经济上的援助。

又常常宽容地庇护我，
这人也有令我叹息的价值。

“我愿意从他的嘴边，
再听见说‘糊涂的青年！’
它永远像音乐一样，
能打动我的心弦。

“我想念那青蓝色的烟气，
从德国的烟突里升起，
想念下撒克逊的夜莺，
想念静谧的山毛榉林。

“我甚至对那些地方想念：
想念我的受难地点①，
在那儿我背过青年的十字架②，
戴过荆棘的冠冕。

“我愿意哭泣，在我曾经
痛哭过的所在地，
这样愚痴的企望，我相信

① 受难地点（Die Leidensstation），耶稣被捕受磔刑前，背着十字架，戴着荆棘冠，沿路受到十二种磨难，受这些磨难的地点就是受难地点。
② 青年的十字架，指海涅对所罗门·海涅的女儿阿玛莉叶和德利撒的失恋。

正是爱祖国的心地。

“这一切我都不愿意多讲，
它实际上只是一种病患，
靦觍的生性，使我常常
在人前隐蔽自己的创伤。

“我讨厌的是那班流氓，
为着要使人心惑乱，
抬出了爱国主义的假招牌，
带着它一切的脓疮。

“无耻的卑劣的叫化子，
只盼望着人们的布施，
一个芬尼① 的名气，
赏给门彻尔和他的夏本班子。

“啊！我的女神，今天的你
看见了我的脆弱多感，
我有些病，但已稍好了，
我很快就会痊愈。

“是的，我有病，但你能

① 芬尼（Pfennig），德国铜币，一百个芬尼合一个马克。一个芬尼的名气，即不值钱的名誉。

使我的灵魂振奋，
只需要好茶一杯，
并且要用蔗酒掺混。”

二五、我发誓保守缄默

女神给我烹茶，
并放进了蔗酒，
她自己却全不用茶，
仅只倒了蔗酒。

她的头靠近我的肩膀，
那胜利冠，那顶小帽，
有点绉摺了，
她用柔和的声音向我讲：

“我想起来就常常恐惧，
你居住在风化不良的巴黎，
全然无人看管，让你混在
那些轻浮的法国人里。

“你在那儿流荡，
你的身边始终缺少
一个诚实的德国出版家，
像老师样的提醒你，引导你。

“那儿的诱惑又是多么强烈，

那儿有很多风的精灵①，
她们是不健康的，但却善于
使你失去灵魂的自由。

“不要去吧！留在我们这儿！
这儿还统治着教养和道德，
而在我们中间，会开花似的，
浮现出许多静默的喜悦。

“跟我们留在德国吧！这里
会比以前更令你适意，
我们在前进，你一定
亲自看见了这个进步。

“连检查制度也不再严格了，
霍夫曼老了，也较温和了，
不会再带着青年的愤怒，
来删削你的旅行记了。

“你也较老了，较温和了，
你更能适应环境了，
甚至也会对于过去，
用较好的眼光来看待了。

① 风的精灵（Sylphide），指轻狂的女子。

"真的，我们从前以为德国的情况
是那么可怕，那都是夸大，
人们还能用自杀逃脱
奴隶生活，像在古代罗马。①

"人民享受着思想的自由，
自由为着广大的人群，
只有少数人受到限制，
限制他们印刷的自由。

"并不曾有过非法的专制，
即使对最恶的煽动家，
倘若没有法庭的裁判，
决不剥夺他作国民的证章。

"德国的情形并不会这样恶劣，
虽然有许多时代的磨难，
相信我，没有一个人饿死过
在德国的监狱里。

"曾在过去开过花的，
是信仰和温情，
那显得多么美丽啊，
现在却只有怀疑，否定。

---

① 参看本书《秃陀堡的森林》一章第十节。

“现实的、外界的自由，
将要把理想摧毁，
理想包藏在我们心胸里，
纯洁得像百合花的梦境！

“我们美丽的诗歌也会凋谢，
它现在已有些凋零了，
在死去的国王中间，
弗莱里格拉特的摩尔王① 也死了。

“孙辈们的吃喝会很丰足，
但不是在旁观的冷静之中，
闹剧将要在眼前轰响
牧歌就要告终。

“啊！倘若你保持缄默，我就
为你打开命运的记录，
我让你从我的魔镜里，
来窥看将来的日月。

“我从来没有给凡人看到的，
我让你能够看见，
看见德国的将来，

① 摩尔（Mohr）王即摩尔族人的王。弗莱里格拉特写过一首题名《摩尔王》的诗，海涅对这首诗曾加以嘲讽。

啊！只怕你不能缄默！”

“我的神！啊女神！”——我狂热地叫起来——
“那会是我最大的喜悦，
让我看见将来的德国，——
我能保守信用，保持缄默。

“只要你向我提示，
我愿为你发任何誓言，
我为你保证缄默，
说罢，我怎样发出誓言？”

她却回答说：“为我发誓，
照亚伯拉罕长老的方式①，
如像他叫埃利赛做的，
当埃利赛准备出发的时候。

“把我的衣服掀起，把你的手
放在我的大腿下面，
为我立誓，保守缄默，
不论说话时或写诗时。”

一个严肃的瞬间，

① 以色列人有一种古老风俗，把手放在大腿下面发誓（见《旧约创世纪》）。

旧时代的风向我吹煽，
当我发出了誓词，
按照这古时族长的习惯。

我掀起了女神的衣服，
把手放在她的大腿下面，
我坚决发誓保守缄默，
不论说话时或写诗时。

二六、德国将来的气息

女神的两颊是那么通红。
(我想，蔗酒涌到了她的王冠。)
她向我说话时，
音调非常忧郁。

“我变老了。我的生日
正是汉堡初建时，
母亲是鳕鱼女王，
在这里的易北河口。

“我的父亲是一位大君主，
他名叫卡欧路斯·麦格努斯①，
他有更大的聪明和魄力，
超过普鲁士的腓得烈大王。

“他即位那天所坐的椅子，
现在是在亚琛。
夜间他当作床铺用的椅子，
遗赠给善良的母亲。

① 汉堡是中世纪时卡欧路斯·麦格努斯（即查理曼大帝）建立的。

“母亲又把它传给了我，
是一件并不漂亮的家具，
但即使有洛特希尔特① 的全部金库，
我也决不愿把它卖出去。

“你看，就在那角落里，
摆着一张坐椅，
靠背的皮革已经破裂，
垫褥也布满蠹蚀的痕迹。

“试走上前去，
把坐椅的垫褥揭起，
从一个圆窟窿里一看，
有一口锅嵌在底里。

“是一口魔法的锅，
神妙的力在里面蒸腾着，
把你的头伸向圆窟窿上，
你就看见将来的景象。——

“你会看见德国的将来，
看见波涛起伏的幻象，
但不要害怕，倘若

① 洛特希尔特（Maier Amschel Rothschild，1743—1812），德国的大银行家。

从污物里冲出了恶瘴。”

她说着，笑着，笑得很稀奇，
但我并不惊异，
好奇地急忙使我的头
向着可怕的圆洞伸去。

我看见的事情，不能宣泄，
我已经发誓要保守缄默，
我几乎说不出来，
啊！上帝！我嗅到了什么气息！——

我一想起就感到厌恶，
那恶劣而令人诅咒的
嗅觉的序幕，就像腐烂的
白菜和俄国臭皮的混合。

可怕的气息，啊！上帝！
它一直向上升起，
像有谁在扫除积粪，
清除了三十六个粪坑①！

① 三十六个粪坑，指德意志联邦三十六个封建领域，与本书《秃陀堡的森林》一章第十三节的“三打之多的君主”同。

我完全领会了圣鞠斯特① 的言语，
在从前的公安委员会里：
“要治愈重大的病患，
不能用玫瑰油和麝香。”

但这德国将来的气息，
已经超过了一切，
超过我的鼻子所能接受，
我不能再忍耐片刻。

我晕迷了，当我睁开眼睛，
我发现自己仍然在
女神的身边，我的头
靠在她的宽广的胸前。

她眼光发闪，她嘴唇发烧，
她的鼻孔有些发战，
如醉如痴她拥抱了诗人，
以粗野得可怕的热狂歌唱：

① 圣鞠斯特（Louis Antoine Leon Sain-Just，1767—1794），法国大革命时的革命党人，和罗伯斯庇尔同属山岳党，同为公安委员会委员，主张亦同样激进。

"有一屠勒国① 的君主，
他有个视如至宝的酒杯，
当他从杯中饮酒时，
他的眼里总噙着泪水。

"于是他就有了某种思想，
它总是出乎人的意想，
于是他就施展才能，发出命令，
命令人逮捕你，我的孩子！

"不要再到北地去，谨防
那屠勒国王逮捕你。
谨防宪兵和警察的追逐，
谨防那班历史学派② 的攻击。

"我爱你，留在汉堡陪我，
我们将要又吃又喝，
吃喝今天的牡蛎和葡萄酒，
而把那黑暗的将来忘却。

① 屠勒国，古希腊人所设想的一片位于世界极北方的国土。海涅在这里用"屠勒国"影射柏林，用"屠勒国的君主"影射普鲁士国王。"有一屠勒国的君主"为歌德的《浮士德》(Faust)第一部第八场由玛加利大(Margaritha)朗诵的歌谣之首句。

② 历史学派，指德国当时由萨伏格尼(Friedrich Karlvon Savigny，1779—1861) 所代表的法学派别，主张法律是由民族发展中历史地形成，重视习惯法，反对民主政治立法，这一种思想为当时复古的反动思想界所欢迎。

“盖起它来，莫让那秽气
来扰害我们的快乐，
我爱你，不下于任何女子
钟爱一个德国诗人！

“我和你接吻，我感觉到
你的天才使我兴奋，
一种奇异的激情，
统制了我的灵魂。

“我好像听见，在街上，
那守夜的人们在歌唱，——
是结婚的歌曲，是结婚的音乐，
啊，我甜蜜的快乐伙伴！

“于是又来了骑马的仆从，
带着撩乱辉煌的火炬，
他们在壮严地跳着火把舞，
他们跳着，跃着，摇摇摆摆。

“又来了许多寿星，
来了高贵贤明的参议员！
市长清一清喉咙，
预备作一篇演讲。

“穿着漂亮制服出现的

是那些外交团体，
他们留下了贺仪，
用邻国的名义。

“又来了犹太僧侣和牧师，
来了宗教的代表，——
啊！连霍夫曼也来了，
带着他检查的剪刀！

“剪刀嘎嚓嘎嚓地响在他的手里，
这野蛮的家伙向前推挤，
挤到你身边，——找最好的一块
剪进你的肉里。”

二七、诗的火焰

那奇怪的长夜，
后来发生了什么，
让我到暖和的夏日，
再一次向你述说。

那伪善的旧世代
在消逝，谢谢上帝！
它今天正逐渐走向坟墓：
是欺诳病致死的。

一个新世代在生长，
全没有粉饰和罪恶，
它带来了自由思想、自由空气，
我要向它宣告一切。

已开始有青年人，能理解
诗人的信念和赤忱，
能从诗人的心头取暖，
从他的太阳样的热情。

我的心像光一般地爱，

又像火一样的纯洁，
最高尚的优美女神
弹奏着我的琴弦。

就在这张琴上
我的师父也曾弹奏过乐章，
他是死去的阿里斯托法涅斯先生
是艺术女神的宠儿。

伴着这张七弦琴，他曾经
唱过派斯特铁洛① 的爱情，
唱他求巴西列亚②结为夫妇，
唱他和她一同飞升。

我要在最后一章，
试作一些模仿，
模仿《鸟》的尾声，
它确是师父最好的剧本。

《蛙》③ 也很出色，
现在有德文的翻译，
它正在柏林舞台上面，

---

①② 派斯特铁洛和巴西列亚是阿里斯托法涅斯的著名喜剧《鸟》中的人物。

③《蛙》，阿里斯托法涅斯的名著之一。海涅在这里用嘲笑的口吻指出蛙可“供国王的赏玩”，因为这个剧本并未讽刺君主专制。

供国王的赏玩。

国王爱这出戏，这是出于
优良的古典嗜好；
但先前的国王，却更爱好
现代的蛙叫。

国王爱这出戏，但如果
这位作者还在人间，
我就要向他劝说，
不要亲自到普鲁士去。

对于现实的阿里斯托法涅斯；
事情就不会畅顺，
他立刻会被人陪伴，
被宪兵的合唱团。①

下流人会立刻得到批准，
准许他们咒骂，而不是奉承，
警察们得到命令
以逮捕对待高人。

啊！国王，为了你好，

① 现实的阿里斯托法涅斯，指海涅自己。普鲁士官厅曾在1844年4月16日撤销逮捕海涅的命令，但在12月21日又恢复了逮捕令。

我要向你劝告，
死的诗人，当然要你尊重，
但活着的，更得要你关照。

不要冒犯活着的诗人，
他们有武器和火阵，
它比朱彼忒① 的电火还更猛烈，
而创造者正是诗人。

不怕你冒犯神，旧神和新神，
冒犯一切奥林匹斯② 的同类，
以及他们最高的耶和华，
只不要冒犯诗人。

惩办人类的罪行，
神的刑罚确是最无情，
异常酷热的地狱之火，
人要被蒸煮，被烧灼。

但也有超度的方法，
能从烈火把罪人救拔，
做灵魂弥撒，向教堂布施，
都能够获得升化。

---

① 朱彼忒，罗马神话中的天帝，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他所掌握的电火，可以摧毁一切他想加以惩罚的东西。

② 奥林匹斯，希腊神话中众神所住的山名。

最后的日子，基督降临，
还要打破那地狱之门，
他即使执行严酷的审判，
也还会放免很多的众生。

但却有一种地狱，任何人
不能从它的拘禁里脱出，
在这儿祈祷毫无用处。
救世主的宽赦也是无益。

难道你不知但丁① 的地狱：
那令人战栗的三行诗体？
谁要被诗人关了进去，
就没有神灵能给他救助。——

哪怕是神，是基督，都不能
从诗的火焰里把他救出！
当心自己，莫叫我们
咒你进了这样的地狱！

---

① 但丁（Alighieri Dante，1265—1321），意大利诗人，所著长诗《神曲》（Divina Commedia）曾描写地狱、炼狱和天堂。

译者后记

《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是海涅的政治诗中最重要的一部。读过马克思传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在流亡巴黎的时候，曾经和海涅经常往来，并且对他的诗的创作曾提过许多意见，而这时他的主要创作就是《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

这部诗，是1844年初写成的。1843年底，海涅回到他离别了13年的德国，1844年1月又折返巴黎，他把他对于祖国的现实情况的观感以及自己的理想写成了这部诗。当时的德国，是接近于1848年革命的前夜，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正在酝酿中，无产阶级也将成为独立的势力走上政治舞台，但普鲁士封建贵族的专制统治还有相当力量，暂时还压制着人民的革命活动。海涅在他的诗里一方面反映了德国当时的这种气闷的、只能在睡眠中梦想自由的政治状况；他以极端厌恶和鄙视的感情，来讽刺他在旅途中所目击的德国“丑陋的骑士制度”和一切封建统治下的“令人作呕”的现实。另一方面他又用“光一般地爱”和“火一样地纯洁”的心来歌颂“一个新世代”的“生长”，用自信的乐观的轻快韵律唱出关于“要在地上建筑起天国”的“新的歌”。他在诗的梦境中估计到要把新的自由思想变为实践，就必须用血和杀人屠刀的力量，去粉碎那些死人、王者及圣贤的统治。他臆测到将来要摧毁德国的那种特别顽固的腐旧制度，就会要像“清除三十六个粪坑”一样麻烦，要遇到可怕的难闻的臭味，要采取猛烈的革命手段，而“不能用玫瑰油和麝香”。海涅的这些诗的预感，自然是带着浪漫

主义的朦胧色彩的，但它们大体上可以说是在长期的事实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应验，而这过程是一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希特勒法西斯德国被苏联红军打垮的时候才算基本终结。现在西德的美英法占领者还妄想要在德国人民中间再把这种“积粪”保持下去，但那已是无力的残遗，人民起来把它彻底清除的时期也不会远了。“地上的天国”，已在苏联以及许多新的人民的国家里建立起来，也在东部德国地区开始建立了。

我译这部诗，是从 1931 年就开始的，因为译诗并非自己的专业，仅出于兴趣和爱好而在工作余暇零碎抽时间作，又因为诗中有许多典故及史实需要费一些力量去研究查考，所以工作拖了很长的期间，到 1945 年夏才最后译完，1946 年才第一次出版。

我的译文最初是依据原作者所说的德国出版的单行本译出来的，也正如作者序上所说，有些地方曾遭删削。抗战期间，在延安得到苏联版的《海涅选集》才把一些被删削的补上了。原诗 27 章，只有一个总的题目，各章的题目，都是我加上去的，目的是为了醒目，也表示自己个人对于内容的某种了解，但决不能让读者的了解也因此受到限制，所以必须声明一下。

本书蒙冯至先生帮忙就原文校阅，改正了许多地方，这里应该声明致谢。

附录三：

《“有的放矢”及其他——哲学·文艺·随感集》前言及目录

（海燕书店1951年5月版）

前　　言

感谢海燕书店的朋友们，他们把我1941年以后在延安写的一些文章搜集起来，编成这一本集子。如书名所表示的，这里包含着关于哲学、文艺和随感三部分文章。这些文章都是很零散的，只有哲学一部分有几篇较成系统，而就是哲学部分内，也有好几篇是随感的性质，不过因为它的内容涉及思想意识和思想方法的修养问题，所以也归入哲学一类。

这些文章，都是延安整风运动以后写的，因此，它自然也就是这个伟大的思想革命运动的一小部分情形的反映。这一个运动教育了广大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作干部，我自己在这个运动中也受到了很多的教育，在这些教育的帮助下，开始认识了和改正了自己许多知识分子的缺点。这本集子里的文章，特别是关于哲学部分的几篇稍有系统的文章，就记录了自己当时思想上的变化过程。

这里的一些文章，如果不注意当时延安以及解放区整风运动的情形，是不能完全了解的。为着这个原因，所以我希望读者们

不要忘记阅读一下《整风文献》。

作者 1951年3月28日

目 录

哲 学

谈主观主义及其来源
不要误解“实事求是”
介绍五四文化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争论
“有的放矢”及其他
学习观念的革新
谈讽刺
关于唯物论的几段杂记
怎样改造了我们的学习
哲学战线上的列宁时代
人民的成功
建立新的劳动观念
《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
人民的军队
劳动也是整风
“中国大众的立场”
难
不埋没人
血肉相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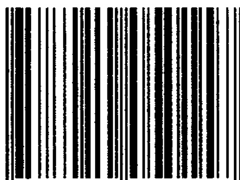
人类科学文化的胜利
一往无前

文　艺

旧的恶习惯应该抛弃
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
群众需要精神食粮
群众自己的秧歌队
前方文艺运动的新范例
《惯匪周子山》
美术工作与群众的进一步结合
改变面目改变脑筋
文艺工作者到前方去

随　感

新办法
降魔
打击与回击
谈面子
再谈面子
类推
东方强盗就缚之后
反面文章



ISBN 7-01-005015-5
定价:600.00 元(共八卷)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艾思奇全书　第3卷　1940-1948
作者=艾思奇著
页数=953
SS号=11795999
DX号=
出版日期=2006.10
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

封面
书名
目录
纪念“八一”（1940.8）
哲学是什么（1940.6—8）
第一章　哲学是研究事物的最一般的规律的科学
一、认识事物规律性的重要
二、科学是研究各种事物规律的学问
三、哲学是研究事物最一般的发展规律的科学
第二章　哲学是党性的科学
一、唯物论与唯心论
二、哲学的阶级基础
三、哲学本身的斗争和发展
第三章　辩证法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世界观
一、辩证法唯物论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
二、辩证法唯物论的思想来源
三、辩证法唯物论与中国无产阶级
什么是辩证法（1940.9—1941.1）
第一章　事物的普遍联系
一、什么是事物的联系
二、怎样从联系的观点上看事物
三、从联系上看事物的意义
第二章　论事物的运动变化
一、什么是事物运动变化
二、怎样从运动变化的观点来看事物
第三章　论质量的互相转变
一、什么是质
二、什么是量
三、量变质和质变量
第四章　论对立的统一（上）

一、什么是对立的统一
当前文化运动的任务（1940.8）
文学上的才能是哪里来的？（1940.9）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1940.10）
民主与集中的关系（1940.11）
自由亡国论（1940.12）
鲁迅先生早期对于哲学的贡献（1941.1）
一、时代环境
二、辩证法
三、唯物论与理想主义
关于辩证法论理学认识论的一致性（1941.2）
辩证法唯物论怎样应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1941.3）
关于研究哲学应注意的问题（1941.4）
光明（1941.5）
进一步认识中国的现实（1941.8）
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1941.8）
一、前言
二、辩证法唯物论思想的发展情况
三、唯生论和力行哲学
四、“中”的哲学
反对主观主义（1941.9）
谈主观主义及其来源（1941.10）
庆祝郭沫若先生五十寿辰（1941.11）
不要误解“实事求是”（1942.4）
介绍五四文化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争论（1942.5）
“有的放矢”及其他——学习杂记（1942.5）
学习观念的革新（1942.5）
谈讽刺（1942.5）
谈延安文艺工作的立场、态度和任务（1942.6）

关于唯物论的几段杂记（1942.9）
　一、实际、经验、理论
　二、谈分析
　三、谈综合
怎样改造了我们的学习——在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学习总结报告（1942.10）
　一、我们学习上有哪些主要的缺点呢？
　二、什么是我们改造学习的方针和办法呢？
　三、我们的学习是怎样改造过来的呢？
　四、我们得到了一些什么经验呢？
哲学战线上的列宁时代——为列宁逝世纪念日作（1943.1
）
人民的成功（1943.2）
共产党的本领在哪里（1943.3）
社会科学要研究什么（1943.3）
旧的恶习惯应该抛弃（1943.3）
两个相反的传统（1943.3）
谈起（1943.3）
建立新的劳动观念（1943.4）
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1943.4）
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的人生观问题——答陈俊三同志（1943
.6）
六·二三纪念（1943.6）
向“瓢虫”子孙们警告（1943.7）
希特勒之流乃是白痴——兼答流激同志的问（1943.7）
《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1943.8）
　一、关于“诚”的思想
　二、关于知与行的思想
　三、关于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思想
扒手的诡计（1943.8）

逼上梁山（1944.1）
群众需要精神食粮（1944.1）
人民的军队（1944.2）
劳动也是整风（1944.2）
向日本弟兄们致敬（1944.2）
新办法（1944.2）
群众自己的秧歌队（1944.3）
前方文艺运动的新范例（1944.4）
《惯匪周子山》（1944.5）
改善家庭关系，建设新家庭（1944.7—8）
美术工作与群众的进一步结合（1944.8）
祸首（1944.10）
“军人乐”（1944.10）
改变面目改变脑筋（1944.11）
“中国大众的立场”（1944.11）
降魔（1944.11）
打击与回击（1944.12）
谈面子（1944.12）
不埋没人（1944.12）
再谈面子（1944.12）
柱子（1944.12）
人类科学文化的胜利——庆祝苏联科学院二百二十年纪念会（1945.6）
血肉相连（1945.7）
难（1945.7）
类推（1945.7）
一往无前（1945.8）
东方强盗就缚以后（1945.9）
文艺工作者到前方去（1945.9）
反面文章（1945.9）

一个声援（1945.10）
欢迎叶挺将军（1946.3）
从理论工作方面看博古同志（1946.4）
悼念我们的社长和战友博古同志（1946.4）
谁是杀人的凶手（1946.9）
反对经验主义（1948.7）
附录一：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1942年主编）
例言
毛泽东　改造我们的学习（代序）
第一章　绪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特点
一、列宁论马克思主义与旧唯物主义旧社会主义的分歧
二、列宁论科学精神与革命精神相结合
三、列宁、斯大林论“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四、斯大林论两派马克思主义者
第二章　理论与实践
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事实是共产主义的出发点，实践是真理的标准
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理论与实际的关系，理论对于实际的重要性
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论研究、分析具体环境、条件及历史特点是决定无产阶级政策的基础
四、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论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需要最大的灵活性
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论主观主义、革命空谈与革命的实际背道而驰
六、列宁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与怯懦的改良主义
七、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与客

观主义及自发论、自流论
八、列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论两条战线的斗争
九、列宁、斯大林论政治的明确性和肯定性，反对调和派
十、列宁、斯大林论共产党员要成为有头脑的政治家
十一、列宁、季米特洛夫论必须终结书本与生活的脱离
十二、恩格斯论单纯的理论家不是真正的理论家
十三、斯大林论理论与实际一致的典型——列宁
十四、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
第三章　历史科学的创造
一、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论唯物辩证法
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规律是从自然和历史中找寻出来，规律以合乎自然及历史为依归
三、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
四、列宁论历史唯物主义早已由假设变成科学上被证明了的原理——惟一的科学历史观
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应用
六、列宁论辩证法与折衷主义
七、恩格斯论历史唯物主义与庸俗唯物主义
八、恩格斯对于口头“唯物主义”者的指斥
九、马克思、列宁论庸俗经济学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些特征
十、列宁论共产主义思想是人类知识积累的总汇，一定的思想联盟之必要，应该用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黑格尔的辩证法
十一、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论最伟大的科学家是反对偏见、打破传统的创造家
第四章　国际经验、民族特点、革命传统
一、列宁论革命科学的两个要求

二、列宁论用批判的态度采取别国经验
三、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论考察、研究民族的特点
四、列宁论在一定条件下利用革命传统
附录二：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1931—1945年译）&海涅著
序
一、新的歌
二、税关的检查
三、无聊的亚琛
四、科隆的大教堂
五、父亲莱茵
六、属吏
七、梦里的自由
八、密尔海姆的回忆
九、哈根的中餐
一〇、威士特法仑的弟兄
一一、秃陀堡的森林
一二、狼的嗥叫
一三、不幸的救世主
一四、太阳，你这控诉的火焰！
一五、红胡子的马匹
一六、我们也能解放自己
一七、半阴半阳的现在
一八、明登的恶梦
一九、汉诺威的国王
二〇、会见了母亲的时候
二一、汉堡的大火灾
二二、人的改变
二三、汉堡的守护神

二四、我染上了怀乡病
二五、我发誓保守缄默
二六、德国将来的气息
二七、诗的火焰
译者后记
附录三：《“ 有的放矢 ”及其他——哲学 · 文艺 · 随感集》前言及目录
封底